前言

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是一部反映苏联人民在反法西斯卫国战争时期的英雄业绩的杰出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小说于一九四五年出版后，受到苏联国内外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次年获得苏联国家奖。一九五一年又出版了作者的修订本，使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达到更高的统一。

一九四二年七月，顿巴斯矿区的小城克拉斯诺顿被德国法西斯军队占领，当地未及撤退的青年，以共青团员为核心，在地下区委的领导下，组成了“青年近卫军”，展开了英勇的斗争，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使人民受到巨大的鼓舞。在一九四三年一月克拉斯诺顿收复的前夕，由于叛徒的出卖，大部分成员不幸被捕，壮烈牺牲。这就是小说《青年近卫军》所根据的事实基础。

小说通过“青年近卫军”组织、克拉斯诺顿地下区委、伏罗希洛夫州游击队和红军正规部队的对敌斗争，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的画卷，歌颂了伟大的卫国战争，展现了战争的宏伟规模和广泛的群众基础，揭露了德国法西斯的凶残本性，表明了正义战争必胜的真理。

小说以极大的热情表现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成长的苏联青年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英雄气概，塑造了“青年近卫军”总部领导人奥列格、万尼亚、邬丽亚、谢辽萨、刘巴等青年英雄的光辉形象，同时也着力描写了地下州委书记普罗庆柯、区委书记刘季柯夫等年长一辈领导人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显示了他们对祖国、对社会主义事业和共产主义理想的无比忠诚。小说以感人的艺术力量令人信服地表现了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是“青年近卫军”力量的源泉，具有深刻的思想教育作用。

小说开始时，一群姑娘在河边嬉戏，忽然听到了震耳欲聋的炮声和敌机轰鸣声，美好的和平生活霎时间中断了。悲剧的场面出现了，人们背井离乡，炸毁矿井。州委指挥疏散，建立地下组织。然后是以奥列格为核心的青年组织逐渐形成，并得到了以刘季柯夫为首的地下区委的领导。激动人心的对敌斗争不断展开：散发传单，揭露法西斯的暴行和谎言，传播红军坚守莫斯科和在斯大林格勒反攻的消息；绞死伪警福明，警告卖国求荣的叛徒，杀死敌人警卫，解救被俘的红军战士；高插红旗，庆祝十月革命节，鼓舞人们的斗志；武装袭击敌人，破坏交通运输；炸毁“职业介绍所”，挫败敌人强迫苏联人民到德国去服苦役的阴谋。

同时，地下区委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由于叛徒的出卖，区委领导人之一舒尔迦和参加地下斗争领导工作的井长瓦尔柯最早被捕牺牲。普罗庆柯领导的州游击队遭受挫折，化整为零，配合正规军的行动，迂回作战，节节胜利。最后还是由于叛徒的出卖，“青年近卫军”和地下区委先后被破坏，几乎全部被捕，形成了悲剧的高潮。但是，通过老少两代的视死如归、慷慨就义，反法西斯战争必胜、正义事业必胜的信心却有力地鼓舞着人们。

在小说中，青年们的形象鲜明突出，个个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奥列格谦虚谨慎，甚至有些腼腆，偶然还表现出稚气，但考虑问题周密而又果断，在斗争中日臻成熟，迅速成长，是一个出色的组织家。邬丽亚充满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在战火即将烧到跟前的时候还在河底摘下百合花插在头发上，后

来在严峻的斗争环境中愈来愈深沉、稳重，并且严于责己，使同伴们看到她就会产生一种信心。谢辽萨刚强勇敢，渴望丰功伟绩，富于冒险精神，斗争中最危险的任务都是由他去完成的。刘巴热情洋溢，无忧无虑，天不怕地不怕，可是智勇双全，意志坚强，出色地完成了情报员的工作。在学校被称为“教授”的万尼亚勤奋好学，爱好诗歌，自己也写诗，但做事严肃认真，他是“青年近卫军”的传单与文告的起草人。指挥员杜尔根尼奇在部队里受过战火的考验，有军人的风度，办事严格，一丝不苟。总之，“青年近卫军”的成员都各有自己的性格。

尽管如此，作为一个集体，这些青年却有一些共同的性格特征，那就是：“喜欢幻想和渴望行动、富于想象和讲求实际、酷爱善良和严峻无情、胸襟开阔和精明打算、热爱人间欢乐和自我克制——这些似乎难以结合起来的特点合在一起就创造了这一代人的独特的面貌。”

在精心刻画青年形象的同时，作者也出色地勾勒出年长一辈领导人的形象。普罗庆柯具有州委领导人的气魄，能刚能柔，蓝眼睛里闪耀着狡黠的光芒。刘季柯夫沉着镇静，眼神严峻，但诚挚可亲，他在隐蔽期间能够装得表情冷漠，动作缓慢，但一听到可以出去工作，就“像猛狮一样有力地一步跨到门口”。刘季柯夫的副手舒尔迦是一个参加过国内战争的老布尔什维克，为了社会主义事业勤勤恳恳地奋斗了一生，可是他对老朋友的信任还不及对一个不可靠的接头地点的信任，终于铸成大错，很快便被出卖。井长瓦尔柯理应渡河到大后方去，可是为了整顿桥上的混乱局面，自动留了下来，后来参加了地下斗争。地下区委另一个领导人巴腊柯夫担着“俄奸”的恶名，为对敌斗争呕心沥血。

对于德国法西斯，作者则以讽刺的笔法尽情加以嘲弄、揭露。脖子转动时活像一只鹅的男爵文采尔将军，只知道严刑拷打苏联党团员的大肚皮宪兵站长勃柳克纳，因为身上藏着掠夺来的各国钱币乃至从死者嘴里拔下的金牙而难得洗澡、浑身臭气的党卫军军士芬庞，就是他们的代表。在法西斯“新秩序”底下，由他们扶植起来的叛徒、俄奸以及形形色色的社会渣滓，也都原形毕露。

小说细腻地描写了奥列格的母亲叶列娜开始时如何为儿子的秘密活动而忧心忡忡，最后如何走上了和他共同斗争的道路；作家恰如其分地描写了邬丽亚和阿纳托里、谢辽萨和华丽雅、奥列格和妮娜、刘巴和列瓦肖夫等男女青年间纯真的爱情，也深情地描写了普罗庆柯和卡佳、刘季柯夫和叶芙多基雅这几对处在患难中的夫妻之间的关系。他们不管是年长还是年轻，都是有血有肉的人，感情丰富的人。

虽然小说是以事实为基础，但正如作者所指出的：“我写的不是历史，而是小说。”这是一部艺术作品。这里有严格按照事实，甚至事实细节写成的部分，但也有作者的想象和虚构，还有不少作者自己和他这一代人年轻时的经历和体验。后者特别表现在感人的回忆与作者擅长的抒情插话里。作者以他一贯热爱生活、热爱世上一切美好事物的全部心灵，高昂激越地写出了他所向往的新人。小说中浪漫主义因素与现实主义因素的有机结合是作者的创作特点，它鲜明地表现在人物的塑造上。小说中的英雄人物是理想的，但又是活生生的。小说中处处可以感到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美与丑的强烈对比，但读来毫不牵强，而是自然而然地出现的。这一切，都使这部小说成为既具有高度思想性、又具有高度艺术性的作品。

法捷耶夫（1901—1956）是中国人民非常熟悉的作家。他出身革命家庭，幼年在海参崴商业学校学习时就同布尔什维克接近，十八岁入党，参加过国内战争和镇压喀琅施塔得叛乱。两次受伤后，到莫斯科矿业学院学习。后来调去做党的工作。这些经历都在他以后的写作活动中起过作用。

一九二三年他发表了短篇小说《逆流》（后改名《阿姆贡团的诞生》），次年发表中篇小说《泛滥》。一九二七年发表的描写远东游击斗争的长篇小说《毁灭》给他带来广泛的声誉，成为苏联革命初期经典性作品之一。小说摒弃当时流行的抽象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细腻地描绘了现实，展示了人物在革命烈火中的精神成长和性格形成。这部小说在一九三一年就由鲁迅译成中文出版（一九七八年又出版了直接译自俄文的新译本）。毛泽东在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它作了高度的评价，指出“它并没有想去投合旧世界读者的口味，但是却产生了全世界的影响”。另一部长篇小说《最后一个乌兑格人》（四部，1929—1940）也在一九六三年出版了中译本。小说在国内战争的背景上，描绘出数十年间社会生活变化的巨幅画卷，揭示了共产党员和革命知识分子的丰富的内心世界。继《青年近卫军》之后的第四部长篇《黑色冶金》是描写当代生活的，只发表了若干片段，远未完成。

法捷耶夫还是一位卓越的文艺批评家、理论家。他的大部分论文、报告、书信收集在他生前编就的《三十年间》内，于一九五七年出版。其中相当一部分已有中译。这些论著对社会主义美学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法捷耶夫长期担任苏联文学界的领导工作，一九二六至一九三二年是“拉普”领导人之一；一九三九至一九五六年担任苏联作家协会书记、总书记、主席。同时，他在苏共第十八次、十九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一九五六年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当选候补中央委员，一九五〇年起还担任世界和平理事会副主席。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他率领苏联文化艺术代表团来我国访问，受到热烈的欢迎。

《青年近卫军》中译本初版于一九四七年。根据原书修订本重译的译本于一九五四年出版，译文经校订后于一九七五年再版。此后不断重印，拥有广大的读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次译文又作了一些修改。

译　者

一九九二年九月

第一章

战友们，迎着朝霞前进吧！
我们用霰弹和刺刀给自己开路……
战斗吧，工农的青年近卫军，
让劳动成为世界的主人，
把大家团结成一家人！
——《青年歌》

“不，瓦丽雅，你来看看，这是多么美啊！真是美极了！完全像雕刻出

来的……可它不是大理石的，也不是雪花石膏的，它是活的，不过又是那么冷冰冰的！而且这是多么精致优美，凡人的手再也做不出来。你看，它这样静静地贴在水面上，纯洁、端庄、恬静……这是它在水里的影子，简直很难说，这两朵里面哪一朵更美。还有颜色呢？你看，你看，它并不是白的，我是说，它是白的，可是又有多少深浅不同的色调啊——带一点黄，带一点粉红，又像是天蓝的。还有花心呢，滋润得像珍珠，简直把人的眼都看花了，——这些颜色人们是叫都叫不出来的！……”

一个姑娘从小河边的柳丛里探出身子，这样说道。她穿着雪白的上衣，有波纹的黑发梳成两条辫子，一双非常美丽的水灵灵的黑眼睛，突然放出强烈的光芒；她本身就像是这朵倒映在暗色河水里的百合花。

“居然还有工夫来赏花！你这个人真怪，邬丽亚①！”那个叫瓦丽雅的姑娘回答说，她也跟着伸出头来望着小河。她的颧骨略微有点高，鼻子有点儿翘，但是她的焕发着青春与善良的脸却非常动人。她的眼睛对百合花望也不望，只是不安地在岸上搜寻着跟她们走散了的女伴，喊了一声：“喂！……”

①邬丽亚是邬丽亚娜的小名。

“喂—喂……喂—喂……喂！……”就在近旁有几个不同的声音答应着。

“你们到这边来吧！……邬丽亚找到一朵百合花啦。”瓦丽雅带着爱怜和嘲笑的神色瞅了朋友一眼，说。

就在这时候，好像远处雷鸣的回声似的，炮声又隆隆地响了起来，——这是从西北方，从伏罗希洛夫格勒附近传来的。

“又来了！”

“又来了……”邬丽亚低声重复着，她眼睛里射出来的强烈的光芒熄灭了。

“这一次他们真会冲进来吗？我的天哪！”瓦丽雅说，“你记得吗，去年都要把我们急死了？结果总算平安无事地过去了！可是去年他们离得没有这么近。你听见吗，炮声响得多么厉害！”

她们默默地倾听了一会。

“我听到这种声音，再看到这么明朗的天空，看到满树的青枝绿叶，感到脚底下被太阳晒得热乎乎的青草，闻到草的香味，——我心里就感到非常痛苦，仿佛这一切已经要永远、永远离开我了，”邬丽亚的低低的声音激动地说，“这次战争好像使人心肠变硬了，本来你已经学会了无论对什么事都无动于衷，可是突然你不由得对一切又产生了这样的爱，这样的怜惜！……你知道，这种话我是只能对你说的。”

她们的脸在叶丛中挨得很近，她们的呼吸混在一起，她们的眼睛互相对望着。瓦丽雅的眼睛是浅色的、善良的，中间隔得很宽，眼睛里含着温顺和爱慕的神情望着朋友。邬丽亚的眼睛是深褐色的、大大的，——不是普通的眼睛，而是诗人笔下的美目，——长长的睫毛，乳色的眼白，神秘的黑瞳人，从这双瞳人深处仿佛又射出了湿润的强烈的光芒。

远处的排炮声隆隆地响着，连这里河边低地上的树叶都被震得微微抖动；每一阵炮声都使姑娘们的脸上现出不安的阴影。

“你记得昨天傍晚草原上是多么美吗？你记得吗？”邬丽亚压低声音问道。

“记得，”瓦丽雅轻声说，“那落山的太阳，你记得吗？”

“是啊，是啊……你知道，人家都说我们的草原不好，说它单调，没它

是一片红褐色的，尽是些丘陵，好像住不得人，可是我倒很喜欢它。我记得，奶妈身体还健壮的时候，她常带我到瓜田里干活，那时我还很小，我就仰脸躺在那儿，拚命往高里看，心里想，不知能望到多高，不知能不能望到天顶？昨天我们看着落日，后来又看着那些汗淋淋的马匹、大炮、马车和伤员，那时候我心里痛苦极了……红军战士们都是筋疲力尽，满身尘土。我忽然明白过来，这根本不是什么重新部署，这是在进行着可怕的，对啦，正是可怕的撤退。所以他们根本不敢正眼望人。你注意到吗？”

瓦丽雅默默地点点头。

“我望望这片草原，我们在那儿不知唱过多少歌曲，再望望那落山的太阳，眼泪几乎就要流出来了。可是过去你常看见我哭吗？昨天傍晚的情形你还记得吗？……天快黑了，他们过了一批又一批，炮声、地平线上的闪光、通红的火光，一直没有停过，——大概是在罗文基吧，——再加上那紫红色的晚霞，色彩那么浓。你是知道的，世界上我什么都不怕，什么斗争、困难、痛苦我都不怕，我只希望能知道应该怎么做……有一样可怕的东西压在我们心上。”邬丽亚说，一阵忧郁、蒙胧的光辉使她的瞳人变成了金色。

“可是我们过去的生活是多么美好啊，是吗，邬丽亚？”瓦丽雅热泪盈眶地说。

“全世界的人都可以过美好的生活，只要他们愿意，只要他们懂得的话！”邬丽亚说，“可是有什么办法，有什么办法呢！”她用孩子般的细声拉长声调说。她听到同伴们说话的声音，声调就变了，眼睛里也闪耀着淘气的神情。

她迅速地甩掉光脚上穿的便鞋，把深色的裙摆紧紧攥在狭长的、晒黑的手里，勇敢地走下水去。

“大家看啊，百合花！”从树丛里跳出一个纤瘦、灵活、眼睛调皮大胆的姑娘，高声叫道，“别动，是我的！”她尖叫了一声，双手猛地把裙子撩起，黝黑的光脚一闪，就跳到水里，激起琥珀色的水珠溅了她自己和邬丽亚一身。“啊呀，这里的水好深！”她一只脚被水草绊住，一边后退，一边笑着说。

另外六个姑娘，也叽叽喳喳地拥到了河边。她们也像邬丽亚、瓦丽雅以及刚刚跳到水里的纤瘦的莎霞一样，都穿着短裙和普通的上衣。顿涅茨的热风和骄阳仿佛故意要突出每个姑娘天生的特点，使这个姑娘的胳膊、腿、脸庞、脖颈一直到肩胛骨，都变成金色，使那一个姑娘变成浅黑色，把另外一个姑娘又晒得好像在炉子里烤过似的。

不管哪里的姑娘都是一样，只要有两个以上的姑娘聚在一块，她们就会谁也不听谁的，各自拚命用又高又尖的音调大声说着，仿佛自己所说的一切都是极端重要的话，应该让全世界都知道和听到似的。

“……他张开降落伞跳下来，这是真的！样子那么可爱，鬈头发，白皮肤，眼睛圆溜溜的，像小扣子一样！”

“说实在的，我可当不了护士，一看见血就把我吓死了！”

“当真会把我们丢下不管吗？你怎么能这样说！这根本不可能！”

“啊，这朵百合花真美极了！”

“玛雅，你这个小茨冈，要是把我们扔下，那可怎么办？”

“看啊，莎霞这个人真怪，莎霞这个人真怪！”

“一见钟情，你这个人哪！”

“邬丽亚，你这个怪人往哪儿钻？”

“你们疯啦，也不怕淹死！……”

她们说的是顿巴斯特有的、不很好听的混合方言，这种方言揉合了俄罗斯中央几个省份的语言，夹杂着乌克兰土话、顿河哥萨克的方言以及亚速海几个港埠——马利乌波尔、塔甘罗格、顿河罗斯托夫——的口语。但是世界上无论哪一种语言，只要从姑娘们嘴里说出来，就都变得美妙动听了。

“我的好邬丽亚，你要它干什么？”瓦丽雅说，她的善良的、隔得很宽的眼睛担心地望着：朋友的晒黑的小腿已经没在水里，后来连雪白的膝盖都被水淹没了。

邬丽亚小心地用一只脚在长满水草的河底试探着，把裙摆提得更高，甚至露出了黑裤衩的边，又迈了一步。她低低弯下修长匀称的身子，用一只空着的手抓住百合。一条沉甸甸的黑辫子滑到了前面，蓬松的大辫梢落到水里，在水上漂着，但是在这一刹那，邬丽亚只用手指最后使了一下劲，就把百合花连着长长的茎一起拔了起来。

“真了不起，邬丽亚！凭你的行动，你完全配得到联盟英雄的称号……不是全苏联的，而是我们五一矿山闲不住的姑娘们联盟的英雄！”莎霞站在没到腿肚的河水里，圆睁着淘气的褐色眼睛望着朋友，说。“把花儿给我！”说着，她把裙子朝双膝中间一夹，用纤细灵活的手指拿过百合花，给邬丽亚插在有着天然大波纹的黑发里。“啊，你戴着正合适，简直叫人嫉妒！……等一等，”她突然说，就抬起头凝神细听着。

“什么地方又响起来了……你们听见吗？这该死的！……”

莎霞和邬丽亚连忙爬上了岸。

姑娘们都抬起头来，留神细听着那断断续续的轰响声，极力要在白热的天空看到飞机。

这种轰响声时而像蜂鸣那样尖细，时而变成低沉的嗡嗡声。

“不止一架，起码有三架呢！”

“在哪儿，在哪儿？我什么也没看见……”

“我也没看见，我是听声音听出来的……”

发动机的震动声一会儿在头顶融成一片可怕的隆隆声，一会儿又分成为单独的、刺耳的或是低沉的轰轰声。飞机的隆隆声已经到了头顶上，虽然看不见飞机，但是机翼的黑影却仿佛已经在姑娘们的脸上掠过。

“大概是到卡缅斯克去的，去炸渡口……”

“也许是到米列罗沃去的。”

“得了吧，你还说到米列罗沃去呢！米列罗沃已经放弃了，昨天的战报你没有听吗？”

“反正战斗还在南边进行。”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姑娘们一边谈论，一边不由又去倾听远处隆隆的炮声，炮轰似乎愈来愈近了。

不管战争是多么艰苦可怕，不管它给人们带来的损失和痛苦是多么惨重，但是身心健康的欢乐的青年，怀着天真善良的利己主义，怀着爱和对未来的梦想，是不愿意也不会在共同的危险和痛苦后面看到自己的危险和痛苦的，除非这种危险和痛苦会突然袭来，并且破坏他们的幸福的步伐。

邬丽亚·葛洛莫娃、瓦丽雅·费拉托娃、莎霞·庞达烈娃和另外几个姑娘，都是今年春天才从五一矿山的十年制学校毕业的。

中学毕业，这是青年人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而战时从中学毕业，这更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

去年夏天战争刚开始的时候，高年级学生——人们还管他们叫男孩子和女孩子——整个夏天都在克拉斯诺顿城附近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里、矿井里、伏罗希洛夫格勒的机车制造厂里劳动。一部分学生甚至到了现在制造坦克的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

秋天，德国人侵入顿巴斯，占领了塔甘罗格和顿河罗斯托夫。整个乌克兰只剩一个伏罗希洛夫格勒州没有被德国人占领；跟部队一起撤退的基辅政府迁到了伏罗希洛夫格勒，而伏罗希洛夫格勒州的机关和斯大林诺州（以前叫尤佐夫卡）的机关，现在都设在克拉斯诺顿。

深秋时节，战线已经在南方稳定下来，但克拉斯诺顿满是红色泥泞的街道上，还是有来自被德军占领的顿巴斯各区的人们络绎不绝地经过。人们靴子上带来的草原上的泥泞，似乎使街上的泥泞越来越多。学生们已经完全准备好随着学校撤退到萨拉托夫州，但是撤退计划取消了。德军被远远地拦截在伏罗希洛夫格勒西面，顿河罗斯托夫从德国人手里夺回来了；冬天，德国人在莫斯科城下吃了败仗，红军开始进攻，人们都希望一切还会平安无事地过去。

学生们已经习惯有外来人住在他们的舒适的家里。在克拉斯诺顿有着防火瓦屋顶和砖墙的标准式小屋里，在五一村的农舍里，甚至在“上海”的土房里，——这些小小的寓所在战争最初几个星期里曾因为父兄奔赴前线而显得冷落，——现在都有外来机关的工作人员、驻扎在此地或开赴前线的红军部队的指战员们住着或过夜。

他们学会了辨别一切兵种、军衔和武器，辨别自己的和缴获的摩托车、卡车和小汽车的牌号。不仅在坦克笨重地停在道旁的白杨树荫下，装甲钢板上蒸发出摇曳不定的热气的时候，就是在它们像迅雷般在尘埃滚滚的伏罗希洛夫格勒公路上疾驶，或是在秋雨泥泞和冬日积雪的军用大道上费力地开往西方的时候，他们也能一眼就看出坦克的型号。

他们不仅根据外形，凭声音也能区别出自己的飞机和德国飞机，不管这时顿涅茨的天空是阳光灿烂，是红土漫天，是繁星密布，还是狂风怒号，一片漆黑。

“这是我们的‘拉格’①（或是“米格”②，或是“雅克”③）。”他们平静地说。

“那是‘密塞’④来了！……”

“这是‘容克—87’⑤飞往罗斯托夫去。”他们不经意地说。

①②③ 都是苏联飞机型号的缩写。

④⑤都是德国飞机的型号。

他们习惯了在防空队里值夜班，肩头挂着防毒面具在矿井里、在学校和医院的屋顶上守望。不论是远方的轰炸震动了空气，探照灯光像织针似地远远在伏罗希洛夫格勒的夜空中交叉照射，这边那边的地平线上不时升起通红的火光，或者是敌人的俯冲飞机在光天化日下向草原上长长的卡车队投下高空爆炸弹，后来又怒吼着用炮和机枪沿公路扫射，使公路上的战士和马匹像滑行艇开过后的水流那样向两边奔散，——遇到这种情况，谁也不感到心惊胆战了。

他们喜爱去集体农庄田野的遥远的路途，爱在卡车开过草原时迎风高歌。他们喜爱在无垠的田野里收割穗大粒肥的小麦的夏季农忙季节，喜爱夜深人静时燕麦秸堆里絮絮的知心话和突然迸发的笑声。他们喜爱在屋顶度过

的漫长的不眠之夜，这时姑娘的火热的手掌一动不动地、一连两三小时放在小伙子的皮肤粗糙的手里，朝霞在苍白的丘陵上空渐渐升起，露珠在灰红的屋顶上闪烁着，从槐树卷缩的秋叶上落到庭园的地上，空气中散发出凋零的花草的根在湿土里腐烂的气味以及远方大火的烟味，公鸡还是若无其事地啼叫着……

接着，他们今年春天毕业了，同老师告别，同自己的组织告别；战争，好像是在等候着他们似的，直冲着他们来了。

六月二十三日，我军朝哈尔科夫方向撤退。七月三日，像晴天霹雳似的，广播了我军在防守八个月之后放弃塞瓦斯托波尔城的消息。

旧奥斯科尔放弃了，罗索希放弃了，康杰米罗夫卡放弃了，战事在沃罗涅什西面进行，战事在通沃罗涅什的要道上进行。七月十二日——逼近了利西昌斯克。突然之间，我方正在撤退的部队已经涌过克拉斯诺顿。

利西昌斯克，这就在近旁。到了利西昌斯克，就是说，德国法西斯匪徒明天就可能开进伏罗希洛夫格勒，后天就可能开进这里，开进克拉斯诺顿和五一村，开进那些每一棵小草都是熟悉的、有着从庭园里钻出来的覆着尘土的茉莉和丁香的小巷，闯进爷爷种了苹果树的小果园，闯进百叶窗紧闭的阴凉的农舍，——在那里的钉子上，还挂着父亲下工回家去军事委员会之前亲手挂上的矿工短袄；在那里，母亲的青筋突露的温暖的手把每一块地板都擦得发亮，给窗台上的中国月季浇了水，在桌上铺了新的发出粗麻布气味的花台布。

在前线暂时沉寂的时期，就有一批少校军需在城里安居下来，仿佛要在这儿过一辈子似的。他们的胡须都刮得很干净；他们非常认真、审慎、见多识广。他们跟房东们玩纸牌的时候谈笑风生，乐意解释前线的形势。他们在市场上买腌西瓜，有时还把罐头食品送给房东做菜汤。在新一号矿井的高尔基俱乐部里和市立公园的列宁俱乐部里，总有许多尉官出入，他们爱跳舞，愉快活泼，好像很懂礼貌，又好像很顽皮，——叫人很难说。尉官们在城里时来时往，但是总有新人到来，姑娘们对这些经常变换的、经受风吹日晒的、英气勃勃的脸已经十分习惯了，觉得他们全都是自己人。

可是突然，他们一下子都走了。

上杜望纳雅车站是一个清静的车站，每个出差回来或回家探亲的克拉斯诺顿人，或是一年一度回来度暑假的大学生。平时到了这里，就觉得已经是到了家。现在，在上杜望纳雅以及沿李哈雅——莫罗佐夫斯克——斯大林格勒铁路线所有的小站上，都拥塞着车床、人、炮弹、机器和粮食。

门前有槐树、小槭树和白杨遮荫的小房子的窗口，传出妇女和孩子的哭泣声。在那里，母亲在给将要随着保育院或学校一同撤退的孩子整理行装；在那里，父母在送别子女；在那里，要同自己的组织一起离开城市的丈夫或父亲在同家人告别。在某些百叶窗紧闭的小房子里，却笼罩着比母亲的哭泣更为可怕的寂静，——房子里的人也许都走空了，也许只剩下一个年迈的老母亲，她送走了全家，心里难受得像压着铁块，但是她连哭的气力都没有了，只是垂着黝黑的双手僵坐在上房里。

清晨，姑娘们在远方的炮轰声中醒来，就同父母争论，劝父母立即离开，让她们单独留下，做父母的却说，他们的一生已经算完了，她们这些团员却应当去躲避罪恶和灾难。争论之后，她们匆匆地吃了早饭，就跑出去互相探听消息。她们就这样像鸟儿似的成群结队，炎热和焦虑使她们疲惫不堪，

她们有时在朋友家的光线昏暗的小屋里或是小花园里的苹果树下坐上几小时，有时跑到溪边树木茂密多荫的峡谷里去，心里暗暗预感到她们将会遇到的无论情感或理智都无法理解的不幸。

现在，不幸果然来临了。

“伏罗希洛夫格勒大概已经放弃了，可是没对我们讲！”一个姑娘声音刺耳地说。她身材矮小，宽脸，尖鼻子，头发光亮平滑，好像粘在头上似的，两条小辫灵活地朝前翘着。

这个姑娘姓维丽柯娃。名叫齐娜。可是从小在学校里就没有人叫她的名字，只叫她的姓：维丽柯娃，维丽柯娃的。

“你怎么能这么说，维丽柯娃？没讲，就是还没有放弃。”玛雅·毕格里万诺娃说。这是一个黑眼睛的美丽的姑娘，肤色生来就像茨冈姑娘那样黝黑，她说完这话，就带着自尊的神情把任性的、饱满的下唇抿了起来。

在今年春天毕业之前。玛雅是学校的团支部书记，她习惯了纠正大家，教育大家，总之，她希望在任何时候一切都是正确的。

“你不说，我们也知道：‘姑娘们，你们不懂得辩证法！’”维丽柯娃学玛雅学得像极了，使大家都哄笑起来。“要他们对我们说真话，休想！我们一直相信，相信，现在可不相信他们了！”维丽柯娃说，她那双挨得很近的眼睛闪动着，两条朝前撅着的小辫像甲虫的触角那样威风凛凛地翘着。“罗斯托夫恐怕也放弃了，我们连跑都没处可跑了。他们自己倒溜得快！”

维丽柯娃显然是在重述她常听到的话。

“你的议论真奇怪，维丽柯娃，”玛雅极力不提高声调说，“你怎么能说这种话？你要知道，你是个共青团员，你还当过少先队的辅导员呢！”

“别理她。”舒拉·杜勃罗维娜轻声说，她是一个不爱说话的姑娘，年纪比别的姑娘都大，头发剪成男式，颜色很浅的眉毛和一双怕羞的浅色眼睛，使她的脸带有一种异样的神情。

舒拉是哈尔科夫大学的学生，父亲是克拉斯诺顿的鞋匠和马具工人。她在去年哈尔科夫被德军占领以前回到父亲家里。她比别的姑娘们大三四岁，但她总是喜欢跟她们在一起：她像少女那样暗暗地对玛雅怀着无限的爱慕，跟她形影不离，姑娘们都说，“她们两个就像线跟着针一样。”

“别理她。你再怎么说她也听不进去。”舒拉对玛雅说。

“叫我们去整整挖了一夏天的战壕，不知花了多少人力，害得我还生了一个月的病，可是现在有谁呆在这些战壕里呢？”矮小的维丽柯娃不听玛雅说的，自管说着。“战壕里都长了草！这难道不是事实？”

纤瘦的莎霞装出惊奇的神气耸耸瘦削的肩膀，眼睛睁得滚圆地望望维丽柯娃，长长地吹了一声口哨。

但是，姑娘们所以会过分注意地细听维丽柯娃的话，显然并不是因为她所说的内容，而是因为大家都不知道目前形势究竟如何。

“不，形势的确很坏，对吗？”东妮亚·伊凡尼兴娜胆怯地望望维丽柯娃，又望望玛雅说。她的眼睛里涌出了泪珠。在她们中间她年纪最小，差不多还是一个小女孩，长腿，大鼻子，浓厚的深栗色头发梳到大耳朵后面。

东妮亚的姐姐李丽亚从战争一开始就去前线当军医医士，在哈尔科夫一带的战事中下落不明。东妮亚最爱她的姐姐，从那以后，她就觉得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可怕的、无法挽回的，她的忧郁的眼睛也一直是泪汪汪的。

只有邬丽亚没有参加她们的谈话，对她们的激动不安似乎也没有同感。

她解开辫梢被河水浸湿的乌黑的大辫子，拧干头发，又把它编好。接着，她把两条腿轮换着伸出去让太阳晒干，好像倾听内心的声音似地低着头站了一会，她的乌黑的眼睛和头发被头上那朵洁白的百合花一衬，显得格外好看。腿晒干之后，她用狭长的手掌擦了擦脚底（她的瘦瘦的高脚背被晒黑了，下面好像围着一道浅色的箍），再擦擦脚趾和脚后跟，就用习惯的动作麻利地把脚伸进便鞋。

“唉，我真是个傻瓜，傻瓜！人家叫我进专门学校，我为什么不去呢？”纤瘦的莎霞说。“有人叫我进内务人民委员部①的专门学校，”她带着男孩子的满不在乎的神气望望大家，天真地解释说，“这样我就可以留下来待在德国人的后方，可你们还都蒙在鼓里。你们都在那儿发愁，可我一点也不着急。

①人民委员部是苏联以及各加盟共和国、各自治共和国的管理机关，一九一七年成立。一九四六年，人民委员部改称为部。内务人民委员部即内务部。

‘莎霞怎么会这么镇静？’哪知道，是内务人民委员部派我留下来的！我啊，我要把德国秘密警察机关里的笨蛋，”她突然嗤一下鼻子，带着狡猾的嘲笑瞅了维丽柯娃一眼，“我要把这些笨蛋爱怎么摆布就怎么摆布！”

邬丽亚抬起头来，严肃而注意地望了望莎霞，脸上好像抖动了一下：好像是嘴唇，又好像是那纤细的、轮廓秀丽的鼻孔动了一下。

“内务人民委员部不派我，我也要留下。有什么关系呢？”维丽柯娃怒冲冲地把触角般的小辫一撅，说，“既然谁都不管我，那我就要留在这里，像过去一样生活。那有什么关系？我是个女学生，照德国人的理解，就像革命前女学堂的学生。他们究竟是有文化的人，他们会把我怎么样？”

“像革命前女学堂的学生？！”玛雅叫了起来，她的脸突然涨得通红。

“我是刚从女学堂毕业出来的，您好！”

莎霞模仿维丽柯娃模仿得维妙维肖，姑娘们又哄笑起来。

就在这一刹那，一声沉重可怕的巨响，震动着空气和大地，差点没把她们的耳朵震聋。

树上的枯叶和树皮屑纷纷落下，连水面也起了微波。

姑娘们脸色发白，默默地互相对望了几秒钟。

“会不会是在什么地方扔了炸弹？”玛雅问。

“它们不是早就飞过去了吗，又没有听到有第二批！”东妮亚眼睛睁得大大地说，她总是头一个感到不幸。

这时，几乎是混在一起的两声爆炸，撼动了四周；一声很近，另外一声稍迟一些，离得很远。

姑娘们一声不响，都不约而同地急忙朝村里跑去，只见她们的晒黑的小腿在矮树丛中闪动着。

第二章

姑娘们在顿涅茨草原上跑着；这里的草原被太阳晒得很干，又被羊群践踏，一动脚就会扬起一阵尘土。简直难以相信，刚刚还有清新葱郁的树木环抱着她们。这个峡谷非常幽深，中间有一条河水流过，两岸的树林像狭带

般蜿蜒着。姑娘们跑过三四百步之后，已经看不见峡谷、河流和树林——

草原把这一切都吞没了。

这不是像阿斯特拉罕草原或是萨利斯克草原那样地势平坦的草原，它上面全是丘陵和峡谷。这儿有一个巨大的向斜层，它的两翼通到地面，远远高耸在南北两面的地平线上，就像是两堵巨浪。这个向斜层好像一只热气腾腾的蓝色的盘子，里面白热的空气在摇曳颤动。

在这片干燥的天蓝色草原的坑坑洼洼的表面，在它的丘陵和洼地里，矿区的村子和农庄参差分布，掩映在碧绿的、暗绿的和金黄色的方方的小麦地、玉蜀黍地、向日葵地和甜菜地中间。这里还现出一些孤零零的井架，井架旁边高耸着由矿井里抛出的矸石堆成的、一堆堆深蓝色的锥形矸石堆，比井架还高。

在村子和矿场之间的每一条道路上，逃难的人群络绎不绝，都急着要赶到通卡缅斯克和李哈雅的大路上去。

远方传来的激战的声音，说得更准确些，是在西方、西北方和遥远的北方进行的许多大大小小战斗的声音，在这里辽阔的草原上，都清晰可闻。远方大火的烟雾向天空冉冉升起，有的像一片片的密云，停留在地平线上。

姑娘们刚跑出林木茂密的峡谷，首先就看到又有三处地方在冒烟：两处近，一处远——在被丘陵挡住看不见的城区里。这是一缕缕在空中逐渐消散的灰色轻烟，要不是这些爆炸声，要不是姑娘们愈走近城区愈闻得出的那股刺鼻的、大蒜似的气味，她们也许不会注意到它们。

五一村前有一座圆圆的小山；她们跑到山上。这个分布在丘陵和洼地的全村景色，以及从伏罗希洛夫格勒通过来的公路，就都展现在她们眼前。公路在这里经过那座把克拉斯诺顿城市和这个村子隔开的长山岗的岗顶。从这儿望过去，只见公路上都是密密麻麻的军队和逃难的人们。汽车——普通的民用汽车，伪装成绿色的、损坏的和满是尘土的军用车，卡车，轻载车和救护车——拚命按着喇叭，疾驰着越过他们。被这无数的人脚和车轮一次又一次掀起的红土，就像天幕似的悬在整段公路的上空。

这时，发生了一件不可能的、不可思议的事情：新一号井的钢骨水泥井架——在全城的建筑物中，从公路那边唯一可以看到的就是它的雄伟的胴体，——突然倒了下去。矸石腾空而起，像一把厚厚的扇子霎时遮住了它，接着地底下又发出一声可怕的巨响，在空中和脚底下隆隆滚过，把姑娘们吓得战栗了一下。等一切消散之后，井架连影子都没有了。巨大的深色的锥形矸石堆仍在原处岿然不动，迎着太阳闪闪发光，而原来是井架的地方却冒着一团团肮脏的灰黄色的浓烟。在公路上空，在骚乱不安的五一村上空，在这里看不见的城市上空，以及在整个周围的世界上空，都荡漾着一种融成一片的、拖长的声音，好像是呻吟，里面夹着微微起伏的遥远的人声，——不知他们是在哭，是在咒骂，还是在痛苦得呻吟。

这一切可怕的景象：疾驰的汽车、川流不息的人们、这一声惊天动地的爆炸、井架的消失，顷刻间像晴天霹雳似的袭向她们。于是交集在她们心里的种种感受，就突然被一种无法表达的，比担心自己更为深刻、更为强烈的感觉所贯穿，——这是一种在她们面前裂开了末日的深渊，裂开了世界末日的深渊的感觉。

“在炸矿井了！……姑娘们！……”

这是谁在号泣？好像是东妮亚，但是这声号泣仿佛是从她们每个人的

灵魂里迸发出来的：

“在炸矿井了！……姑娘们！……”

她们不再说什么，彼此既来不及，也没有什么好说。她们这一伙自然而然地分散了：大部分都往村里跑，各自回家，玛雅、邬丽亚和莎霞却越过公路抄近路进城，要到共青团区委会去。

但是就在她们不约而同地分成两批的时候，瓦丽雅却突然抓住了好朋友的手。

“邬丽亚！”她用怯弱的声音恳求说，“亲爱的邬丽亚！你到哪儿去？我们回去吧……”她踌躇了一下又说，“也许会出什么事……”

邬丽亚却陡地朝她转过身来，默默地望了她一眼——不，甚至不是望着她，而是透过她眺望非常非常遥远的地方。她的黑眼睛里带着好像她是在飞翔的那种焦急的神情——大概，正在飞行的鸟儿就常有这样的眼神。

“等一下，邬丽亚……”瓦丽雅拉着邬丽亚的手，用恳求的声音说，另一只空着的手迅速地把百合花从邬丽雅的有波纹的黑发里拔出来，扔在地上。

这一切发生得非常快，邬丽亚不仅来不及考虑瓦丽雅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且简直就没有注意这件事。接着，连她们自己也莫名其妙，就朝着不同的方向跑去。这样做，在她们多年的友谊中还是第一次。

的确，叫人难以相信这一切是真事。可是，由玛雅·毕格里万诺娃领先的这三个姑娘穿过公路之后，就亲眼证实了这件事：在新一号井的巨大锥形矸石堆旁边，整齐漂亮的井架和它全部巨大的升降装置，都已经不见了；只有一团团灰黄色的浓烟升向天空，使四周弥漫着难闻的大蒜气味。

时近时远的新的爆炸，震撼着大地和空气。

和新一号井连接的这个市区，同城中心只隔着一个深谷；谷底有一条满生菖蒲的、浑浊的小溪流过。如果不算小溪两旁峡谷斜坡上盖的土房，整个这一区，也像城中心一样，都盖起每幢可供两三户居住的砖砌平房。平房都是瓦顶或是防火瓦顶，屋前留出一个小小的庭园——一部分做菜园，一部分筑有花圃。有的人家已经栽种了樱桃树、丁香或是茉莉；有的沿着油漆过的整齐的栅栏在里面种上一行行的小槐树和小槭树。现在，一队队的工人、职员和男男女女正缓慢地走过这些整齐的小屋和庭园；载着克拉斯诺顿各企业和机关财产的卡车，也夹在队伍里面。

一切所谓“没有组织起来的居民”，都纷纷从家里出来。有人站在庭园里，带着痛苦或是好奇的神情望着撤退的人。有的走到街上，背着包袱和口袋，推着满载家常用品的小车，在队伍旁边慢吞吞地走着，年纪小的孩子们就坐在小车上，有些妇女手里还抱着婴孩。半大的男孩子们被爆炸声所吸引，都向新一号井奔去，可是民警把那边封锁了，不让人过去。这时迎面有一批人从矿井那面冲过来，而从市场那边的小巷里慌慌张张跑出来的集体农庄女庄员们，还有马车和牛车，也和那批人混在一起。这些女庄员们的篮子里和独轮车上，都装满了蔬菜和食品。

队伍里的人们默默地走着，个个都面色阴沉，全神贯注地在想一件事，因此对于周围发生的事情似乎没有察觉。只有在队伍旁边走的领队，看到逃难的人们堵塞了街道，妨碍队伍前进，才停下来或是跑到前面，帮助民警和民警马队维持秩序。

人群里有一个妇人抓住了玛雅的手，莎霞也在她们旁边站下；邬丽亚

一心只想赶快跑到区委会去，还是沿着栅栏往前跑，像鸟儿那样挺起胸膛迎着人们跑过去。

一辆绿卡车吼叫着从峡谷里拐了弯慢慢地开过来。邬丽亚和另外一些人都急忙朝一座标准式房屋前的小庭园那边闪让。要不是有一扇门，站在门边两棵沾着尘土的丁香中间的一个姑娘，就会被邬丽亚撞倒。那姑娘生得个子不高，体态非常苗条优美，浅黄的头发，小小的翘鼻子，一双蓝眼睛眯缝着。

尽管在目前的情况下这显得很奇怪，但是，邬丽亚在撞到门上、差一点把这位姑娘撞倒的一刹那，她仿佛突然看到这个姑娘在跳华尔兹舞。她仿佛还听到管乐队演奏的华尔兹舞曲。这幅幻景好像是幸福的幻景，突然又苦又甜地刺痛了邬丽亚的心。

这位姑娘在舞台上载歌载舞，在大厅里载歌载舞。她通宵和大家一同跳舞，跟什么人都跳，不加选择，从不疲倦。她的蓝眼睛和整齐洁白的小牙都闪耀着幸福的光辉。这是什么时候的事？这一定是在战前，这是另一种生活，这是梦境。

邬丽亚不知道这姑娘姓什么。大家都叫她刘巴，更多的时候叫她刘勃卡。对啦，这是刘勃卡，“女演员刘勃卡”，顽童们有时这样叫她。

最令人惊奇的是，刘勃卡竟然打扮得好像要上俱乐部似的，悠闲自在地站在门边的丁香丛中。她的玫瑰色的小脸总是保护着不让日晒，金黄色的头发精心梳过，卷成一个圆圈，小手好像是象牙雕成的，指甲闪闪发光，仿佛刚刚修过，健美匀称的小脚上穿着轻巧的奶黄色高跟鞋，——这一切都显出仿佛刘勃卡马上就要登台表演歌舞。

但是使邬丽亚更为吃惊的却是她那副盛气凌人的、同时又是非常单纯、非常聪明的神气，这种神气在她的鼻子微翘的玫瑰色的脸上，在她略微嫌大的嘴的涂着唇膏的饱满的嘴唇上，主要的是在那双眯缝着的、非常灵活的蓝眼睛里，都流露出来。

她似乎认为，邬丽亚差点把门撞坏，是一件极其自然的事；她对邬丽亚连瞅都不瞅一眼，自管悠闲地、盛气凌人地望着街上发生的一切，嘴里莫名其妙地喊着：

“笨蛋！你干吗往人身上开！……你干吗不能让人过去，你一定是神经错乱了！你还开？你还开？……喂，你这个笨蛋，又不是过年！”她把小鼻子一翘，闪动着睫毛浓密的蓝眼睛，向一辆卡车的司机叫喊着。其实司机正是为了等人们散开，才冲着她家的门把车煞住的。

卡车上满装了民警局的财产，由几个民警守护着。

“嘿，你们这些维持秩序的人，可真不少！”刘勃卡又找到新的理由，高兴得大喊起来。“你们不来安定人心，自己反而溜了！……”说着，她用小手做了一个无法模仿的手势，还像顽童那样吹了一声口哨。

“这个傻瓜在嚷什么！”卡车上的中士民警队长，被这种显然是不公平的话惹火了，回嘴说。

可是，他这样做显然是自讨苦吃。

“啊，德拉普金同志！”刘勃卡向他问好。“你这位红色勇士是从哪儿出来的？”

“你住嘴不住嘴？……”“红色勇士”突然发火了。他动了一动，好像要跳下来。

“你是不会跳下来的，你就怕别人把你甩下！”刘勃卡说的时候没有提高嗓门，毫不生气。“一路平安，德拉普金同志！”她的小手从容而随便地挥动了一下，向那个气得脸色发紫的民警队长作别，他果然没有从已经开动的卡车上跳下来。

要不是她的蓝眼睛里流露出这种天真无邪的神情，要不是她的批评大部分都是有的放矢的话，旁人听到她的这种言论，看到她的这副打扮，再加上周围的人们都在逃跑而她却站在那里安然不动，一定会把她当做最狠毒的反革命，等待德国人到来而嘲笑苏维埃人的不幸。

“喂，那个戴帽子的！瞧你把多少东西叫老婆拿着，自己反而空着手！”她大喊着。

“瞧，你老婆是多么瘦小。你头上还戴着帽子！……我瞧着你就别扭！……”

“老太太，你怎么在偷吃集体农庄的黄瓜？”她又对一辆大车上的一个老妇人喊着。

“你以为苏维埃政权撤退了，你就可以胡来了吗？那么天上的上帝呢？你以为他看不见？他全都看得见！……”

没有人理会她的批评，她也不会看不到这一点。她好像是为个人消遣而在打抱不平。邬丽亚非常欣赏她那种沉着无畏的态度，她对这个姑娘立刻产生了信任，就跟她攀谈起来。

“刘巴，我是五一村的共青团员邬丽亚娜·葛洛莫娃。告诉我，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这很平常……”刘勃卡用发光的、大胆的蓝眼睛亲切地望了邬丽亚一眼，欣然回答说，“我们的军队放弃了伏罗希洛夫格勒，是今天一清早就放弃的。各个机关都接到命令立刻撤退……”

“那么共青团区委会呢？”邬丽亚声音沮丧地问。

“你这个秃子，干吗打人家小姑娘？哼，你这个小流氓！瞧我不出去揍你！”刘勃卡对人丛里的一个野孩子尖声叫道。

“共青团区委会吗？”她反问了一句。“共青团区委会照例是打先锋的，一清早就走了……你干吗朝我瞪着眼，姑娘？”她生气地对邬丽亚说。可是她瞅了邬丽亚一眼，懂得她的心理之后，立刻笑着说：“我是说着玩的，说着玩的……事情明摆着，它接到了命令，所以它走了，并不是逃跑的。你明白吗？”

“那么叫我们怎么办呢？”邬丽亚突然满腔怒火，气愤地问。

“你吗，自然也得离开。今天一早就发出了命令。你一早到哪儿去啦？”

“那么你呢？”邬丽亚直截了当地问。

“我吗？……”刘勃卡沉吟了一会，她的聪明的脸上突然露出事不关己的冷漠的神气。

“我还要看看。”她回避地说。

“你难道不是团员？”邬丽亚钉着问道。她那双流露出坚强和愤怒的神色的乌黑的大眼睛，和刘勃卡的眯缝着的警觉的眼睛，刹那间遇到一起。

“我不是，”刘勃卡说，她微微把嘴一抿，就扭过身去。

“爸爸！”她叫了一声，开了门，高跟鞋咯登咯登地响着，跑去迎接朝这边走过来的一批人。这些人在人群中间显得很突出，人们都惊骇地、怀着突发的敬意给他们让路。

走在前面的是新一号井井长安德烈·瓦尔柯，他年纪约摸五十上下，身体结实，胡子刮得很干净，脸色像茨冈人那样阴沉黧黑，穿着上衣和靴子；另外一个是全城闻名的著名采煤工葛利高利·伊里奇·谢夫卓夫，他也在那个井里工作。他们后面还有几个矿工和两个军人。再后面，隔开一段路，是一群形形色色的看热闹的人：甚至在生活中最不平常、最艰难的时刻，还是有好多纯粹是好奇的人。

谢夫卓夫和另外几个矿工都穿着工作服，风帽推到脑后。他们的脸上、手上和衣服上全都是煤灰。他们里面有一个人的肩上挂着一卷沉重的电缆，另外一个背着一箱工具，谢夫卓夫手里却拿着一个奇怪的金属仪器，里面戳出几根短短的光电线。

他们一言不发地走着，他们的眼睛好像不敢望着人群里面的人，也不敢互相对视。汗水从他们的涂满煤灰的脸上流下来，留下一道道痕迹。他们的脸显得疲惫万分，好像他们是背负着力不胜任的重担。

邬丽亚突然明白了，为什么街上的人都怀着敬畏的心情预先给他们让路，——他们前面的一段街上都是空的。原来就是他们，亲手炸掉了新一号井，炸掉了顿涅茨矿区引以自豪的矿井。

刘勃卡跑到谢夫卓夫面前，用雪白的小手握住他的青筋突起的黑手，和他并排走着，他也立刻把她的手紧紧握住。

这时，由井长瓦尔柯和谢夫卓夫率领的矿工们都到了门前。他们如释重负地把带的东西——一卷电缆、工具箱和这个奇怪的金属仪器——隔着栅栏随便往里面一扔，就扔在庭园里的花上。事情很明白，先前那样精心培植的花草，也像有着这些花草和其他许多东西的那种生活一样，都已经完结了。

他们扔下这些东西，站了一会，彼此也不对视，仿佛感到有些尴尬。

“好吧，葛利高利·伊里奇，赶快收拾收拾，车子已经准备好了。我先去接别人，然后大伙一块来接你。”瓦尔柯说话的时候，他的眼睛也没有从他的像茨冈那样连在一起的阔眉毛下面抬起来望着谢夫卓夫。

接着，他就带着那几个矿工和军人，慢慢地沿着街走去。

谢夫卓夫仍旧拉着刘勃卡的手站在门前，旁边还有一个干瘦的长腿老矿工，他的被香烟熏黄的口髭和胡子好像被拔过似的，稀稀拉拉。邬丽亚也还站在旁边，她仿佛只有在这里才能解决那个使她苦恼的问题。他们谁也没有去注意她。

“刘波芙·葛利高利耶芙娜①，我又不是没有对你说过。”谢夫卓夫瞅了女儿一眼，生气地说，可是他还握着她的手。

①刘波芙·葛利高利耶芙娜是刘勃卡的本名和父名。父亲对女儿平常只叫名字，这里谢夫卓夫对刘勃卡有不满的意思。

“我已经说过，我不走。”刘勃卡绷着脸回答说。

“别胡闹啦，”谢夫卓夫显然很激动，但是声音仍旧很轻。“你怎么能不走？共青团员……”

刘勃卡的脸马上涨红了。她抬起眼睛望望邬丽亚，但是脸上立刻露出任性的、甚至是撒泼的神气。

“才做了几天的团员，”她说了就把嘴一抿，“我没有做过对不起别人的事。人家也不会来跟我找麻烦……我舍不得离开母亲。”她又低声加了一句。

“她脱团了！”邬丽亚突然惊骇地想道。可是她立刻想起了自己生病的母亲，心里就难受得好像火烧似的。

“啊，葛利高利·伊里奇，”老头说话的声音低沉得可怕，令人奇怪从这样干瘪的身体里怎么会发出这样的声音，“我们分手的时候到了……再见……”他对着低头站在他面前的谢夫卓夫望了一会。

谢夫卓夫默默脱下头上的便帽。他生着淡亚麻色的头发，蓝眼睛，一张俄罗斯中年工匠的瘦脸上满布深深的纵纹。他虽然已经并不年轻，穿着这件不合身的工作服，手上脸上又都是煤灰，但是依然可以感到，他的体格是结实而匀称的，并且具有俄罗斯的古典美。

“你要不要跟我们一块去碰碰运气？啊？康德拉多维奇？”

他问的时候没有望着老头，样子非常局促不安。

“我和我的老伴哪儿也去不成。还是等我们的孩子们随着红军回来解放我们吧。”

“你们家老大怎么样啦？”谢夫卓夫问。

“老大？还提他干吗？”老头阴郁地说，他摆了摆手，面部的表情仿佛要说：“我的丢脸的事你是知道的，何必再问？”他向谢夫卓夫伸出一只瘦骨嶙峋的干枯的手来，伤心地说：

“再见了，葛利高利·伊里奇。”

谢夫卓夫也伸出手来。但是，他们的话好像还没有说完，他们就握着手又站了一会。

“是啊……有什么办法呢……我的老伴，你瞧，还有我女儿，也不走。”谢夫卓夫缓慢地说。他的声音突然中断了。

“我们怎么能把它炸了，啊？康德拉多维奇？……把我们的美人儿……可以说是全国的奶娘……唉！……”他突然从心底发出一声异常轻微的长叹，像水晶般光彩夺目的泪珠，就落到他那被煤灰弄脏的脸上。

老头沙哑地呜咽着，低低地垂下头来。刘勃卡也放声大哭了。

邬丽亚咬着嘴唇，但是抑制不住那使她窒息的、无处泄恨的泪水，急急往五一村跑，往家里跑。

第三章

当郊区的一切都笼罩着这种撤退和匆促疏散的紧张气氛时，靠近城中心的地方，一切倒比较平静下来，似乎比较正常了。街上的职员的队伍和携儿带女的逃难的人们，都已经散去。各个机关的入口处或者院子里，都停着一排排的马车和卡车。有一批刚够办事的人手，在把装着机关财产的木箱和塞满文件的麻袋装到车上。他们在低声谈话，好像故意只谈他们所做的事。从敞开的门窗里传出锤子的敲击声，有时还有打字机的嗒嗒声。办事认真的事务主任们在做最后的财物清单：哪些需要运走，哪些可以不要。要不是远处隆隆的炮轰和震撼大地的爆炸，人们可能以为，这些机关只是从旧址迁往新居呢。

在城中心的高地上，屹立着一座新的、两侧展开的单层大厦，大厦正面遍植幼树。离开城市的人们，无论从哪里都可以看到这座建筑物。这里是区委会和区执行委员会，从去年秋天起，布尔什维克党伏罗希洛夫格勒州委

会也在里面办公。

各机关和各企业的代表们不断地走进这座建筑物的大门，又几乎像奔跑似地出来。从敞开的窗口传出不停的电话铃声和对着话筒答复的、有时故意抑制、有时又过分大声的指示。

有几辆民用的和军用的小汽车，排成半圆形停在总入口处旁边。最后面的是一辆满是尘土的军用吉普车。它后座上的两个穿着褪了色的军便服的军人——一个没有刮过脸的少校和一个魁梧的年轻中士——不时探出头来张望。在所有的司机们以及这两个军人的脸上和姿态中，都有一种难以觉察的共同的神情：他们在等待着。

这时，在大厦右侧一个大房间里展开的那个场面，以它内在的力量来讲，是足以使古代的大悲剧黯然失色的，如果它的外表不是这样平淡无奇的话。应当立即离开的州和区的领导人，在和要留下的领导人告别。这些留下的人现在要完成疏散工作，等德国人来了之后，他们就要销声匿迹，融化在群众中间，转入地下工作。

除了共同经历的患难之外，再没有别的什么能够使人们这样接近起来。

整个战争时期，从第一天到现在，对这些人说来，已经连成一个紧张得非人力所能忍受的、连续不断的劳动日，只有久经锻炼的、最坚强的性格才能经受得住这样的紧张。

他们把所有最年轻、最强壮的人献给前线。他们把可能遭到掠夺或破坏的最大的企业：几千台车床，几万个工人和几十万家属，运送到东方。但是像变魔术似的，他们马上又找到了新的车床和新的工人，使空阒的矿井和厂房又有了新的生命。

他们使工厂和所有的人们保持着一种时刻准备着的状态，以便一旦需要又可以行动起来，全部迁往东方。同时他们还不停地执行着这样一些职责，假如不这样做，苏维埃国家人民的生活就无法想象：他们供给人们吃，穿，教育儿童，治疗病人，培养出新的工程师、教师、农艺师，维持食堂、商店、戏院、俱乐部、体育馆、澡堂、洗衣房、理发店、民警队和消防队。

他们在全部战争的日子里始终如一地工作着。他们忘记了他们可能有个人的生活：他们的家属都在东方。他们吃、住、睡觉都不在家里，而是在机关和企业里，——不论日夜什么时候都可以在他们的岗位上找到他们。

顿巴斯的土地一片跟着一片地失陷，但是他们越发紧张地在剩下来的土地上工作。他们极度紧张地在顿巴斯最后一部分土地上工作，因为这是最后一部分了。但是直到最后，他们还使人们保持着这种巨大的干劲，来担负起战争压在人民肩上的一切。如果从别人身上已经挤不出精力，他们就一次又一次地从自己的精力和体力中挤。谁也说不出，他们的精力的限度究竟在哪里，因为它们是没有限度的。

最后，连顿巴斯的这一片土地也要放弃的时候来到了。这一次，在几天之中，他们又运走了几千台车床、几万人和几十万吨贵重物品。现在，到了最后一刻，连他们自己也都非走不可了。

他们站在克拉斯诺顿区党委书记的大办公室里，紧紧地挨在一起。长会议桌上的红毡已经拿掉。他们面对面站着，说笑着，互相拍着肩膀，总下不了决心说出告别的话。要离开的人们心头十分沉重、烦乱和痛苦，仿佛有乌鸦在抓他们的心。

州委干部伊凡·费奥多罗维奇·普罗庆柯，自然而然地成为这些人的

中心。早在去年秋天，全州初次面临被占领的威胁的时候，他就被选拔出来做地下工作。可是当时事情自然而然地搁下来了。

普罗庆柯是个三十五岁的男子，身材矮小、匀称、灵活。他的两鬓微秃，日见稀疏的亚麻色头发向后梳着，红润的脸以前总刮得干干净净，现在却长着深色的柔毛，这已经不是胡茬，但是还没有长成胡子。这是他在两星期之前开始留的，那时根据前线战事的进程，他明白做地下工作是在所不免的了。

他怀着敬意在和他面前的一个军服上没有级别标志的高个子中年人亲切地握手。那人的脸瘦削、刚毅、满是细皱纹——长期过度辛劳的痕迹；他脸上特别显著的是真正的大领导人所特有的那种泰然自若、朴质而又威严的神情，这种神情是由于对世界形势知识丰富、了解深刻而出现的。

这个人是新近建立的乌克兰游击队司令部领导人之一，昨天才到克拉斯诺顿来建立州游击队和正规军之间的协同动作的。

那时候，还没有料到会撤退得这么远，还希望能挡住敌人，至少能把他们挡在顿涅茨河下游和顿河下游一带。根据游击队司令部的命令，普罗庆柯应当在他即将作为基地的游击队和调来卡缅斯克区支援我军在北顿涅茨河的掩护部队的一个师中间，建立联系。这个师在伏罗希洛夫格勒地区的战斗中损失惨重，马上就要到达克拉斯诺顿，师长是昨天同游击队司令部以及南方方面军政治部的代表们一起到来的。师长是一位四十来岁的将军，他也站在这里，等着跟普罗庆柯告别。

普罗庆柯握着游击队领导人的手——游击队领导人平时也是他的领导，常到他家里串门，跟他的妻子也很熟——对他说：

“谢谢您的帮助和教导，再一次谢谢您，安德烈·叶费莫维奇。请向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①转致我们游击队的谢意。如果您有机会去总司令部，请告诉他们，就说现在在我们伏罗希洛夫格勒总算也建立了游击队……如果您的运气好，能见到总司令斯大林同志，就请告诉他，我们一定会光荣地完成自己的职责……”

①赫鲁晓夫（1894—1971）在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曾先后任西南及乌克兰几个方面军的军事委员会委员。

普罗庆柯说的是俄语，但有时不自觉地夹着乌克兰乡音。

“如果你们完成了，即使我们不说，他们也会听到的。至于你们一定会完成，那我是毫不怀疑的。”安德烈·叶费莫维奇露出刚毅的微笑说，他满脸的皱纹都放着光。他忽然转过身来对围着普罗庆柯的人们说：“普罗庆柯这家伙真鬼：还没有开始作战，已经在试探，能不能从总司令部得到供应！”

大家都笑起来，只有将军没有笑，在全部谈话时间他都站在那里，坚强饱满的脸上始终带着严峻的、忧心忡忡的神情。

在普罗庆柯的明朗的蓝眼睛里闪露出狡猾的神气，眼睛开始闪闪发光，不过不是两只同时发光，而是有先后，仿佛有一颗顽皮的小火星独脚跳着，从一只眼睛里跳进另外一只眼睛里面。

“我自己的供应有的是，”他说，“要是用完了，我们就像那个老柯夫派克①一样，没有军需机关也活得下去：从敌人那里拿来的，就是我们的……不过，要是给我们添拨点什么……”普罗庆柯把双手一摊，大伙又笑起来。

①柯夫派克（1887—1967），苏联苏姆斯克游击队司令员，少将，卫国战争时期曾五次在敌后袭击敌人。

“请向方面军政治部的工作人员转致我们最大的谢意，他们给了我们极大的帮助。”普罗庆柯握着一个团政委衔的中年军人的手，说道。“至于你们，小伙子们……我真不知道对你们说什么才好，我只能好好地吻吻你们……”普罗庆柯感情激动地挨个儿拥抱并且亲吻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年轻小伙子们。

他是一个细心的人，他懂得在任何工作中都不能让一个工作人员感到委屈，不管这个工作人员的职位大小，只要他在工作中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他就这样向帮助他组织游击队和地下工作网的每一个机构和每一个人表示了谢意。他怀着沉痛的心情依依不舍地跟州委的同志们告别。在几个月如一日逝去的战争期间，友谊和命运已经把他们牢牢地拴在一起了。

他眼睛潮润地离开了朋友们，又四下看了一遍，有没有漏掉什么人。这时个子敦实的将军默默地把整个身子迅速有力地迎向普罗庆柯，同时向他伸出手来。在将军的普通俄罗斯人的脸上，突然显露出天真的表情。

“谢谢，谢谢您，”普罗庆柯感情流露地说。“麻烦您还亲自来。现在我们好像是拴在一根绳子上了……”说着，他握了握将军的结实的手。

将军脸上的天真的表情霎时间消失了。他那戴着制帽的圆圆的大头做了一个不满的、甚至像是气愤的动作。他的聪明的小眼睛又带着原来的严峻的神气望着普罗庆柯。他似乎有非常重要的话要说，但是他什么也没有说。

决定性的一刹那到了。

“你自己要小心。”安德烈·叶费莫维奇说的时候脸色改变，他拥抱了普罗庆柯。

大家重又跟普罗庆柯、他的助手以及留下来的工作人员们告别，然后脸上似乎带着歉意一个一个地走出办公室。只有将军出去的时候是高昂着头，迈着和平时一样轻快迅速的步子，以他那样的胖子来说，这样的步伐是出人意料的。普罗庆柯没有去送他们，他只听到街上的汽车呜呜地响起来。

办公室里的电话铃声一直不停，普罗庆柯的助手放下这个听筒又拿起那一个，请他们过一会儿再打来。普罗庆柯刚跟最后离开的人告别，助手马上就递给他一个听筒。

“面包厂打来的……已经打来过上十次了……”

普罗庆柯拿起听筒，在桌角坐下，马上就和刚才跟同志们告别时一会儿态度亲切、真情流露，一会儿调皮快活的样子判若两人了。在他拿听筒的姿势里，在他的面部表情和语调里，都显露出沉着和威严。

“你别胡扯，你听我说，”他说，听筒里的声音马上就停了，“我对你说过运输工具要来，它自然会来。市贸易公司会来取你的面包，预备给市民们在路上做干粮。销毁这许多面包是犯罪行为。你烘了一夜的面包究竟是为了什么？我看是你自己在着急。等我叫你着急的时候你再急。明白吗？”普罗庆柯挂上听筒，又取下一只铃声尖锐发抖的听筒。

在面对新一号井的打开的窗口，可以看见离城的部队、卡车以及疏散的居民队伍在移动。从这里的小山上看出去，几乎像看地图一样，移动基本上分为三股：主流往南，向新切尔卡斯克和罗斯托夫移动，较小的一股往东南，向李哈雅移动，最小的一股是向东，向卡缅斯克移动。刚刚离开区委会大厦的那些汽车，也鱼贯地往新切尔卡斯克开去。只有将军的满布尘土的吉普车，是穿过拥挤的街道，向着伏罗希洛夫格勒公路那面开去。

这时，要回到师里去的将军的思想，已经远远离开了普罗庆柯。灼人

的太阳斜照着他的脸。汽车、将军、司机以及后座上默不作声、没有刮胡子的少校和身材高大的中士，都在尘埃的包围之中。远处的炮轰声、公路上汽车的吼声、离城的人们的情景——这一切把这几个年龄和职位异常悬殊的军人的思想不由地都吸引到严峻的现实上来。

在和普罗庆柯告别的人们里面，只有身为军人的乌克兰游击队司令部的代表和将军，才懂得德军坦克部队占领米列罗沃以及他们向莫罗佐夫斯克（顿巴斯到斯大林格勒铁路线上的一个城市）挺进的意义。这表示，南方方面军已经和西南方方面军隔断，伏罗希洛夫格勒州以及罗斯托夫州的大部分和中央的联系被切断了，斯大林格勒同顿巴斯的交通也被切断了。

现在这个师的任务是尽可能长久地挡住从米列罗沃进犯南方的德军，使南方方面军的军队得以退到新切尔卡斯克和罗斯托夫。而这就意味着，将军指挥的那个师在几天之后要么根本不再存在，要么陷入敌人的包围。被包围的想法是将军深恶痛绝的。但是将军又不愿意他的师不再存在。另一方面，他知道，他会百分之百地履行他的天职。所以现在他的全副精神都是用来解决这个无法解决的难题。

按年龄来说，将军并不是属于老一代的苏联军事将领，而是属于中间一代。这一代在国内战争时期或国内战争结束不久开始他们的道路时，都还是些十分年轻的、并不突出的人。

在他当普通士兵的时候，足迹走遍了现在他乘吉普车驶过的顿涅茨草原。他这个库尔斯克农民的儿子，十九岁的牧人，开始他的军人道路时，彼列科普之役①的不朽声誉已经轰动全国。他入伍是在肃清乌克兰马赫诺②匪帮的那个时期：这是与革命敌人大搏斗的最后微弱的余音。他曾在伏龙芝③的指挥下作战。在青年时代，他是一个出众的坚强的战士。他也是一个出众的聪明的战士。但是他的出众并不仅仅因为这个：坚强而聪明的人在人民中间并不罕见。他渐渐地、不知不觉地、甚至仿佛是缓慢地掌握了连政治指导员、营政委和团政委——全体政治部和军队党支部工作人员的无数的无名大军（愿这些人永垂不朽！）——教导给红军战士的一切。而且，他不单是理解他们的教诲，他还把这些教诲学透学通，牢牢铭记在心头。突然，他作为一个具有非凡的政治才能的人在战友们中间得到了选拔。

①彼列科普是联接克里木半岛和欧洲大陆的地峡。一九二〇年，红军在伏龙芝领导下，在该地彻底击溃弗兰格尔匪帮。

②马赫诺是苏联国内战争时期乌空兰无政府主义暴乱的头目，这个匪帮于一九二一年被红军消灭。

③伏龙芝（1885—1925），一九〇四年参加共产党，十月革命后担任苏联党、政、军重要领导工作。

他以后的道路是简单的、一帆风顺的，就像他那一代任何一个军事将领的道路一样。

在伟大卫国战争中，他起初是团长。可是他已经有了伏龙芝陆军大学毕业、哈勒欣河之战①、“孟纳兴防线”突破战②的经历。以他这样的出身和年龄的人来说，这已经很多，可是这还远远不够哪！卫国战争使他成了一员统帅。他成长了，但更重要的是他不断地受到培养。现在他是在大战的实践中受到培养，正像以前在军事学校、后来在陆军大学、再后来在两次小规模战争的实践中受到培养一样。

①一九三九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入侵蒙古人民共和国东部的哈勒欣河区。苏军曾与蒙军一起对日军作战。

②“孟纳兴防线”是芬兰在卡累利阿地峡修筑的军事防御工事，以当时芬兰元帅孟纳兴的名字命名。苏军在一九三九至四〇年苏芬战争期间曾突破该防线。

撤退固然令人非常痛心，但是在战争进程中不断加强的这种意识到本身力量的新的感觉，却是使人惊奇的。我们的兵士比敌人的兵士强，这不仅是从精神上的优越性来说——这一点根本无法比较！——即使单纯从军事方面来说，也是如此。我们的指挥员不仅在政治觉悟方面，即使在所受的军事教育方面，在迅速接受新事物、广泛应用实际经验的能力方面，也是高得不可比拟。军队的技术装备并不比敌人差，在某些方面甚至比敌人好。创造这一切和指导这一切的军事思想来自伟大的历史经验，但同时它又是新的、大胆的，像产生它的革命一样，像这史无前例的苏维埃国家一样，像形成并实现这种思想的人们的天才一样——这种思想展开鹰隼般的双翅在空中翱翔。但是到头来仍旧不得不撤退。目前敌人在数量上、在突然袭击方面、在不受正常的良心定义限制的残酷性方面，占着优势，他们每一次都是靠孤注一掷来取胜，这时他们已经根本顾不到后备力量了。

像苏联的许多军事将领一样，将军很早就明白，与历来的战争比较起来，这次战争需要更多的人力与物力的后备。应当善于在战争的进程中创造人力与物力。更复杂的是如何运用这些人力与物力：要分配及时，调遣得当。敌人在莫斯科城下被击溃以及他们在南方的失败，不仅说明了我们的军事思想、我们的战士和我们的技术装备的优越——这些事实更多地说明了，人民和国家的伟大后备力量是掌握在节约的手里，是掌握在有本领、有能耐的手里。

但是，在对敌我双方的一切似乎都已经了解的时候，却又要在人民眼前进行撤退，这终究是可恼的，非常可恼的！

将军沉浸在自己的思索中，在车子里一言不发。吉普车费力地穿过挤满正在疏散的居民的街道，刚开到伏罗希洛夫格勒公路，就有三架德国俯冲轰炸机差不多就在头顶上连续飞过，发动机发出吼叫似的声音。这些飞机来得是那么突然，因此将军以及陪同他的那个军官和中士都来不及跳出去，仍旧坐在车子里。战士和逃难的人们分为两股，像潮水似地退到公路两旁，——有的扑倒在沟渠里，有的靠着房屋的墙根或是紧贴着墙。

就在这一刹那，将军看见一个穿白上衣、梳两条乌黑的长辫子、身材苗条的姑娘，单身站在公路边上。好长一段公路上都是空的，只剩下这个姑娘孤零零地站在那里。她带着无畏的、阴郁的神情，目送这些涂得花花绿绿的、张开的翅膀上画着黑十字的鸟儿在她头顶上疾飞而过，它们飞得非常低，好像扇起一阵风吹着了她。

将军喉咙里突然咯的一响，旅伴们都愕然望了望他。他好像觉得衣领太紧似的，愤愤地把圆圆的大头扭动了一下，后来就转过脸去，不忍再看公路上的这个单身姑娘。吉普车陡地转了弯，沿着公路在高低不平的草原上跳动着驰去——不是向卡缅斯克，而是向伏罗希洛夫格勒那个方向，将军的那一师人，就是刚刚从那里向克拉斯诺顿开过来的。

第四章

在邬丽亚头顶上疾飞而过的俯冲轰炸机，已经在城外用机枪沿公路扫射了几阵，又在阳光夺目的空中隐没。几分钟后，才又听到远处低沉的爆炸声，——大概是俯冲轰炸机在炸顿涅茨河的渡口。

五一村的一切都在动荡不安。邬丽亚只见一辆辆马车和拖儿带女的人们迎面跑过来。这些人她都认识，他们也都认识她，但是谁都不朝她看，也不跟她交谈。

最出人意外的是维丽柯娃给人的印象。这个“革命前的女学堂的学生”吓得面无人色，坐在一辆堆满箱子、包裹和面粉袋的马车上，夹在两个妇人中间。赶车老汉头戴便帽，靴子上满是白面粉。他把两条腿耷拉在一边，使出全身之力用缰绳梢抽打那匹驽马，徒然想叫它快跑冲上斜坡。天气虽然热得要命，维丽柯娃却穿着棕色的呢大衣，不过没有戴头巾和帽子。在厚呢的硬领上面，两条小辫仍旧威风凛凛地朝前翘着。

五一村是这一区最老的矿村；克拉斯诺顿城实际上就是从这个村子发展起来。它是不久以前才被称为五一村的。从前，还没有发现这些地方有煤的时候，这一带都是哥萨克的庄子，其中数索罗金庄最大。

这里的煤是在本世纪初发现的。顺着岩层开采的最初几个矿井是倾斜的，而且非常之小，煤可以用马拖的、甚至是手摇的绞车提起来。这些小矿井属于不同的主人，但是沿用旧称，整个矿场都叫索罗金矿场。

矿工们都是俄罗斯中央几个省份和乌克兰的移民，他们在哥萨克的庄子里落了户，和哥萨克们结了亲，哥萨克自己也在矿井里干活了。家庭人口增多了，分了家，又在旁边盖起了房子。

又开了新的矿井——有的在一个长山岗后面，现在的伏罗希洛夫格勒公路就通过这个山顶；有的在再过去一点的峡谷后面，这个峡谷把现在的克拉斯诺顿城分隔成两个大小不等的部分，这些新矿井属于一个姓雅尔曼金或是叫“疯老爷”的独身地主，因此在这些矿井周围新兴起来的村庄最初也俗称雅尔曼金村或是“疯人”村。“疯老爷”本人住在一座灰色的砖砌平房里，房子一半辟做花房，里面种着奇花异草，养着海外飞禽。这座房子当时孤零零地耸立在峡谷后面的高岗上，四面通风，也被叫做“疯人”院。

到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后，在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这一区里才又建立了一些新矿井，索罗金矿场的中心也移到这边来了。区里造起了标准式小屋，盖起了机关、医院、学校和俱乐部的大建筑物。在山岗上“疯老爷”的房子旁边，兴建起区执行委员会的两侧有侧厅的漂亮的大厦。“疯老爷”的房子成了克拉斯诺顿煤业联合公司的设计室，可是设计室的职员们却根本不知道，他们在里面度过生命中三分之一时间的这座房子，过去是座什么房子。

这样，索罗金矿场就变成了克拉斯诺顿城。

邬丽亚、她的女友和同学们，都是同他们的城市一起成长的。他们做小学生的时代，在植树节那天就在那块堆满垃圾、牛蒡蔓生的空地上参加植树。市苏维埃把这块空地划做公园，这里应该造一座公园的主张，是在老一辈的共青团员中间产生的。这一代人还记得“疯老爷”和雅尔曼金村，记得第一次德军占领和国内战争。他们里面有些人目前还在克拉斯诺顿工作——有些人的头发里或是布琼尼式的哥萨克口髭里已经露出银丝——但是多数人

已经被生活分散到全国各地，而且有的已经高升了。领导那次植树的是园丁达尼雷奇，当时他就年纪不小。虽然现在他已经老态龙钟，但还在公园里做园丁的头头。

于是，这座公园就成长起来，成了成年人喜爱的休憩场所。但是对青年来说，它不仅只是一个场所，而是青春焕发时期的生命本身，因为它和他们一同成长，它像他们一样年轻。

现在，公园里翠绿的树冠已经迎风喧哗，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那儿已经绿叶成荫，可以找到幽秘的角落。夜里，在月色之下，它无比美丽，可是到了阴雨连绵的秋夜，当潮湿的黄叶在黑暗中盘旋着簌簌落下的时候，这里甚至有些阴森森的。

青年们就这样和他们的公园、和他们的城市一同成长起来，并且按照自己的意思给各个城区、郊区和街道题了名字。

搭起了一批新的木屋，他们就把这块地方叫做“新木屋”。现在已经根本没有什么木屋，周围都盖起了砖房，但是旧名字仍旧沿用下来。直到如今还有个城区叫“鸽房”。从前这里有三所孤零零的破木屋，孩子们就在里面养鸽子，现在那边也造起了标准式房屋。“楚利林诺”——以前这里总共只有一座小房子，里面住着一个姓楚利林的矿工。“干草场”——以前那边有个堆干草的院子。“木头街”——这是公园后面铁路过道口那边的一条和全城毫不相联的街道，现在它也还是那样，那边的房子也还是那些木头房子。那边住着华丽雅·鲍尔茨，一个不满十七岁、生着深灰色的眼睛、梳两条金黄色辫子、自尊心很强的姑娘。“砖房街”——这是最早造起标准式砖房的街道。现在这种房子很多，但是只有这条街叫“砖房街”，因为它是第一条。而“八家宅”呢——这已经是整整的一个区，有了好几条街，以前这里一共只有八幢这种标准式房屋。

全国各地的人们不断汇集到顿巴斯。他们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往哪里住？一个叫李方查的中国人，用粘土和麦秸在空地上搭了一所住房，后来他又搭了好些一间连着一间的、蜂窝似的小房间出租。直到后来，外地人才懂得，其实不必向李方查租房，自己搭就行。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占地很广的区域，里面全是互相毗连的土房，——这一区名叫“上海”。后来，在那个把城市隔成两部分的峡谷两旁和城市四周的空地上，也都造起同样蜂窝式的土房，这片粘土窝就叫“小上海”。

这一区最大的矿井新一号井的位置正巧在索罗金庄和以前的雅尔曼金村之间。自从这个矿井开工之后，克拉斯诺顿城就朝索罗金庄那面扩展，差不多和它联成一片。这样一来，那个久已和近旁较小的庄子连在一起的索罗金庄，就成了五一村——成了城里的一个区。

这个区和城市其他各区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这里多数的住房都是原来的哥萨克庄子。

这都是私人房屋，式样各不相同。这里的居民中间仍旧有许多哥萨克，他们不在矿里工作，而是在草原上种地，并且联合起来组成几个集体农庄。

邬丽亚的父母的小房坐落在远远的村边的洼地里。从前这里是迦夫利罗夫庄，这座小房是一座古老的哥萨克式小房。

邬丽亚的父亲马特维·马克西莫维奇·葛洛莫夫是波尔塔瓦省的乌克兰人，从小就跟随父亲到尤佐夫卡谋生。当年他是一个高大强壮、勇敢、漂亮的小伙子，披着一头发梢卷成圆圈的金色鬈发，又是出名的采煤大力士，

姑娘们都喜欢他。难怪在邬丽亚看来不啻是圣经上所写的那个古老时代，这里刚开出几个小矿井，他刚到这一带地方来谋生的时候，就把玛特辽娜·萨维里耶芙娜，当年还是迦夫利罗夫庄的玛特辽莎①，一个娇小的黑眼睛的哥萨克姑娘，迷住了。

日俄战争期间他在莫斯科第八格列纳结尔兵②团服役，六次受伤，两次是重伤。他曾经多次得奖，最后一次因为抢救本团团旗，获得圣乔治章。

①玛特辽莎是玛特辽娜的小名。

②格列纳结尔兵，帝俄时代精选的步兵或骑兵，以身材高大闻名。

从此他的健康就衰退了。他在一些小矿井里又工作了一个时期，后来在矿井里当马车夫，经过半生的漂泊，他就在这个迦夫利罗夫庄，在玛特辽娜陪嫁的小房子里定居下来了。

邬丽亚刚抓住自家的门，就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她爱自己的父母，而且一个人在年轻时候往往如此，她不仅想不到，而且不能设想，在生活中当真会有一天需要撇开家庭自己单独来决定自己的命运。现在，这个时刻却来临了。

邬丽亚知道，她的父母年老多病，而且对自己的家十分留恋，所以不会下决心离开。他们的儿子在军队里，邬丽亚又是一个没有确定的生活方向的姑娘，一个没有职业的人，照管不了他们。还有一个女儿比邬丽亚大得多，丈夫是矿井管理处的一个上了年纪的职员，都住在他们家里。这个大女儿有她自己的孩子，她也下不了决心离开。他们大家都早已决定：不管发生什么事，他们都决不离开家园。

只有邬丽亚，在这最后关头之前，心里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计划，也没有一个坚定的目标。她总觉得，应当由别人来给她做主。有时她想参军，一定要进空军，于是她就写信给她的在一个空军部队里做技师的哥哥，问他能不能设法让她进航空学校。有时她觉得，干脆不如像克拉斯诺顿的某几个姑娘那样，进护士训练班——这样她很快就可以进作战部队。有时她心里暗暗希望到敌占区去参加游击队的地下活动。有时，她心里又突然充满了如饥似渴的要学习的愿望，要继续学习！战争总不能永远打下去，它一旦结束，就又要生活和劳动，那时就更需要通晓业务的人，她不是很快就可以成为一个工程师或者教师吗？但是结果谁也不来支配她的命运，而现在时候已经到了，她得打开门并且……

直到此刻，她才感到，生活会变得多么可怕。她得丢下父母任凭他们受敌人凌辱，只身闯进这个茫茫的、可怕的、充满困苦、流浪和斗争的世界……她觉得膝盖十分软弱无力，差点坐在地上。啊，要是她能够马上钻进这个舒适的小房子，关上百叶窗，倒在自己的少女的卧榻上，就这样悄悄地躺着，不作任何决定，那该多么好呀！这个黑头发的小姑娘邬丽亚跟别人有什么相干呢！就这样爬上床，蜷着腿，生活在相亲相爱的亲人中间，管它发生什么事情……可是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什么时候发生？会不会拖得很久？也许，它并不十分可怕吧？

但是在这同一刹那，她因为自尊心受到屈辱而颤抖了：她怎么能容许得出这样的结论？可是她已经没有时间选择了：母亲已经迎着她跑过来。是什么力量使母亲从病榻上起来的呢？母亲的后面是父亲、姐姐和姐夫。孩子们也跑了过来。他们的脸上都带着焦急不安的痕迹，小外甥一个劲儿地哭着。

“你到底跑到哪儿去啦，我的好女儿？一清早就不见你的影儿！快到阿

纳托里那里去，要是他还没有走，快去，女儿！”母亲说，眼泪顺着她的被风吹日晒的、苍白的、满是皱纹的两颊滚下来，她也不打算去擦。

母亲已经老了，背也开始弯了，但是头发依然乌黑。她的头发是乌黑的，她的黑眼睛仍然是美丽的，像是一只大野鸟的眼睛，虽然她本人身材矮小。她聪明能干，性格坚强，女儿们和老葛洛莫夫都听她的话。但是现在到了女儿得自己拿出主张的时候，母亲却束手无策了。

“谁找过我？是阿纳托里？”邬丽亚急忙问道。

“区委会有人找你。”父亲说。他站在母亲后面，沉重地垂着两只大手。

他已经多么衰老了啊！他前面的头发几乎全秃了，只有后脑和两鬓还留着昔日鬈发的痕迹，依然鬈成一圈圈的。但是他的格列纳结尔兵式的发红的口髭已经白了许多，脸上的胡茬也花白了，鼻子完全是红里透青的，砖色的兵士的脸上也布满皱褶。

“快去，快去，女儿！”母亲重复说，“等一下，我去叫阿纳托里！”说着，这个矮小的老妇人就穿过田垅向邻居波波夫家跑去，波波夫家的儿子阿纳托里是今年同邬丽亚一起从五一村的中学毕业的。

“您去躺着吧，妈，我自己去！”

邬丽亚撒腿去追母亲，但是母亲已经顺着樱桃园往下面跑去，她们这一老一少，就一同跑着。

葛洛莫夫和波波夫两家的花园互相毗连。两家花园都缓缓地往下倾斜，通到一个干涸了的小谷，谷底有一道篱笆，就算是界线。邬丽亚和阿纳托里虽然生下来就是邻居，但是除了在学校里以及他常去做报告的共青团集会上之外，她从不跟他见面。小时候，他有他男孩子的爱好；到了高年级里，同学们都嘲笑他，说他怕女孩子。真的，要是他在街上或是某人家里遇到邬丽亚或是别的女孩子，他总是手足无措，甚至顾不得向人家问好，即使向人家问好，也是涨得满脸通红，弄得随便哪个女孩子都会脸红起来。女孩子们有时私下也谈起这一点，背地里嘲笑他。但是邬丽亚却仍旧尊重他，他读书读得非常多，人很聪明，只是沉默寡言；他喜爱的诗和邬丽亚喜爱的相同，他还搜集甲虫、蝴蝶、矿物和植物的标本。

“塔伊西雅·普罗柯菲耶芙娜！塔伊西雅·普罗柯菲耶芙娜！”母亲隔着矮篱笆把身子探进邻家的小花园，叫道。“托里亚①！邬丽亚来了……”

①托里亚是阿纳托里的小名。

阿纳托里的妹妹在那边上面的什么地方尖声答应了一声，可是有树遮着看不见她。接着，在枝头满缀熟透了的小樱桃的树丛中间，他本人也跑过来了。他穿着下摆和袖口绣花的乌克兰式衬衫，敞着衣领，为了不让他的朝后梳的燕麦色长发披散下来，后脑上压着一顶乌兹别克式小帽。

他的晒黑的、眉毛浅白的、总是严肃的瘦脸热得通红，胳肢窝底下都现出潮湿的汗圈。

显然，他把看见邬丽亚要怕羞的事已经完全忘记了。

“邬丽亚……你可知道，我一清早就在找你，我已经把所有同学家里都跑遍了，为了你，我叫维嘉①·彼得罗夫晚些动身。他们都在我们家里，他父亲骂得可凶啦，你赶快去收拾吧！”他急急地说。

①维嘉是维克多的小名。

“可是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啊！这是谁的命令？”

“是区委会的命令，叫大家都离开。德国人眼看着就要来了。所有的人

我事先都通知了，唯独找不到你们这一伙，都快把我急死了。后来维嘉和他父亲从波高烈莱庄赶着车子来了。他父亲在国内战争时期就在这里打过游击反对德国人，他当然一分钟也不能耽搁。你瞧，维嘉是专门来接我的！真是个好同志，这才称得上是同志！他父亲是林务区长，他们林管区的马挺棒！我当然请他们等一等。他父亲就骂起来，我说：‘您自己是个老游击队员，您懂得是不该把同志丢下的，而且，’我说，‘您一定是一个勇敢的人……’所以我们就等着你。”阿纳托里急急地说，显然是希望一口气把他的全部感受都对邬丽亚说出来，他的时而是浅灰色、时而是蓝色的眼睛望着她，突然射出光芒。这双眼睛一霎时使他的眉毛浅白的脸显得非常魅人。

以前她怎么会觉得这张脸是毫无特色的呢？在阿纳托里的脸上——在他的饱满的嘴唇的线条里，在他的阔鼻孔的轮廓里——显露出一种精神力量，是的，正是力量。

“托里亚，”邬丽亚说，“托里亚……你……”她的声音发抖了，她隔着篱笆把晒黑了的狭长的手伸给他。

这时候，他才不好意思起来。

“快，快，”他避免正视她的似乎烧透他全身的黑眼睛，这样说道。

“东西我都收拾好了，你们把大车赶到大门口来吧……请赶过来……请赶过来吧，”邬丽亚的妈妈重复说着，眼泪不断地从她脸上滚下来。

在这一分钟以前，母亲还不完全相信，她的女儿要只身投进这个巨大、崩裂的世界，但是她知道，女儿留下来有危险，现在既然有好心人，又有大人陪着，现在一切就都决定了。

“可是，托里亚，你通知瓦丽雅·费拉托娃了吗？”邬丽亚声调坚决地说，“你是知道的，她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我不能不带她去。”

阿纳托里的脸上露出十分苦恼的神情，他既不能够，也不想掩饰这种苦恼。

“马不是我的，而且已经有我们四个人……我简直不知道……”他一筹莫展地说。

“但是把她丢下我一个人走是不行的，你明白吗？”

“马当然很有气力，不过到底是五个人啊……”

“好吧，托里亚，谢谢你的一切……你们走吧，我跟瓦丽雅一起走……我们可以步行。”邬丽亚坚决地说，“再见了！”

“天哪，怎么能步行，我的女儿！我已经给你把全部衣服和内衣都放在一只箱子里，还有铺盖呢？……”母亲像孩子那样用拳头揩着脸，大声哭起来。

邬丽亚对朋友的高尚的友谊，不仅没有使阿纳托里感到惊奇，他反而觉得这是非常自然的。要是邬丽亚不这样做，那才会令人惊奇呢，因此他并没有生气，也没有露出不耐烦的样子；他只是在寻找解决的办法。

“你至少该去问她一声！”他叫了起来，“也许她已经走了，也许她根本不打算离开，她究竟不是团员啊！”

“我去找她。”玛特辽娜·萨维里耶芙娜突然精神抖擞起来，她简直是在不自量力了。

“妈，您去躺着吧，一切都由我自己来！”邬丽亚生气地说。

“托里亚！你们快好了吗？”维克多·彼得罗夫在上面，在波波夫家里用响亮有力的嗓子喊道。

“他们的马挺棒，那是不成问题的。大不了我们轮流跟着马车跑。”阿纳托里一面考虑，一面在自言自语。

但是邬丽亚无需去找瓦丽雅。她们母女刚走上自家的台阶，就看见她们一家人围着瓦丽雅，站在台阶同边屋、厨房和牛棚中间。瓦丽雅显得瘦了，连她的晒得黑黑的脸都显得苍白了。

“瓦丽雅，去收拾收拾。有马，我们可以说服他们把我们俩都带走！”邬丽亚急急地说。

“等一下，我有话要对你说……”

瓦丽雅抓住了她的手。

她们退到门边。

“邬丽亚！”瓦丽雅直望着她说。她那双隔得很宽的浅色眼睛里流露出无限的痛苦。

“邬丽亚！我哪儿都不去，我……邬丽亚！”她感情激动地说，“你是个不平凡的人，是的，是的，你身上有一股强烈的、巨大的力量，你什么都能做，我妈说得对——上帝给了你一双翅膀……邬丽亚，你是我在世界上的幸福，”瓦丽雅怀着热爱说，“我在世界上最大的幸福，就是你，但是我……我不跟你走。我是个最平凡的人，我知道这一点，我总是梦想着最平凡的事儿……你看，我想等我毕了业，就去工作，将来遇到一个善良的好人，我就跟他结婚，我要有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我们将要过着快乐而平凡的生活，别的我什么都不想。邬丽亚，我不会斗争，我不敢单身到外边去……是的，我知道，现在我的这些梦想都破灭了，但是我妈年纪大了，我没有做过伤害别人的事，我是个不受注意的人，所以我打算留下来……请你原谅我……”

瓦丽雅说着就用她一直团在手里的小手帕捂着嘴哭起来。邬丽亚猛地抱住她，搂得紧紧地，自己也伏在她的非常熟悉可爱的、亚麻色头发散发着香味的头上，哭起来。

她们从小就是好朋友，一起念书，一同升级，互相分享最初的少女的欢乐、忧愁和秘密。邬丽亚生性沉默，只有在特殊的精神状态下才肯吐露自己的心事；瓦丽雅的思想感情虽然并不总能理解邬丽亚的倾诉，却总是把一切一切都告诉她。其实年轻人哪里会顾到什么相互了解呢？彼此信任、可以无话不谈，这就是欢乐。哪知道，她们竟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在她们的温柔的、神圣的少女的友情后面有过这么多晴朗明媚的日子，所以别离的痛苦使她们心碎。

瓦丽雅觉得，她此刻是在放弃自己生活中一件最重要、最光明的东西，今后的前途就是非常暗淡、非常渺茫可怕的了。

邬丽亚却感到，她要失去她在幸福的时刻或是精神最苦闷的时刻唯一可以推心置腹的人。她并不介意朋友是否了解她，她只知道，她永远可以在瓦丽雅心里找到感情的共鸣——善良和顺从、爱和单纯是同情的共鸣。邬丽亚哭，是因为这是她童年的结束，她要成为大人，她要走进世界，而且是只身前往。

现在她才记起，瓦丽雅把她头上的百合花拔掉、扔在地上的事。现在她才明白，瓦丽雅为什么要这样做。在这种人心惶惶的时刻，瓦丽雅想到，她的朋友要是头上插着这枝百合花跑到炸毁矿井的地方，会显得多么异样，因此她拔掉了邬丽亚头上的百合花。这表示，她完全不像她所说的那么平凡，

她懂得的事情很多。

有一种预感告诉她们：现在她们中间发生的事情，是最后一次了。她们不仅感到，而且知道，在某种特殊的、精神的意义上来说，她们要永别了。因此她们伤心地哭着，并不因为流泪而害羞，也不想忍住泪水。

在这些岁月里不知流了多少眼泪——不仅落在顿涅茨的土地上，也落在所有被破坏、被焚烧和血流成河的苏维埃土地上。这些眼泪里面有的是无力、恐惧、直接的难忍的肉体痛苦的眼泪。但是也有多少崇高的、神圣的、高贵的——人类从未流过的最神圣、最高贵的眼泪啊！

一辆车身长长的农村大车，由两匹枣红色的好马拉着，咕隆隆地向门口驶过来。车子是用大货车改装的，装着向外倾斜的木栅栏，车上堆满了包裹箱箧。赶车的是一个块头很大的中年人，他生得粗眉大眼，满脸是肉，身穿军便服，头戴皮制帽。邬丽亚看到车子过来，就放开朋友，用小枕头般狭长的手掌擦掉眼泪，脸上又恢复了原来的表情。

“别了，瓦丽雅……”

“别了，邬丽亚。”瓦丽雅失声痛哭了。

她们吻别了。

大车在门口停下。车子后面出现了阿纳托里的母亲塔伊西雅·普罗柯菲耶芙娜——一个高大健壮、肤色洁白、眼睛和头发都是浅色的哥萨克妇人，——和他的妹妹娜塔莎。她们都跑得面孔通红、满头大汗，眼睛也是哭过的。阿纳托里的父亲从宣战之后就上了前线。

阿纳托里已经坐在车上，他旁边是深色头发、样子可爱的维克多。维克多穿着胸口敞开的汗衫，手里拿着用什么软东西裹着、又用绳子捆着的吉他，大胆的、孩子气的眼睛里露出忧伤的神色。

邬丽亚转过身子，像木头人似的迎着亲人走过去。她的箱子、包袱和头巾都已经拿出来了。矮小年老、有着大野鸟般的黑眼睛的母亲，急急向她跑过来。

“妈妈！”邬丽亚说。

母亲把两只干瘦的小手一拍，就昏倒了。

第五章

自从民族大迁徙①以来，顿涅茨草原还不曾见过像一九四二年七月这些日子里那样的大队人马的移动。

①指公元最初几个世纪欧洲斯拉夫人、日耳曼人等的大迁徙。

在烈日下的公路上、土路上或是草原上，满眼都是带着辎重车、炮队和坦克的撤退的红军部队，保育院和幼儿园的孩子们，畜群，卡车，以及逃难的人们。逃难的人们有时排成队列，有时分散，他们推着小车，上面堆着物件，孩子们就坐在包袱上面。

他们走过的时候践踏着快要成熟或是已经成熟的庄稼。无论是践踏庄稼的人也好，播种庄稼的人也好，谁都不再爱惜这些庄稼了。这些庄稼已经成为无主之物：留下来也是落到德国人手里。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土豆地

和菜园里，谁爱进去谁就进去。逃难的人们挖出土豆，放在用麦秸或是篱笆燃起的篝火的余烬里烤来吃。步行和乘车的人，个个手里都拿着黄瓜、西红柿、一块一块流着汁水的西瓜或是甜瓜。草原上尘土漫天，望着太阳都不用眨眼。

一个像一粒砂子似的被卷入撤退洪流的人，他反映他的内心活动远远超过他反映周围发生的事件；因此，他的表面看法认为是偶然的、无意义的事，实际上却是由复杂的、有组织的、按照千百个大大小小人物的意志而行动的国家战争机构所调度的庞大的人群和物资的规模空前的移动。

在迫不得已的匆促的撤退中往往如此，除了大批军队与居民的虽然困难然而有计划的主要的、大规模的移动以外，在所有的道路上和草原上，还有逃难的人们，小机关和小团体，在战斗中受创、失去联络、迷失路途的军队的零散队伍和辎重车，以及一群一群因病、因伤、因缺少运输工具而掉队的军人，朝东方和东南方向走去。这些时大时小的队伍，对于前线的实际情况一无所知，只是向他们认为比较妥当合适的方向走去，他们塞满了移动主流的一切空隙和通道，首先是塞满顿涅茨河的渡口；在那里的渡船和浮桥旁边，大群的人、大量的汽车和大车受到敌机轰炸，已经忙乱了一昼夜。

在德军已经在顿涅茨河对岸深入莫罗佐夫斯克的情况下，老百姓再往卡缅斯克那面移动尽管是毫无意义，但是从克拉斯诺顿逃出来的人们，却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正是直奔这个方向，因为调去加强我们在米列罗沃以南顿涅茨河上防务的那个师的先头部队，就是刚刚离开克拉斯诺顿朝这个方向前进的。邬丽亚、阿纳托里、维克多和他父亲乘的那辆套着两匹枣红色骏马的农村大车，也正是投进了这个洪流。

这辆大车夹在别的汽车和大车中间，已经翻过小丘走下斜坡，庄上的最后几座房屋刚从眼前消失，这时候，高空中突然响起了发动机的怪吼，接着，又有几架德国俯冲轰炸机遮住了太阳，低低地在头顶上飞过，一面用机枪向公路扫射。

维克多的父亲，这个戴着皮帽、满脸是肉、嗓音洪亮、精力充沛的大汉，突然脸色发白。

“到草原上去！卧倒！”他声音可怕地喊道。

其实孩子们已经跳下大车，奔到麦田里。维克多的父亲放下缰绳，也跳下了大车，立刻就像蒸发了一般在原地消失了。仿佛这不是一个穿着笨重皮靴的管林大汉，而是一个无形的幽灵。大车上只剩下了邬丽亚，——她自己也不知道，她为什么不跑。但是就在这一刹那，受惊的马忽然猛力一冲，差点把她从车上摔下来。

邬丽亚打算抓住缰绳，可是她够不着：马儿差一点把胸脯撞到前面的一辆轻便马车上，它身子竖立，又朝旁边一冲，几乎把套索挣断。坚固的、车身长长的、容积很大的大车歪了一歪，但是又站稳了。邬丽亚一手攀住车沿，一手抓着一个沉重的布袋，使尽全身力量不让自己摔出去：否则她马上就会死在周围大车的奔马的马蹄之下。

两匹高大的枣红马，打着响鼻，喷着涎沫，后腿站起，发疯似地在被践踏过的庄稼上、在人群和车辆中间横冲直撞。突然，从前面的轻便马车上跳下一个高大、宽肩、浅色头发、没有戴帽子的青年，一下子似乎钻到了马肚底下。

邬丽亚一时没有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转眼之间她在两个鬃

毛直竖、嘴巴大张的马头中间看见了那个青年的非常年轻的、朝气勃勃的脸。他两颊红润，颧骨突出，目光炯炯，面部表情异常紧张用力。

青年用一只手有力地抓住一匹长嘶的马的马嚼旁边的缰绳，站在马和辕杆中间，使劲压在马身上，免得被车辕压倒。他站在那里，高大，整洁，穿一身熨得很平整的灰色衣服，打着深红色的领带，上装袋口露出自来水笔的白骨笔套。他打算用另一只手从辕杆上面抓住另一匹马的缰绳。只有看到他拉马的那只胳膊的衣袖下面隆起的肌肉和晒黑的手背上突露的血管，才看得出他是费了多大的气力。

“站住……站住……”他的声音不很响，但是带着命令的口吻。

当他抓到另一匹马的缰绳的那一瞬间，两匹马在他手里突然安静下来。它们还抖着鬃毛，斜着眼看他，但是他一直等到它们完全安静下来才撒手。

青年放掉手里的缰绳之后，第一件事就是用大手仔细摸了摸他的几乎没有弄乱的、偏分的浅黄色头发，使邬丽亚看了感到奇怪。接着，他抬起完全汗湿的、孩子般的脸，咧着嘴对邬丽亚天真快活地笑了一笑。他的颧骨高高的，眼睛大大的，长着暗金色的长睫毛。

“好—好马，会把车—车子拉坏。”他满脸带笑地望着邬丽亚，稍微有点口吃地说。邬丽亚仍旧抓着车沿和布袋，鼻孔略微鼓着，黑眼睛里带着敬意望着他。

人们又回到公路上，找寻自己的大车和汽车。有的地方，大概是在死伤的人旁边，拥集了许多妇女：从那里传来了呻吟和号泣。

“我真怕马受了惊，车辕杆会撞伤你！”邬丽亚说，她因为激动，鼻孔微微颤动着。

“我也是怕这个。不过马并不凶，骟过的。”他天真地说，他的手指很长的、晒黑的大手，随便摸了摸靠近他的那匹马的因为流汗而发亮的马脖子。

远处，已经是在顿涅茨河上的什么地方，响起了低沉而又刺耳的轰炸声。

“我真替他们难受。”邬丽亚环顾四周说。

凡是目光可以看到的两面，都已经有人和大车走过，仿佛是一条奔腾作响的大河滚滚而过。

“是的，很难受。尤其是我们那些做母亲的。她们心里不知有多么难受！将来她们不知还要有多大的痛苦呢！”青年说。他的脸马上变得严肃起来，额头露出一道道和他的年龄不相称的明显的皱纹。

“是的，是的……”邬丽亚低声说，她眼前似乎立刻浮现出自己矮小的母亲昏倒在焦干的土地上的情景。

维克多的父亲也像消失时那样突然地出现在马的旁边，带着夸张的关切摸着挽索、皮马套和缰绳。阿纳托里也跟着来了，他微微地笑着，负疚地摇着戴着乌兹别克小帽的脑袋，但是脸上仍然带着平时那种一本正经的表情。阿纳托里后面的维克多，也显得有点不好意思的样子。

“我的吉他没有弄坏吧？”维克多关切地瞅了瞅大车，急急地问。等他看到用绗过的棉被裹着的吉他还在包裹中间，就抬起勇敢而忧郁的眼睛瞅了邬丽亚一下，笑了起来。

那个宽肩膀的青年还站在两匹马中间，他钻过辕杆和马颈，潇洒自如地昂着满头浅色头发、没有戴帽子的大头，走到大车跟前。

“阿纳托里！”他高兴地喊了一声。

“奥列格！”

他们紧紧抓住对方的胳膊，在这当儿奥列格又斜过眼来看了看邬丽亚。

“柯舍沃伊。”他这样自我介绍着，伸出手同她握手。

他的左肩比右肩略高。他非常年轻，还完全是一个孩子，但是他的晒黑的脸，他的高大矫捷的身躯，甚至他的打着深红色领带、露出自来水笔白笔套的熨平的衣服，他的全部举止和略带口吃的言谈，都给人一种朝气勃勃、有力、善良、心地纯洁的感觉，使邬丽亚马上对他产生了信任。

他也以青年人那种不自觉的观察力霎时就看清了她的穿着白上衣和深色裙子的苗条的身姿，习惯于田间劳动的农村姑娘的柔韧有力的腰肢，向他注视的黑眼睛，有着波纹的发辫，轮廓美妙的鼻孔，膝盖以下被深色裙子遮住一点的、修长匀称的、晒黑的小腿，——他忽然红了脸，陡地转过身去对着维克多，慌乱地伸出手来同他握手。

奥列格·柯舍沃伊是高尔基学校的学生。高尔基学校是克拉斯诺顿最大的学校，设在市立公园里面。他同邬丽亚和维克多是初次见面，但是同阿纳托里之间已经有了在团员积极分子之间产生的无忧无虑的友谊，那种由一次一次的共青团会议而增进的友谊。

“瞧，想不到在这儿碰到了，”阿纳托里说。“你记得吗，前天我们大伙还到你家里喝过水，你还把我们介绍……给你的外婆！”他笑了起来。“她怎么样，跟你一起走吗？”

“不，外—外婆不走。妈妈也不走，”奥列格说着，额头上又堆起了皱纹。“我们一伙五个人：柯里亚，妈妈的弟弟，可我怎么也叫不惯他舅舅！”他微笑了一下。“他的妻子和他们的小男孩，还有替我们赶车的老—老头。”他朝前面的轻便马车那边点点头，那边已经喊过他几次了。

现在，那匹灵活矮小的黄骠马拉着那辆轻便马车，一直在前面跑，两匹枣红马紧跟在后面，轻便马车上的人们的脖子和耳朵上都感到它们湿润的鼻孔里喷出的热气。

奥列格的舅舅尼柯拉·柯罗斯蒂辽夫，或是柯里亚舅舅，是克拉斯诺顿煤业联合公司的地质工程师。他生性恬静，年轻漂亮，浅褐色的眼睛，黑眉毛，穿一套蓝衣服。他只比外甥大七岁，跟他就像跟平辈一样亲热，这时就拿邬丽亚来取笑他。

“老弟，这个机会万万不能错过。”柯里亚舅舅并不望着外甥，声调平板地咕噜说，“你差不多是救了这个漂亮姑娘的性命，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啊！这种事儿，老弟，没有媒人是不成的。你说对吗，玛丽娜？”

“见你的鬼！都要把我吓死了！”

“她很美，是吗？”奥列格问他年轻的舅母，“简直美极啦！”

“那么莲娜呢？……唉，你这个奥列日卡真是！”舅母的黑眼睛盯着他说。

玛丽娜舅母是一个非常俊俏的乌克兰妇人，这样的人好像是从民间的版画上走下来的，——穿着绣花的乌克兰式上衣，戴着项圈，牙齿洁白，柔密乌黑的头发好像绵云似的覆在头上，——甚至在匆促上路之前她也要着意修饰一番。

她手里抱着一个三岁的胖小子，这孩子对他在周围看到的一切都有着非常快活的反应，他并没有想到他已经陷入了多么可怕的境地。

“不，在我看，莲娜和我们的奥列格才真是一对。这一个虽然很美，可是她决不会爱上我们的奥列格，因为奥列格还是一个孩子，可人家已经是一

个漂亮的大姑娘了！”玛丽娜舅母很快地说着，乌黑的眼睛不安地望着四周，不时还望望天空，“女人年纪大了是会喜欢小伙子的，可是如果她还年轻，那她决不会爱上比自己年轻的人，我这样说，是根据我自己的经验。”舅母的话快得像放连珠炮，表示她真是“要吓死了”。

莲娜·波兹德内雪娃是奥列格同班的女同学，留在克拉斯诺顿没有走，奥列格跟她感情很好，并且爱上了她，他的日记里有好多篇幅讲到她。他奥列格对邬丽亚这样倾倒，就对莲娜的关系来说，也许的确有些不好吧？但是这会有什么不好呢？莲娜已经是永远在他心坎里的，永远不会淡忘，而邬丽亚……于是在他面前又浮现出邬丽亚和那两匹马，他又觉得有一匹马从左侧向他呼气。难道经过这一切之后，玛丽娜的意见还会是正确的吗？那就是说，这个姑娘也许会因为他还是个孩子而不爱他！“唉，你这个奥列日卡真是！……”

他容易钟情，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

两辆马车——轻便马车和装着向外倾斜的木栅栏的农村大车——还久久地在草原上迂回行进，极力想越过行列，但是还有成千成百的人，也极力要钻到前面去。一眼望去，到处都是同样的人、汽车和大车的洪流。

邬丽亚和莲娜的形象渐渐地都离开了奥列格，一切都被这连绵不断的人流遮蔽了。在这股人流里，套着黄骠马的轻便马车和套着两匹枣红马的大车，就像是两叶破舟，在大海中摇晃着。

无垠的草原向世界所有的角落伸展过去，地平线上不断升起浓烟。仅仅在很远很远的东方，有几朵无比皎洁明亮的卷云，堆在浅蓝的天空，如果从这些云朵里飞出几个手擎银喇叭的白衣天使，也是丝毫不足为奇的。

这时候，奥列格不禁想起了妈妈和她的慈爱而柔软的双手……

……妈妈，妈妈！自从我开始意识到世界上有我的那一刻起，我就记得你的手。夏天，你手上的皮肤总是被太阳晒黑，一直到冬天都不褪，——它是那么柔和、均匀，只在有血管的地方颜色略微深些。也许，你的手略嫌粗糙，因为它们不知干了多少活儿，但我总觉得它们非常柔软，我非常喜欢吻你手上暗色的血管。

是的，从我开始记事的那一刻起，一直到你送我走上艰苦的生活道路时，你疲惫不堪，轻轻地把头最后一次放在我胸口的最后一分钟为止，我记得你的手总是在干活。我记得这双手怎样在皂沫中搓洗我的被单，那时这些被单小得简直像襁褓。我也记得冬天你穿着皮袄用扁担挑水的模样，你把一只戴无指手套的小手放在扁担前面，而你自己也像那只手套那么小，那么柔软。我看见你的骨节略微变粗的手指点着初级读本，我就跟着你念：“别—阿—巴，巴—巴。”①我看见你的一只有力的手把镰刀贴近麦秆的根部，另一只手抓住一把麦秆让镰刀把它割断，我看见镰刀的不可捉摸的闪光，接着就是双手和镰刀的十分迅速、平稳、柔和的动作，把一束束麦穗轻轻放下，免得弄断紧握着的麦秆。

①这是初学俄语时学的拼音。

我记得，当我们孤独地生活着，似乎在世界上是完全孤独的时候，你到冰窟窿里去洗衣服，手被冷水冻得通红僵硬，手指不能弯曲。我记得，你的手能够轻得令人毫不觉察地拔出儿子手指上的刺。也记得，当你一面缝衣服一面唱歌——仅仅是为你自己和为我而唱——的时候，这双手一眨眼就把线穿进针眼。因为世界上没有一样事情是你的手不会做、不能做或是不屑做的！我见过你用手把粘土和着牛粪，去抹农舍的墙；我也见过你的戴着戒指

的手从绸衣袖里露出来，举着一杯摩尔达维亚红酒。而当继父跟你闹着玩把你抱起的时候，你的丰腴白皙的双臂又是多么温存地环绕着他的脖颈。这位继父，你教会了他爱我，而我先是因为你爱他就尊敬他，把他当作自己的生父一样。

但是，最使我永记不忘的是，你那双略嫌粗糙的、十分清凉而又令人感到十分温暖的手，在我似睡非睡地躺在床上的时候怎样温柔地抚摩我的头发、脖颈和胸部。我不论什么时候张开眼睛，你总在我身旁，房间里点着夜明灯，你那双深邃的眼睛仿佛从黑暗中凝望着我，你自己则是遍体安详、发光，仿佛披着金装。我要吻你那双圣洁的手。

你——如果不是你，那么就是别的跟你一样的人，——把儿子们送上前线之后，有的儿子你已经再也看不到了。如果这杯苦酒放过了你，它也不会放过别的像你一样的母亲。但是，假如在战争的岁月里，人们还有面包可吃，还有衣服可穿，地里还堆着麦垛，火车还在轨道上奔驰，花园里的樱桃树还在开花，熔铁炉里的火焰还在熊熊发光，还有一种无形的力量使伤病员从地上或床上起来，奋力作战，那么这一切都是出自我的——我的、他的、还有别人的——母亲之手。

年轻人，我的朋友，你也回顾一下，像我这样回顾一下吧，然后你再说说，除了自己的母亲，你一生中还使什么人的感情受过更大的伤害？我们的母亲不是为了我，为了你，为了他，为了我们的失败、错误和痛苦而白了头的吗？总有一天，在母亲的坟前我们的心会因为这一切而受到谴责。

妈妈，妈妈！宽恕我吧，因为只有你，世界上只有你能够宽恕我。像我小时候那样把你的手放在我头上，宽恕我吧……

这样的思想和感情涌集在奥列格心头。他始终不能忘记，他母亲是留在“那边”，还有维拉外婆，“我严峻的岁月中的女友”①，她也是个妈妈，是他母亲和柯里亚舅舅的妈妈，也留在“那边”。

①俄国诗人普希金（1799—1837）《给奶娘》一诗中的诗句。

于是奥列格的脸变得严肃起来，木然不动了，长着暗金色睫毛的大眼睛也蒙上了一层潮润的薄膜。他弓着背坐着，耷拉着腿，大手的有力的长手指交叉着，额头上又露出了深深的纵皱纹。

柯里亚舅舅、玛丽娜、甚至他们的小儿子，也都安静下来了。同样的寂静也降临到他们后面的大车上。后来连黄骠马和枣红色骏马在这种酷热和拥挤中也感到疲倦了，两辆马车不觉又驰到公路上；公路上的人、汽车和大车的洪流仍旧在不断地滚动。

人们在这条人间苦难的洪流里无论是做什么，想什么，说什么——不管他们是说笑也好，打盹也好，喂孩子也好，交朋友也好，在难得碰到的井旁饮马也好——在这一切的后面和上面都已经张开了一个看不见的黑影，它已经在北方和南方展开双翅，从背后扑来，比这股洪流更为迅速地在草原上扩展着。

他们都觉得自己是被迫离开家园和亲人，此去前途茫茫，而投出这个黑影的力量又会追上他们，使他们粉身碎骨。这样的感觉像石头似的沉重地压在每个人心上。

第六章

车辆和逃难的人群靠公路边上移动，轻便马车和农村大车被挤到了那边，新一号井的卡车也夹在里面。卡车上载着矿井管理处的工作人员、器材、井长瓦尔柯和谢夫卓夫——这个谢夫卓夫，不过几个小时以前，邬丽亚还在他家门旁边见到过。

步行的还有一所保育院的孩子，这所保育院是当时设在“八家宅”，是收容卫国战争参加者的孤儿的。这些五岁到八岁的男孩和女孩，由两个年轻保育员和兼任教员的女主任陪着。主任是个中年妇人，锐利的目光若有所思，头上照刈麦妇女的式样包着红头巾，满沾尘土的长统胶靴直接套在只穿着袜子的脚上。

几辆载着保育院财物的大车，随着孩子们同行，孩子们走累了，就轮流乘坐大车。

新一号井的卡车刚开到保育院的孩子们跟前，车上的人就全都跳下来，让孩子们坐上去。谢夫卓夫非常喜欢一个浅黄头发、蓝眼睛的小女孩，她的小脸儿一本正经，小脸蛋胖乎乎的，谢夫卓夫说它是小馒头。他几乎一直抱着她，吻她的小手和馒头似的小脸蛋，逗她说话，因为他自己也跟她一样，有着浅黄头发和蓝眼睛。

轻便马车和农村大车现在跟保育院的大车挨在一起。他们后面是一个带着炊事班、机枪和大炮的部队，在公路上拉得很长。被顿涅茨的天空衬得异样突出的近卫军迫击炮，像军旗般轻快地摆动着，缓缓移动。从远处看不见运载这些迫击炮的卡车，这些奇怪的武器就像凌空在这些蜿蜒好多公里的军人和老百姓的头上移动。

粘在指战员们皮靴上的锈色尘土，已经积了厚厚的一层。部队行军已经好几天。队伍的前头，紧跟着大车，是一连自动枪手；大车走得缓慢的时候，他们就从大车两旁绕过去。战士们的脸好像在窑里烧过的耐火砖，他们用一只累坏了的、或是受伤后包扎着的胳膊，像抱婴孩那样把自动枪抱在怀里。

好像根据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似的，邬丽亚坐的那辆大车似乎成了自动枪连的附属财产，成了连队的一部分：无论是在行军或是休息的时候，大车总是处在连队当中，不管邬丽亚朝哪里望，她总会遇到青年军人慢慢地投过来的或是直接向她射过来的目光。这些军人的皮靴和帽子上都满是灰尘，身上的军便服经过日晒雨淋，不止一次汗湿了又吹干，吹干了又汗湿，并且在潮湿的泥地上、沙滩上、沼泽里、松林中和盐沼里弄得满是泥污。

虽然是在撤退，战士们在姑娘们面前仍旧精神饱满，爱闹，爱开玩笑，并且像任何一个连在行军中或是休息时一样，在自动枪连里也有他们所喜爱的滑稽大家。

“你往哪儿去，没有命令你上哪儿去？”只要维克多的父亲想利用一点点机会催马往前钻，那位滑稽大家就要对他嚷嚷。“不行啊，亲爱的朋友，没有我们现在你们是不能走的。

我们已经把你们永远编进我们的连队，你们要像军用小铜锅一样永远跟着我们。在给养方面，像锥子啦、肥皂啦、口粮啦，我们都把你们计算在内，至于这位姑娘——愿上帝和正教教会保护她的美丽！——我们每天早上要给她喝咖啡。而且是加糖的！……”

“对，卡尤特金，别让我们的连队丢面子！”自动枪手们快活地打量着邬丽亚，笑着。

“怎么样？我们马上就来证实一下。司务长同志！菲佳！他睡着了吗？弟兄们，你们瞧，他一边走一边睡……这个司务长真不赖！把鞋掌都丢掉了……”

“你倒没有把脑袋丢掉吗？”

“我丢了一个笨脑袋，它恰巧跑到了你的肩头上，不过那个聪明的倒还在我身上。我的脑袋是装上去的，瞧……”

于是卡尤特金就端端正正地捧住自己的小脑袋，一手托住下巴，另一只手按住后脑勺——头上的船形帽随便扣在一边眉毛上，——瞪着眼，用头做出旋转的动作，仿佛真的要把脖子旋出来。脑袋和身子要脱离关系的错觉是那样逼真，全连的人和近旁所有的人看了都哈哈大笑起来。邬丽亚忍不住了，也像孩子似的清脆地笑起来，笑了又觉得不好意思。所有的自动枪手都欢欢喜喜地望了望邬丽亚，仿佛他们知道卡尤特金是专门做给她看的。

这位滑稽大家卡尤特金个子矮小，动作非常灵活。他满脸都是细皱纹，但是面部表情善于变化，使人再也猜不出他的年龄——他可能是三十开外，也可能是二十不到，从身材和举动看来，他完全是个孩子。他的大大的蓝眼睛四周也布满细皱纹，当他不开口的时候，眼睛深处就突然露出日积月累的倦意，但他仿佛不愿意让人家看到他的疲倦，所以嘴巴几乎没有停过。

“你们是从哪里来的，年轻人？”他问邬丽亚的同伴。“哦，我知道了，你们是从克拉斯诺顿来的！”他得意地说。“这位姑娘大概是你们哪位的姊妹？或者，老爷子，请原谅，是您的闺女？啊，这是怎么回事？姑娘跟谁都没有关系，不是什么人的闺女和姊妹，也不是出了嫁的媳妇！到了卡缅斯克她一定要被动员的。动员她去做交通指挥员。指挥街上接连不断的交通！”卡尤特金做了一个无法模仿的手势指指公路上和草原上发生的一切。“她还不如加入我们的自动枪连！……真的，小伙子们，你们眼看就要到俄罗斯了，那边的姑娘多得不得了，可我们连队里连一个也没有。我们非常需要一个这样的姑娘，她可以教我们谈吐文雅，举止大方……”

“这要看她自己愿不愿意了，”阿纳托里忸怩地望望邬丽亚，含笑说。邬丽亚竭力绷着脸，结果还是笑了，只好望着旁边，免得和卡尤特金的目光相遇。

“唔，我们会说服她！”卡尤特金叫道，“我们可以从咱们连里派出几个能说会道的弟兄，不管什么样的姑娘他们都能说服！”

“要不要真的去呢，现在跳下车就走？”邬丽亚突然这样想，她的心都揪了起来。

奥列格这时一直在大车旁边走着，他像着了迷似的，眼睛一直盯着卡尤特金。他爱上了卡尤特金，并且希望大家都喜欢他。只要卡尤特金一开口，奥列格就把头往后一仰，咧着嘴大笑起来。他实在太喜欢卡尤特金，他高兴得甚至不时搓着指头尖。但是卡尤特金好像根本没有感到这种情形，甚至没有瞅过他一眼，他对邬丽亚和所有被他逗笑的人，也是一眼都不看。

有一次，卡尤特金说了一个滑稽透顶的笑话，战士们都在大笑的时候，一辆蒙着厚厚的一层尘土的吉普车从草原上赶来，开到连队旁边。

“立—正！……”

从连队的人丛中走出一个长脖子上青筋突露的大尉，他一手按住摇晃

的手枪套，迅速地迈动两条瘦腿，跑到停下的吉普车跟前。一位胖胖的将军伸出戴着新制帽的圆圆的大脑袋来望了一望。

“不必了，不必了，”将军说，“稍息……”

他下了车，跟敬过礼的大尉握了手，那双在他的严峻朴质的脸上发出快活光辉的小眼睛同时迅速地扫视着在尘土飞扬的大路上行军的自动枪手们。

“啊，原来是我们库尔斯克人，还有卡尤特金！”将军喜形于色地说。他向吉普车做了一个手势，叫它在草原上跟着开动，自己却跨着以他的体格说来是出人意外地轻快的步伐，和自动枪手们一同步行。“是卡尤特金，好极了……如果卡尤特金活着，这就表示士气是不可战胜的。”他高兴地望着卡尤特金，可是他的话却是对着边走边向他身边挤过来的战士们说的。

“我为苏维埃联盟服务！”卡尤特金说的时候非常严肃，不像他在这以前用的那种故意提高的、开玩笑的声调。

“大尉同志，我们到哪儿去，我们去干什么，战士们都知道吗？”将军向在他旁边略微靠后一点的连长问道。

“知道，将军同志……”

“他们上次在水塔旁边的表现真了不起，记得吗？”将军迅速扫视着向他身边挤过来的战士们，说。“而主要的是保全了自己……啊，好就好在这里！”他赞叹地说，好像有人要反驳他似的。“死并不难……”

大家都明白，将军的话与其说是表扬过去，还不如说是让他们对未来做好思想准备。大家脸上的笑容都消失了，出现了一种难以捉摸的、共同的、含义深长的表情。

“你们年纪虽轻，可是经验却丰富得很哪！拿我年轻的时候来说吧，简直跟你们没法比，”将军说。“以前我也在这条路上走过。不过，敌人跟现在的不同，装备也不同！要是跟我那时候受的教育来比较，你们受的就是大学教育了……”

将军动了动他的大脑袋，仿佛是要驱除或是肯定什么想法。在某些场合，这是他不满的表示，在另一些场合，却又是满意的表示。目前这是他满意的表示。大概，青春时代的回忆使他愉快，同时，自动枪手们和他们的已经成为自然的军容也使他高兴。

“请容许我问一句，”卡尤特金说，“他们进来得很深了吗？”

“很深，真该死！”将军说。“非常深，弄得咱们已经有些尴尬了。”

“还要进来吗？”

将军默默地走了一会。

“那就要看我们了……去年冬天我们给了他们一次打击之后，他们又积聚了力量。他们搜集了整个欧洲的技术装备，集中一点，专向我们进攻。他们估计我们一定顶不住。可是他们没有后备力量……瞧，问题就在这里！……”

将军的目光落到前面的一辆大车上，他突然在车上的人们中间认出了德国俯冲轰炸机飞过时他在公路上看到的那个单身姑娘。他可以想象得出，在他乘着吉普车赶到师的第二梯队里逗留片刻便又赶上经过克拉斯诺顿的先头部队的这段时间里，这个姑娘可能遭遇的一切和她的感受。将军脸上现出了一种不仅是怜惜，而且是阴郁的关切的表情，他突然加快了脚步。

“祝你们成功！”

他做一个手势叫吉普车停下，迈着对他这个胖子说来是非常出人意料的轻快的步伐，很快地走到吉普车跟前。

在将军跟自动枪手们待在一起的时候，卡尤特金的举动以及他向将军提出的问题都非常严肃。显然，他认为在将军面前无须施展出使他在战士们中间博得注意和喜爱的那些特点。

但是吉普车刚从眼前消失，卡尤特金全身就又充满了原先那股谈笑风生的精力。

一个身材魁伟、大手像锅底那样乌黑的步兵战士，提着一个沉甸甸的油污的布包，喘吁吁地从队伍的后排挤出来。

“同志们！矿井的汽车是在这儿走吗？”他问。

“喏，它在那边，不过是停着！”卡尤特金指着那辆坐满小孩子的卡车，开玩笑说。

队伍果然由于前面堵塞而停了下来。

“对不起，同志们，”那个战士走到瓦尔柯和谢夫卓夫面前，说。谢夫卓夫小心地把浅黄头发的小姑娘放了下来。“我要把几件工具交给你们。你们是技术人员，会用得着，可是我带着它行军，反而成了累赘。”说着他就动手在他们面前打开那个油污的布包。

瓦尔柯和谢夫卓夫弯下腰来看他手里的东西。

“你们看见吗？”战士郑重地说，他把布包在大手上摊开，让他们看一副崭新的钳工用具。

“我不明白——你是要卖还是怎么？”瓦尔柯问，抬起浓眉下面茨冈式的眼睛不友好地望着他。

战士的砖红色的脸涨得发紫，满脸冒出汗珠。

“你怎能这样说！”他说。“这是我在草原上捡来的。我走过的时候，看见它用布包着，大概是什么人失落的。”

“也许是故意扔掉的，为了跑起来轻便些！”瓦尔柯冷笑了一声。

“一个手艺人不会把工具扔掉。是失落的。”战士只对着谢夫卓夫冷冷地说。

“多谢，多谢，朋友……”谢夫卓夫说着，一面连忙帮助战士包起工具。

“好啦，总算让它有了个着落，不然怪可惜的，挺好的工具。你们有汽车，我是带着全副装备行军，叫我往哪儿放！”战士有些高兴起来，说。“祝您幸运！”他只跟谢夫卓夫握了握手，就跑了回去，很快地混在队伍里面。

瓦尔柯对他的背影默默地望了一会，脸上露出刚毅的赞许的表情。

“真是好样的……是的……”瓦尔柯沙声说。

谢夫卓夫一手拿着这包工具，一手抚摩着那个长着淡黄头发的小女孩的头，这时他明白了，他的井长不信任那个战士，并非因为不够热情。他——这个有几千人干活、每天要出产几千吨煤的企业的领导人，大概见惯了有时有人要欺骗他。这个企业现在已经被他这个当井长的亲手炸毁；里面的人一部分被遣送出去，一部分留下的是凶多吉少。于是谢夫卓夫初次想到，此刻井长心里该有多么沉痛啊。

到傍晚，开始听见前面有炮声。夜里炮声愈来愈近，连一排排的机枪声都听得清。在卡缅斯克地区那边，整夜可以看见闪光，有时火光亮得竟照亮了整个队伍。大火的红光时而在那边，时而在这边把天空染成葡萄酒色，把浓重的紫红光辉倾泻在黑暗草原里的坟墓顶上。

“是阵亡将士公墓，”维克多的父亲说，他默默坐在马车上，自制烟卷的火星有时照亮他的多肉的脸。“这不是古墓，是我们的公墓。”他喑哑地说，“我们曾经跟着巴尔霍明科①和伏罗希洛夫在这里突过围，埋葬过自己人……”

①巴尔霍明科（1885—1921），苏联国内战争时期的红军将领，曾参加顿河地区粉碎反革命军队的战斗和察里津保卫战，后来在与马赫诺匪帮作战时牺牲。

阿纳托里、维克多、奥列格和邬丽亚都默默望了望那些浴着火光的坟墓。

“是啊，关于上一次的战争，我们在学校里不知写过多少文章。我们梦想，我们羡慕我们的父辈，现在战争临到我们头上来了，仿佛故意来考验考验我们是哪一种人似的，可是我们却在避开……”奥列格说着，深深地叹了口气。

夜间，队伍的移动发生了变化。现在各机关和民用的汽车和大车以及逃难的人群全都停了下来，——据说前面在过军队。最后轮到自动枪手们出发了，他们在黑暗中忙碌起来，弄得武器发出轻轻的响声，整个部队也开始蠕动。汽车紧挤在一起给他们让路，马达轧轧地响着。手卷纸烟的火星在黑暗中闪闪烁烁，好像是天上的小星星。

有人碰了碰邬丽亚的臂肘。她转过身来。是卡尤特金站在大车那面，背对着维克多的父亲坐的地方和青年们站的地方。

“过来一会儿。”他说话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出。

他的声音里有一种力量使她下了车走到他跟前。他们朝旁边走了几步。

“对不住，我来打搅您。”卡尤特金轻声说，“你们去不得卡缅斯克，它眼看就要被德国人占领；顿涅茨河那一边，德国人也进来得很深。我对您说的话，您可别告诉别我，我没有权利说出来，但是你们是自己人，要是让你们平白无故地牺牲，我觉得于心不忍。你们得改变方向朝南面一点去，就这样，也但愿上帝保佑你们能赶得及。”

卡尤特金跟邬丽亚说话的时候连大气都不敢出，好像他手心里捧着一个火星，生怕把它吹熄。在黑暗中看不清他的脸，但它是严肃而温和的，眼睛里也不含有倦意，在黑暗中发着光。

他跟邬丽亚说话的态度，比他说的话更使邬丽亚感动。她一声不响地望着他。

“你叫什么名字？”卡尤特金轻声问。

“邬丽亚娜·葛洛莫娃。”

“你有没有自己的照片？”

“没有。”

“没有……”他伤心地重复了一句。

邬丽亚心里突然感到惋惜，同时又起了一种淘气的念头，于是她弯下身子，紧凑着他的脸。

“我没有照片，”她轻声说，“但是，如果你认真地、好好地望望我，”她沉默了一会，乌溜溜的眼睛直盯着他望了半晌，“你就不会忘掉我了……”

他木然不动，只有他的大眼睛有一会儿在黑暗中射出悲哀的光芒。

“是的，我不会忘掉你。因为你是不能被忘掉的。”他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出，“再见了……”

说着，他就踏着沉重的军靴，走进了连队。连队在黑暗中愈走愈远，

他们的烟卷的火星好像是一条没有尽头的银河。

邬丽亚还在考虑，要不要把他对她说的话告诉什么人。但是显然，这件事不止他知道，而且已经传遍了整个队伍。

她走到大车跟前的时候，好多汽车和大车已经到了草原上，向着东南方行进。逃难的人们也连续不断向着同一方向走去。

“只好去李哈雅了。”响起了瓦尔柯的沙哑的声音。

维克多的父亲向他问了一句什么。

“何必要分开，命运既然已经把我们联在一起，我们就一块走吧。”瓦尔柯说。

黎明时分，他们已经到了没有道路的草原上。

在空旷的草原上，晨曦是无比的美丽。晴朗的天空高悬在这儿几乎是完整无恙的无垠的麦田上。谷底翠绿的再生草被露水镀成了银色；太阳直对着人升起，一滴滴露珠里反映出顺着峡谷移动的柔和的、彩虹般的日光。但是在晨曦中，孩子们的疲惫不堪的、没有睡醒的、瘦削的脸和大人的阴沉疲倦、惊惶不安的脸却显得格外悲伤。

邬丽亚看见了保育院的主任。她那双直接套在袜子上的长统胶鞋上满是尘土。她脸色发黑。她一路上都是步行，昨天夜里才坐上一辆大车。顿涅茨的太阳好像把她晒干并且晒焦了。显然这一夜她也没有睡，一直默不作声，机械地做着一切，她的锐利的若有所思的眼睛里露出不是这个阳世所有的、而是阴间的表情。

一清早，空中就有发动机不住地嗡嗡响着。看不见飞机，但是左前方一直发出震撼空气的隆隆的轰炸声，有时在空中老远的地方还有机枪的嗒嗒声。

在顿涅茨河和卡缅斯克上空那边，展开了在这里只能听见、但是看不见的空战。只有一次他们看见前面有一架德国俯冲轰炸机投弹完毕低低飞去。

奥列格突然跳下轻便马车，等待农村大车走过来。

“只要想一想，不，只要想一想，”他抓着车沿在大车旁边走着，潮润的大眼睛望着同伴们，说，“如果德国人已经过了顿涅茨河，方才和我们一块的那个部队要在卡缅斯克阻挡他们的话，那么那个部队是走不掉了，那些自动枪手，那个给大家逗笑的妙极了的小伙子，还有那个将军，他们统统都走不掉了！这他们当然是知道的，他们在动身的时候就知道！”

奥列格激动地说。

邬丽亚想到卡尤特金是在死神面前和她告别，就突然感到心里好像被尖刀戳穿似的；她回忆起自己对他说的话，不禁羞得满脸通红。但是纯洁的内心的声音对她说，她并没有说过什么话会使卡尤特金临死时回忆起来感到痛苦。

第七章

逃难的人们还是不断地通过克拉斯诺顿。城市上空一直滞留着乌云般

的尘埃。人们的衣服上、花草上、以及牛蒡和南瓜的叶子上，都盖着一层肮脏的黑褐色的尘土。

在公园后面的铁路支线上，列车轰隆轰隆地来回行驶，从一个个矿井里收集还可以运走的设备。可以听到机车的呼哧声、汽笛声和扳道员的喇叭声。从过道口那边传来激动的人声、无数的脚踏着尘土的沙沙声、汽车的呜呜声和炮架的轮子经过垫板时的隆隆声——这是军队在继续撤退。从小丘背后这个或那个方向，不时传来远处轰轰的排炮声，仿佛在这些小丘后面的无垠的大草原上，有人在滚动着一只其大无比、高及天际的空桶。

在克拉斯诺顿煤业联合公司的两层砖砌建筑物外面，在通到公园大门为止的宽阔的大街上，还停着一辆卡车。一群男男女女从敞着的大门里把公司剩下的最后一批财产搬出来，装上卡车。

大伙在干活的时候镇静、迅速、肃静无声。他们的忧心忡忡的脸上和因为拖重东西而肿胀的手上，都是汗水和污垢。略靠旁边一点，就在公司的窗下，有一对青年男女站在那里全神贯注地谈话，显然，不管是这辆卡车，是这些满身汗水的肮脏的人，还是周围发生的一切，对他们说来都不会而且不可能比他们谈话的题材更为重要。

姑娘穿着粉红上衣，光脚穿着黄皮鞋。她生得高大、丰满，浅黄色头发。深色的、发出暗淡光辉的、杏仁般的眼睛略微有点斜视。由于她有点斜视，她抬起秀丽的头望着青年的时候，像缎子般光滑的、雪白丰满的脖子就微歪着。

青年生得个子瘦长，四肢不匀称，背有点儿驼。洗旧了的斜领蓝衬衫的袖子，对他的长胳膊已经嫌短；腰里束着一根窄皮带；棕色条纹的灰色裤子也略微嫌短；光脚穿着便鞋。长长的深色的直头发不肯听话，在他说话的时候总要垂到他的额上和耳朵上，他得常常把头猛地一甩，把头发甩到后面去。他的苍白的脸属于几乎晒不黑的类型。而且他还非常怕羞。但是他面部的表情里却含有无限的天生的幽默，同时还蕴藏着似乎马上就要发出闪光的灵感，这激动着那个姑娘，使她目不转睛地望着他的脸。

他们根本不在乎是不是有人在听他们或是注意他们。但是的确有人在注意他们。

在大街斜对过的一所标准式房屋的大门附近，停着一辆老式的、车轮很高的黑色小汽车。汽车已经磨损得很厉害，有的地方变成红色，有的地方被磨擦得发出白铁的闪光，它好像是福音书里的骆驼，因为要穿过针眼而擦破了两肋。这是苏联汽车制造工业的第一批产品，俗称“迦济克”①，现在到处都已经被淘汰了。

是的，这是“迦济克”——这种汽车曾经在顿河和哈萨克斯坦的草原上，在北方的冻土带驰骋过几千几万公里；它们几乎是沿着羊肠小径攀登高加索和帕米尔的丛山，它们深入到阿尔泰山和锡霍特—阿林山脉的原始森林；它们为第聂伯河水坝、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以及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厂的建设工程出过力；它们载送朱赫诺夫斯基和他的同伴们到北方机场去营救诺皮列的探险队②；它们穿过暴风雪和冰群，沿着阿穆尔河的冰道开去支援共青城的第一批建设者。总之，这种“迦济克”曾鼓足力量，竭尽全力地背负起协助完成整个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任，它们尽了力，变得陈旧了，就让位给更为完善的汽车，也就是它们尽力帮助建成的那些工厂的产品。

①“迦济克”是“迦兹”的爱称。“迦兹”是“高尔基汽车厂”的缩写，这

里是指汽车牌子。

②诺皮列（1885 年生），意大利飞艇设计师和极地探险家，一九二八年乘“意大利”号飞艇赴北极探险失事。苏联破冰船“克拉辛”号参加了营救该艇上全体人员的工作。

停在标准式房屋外面的那辆“迦济克”是一辆轿车。车内后座脚下放着一只沉重的长木箱；在座位和木箱的横头，摞着两只手提箱；箱子上面放着两只塞得满满的背囊，一直顶到车篷；靠着背囊放着两支装了弹盘的什帕金式冲锋枪，旁边还放着一叠弹盘。在剩下的空座位上，坐着一个面貌端正、浅黄头发、皮肤被晒黑的妇人。她穿的那件质地结实的旅行衣，因为长期日晒雨淋而说不出是什么颜色。她的腿已经没有地方好放，只好交叠着，勉强塞在木箱和车门中间。

这个妇人老是不安地从车门上早已没有玻璃的通风窗里朝外望，一会儿望望标准式房屋的台阶，一会儿望望在公司外面装车的卡车那边。她显然是在等人，而且已经等了好久，她因为那些装车的人会看到这辆孤零零的轿车和车子里面她这个妇人而感到不快。不安的神情像阴影似的在她的线条端正的脸上掠过，后来她又仰靠在座位上，从车门的窗洞里沉思地注视着在公司窗下交谈的那对青年男女。她脸上的线条渐渐变得柔和了，在她的灰眼睛里和她的坚毅的、棱角分明的嘴唇上，不觉都露出了一丝善良而感伤的笑意。

这妇人大约三十来岁；她不知道，当她望着那对青年男女时在她脸上流露出来的这种善意的惋惜和惆怅，只是表示她已经三十岁了，她不能再像他们那样了。

那对青年男女不顾四周和整个世界所发生的一切，正在互相倾吐爱慕。他们不能不这样做，因为他们就要分离了。但是他们倾吐爱慕的方式是少年时代独有的，那就是说，他们什么话都谈，唯独不谈爱情。

“万尼亚①，你来了，我真高兴，我心里好像一块石头落了地。”她微歪着头，闪烁的、时时放出光辉的眼睛望着他，说。在他眼里，世上再也没有比这微歪的头更可爱的东西了。

“我还以为我们要走了，我就此看不到你了……”

①万尼亚是伊万的小名。

“你可明白，这几天我为什么不来吗？”他用微哑的低音问道，一双近视眼从头到脚地打量着她。这双眼睛里蕴藏着的灵感，好像灰烬底下的煤火似的，马上就要发出闪光。

“不，我知道，你一切都会了解……三天前我就该走了。我已经什么都准备好了，还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要来向你告别，可是共青团区委会突然把我找去。他们刚刚接到这个撤退的命令，一切就弄得乱七八糟了。我那个专修班撤退了，我却留了下来，使我很伤脑筋。同学们都来找我帮忙，我自己也知道应该帮忙……今天奥列格叫我搭他们的马车去卡缅斯克，——

我们是好朋友，这你是知道的——但是我觉得不好意思走……”

“你可知道，我心里仿佛一块石头落了地。”她说，她的发出暗淡光辉的眼睛一直望着他。

“老实说，我心里也很高兴：我想，我还可以看到她好多好多次。可是哪有这样的好事！”他低声说，他的目光恋恋不舍地盯着她的眼睛，他完全被她的略带红晕的脸、丰腴的脖子、以及在粉红上衣底下可以感觉得到的整个丰满的身体所发出的那股热烈温存的暖意俘虏了。“你能想象得出吗？伏

罗希洛夫学校、高尔基学校、列宁俱乐部、儿童医院——全都要我负责！幸亏我有一个好帮手：若拉·阿鲁秋仰茨。你记得吗？是我们学校里的。真是个好样的小伙子！他自告奋勇来帮忙。我们已经不记得我们什么时候睡过觉。白天黑夜两条腿不得闲：找大车啦，找汽车啦，装东西啦，找饲料啦，这儿不知道哪个车胎爆了，那儿的马车又得送到打铁房去修理。简直搞得你晕头转向！……但是，我当然知道你没有走。我是听我父亲说的。”他带着羞怯的微笑说，“昨天夜里我走过你们的家，我的心都要停了！我想，去敲下门怎么样？”他笑了起来，“后来我记起了你的父亲。不行，我心里想，万尼亚，忍耐一下吧……”

“你可知道，我心里简直像一块石头……”她又要说了。

但是他说得正在兴头上，没有让她说下去：

“说实话，今天我已经决定什么都不管了。我想，她要走了！我要看不到她了！你知道又出了什么事吗？原来有一个保育院——就是去年为收容孤儿在‘八家宅’组织起来的那一个——还没有撤退。保育院主任就住在我们隔壁，她直接来找我，差点要哭了：‘捷姆奴霍夫同志，帮帮忙吧。哪怕能通过团委弄到交通工具也好。’我说：‘团委已经走了，你去找人民教育处吧。’她说：‘我这几天一直和他们保持着联系，他们答应马上可以把我们送走，可是今天早上我跑去一看，他们自己都没有交通工具。我再这么四面一跑，连人民教育处也不见了……’我说：‘没有交通工具，它能到哪儿去呢？’她说：‘我不知道，不知怎么就没影儿了……’人民教育处没影儿了！”万尼亚突然非常高兴地大笑起来，他的不听话的长长的直头发都落到了额上和耳朵上，但是他立刻猛地把头一甩，把头发甩回去。“这些人真妙！”他笑着说。“嗨，我心里想：万尼亚，你的事情不妙！你要像看不到自己的耳朵那样看不到克拉娃①了。你能想象吗？我和若拉着手去办这件事，居然弄到了五辆大车！你知道是从哪里弄来的？从军人那里。主任和我们告别的时候，眼泪几乎把我们全身都弄湿了。你以为这就完了吗？我对若拉说：‘你快回去把东西收拾收拾，我也去收拾一下。’后来我暗示他，我还要到一个地方去一下，我说，你等一会儿来找我，要是我不在，你就等我一下，总之，我向他暗示了这个意思……我刚整理好东西，你知道是谁冲进来了？是托里亚·奥尔洛夫，你认识他吗？他还有个外号叫“雷响’……”

①克拉娃是克拉芙其雅的小名。

“我心里简直像一块石头落了地。”克拉娃终于打断他的滔滔不绝的话头，拚命压低声音说，她的眼睛里放出热烈的光辉，“我真担心你不会来了。要知道，我又不能去找你。”她用非常柔和的低音说。

“那是为什么呢？”他问，突然对这种想法感到惊奇。

“啊，你怎么不明白？”她忸怩起来，“叫我对父亲怎么说呢？”

在这次谈话中，恐怕她至多也只能说到这里：最后要让他懂得，他们的关系不是普普通通的关系，这里面存在着秘密。她无论如何应该向他提醒这一点，如果他自己不愿意谈的话。

他沉默起来，朝她看了一眼。这一看，使她的整个大脸、她的丰腴的白脖颈直到粉红上衣领口露出的胸口，突然都变得跟这件上衣一样颜色了。

“不，你不要以为他不喜欢你。”她闪动着杏仁似的、略微斜视的眼睛，急急地说，“他不知说过多少次：‘这个捷姆奴霍夫很聪明……’你知道，”这时她的声音又变成柔和的、迷人的低音，“你要是愿意，你可以跟我们一

起走。”

这种突然产生的可以跟心爱的姑娘一同撤退的可能，是他的头脑里不曾想过的。这种可能的诱惑力非常大，使他不禁茫然失措了，他望了望她，尴尬地笑了一笑。忽然他的脸变得严肃起来，他心不在焉地顺着街道望过去。他背对公园站着，这条通向南方的长街，被迎面射来的炎热的阳光照射着，整个都展现在他面前。在远处通第二过道口的斜坡那里，街道仿佛到了尽头；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显现出草原上一些蓝色的丘陵，丘陵后面不断腾起远方大火的烟雾。但是这一切他都看不见，因为他的眼睛近视得厉害。他只听到隆隆的炮声、公园后面机车的鸣笛声以及从小就熟悉的扳道员的号声，在草原的天空下，这种声音听起来是非常的清脆明晰，充满和平的意味。

“我的东西都没有带，克拉娃，”他发愁地、慌乱地说，一面摊开双手，好像要让人家看看他的披散着深亚麻色长发的、光着的头，看他的这件洗旧了的、袖子嫌短的充缎衬衫，这条穿旧了的、嫌短的棕色条纹裤子和光脚上穿的便鞋。“我连眼镜都没有拿，连你都看不清楚。”他闷闷地开玩笑说。

“我们去问问爸爸，再乘车子去拿你的东西。”她热情地低声说。她歪着头望着他，甚至动了一下要去握他的手，但是没有敢握。

正巧在这时候，克拉娃的父亲戴着便帽，穿着灰色旧上装和皮靴，提着两只箱子，满脸大汗地从卡车后面走出来。他打量着有什么地方可以放他的箱子，可是卡车已经装得满满的。

“来，柯瓦辽夫同志，我来放。”站在卡车上的包裹和箱子中间的一个工作人员说，接着，他屈下一膝，一只手撑着车沿，把箱子一只一只地接了过去。

这时候，万尼亚的父亲也是绕过卡车，走了过来。他的晒黑的、青筋暴露的、瘦削的双手捧着一包好像是从洗衣房取出来的东西，里面大概是床单。他捧着这包东西非常吃力：他伸直胳膊捧着这包东西，艰难地拖着发软的长腿，脚底在地面上擦着。他的拉长的、满是皱纹的脸上全是汗珠，甚至晒黑的皮肤都变得苍白起来。在这张瘦削疲惫的脸上，那双严厉得令人痛苦的、发出不健康光辉的、颜色很淡的眼睛，显得特别惹人注意。

万尼亚的父亲，亚力山大·费奥多罗维奇·捷姆奴霍夫，在公司里当看门人；而克拉娃的父亲柯瓦辽夫，管理处的总务主任，正是他的顶头上司。

柯瓦辽夫像大多数总务主任一样，在平时，他们心平气和地承受着人们的愤懑、嘲笑和蔑视的重担，只是由于他们个别不诚实的同行损害了别人，人家就把怨气发泄到全体总务主任的头上。像柯瓦辽夫这样的总务主任，到了困难时刻就显示出，世上真正的总务主任是什么样的。

最近几天里，自从他接到经理的命令要运走公司的财产那一刻起，他就不顾同事们的恳求和埋怨，不顾一部分上级的阿谀的友好表示（这些上级在平时对他并不见得比对前厅里荷兰式火炉旁边的扫帚更为注意），不顾这一切，他仍旧像平时一样沉着、稳妥、迅速地把哪怕有一点点价值的东西都包装起来，装车运走。今天凌晨，他接到公司负责疏散工作的特派员的命令，要他刻不容缓地毁掉不能运走的文件，并且赶紧向东方撤退。

但是，接到这个命令之后，柯瓦辽夫依然沉着而迅速地先把特派员本人和他的财物送走，然后，不知从什么地方，也不知通过什么方法弄来了各种各样的运输工具，继续把公司里剩下来的财产运走，因为他的良心不许他不这样做。他最害怕的是，即使在这个悲痛的日子，人家也会像平时那样责

难他，说他首先为自己打算，因此他毅然决定带家属乘最后一辆车子离开。他总算为自己保留了一辆撤退时用的车子。

可是公司看门的捷姆奴霍夫老头，却因为年老多病，根本不准备走，而且也走不了。几天前，他像所有不能离去的职员一样，拿到了附有两星期退职金的解雇书。这表示他和公司的一切关系都结束了。但是这几天来，他还是白天黑夜地拖着因为风湿而残废的腿，帮助柯瓦辽夫把公司的财产打包、装车、运送出去，因为老头一向是把公司的财产看得跟自己的财产一样。

捷姆奴霍夫老头是顿涅茨的老矿工，一个手艺非常高明的木匠。当他还是一个年轻小伙子的时候，他从唐波夫省移民过来，就开始在矿井里挣钱谋生。在顿涅茨土地的地下，在最危险的岩石的堆方和滑块上，他挥舞着神奇的小斧头，支护着巷道，斧头到了他手里就像金鸡一样啄食着，飞舞着，歌唱着。捷姆奴霍夫老头从年轻时就一直在潮湿的地方干活，得了很严重的风湿病，退休之后到煤业联合公司当看门人，他做看门人也就像他以前做木匠一样卖力。

“克拉娃，快些准备吧，去帮母亲的忙！”柯瓦辽夫吼叫了一声，用结实的脏手背挥去破帽舌下面的额上的汗。“啊，是万尼亚！”他看见万尼亚，随便地说，“你看，变成什么样子啦？”他愤愤地摇了摇头，但是马上抢过老捷姆奴霍夫手里捧着的包裹，帮他举起来放到车上。“真想不到，竟然活到这种地步！”他喘着气接下去说，“唉，这些该死的东西！”这时响起一阵特别震耳的隆隆声，好像是有一只巨大的木桶发疯似地在地平线上滚过去似的，气得他的脸都歪扭了。“你怎么样，不走吗？你的儿子走吗，亚力山大·费奥多罗维奇？”

老捷姆奴霍夫没有回答，也不瞅儿子一眼，又去拿包裹：他既替儿子担心，又对儿子不满，因为儿子在几天前不肯到萨拉托夫去追赶他今年夏天念过书的伏罗希洛夫格勒法律专修班。

克拉娃听到父亲的话，暗暗向万尼亚丢了个眼色，甚至触了触他的衣袖，自己已经要开口对父亲说什么。但是万尼亚抢了先。

“不，”他说，“我此刻不能走。我还要替沃洛佳①·奥西摩兴弄一辆大车，他因为阑尾炎动了手术，现在正躺着呐。”

克拉娃的父亲吹了一声口哨。

①沃洛佳是符拉基米尔的小名。

“你会弄到的！”他嘲笑而又沉痛地说。

“而且，我不止一个人，”万尼亚说，他避开克拉娃的视线，嘴唇突然发白，“我有个同学若拉·阿鲁秋仰茨，跟我一起奔走。我们约好要等一切事情办完了，才一块儿步行撤退。”

万尼亚说得丝毫不留转弯的余地，他望了望克拉娃，只见她的深色的眼睛蒙上了一层阴霾。

“原来如此！”柯瓦辽夫说，他根本没有把万尼亚、若拉以及他们的约言放在心上，“那么，暂时告别了。”他朝万尼亚迈了一步，伸出汗湿的大手跟他握手，这时一阵排炮的响声把他震得哆嗦了一下。

“你们是去卡缅斯克还是去李哈雅？”万尼亚声音很低地问。

“去卡缅斯克？！德国人马上就要占领卡缅斯克了！”柯瓦辽夫吼叫起来。“我们去李哈雅，只有李哈雅可以去！我们先去别洛卡里特文斯卡雅，过顿涅茨河。你们赶上来找我们吧……”

他们上面有什么东西卡嚓一响，又当的一声，接着就有一阵尘土落了

下来。

他们抬起头来，看见二楼公司计划处办公室的窗子打开了，窗口伸出一个有点秃顶的、红红的胖脑袋，脸上和脖颈上的汗简直像小溪一般流着，仿佛汗珠马上就要滴到下面的人身上。

“您难道还没有走，斯塔庆柯同志？”柯瓦辽夫认出这是计划处主任的脑袋，觉得很奇怪。

“没有，我在这里整理文件，免得有什么重要的东西落到德国人手里。”斯塔庆柯的低沉的嗓音像平时一样轻轻地、客气地说。

“真是巧极了，总算您运气好！”柯瓦辽夫高呼道，“再过十来分钟我们就要走了！”

“你们走吧，我总有办法离开的，”斯塔庆柯客气地说，“告诉我，柯瓦辽夫，你知不知道，那边停的是什么人的汽车？”

柯瓦辽夫、他的女儿、万尼亚和卡车上的那个工作人员，都转过头去朝“迦济克”那边望了一下。

“迦济克”里面的妇人立刻改变姿势，把身子向前移动一下，使人们从车门的窗上看不到她。

“他不会带你去的，斯塔庆柯同志，他自己的事就够多的了！”柯瓦辽夫高声说。

他跟斯塔庆柯一样，知道州党委干部伊凡·费奥多罗维奇·普罗庆柯去年秋天就在这所房子里租了一间屋子，单身住在里面：他的妻子在伏罗希洛夫格勒工作。

“我又不想沾他的光。”斯塔庆柯说，他那老酒鬼的通红的小眼睛望了望柯瓦辽夫。

柯瓦辽夫突然发窘了，连忙偷眼望了望卡车上的那个工作人员，不知他懂不懂得斯塔庆柯的话里带刺。

“我太天真，以为他们早就溜了，可是忽然看见一辆汽车，心里就想，这不知是谁的车子？”斯塔庆柯笑眯眯地解释说。

他们还对那辆“迦济克”望了一会。

“结果呢，他们还没有全走掉。”柯瓦辽夫沉着脸说。

“唉，柯瓦辽夫，柯瓦辽夫！”斯塔庆柯声调悲伤地说。

“做一个比罗马教皇更虔诚的信徒是没有好处的。”他把柯瓦辽夫根本不知道的一句谚语说错了①。

①原来的谚语是：总不能做一个比罗马教皇更虔诚的天主教徒。斯塔庆柯是暗示柯瓦辽夫不必为苏维埃政权过分尽力。

“斯塔庆柯同志，我是个普通干部，”柯瓦辽夫嗄声说，他挺直身子，眼睛不是望着上面的窗口，而是望着卡车上的那个工作人员。“我是个普通干部，不懂您的暗示……”

“你干吗生我的气？我又没有说什么得罪你的话……一路平安，柯瓦辽夫！在到萨拉托夫之前，我们恐怕不会见面了。”

斯塔庆柯说，上面的窗子砰的一声关上了。

柯瓦辽夫抬起若有所思的眼睛，和带着几分困惑不解的神情的万尼亚互相对视了一眼。

柯瓦辽夫的脸突然涨成深紫色，好像有人得罪了他似的。

“克拉娃，去准备吧！”他高喊一声，就绕过卡车走进公司去了。

柯瓦辽夫是真的生气了，不过并不是为他自己生气。他气的是，一个不是像他柯瓦辽夫这样的普通干部（这种人因为不了解情况而抱怨、诉苦，还情有可原），而是像斯塔庆柯那样接近当局的人，和政府的代表们过往密切，在太平盛世对他们阿谀奉承，花言巧语，现在到了这些代表们不能为自己辩护的时候，这个人却来责难他们。

“迦济克”里的妇人因为自己引起人们的注意，感到十分焦急不安，她的脸涨得通红，气愤地望着标准式房屋的门。

第八章

普罗庆柯和另外两个人坐在一间通后院的房间里。他们打开窗子，让过堂风把烧文件的烟吹出去。房东一家几天前就离开了。这个房间跟整座房子一样，空寂、凄凉，叫人待不下去：活人离开了房子，只留下一个空壳。东西都挪动了。普罗庆柯跟那两个人不是坐在桌旁，而是坐在房间当中的椅子上谈话。他们在商量当前工作的初步计划，交换秘密接头的地址。

普罗庆柯马上就应当离开，前往游击队根据地；他的助手在几小时前已经出发到那边去了。作为州的地下工作领导人之一，普罗庆柯应该待在以米佳金镇附近的森林为基地的游击队里，米佳金镇是伏罗希洛夫格勒州和罗斯托夫州交界的一个哥萨克村庄。他的两个同伴却要留在这儿克拉斯诺顿。他们俩都是真正的顿涅茨矿工，在上一次德军占领时期和邓尼金①白匪统治时期参加过国内战争。

①邓尼金，沙皇将军，一九一九年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者在南俄和乌克兰建立的地主资产阶级反革命政权的头目。

留下担任地下区委书记的费里普·彼得罗维奇·刘季柯夫，比他的同伴年纪略大一些，已经五十开外。他的浓密的头发已经花白，特别是两鬓和前面。他的修得短短的刚硬的口髭也斑白了。可以感觉得到，他当年一定是个身强力壮的人，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加，他身上和脸上都变得虚胖起来，两腮胖得朝下坠，这样一来，本来就有些笨重的下巴就显得格外笨重了。刘季柯夫一向爱整洁，即使在目前这种情况也是穿着一套对他肥大的身躯很合身的整洁的黑衣服和干净的翻领白衬衫，紧紧地打着领带。

他是一个老工匠，在经济恢复时期的最初几年就成了劳动英雄，他是作为生产人员被提拔起来的：起初在很小的企业里做负责人，渐渐地就到了愈来愈大的企业里。他在克拉斯诺顿已经工作了十五六年，最近几年担任克拉斯诺顿煤业联合公司中央工厂的机械车间主任。

他的地下工作的同伴马特维·舒尔迦，是第一批响应号召去支援农村的产业工人之一。

舒尔迦的父名是柯斯季耶维奇，大家也多半这样叫他，柯斯季耶维奇就是乌克兰语的康斯坦丁诺维奇。他是克拉斯诺顿人，后来一直在顿巴斯各区担任和农业有关的职务。战争爆发时，他在伏罗希洛夫格勒州北部的一个农业区里担任区执委会副主席。

在克拉斯诺顿第一次受到被占领的威胁时，刘季柯夫就知道他将要留下来做地下工作；舒尔迦跟他就不一样，他是在两天前才根据他个人的请求

而接到委派的，因为他工作的那个区已经被德军占领了。大家认为让舒尔迦留在克拉斯诺顿做地下工作的确有着方便有利的条件：一方面，他是本地人；另一方面，这里已经不大有人认识他了。

舒尔迦，或是柯斯季耶维奇，大约四十五岁光景，生得膀粗腰圆，浓眉大眼，结实的脸膛晒得很黑。脸上的毛孔里带着稀疏的黑斑，——这是职业的痕迹，久做矿工和铸工的人，脸上永远留着这种黑斑。柯斯季耶维奇此刻把便帽推在后脑上，露出他的剪成平顶的头，他的粗大的头顶骨的结实程度是罕见的。他的眼睛也大得像牛眼一样。

在整个克拉斯诺顿，没有一个人的心情像他们三个人那样镇定，同时又那样慷慨激昂。

“留下来听你指挥的都是些很好的人，简直可以说是真正的人，跟这些人在一起可以轰轰烈烈地干一番大事。”普罗庆柯说，“你自己打算住在什么人家里？”

“就在我原来住的地方，在彼拉盖雅·伊里尼奇娜家里。”

刘季柯夫说。

普罗庆柯的脸上露出的不是惊奇，而仿佛有几分怀疑。

“我有点不明白你的意思。”他说。

“我干吗要躲起来，伊凡·费奥多罗维奇？您自己想想看，”刘季柯夫说，“我这个人在这个城里是大家都知道的，我根本没法躲藏。巴腊柯夫也是这样。”他提到的是地下区委的第三位领导人的名字，那人不在这里，“德国人一下子就会发现我们；如果我们躲起来，越发会引起他们的疑心。我们用不着躲。德国人迫切需要我们的工厂，我们呢，就送上门去！我们说：‘厂长跑了，工程技术人员被布尔什维克强迫带走了，可是我们在这里，我们是留下来给你们德国人工作的。工人们跑散了，我们可以把他们召集起来。没有工程师吗？就给你巴腊柯夫，一位机械工程师！他还会讲德国话……我们就给他们干点活。”刘季柯夫说的时候脸上毫无笑意。

他注视着普罗庆柯，他的目光是严峻而专注的，含着对一切都不肯轻信、而要通过独立思考来检验的人们所特有的那种智慧的表情。

“那么巴腊柯夫的意见怎么样？”普罗庆柯问。

“这是我们的共同计划。”

“你可知道，你们俩首先会碰到的是什么样的危险？”普罗庆柯问。他有本领从各方面来看问题，看到这件事在现实生活中的发展。

“我知道：我们是共产党员。”刘季柯夫回答说。

“问题倒不在这里。共产党员去给德国人做事，是他们德国人求之不得的事！但是他们也许等不及明白对他们的好处：你们还没有把来意说明白，他们一发火已经把你们……”普罗庆柯指指天花板①。 ①意思是把他们绞死。

“我们头几天不露面。等需要我们的时候再出来。”

“对！问题就在这里。我倒想知道，你躲到哪里去？”

“彼拉盖雅·伊里尼奇娜会有地方把我藏起来……”刘季柯夫在全部谈话时间里第一次露出笑容，这一笑使他的朝下坠的沉重的脸变得非常开朗。

普罗庆柯脸上疑虑的神情消失了，他对刘季柯夫感到满意了。

“那么舒尔迦呢？”他望了望舒尔迦，问道。

“他不是舒尔迦，他是奥斯塔普楚克·叶夫多金，”刘季柯夫说，“在他

的机车制造厂的劳动手册上是这么写的。几天前，他到我们的机械车间来做钳工。事情很明白：他原来在伏罗希洛夫格勒工作，是个单身汉，战事发生之后，他来到了克拉斯诺顿。等将来工厂要开工的时候，我们把钳工奥斯塔普楚克也叫来给德国人干活。我们来给他们干。”刘季柯夫说。

普罗庆柯转过身来向着舒尔迦，不自觉地不讲他刚才对刘季柯夫讲的俄语，而开始讲起一种俄语和乌克兰语相夹杂的话来。舒尔迦，讲的也是这种话。

“告诉我，柯斯季耶维奇：在给你做隐蔽用的住所里面，至少有一个人是你本人认识的吧？换句话，这些人你自己对他们都了解吗？他们的家庭怎么样？他们接近的是些什么人？”

“要说我是不是了解他们，那我对他们是不太了解的，”舒尔迦抬起神情镇定的牛眼似的大眼望着普罗庆柯，慢慢地说，“一个地址在我们按照旧习惯管它叫‘鸽房’的地方，那是康德拉多维奇，或者叫伊凡·格纳简柯的。他在一九一八年是个好样的游击队员。第二个地址在‘上海’，是福明·伊格纳特的。我自己并不认识他，因为他是新近到克拉斯诺顿来的，可您大概也听说过，他是我们四号井的一个斯达哈诺夫①工作者，据说是自己人，他同意这样做。方便的是他不是党员，虽然很出名，不过据说他没有担任过任何社会工作，没有在集会上讲过话，是一个不引人注意的人……”

①斯达哈诺夫是三十年代苏联煤矿工业技术革新者。

“你到他们家里去过吗？”普罗庆柯追问道。

“康德拉多维奇，也就是伊凡·格纳简柯家里，我最后一次是十二年前去的。可是福明家里我却从来没有去过。我哪里有工夫去呢，伊凡·费奥多罗维奇？您自己也知道，我是昨天才到的，而且是昨天才批准我留下来，给了我这几个地址的。我想，挑选他们的人对他们总该熟悉吧？”舒尔迦又像回答，又像询问似地说。

“你们听我说！”普罗庆柯竖起一个指头，先望望刘季柯夫，然后又望望舒尔迦，“别相信纸上写的，别相信别人的话，别相信别人的指使！对每一件事、每一个人，都要重新检查，用自己的经验检查。组织你们的地下工作的那些人，已经不在这里，这你们是知道的。

遵照秘密工作的规矩——那是很有道理的规矩！——他们已经离开。他们已经走得很远了。

也许，已经快到新切尔卡斯克了。”普罗庆柯带着不可捉摸的微笑说，这时有一颗活泼的小火星迅速而高兴地从他的一只蓝眼睛里独脚跳进另一只，“我说这些话有什么用意呢？”他接下去说，“我这些话的用意是，建立地下工作的时候，我们的政权还在这里，可是德国人要来了，这时就要对人们再进行一次考验，用生和死来考验……”

他没有来得及发挥自己的思想。临街的门砰的一响，外面房间里响起一阵脚步声，坐在外面“迦济克”里的那个妇人走了进来。她脸上明白显露出她在等待普罗庆柯时的全部感受。

“你等得心焦了吧，卡佳①？我马上就来。”普罗庆柯咧开嘴巴抱歉地微笑着说了，就站起身来。其余的人也站了起来。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妻子，是一位教师。”他突然非常得意地说。

①卡佳是叶卡杰林娜的小名。

刘季柯夫尊敬地握了握她的有力的手。她和舒尔迦本来认识，就对他

笑笑说：

“您的妻子呢？”

“我一家都在……”舒尔迦正要回答。

“啊，对不起……原谅我。”她突然说，连忙用手把脸捂住，但是从指缝里和手掌旁边还可以看得出她是满脸通红。

舒尔迦的一家都留在德军占领区，这也是舒尔迦请求把他留在州里做地下工作的原因之一。他家里的人没有来得及离开，因为德军来得太突然，那时舒尔迦正在很远的村镇里把牲畜集中起来，准备赶到东方去。

舒尔迦的一家，像他本人一样，都是普通人。当干部家属向东方疏散的时候，舒尔迦的家属——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一个在小学念书的女孩和一个七岁的儿子——不愿意离开，同时舒尔迦本人也不坚持一定要他们离开。当初他还年轻，在这一带打游击的时候，他年轻的妻子就和他在一起，他们的长子正是那时候出生的，现在已经当了红军指挥员了。根据以往的习惯，他们觉得一家人在危难的时候不应该分开，而应当共度患难，——他们也是用这样的精神教育他们的子女。现在舒尔迦觉得，使妻子儿女陷在德国人手里都是他的过错，他还希望能救出他们，如果他们活着的话。

“原谅我。”普罗庆柯的妻子把捂在脸上的手放下来，又说了一遍，接着又是同情又是抱歉地望了望舒尔迦。

“好吧，亲爱的同志们……”普罗庆柯刚开口，又沉默了。

已经该走了，但是四个人都觉得依依不舍。

从他们的同志们离开他们，通过自己的土地到自己人那里去之后，他们四个人留在这里总共只过了几小时，可是他们已经开始了一种新的、不熟悉的地下生活；在祖国的土地上过了二十四年的自由生活之后，这种生活显得非常异样。他们刚刚还看见自己的同志们，同志们离他们还不太远，要追还可以追得着，但是他们却不能够去追赶。现在他们四个彼此非常地接近，比自己的亲人还亲，因此他们实在是难舍难分。

他们站着，久久地相互握着手。

“我们倒要看看，德国人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是什么样的主人和统治者。”普罗庆柯说。

“您自己要保重，伊凡·费奥多罗维奇。”刘季柯夫非常严肃地说。

“我的生命力有野草那么强，你要保重自己，费里普·彼得罗维奇，还有你，柯斯季耶维奇。”

“我是不会死的。”舒尔迦忧郁地笑了笑，说。

刘季柯夫严峻地望望他，没有说什么。

他们轮流着拥抱，吻别，竭力避免目光相遇。

“再见。”普罗庆柯的妻子说。她脸上没有带笑，她的这句话甚至说得很庄严，她的眼睛里涌出了泪水。

刘季柯夫第一个走出去，舒尔迦跟着他。他们出去的时候也跟进来的时候一样——走后门，穿过小院。这里有几间偏屋，他们可以不让人看见，分别从房后走出去，走到旁边和大街平行的那条街上。

普罗庆柯和他的妻子却走前门，走到通公园大门的公园街上。

炎热的午后的太阳迎面照着他们。

普罗庆柯看到对街那辆装满东西的卡车，车上的工作人员和在车旁话别的一对青年男女，就懂得妻子为什么要这样不安了。

他把摇把摇了好一会，“迦济克”跳动起来，但是发动机没有开动。

“卡佳，你来摇吧，我来踏风门。”普罗庆柯爬进汽车，狼狈地说。

妻子用晒黑了的、纤细的手抓住摇把，使出出人意料的力气摇了几下。车子动了。她用手背挥掉额头上的汗水，把摇把扔在司机座脚下，自己在普罗庆柯旁边坐下。“迦济克”像一匹不听话的马驹似的，急遽地在街上奔驰，排气管噗噗地响着，放出一缕缕蓝灰色的烟，过了一会才恢复正常，很快就在过道口斜坡后面消失了。

“你看，忽然来了这个托里亚·奥尔洛夫，你知道他吗？”

这时候，万尼亚正在低声说着，他的嗓音有点喑哑。

“我不知道，他大概是伏罗希洛夫学校的吧。”克拉娃几乎是无声地回答说。

“总之，他来找我，说：‘捷姆奴霍夫同志，离你们家不远，只隔几个门，有一个非常积极的共青团员沃洛佳·奥西摩兴。他不久前因为阑尾炎动过手术，可是他出院太早，所以伤口裂开了，化了脓。您能不能想办法给他弄一辆车子？’你明白我的处境吗？我非常熟悉这个沃洛佳·奥西摩兴——这个青年人真是好极了！你明白我的处境吗？我说：‘好吧，你先到沃洛佳那里去，我现在先去一个地方拐个弯儿，再想办法去搞辆车子来看你们。’后来我就跑来看你了。现在你明白了吗，我为什么不能跟你们一块走？”他抱歉地说，极力要看出她的泪水盈眶的眼睛的神色，“可是我和若拉……”他又开始往下说。

“万尼亚，”她突然凑近他说，使他的脸上感到了她的温暖的、牛奶味儿的呼吸，“万尼亚，我为你感到骄傲，我真为你感到骄傲，我……”她发出了一声呻吟，完全不像少女的呻吟，而是一种低沉的、妇人的呻吟。随着这声呻吟，她忘却了世界上的一切，伸出丰腴的、凉凉的双臂，也不像少女那样，而是像妇人那样，大胆地搂住他的脖子，热情地吻了一下他的嘴唇。

接着，她放开万尼亚，跑进了便门。万尼亚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过身去，不再理会披散下来的乱发，迎着太阳，摆动着长胳膊，急急地沿着街道，朝着和公园相反的方向走去。

像余烬般蕴藏在他心里的灵感，这时好像火焰一样照亮了他的不平常的脸。但是，无论是克拉娃或是别人都没有看到，此刻他的脸变得多么美丽。万尼亚一个人摆动着胳膊在街上行走。区里有的地方还在炸矿井，有的地方还有人在奔跑、哭泣、咒骂，军队还在撤退，排炮还在隆隆地响，飞机的发动机还在天空示威似地怒吼，空中还滞留着烟尘，烈日还在无情地烤灼，但是对万尼亚说来，除了搂过他的脖子的那双丰腴、阴凉、温柔的手臂和留在他唇上的沾着泪水、含有涩味的热吻之外，已经什么都不存在了。

他周围发生的一切已经吓不倒他，因为对他说来已经没有什么力不能及的事。他不仅能够疏散沃洛佳·奥西摩兴，而且能够疏散整个城市——连同妇女老少和他们的全部财产。

“我为你感到骄傲，我真为你感到骄傲。”她的柔和的声音低低地说的那句话，一直萦绕在他的脑际，除此以外，他已经什么都不能想了。他才十九岁。

第九章

谁也说不出，德国人统治下的生活将是什么样子。

刘季柯夫和舒尔迦事先已经讲好，他们怎样找到对方：按照约定的记号，通过第三者——克拉斯诺顿总秘密接头处的房东。

他们分开走出去，各走各的路。他们可曾想到，他们从此就不能见面了吗？

刘季柯夫照他对普罗庆柯所说的那样行动：他消失不见了。

舒尔迦现在也应该老老实实地躲在一所给他指定的房子里，最好是躲在他当初打游击的老伙伴伊凡·格纳简柯——或是照人家不拘礼节地管他叫康德拉多维奇——家里。但是舒尔迦跟他已经有十二年没有见面，他觉得非常非常不愿意在这种时候去找他。

尽管他的态度非常镇静，他的内心是痛苦的。此刻他需要有一个非常知心的人。舒尔迦开始回忆，在一九一八到一九一九年做地下工作期间跟他特别接近的人里面，还有哪些人留在克拉斯诺顿。

这时舒尔迦想起了他的老伙伴列昂尼德·雷巴洛夫的妹妹李莎，他的永远嵌着煤屑的大脸上便露出了天真的微笑。他想起了那几年的李莎①·雷巴洛娃的模样：身材苗条，头发浅色，眼睛灵活，性情泼辣，动作急躁，说话生硬。记起她到“干草场”来给他和列昂尼德送饭的情形，记起他老是开玩笑说：“可惜我有了老婆，不然就要向你求婚，”她听了就露出雪白的牙齿直笑。其实她跟他的妻子是很熟的！

①李莎是叶李莎维塔的小名。

十一二年前，他曾在街上碰到过她，还有一次似乎是在一个妇女集会上。他记得她好像已经结了婚。不错，国内战争刚结束，她就跟一个姓奥西摩兴的结了婚。这个奥西摩兴后来在煤业联合公司里做职员。他们在通向五号井的那条街的标准式房屋里分配到一套房间，那时舒尔迦正在房屋分配委员会里工作。

他记忆中的李莎还是他年轻时代认识的模样，青春岁月的种种回忆突然非常有力地涌上心头，使他觉得自己又变得年轻起来。他觉得，现在他面临的一切似乎也突然被他的青春的光辉照亮了。“她不会变的，”他想，“她的丈夫奥西摩兴好像也是自己人……啊，不管怎样，我还是先去看看李莎·雷巴洛娃！也许，他们没有走。也许，命运本身在把我领到他们那里去。也许，已经只剩下她一个人了？”他向过道口走下去，一面激动地想着。

他离开这几十年了，这十年里，整个这一区里都造起了砖房，现在已经难以辨认奥西摩兴家住的是哪一所。他在静悄悄的街道上走了好久，在一排排百叶窗紧闭的房屋旁边徘徊，不敢去敲门打听。最后，他想出应当拿草原上远远可以看到的五号井的井架做目标。他顺着直对井架的街道走过去，很快就找到了奥西摩兴家的房子。

窗子大开着，窗台上摆着花；他隐约听到里面有几个青年人的声音。他敲门的时候，他的心又像年轻时候那样怦怦地跳起来。里面大概没有听见敲门声，他又敲了几下。门里边传来了穿软底鞋的脚步声。

他面前站着李莎·雷巴洛娃，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她穿着便鞋，满脸怨气和悲痛，眼睛哭得红肿。“唉，生活把她折磨得多么厉害呀。”舒尔迦立刻这样想道。

但是他马上就认出了她。她年轻时候也常有这种又像气忿又像怨恨的

生硬的表情。但是舒尔迦知道，实际上她是很善良的。她仍旧很苗条，浅色头发里也没有白发，但是却满脸皱纹——艰苦的经历和劳累的皱纹。她穿得似乎有些邋遢，以前她是从来不容许自己这样的。

她带着敌意和询问的神气望着站在她家门口的这个陌生人。突然，她脸上露出了惊奇的表情，她的噙着泪水的眼睛里似乎也露出一丝昔日的喜悦。

“马特维·康斯坦丁诺维奇……舒尔迦同志！”她说，握着门柄的手无力地垂了下去。

“是哪一阵风把您吹来的？在这种时候！”

“对不起，李莎……还是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①，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我现在就要到东方去，要撤退，现在弯过来看看你。”

①俄罗斯人习惯，称人的名字和父名表示尊敬。

“原来如此，到东方去。大家都到东方去！可是我们呢？我们的孩子呢？”她一下子突然激动起来，一面神经质地、很快地整理着头发，一面瞪着又像怨恨、又像非常困倦的眼睛望着他。“您现在要到东方去，舒尔迦同志，我的儿子动了手术躺在床上，可是您现在要到东方去！”她重复地说，仿佛她曾一再警告过舒尔迦，说会发生这样的事，现在事情果然发生了，因此这都是他的过错。

“对不起，您别生气。”舒尔迦的态度非常镇静，心平气和，虽然他内心深处已经感到一种突如其来的忧伤。他心里想：“啊，想不到你会变成这样，李莎·雷巴洛娃，你竟然这样来欢迎我，我亲爱的李莎！”

但是他一生阅历很多，他控制着自己。

“请您说清楚，您出了什么事？”

他也改口称“您”了。

“请您原谅我，”她的态度仍旧很生硬。但是她脸上又出现了很久以前的友好关系的影子。“请进来……可是我们的事情很糟糕！”她一筹莫展地摆了摆手，红肿的眼睛里又涌出了泪水。

她退后一步，请他进去。他随着她走进昏暗的门厅，一进去就从一扇打开的门里看到右面那个浴满阳光的房间，看见里面有一个十几岁的青年靠着枕头半躺在床上，身上盖的被单褪到腰部上面。他穿着翻领白汗衫，生着一双深色的眼睛，原来晒得黑黑的脸现在显得苍白。有三、四个小伙子和一个姑娘站在他床边。

“他们是来跟我的儿子告别的。您这边来。”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请他走进对面的房间。这个房间在这所房子的背阳的一面，光线比较暗，但是很阴凉。

“首先要向您问好。”舒尔迦说。他脱下帽子，露出结实的、剪成平顶的头，然后伸出手来，“我不知道应该怎么称呼您，叫您李莎呢，还是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

“您怎么方便就怎么叫吧。我这个人不妄自尊大，也不要求人家用尊称来称呼我，不过我现在算是什么李莎？从前是李莎，可现在……”她急躁地摆了摆手，好像不愿意谈这个，她的红肿的浅色眼睛疲倦地、抱歉地、同时又好像非常温柔地望了望舒尔迦。

“对我来说，你永远是李莎，因为我自己也老了。”舒尔迦微笑着在椅子上坐下。

她在他对面坐下。

“我既然是个老年人，那么请原谅，我一开口就要给你提个意见，”舒尔迦仍旧带着笑，但是非常严肃地接着说，“我要到东方去，我们别的人也要到东方去，对这件事你是不应该生气的。德国鬼子没有给我们放宽期限。从前你曾经像是我的妻子一样，所以我不妨对你说，他们这些德国鬼子，已经到了我们的大后方……”

“这难道会使我们轻松些吗？”她忧愁地说，“你们要走了，我们却留在这里……”

“那又怨谁呢？”他的脸色阴沉起来，说道，“从战争一开始，我们一直在把像你们这样的家庭疏散到东方，”这时他想起了自己的家庭，“帮助他们，向他们提供交通工具。不仅是家属，就是成千成万的工人，我们也都把他们送到乌拉尔，送到西伯利亚。当时你们为什么不走呢？”舒尔迦问，他心里愈来愈感到痛苦。

她没有作声，舒尔迦看到她一动不动，直挺挺地坐着，仿佛在倾听隔着门厅的那个房间里的动静，知道她并没有好好地听他的话。于是他自己也不禁倾听起那边的动静来。

那边只是偶尔传来几声低低的谈话，听不清那边在干什么。

不管万尼亚是多么顽强和冷静——这在同学们口中甚至成为美谈，——他仍然没能给沃洛佳弄到一辆大车，或是在汽车上找到一个座位。他回到家里，看见若拉已经等得疲倦不堪，父亲也已经回到家里：根据这一点，他知道柯瓦辽夫一家已经走了。

若拉今年十七岁，个子长得非常高，不过比起万尼亚来还是矮半个头。他生来就黑，被太阳晒了变得更黑，他生着饱满的嘴唇、弯弯的睫毛和一双亚美尼亚人的美丽的黑眼睛。

他的样子有点像黑人。

虽然年龄上有差别，他们这几天来却成了好朋友：他们俩都是爱书如命的人。

万尼亚在学校里甚至被称做教授。他只有一套节日穿的、带有棕色条纹的灰色衣服，只有在生活中的隆重场合他才把它穿上；而且这套衣服像他所有的衣服一样，也已经嫌短。但是当他在上装里面穿上翻领白衬衫，打上咖啡色领带，戴上黑玳瑁边眼镜，口袋里装满报纸，弯着的胳膊里拿着一本书，心不在焉地用书拍拍自己的肩膀，摇摇摆摆地在走廊里走过的时候，他的态度总是那么镇静而沉默，蕴藏在他心里的灵感非常均匀而明亮地燃烧着，仿佛把遥远的反光投到他的苍白的脸上，——这时候，所有的同学，特别是低年级的同学，他辅导的少先队员们，都不由自主地怀着敬意给他让路，仿佛他真是一位教授似的。

若拉甚至专门有一本划着格子的练习本，里面记着他读过的每一本书的作者姓名、书名和对它的短评，比方：

尼·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真好！

亚·勃洛克①。《美女诗》。含混的辞汇太多。

拜伦②。《查尔德·哈罗德游记》。真不懂这部作品为什么会这样激动人心，如果它读起来是这样枯燥乏味。

弗·马雅可夫斯基。《好！》。（没有任何评语。）阿·托尔斯泰。《彼得大帝》。

好！指出彼得是一个进步的人物。　　①勃洛克（1880—1921），苏联诗人。在创作初期（一九〇四年的《美女诗》等）是象征主义的代表。

②拜伦（1788—1824），英国诗人。长诗《查尔德·哈罗德游记》是根据他在西班牙、希腊等国旅行的见闻和感受写成的。

在这本划了格子的练习簿里还可以读到许多其他的东西。一般地说，若拉非常整洁、有条理，他坚持自己的信念，在各方面都喜欢整齐和纪律。

在所有这些日子里，他们白天黑夜地忙着办理学校、俱乐部和保育院的疏散工作，同时嘴巴一刻不停地热烈谈论着第二战场、诗《等着我》、北海的航道、影片《灿烂的生活》、科学院院士李森科的著作、少先队运动的缺点、伦敦西科尔斯基①政府的古怪的态度、诗人施巴巧夫、电台播音员列维丹、罗斯福和邱吉尔等等。只有在一个问题上他们的意见是分歧的：若拉认为阅读书报要比在公园里追求姑娘们有益得多，可是万尼亚说，就他本人来说，如果他不是这样近视，他还是要追求的。　　①西科尔斯基（1881—1943），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流亡英国的波兰政府总理，对苏态度摇摆不定。

万尼亚和哭哭啼啼的母亲、姐姐、父亲告别。父亲尽管气愤地喘息着，喉咙里咯咯地响着，竭力不望着儿子，最后还是给他划了十字，突然用焦干的嘴唇在他的前额上吻了一下。

在这时候，若拉就劝他，他既然弄不到大车，那么到奥西摩兴家里去也无益。但是万尼亚说，他曾答应过托里亚·奥尔洛夫，所以应该去一下把事情说清楚。

他们把背包朝肩膀后面一甩，万尼亚朝床头他心爱的角落里投了最后的一瞥。那里挂着哈尔科夫乌克兰出版社印行的、画家卡尔波夫画的普希金石印像，摆着一个书架，放在显著地位的是普希金文集和列宁格勒苏联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普希金时代的诗人们的几卷小开本诗集。万尼亚对这一切望了一眼，夸张地用急遽的动作把帽子扣得低低的，几乎压在眼睛上，就和若拉一同去看沃洛佳去了。

沃洛佳半躺在床上，他穿着白汗衫，盖的被单褪到腰部。床上放着一本打开的书：《继电器防护》，大概他今天早上还读过。

为了不妨碍打扫房间，各种各样的工具、一卷卷的电线、自制的电影摄影机和收音机零件都胡乱堆在床后靠窗的角落里——沃洛佳热中于发明，他梦想将来做个飞机设计师。

沃洛佳最要好的朋友，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外号叫“雷响”的托里亚·奥尔洛夫，坐在床前的凳子上。他外号所以叫“雷响”，是因为他无冬无夏总是伤风咳嗽，咳嗽的声音很响，好像是对着空木桶咳嗽似的。他弓着背坐在那里，两个大膝盖叉得老远。他所有的关节——臂肘上的、手上的、膝盖上的——以及脚掌和小腿都特别发达，粗大突出。浓密的灰色鬈发在滚圆的脑袋上向四面翘起。他的眼神是忧郁的。

“这么说，你怎么也不能走路吗？”万尼亚问沃洛佳。

“哪儿能走，医生说，一走路，创口要是裂开，肠子都要流出来。”沃洛佳发愁地说。

他发愁不仅是因为他自己走不了，同时还因为母亲和妹妹为了他也不能走。

“好，让我看看伤口。”精明能干的若拉说。

“您别胡来，他的创口包扎着呐！”沃洛佳的妹妹刘西雅①用臂肘撑着床背，站在哥哥的床脚头，听见这话吓了一跳。 ①刘西雅是刘德米拉的小名。

“别担心，包你出不了毛病。”若拉带着有礼貌的微笑说，他的悦耳的亚美尼亚口音使他的话听起来具有特别的意味。

“我自己就是急救学校毕业的，解绷带和裹绷带都很在行。”

“这不卫生！”刘西雅抗议道。

“在困难的战地条件下应用的最新军事医学，已经证明了这是偏见。”若拉断然地说。

“您读到的是另外一回事。”刘西雅傲慢地说，但是过了一刹那，她再望着这个黑得像黑人的男孩子的时候，已经有些发生兴趣了。

“你算了吧，刘西雅！妈妈是神经质，这我还可以理解，可是你干吗要来瞎管闲事！走开，走开！”沃洛佳生气地对妹妹说，说完他就掀开被单，露出两条瘦腿。他的腿晒得非常黑，筋肉非常发达，无论什么疾病或是住院都不能使这种黑色和这发达的筋肉消失。

刘西雅转过身去。

托里亚和万尼亚扶着沃洛佳，若拉给他把蓝短裤略微褪下，解开绷带。创口已经化脓，非常难看。沃洛佳因为硬挺着不要露出疼得愁眉苦脸的样子，所以脸色苍白得厉害。

“很糟糕，是吗？”若拉皱着眉头说。

“是不大妙。”万尼亚表示同意。

他们极力不看沃洛佳，默默地给他重新包扎好。沃洛佳的狭长的棕色眼睛，一向总闪耀着大胆和调皮的神色，现在却是忧愁的，极力希望看出同伴们的眼色。

现在他们面临到最大的困难是，他们明知道这个同志要遭到危险，却又不得不离开他。

“你的丈夫到哪里去了，李莎？”这时舒尔迦为了转移话题，这样问道。

“死了，”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态度生硬地说，“是去年死的，刚巧在战争爆发以前。他一直生病，后来就死了。”她重复了几遍，舒尔迦听起来觉得她是带着怨恨的责难，“唉，马特维·康斯坦丁诺维奇！”她的声音里含着痛苦，“您现在也是当权的人了，也许，您什么都没有看见，您真不知道我们现在是多么痛苦哪！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说来，您就是我们的政权了。我记得，您的出身也跟我们一样。我记得，我哥哥跟您是怎样为我们的生活斗争的。我一点也不埋怨您，我知道您不能留下来等死。可是难道您没有看见，跟你们一同撤退的人，有些人扔下一切不管，只顾带着家具，带着一卡车一卡车的破烂逃走，对我们这些老百姓一点都不管，其实这一切都是我们这批小人物亲手做出来的。唉，马特维·康斯坦丁诺维奇！您难道看不出，在这些坏蛋的眼里，请原谅我，东西要比我们这些普通人更宝贵吗？”她痛苦地歪扭着嘴唇叫道，“以后您会奇怪，怎么别人会埋怨你们。可是要知道，一个人一生中只要有一次经历过这种事，他就会对一切的一切都丧失信心！”

事后舒尔迦曾一再怀着痛苦的激动和悲哀回忆起他们谈话中的这一段。最使他后悔的是：在内心深处，他是了解这个妇人当时的心情的，本着他的刚强开朗的性格，他也有一番恳切的话要对她说。问题是，她说话的时

候是怀着满腔的痛苦以及他认为是怨恨的情绪，她说的话以及她整个的模样，跟他年轻时所了解的那个李莎截然不同，完全不符合他的期望！

因此这使他突然觉得自己是受了侮辱：他自己留在这里，他的全家都陷在德国人手里，也许已经遭了难，可是这个女人却尽谈她自己的事，对于他的家庭，对于年轻时候跟她很要好的他的妻子，连问都不问一声。所以从舒尔迦的嘴里也突然冲出了一些话，事后他回忆起这些话来总觉得很后悔。

“您想得太远了，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他冷冷地说，“想得太远了！在德国政权到了门口的时候，当然不妨对自己的政权丧失信心。您听到吗？”他严峻地举起手指短短、生满汗毛的手说，这时远方隆隆的炮声仿佛冲进了房间。

“您有没有想过，我们人民的精华有多少将在那边牺牲，照您的说法，他们是从普通人上升为当权的人；可是照我的说法，他们是上升到自觉程度的人，他们是人民的精华，是共产党员！如果您对那些人失去信心，在德国人践踏我们的时候失去信心，这使我很气愤。又气愤，又为您惋惜，惋惜！”他厉声地重复了一遍，他的嘴唇都像小孩那样颤抖起来。

“您这算什么话？……这算什么话？……您……您是要责备我，说我在等待德国人吗？”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很不客气地叫道。她气得喘不过气来，因为被他这样误解而格外激动。“啊，您怎么能……那么我的儿子呢？……我是个做母亲的！……可是您……”

“难道您忘了，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当初我们都是像您所说的普通工人，我们面临着德国人和白党的威胁的时候，难道我们首先是想到自己吗？”舒尔迦不听她的，怀着悲痛的心情说，“不，我们首先不是想到自己，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我们最优秀的人——领导同志们，这就是我们想到的人！回想一下您的哥哥吧？我们工人永远就是这样想、这样行动的！隐藏并且保护我们的领导同志，那些最优秀的人，我们的精华，自己却挺胸而起——一个工人过去和现在都是这样想的，并且认为不这样想就是自己的耻辱！这些年来您难道已经变得这么厉害了吗，叶李莎缮塔·阿列克谢耶芙娜？”

“等一等！”她突然说，她挺直了身子，倾听隔着穿堂的那个房间里的动静。

舒尔迦也凝神听了一下。

那个房间里寂静下来，这种寂静向做母亲的暗示，那边有什么事发生了。她霎时间忘记了舒尔迦，猛冲到门口，向儿子那边跑去。舒尔迦对自己很不满，他板着脸，长满黑汗毛的大手揉捏着便帽，走到穿堂里。

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的儿子半躺在床上跟同伴们告别。他默默地握着他们的手，久久不放，他的脖颈和剪成平顶、但是已经长出一点深色头发的头，激动地、神经质地扭动着。说来虽然很奇怪，但他的脸上却露出喜悦的兴奋的神情，他的狭长的深色眼睛也在闪光。站在他床头的那个头发蓬乱、样子拙笨、骨骼粗大的同伴，侧着身子，所以只能看到他的侧面，他面带喜色，睁大眼睛望着打开的、满是阳光的窗子。

那个姑娘脸上带着笑，仍旧站在病人的床脚头。舒尔迦在这个姑娘身上看到了当年的李莎·雷巴洛娃的影子，他的心忽然痛得揪了起来。这是他二十多年前认识的李莎，只不过比他认识和喜欢的那个两手略嫌粗大、动作急躁的女工李莎显得温柔罢了。

“是的，该走了。”他悲伤地想，手里揉捏着便帽，尴尬地在吱吱作响的地板上走过去。

“您要走啦？”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跑到他跟前，高声问道。

“真是所谓毫无办法，已经该走了。您别生气。”他戴上便帽。

“已经要走了吗？”她又说了一遍。在她的这声询问和感叹之中，含着又像是痛苦又像是惋惜的感情，也许，这不过是他的想象。“您别生气。愿上帝——如果他存在的话，——保佑您平安到达，别忘了我们，记住我们。”她一筹莫展地垂下双手，说道。她的声音含着那样善良的、母性的感情，他感到自己的喉咙突然哽住了。

“再见。”舒尔迦阴郁地说了就走了出去。

唉，舒尔迦同志，你不该离开！你不该丢下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和这个跟当年的李莎·雷巴洛娃一模一样的姑娘，你不该不去思考甚至不去了解你眼前这几个青年中间发生的事情，甚至不想知道这些青年是些什么人！

假如舒尔迦不这样做，也许，他的整个生活会变成另一种样子。但是当时他不仅不能了解这一点，他甚至还觉得自己是受了委屈和侮辱。他除了到从前叫“鸽房”的那个很远的地区去，寻找从前打游击的伙伴——他已经有十二年没有见面的伊凡·格纳简柯——的小房之外，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他是否想到，这时他已经在那条把他引向死亡的道路上跨出了第一步呢？

下面就是在他跟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走到门厅之前的一分钟里所发生的事，也就是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的儿子的房间里发生的事。

房间里笼罩着悲痛的沉默。接着，托里亚，就是那个外号叫“雷响”的托里亚·奥尔洛夫，从凳子上站起来说，如果他的好朋友沃洛佳不能离开，那么他，托里亚，也要陪他一块留下来。

最初一瞬间，大家都不知道说什么好。过了一会，沃洛佳激动得流着眼泪，开始亲吻托里亚，大家也都被喜悦的激动所控制。刘西雅跑过去搂住“雷响”的脖子，开始吻他的双颊、眼睛和鼻子——使他不知道还有比这更幸福的时刻。然后她生气地望了望若拉。她非常希望这个做事很有条理的、黑人般的青年也留下来。

“这才好啊！这才是同志！这才是好汉，托里亚！”万尼亚用微哑的低音满意地说。

“我因为你感到骄傲……”他突然说。“我和若拉都因为你感到骄傲。”他改正说。

于是，他握了握托里亚的手。

“我们难道会这样混下去吗？”沃洛佳双目炯炯地说，“我们要斗争，对吗，托里亚？区党委不可能不留人在这里做地下工作。我们要找到他们！难道我们就不能有一点用吗？”

第十章

万尼亚和若拉跟沃洛佳告别之后，就投入了沿着铁路向李哈雅移动的逃难的人流。

他们最初的计划是前往新切尔卡斯克，据若拉说，他有个亲戚在那边很有办法，可以帮助他们继续前进：他的叔叔在那边车站里做鞋匠。但是万尼亚知道了柯瓦辽夫一家是去李哈雅之后，在最后一分钟含含糊糊地向若拉叙述了这条路线的好处，建议走这条路。对若拉说来，无论到哪里去，根本无所谓，所以他就心甘情愿地放弃了自己的相当明确的路线而采取了万尼亚的模糊不明的路线。

在一段路上，有一个矮小、弯腿、口髭浓密异常的少校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他右胸佩着近卫军徽章，军便服皱皱巴巴，长统靴干裂而歪扭。照他的解释，他的军服，特别是靴子，所以弄成这副惨相，是因为在他住院养伤的五个月里，这些东西一直被扔在医院的储藏室里。

那所医院最近一直借用克拉斯诺顿市立总医院的一所分院，目前正在疏散。但是由于缺乏运输工具，凡是能够行走的人，只好请他们步行，现在还有一百多个重伤员留在克拉斯诺顿，毫无希望离开。

少校除了详尽地说明了本身的命运和他住过的医院的情况之外，以后一路上他一直一言不发。他沉默到了极点，他执拗地沉默着，根本没有希望让他开口。此外，少校还是瘸腿。

不过，尽管如此，他还是相当带劲地迈着穿着歪歪扭扭的皮靴的脚，不落在年轻人后面。因此过不多久，年轻人就对他产生了极大的敬意，他们无论谈什么，都要把他当做一位沉默寡言的权威来向他请教。

这时候，许许多多中年人和青年人，而且不仅是妇女，还有持枪的男子，都在这条无穷无尽的撤退洪流里受着痛苦和折磨。可是万尼亚和若拉，肩上背着背包，袖子卷到臂肘上面，手里拿着帽子，却朝气勃勃，满怀着灿烂的希望，在草原上阔步前进。他们比别人优越的地方，就在于他们非常年轻，他们是单身，他们不知道敌人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自己人在哪里，他们不相信谣言；现在尽管四周是无边的草原，骄阳似火，烟雾弥漫，在这个不时受德机轰炸和扫射的大路地区，尘土好像黑压压的乌云，可是在他们看来，整个世界对他们都是开放的，四面八方他们都可以去得。

而且他们所谈论的事，和周围发生的一切也毫无关系。

“你为什么认为在目前做法学家没有意思呢？”万尼亚用微哑的低音问道。

“因为在目前战争时期，应该做一个军人，战争结束之后，就应当做一个工程师，来复兴经济，至于做法学家，目前并不重要。”若拉说，他虽然才十七岁，可是他的见解一向是明确而肯定的。

“对，打仗的时候，我当然要做军人；可是我的眼睛不好，人家不会要我。你离我远一些，我看你就像是一团模模糊糊、又长又黑的东西。”万尼亚苦笑着说。“做工程师固然非常有用，但是这里有个爱好问题，而我的爱好，你知道，是在诗歌方面。”

“那你应该进文学院。”若拉非常清楚明确地说，又望望少校，仿佛只有少校才能懂得他若拉是多么正确。但是少校对他的话毫无反应。

“我恰恰不愿意这样，”万尼亚说，“普希金也好，丘特切夫①也好，他们都没有念过文学院，而且那时候也没有这样的学校。总之，进学校学做诗人是不行的。”

①丘特切夫（1803—1874），俄国诗人，曾在俄国驻

外使团中担任外交职务。

②迦林（本名：尼·格·米哈伊洛夫斯基，1852—1906），俄国小说家。

“什么都可以学会。”若拉回答说。

“不，进学校学做诗人——这简直是荒唐。每个人都应当学习，而且应当从普通的职业开始生活的道路。如果他天生有诗人的才华，这种才华一定会循着独立发展的途径得到发展。我想，只有到这种时候，才能成为专业作家。比方说，丘特切夫做过外交家，迦林②做过工程师，契诃夫做过医生，托尔斯泰是地主……”

“这个职业倒挺舒服！”若拉抬起乌黑的、亚美尼亚人的眼睛，狡猾地望望万尼亚说。

他们俩都笑起来，少校也微微一笑。

“那么他们有谁做过法学家吗？”若拉认真地问。

归根结蒂，如果作家里面有人做过法学家，他觉得把这个例子应用到万尼亚身上就完全合适了。

“这我可不知道，但是法律教育可以向作家提供社会科学、历史、法律、文学等方面必要的知识……”

“就说这些学科吧，”若拉有点卖弄地说，“这些学科最好在师范学院里念。”

“可我又不想当教师，虽然你们在学校里管我叫教授……”

“说来说去，在我们的法庭上做辩护人总是没有意思的，”若拉说，“比方说，你记得在审讯那些坏蛋危险分子的时候吗？我老是在想那些做辩护人的。他们的地位真尴尬，是吗？”若拉又笑起来，露出了雪白的牙齿。

“在我们这里当辩护人，当然没有意思，因为我们这里是人民法院。但是，我想做一个侦查员一定很有趣，可以认识许多形形色色的人。”

“最好是做公诉人，”若拉说。“你记得维辛斯基①吗？真棒！可是无论如何，我自己总不愿意当法学家。”

①维辛斯基（1883—1954），苏联外交家、法学家。在一九三三至三八年间大审判时，曾数次担任国家公诉人。

“列宁曾经是法学家。”万尼亚说。

“那是时代不同。”

“争论‘做什么职业’这个题目简直是无益而愚蠢的，要是我不明白这一点，我一定还要和你争论下去。”万尼亚笑着说。“应当做一个有学问的人，熟悉自己的业务，热爱自己的工作，如果你同时还有诗人的才华，它自然会发挥出来。”

“万尼亚，你可知道，我一向爱读你发表在壁报上，还有发表在你和柯舍沃伊合办的《帆》杂志上的诗。”

“你看我们的杂志吗？”万尼亚兴奋地又问了一遍。

“是啊，我看这份杂志。”若拉郑重地说，“我还看我们学校编的《鳄鱼》杂志，我们学校出版的一切我都注意。”他得意洋洋地说，“我可以肯定地对你说：你是有才能的！”

“哪里谈得上什么才能，”万尼亚忸怩地用眼角瞟着少校说，接着把头一甩，把披散下来的长发甩到后面。“只是凑合着胡诌几句诗罢了……普希金，那才了不起呢，那才是我的上帝！”

“不，我记得你把莲娜·波兹德内雪娃批评得好凶，你说她老是对着镜

子装模做样……哈哈！……批评得真好！”若拉叫了一声，他的亚美尼亚口音突然变得很明显。“你是怎么说的？‘她渐渐张开美丽的小嘴’……哈哈……”

“哦，那是胡诌的。”万尼亚惶乱地、含糊地低声说。

“告诉我，你没有写过什么爱情诗吗，啊？”若拉神秘地说，“喂，把你的爱情诗念几首给我们听听，好吗？”若拉对少校挤挤眼。

“哪里有什么爱情诗，真亏你想得出！”万尼亚窘到了极点。

他写过献给克拉娃的爱情诗，题目完全像普希金的诗那样，都是《致……》。正是那样——一个《致》和虚点。于是他又记起了他和克拉娃中间发生的一切以及自己的全部梦想。

他是幸福的。是的，在普遍的不幸之中他是幸福的。但是他难道能把这些想法告诉若拉吗？

“不，你一定有的。喂，你还是念几首吧。”若拉恳求说，他的稚气的亚美尼亚人的眼睛闪耀着。

“别瞎扯……”

“你真的不写爱情诗吗？”若拉突然变得正经起来，他的声音里又出现了先前的教训口吻，“不写是对的。现在难道是写爱情诗的时候——像那个西蒙诺夫，对吗？现在应该用毫不妥协地憎恨敌人的精神来教育人民！应该写政治诗！像马雅可夫斯基、苏尔柯夫，对吗？那样才好！”

“问题不在这里，写是各方面都可以写的。”万尼亚沉思地说，“我们既然生在世界上，而我们过的生活也许是多少代优秀的人们梦寐以求、并且为它奋斗过的生活，那我们就可以、就有权写我们生活中的一切事物，因为这一切都是重要的、不会重演的。”

“好，你就念点什么给我们听吧！”若拉恳求道。

天气闷热不堪。一路上他们一会儿嘻嘻哈哈地大声叫嚷，一会儿又把嗓门压低变成亲热体己的声调；他们一边走一边指手划脚，背着背包的脊梁完全汗湿了。尘土落在脸上，他们一擦汗就把尘土涂得满脸都是；黑得像黑人的若拉、长脸略微晒黑的万尼亚，以及口髭浓密的少校，都弄得像扫烟囱的工人。但是他们认为——而且他们毫不怀疑在少校眼中也是如此——这时全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们谈论的事情上。

“好，我来念……”

于是万尼亚就毫不激动地用平静的、微哑的声音朗诵起来：

不，我们没有苦闷，也不忧伤，
生活的道路并不使我们惊惶，
不，陌生的变心的感觉，
没有激动我们的心房。
青春幸福的岁月
汹涌地闪过，
各种各样的梦想
充满着心窝。
我们不厌恶生活，
不知道冷冷的哀愁，
不怀疑青春会虚度，
也没有内心的空虚。

宇宙的欢欣吸引着我们，
我们毫无畏惧地
把目光注视前方，
未来公社的顶峰就在那里号召。

“真棒！你肯定是有才能的！”若拉怀着衷心的钦佩望着这位年长的同学，欢呼道。

这时少校的喉咙里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万尼亚和若拉都转过脸去看他。

“你们这两个孩子……你们甚至不知道你们有多么好！”少校嗄声说，他抬起深藏在下垂的眉毛下面的湿润的眼睛，激动地望着他们。“不！这样的国家过去站得稳，将来也能站得稳！”他突然这样说，又把一根短而黑的指头狠狠地伸向空中，好像要威胁什么人。“他以为他已经使我们没法生活下去了！”少校的声音里带着嘲笑接下去说。“不，老弟，绝对办不到！生活在进行着，我们的孩子们把你看做瘟疫或是霍乱。你来了也待不久，可是我们的生活还是照样前进——该学习还是学习，该工作还是工作！可是他却在痴心梦想！”少校嘲笑道。

“我们的生活要永远前进，他算是什么东西？不过是光滑的皮肤上的一个疱，剥掉了，就没有了！……没有问题！我在那个倒霉的医院里曾经感到灰心丧气，我想，难道没有力量来对付他了吗？可是我一跟你们在一起，我的精神就完全振作起来……我想，现在一定有许多人在咒骂我们这批军人，难道可以这样吗？的确，我们是在撤退。要知道，他是集中了多少兵力来打我们啊！但是请你们想一想，我们显示了怎样的毅力！唉，我的天！坚守在原处，不撤退，献出生命，——这是幸福。请相信我的良心，我自己也认为，献出生命，为你们这样的孩子献出生命，是幸福的！”少校激动地说，他的干瘦的身体激动得战栗着。

万尼亚和若拉没有作声，带着惶惑的、和善的表情望着他。

少校说了这一番话，霎霎眼睛，用脏手帕擦擦口髭，就不吭声了，这样一直沉默到夜晚。到了夜晚，少校突然精神百倍，猛烈地冲去“消散”——照他的说法——大量拥塞在那里的汽车、大车和炮车，从此万尼亚和若拉就没有再看见过他，并且很快就把他忘掉了。

他们花了两天两夜的工夫才走到李哈雅。这时他们已经知道，南方的战事正在新切尔卡斯克城下进行，而在顿涅茨河那面，在顿涅茨河与顿河中间的广大草原地带，也有德国坦克和机械化部队突破了防线，在进行活动。

但是，据传说，在卡缅斯克附近有个部队在顽强地作战，阻挡德军进犯李哈雅。老百姓还在纷纷传说着指挥那个部队的将军的姓名。人们觉得，正是靠了他和他的部队，顿涅茨河下游的渡口才能仍旧掌握在我们手里，人们才能够畅行无阻地沿着草原里的村道来到顿河并且渡过顿河。

这几天烈日下的旅程，伊万尼亚和若拉筋疲力尽。到最后一夜，他们实在两腿无力，就倒在一个田庄里的干草棚里睡着了。一阵轰轰的炸弹声震撼着干草棚，把他们惊醒。

草原上的太阳还没有升起多高，但是整个无垠的麦田上空已经弥漫着闷热的、泛着淡蓝的金色雾霭；在这时候，万尼亚和若拉正渐渐走近分布在顿涅茨河这边岸上，由汽车、大车和人组成的庞大的逃难队伍。逃难队伍的宿营地比对岸的占地很广的哥萨克城稍在下游一些。在那个哥萨克城里，有

树木苍郁的花园，政府机关、贸易机关以及学校的砖砌建筑物，其中有许多遭到空袭，被炸成一片瓦砾场，还在冒烟。

这整个庞大的逃难队伍里的成员虽然是流动的，但也有它的老居民。这整个逃难队伍，不断由新的人员和交通工具补充着，两星期以前就在这里形成，过着自己的特殊的、独特的生活。

这个逃难队伍是零星部队，机关干部，企业职工，各种交通工具，各个社会阶层、各种不同年龄和家庭状况的逃难者的不可思议的混合物。这些人的全部努力、全部注意和全部活动都是为了尽可能地靠近河岸，靠近顿涅茨河上那座狭窄的浮桥。

但是，如果聚集在逃难队伍里的人们的全部努力是为了走到桥上，那么管理渡口的军人们的全部努力就是不放他们到桥上来，而是让撤往顿涅茨河和顿河中间的新防线的红军部队尽先渡河。

在敌人眼看就会出现在顿涅茨河两岸，一个比一个离奇的谣言不断激起自相矛盾的愿望和努力的状况下，个人的、局部的意志和努力同国家的军事需要就发生了冲突——而逃难队伍的日常生活，就是在这种冲突中度过的。

有的团体停在这里等待过河已经等了很久，甚至在地上挖好了防空壕。有的还搭起了帐篷，砌起临时炉灶来做饭。逃难队伍里到处都是孩子。不分昼夜都有汽车、大车和人，像一道连绵不断的细流蜿蜒通过顿涅茨河。在这道细流两边还有人乘着木筏或是小船渡河。几千头牛羊挤集在岸上，洑水过去，发出哞哞和咩咩的叫声。

德机一天几次来轰炸和扫射渡口。这时，保卫渡口的高射炮队马上就开始射击，高射机枪也咯咯地响起来，整个逃难队伍零时间就在草原上散开。但是飞机一过去，大家又回到自己原来的地方。

万尼亚从加入这个逃难队伍的那一刻起，心中除了找寻柯瓦辽夫一家乘坐的那辆汽车之外，已经没有其他的目的。有两种感情在他心里斗争：他已经开始懂得，形势是多么险恶，因此他希望克拉娃和她的父母不仅已经过了顿涅茨河，而且已经过了顿河，但是另一方面，假如他还能在这里遇到克拉娃的话，他也会感到非常幸福。

万尼亚和若拉正在这个逃难队伍里到处寻找克拉斯诺顿的同乡的时候，突然听到一辆大车上有人喊他们的名字。接着，他们的同学奥列格·柯舍沃伊，已经伸出有力的长胳膊搂抱着他们，使劲地吻着他们的嘴唇了。奥列格虽然晒得黑黑的，但仍旧像平时一样清洁整齐，他那肩膀宽阔、矫健灵活的身形和长着金色睫毛的、发亮的眼睛里，都露出跃跃欲试的神气。

他们碰到瓦尔柯和谢夫卓夫乘坐的新一号井的汽车，碰到邬丽亚和奥列格的亲属乘的大车，还碰到由于他俩的努力才能离开克拉斯诺顿的那个保育院，可是它的主任现在甚至认不出他们了。

第十一章

因为有新一号井井长瓦尔柯的黧黑的手在严厉地管理着，所以在万尼

亚和若拉加入的那一部分逃难队伍里，到处都已经秩序井然：汽车和大车分别排列成行，各处都挖了防空壕。

矿井的卡车旁边放着储存的木柴——几米长的农家篱笆。玛丽娜舅母和邬丽亚在用新鲜白菜和猪油做菜汤。

这个老茨冈瓦尔柯是一个真正的当家人。他带着他的工人和五个共青团员，迈着沉重的脚步，连在一起的浓黑的眉毛底下的眼睛令人望而生畏，使人们不由得不给他让路。他一直向渡口走去，希望用自己强硬的手腕来干预这件事情。

从瓦尔柯着手整顿秩序的那一刻起，奥列格就爱上了他，正像他不久以前爱上卡尤特金以及更早以前爱上邬丽亚一样。

不可遏制的要活动的渴望，要充分发挥本身能力的愿望，要参与人们的生活和活动，以便献出自己的、比较完善的、比较灵活的、充满新内容的东西的愿望，——这种还不是完全自觉的、然而却充满他整个身心并构成他性格的基础的精神力量，控制着奥列格。

“啊，万尼亚，我碰—碰到了你，真巧—巧极了！”奥列格高兴地、微微有些口吃地说。他和万尼亚并排跟在瓦尔柯后面走着。“我们碰到了，真好，我想你想得好苦啊。瞧，你居然还在念诗！啊—啊，老兄！……”后来奥列格尊敬地用目光和手指指着瓦尔柯的背影。“是啊，老兄，世界上主要的力量就是组织的力量！”他说，围着暗金色睫毛的眼睛里射出锐利的光芒。“没有这种力量，最好的和最需要的事情也要垮台，就像编织的东西一样，破了一点，线头就要散开。但是只要着手去做，拿出毅力来——那……”

“那你就小心要挨耳光。”瓦尔柯没有转过脸来，说道。

青年们也很赞赏他的阴郁的幽默。

越在前线，到了部队的第二梯队之后，就难于判断前方战斗的规模和剧烈的程度；同样，在渡口，待在最后一批等候过河的人里面，也就无法判断灾难的真正规模。

越靠近渡口，渡河的人们的情形就越是混乱，越发不可收拾，大伙的怨气也积得越深。

这股怨气日积月累，已经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恐怕已经没有一种力量能够使它消散。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都拚命要逼近浮桥，但是后面的车子紧抵着前面的车子，人群夹在车辆中间，挤得水泄不通，乱得不可收拾，因此除了逐渐向前推进，已经毫无办法来整顿秩序。

天气本来就热，再一挤，格外热得难以忍受；人们汗流如注，心里又是万分紧张，似乎他们只要互相一碰，就会爆炸似的。

管理渡口的那些军人已经有好多天没有睡觉。由于睡眠不足，由于从早到晚待在烈日之下，还由于几千只人脚和车轮不断扬起的尘土，他们的脸都变得黧黑，嗓子叫骂得已经沙哑，眼皮红肿，黝黑的手上全是汗水，他们的神经疲惫不堪，手里连东西都握不住了。但是他们继续执行他们的非人力所能胜任的工作。

非常清楚，除了这些人做的那些事以外，其他已经什么办法也没有了，但是瓦尔柯仍旧一直走到桥头的堤坡上，他的沙哑的声音就在人声和汽车吼叫声中消失了。

奥列格跟同伴们好容易挤到岸边。他脸上带着孩子般的紧张的注意、失望和惊讶的表情望着：只见在这一片尘埃和炎热之中，满载物件的卡车和

大车，从松坍的、满是泥泞的河岸上一辆接一辆地开过去，人们不断地走着，虽然汗流浃背，肮脏不堪，满心怨恨，受尽屈辱，但是仍旧走着，走着……

只有顿涅茨河本身，大伙从小就喜爱的、宽阔的、在这一带水势平稳的顿涅茨河——小学生们在它的中游不知洗过多少次澡，捉过多少次鱼啊，——它的温暖的、有些混浊的河水依旧滚滚流动。

“不，真恨不得打谁一顿嘴巴子！”维克多·彼得罗夫突然说，他的神情忧郁的、大胆的眼睛不是望着渡口，而是望着河水。他是波高烈莱庄上的人，是在这条河边长大的。

“可是你要打的人大概已经过了河了！”万尼亚开玩笑说。

青年们用鼻子嗤了一声。

“要打不该在这里打，应该到那边去打。”阿纳托里把戴着乌兹别克小帽的头朝西方点了点，冷冷地说。

“一点也不错。”若拉支持他的意见。

几乎就在他说这句话的同一刹那，响起了一声叫喊：

“空袭！”

高射炮立刻开炮，机枪也响起来，空中充满发动机的吼声，落下的炸弹的刺耳的啸声也愈来愈响。

青年们都在地上卧倒。近处和较远的爆炸震撼着四周的一切，泥块和木屑纷纷落下，随着第一批飞机马上又飞来了第二批，跟着就是第三批。呼啸声、吼叫声、投下的炸弹的爆炸声、高射炮和机枪的火力，一时似乎充满了草原和天空之间的整个空间。

但是现在飞机过去了，人们也开始从地上站起来。这时从不太远的地方，从若拉和万尼亚过夜的庄子那边，传来了隆隆的炮声。过了一瞬，就有炮弹带着巨响在逃难队伍里爆炸开来，炸起了一股一股的泥土和木屑。

从地上站起来的人们，一部分又仆倒在地上，一部分扭过头去对着炮弹爆炸的那一面，同时眼睛却仍旧盯着渡口。看到管理渡口的军人们的脸色和行动，大家明白，有一件无可挽救的事情发生了。

管理渡口的军人们交换了一下眼色，好像凝神倾听似地站了一会；突然，其中有一个军人跑进通浮桥的堤坡旁边的掩蔽部，另外一个沿岸叫喊着召集他们的队伍。

过了一分钟，那个军人从掩蔽部里跑了出来，一只胳膊上搭着两件大衣，另外一只手拖着几个背包的背带。接着，这两个军人和警卫小队的战士们并没有排队，就撒腿在浮桥上奔跑起来，越过了那些重又向浮桥开过去的汽车和在浮桥上开动的汽车。

跟着而来的事情发生得实在太突然，所以谁也讲不清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有些人跟在军人们后面拔腿就跑，一面叫嚷着。堤坡上的汽车突然乱成一团：有几辆汽车同时涌上浮桥，卡在一起，轧轧地响起来。前面的路虽然明明被这些汽车堵住，但是其他的汽车仍旧后面的顶着前面的，发动机响得可怕，继续向浮桥上这一堆汽车冲过来。一辆汽车跌到水里，跟着又跌下了一辆，第三辆眼看也要跌下去，幸亏司机拚命用力一扳，把车子煞住了。

万尼亚本来是惊讶地睁着一双近视眼望着车祸，这时忽然叫了一声：

“克拉娃！”

就撒腿奔到堤坡上。

不错，差一点跌到水里的这第三辆汽车正是柯瓦辽夫的车子，柯瓦辽

夫本人、他的妻子、女儿和另外几个人都坐在行李上面。

“克拉娃！”万尼亚又是一声高呼，他不知怎么已经到了汽车跟前。

车子上的人一个个跳下来。万尼亚伸手去搀，克拉娃就跳到他面前。

“完了！……他妈的！……”柯瓦辽夫这样一说，把万尼亚的心都说冷了。

克拉娃浑身哆嗦，迷惘地斜睨着万尼亚。万尼亚却不敢老握着她的手不放。

“你能够走路吗？你说呀，你能够走吗？”柯瓦辽夫迸出哭泣一般的声音向妻子问道，他妻子正用手捧着心，像鱼儿那样张着嘴吸气。

“别管我们啦……你快跑吧……他们会把你弄死的……”

她上气不接下气地嘟囔着。

“怎么啦，出了什么事？”万尼亚问。

“德国人来了！”

“你跑吧，跑吧，别管我们啦！”克拉娃的母亲重复着说。

柯瓦辽夫抓住万尼亚的手，眼泪直流。

“万尼亚！”他含泪说，“救救她们，别扔下她们。你们要是能保得住性命，就到下亚力山德罗夫卡去，那边有我们的亲戚……万尼亚，我一切都拜托你了……”

一颗炮弹轰的一声在堤坡旁的车堆里爆炸开来。

岸上的人，军人和非军人，都一声不响，像狂潮似的涌上了浮桥。

柯瓦辽夫放开万尼亚的手，朝着妻子和女儿猛地迈了一步，显然是要告别，但是突然绝望地把双手一摆，就跟着别人一起在浮桥上奔跑过去。

奥列格从岸上呼喊着万尼亚，但是万尼亚一点没有听见。

“走吧，趁我们还没有被撞倒，”他对克拉娃的母亲说，态度严峻而镇静，一面过去挽着她的胳膊。“我们到那个掩蔽部里去。听见吗？克拉娃，你跟着我走，听见吗？”他的声音严厉而又温柔。

在他们走进掩蔽部之前，他还注意到，高射炮旁的战士急急忙忙地把炮管上一些沉重的零件卸下，捧着它们往桥上跑，后来就把这些零件扔到水里。在整个河面上，在桥的上游和下游，都有人和牲畜泅水过去。但是这些情形万尼亚已经看不见了。

他的同伴们看不见他和瓦尔柯之后，竭力不让迎面涌来的人流把他们冲走，都向自己的大车跟前跑去。

“大家不要分散，我们应该在一起！”奥列格喊叫着，带头用自己有力的肩膀在人堆里开路，不时回过头来望着同伴们，他的眼睛气得发黄，恶狠狠的，里面燃着怒火。

整个逃难队伍都骚动起来，大有土崩瓦解之势；汽车一辆挨着一辆移动，发动机咆哮着，凡是能够挤出去的，都沿着河岸缓缓地向下游开去。

飞机来的时候，玛丽娜舅母正蹲着把柯里亚舅舅用炮兵短剑从篱笆上砍下来的木条添在火里。邬丽亚挨着她坐在草地上，想心事想出了神，因此她的脸上、嘴角旁边和秀气的鼻翼上都现出了忧郁的神情。后来她又望着谢夫卓夫：他刚给那个蓝眼睛的小姑娘吃过牛奶，现在抱着她坐在卡车踏板上，凑着她的耳朵说什么，逗得她吃吃地笑。卡车停的地方离篝火大约有三十公尺，保育院的孩子们由保育员看着在卡车周围游戏，他们的女主任坐在一旁，对一切都漠不关心。保育院的大车、彼得罗夫的大车以及柯舍沃伊的马车，

都跟别的大车排列在一起。

空袭来得非常突然，谁也来不及跑进在地上挖的防空壕，大家都是就地卧倒。邬丽亚也扑倒在地上，她听到落下的炸弹的号泣声像旋风般增大着，仿佛越往下声音越响。在同一刹那，一声可怕的巨响，像闪电似的，似乎不仅在她头顶上，而且简直就在她身上爆炸开来。

空气呼啸着在她头顶上掠过，背上洒了一阵泥土。邬丽亚听到天空发动机的吼声，接着又是这种号泣声，不过已经远了一些，她还是这样贴着地面趴着。

她记不清她是什么时候站起来的，也记不清她怎么知道应当而且可以站起来。但是她骤然看到围绕着她的这个世界，从她的灵魂深处就冲出了一声强烈的、野兽嚎叫似的哀号。

她面前已经没有新一号井的卡车，也没有谢夫卓夫和蓝眼睛的小姑娘——他们都不见了，近旁也没有他们的踪影。原来停卡车的地方，出现了一个圆圆的大弹坑，里面烧黑的泥土都翻了出来。在弹坑四周，遍地都是烧焦了的汽车零件和孩子们的断肢残骸。在离邬丽亚几步远的地方，有一截奇怪的东西，那截东西包着红头巾，粘着泥土。邬丽亚认出来这就是那个保育院女主任的上半身。她的下半截身子和她直接穿在袜子上的长统胶鞋，却不见了，根本没有了。

有一个七、八岁的男孩，头僵硬地弯向地面，好像准备蹦跳似地把手甩在背后，在原地打转，跺着一只脚嚎叫着。

邬丽亚身不由己地跑到男孩跟前，要把他抱起来，但是那孩子尖叫着在她手里抽搐起来。她把他的头扳起来一看，只见孩子的脸肿得像个大水疱，两只眼睛鼓了出来。

邬丽亚朝地上一坐，痛哭起来。

四周的一切都在奔跑着，但是邬丽亚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听不见了。直到奥列格来到她的身边，她才恢复知觉。他嘴里说着什么，他的大手抚摩着她的头发，好像打算把她搀起来，但她还是用双手捂着脸痛哭。大炮的轰鸣、炮弹的爆炸声以及远处的机枪声传到她的耳朵里，但是她对这一切都不在乎了。

突然，她听到奥列格的非常年轻响亮的声音发抖地说：

“德国人来了……”

这句话，她听进去了。她停止哭泣，突然挺直身子。一霎间她认出了站在她旁边的奥列格和所有的同伴：维克多的父亲、柯里亚舅舅、手里抱着孩子的玛丽娜，甚至还有给奥列格和他的亲属赶车的老头。只是不见了万尼亚和瓦尔柯。

所有这些人都带着异样的神情紧张地望着一边，邬丽亚也朝那边望了一望。刚才还围绕着他们的逃难队伍，现在连一点痕迹都没有了。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片开阔的、浴满阳光的灿烂的草原。上面是炽热的天空，发出白茫茫的闪光。就在这片白茫茫的大气的闪光中，有几辆漆成雨蛙色的绿色德国坦克，在阳光灿烂的草原上朝着他们开过来。

第十二章

经过实验农场上的一场激战，德军在七月十七日午后二时占领了伏罗希洛夫格勒。那边原来有南方方面军的一个集团军作掩护，但是在这次同敌人的优势兵力的战斗中被击溃了。

残余的部队沿着铁路线且战且退，几乎退到了上杜望纳雅车站，直到最后一个兵士战死在顿涅茨草原上为止。

在这以前，凡是能够或是想要从克拉斯诺顿和附近各区疏散的人们，都已经离开这儿或是往东方去了。但是在远远的别洛沃德斯克区，却有一批克拉斯诺顿高尔基学校八、九年级的学生在那里从事田间劳动；他们由于不知道实际情况和缺乏交通工具，在那里不能出来。

人民教育处委派这个学校的女教师，俄罗斯文学教员玛丽雅·安德烈耶芙娜·鲍尔茨，去把这批学生撤出来。她是顿巴斯人，精力充沛，非常熟悉当地的情形。她自己也一心要把这件事办好，因为这批学生里面还有她的女儿华丽雅。

撤出这批学生所需要的只是一辆卡车，但是玛丽雅·安德烈耶芙娜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已经什么交通工具都弄不到了。她由于种种机遇才到达国营农场，路上足足花了一天多的时间。那边农场的场长已经有好几天没有睡觉，没有刮胡子，嗓子嚷得嘶哑，正拚命设法使用一切交通工具来疏散农场的财产，但是他毅然把最后一辆卡车交给了玛丽雅·安德烈耶芙娜。玛丽雅·安德烈耶芙娜一路辛苦，再加上为她那共青团员的女儿和全体学生的命运担忧，已经弄得筋疲力尽；场长一答应给车，她就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由于感激之情而放声大哭。

前线吃紧的消息在别洛沃德斯克虽然是尽人皆知，但是在玛丽雅·安德烈耶芙娜到来之前，学生们怀着青年人特有的无忧无虑的心情，同时相信大人会及时给他们安排，因此大家的情绪还是兴奋快乐的。当许多年轻人聚集在美妙自由的大自然的环境里，再加上年轻人中间自然会发生的浪漫蒂克的友谊，这种情绪总是会形成的。

玛丽雅·安德烈耶芙娜不想过早破坏年轻人的情绪，向他们隐瞒了实际情况。但是根据她那种紧张焦急和叫他们赶紧准备回家的情形，他们都明白，一定有什么严重的、不顺遂的事情发生了。情绪马上低落下来，每个人都想到了家，想到他们今后的遭遇。

华丽雅·鲍尔茨是个早熟的姑娘，可是她的覆着金色柔毛的、晒得黑黑的手和腿还显得有些像孩子，深色睫毛下面的深灰色眼睛里，露出独立不羁的、傲慢的神色。她梳着两条金光粲然的辫子，丰满娇艳的嘴唇显出自尊心很强的样子。她在国营农场劳动期间跟他们学校里的男同学斯巧巴·萨方诺夫很要好。斯巧巴生得个子矮小，白头发，翘鼻子，满脸雀斑，一双眼睛活泼而机灵。

华丽雅是九年级的学生，斯巧巴却在八年级。如果华丽雅有什么要好的女同学，这可能成为他们友谊的障碍，但是华丽雅并没有要好的女同学；如果在男同学里面有她喜欢的人，这也可能成为他们友谊的障碍，但是她谁都不喜欢。她读书读得很多，钢琴弹得很好，她的修养使她在女同学里面显得很突出，她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因此对于年龄相仿的男孩子对她的崇拜感到很习惯。斯巧巴合她的心意并不是因为他喜欢她，而是因为他能够给她解

闷；他的确是一个机灵而又真诚的小伙子（不过这是掩盖在他的孩子气的顽皮下面），一个忠实的同伴和喜欢信口开河的人。正因为华丽雅本人不爱随便乱讲，除了自己的日记簿之外，从不把心里的秘密告诉别人，她梦想做出一番英雄的事迹（她也像大伙一样，想做女飞行员），她心目中的英雄也是一个建立丰功伟绩的人，而斯巧巴却爱信口开河，脑子里有着无穷无尽的幻想，所以她觉得他挺有意思。

华丽雅第一次鼓起勇气跟他作了一次严肃的谈话。她直截了当地问他，如果德军进了克拉斯诺顿，他打算怎么办。

她的深灰色的、不容人接近的眼睛冷冷地、非常严肃地、探究地望着他。斯巧巴平时是个无忧无虑的孩子，热爱动物学和植物学，一直想成为一个著名的科学家，从来没有想过德国人来了他要怎么办，可是这时他连想都没有想，就也是那样严肃地说，他要跟德国人进行毫不妥协的地下斗争。

“这不是空话？这是真的吗？”华丽雅冷冷地问。

“唔，怎么是空话？当然是真的！”斯巧巴不假思索地回答说。

“你发誓……”

“好，我发誓……当然可以发誓……要不然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不是共青团员吗？”白发的斯巧巴惊讶地抬起眉毛问道。他终于考虑起别人向他提出的问题来了。“那么你呢？”他好奇地问。

她把嘴巴凑近他的耳朵，狠狠地耳语说：

“我发誓—誓—誓……”

然后，她把嘴巴紧贴着他的耳朵，突然像马驹那样打了一声响鼻，几乎把他的鼓膜震破。

“你到底是一个傻瓜，斯巧巴！傻头傻脑，空话连篇！”她说完就跑了。

他们当夜就离开了。卡车的前灯遮着黑布，斑驳的光点在车子前面的草原上跳跃。在他们头上展开了辽阔黑暗的星空；草原上散发着十分清新的气息——干草、成熟的庄稼、蜂蜜和苦艾的气味；温暖强劲的空气迎面扑来，真叫人难以相信家里可能有德国人在等着他们。

卡车上挤满了年轻人。换了别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唱个通宵，朝着草原大叫大喊，高声欢笑，在隐蔽的角落里偷偷地接吻。可是现在大家都缩做一团，不想开口，只是偶尔低声随便交谈几句。不多一会，大多数坐在行李上的年轻人，都已经互相紧靠着打起盹来。卡车开过坑坑洼洼的地方，他们的脑袋就不住地晃动。

被派做值班的华丽雅和斯巧巴坐在车子最后面。斯巧巴也开始打盹了，华丽雅坐在自己的旅行袋上，一直望着前面草原上的一片黑暗里。她的丰满的嘴唇上原来是带着自尊的表情，此刻没有人看见她的时候，却露出稚气的忧郁和委屈的神情。

这一次航空学校又不收她。她不知试了多少次，可是，这批傻子，每次都不收她。生活真是不顺利。现在等待着她的是什么呢？斯巧巴——专会说空话。当然，她可以做地下工作，但是这件工作怎么做，有谁来领导？父亲——华丽雅的父亲是犹太人——会出什么事？他们的学校会发生什么事？像她这样感情丰富的人，连一个人都没有来得及爱上，而生活却已经要有这样一个结局。生活的确是不顺利啊。华丽雅没有能够在人们面前发挥自己的才能，没有能够出人头地，没有能够成名和得到人们的崇拜。她的眼睛里涌出了自尊心受到伤害的眼泪。不过这眼泪总是好的，因为她才十七岁；这是

一个个性很强的少女的无私的梦想，这种梦想并不是冷漠的、自私的。

她突然觉得背后有一种异样的声音，仿佛有一只猫儿纵身一跳，用爪子抓住了卡车的后槽板。

她连忙转过身去一看，不禁微微颤抖了一下。

也许是一个孩子，也许是一个瘦小的青年，头上戴着便帽，双手像钩子那样攀住卡车的边缘，上半身已经上来了。他抬起一只脚，打算全身爬进车厢，一面还迅速地打量着面前的一切。

他是要偷东西吗？他到底要干什么？华丽雅的手本能地动了一下，想把他推下去；接着她又改变了主意，为了避免引起惊慌，她决定叫醒斯巧巴。

但是这个孩子或是小伙子的动作非常麻利；他已经进了车子。他已经坐到华丽雅旁边，把含着笑意的眼睛凑近她的脸，还把一个指头放在嘴上。这小伙子显然不知道他碰到的是什么人。再过一会儿，他就该倒霉了，但是就在这一刹那，华丽雅已经把他仔细打量了一下。

这是个和她年龄相仿的小伙子，便帽戴在后脑上，脸很久没有洗过，但是却充满一股男孩子的高尚勇敢之气，含笑的眼睛在黑暗中发光。华丽雅仔细打量着他的这一刹那，决定了形势对他有利。

华丽雅没有动，也没有出声。她带着超然的冷淡的神气望着他；只要她不是单独的时候，她脸上总带着这种神气。

“这是什么车？”小伙子凑近她的脸，低声问道。

现在她可以看得更清楚了。他的头发有点鬈曲，大概很硬，有点向前翘的薄嘴唇显得很有力，又有点粗野——嘴唇里面似乎有些肿。

“怎么？给你预备的车子不中你的意吗？”华丽雅也冷冷地低声回答。

他笑了笑。

“我的车子在大修，可是我累得要命，所以……”他摆了摆手，好像是说：“我根本无所谓。”

“对不起，卧铺都客满了。”华丽雅说。

“我有六天六夜没有合眼，再熬个把钟点没有关系，”他并没有生她的气，亲切而坦率地说。

就在这个时候，他迅速地环视着他的视野所能看到的一切，打算看清楚黑暗中的人脸。

车身一路颠簸着，华丽雅和这个小伙子有时不得不抓住车沿。华丽雅的手有一次落到他的手上，她马上把手缩了回来。小伙子抬起头来，仔细望了望她。

“是谁睡在这儿？”他把脸凑近斯巧巴的两面摆动的白头。

“斯巧巴·萨方诺夫！”突然他不是用耳语，而是大声说道，“我现在知道这是什么车子了。是高尔基学校的吗？你们是从别洛沃德斯克区开出来的吧？”

“你怎么认识斯巧巴·萨方诺夫的？”

“我们是在峡谷的小溪旁边认识的。”

华丽雅还等着下文，可是小伙子却不往下说了。

“你们在峡谷的小溪旁边干什么？”她问。

“捉蛤蟆。”

“捉蛤蟆？”

“正是。”

“干什么用？”

“起初我以为他捉蛤蟆是为了钓鲇鱼，哪知道他是捉来解剖的！”小伙子大笑起来，对斯巧巴的怪诞行动抱着公然的嘲笑。

“后来呢？”她问。

“我劝他去钓鲇鱼，我们就在夜里去钓。我钓到两条，一条小的，斤把重，另外一条还不错；斯巧巴什么也没有钓着。”

“后来呢？”

“我劝他一清早跟我去洗澡，他听了我的话，可是从水里爬出来的时候浑身发青，他说：‘可把我冻坏了，就像一只去了毛的公鸡，耳朵里都灌满了冷水！’”小伙子的鼻子里嗤了一声，“我就教他怎样立刻使身体暖和，怎样把耳朵里的水倒出来。”

“这是怎么个弄法？”

“你只要按住一只耳朵一只脚跳，嘴里喊着：‘卡杰林娜好宝贝，把我耳朵里的水弄出来！’然后按住另外一只耳朵，再这么叫。”

“现在我明白你们是怎么交起朋友来的了。”华丽雅微微动了一下眉毛，说道。

但是他不懂得她的话里带刺。他突然变得严肃起来，朝前面的黑暗中望了一下。

“你们迟了一步。”他说。

“为什么？”

“我想，不是今天夜里，就是明天早上，德国人就要开进克拉斯诺顿。”

“德国人来了又怎么样呢？”华丽雅问。

不知她是要试探试探这个小伙子呢，还是要表示她不怕德国人——她自己也不知道她这样说有什么用意。他抬起坦率大胆的浅色眼睛望了望她，又垂下眼皮，什么也没有说。

华丽雅心里突然感到对他有一种敌意。说也奇怪，他好像也感到了，就和解地说：

“那就没有地方好逃了！”

“可是为什么要逃呢？”她故意要气气他。

但是他坚决不愿意跟她把关系弄僵，所以又和解地说：

“那倒是真的。”

其实他只要爽爽快快地说出自己的姓名来满足她的好奇，他们的关系也许马上就可以搞好。但是，他也许是没有想到这一点，也许是不愿意说出自己的姓名。

华丽雅自尊地沉默着，他却开始打起盹来，但是只要车子一跳，或是华丽雅有意无意地一动，他总抬起头来。

克拉斯诺顿近郊的建筑物在黑暗中出现了。还没到公园，在第一过道口附近，卡车就放慢速度。过道口没有人守护，拦路竿都竖立着，路灯也没有开。车子在桥板上开过，隆隆地响起来，铁轨发出铿锵的声音。

小伙子突然精神抖擞，他在腰里，在那件随随便便套在钮扣脱落的脏军便服上的短外衣底下摸了摸什么东西，一边说道：

“我可以从这里走回去……谢谢你们的好意。”

他欠起身来，华丽雅觉得他的短外衣的口袋和裤袋都是鼓鼓的，里面好像放着什么沉重的东西。

“我不愿意叫醒斯巧巴，”他又把含笑的大胆的眼睛凑近华丽雅，说，“等他醒了，请告诉他，就说谢尔盖·邱列宁请他去玩。”

“我不是邮局，也不是传呼电话。”华丽雅说。

谢尔盖·邱列宁的脸上露出了真正痛心的表情。他痛心得找不出话来回答。他的嘴唇似乎肿得更厉害了。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就跳下车，在黑暗中消失了。

华丽雅因为自己这样刺痛了他，突然感到难受起来。最遗憾的是，她对他这样说了之后，她的确已经不能再把这一切告诉斯巧巴，并且无法纠正自己对待这个来也突然、去也突然的勇敢青年的不通情理的态度了。因此，他的模样和那双大胆的、含笑的、在她出口伤人之后变得悲哀的眼睛，还有那两片仿佛肿起来的薄嘴唇，就牢牢地铭刻在她心上。

全城都沉浸在黑暗中。任何地方——无论在窗上，在矿井的放行亭里，在过道口——都看不见一线灯光。空气凉爽起来，可以明显地闻到从还在冒烟的矿井里飘出来的微燃的煤块的气味。街上看不到一个人影，特别感到异样的是：听不到来自矿区和铁路支线上的惯常的劳动的噪音。只有狗在吠叫。

谢辽萨①·邱列宁用猫儿那样毫无声息的脚步迅速地顺着铁路支线走近平时做市场的大片空地。他绕过空地，溜过李方查的像蜂巢似的粘在一块的、周围是樱桃园的黑魆魆的房子，悄悄地走到自家的房子前面。在周围那些没有刷白的、草顶土墙的小棚子的衬托下，这所房子显得很白。

① 谢辽萨是谢尔盖的小名。

他随手轻轻地掩上门，四下张望了一下，就溜进了小贮藏室；几秒钟后又拿着铲子出来。虽然是一片漆黑，可是他在自己家里是熟门熟路，所以不多一会儿已经到了菜园里，到了沿着篱笆生长的一排黑魆魆的槐树丛旁边。

他在两棵槐树中间挖了一个相当深的坑——土很松——从裤袋和上衣口袋里掏出几个小型手榴弹和两支装着子弹的勃朗宁手枪，放在坑底。这些东西每一件都分别用布包着，他也仍旧原封不动地把它们放下去。后来他用土把坑填满，又用手把土弄平，等早上太阳出来，就可以把土晒干，消灭他工作的痕迹。他掀起衣服的下摆仔细地把铲子揩干净，回到院子里把铲子放好，然后再去轻轻地敲门。

通过道的上房的门闩响了一下，母亲——根据沉重的脚步声他听出来是她——在泥地上曳着光脚，走近门口。

“谁？”她的还带睡意的声音惊惶地问道。

“开门。”他轻声说。

“我的天哪！”母亲激动地轻声说。可以听到她激动得手直哆嗦，摸不到门钩。最后门总算打开了。

谢辽萨跨进门槛，在黑暗中闻到母亲的刚刚醒来的身上发出的熟悉的暖气，就抱住这个亲爱的胖大的身子，把头贴在她的肩上。他们就这样默默地搂抱着在过道里站了一会。

“你跑到哪儿去啦？我们以为你不是撤退就是被打死了。大家都回来了，可就是没有你。至少也该让人捎个口信，说你怎么样了。”母亲低声埋怨说。

几个星期以前，像本州其他各区一样，谢辽萨跟许多妇女和少年也从克拉斯诺顿被派到通往伏罗希洛夫格勒的要冲去挖壕沟和建筑防御工事。

“我在伏罗希洛夫格勒耽搁了一阵。”他用平常的声音说。

“别嚷……你要把爷爷吵醒了。”母亲生气地说。她管自己的丈夫，谢辽萨的父亲，叫爷爷。他们有十一个孩子，已经有了几个像谢辽萨那么大的孙子。“ 他会揍你一顿！…… ”

谢辽萨把这种责备只当耳边风：他知道父亲已经再也不会揍他。父亲是一个老采煤工，有一次，在阿尔马兹车站的安年矿山，被一辆脱链的煤车险些撞死。当时老头的身体特别强壮，总算保住了一条性命，后来还干了不少地面工作，但是近几年来他的身子完全弯了，几乎不能行动，甚至坐着的时候都要在胳肢窝下撑一根特制的、钉着软皮垫的拐杖，因为腰杆已经完全支持不住他的身体了。

“你想吃东西吗？ ”母亲问。

“想是想，可是没有劲儿，只想睡觉。”

谢辽萨踮起脚尖穿过父亲在打鼾的房间，走进上房，他的两个姐姐——带着一岁半的孩子、丈夫在前线的达莎和他心爱的小姐姐娜佳——睡在里面。

除了这两个姐姐，在克拉斯诺顿还有一个姐姐菲尼亚。她带着孩子们单独住，她的丈夫也在前线。至于迦夫利拉·彼得罗维奇和亚力山德拉·瓦里耶芙娜其余的孩子们，都已经分散到全国各地，独立生活了。

谢辽萨走进两个姐姐睡的这间闷热的上房，摸到床前，脱下衣服随便一扔，身上只剩一条裤衩，也不管已经整整一个星期没有洗澡，就躺在被子上面。

母亲在泥地上曳着光脚走进上房，一只手摸到他的粗硬的鬈发，另一只手就把一大块面包头塞到他嘴边。面包是家里烘的，新鲜、喷香。他抓住面包，很快地吻了吻母亲的手，也顾不得疲倦，就大口大口地嚼着这块好吃的小麦面包，锐利的眼睛兴奋地朝黑暗中望着。

卡车上的这个姑娘是多么不平凡啊 !那样的性格 !还有那样的眼睛 !……但是她不喜欢他，这是事实。要是她能知道他这几天的经历和体验就好啦！要是可以把这件事哪怕跟世界上的一个人谈一谈也好！但是到了家里是多么好啊，躺在自己的床上，在舒适的上房里，跟亲人在一起，嚼着母亲亲手烘的这块喷香的小麦面包，又是多么美啊！似乎，他一倒在床上，就会睡得像死人一样，至少睡它两天两夜，但是如果不让一个人知道他的经历，他是睡不着的。要是那个梳两条辫子的姑娘知道就好啦！不，他什么都没有告诉她是对的。天晓得这是谁家的姑娘，是什么样的人！或许，他明天可以把这一切都告诉斯巧巴，顺便向他打听那个姑娘是谁。但是斯巧巴是个快嘴。不，他只能把这一切告诉维佳·鲁基扬庆柯，要是他没有走的话。但是干吗要等到明天，现在不就可以把一切都讲给娜佳姐姐听吗！

谢辽萨轻手轻脚地下了床，手里拿着面包到了姐姐床边。

“娜佳……娜佳…… ”他坐在姐姐床边，用手指推推她的肩膀，轻轻地喊道。

“啊？……什么事？…… ”她半睡半醒，吃惊地问。

“嘘…… ”他把自己的没有洗过的手指放在她的嘴上。

但是她已经认出了他，急忙爬起来，用温暖的光膀子搂住他，在他的耳朵上吻了一下。

“谢辽萨……你还活着……亲爱的小弟弟……你还活着…… ”她幸福地喃喃说着。看不出她的脸，但是谢辽萨想象她的脸上一定带着幸福的微笑，

小小的颧骨睡得红扑扑的。

“娜佳！我从十三号起就没有睡过觉，从十三号早上到今天傍晚一直都在作战。”他激动地说，一边在黑暗中嚼着面包。

“啊，你……”娜佳轻声叫起来，她摸摸他的手，穿着睡衣就盘腿坐在床上。

“我们的人全部牺牲了，可是我跑出来了……我走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全部牺牲，还有十五个人，可是上校说：‘你走吧，你何必把一条命送掉。’他自己已经浑身是伤，脸上、手上、腿上、脊梁上，全都包扎着，全都是血。他说：‘我们反正是要牺牲的，可是你何必呢？’所以我就走了……我想，现在他们已经全部牺牲了。”

“啊呀，你……”娜佳惊骇地轻声说。

“在离开之前，我拿了一把工兵用的铲子，把死人身上的武器收集拢来，送到上杜望纳雅后面的小壕沟里，那地方有两个土墩，左面有一座小树林，很容易认。我收集了步枪、手榴弹、手枪、子弹，把这些都埋好了才离开。上校吻了我，对我说：‘你记住我的名字——索莫夫。索莫夫，尼古拉·巴夫洛维奇。等德国人走了，或是你见着我们的人的时候，你写封信给高尔基城的军事委员部，让他们通知我的家属或是有关的人，就说我已经光荣牺牲……’我说……”

谢辽萨不作声了，好一会工夫他抑制住呼吸，吃着被泪水沾湿弄咸的面包。

“啊，你……”娜佳啜泣着。

是的，她的小弟弟一定忍受了很大的痛苦。她已经不记得，他在七岁以后什么时候曾哭过——他是个硬骨头。

“你怎么会跟他们在一块的？”她问。

“就是这么碰上的，”他又兴奋起来，连脚一齐上了姐姐的床。“我们的防御工事刚要筑好，我们的部队就已经撤退过来，在那儿防守。全部克拉斯诺顿人都回家了，我就请求一个上尉连长把我编进连里。他说：‘没有团长批准我做不了主。’我说：‘帮帮忙吧。’我就拚命地请求，还有一个司务长支持我。战士们都在笑，可是他说什么也不答应。我们在争论的时候，德国人开始炮轰了。我跑进了战士们的掩蔽部，他们爱惜我，一定要等天黑才放我走。等到夜里他们叫我离开，可是我只爬出了掩蔽部，仍旧趴在壕沟后面。早上德国人来进攻，我又回到壕沟里，从一个被打死的战士身上取下步枪，跟大伙一起射击起来。有好几个昼夜，我们不断击退进攻，已经没有人赶我走了。后来上校也认出了我，他说：‘我们是必死无疑，否则的话，我们一定把你编进队伍，可是，我舍不得你，你还应该活下去。’后来他笑着说：‘你就把自己算做个游击队员吧。’这样，我就跟他们一起，差不多撤退到上杜望纳雅。我看见弗里茨①，就像现在看见你这么近，”他压低声音，咝咝地说。“我亲手打死了两个……也许还不止，不过这两个——我亲眼看见是我打死的。”他撇了撇薄薄的嘴唇说，“现在，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被我看见，我就要杀死他们，我就要杀了这批坏蛋。

你记住我的话吧……”

①弗里茨是德国人的普通名字，常用来代表德国人。

娜佳知道，谢辽萨说的是真话：他杀死了两个弗里茨，而且还要杀死他们。

“你会送命的。”她害怕地说。

“情愿死，也比舔他们的靴子或是苟且偷生强。”

“唉，我们真不知道会碰到什么事！”娜佳绝望地说。她更清晰地想象着，明天，也许就在今夜，会有什么灾祸等着他们。“我们医院里有一百多个不能行动的伤员。还有一位医生，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陪他们留下来。我们每次走过他们身边的时候心里老是担心，生怕德国人会弄死他们！”

她忧愁地说。

“应该让居民分别把他们接到自己家里。你们做事怎么这样？”谢辽萨激动起来。

“居民！现在谁知道谁在打什么主意？听说，在我们‘上海’，有一个来历不明的人躲在伊格纳特·福明家里，谁知道他是个什么人？也许是德国人派来，先来摸底的。福明藏的人反正好不了。”

福明是一个矿工，因为工作出色曾经多次得奖，并且在报上受过表扬。他是在三十年代初在这儿村里出现的，那时像在全顿巴斯一样，在克拉斯诺顿也有许多陌生人出现，并且在“上海”安家落户。关于福明有着各种不同的传说。娜佳现在说的就是这一点。

谢辽萨打了个呵欠。现在，他把话都讲了出来，面包也吃完了，他觉得自己是完全到家了，他想睡了。

“你躺下吧，娜佳……”

“现在我睡不着了。”

“我可睡得着。”谢辽萨说着就爬回自己的床上。

他的头刚靠到枕头，他眼前就浮现出卡车上那个姑娘的眼睛。“说什么我也要找到你。”谢辽萨喃喃地说，他脸上露出了微笑，接着，他眼前的一切和他心里的一切都消逝了。

第十三章

读者，如果你有一颗充满刚毅、大胆和渴望丰功伟绩的鹰之心，但是你自己还是个赤着脚乱跑、脚上都是裂口的孩子，人们对你的心灵所向往的一切一切都还不了解，那你打算怎样行动呢？

谢辽萨·邱列宁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他就像草原里的草那样生长起来。他的父亲是图拉人，从小就到顿巴斯来谋生。在四十年的矿工生活中，他对自己这行职业养成了一种天真、自尊、专断的自豪感；无论在于哪一种职业的人身上，这种特点都没有像在水手和矿工身上那样显著。甚至在他根本不做工人以后，他，迦夫利拉·彼得罗维奇，仍旧以为自己是全家最重要的人。每天清早他把全家都叫醒，因为照矿工的老习惯，天不亮他就醒了，可是他一个人又感到寂寞。不过他即使不感到寂寞，也照样会把大家吵醒，因为他一清早就咳得上气不接下气。他一醒就要咳上一个多钟头。他咳起来吁吁直喘，又是吐痰，又是清嗓子，胸口好像一只坏了的风琴似的，发出可怕的、嘶哑的咝咝声和嘘嘘声。

然后他就整天坐着，胳肢窝下面撑着叉头上包皮的拐杖。他瘦得只剩

皮包骨头；隆起的长鼻子以前大而多肉，现在却变得又尖又瘦，简直可以用来裁纸；凹陷的面颊上长满粗硬的灰白胡茬；两撇笔直的胡子威风凛凛，这两撇胡子在鼻孔下面还保持原有的浓密，越到梢上越稀，最后只剩一两根柔韧的毛，像两根长矛朝两边翘着；两道浓眉下面是一双颜色变淡的、目光锐利的眼睛。他就这样撑着拐杖有时坐在自己的床上，有时坐在土房的门槛上，或是坐在棚子旁边的木墩上，严厉地、短促地、威风凛凛地发号施令，教训大家，有时候一阵咳嗽，咳得全“上海”都能听到他的嘶哑的连咳带喘的声音。

要是你不到老年就丧失了一大半劳动力，后来又完全成了残废，你倒来试试看把三个男孩八个姑娘（一共十一个）抚养成人，让他们学会一技之长，让他们出外工作！

多亏他的妻子亚力山德拉·瓦西里耶芙娜，要不然迦夫利拉·彼得罗维奇恐怕也未必能够挑起这副重担。这个奥廖尔省的农家妇女，身强力壮，在罗斯①被称做“厉害婆娘”的那种妇女，是一个真正的城总管夫人玛尔法②。直到现在她还是硬朗矍铄，不知道什么是疾病。她虽然不识字，不会写，但是，如果需要的话，她能够发威，又能够耍滑；能够沉默，又能够说起来滔滔不绝；能够凶狠；又能够和颜悦色；能够逢迎人意，随机应变，又能够讽刺挖苦；要是有人因为缺乏经验而和她争吵，那很快就可以领教她的厉害。①罗斯是俄罗斯的古名。

②玛尔法（十五世纪后半期），诺夫戈罗德城总管波列茨基之妻，丈夫死后，她领导了诺夫戈罗德的反动贵族集团，反对把俄罗斯的土地归并莫斯科统一管辖。此处指亚力山德拉能干，在家总管一切。

现在十个大孩子都已经参加工作，最小的谢辽萨虽然还在念书，可是像草原里的草那样成长起来：他从来没有过自己的衣服和鞋子，都是穿哥哥们的旧衣服，在他上身之前，不知改过多少遍，补过多少次；他受惯了风吹雨打、烈日严寒，他脚底板的皮粗糙得像骆驼皮，不论生活给他带来怎样的创伤，到了他身上就像到了童话中的勇士身上那样，转眼就会痊愈。

父亲对他虽然比对别的孩子发出更多的嘶哑的斥骂声，可是在所有的孩子里，也更疼爱他。

“简直是个不要命的，啊？”他抚摩着他的样子吓人的胡子，得意地说，“是吗，舒尔卡？”舒尔卡就是他那六十岁的老伴亚力山德拉·瓦西里耶芙娜。“请瞧瞧他，是吗？天不怕，地不怕！就跟我小时候一模一样，啊？”说着他又咳起来，几乎喘个半死。

你有着一颗鹰之心，但是你年纪还小，你穿得很破旧，脚上都裂了口子。那么，亲爱的读者，你打算怎样行动呢？当然罗，你首先是要建立功勋。但是谁在童年不梦想建立功勋呢？可是建立功勋并不是总能成功的。

如果你是个四年级的学生，你在上算术课的时候从课桌下面放出一群麻雀，这并不能给你带来荣誉。校长请来了家长，那就是把六十岁的舒尔卡妈妈请来，这已经不知是第几次了！爷爷——由于舒尔卡妈妈叫开了头，所有的孩子都管父亲叫爷爷——会气呼呼地喘着，恨不得请你吃一顿耳刮子，但是他够不着你，他气得只能用拐杖捶着地，他压根没法把这根拐杖打到你身上，因为它还要支撑着他那干瘪的身体呢。舒尔卡妈妈从学校回来之后，可结结实实地给了你一顿耳光，让你的腮帮子和耳朵要火辣辣地痛上几天——随着年纪的增加，舒尔卡妈妈的手反而越来越重。

那么同学们呢？同学们有什么！难怪俗话说，荣誉只是过眼云烟。到明天，你放麻雀的功勋就已经被忘得一干二净了。

夏天放了暑假，你可以把你的皮肤晒得比别人都黑，潜水和游泳比别人都高明，双手在沉木底下捉起梭鱼来比别人都快。你要是老远看见有一群姑娘在岸上行走，就拚命地追上去，到了她们跟前你纵身跳下断崖，像一只黑燕子掠过水面，钻到水里。姑娘们装出毫不在乎的样子，只是好奇地等待着，看你几时钻出水面，那时你在水底略微褪下裤衩，突然撅着你的白里透红的屁股（你身上唯一没有晒黑的地方）浮了上来。

你看到姑娘们闪动着粉红的脚后跟，衣服迎风飘拂，好像被风刮走似的从岸上逃走，一边用手捂着嘴吃吃笑个不停，你会体验到霎时的满意。跟你一起在沙滩上晒太阳的同年的孩子们感到欣喜若狂，你可以满不在乎。你随时都可以获得小男孩的敬仰；他们会成群结队地跟着你，模仿你的一举一动，你每说一句话或者动一下指头，他们都会服从。罗马恺撒①的时代早已过去，但是小孩子们对你却崇拜得五体投地。

①恺撒（公元前100—前44年），罗马统帅。

当然，你对这些还不满足。于是，在一个和你生活中其他的日子似乎毫无区别的日子里，你突然从二楼教室的窗口如飞一般，跳到下面的院子里，那时候是休息时间，全校的学生都在院子里做着普通的、无害的游戏。你在跳下来的时候体验到刹那间的、彻骨的喜悦——由于跳跃本身，也由于从一年级到十年级的女生们的尖叫；这野性的尖叫里充满恐怖，同时也希望向全世界宣布她们的存在。但是其余的一切只是给你带来失望和痛苦。

跟校长的谈话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显然已经闹到要把你从学校开除出去了。你自己知道犯了过错，因而不得不对校长耍赖。于是校长第一次亲自到“上海”的土房里来进行家访。

“我想了解一下这个孩子的生活情况。最后，我想了解这一切的原因。”校长彬彬有礼地、意味深长地说。在他的声调里含有对家长的责备。

家长——母亲刚从炉灶里取出锅子，满手黑煤烟，身上却连揩手的围裙都没有戴，急得不知道把两只柔软滚圆的手往哪里放才好；父亲狼狈到了极点，他哑口无言，试图拄着拐杖在校长面前站起来。家长负疚地望着校长，仿佛真的一切都是他们的过错。

校长走了，第一次谁也不来骂你，似乎大家都不愿意理睬你。“爷爷”坐在那里，也不瞅你，只是喉咙里偶尔发出哼哼的声音，他的胡子一点也不威风，而显得没精打采，这是一个饱受生活折磨的人的胡子。母亲一直满屋乱转，脚底板在泥地上拖曳着，一会儿在这里，一会儿在那里弄得乒乒乓乓地响。突然你看见她朝俄罗斯式炉灶的炉门弯下腰来，偷偷地用她那抹了煤烟的、老年人的滚圆好看的手擦去眼泪。父亲和母亲的整个样子似乎都在对你说：“你仔细地看看我们，仔细看看我们，看看我们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于是你第一次发觉，你年老的爹娘已经很久没有节日穿的衣服了。几乎在他们的整整一生中，他们都没有跟孩子们同桌吃过饭，他们总是单独吃，免得孩子们看见他们除了吃黑面包、土豆和荞麦粥之外，什么都没有。他们这样做，无非是为了把孩子们一个个抚养成人，而现在无非是为了让你这个家里最小的孩子，能够受教育，长大成人。

母亲的眼泪刺痛了你的心。你初次觉得父亲的脸含有深意，面色忧伤。他的咳嗽和喘息也毫不可笑，而是可悲的。

姐姐们在织毛线，不是这个姐姐，就是那个姐姐，突然抬起眼来瞟你一下，她们的鼻翼就由于生气和蔑视而颤抖起来。于是你就用粗暴的态度对待父母和姐姐们，可是到了夜里你却不能入睡，受辱的感觉和意识到自己犯罪的感觉同时折磨着你，两行吝啬的泪水滚到你的小小的硬颧骨上，你只好用那没有洗过的手掌悄悄地把它擦去。

经过这一夜，你显得成熟了一些。

这几天日子很不好过，你受到大家无言的谴责，可是在你那入迷的眼睛前面，却展露出整个充满不可思议的、神话般的丰功伟绩的世界。

人们在海底游了两万里①，发现了新的陆地；他们漂流到荒岛上，用自己的双手重新创造一切；他们攀登世界最高峰；人们甚至登上月球；他们在海洋里跟狂风暴雨搏斗，沿着桅盘和桅顶横衍攀上被海风吹得摇晃的桅杆；他们把一桶桶的鱼油倒进惊涛骇浪之中②，然后驾着海船滑过尖礁；人们乘着木筏渡海，口渴难忍，嘴里用焦干的肿胀的舌头转动着子弹③；他们忍受着沙漠里干燥的热风，他们跟蟒蛇、豹子、鳄鱼、猛狮、巨象搏斗，并且战胜它们。人们建立这样的功勋是为了谋利，或是为了过更好的生活，或是出于热爱冒险，或是由于同志关系和忠实的友情，或是为了营救陷入不幸的心爱的姑娘，否则就是完全出于大公无私——为了人类的利益，为了祖国的光荣，为了使科学的光辉能够永远照耀大地：利文斯敦④、阿蒙森⑤、谢多夫⑥、涅韦尔斯科伊⑦，就是这样的人。

①指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1828—1905）的科学幻想小说《海底两万里》，这一段所讲的大都是这部小说里的情节。

②传说把鱼油倒进海里可以使波涛暂时平息。

③传说在沙漠或酷暑中旅行，常用子弹或水晶卵石含在口中吮吸，借以解渴。

④利文斯敦（1813—1873），英国旅行家、传教士，曾在中非和南非长期旅行考察。

⑤阿蒙森（1872—1928），挪威极地旅行家和考察家，一九一一年首抵南极，一九二六年曾赴北极探险。

⑥谢多夫（1877—1914），俄国北极探险家。

⑦涅韦尔斯科伊（1813—1876），俄国海军上将，远东考察家。

还有人在战争中建立了多么辉煌的战功啊！人们打了几千年的仗，有成千上万的人在战争中使自己的名字永垂青史。你生长在这种没有战争的时代是你的幸运。在你居住的地区，为了使你生活得幸福而抛却头颅的阵亡将士公墓上，已经草莽丛生，可是那些伟大年代的统帅的威名直到今天还响震四方。在夜深人静，你忘记了时间、神游于他们的传记的时候，在你的灵魂里鸣响着像军歌般雄壮的鼓舞人心的声音。你一次又一次地去阅读他们的传记，你要把这些人物的面貌铭刻在心里，于是就描画他们的肖像——不，这又何必骗人，你是隔着玻璃把这些肖像在纸上勾描下来，然后按照你的理解用黑色软铅笔给它们描上暗影，为了把肖像画得更生动有力，你拚命地吮舔铅笔，等画好之后，你的舌头全成了黑的，甚至用浮石擦都擦不干净。这些画像至今还挂在你的床头。

这些人的事业和功勋保证了你这一代的生活，并且使人们永志不忘。其实，这些人也是像你一样的普通人。米哈伊尔·伏龙芝、克里姆·伏罗希洛夫、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①、谢尔盖·基洛夫②、谢尔盖·邱列宁……

是啊，如果他来得及表现自己，他这个普通共青团员的名字也是可以和这些名字并列的。这些人的生活的确是太吸引人，太不平凡了！他们饱尝沙皇统治下地下工作的滋味。他们被追踪，被关进监狱，被流放到北方和西伯利亚，但是他们一再逃脱，重新加入战斗。奥尔忠尼启则从流放中逃出来。伏龙芝两次从流放中逃出来。斯大林几次从流放中逃出来。追随他们的起初只有几个人，后来是几百人，再后来有几十万，再后来就有几百万了。　　①奥尔忠尼启则（1886—1937），一九〇三年参加共产党，为推翻沙皇专制政府进行了英勇斗争；十月革命后担任苏联党、政重要领导工作。

②基洛夫（1886—1934），一九〇四年参加共产党，为推翻沙皇专制政府进行了英勇斗争；十月革命后担任苏联党、政重要领导工作。

谢辽萨出生的时候，已经无须去做地下工作。他不必从什么地方逃走，也没有地方可逃。他从学校二楼的窗口跳了下来，他现在完全明白，这件事简直是愚蠢的。而且生活中追随他的只有一个维佳·鲁基扬庆柯。

但是不应该失去希望。封锁着辽阔的北冰洋的有力的冰块压碎了“契留斯金号”①船身。船身破裂的声音在那漫漫的长夜是可怕的，它使举国震动。但是船上的人们没有遇难，他们下了船，移住冰上。全世界都注视着他们能否得救。他们得救了。世界上有的是具有充满毅力的鹰之心的人。这也是一些像你一样的普通人。他们驾着飞机，穿过风雪冒着严寒赶到遇险的人那里，把那些人绑在机翼上救出来。他们成了第一批的“苏联英雄”。

契卡洛夫！他也是像你一样的普通人，但他的名字却像号召似的震动了全世界。飞越北极直抵美洲，这是人类的梦想！契卡洛夫。葛罗莫夫。还有冰原上的巴巴宁②探险队呢？生活就这样进行着，充满了幻想和日常的劳动。　　①苏联轮船，一九三三至三四年间完成了由摩尔曼斯克到白令海峡的直接航行。一九三四年二月，船被冰挤毁。苏联政府教出了全体船员。

②契卡洛夫，葛罗莫夫是三十年代苏联著名飞行家；巴巴宁是三十年代苏联北极探险家。

在全苏联以及在克拉斯诺顿本城，都有着不少像你一样平凡的、但是因为建立功勋而享有荣誉的人，——这样的事，在以前的书里是不会记载的。在顿巴斯，而且不仅在顿巴斯，尼基达·伊佐托夫和斯达哈诺夫的名字家喻户晓。每个少先队员都说得出，巴莎·安盖林娜是怎样的人，克里沃诺斯和马卡尔·马扎依①是怎样的人。人人都尊重他们。父亲总要请别人把报上有关这些人的记载读给他听，过后他就会使人莫名其妙地好半天发出呼哧呼哧的声音，显然是因为自己老了，被煤车撞成了残废，内心感到痛苦。是的，他迦夫利拉·邱列宁，这一辈子在自己的双肩上承担的工作真不少。谢辽萨懂得，“爷爷”的心情是多么沉重，因为他现在已经不能站在这些人的行列里了。　　①伊佐托夫、安盖林娜、克里沃诺斯、马扎依是三十年代苏联煤矿、农业、运输、炼钢部门的技术革新者。

这些人的荣誉，是真正的荣誉。但是谢辽萨年纪还小，他应当念书。将来，等他成人之后，这一切有一天会降临到他身上。但是，要建立像契卡洛夫或者葛罗莫夫那样的功勋，他已经完全成熟了——他心里感觉到，他已经完全成熟，足以建立这样的功勋。糟糕的是，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明白这一点，除了他就没有第二个人。在全人类里面，只有他一个人有着这样的感觉。

战争爆发时他就是这样。他三番五次地打算报名进军事专门学校，—

—是的，他应该成为一个飞行员。可是人家不收他。

所有的学生都到地里去干活，他因为伤心到极点，却到矿井去工作。过了两星期，他已经能够到工作面上干活，采起煤来并不比大人逊色。

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在别人的心目中已经得到怎样的好评。他从吊笼里出来的时候浑身乌黑，漆黑的脸上只有一双浅色的眼睛和洁白的小牙在闪闪发亮。他跟大人们一起，他是那么神气十足地、摇摇摆摆地走去洗淋浴，他像父亲一样打着响鼻，发出咯咯的声音，然后不慌不忙地赤脚走回家去，因为他的鞋是公家的。

他回家很晚，大家都已经吃过饭，给他单另留了饭菜。他已经是成年人、男子汉和工人了。

舒尔卡妈妈的圆滚滚的双手垫着抹布，从炉灶里取出盛菜汤的铁锅，直接从锅子里给他倒了满满一碗。菜汤直冒热气，家里烤的小麦面包从来还没有这样好吃过。父亲从浓眉下面望着儿子，颜色变淡的锐利的眼睛闪着光，胡子抖动着。他没有发出呼哧呼哧的声音，也不咳嗽，他平静地跟儿子谈话，就像跟一个工人谈话一样。父亲对什么都感兴趣：矿井里的工作怎么样？谁开采了多少？工具啦，工作服啦，父亲样样都要问。他讲到水平、平巷、采煤工作面、工作面和小暗井，就像讲自己家里的房间、角落和贮藏室一样。老头的确在区里差不多所有的矿井里都干过；他不能干活之后，就通过同伴了解各种情况。他知道是在哪个方向进行开采和开采的进度，他能够用瘦长的手指一面在空中描画，一面向任何人解释开采的位置以及在地下进行的一切。

冬天，谢辽萨一放学，一点东西也不吃，就直接跑去找他的朋友——炮兵、工兵、或是地雷工兵，或是飞行员。到晚上十一点多钟，眼皮快粘到一块才回来温课，可是早上五点钟已经到了靶场上，在那里，他的朋友，值班的中士，就教他和战士们一起用步枪或是轻机枪射击。的确，他无论是用步枪、那干式手枪、毛瑟枪、特特式手枪、杰克佳辽夫式手枪、马克西姆枪、或是什帕金式冲锋枪射击，都不比任何战士逊色。他会扔手榴弹和燃烧瓶，会挖壕沟，自己会装地雷、埋地雷和清除地雷。他知道世界各国飞机的构造，他能取出空投炸弹里的炸药。和他一起做这一切的还有维佳·鲁基扬庆柯。他无论到哪里都拖着维佳；维佳崇拜他，大致就像谢辽萨本人崇拜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或是谢尔盖·基洛夫一样。

今年春天他又作了一次非常大胆的尝试：他已经不是要进专为青年办的，而是要进正式的、成人的航空学校。他又碰了壁。人家对他说，他太年轻，明年再来吧。

是的，这是一次可怕的失败——本来要进航空学校，结果却到伏罗希洛夫格勒前面构筑防御工事。但是他已经拿定主意，决不回家。

为了编入部队，他不知用了多少心机，耍了多少手腕啊！他用过的计策和受到的屈辱，他连百分之一都没有告诉娜佳。

现在他才知道了什么是战斗，什么是死亡，什么是恐惧。

谢辽萨睡得非常熟，父亲清早起来咳嗽，也没有把他吵醒。他醒的时候，太阳已经高悬；上房的百叶窗关着，但是根据窗缝里射进来的一道道金光照在泥地上和家具上面的情形，他就可以知道是什么时候。他一醒，马上就知道德国人还没有来。

他到院子里去洗脸，看见坐在台阶上的“爷爷”和离“爷爷”不远的

维佳·鲁基扬庆柯。母亲已经到了菜园呈，姐姐们早已上班去了。

“啊哈！你好，战士！安尼卡①！喀—喀—喀……”“爷爷”向他表示欢迎，又咳嗽起来。“你还活着吗？如今这种世道，这是重要的。嘿一嘿！你的好朋友天一亮就来了，等你起床。”“爷爷”非常亲切地朝维佳那边动了动胡子，维佳正一动不动，顺从而严肃地抬起温柔的深色眼睛望着他的胆大包天的朋友，朋友的颧骨很小的脸上虽然犹有睡意，但是已经充满了要活动的渴望。“你的好朋友真不赖，”“爷爷”接下去说。“每天早上，天蒙蒙亮他就来了：‘谢辽萨来了吗？谢辽萨回来了吗？’他心里……喀—喀……只有个谢辽萨！”“爷爷”满意地说。

①安尼卡是俄国古代民谣中的好吹牛的大力士。

朋友的忠实就这样从“爷爷”嘴里得到了证实。

他们俩曾经在伏罗希洛夫格勒附近挖过工事，对朋友绝对服从的维佳，本来想跟他一起留下参军。但是谢辽萨硬逼他回家，这并不是因为他怜惜维佳，更不是因为他怜惜维佳的父母，而是因为他深信他们不仅不可能一同参军，而且有维佳在场，反而会成为他谢辽萨参军的障碍。维佳受了他的专横的同伴的欺侮，十分伤心，只好离开。他不仅被迫离开，而且被迫起誓，叫他无论对自己的父母或是对谢辽萨的父母，总之，对世界上任何人都不许泄露谢辽萨的计划：谢辽萨的自尊心要求他这样做，以防万一失败。

听了“爷爷”的话，足见维佳对朋友是守信用的。

谢辽萨和维佳坐在土房背后一条污浊的、满生芦苇的小溪边上，小溪那边是一片牧场，牧场后面有一幢孤零零的大房子，这是建成不久、还没有启用的矿工浴室。他们坐在峡谷边上，抽着烟，交换着新闻。

他们俩都在伏罗希洛夫学校念书；他们的同学里面，有托里亚·奥尔洛夫、沃洛佳·奥西摩兴和刘勃卡·谢夫卓娃还留在城里。据维佳说，刘勃卡·谢夫卓娃现在的生活方式跟平时完全不同：她什么地方都不去，什么地方都看不到她。刘勃卡·谢夫卓娃也是伏罗希洛夫学校的学生，但是她只念完了七年级，早在战前就离开学校，因为她决定要当演员，常在区里的戏院和俱乐部里表演歌唱和舞蹈。刘勃卡留在城里的消息，使谢辽萨听了特别高兴，因为刘勃卡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姑娘，跟他完全一样。刘勃卡·谢夫卓娃就是穿了裙子的谢辽萨·邱列宁。

维佳还凑着谢辽萨的耳朵，把谢辽萨已经知道的消息告诉他：福明家里藏着一个陌生人，所有住在“上海”的人都在大伤脑筋，猜测这是个什么人，同时又怕这个人。还有，在“干草场”区过去做弹药库的地方，在完全敞着的地窖里，留下了几十个燃烧瓶，大概是由于走得匆忙扔下的。

维佳胆怯地暗示，要是把这些瓶子藏起来倒不错，但是谢辽萨忽然想起了什么事，脸色变得严峻起来，说他们应该赶紧去陆军医院。

第十四章

自从战线接近顿巴斯，克拉斯诺顿出现了第一批伤员之后，娜佳·邱列宁娜就志愿参加护士训练班，现在她已经在陆军医院做了一年多的护士

长。市立医院把下面一层全部拨给陆军医院使用。

陆军医院的全体工作人员，除了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医生之外，已经撤退了好几天。市立医院以主任医师为首的大部分医务人员，也已经到东方去了，但是医院的生活仍旧照原来的制度进行。谢辽萨和维佳一到接待室，就被值班的助理护士挡住，叫他们用湿布把脚揩干净，在门厅里等她去找娜佳，这使他们对这个机关立刻充满敬意。

过了一会，助理护士陪着娜佳走出来。但这似乎已经不是谢辽萨昨夜在她床上跟她谈话的娜佳：在娜佳的高颧骨、细眉毛描画过的脸上，有着一种新的、非常严峻而紧张的表情，跟助理护士的慈祥、和蔼而有皱纹的脸上的表情一样。

“娜佳！”谢辽萨手里揉着帽子，轻轻地说道，他不知为什么在姐姐面前胆怯起来。

“娜佳，得把弟兄们救出来，你应该明白……我和维佳可以挨家挨户去问，你去告诉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吧。”

娜佳沉吟着默默对谢辽萨望了一会，然后不信任地摇摇头。

“你去，去把医生叫出来，要不就把我们带进去！”谢辽萨把脸一板，说道。

“鲁莎，拿罩衣给他们。”娜佳说。

助理护士从一只白漆长衣橱里取出两件白罩衣，还照例给他们拎着，让他们便于伸进衣袖。

“这孩子说的倒是实在话，”鲁莎大婶突然开口说，她抬起那双老来变得宁静慈祥的眼睛瞅了瞅娜佳，她的柔软的瘪嘴好像嚼东西似地、很快地磨动着。“人家肯收留的。我自己就可以收留一个。谁不心疼这些孩子？我是个孤老太婆，儿子都上了前线，只有一个小女儿跟着我。我们住在新村。要是德国人来了，我就说是我的儿子。应该事先关照大家，让他们说是亲戚。”

“你不知道他们这批德国人。”娜佳说。

“不错，德国人我是不知道，可是自己人我是知道的，”鲁莎大婶很快地动着嘴唇，胸有成竹地说，“我可以告诉你们，村里谁是好人。”

娜佳领着孩子们在明亮的走廊里走过去，走廊的窗户对着城那边。他们每次走过开着的病房门口，就有一股已经溃烂的经久未愈的伤口和脏被单的气味扑鼻而来，那股气味热烘烘的，非常难闻，连药物的气味都盖不过它。他们突然觉得，从医院的窗口望出去，浴满阳光的故乡的城市竟是这样的明亮、熟悉、宁静、舒适。

留在医院的伤员都不能起床；只有几个伤员撑着拐杖在走廊里慢慢地晃悠。在所有伤员的脸上——年轻的和中年的，刮过的和多日未刮、长满兵士式胡茬的脸上，都带着跟娜佳脸上和助理护士鲁莎脸上同样的严峻而紧张的表情。

刚听到走廊里孩子们的脚步声，病床上的伤员们就带着询问的神情，怀着希望抬起头来。拄着拐杖的伤员们虽然没有作声，脸上也都隐隐露出了兴奋的神情，目送着这两个穿白罩衣的少年和他们前面的、大家都熟悉的、脸色严峻的护士娜佳。

他们走到走廊尽头的唯一关着的门前，娜佳没有敲门，就伸出动作准确的小手，猛地把门打开。

“有人找您，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她一边让孩子们走进去，一面

说。

谢辽萨和维佳走进办公室的时候，都有点胆怯。一个瘦长、阔肩、硬朗的白发老人，迎着他们站起来。他的脸刮得很干净，颧骨高耸，鹰钩鼻，方下巴，被太阳晒得发出黑光的脸上有着很深的纵皱纹，——老人全身仿佛是铜铸的。他从桌旁站起来，孩子们看到桌上既没有书报，又没有药物，整个办公室都是空空荡荡的，而且他又是一个人坐在里面，因此他们明白，医生在这个办公室里并不办公，只是独自坐在那里考虑一些伤透脑筋的问题。他们明白这一点，还由于医生已经不穿军装，而是穿着便服：他穿着灰色上装，领子从颈部用带子系住的白罩衣下面露出来，下面穿着灰色裤子，脚上的半高统皮鞋没有擦干净，大概不是他自己的。

他也像娜佳、鲁莎、以及病房里的伤员们那样，非常严肃地望着这两个孩子，并没有露出惊奇的神气。

“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我们是来帮您把伤员们分送到居民家里去的。”谢辽萨说，他一看便明白对这个人用不着多说。

“人家肯收吗？”医生问道。

“有这样的人，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娜佳用她那悦耳的声音说，“市立医院的助理护士鲁莎愿意带一个回去，她还答应介绍几家，孩子们可以去征求一些人的意见，我也可以帮忙，别的克拉斯诺顿人也不会拒绝帮忙。我们邱列宁家也可以收容，可是我们家里没有地方，”娜佳说的时候脸涨得通红，连小小的颧骨上都现出了鲜艳的红晕。谢辽萨的脸突然也红起来，虽然娜佳说的是实话。

“请把娜塔丽雅·阿列克谢耶芙娜叫来。”医生说。

娜塔丽雅·阿列克谢耶芙娜是市立医院的一个年轻医生。医院全体人员撤退的时候，她因为母亲（母亲不住在城里，住在离城十八公里的矿村克拉斯诺顿）有病，无人照顾，所以没有走。她因为自己什么地方都不去而留在德国人统治下面，在同事面前感到惭愧；既然市立医院里还留着病人、财产、药物和医疗器械，她就自愿地担负起市立医院主任医师的责任。

娜佳出去了。

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在桌旁自己的位子上坐下，精力充沛地、利落地甩开白罩衣的下摆，从上装口袋里掏出烟盒和一张折着的、皱皱巴巴的旧报纸，从边上撕下一角，一只青筋突露的大手和嘴唇非常迅速地动着，就用烟盒里的马合烟①卷成烟卷，抽了起来。

①马合烟是一种劣质烟草。

“对，这是一个办法。”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说，他望了望规规矩矩地坐在沙发上的孩子们，脸上毫无笑容。

他先看看谢辽萨，再看看维佳，然后又看看谢辽萨，仿佛知道他是头儿。维佳懂得这一瞥的意义，但是毫不生气，因为他也知道谢辽萨是头儿，而且要谢辽萨做头儿，他是以谢辽萨感到自豪的。

娜佳陪着一个矮小的妇女走进了办公室。她年纪大约二十七八，但是样子却像小孩，因为她的小脸、小手和小脚都给人一种稚气、温柔和丰满的感觉，这在妇女身上往往会使人产生错觉，以为她的性格也是如此。当初，娜塔丽雅·阿列克谢耶芙娜的父亲不让她继续在医学院求学的时候，她就是靠这双胖胖的小脚从克拉斯诺顿步行到哈尔科夫。她曾经靠这双胖胖的小手做针线活和洗衣服，挣钱去求学，后来，父亲去世之后，她也就是靠这双小

手负担起一家八口的生活；如今，这个家庭的成员有的在作战，有的在别的城市工作，有的进了学校，她也就是靠这双小手大胆地来做连年纪比较大、经验比较丰富的男医生都不敢做的手术。在娜塔丽雅·阿列克谢耶芙娜的孩子般的胖胖的小脸上，那双眼睛里的那种正直、刚强、铁面无私、实事求是的表情，会使一个全国性机关的总务主任都为之羡慕不置。

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站起来迎接她。

“您不用操心，我都知道了，”她说，一面把圆滚滚的双手放到胸前，这种姿势跟她眼睛里那种公事公办、实事求是的表情以及她的非常准确、甚至有些干巴巴的谈吐，是非常不协调的。“我都知道了，这办法当然有理，”她说。她对谢辽萨和维佳望了一下，神态之间毫不流露出她个人对他们的看法，但是这里面也露出一种实事求是的表情，打量着是否可以利用他们。然后她又对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望了一眼。“那么您呢？”她问。

他马上懂得了她的意思。

“我最好能作为一个本地的医生留在你们医院里。这样，在任何条件下我都可以照顾他们。”大家都懂得，他所说的“他们”是指伤员。“这样行吗？”

“行。”娜塔丽雅·阿列克谢耶芙娜说。

“你们医院里不会有人出卖我吧？”

“我们医院里不会出卖您。”娜塔丽雅·阿列克谢耶芙娜把两只胖胖的手放在胸前，说道。

“谢谢，谢谢你们。”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第一次眼睛里露出笑意，他伸出手指有力的大手，先后跟谢辽萨和维佳握手。

“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谢辽萨说，他的坚定的、浅色的眼睛直望着医生的脸，那神情仿佛是说：“不管您和大伙对我的话有什么看法，可是我仍旧要说出来，因为我认为这是我的责任。”“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请您记住，您永远可以信赖我和我的同伴维佳·鲁基扬庆柯，永远可以。您可以通过娜佳和我们联系。我还要代表我自己和我的同伴维佳·鲁基扬庆柯对您说：您的行动，您在这种时候留在伤员身边的行动，我们认为是崇高的行动。”谢辽萨说，他的额头上渗出了汗珠。

“谢谢你们，”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非常严肃地说，“你们既然提到这一点，那我也要这样对你们说：一个人，不管他干的是什么职业，是哪一行，在他的一生中都可以碰到这种情况，那时他不仅可以、而且应当离开那些依靠他、受他领导、或是对他寄予希望的人。是的，可能发生这种情形，他撇下他们走掉反而更为相宜。这是最高的权宜之计。我再重复一遍，不管哪一种职业的人，甚至统帅和政治领袖，都是如此，只有一种职业除外，那就是医生，特别是军医。军医一定要跟伤员在一起。永远在一起。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没有一种需要可以高出这种义务。甚至军纪、命令都可以违犯，如果它们是跟这种义务相抵触的话。即使方面军司令员下令叫我离开，丢下这些伤员不管，我也不会服从。但是他绝不会说这样的话……谢谢，谢谢你们。”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说，他在孩子们面前低下他的仿佛是铜铸的、脸上闪着黑光的灰白的头，深深鞠了一躬。

娜塔丽雅·阿列克谢耶芙娜默默地把胖胖的小手放在胸口，她的注视着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的实事求是的眼睛里，露出了庄严的表情。

在前厅里举行的会议上，拟出了一个行动计划。参加会议的只有谢辽萨、娜佳、鲁莎大婶和维佳。这是最近四分之一世纪中最短的会议，因为它

一共只占用了孩子们脱掉白罩衣所需的时间。接着，孩子们已经克制不住，就像子弹般飞出了医院，迎着七月正午的令人难忍的阳光跑出去。一种说不出的喜悦，为自己和为人类的自豪感，以及不可压抑的、要活动的渴望，在他们心里几乎要满溢出来。

“这才是好样的，这才是好样的！是吗？”谢辽萨激动地望着自己的朋友，说道。

“谁说不是。”维佳眼睛霎了霎，说。

“我现在去打听一下，藏在伊格纳特·福明家里的那个人是谁！”谢辽萨突然这样说，这跟他们的感受和谈话毫无明显的联系。

“你怎么个打听法？”

“我去请他收留一个伤员。”

“他会出卖的。”维佳非常肯定地说。

“你以为我会对他说实话！我不过是要到他的屋子里看看。”谢辽萨狡猾而高兴地笑起来，眼睛和牙齿闪闪发光。他一心一意地想着这个念头，所以他知道它一定会实现。

他来到远离市场的“上海”近郊，到了福明的土房门口。福明窗下那些肥硕的、有筛子那么大小的向日葵，都垂着头。

谢辽萨敲门敲了好半天，里面却没有人答应。他猜想里面的人一定打算隔窗看清他的脸，所以他故意紧靠着门，不让里面看见。最后门打开了。福明一手仍旧抓着门把手，另一只胳膊抵着门框。他像蚯蚓一样，又细又长；他低着头，一双深藏在许多各式各样的皱褶里的灰色小眼睛怀着真正的好奇望着谢辽萨。

“谢谢您。”谢辽萨说，接着就泰然从福明抵着门框的胳膊下面钻过去，好像给他开门正是为了让他进去。福明甚至来不及惊奇，连忙跟着他赶过来，这时他已经不仅到了门道，而且打开了通上房的门。

“对不起，公民。”谢辽萨说这话的时候已经进了上房，他温顺地对着福明一鞠躬。福明站在他面前，穿着方格子的上衣和裤子，裤脚塞在擦得雪亮的小牛皮长统靴里，背心上有一条沉甸甸的镀金表链垂在肚子上。他个子瘦长，那张端正冷酷的长脸上终于露出了惊讶的、甚至有点发怒的表情。

“你要干吗？”福明把稀疏的眉毛一抬，问道。他眼睛周围许多各式各样的皱褶就非常复杂地活动起来，仿佛要舒展开来似的。

“公民！”谢辽萨激昂慷慨地说，“公民！请救救一个受伤的战士吧！”他采取了法兰西革命时代国民议会议员的姿态，这使他自己和福明都感到很突然。

福明眼睛周围的皱褶霎时间停止活动，注视着谢辽萨的眼睛也像木偶的眼睛那样呆住了。

“不，受伤的不是我。”谢辽萨说，伦明白了福明为什么会变得这样目瞪口呆。“战士们撤退了，就让一个伤员留在大街上，就在市场旁边。我和孩子们看见了，所以直接来找您。”

福明的端正的长脸上，忽然流露出有许多强烈的感情在他内心发生激烈斗争的痕迹，他不由斜过眼去，望了望另外一间上房的紧闭的房门。

“可是你为什么要直接来找我呢？”他压低嗓门，恨恨地问道，他的眼睛凶狠地紧盯着谢辽萨，眼睛周围的皱褶又恢复了无限复杂的运动。

“伊格纳特·谢苗诺维奇，不来找您，又去找谁呢？全城都知道，您是

我们这里的第一个斯达哈诺夫工作者。”谢辽萨说，当他无情地把这支毒矛朝福明刺过去的时候，他的眼睛显得异常地天真纯洁。

“你是哪一家的？”福明问，他愈来愈慌张，也愈来愈感到惊奇。

“我是普罗霍尔·刘别兹诺夫的儿子，你跟他很熟，他也是个斯达哈诺夫工作者。”谢辽萨愈是肯定地知道根本没有什么普罗霍尔·刘别兹诺夫，他的口气也愈坚决。

“我可不认识普罗霍尔·刘别兹诺夫。你看，我的小兄弟，”福明定了定神，两只长胳膊忙乱地动着。“我这里没有地方收留你的战士，而且我的老婆病了，所以小兄弟，你，这个……”他的手动着，虽然不十分明显，却是朝大门那边摆动。

“您的做法相当奇怪，公民，大家都知道您还有一间屋子。”谢辽萨带着责备的口吻说，一双明澈、天真、大胆的眼睛直盯着福明。

福明来不及移动，甚至来不及出声，谢辽萨已经一步——甚至是不很急促的一步——跨到隔壁房间的门口，打开房门走进这个房间。

这个房间收拾得清洁整齐，百叶窗半掩着，里面摆着家具和几桶橡皮树，桌旁坐着一个穿工人服装的人，那人生得肩膀浑圆有力，脑袋结实，头发剪成平顶式，一脸深色的斑点。

他抬起头来，非常镇静地望了望走进来的谢辽萨。

就在这一刹那，谢辽萨明白坐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坚定刚强的好人。明白了这一点之后，他立刻感到非常胆怯起来。是的，他那颗鹰之心里连一丝勇气都没有了。他胆怯到连话也说不出、动也不能动的地步。这时候，福明的脸在门口出现了，满脸带着怒气和恐惧。

“别忙，老兄，”坐在桌旁的这个陌生人，不慌不忙地对着向谢辽萨逼近的福明说。

“你们为什么不把这个受伤的战士带到自己家里去呢？”他问谢辽萨。

谢辽萨没有吭声。

“你父亲在这里呢，还是已经疏散啦？”

“疏散了。”谢辽萨涨得满脸通红地说。

“母亲呢？”

“母亲在家。”

“那你为什么不先去找她？”

谢辽萨不做声。

“难道她是那种人，会不肯收留吗？”

谢辽萨怀着惧怕的心情点点头。从这场戏结束的那一刻起，他在“父亲”、“母亲”这些词的后面已经看到自己实在的父母，对他们说了这样卑鄙的谎话是令人痛心和可耻的。

但是，这个人显然把谢辽萨的话信以为真。

“哦，”他打量着谢辽萨，说，“伊格纳特·谢苗诺维奇对你说的是实话，他不能收留那个战士，”他沉吟着说，“但是你会找到肯收留的人。这是一件好事。我可以对你说，你是个好样的。你去找找看，会找到的。不过这件事要保密，不要随便去找人。要是没有人肯收，你再来找我。要是有人收留，就别来了。现在你最好把你的地址给我，需要的时候我可以去找你。”

这时候，谢辽萨为了自己的鲁莽不得不付出对他说来是十分恼人和痛心的代价。现在他非常愿意把自己的真地址告诉这个人，但是他却只好当场

想出一个脑子里最先想到的地址。

他这一撒谎，就永远割断了再跟这个人联系的可能。

谢辽萨又到了街上。他心慌意乱，极其狼狈。毫无疑问，藏在福明家里的那个人是一个真正的重要人物。而福明的为人起码是不大好，这一点大概也是不用怀疑的。但是他们之间无疑地是有着联系。这里面的奥妙就难以解释了。

第十五章

舒尔迦在离开奥西摩兴家的小房子的当天，他就到旧称“鸽房”的克拉斯诺顿郊区去，找他从前打游击时的老朋友伊凡·康德拉多维奇·格纳简柯。

这个郊区，跟克拉斯诺顿的许多区一样，已经造起了标准式房屋，但是舒尔迦知道，康德拉多维奇还住在他私有的小木屋里，这木屋就是使这个郊区得名“鸽房”的古老房屋之一。

随着敲窗声，门口出现了一个样子像茨冈女人的妇人。她还相当年轻，但是脸上的皮肤已经十分松弛，穿得虽不寒伧，但是不修边幅。舒尔迦说，他是路过这里，想看看康德拉多维奇，如果可能，他想请老头出来跟他谈谈。

舒尔迦和康德拉多维奇，就在这座小屋后面的草原上会面了。那一天还听得见远方隆隆的炮声，他们走到洼地里，免得在高处被人看见。

康德拉多维奇，是有权自认为顿涅茨矿山创始者的那几代矿工的后裔。他的祖父、父亲——乌克兰来的移民、还有康德拉多维奇本人，都是建设顿巴斯的真正的血统矿工，是矿工的荣誉和传统的保持者，在一九一八到一九一九年，他们组成了矿工近卫队，使德国干涉军和白匪在顿巴斯一碰到他们，就遭到失败。

这也就是同自己的井长瓦尔柯以及谢夫卓夫一同炸毁新一号井的那个康德拉多维奇。

在草原的这块洼地里，在已经西斜的夕阳下，他和舒尔迦进行了下面的谈话。

“康德拉多维奇，你知道我来找你干什么吗？”

“我不知道，可是我猜得着，马特维·康斯坦丁诺维奇。”

康德拉多维奇忧郁地说，他并不望着舒尔迦。

草原上一阵微风吹进洼地，把老头的打满补钉的老古董短上衣的下摆吹得歪到一边。那件上衣穿在老头的干瘪的身上，好像是挂在十字架上一样。

“我是留在这里工作的，像一九一八年一样，所以我来找你。”舒尔迦说。

“我的整个生命都是你的，这你是知道的，马特维·康斯坦丁诺维奇，”康德拉多维奇用沙哑低沉的声音说，眼睛并不望着舒尔迦，“但是我不能让你住到我家里，马特维·康斯坦丁诺维奇。”

康德拉多维奇的话完全出人意料，使人难以相信，舒尔迦听了不知怎样回答，只好不作声。康德拉多维奇也不作声。

“康德拉多维奇，你是不让我住到你家里去，我这样理解你的话对吗？”

舒尔迦轻轻地问，他不敢望着老头。

“我不是不让，我是没有办法。”老头沉痛地说。

他们就这样谈了一会，彼此谁也不望着对方。

“你不是表示过同意的吗？”舒尔迦问，他心里的怒火沸腾起来。

老头垂下了头。

“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同意的是什么？”

老头不作声。

“你可明白，你这等于是出卖我们吗？”

“马特维·康斯坦丁诺维奇……”老头非常低沉地、沙哑地、完全像嘶喊似地叫起来，声音里带着威胁的调子。“不要把话说得这么绝。”

“我怕什么？”舒尔迦恨恨地说。他的充满血丝的牛眼直盯着康德拉多维奇的干瘪的脸和稀稀拉拉的、好像拔过似的、被香烟熏黄的胡子。“我怕什么？再没有什么比我听到的话更可怕了！”

“等一等……”康德拉多维奇抬起头来，用骨骼粗大的手抓住舒尔迦的胳膊肘，他的手指甲是黑的，残缺不全。“你相信我吗？”他悲痛地、低沉地问，声音压得不能再低。

舒尔迦想说什么，可是老头抓紧他的胳膊肘，刺人肺腑的深陷的眼睛凝望着他，几乎是哀求着说：

“等一等……你听我说……”

他们现在是四目相对了。

“我不能让你住到我家来，因为我怕我的大儿子。我怕他出卖你。”老头把脸凑近舒尔迦的脸，用沙哑的低音说道。

“你记得吗，一九二七年你曾到我们家来过？那是你最后一次到我们家来，那时我和我的老伴在庆祝我们共同生活的二十五周年，也就是我们的银婚纪念。你大概不会记得我所有的孩子，而且你也没有这种义务，”老头笑了一下，“可是我的大儿子你应该在一九一八年就记得他……”

舒尔迦没有作声。

“他走上了邪路，”康德拉多维奇用沙哑的低音说。“他在一九二九年就已经缺了一只手，你记得吗？”

舒尔迦依稀记得一九一八年他在康德拉多维奇家里看见过一个半大的男孩子，愁眉苦脸，行动迟缓，不爱说话。但是到了一九二九年，在康德拉多维奇家里围绕着舒尔迦的那些年轻人里面，谁是当年的那个少年，他们里面谁缺了一只手，这些他已经不记得了。他惊奇地发觉，那天晚上的情形他差不多都不记得了。大概，他那时去看康德拉多维奇是有些碍于情面，所以那天晚上的情形就和许多类似的、跟另外一些人一块、在另外一些场合，也是碍于情面而去度过的晚上一样，被遗忘了。

“他的手是在鲁干斯克工厂里轧断的……”康德拉多维奇说的是伏罗希洛夫格勒的旧称，根据这一点，舒尔迦明白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他回家靠我们过活。让他念书已经嫌晚，而且当时我们也没有想到这一点，合适的、他干得了的职业他又找不到，于是他就走上了邪路。他开始用父亲的钱，那就是用我的钱喝酒。我呢，也可怜他。谁也不肯嫁他，因此他喝得更厉害。到一九三〇年，你刚才看见的那个活宝缠住他，跟他结了婚，后来他们那里就出现了些不干不净的事。她好像成了个卖私酒的，他们还投机倒把，——我对你是十分坦白的，——他们连赃物都可以收买。起初我是姑息他，

后来又怕丢脸。我和老太婆就拿定了主意，我们决不声张。我们真的保持沉默。甚至在亲生的孩子们面前也是保持沉默。现在我们也是保持沉默……在苏维埃政权下他受过两次审讯，——应当审讯那个臭婆娘，可是他每次都把罪名往自己身上揽。唔，你知道，法官们都知道我是个老游击队员，有名的采煤工人，一个有名的人，所以第一次把他训了一顿，第二次是缓刑。可是他却一年比一年更坏。你相信我吗？我怎能让你住到我家里来呢？为了把房子弄到手，他甚至可以把我和老太婆都出卖！”康德拉多维奇惭愧地扭过脸去，不敢看舒尔迦。

“你既然知道这一点，怎么还会表示同意的呢？”舒尔迦激动地说，他望着康德拉多维奇的像刀那样瘦削的脸，不知该不该相信他。他突然绝望地发觉，自己心里已经没有了谱，不知道在他所处的情况下，对哪些人可以相信，对哪些人不能相信了。

“但是我怎么能拒绝呢，马特维·康斯坦丁诺维奇？”康德拉多维奇声音里含着苦恼说，“你只要想一想，我伊凡·格纳简柯，竟会拒绝。多么可耻！你要知道，那一次的谈话是在什么时候啊？他们是这样说的：‘也许不需要，如果需要，你同意吗？’他们仿佛在检查我的良心，我怎么能忽然提起儿子的事。那样一来，我自己好像在逃避责任，又要害儿子坐牢。说什么他总是我的儿子啊！……马特维·康斯坦丁诺维奇！”老头突然万分绝望地说，“我整个人都属于你，随你怎么支配都成。你知道我的性格——我到死也不会泄露，死，我并不怕。你可以支配我像支配你自己一样。我可以给你找个地方躲藏，我认识人，我可以找到可靠的人，你尽管可以相信我。我当时在区委就是这么想的：我本人准备去干一切，可是我儿子的事，我作为一个非党员，没有必要向区委说明，就是说，我可以问心无愧……我主要是要你相信我……住的地方我是可以给你找到的。”康德拉多维奇说，他没有发觉在他的声音里竟露出了讨好的语调。

“我相信你，”舒尔迦说。但他说的并不完全是真话：他既相信又不相信。他在疑惑不定。他这样说，无非因为这对他比较合适。

老头的脸忽然整个变了样，他顿时泄了气，垂下了头，呼哧呼哧地呼吸着，半天没有出声。

舒尔迦望着他，心里在琢磨康德拉多维奇对他说的这一番话，不住掂着这些话的分量。

当然，他知道康德拉多维奇是自己人。但是他不知道康德拉多维奇在整整十二年里，而且是在国内完成着十分巨大事业的这些年头里，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康德拉多维奇对当局隐瞒了儿子的罪状，甚至在生活最重要的关头隐匿他，而且在可能利用他的房子做地下工作和德国人进行斗争这样的大事上都撒了谎——这一切加重了天平的一头，表示对他不能完全信任。

“你先在这里坐一会或是躺一会，我去给你拿点吃的来，”康德拉多维奇沙哑地低声说，“然后我马上到一个地方去，我可以把一切都安排妥当。”

有一刹那的工夫，舒尔迦差点接受了康德拉多维奇的建议，但是内心的声音立刻告诉他，不应该为感情所动。他认为这不仅是小心谨慎的呼声，而且是生活经验的呼声。

“你何必去奔走，我心目中可住的地方不止一处，我会找到地方。”他说，“至于吃，那倒不着急：要是那个鬼婆娘跟你儿子想出什么坏主意，那就更糟了。”

“你当然更清楚，”康德拉多维奇伤心地说，“不过你千万别对我这个老头失望，我对你还有用。”

“这我知道，康德拉多维奇。”舒尔迦这样说，无非是为了安慰安慰他。

“你要是相信我，就请你告诉我你要去找什么人。我可以顺便告诉你，那个人好不好，值不值得去找他，万一有事，我也好知道到什么地方去找你……”

“要我告诉你我到哪里去，我没有权这样做。你自己是老地下工作人员，你总知道要保密，”舒尔迦调皮地笑着说，“我要去找的人，是我知道的人。”

康德拉多维奇心里想说：“我不也是你知道的人吗？可是你瞧，你知道的到底有多少呢，所以现在你还是跟我商量商量的好。”但是他不好意思对舒尔迦这样说。

“你当然更清楚。”老头阴郁地说，他最后明白了舒尔迦并不相信他。

“好，康德拉多维奇，该走啦！”舒尔迦装出高兴的样子说。

“你当然更清楚。”老头沉思着又说了一遍，他并不看着舒尔迦。

他本来要带舒尔迦经过他的屋子走到街上去。但是舒尔迦止住脚步，说：

“你还是带我走小路出去吧，不然又要被你那个……宝贝看见。”他干奖了一声。

老头想对他说：“你既然知道秘密活动的规则，你就该知道，你是怎么进来的，就该怎么出去，——谁会想到你来找格纳简柯老头是为了地下工作呢。”但是他知道人家不相信他，说也无益。于是他就顺小路把舒尔迦领到旁边的一条街上。走到那边一个小煤栈旁边，他们站下了。

“再见，康德拉多维奇，”舒尔迦说，他的心痛得像刀扎似的，还不如躺进棺材倒舒服些。“我还会来找你的。”

“那就随你的便了。”老头说。

舒尔迦沿街走去，干瘪、长腿的康德拉多维奇还站在这个小煤栈旁边，久久目送着舒尔迦；式样古老的短上衣穿在他身上，就像挂在十字架上一般。

这样，舒尔迦就向自己的死亡迈出了第二步。

第十六章

谢辽萨·邱列宁、他的朋友维佳·鲁基扬庆柯、他的姐姐娜佳以及老助理护士鲁莎，在几个小时里就给七十多个伤员在城里各区找到了住处。不过还是有四十来个伤员无处安排：谢辽萨和娜佳、鲁莎大婶、维佳，还有那些给他们出力的人，都不知道还可以向什么人提出这个请求，同时也不愿意使整个事业冒着失败的危险。

这一天是个很奇怪的日子，这样的日子只有梦里才有。部队穿过城里在远处大路上行进的声音和草原上的战斗声，昨天就都停止了。城里和四周整个草原上，都是异样地寂静。大家都以为德国人眼看就要进城，但是德国人没有来。机关和商店的门都开着，里面空荡荡，谁也不走进去。各个工厂里都寂静无声，也是空空荡荡。炸掉的矿井上面还冒着细烟。城里没有政权，

没有民警，没有交易，没有劳动——什么都没有。街道上冷冷清清。偶然有一个单身妇人跑到自来水龙头跟前或是井边取水，或是跑进菜园去摘两三条黄瓜，随后重又是静悄悄的，又是阒无人迹。家家户户的烟囱都不再冒烟，谁家也不做饭了。狗也不叫，因为没有外人来惊扰它们的安宁。只是偶尔有只猫儿跑过街道，接着又是一片冷落景象。

伤员们是在七月十九日夜里分别安排到各家去的，但是谢辽萨和维佳已经不参加这件工作了。这一夜，他们把“干草场”仓库里的燃烧瓶搬到“上海”来，埋在峡谷里的灌木丛下，每人在自家的菜园里还埋了几瓶，以便在必要的时候用起来凑手。

德国人究竟到哪里去了呢？

黎明时分谢辽萨就出了城，到了草原上。太阳在粉里带灰的雾霭后面升起，又大又圆，对着它看都不晃眼。过了一会，它的边缘从雾霭里露出来，熔化了，光芒四射，整个草原上突然有千万滴露珠闪耀起来，绚烂瑰丽，色彩各异，各处耸立着的圆锥形矸石堆，也被染成玫瑰色。万物苏醒了，在四周闪着光辉。谢辽萨感到自己浑身轻快，就像是一只跳跃的小皮球。

沿铁路支线，有一条平时交通频繁的大道，两者之间的距离时远时近。两条路都铺在高地上，高地两旁伸延出几座中间隔着峡谷的小山，地势渐渐低坦，同草原合在一起。小山上面和它们中间的浅谷里，丛生着茂密的小树林和灌木林。

整个这一带就叫做上杜望纳雅林子。

一出来就开始灼人的太阳，很快升到草原上空。谢辽萨纵目四望，全城的景色几乎尽收眼底。房屋在丘陵上和洼地里分布得很不均匀，这里一堆，那里一簇，大部分都靠近地面设备很显眼的矿井或是围绕着区执行委员会大厦和克拉斯诺顿煤业联合公司。小山上的树冠在阳光下显得翠绿欲滴，但是在树木苍郁的谷底，还是一片清晨阴凉的树荫。铁轨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到远方渐渐并在一块，然后消失在远处的小丘后面。在这小丘后面，正有一圈圈白色的轻烟悠然地冉冉升向天空，——那边是上杜望纳雅车站。

在这个小丘顶上，在那条大路似乎要到尽头的地方，突然出现了一个黑点。它迎面而来，很快地伸延成一条窄窄的黑带，几秒钟后，这条带子离开了地平线，——一个深色的、细长而绵密的东西，从老远的地方朝着谢辽萨飞快地冲过来，后面扬起一条红色的锥形的尘土。谢辽萨还没能看清楚这是什么，可是根据充满草原的轧轧声，他已经明白这是摩托车队在疾驶。

谢辽萨钻进大路下面的树丛里，伏在那里守候着。不到一刻钟，摩托的轧轧声愈来愈响，已经充满了四周的空间。有二十多个乘摩托车的德国自动枪手在谢辽萨身边驰过，他只能看见他们的上半身。他们穿着普通的土灰色德国军服，戴着船形帽，但是眼睛、前额和鼻子上部都被突出的巨大的黑眼镜遮住，使突然在顿涅茨草原这儿出现的这批人的外貌显得非常古怪。

他们到了近郊的小房子旁边，煞住车，跳下来，往四下分散；有三、四个人留在车旁。

但是过了不到十分钟，所有的摩托车兵又一个接着一个地上了车，向城里驰去。

摩托车兵到了洼地的屋后，谢辽萨就看不见他们了。但是他知道，如果他们是向城中心的公园驰去，他们免不了要经过从这里看得很清楚的第二过道口后面路上的高坡，所以谢辽萨就开始注视着那边。有四、五个摩托车

兵以扇形队列驰上这个高坡，但是他们并不往公园那边去，而是转向小丘上的那片房屋——区执委会大厦和“疯老爷”的房子也在那边。几分钟后，那几个摩托车兵又回到过道口，这时谢辽萨又看见整个车队在近郊的房屋中间穿过，折回上杜望纳雅。谢辽萨贴在灌木丛里的地面上，等车队从他旁边驰过，他才抬起头来。

他爬上了一个树木和灌木丛生的小山。这个小山伸向上杜望钠雅，从这里可以看到全区。他在这里的树底下躺了好几个钟头。在天空移动的太阳，一再照在谢辽萨身上，并且开始晒得他只好绕着圈儿爬，躲到有阴影的地方去。

蜜蜂和山蜂在灌木丛里嗡嗡地叫着，在夏天迟开的花朵上采集七月的花蜜和蚜虫在树叶背后排出的透明的粘液。树叶和青草散发出清新的气息。这儿的草长得非常茂密，但是整片草原上的草已经被晒得蔫萎。有时微风一起，树叶就簌簌作声。在很高很高的天空，小朵小朵的鬈曲的绵云被太阳照耀得光彩夺目。

一阵难以克制的倦意使谢辽萨四肢乏力，心里迷糊，使他有时竟忘记他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童年那种平静纯洁的感受频频来到他的记忆中，那时他也是这样闭起眼睛，躺在草原里的草上，太阳也是这样晒在他的身上，蜜蜂和山蜂也是这样在四周嗡嗡地叫着，空气中也是这样散发着晒热的草的气味，世界显得这样可亲、澄净和永恒。可是他耳畔似乎又听见摩托车的轧轧声，在蓝天的背景上他似乎又看到这些戴着大得出奇的眼镜的摩托车兵，他忽然明白，童年的平静纯洁的感受，儿时的这些无比的幸福的瞬息，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时他一会儿心里又苦又甜地紧揪着，一会儿整个身心又充溢着在他血液里沸腾的、强烈的战斗的渴望。

太阳已经西斜，这时从远处的小丘后面又向大路射出一支深色的长箭，地平线上顿时尘土漫天。这又是摩托车兵，人数很多，队伍长得没有尽头。他们后面是卡车，是成百上千辆卡车组成的纵队，在纵队与纵队之间是指挥官乘的小汽车。卡车从小丘背后不断地开出来，好像一条鳞皮在太阳底下闪闪发光的绿色巨蟒，不断从地平线上蜿蜒地游出来，它的头离谢辽萨躺的地方已经不远，可是尾巴还看不见。尘埃滚滚，笼罩着公路上空，摩托的吼声似乎填满了天地之间的全部空间。

德国人在开进克拉斯诺顿。谢辽萨是第一个看见他们的人。

他用猫儿般灵活的动作，又像是爬，又像是跳，又像飞跃似的越过那条大道，再越过铁路，奔到下面的峡谷里，这就到了高地的另一面。待在那里，在铁路路堤后面行进的德军纵队就看不见他。

谢辽萨想出这一着，是为了赶在德国人前面进城，在城里占据一个最便于瞭望的地点——市立公园里面高尔基学校的屋顶上。

他穿过一个废井旁边的空地，奔到公园后面俗称“木头街”的那条街的后身。这条街跟城市隔离，一直保持旧观。

可是他在这里看到的事使他十分震惊，使他不得不停下来。他正挨着“木头街”后身住户的小花园的栅栏，毫无声息地溜过去，不料却在一个小花园里看到了前天夜里命运使他在草原里的卡车上碰到的那个姑娘。

在槐树底下的草地上，铺着一条深色条纹毛毯，那姑娘就躺在上面，头底下垫着枕头，离谢辽萨大约五、六步，侧面对着他，晒黑的腿交叠着，脚上穿着便鞋。她不管周围发生什么事，自管看她的书。一条亚麻色的、发

着金光的大辫子安静自如地拖在枕头上，把她的晒黑的脸衬托得更黑。她的睫毛是深色的，饱满的上唇自尊地微微撅起。是的，成千辆卡车——大队德军人马——正在向克拉斯诺顿城推进，他们的摩托的吼声和汽油的臭味充满了草原和天空之间的整个空间，而这位姑娘却在小花园里躺在一条毛毯上，晒黑的、覆着柔毛的手里捧着一本书在读。

谢辽萨屏住从他胸口呼哧呼哧地冲出来的呼吸，两手抓住栅栏，对着这个姑娘望了好一会，感到迷惘而又幸福。在有史以来一个最可怕的日子里，在这个捧着一本打开的书躺在花园里的姑娘身上，有着一种像生活本身一样淳朴而美好的东西。

谢辽萨怀着不顾一切的勇气跳过栅栏，站在姑娘脚旁。她放下书本，她的围着深色睫毛的眼睛凝视着谢辽萨，露出平静的、又惊又喜的神气。

玛丽雅·安德烈耶芙娜·鲍尔茨把年轻人从别洛沃德斯克区接回克拉斯诺顿的那天夜里，鲍尔茨全家——玛丽雅·安德烈耶芙娜本人、她的丈夫、大女儿华丽雅和十二岁的小女儿刘霞——一直到天亮都没有去睡。

供给城市照明的发电站从十七日起已经停工。他们点着煤油灯，围着桌子面对面地坐着，好像在作客。他们交换的新闻虽不复杂，但是非常可怕，因此在笼罩着家里、街上和整个城市的寂静中，不能大声谈论这些消息。要离开这里已经太晚。留在这里又很可怕。他们全家，甚至刘霞——小姑娘的头发跟姐姐一样，是金色的，不过颜色较浅，苍白的小脸上长着一双严肃的大眼睛，——都感到已经发生了一件无法挽救的祸事，他们的头脑还无法了解这场灾祸的规模。

父亲的样子很可怜。他不住转动着用廉价烟叶卷成的香烟，抽着。孩子们已经难以想象，父亲曾经是力量的化身，家庭的支柱和保护者。他坐在那里，又瘦又小。他的目力一向很差，近几年来简直是丧失了视力，备课都很困难。他跟玛丽雅·安德烈耶芙娜都是教文学的，学生的作业常常由妻子代他改。在油灯下他什么都看不见，他那双眼眶有点像埃及人的眼睛一霎不霎地瞪着。

周围的一切都是那么习惯了的、从小就熟悉的，但是一切又都变了样。铺着花台布的饭桌、华丽雅每天练习弹奏短曲的钢琴、玻璃橱门里对称地摆着朴素而雅致的杯盘的食橱、放着书的书架——这一切都像平时一样，但一切又都是陌生的。华丽雅的许多崇拜者都说，鲍尔茨家里既舒服又富有浪漫气息，华丽雅也知道，是她这个住在这所房子里的姑娘，使围绕她的一切变得富有浪漫气息的。现在呢，这一切仿佛是赤裸裸的一般摆在她面前。

他们怕熄掉灯，怕散开后各自躺在床上单独面对着自己的思想和感触。所以他们就这样默默地坐到天亮，只有钟声滴答地响着。直到听见邻人在他们家斜对面的水塔前面打开龙头取水，他们才熄了灯，把百叶窗打开。华丽雅故意弄出许多响声，然后脱掉衣服，连头钻进被窝，很快就睡着了。刘霞也睡着了。但是玛丽雅·安德烈耶芙娜和丈夫却一直没有去睡。

父亲和母亲在餐室里摆茶具，轻轻的叮当声把华丽雅弄醒了。玛丽雅·安德烈耶芙娜还是生了茶炊。阳光从窗上射进来。华丽雅想起这一夜的枯坐，突然产生了厌恶之感。这样的脆弱简直可耻而又可怕。

归根结蒂，德国人跟她有什么相干！她有她自己的精神生活。谁要是愿意，让他去由于等待和恐惧而苦恼吧，但决不是她，决不是！

她舒舒服服地用热水洗了头，痛痛快快地喝了茶。然后从书橱里取了

一本史蒂文生①的《绑架》和《卡特林娜》，在花园里的槐树下摊开毛毯，专心看起书来。　　①史蒂文生（1850—1894），英国小说家，《绑架》和《卡特林娜》是两部有连续性的小说。

四周是一片寂静。太阳照在荒芜的花坛上和一小块草地上。一只棕色的蝴蝶停在花上，翅膀一张一合。一群毛茸茸的、深色的、肚皮周围有着阔条白毛的土蜂，在花丛里飞绕，发出悦耳的嗡嗡声。一株干多枝密的老槐树向四周投出阴影。透过有的地方已经开始发黄的叶丛，可以看见点点的碧空。

这个有着碧空、阳光、树木、蜜蜂和蝴蝶的神话般的世界，和书中另一个虚构的世界——充满了冒险、荒野的大自然、人类的勇毅和高尚精神、纯洁的友谊和纯洁的爱情的世界——神妙地交织在一起了。

有时华丽雅放下书来，梦幻似地久久凝望着槐树丫枝中间的天空。她在梦想些什么？她不知道。但是，我的天，独自捧着一本打开的书，悠然躺在这个美丽的花园里，是多么美好啊！“大概他们都已经走了，都走掉了，”她想起了她的同学，“奥列格大概也走了，”她跟柯舍沃伊很要好，两家的父母也很要好。“是啊，大家都把她华丽雅忘记了。奥列格走了。斯巧巴也不来。还算是朋友呢。‘我发誓！’真是空谈家！要是那天跳进卡车的那个小伙子，——他叫什么……谢尔盖·邱列宁……谢辽萨·邱列宁，——要是那个小伙子起了誓，他说话一定算数的。”

她已经把自己想象成卡特林娜，而主人公，充满勇毅和高尚精神的被绑架者，在她的想象中就是夜里跳进卡车的那个小伙子。他的头发似乎很硬，她非常想摸摸它。“不然还算是什么男孩子，如果他的头发也像女孩子的那么软，——男孩子的头发应该是硬的……唉，要是这些德国人永远不来就好啦！”她怀着难以形容的苦闷想着。接着，她又沉醉在书本和浴满阳光、有着毛茸茸的土蜂和棕色蝴蝶的花园交织着的虚构的世界里了。

她这样度过了一整天。第二天早上，她又拿了毛毯、枕头和史蒂文生的小说，来到花园里。不管世界上发生什么事，她现在就打算这样生活，在花园里的槐树下……

可惜，她的父母却过不了这样的生活。玛丽雅·安德烈耶芙娜可忍受不住了。她是一个爱热闹的人，健康，好动，声音洪亮，生着饱满的嘴唇和一口大牙。不，这样生活可不行。

她对着镜子把自己收拾了一下，就到柯舍沃伊家去，看看他们是在城里还是已经走了。

柯舍沃伊家住在通到公园大门为止的公园街，占着半幢标准式房屋。这是克拉斯诺顿煤业联合公司分配给奥列格的舅舅尼柯拉·尼柯拉耶维奇·柯罗斯蒂辽夫也就是柯里亚舅舅住的。另外半幢房子里住的是和玛丽雅·安德烈耶芙娜同事的一位教师和他的全家。

公园街上传出了一声孤零零的斧声。玛丽雅·安德烈耶芙娜觉得这声音是从柯舍沃伊家的院子里出来的。她的心猛跳起来。在走进院子以前，她先朝四面张望一下，看看有没有人看见她，仿佛她是在做一件危险而犯法的事。

一条毛茸茸的黑狗躺在台阶旁边，热得伸出红红的舌头。听到玛丽雅·安德烈耶芙娜鞋后跟咯咯的响声，它微微抬起身来，但是认出是她，就抱歉似地望了她一眼，好像是说：“对不起，天热得很，我连朝你摇尾巴的气力都没有了。”便又躺了下去。

瘦长而结实的维拉外婆在劈木柴。她的两条瘦长的胳膊把斧头高高举起，再用足气力砍下来，累得她呼哧呼哧地直喘。显然，她还没有腰疼的毛病，要不，她就是认为需要以毒攻毒。外婆的脸很瘦，晒得很黑，鼻子细长，鼻翼不住地翕动。玛丽雅·安德烈耶芙娜一看到外婆的侧面，就会想到她在革命前出版的多卷集《神曲》里看到的但丁①的像。鬈成一圈一圈的斑白的深栗色头发，围着外婆的黧黑的脸，又垂到她的肩上。平时外婆总戴着黑色窄边的眼镜，眼镜用的年数太久，一只眼镜腿纯粹因为老化而折断了，于是她就用一根黑线绑在眼镜框上。但是这时候外婆没有戴眼镜。

她干得特别带劲，用上两倍三倍的精力，木柴噼噼啪啪地飞散开来。外婆的脸上和整个身形的表情大概是这样的："但愿魔鬼来把这些德国人抓去，你们要是怕德国人，愿魔鬼把你们也都抓去！我还是劈这些木柴的好……喀啦……喀啦……让这些该死的劈柴飞向四面八方去吧！对，与其让自己像你们那样卑躬屈膝，我还不如来劈柴。如果我为了这个而注定该死，那么就让鬼把我抓去吧，我已经老了，死我是不怕的……喀啦……喀啦……"

①但丁（1265—1321），意大利诗人，著有《神曲》等。

维拉外婆的斧头卡在一段多节疤的木头里，拔不出来。她猛地把这段木头举起来甩到肩后，再用劲往木砧上一砸，木头就裂成两半，其中的半块差点把玛丽雅·安德烈耶芙娜碰倒。

这样一来，维拉外婆才发现了玛丽雅·安德烈耶芙娜，她眯缝着眼睛，认出是她，就扔下斧头，用她那大概可以让整条街都听见的大嗓门说道：

"啊，玛丽雅，哦，玛丽雅·安德烈耶芙娜，你来了真好，你没有嫌弃我们！我的女儿列娜把头埋在枕头里，已经一个劲儿地哭了三天啦。我对她说：'你到底有多少眼泪？'请进来吧……"

玛丽雅·安德烈耶芙娜被她的大嗓门吓了一跳，可是这嗓门同时仿佛又使她得到安慰；她自己不也喜欢大声说话吗。

但是她仍旧轻声地、担心地问道：

"我们的同事走了吗？"她指指教师的家。

"他本人走了，可是家里的人都在这里，也是哭哭啼啼。您就在这儿吃饭吧。我做了很好的甜菜汤，可是没有人吃。"

不，她维拉外婆，这个出身贫苦的农妇，一向是很能干的。她是波尔塔瓦省一个农村木匠的女儿。她丈夫是基辅人，是普梯洛夫工厂的工人，自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了重伤回来之后，就在他们村里住了下来。维拉外婆结婚后走上了独立的道路，她当了村苏维埃代表，先在贫农委员会工作，后来进医院工作。丈夫的死并没有摧毁她的意志，反而更发展了她身上这种独立的性格。不错，她现在已经退休，靠养老金生活，但即使现在，如果必要的话，她还能够发出她那威严的声音。维拉外婆入党已经十二年了。

奥列格的母亲叶列娜·尼柯拉耶芙娜，脸朝下趴在床上。她光着脚，身上的花衣服已经揉皱，平时巧妙地盘绕在头上的两条柔密的淡亚麻色发辫，现在散下来，差不多拖到脚后跟，遮盖了她整个年轻、美丽、丰满、强健的小小的身体。

维拉外婆和玛丽雅·安德烈耶芙娜走进上房的时候，叶列娜·尼柯拉耶芙娜从枕头上抬起头来。她的颧骨高高的脸上满是泪痕，善良、聪明、温柔的眼睛都哭肿了。她尖叫了一声，就扑到玛丽雅·安德烈耶芙娜的怀抱里。她们互相紧紧地拥抱着，亲吻了一阵，哭了，接着又笑了。她们高兴的是，

在这些可怕的日子里，她们彼此能够这样相处，这样了解和分担共同的苦难。她们又哭又笑，维拉外婆却把两只青筋突露的手插在腰里，摇着但丁式的、鬈发的头，不住地重复说：

“嗨，一对傻瓜，真是傻瓜，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笑好像并没有理由，哭呢，往后我们大家哭的日子还多呢……”

这时候，街上有一阵奇怪的声音，愈来愈响，传到她们的耳朵里，仿佛是许许多多摩托的轧轧声，还夹杂着凄惨的、也是愈来愈响的狗的狂吠声，——好像全城的狗都疯了似的。

叶列娜·尼柯拉耶芙娜和玛丽雅·安德烈耶芙娜彼此松了抱。维拉外婆也把手放下来，她的瘦削黧黑的脸发白了。她们这样站了一会，不敢去看看这是什么声音，其实她们已经知道这是什么声音了。突然，她们三人——外婆打头，她后面是玛丽雅·安德烈耶芙娜，再后面是叶列娜·尼柯拉耶芙娜——一齐都往前面的小院里跑，她们不约而同，直觉地感到应该怎么走：不是往门口跑，而是在花圃中间，穿过向日葵，向着沿栅栏种的茉莉花丛跑去。

大批卡车的响声从城里低洼的部分传过来，愈来愈响。车轮隆隆地响着，大概是从在这里看不见的第二过道口那边铺的木板上开过来。突然，街头出现了一辆灰色的敞篷小汽车，到拐弯的地方它的玻璃上就反射出使人耀眼的阳光。汽车沿街朝着站在茉莉花丛旁边的妇人们慢慢地开过来。车上直僵僵地坐着几个军人，身穿灰制服，头戴帽顶前部高高突起的灰制帽，面色严峻。

这辆汽车后面还有几辆小汽车。它们从过道口开上街道，一辆接一辆，慢慢地朝公园这边开过来。

叶列娜·尼柯拉耶芙娜眼也不眨地盯着这些汽车，她的指头骨节稍粗的小手突然急遽地把辫子一根一根提起来，盘绕在头上。她这个动作做得非常快，完全是机械的，后来她发觉没有带发针，可是还站在那里，双手捧着头上的辫子，望着街道。

玛丽雅·安德烈耶芙娜发出一声轻轻的叫喊，离开茉莉花丛，撒腿就跑，——她不是往通大街的门口跑，而是朝着房子往回跑。她从教师住的那半边绕过去，从另外一扇旁门跑到和德国人走的那条大街平行的街上。这条街上连人影也不见，她就沿着街跑回家去。

“原谅我，我已经没有力气给你准备了……放勇敢些……你得赶快躲起来……他们可能马上就冲到我们街上！”玛丽雅·安德烈耶芙娜对丈夫说。

她把手按在胸口，上气不接下气地喘着。但是她像所有健康的人一样，跑得满脸通红，浑身大汗，因此她那副激动的模样跟她所说的那件事情的可怕意义并不相符。

“德国人？”刘霞轻轻地说，声音里带着完全不像孩子应该有的恐怖口吻，玛丽雅·安德烈耶芙娜一听，突然住了嘴，望了望女儿，迷惘地环视了一下四周。

“华丽雅在哪里？”

玛丽雅·安德烈耶芙娜的丈夫站在那里，嘴唇发白，默不作声。

“我可以告诉你，我全看见了。”刘霞说话的声音非常轻，非常严肃。“她在花园里看书，有个男孩子，——差不多像大人了，——翻过栅栏跳了进来。她先是躺着，后来坐了起来，他们谈了一会，后来她跳了起来，他们就一同

翻过栅栏跑了。”

“跑到哪儿去了呢？”玛丽雅·安德烈耶芙娜眼睛盯着她问道。

“是往公园那边跑的……毛毯留在那里，枕头跟书也留在那里。我以为她一会就会回来，就出去看着东西，可是她没有回来，我就把东西都收进来了。”

“我的天哪……”玛丽雅·安德烈耶芙娜说完，就重重地朝地板上一坐。

第十七章

可是维拉外婆和叶列娜·尼柯拉耶芙娜还站在茉莉花丛里，看那些又高又长的大卡车在街头吼叫着，一辆跟着一辆地爬进来。这些卡车塞满了街道，到处都是隆隆的响声。车上坐着一排一排满脸大汗、皮肤晒得黧黑、浑身尘土的德国兵士，他们穿着灰色短上衣，戴着肮脏的灰色船形帽，枪支夹在两腿中间。各家院子里的狗都狂吠着朝卡车冲过去，在稠密的红色尘土中围着卡车乱蹦乱跳。

军官乘坐的领头的汽车已经开到柯舍沃伊家的小庭园前面，两个妇人背后突然发出一阵凶猛的吠叫，那条毛茸茸的黑狗像闪电似地从向日葵中间冲出去，跳过庭园的矮栅栏，又是低吼，又像老头那样重浊地嗄声吠叫着，围绕着前头的那辆汽车乱蹦乱跳起来。

两个妇人恐惧地交换了一下眼色。她们感到，马上就要有祸事发生。但是并没有发生什么事。这辆汽车又朝前向着公园开过去，在克拉斯诺顿煤业联合公司的大厦旁边停下，还有几辆小汽车也跟着开到那边。这时已经满街都是载着兵士的卡车。兵士们从卡车上跳下来，舒展着腿和胳膊，一面用俄罗斯人的耳朵听不惯的、刺耳的口音大声交谈着，一面挨家去敲门。那条毛茸茸的黑狗茫然地站在门口，漫无目的地朝着整个街道乱叫。

军官们站在煤业联合公司的大厦前面抽烟，勤务兵们在把箱子搬进大厦。一个矮个子、大肚皮的军官指挥着把卡车上的东西卸下来。他的帽顶高得出奇，相形之下，他的脑袋就显得毫无意义。一个腿长得可笑的青年军官，带着一名高大、笨拙、穿着笨重的皮鞋、浅黄色的头发上戴船形帽的兵士，急急地斜穿过街道，走进普罗庆柯住过的那所房子。过了一会，那个军官和兵士已经从里面走出来，很快又进了隔壁一家的门。隔壁这所房子里也住过州委的干部，但是几天前他们已经跟房东一同离开。军官和兵士从庭园里走出来，朝着柯舍沃伊家院子的门口走过来。

那条毛茸茸的黑狗终于看见真实的敌人直冲着它走过来，就吠叫着向年轻的军官扑过去。军官叉开两条长腿站住，脸上现出了顽童的神气，他鄙视地骂了一声，从皮套里拔出手枪，对准黑狗就是一枪。狗一头栽到地上，嚎叫着朝军官爬了几步就直挺挺地死去了。

“狗被打死了……下一步不知道还要出什么事呢？”维拉外婆说。

煤业联合公司大厦旁边的军官和街上的兵士，听到枪声都回过头来，但是看到死狗，又转过身去干他们自己的事。这里那里不时发出一两声零落的枪声。那个军官带着淡黄头发的大个子勤务兵，已经打开了柯舍沃伊家院

子的门。

维拉外婆直僵僵地、一动不动地昂着她那但丁式的头，迎着他们走过去。叶列娜·尼柯拉耶芙娜还站在茉莉丛中，双手仍旧捧着盘在头上的淡亚麻色发辫。

长腿军官在外婆对面站下，尽管外婆个子也很高，但是他那双冷冷的无色的眼睛还是居高临下地望着她。

“谁来带我看你们的房子？”他问。

他说了这句话，自以为俄语说得非常准确，就把目光从外婆身上移到双手捧着辫子站在茉莉花丛中的叶列娜·尼柯拉耶芙娜身上，然后又移到外婆身上。

“你怎么啦，列娜？去，领他看！”外婆窘迫地哑声说道。

叶列娜·尼柯拉耶芙娜双手捧着辫子，穿过花坛向屋子走去。

军官惊奇地对她望了一会，又把目光移到外婆身上。

“怎么样？”他把浅色的眉毛一扬，说。他那年轻的、保养得很好的绔袴子弟的脸上露出了任性的神情。

外婆不习惯地跨着细步，几乎像跑一样向屋里走去。军官和勤务兵跟在她后面。

柯舍沃伊家住的房子有三个房间和一个厨房。如果客人从厨房里进来，直接就可以到做餐室的大房间，房间里有两扇窗子临着跟公园街平行的街道。叶列娜·尼柯拉耶芙娜的床和奥列格平时睡的长沙发也放在这里。餐室左面的门通尼柯拉·尼柯拉耶维奇夫妇带小孩住的房间。右面还有一扇门通外婆住的那个很小的小房间。这个小房间和厨房共一堵墙，墙那边正好就是炉灶，厨房里生起炉灶的时候，房间里就热得难受，特别是在夏天。但是外婆跟所有的农村老年妇女一样，喜欢暖和，要是热得太难受，她就打开通小庭园的小窗，窗下种着一丛丁香。

军官走进厨房，草草地打量了一下，然后略微弯下身子（免得头碰着门框）走进餐室。

他站了一会，眼睛向四面扫射着。显然这里很中他的意。房间粉刷得干干净净，到处一尘不染，漆过的地板上铺着家制小地毯，虽然粗糙，然而很清洁，桌上铺着雪白的台布，叶列娜·尼柯拉耶芙娜床上的被单也是雪白的，两只枕头一大一小，拍得松松的，覆着轻飘飘的绢纱之类的东西。窗台上摆着花。

军官在门口又弯下身子，很快地走进柯罗斯蒂辽夫夫妇的房间。叶列娜·尼柯拉耶芙娜留在餐室里，仰起头来靠着门框，柔密的淡亚麻色头发好像是一个光环；她甚至没有发觉她的辫子是在什么时候和怎样用发针卡住的。维拉外婆跟着德国人走了进去。

这个小房间，里面摆着小书桌和整齐的文具，桌头和门框的小钉上挂着丁字尺、三角板和曲线板，德国人看了也很中意。

“好！①”他满意地说。

突然他看见被子团皱的床，——玛丽雅·安德烈耶芙娜进来的时候，叶列娜·尼柯拉耶芙娜就躺在这张床上。他快步跨到床前，翻开被子和被单，带着嫌恶的神气用两个指头提起鸭绒褥子，弯下腰来用鼻子闻了一下。

“没有臭虫吗？”他皱着眉头问维拉外婆。

“臭虫没有……没有的。”外婆生气地摇摇头说，她故意说得怪腔怪调，

好让德国人容易听懂。

“好②，”德国人说。他低下头走出房门，又回到餐室里。 ①② 原文为德语。

他朝外婆的房间里只看了一眼，就猛地转过脸来对着叶列娜·尼柯拉耶芙娜。

“冯·文采尔男爵将军要住到这里来，”他说，“这两个房间要腾出来。”他指指餐室和柯罗斯蒂辽夫夫妇的房间。“准许你们住在这里。”他指了指维拉外婆的小房间。“这两个房间里的东西，你们要用的马上就拿去……这个拿掉，这个，”他嫌恶地用两个指头翻了翻叶列娜·尼柯拉耶芙娜床上的雪白的被套、被子和被单。“那个房间也……拿掉……快！”他从急忙闪开的叶列娜·尼柯拉耶芙娜身边走过，从房间里走出去。

“他说有没有臭虫？真是个对头！……维拉外婆啊，你活到老还遇到这种日子！”外婆拉开大嗓门尖声说。“列娜！你傻了吗？”她气愤地说，“得把东西都搬掉，让那个男爵住，但愿他的眼珠子掉出来！你稍微清醒清醒吧。来个男爵住在我们这里，也许还是我们的运气呢，也许他还不像这些家伙那样，像疯子似的……”

叶列娜·尼柯拉耶芙娜默默地卷起被褥，搬到外婆的房间里，就不再出来。维拉外婆从儿子和媳妇的房间里搬出被褥，把儿子和外孙奥列格的像片从墙上和桌上取下来，放在五斗橱里（“免得他们问这是谁那是谁的。”），又把自己的和女儿的衣服搬到自己房间里（“让他们去吧，免得以后到他们这批鬼东西那边去取衣服！”）。但是她仍旧被好奇心苦恼着，她坐不住，就走到院子里。

那个淡黄头发、胖脸上长着淡黄色雀斑的大个子勤务兵，又在大门口出现。他两只手里提着几只套着皮套的又宽又长的扁箱子。有一个兵士跟在他后面，拿着武器——三支自动枪、两支毛瑟枪和一把套着银鞘的腰刀；还有两个兵士，一个提着箱子，另外一个捧着一架并不很大的、沉重的收音机。

他们走进屋子里，对维拉外婆望也不望。

这时，将军由那个长腿军官陪着，跨过门口走进庭园。将军是个瘦长条子，年纪很大，满是皱纹的脸和喉结都洗得很干净，擦得雪亮的窄瘦的长靴上稍微有点尘土，制帽的帽顶前面高高突起。军官低着头，态度毕恭毕敬，在他身后半步。

将军的灰色斜纹呢裤上有两条镶条，军装上钉着暗金色钮扣，黑领上佩着红底绣金色棕树枝的领章。他高昂着长脖颈上的两鬓斑白的狭长的脑袋，一边走一边断断续续说着什么，那个军官紧跟在他后面，低着头，恭恭敬敬地聆听着他说的每一个字。

走进庭园的时候，将军停下脚步，慢慢地转动着紫红色的长脖颈，环顾了一下，样子活像一只鹅，特别因为他那帽顶突起的帽子上有一个长帽舌。将军环顾了一下，僵板的脸上毫无表情。他伸出一只手掌狭长、手指干瘦的手来，很快地朝四周挥动了一下，仿佛在决定他视野中的一切的命运，嘴里还咕噜着什么。军官就格外恭敬地低下了头。

将军走过的时候，他身上那股香水味和别的味道混合的气味往维拉外婆的鼻子里直钻；他那双颜色变得很淡的、疲倦的眼睛在她身上停留了一会，然后低着头走进屋子，免得头碰着门框。长腿的年轻军官向在台阶前立正的兵士们做了一个手势，叫他们别走，自己跟着将军走了进去。维拉外婆还留

在院子里。

几分钟后，军官走出来，向兵士们发了一个简短的命令，同时伸手向庭园里一挥，准确地重复了将军的手势。兵士们在原地转了一个方向，碰靴立正，排成单行走出庭园。军官又回到屋子里。

菜园里，向日葵的金黄色脑袋已经低低地弯向西方，长长的浓密的影子横过花坛。从茉莉花丛后面的街道上，传来了外国人的兴奋的谈笑声。右面的过道口上不断有摩托呜呜地响着，四面还不时传来枪声、狗叫声和母鸡咯咯的啼声。

维拉外婆已经认得的两个兵士又在大门口出现。他们手里拿着斧头。外婆还没有来得及琢磨，他们拿着斧头干什么，两个兵士在门口一边一个，已经动手来砍沿栅栏种植的茉莉。

“你们砍什么，它又不碍你们的事？”维拉外婆忍不住了，向一个兵士冲过去，跑得裙子都飘动起来。“这是花啊，这是美丽的花啊！它难道妨碍你们吗？”她气愤地说，一面从这个兵士跟前跑到另一个兵士跟前，恨得几乎要去揪他们的头发。

两个兵士头也不抬，一声不响地只顾砍着花丛，累得直喘。过了一会，一个兵士对他的同伴说了一句什么，两个人都大笑起来。

“还笑呢。”外婆轻蔑地说。

一个兵士挺直身子，用袖子擦掉额上的汗，笑着望了外婆一眼，用德语说：

“这是上面的命令，军事需要。你看，到处都在砍。”他用斧头指指邻家的庭园。

外婆听不懂他的话，但是她顺着兵士的斧头所指的方向看过去，就看见在邻家的庭园里，在又过去一家的庭园里，以及在她的背后，到处都有德国兵在砍树木和灌木丛。

“游击队——乓！乓！”德国兵试图解释，就蹲到树丛背后，伸出肮脏的、指甲粗大的食指，表示游击队是怎么干的。

外婆马上浑身泄了劲，毫无办法地把手一挥，从两个兵士身边走开，在台阶上坐下。

门口出现了一个戴白帽、穿白罩衣的炊事兵，罩衣下面露出灰色裤脚和粗劣的木鞋掌的皮鞋。他一手提着一只很大的、编得很细的圆篮，里面的杯盘叮当地响着，一手拿着一只大钢精锅。他背后还有一个穿油污的灰色短上衣的兵士，捧着一只大钵子。他们走过外婆身边，到厨房里去。

突然，仿佛是从另一个世界冲出来似的，从屋子里传出了片断的音乐声、噼啪声、咝咝声、片断的德语声，然后又是噼啪声和咝咝声，接着又是片断的音乐。

整条街上都有兵士在砍庭园里的树木，不多一会，从第二过道口到公园这一段街的左右两边都显露出来了，整条街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满街都有德国兵来来去去，摩托车横冲直撞。

从外婆背后的上房里，忽然飘出一阵遥远的、柔和的音乐。在离克拉斯诺顿非常遥远的地方，在过着一种跟此时此地所发生的一切毫不相干的、平静的、有规律的生活。可以欣赏这种音乐的人们，离前线很远，离在街上跑来跑去和砍树的这些兵士很远，离维拉外婆也很远。大概这种生活对于那些在庭园里砍树木的德国兵也是遥远的、不相干的，因为德国兵并没有抬起

头来，没有停下来听听音乐，也没有因为这音乐而交谈几句。

他们砍去了庭园里所有的树木，一直砍到维拉外婆的窗下——叶列娜·尼柯拉耶芙娜一个人就默默地坐在屋里。后来他们又用斧头去砍那些把金黄色的头弯向夕阳的向日葵。他们把这些向日葵也齐根砍掉。这时四周已经被砍得一干二净，游击队也就无从干他们的“兵兵”的工作了。

第十八章

整个黄昏，各种兵种的德国官兵都在向城里各个城区流动，只有大“上海”、小“上海”、遥远的“鸽房”区和华丽雅·鲍尔茨住的“木头街”还没有被占据。

街上已经看不到当地的居民，似乎整个城市都充满了土灰色的军服和同样颜色的、上面钉着银色日耳曼鹰的船形帽或制帽。灰色军服散布到各家的院子里和菜园里；无论是住房、车房、仓库和贮藏室的门口都可以看到这些军服。

奥西摩兴家和捷姆奴霍夫家住的那条街，是被乘卡车来到的步兵最先占领的街道之一。

这条街很宽，可以停卡车。但是因为害怕引起苏联飞机的注意，兵士们都奉了自己长官的命令，到处拆毁庭园的矮栅栏，让卡车可以自由开进院子，受正房和边屋的掩护。

有一辆大卡车上的兵士已经跳下来，车子开着倒车，马达呜呜地响着，卡车撞在奥西摩兴家庭园的栅栏上，栅栏发出要折断的声音。卡车蹂躏着房前的花草和花圃，使空气中弥漫着汽油的臭味，一面呜呜地响着退进奥西摩兴家的院子，停在墙边。

一个样子雄赳赳的上等兵，一脚踢开奥西摩兴家通门道的门，带着一群兵士从门道走进穿堂，闯进他们家里。这个上等兵生得皮肤黧黑，两撇朝前翘的胡子又黑又硬，船形帽压在前额上，露出的鬓角和后脑上的头发也是又黑又硬，好像毛毡一样。

彼此长得很像的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和刘西雅，都坐在沃洛佳的床边，刘西雅把身子挺得笔直。沃洛佳躺在床上，被单一直盖到下巴，狭长的棕色眼睛阴郁地望着前面。

他很激动，但是竭力不让亲人看出来。他们听到门道里咚的一响，穿堂里开着的门口就出现了上等兵和兵士们的汗湿的脏脸，这时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猛然站起身来，脸上带着她特有的坚决的表情，身子挺得笔直，迅速地迎着德国人走出去。

“很好，”上等兵说了这句话，高兴地笑起来，公然厚着脸皮亲切地盯着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的脸。“我们的兵士要驻在这里……只不过两三个晚上。只不过两三个晚上。①很好！”　　①原文为德语。

他背后的兵士们默默地、板着脸望着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她打开平时她和刘西雅住的那个房间的门。德国人还没有来她就决定，如果德国人要在她们家过夜，她们就搬到沃洛佳的房间里，可以大家在一起。但

是上等兵没有走进去，连看都没有看，——他从沃洛佳的敞开的门口望着笔直僵坐在沃洛佳床边的刘西雅。

“噢！”上等兵叫了一声，对刘西雅露出快活的笑容，还敬了个礼。“您的哥哥吗？”他伸出一根黑指头，没有礼貌地朝沃洛佳那边点戳了一下。“他受伤了吗？”

“不，”刘西雅说，她的脸红起来。“他有病。”

“她会说德国话！”上等兵笑着扭脸对着那些仍旧板着脸站在穿堂里的兵士。“您要隐瞒您的哥哥是个红军或是游击队员吗？要瞒住他是个伤兵吗？这种事情我们总查得出的。”上等兵带笑说，他的闪闪发光的黑眼睛向刘西雅献媚。

“不，不，他是学生，才十七岁，他动过手术。”刘西雅激动地回答。

“别害怕，我们不会碰您的哥哥。”上等兵对刘西雅笑笑说，又对她敬了个礼，这才望了望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指给他看的房间。“很好！这扇门通哪里？”他问，但是不等她回答就打开了通厨房的门。“好极了！马上生起火来。你们有母鸡吗？……鸡蛋，鸡蛋！”他亲切地笑起来，露出一副蠢相。

真奇怪，这个上等兵的话，和在全部战争岁月中都可以从亲身经历过的人嘴里听到、从报纸的通讯里和漫画说明里读到的形容德国人的笑话的内容，竟是一模一样。而他说的确实就是这种话。

“弗里德里赫，给我们准备吃的。”他由兵士们簇拥着走进了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指给他的那个房间，整座房子里马上就充满了谈笑声。

“妈妈，你懂吗？他们要鸡蛋，要生炉子。”刘西雅轻声说。

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仍旧站在穿堂里不吭声。

“你懂吗，妈妈？要不要我去拿劈柴？”

“我都懂。”母亲说，她的姿势不变，似乎有点过于镇静。

一个并不年轻的兵士从房间里走出来，他的下颚翘得厉害。一道伤疤从船形帽下面一直延伸到眉毛。

“你就是弗里德里赫吧？”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态度镇静地问道。

“弗里德里赫？我就是弗里德里赫。”兵士阴郁地说。

“来吧……你帮我去拿劈柴……鸡蛋我会拿给你的。”

“什么？”他莫名其妙地问。

但是她向他打了个手势，就到门道里去。兵士跟着她。

“行啦，”沃洛佳并不望着刘西雅，说，“把门关上吧。”

刘西雅掩上了门，以为沃洛佳有话要对她说。

但是等她回到床前，他却闭目躺着，不作一声。这时候，门也不敲，那个上等兵就出现在门口。他打着赤膊，皮肤黧黑，满身汗毛，他一手拿着肥皂盒，肩上搭着毛巾。

“你们的洗脸盆在什么地方？”他问。

“我们没有洗脸盆，我们就在院子里用杯子互相浇水冲洗。”刘西雅说。

“多么野蛮！”上等兵脚上穿着发土红色的厚底皮鞋，叉开腿站在门口，笑嘻嘻地望着刘西雅。“您叫什么名字？”

“刘德米拉。”

“什么？”

“刘德米拉。”

“不懂。刘……刘……”

“刘德米拉。”

“哦！鲁意莎！①”上等兵满意地叫起来。“您会说德国话，可是却用杯子洗脸，”他嫌恶地说。“很不好。”　　①原文为德语。

刘西雅没有作声。

“那么冬天呢？”上等兵叫道。“哈哈！……多么野蛮！那您至少要替我冲一下吧！”

刘西雅站起身来朝门口走，但是他仍旧叉开腿站在门口，露出满身的黑毛，一面嬉皮笑脸地、露骨地直盯着刘西雅。

她在他面前站住，低下头，脸红了起来。

“哈哈！……”上等兵又在那边站了一会，才让她过去。

他们走到台阶上。

沃洛佳能听懂他们的谈话，他闭目躺着，浑身都能感到强烈的心跳。如果他不生病，他可以代替刘西雅给德国人冲水。他因为意识到他和全家目前以及今后的屈辱处境而感到羞耻，他的心剧跳着，所以他闭上眼睛，免得流露出自己的心情。

他听见那批德国兵的沉重的、钉着钉子的皮鞋不断从穿堂到院子里走出走进。母亲在台阶上厉声说着什么，曳着鞋走进厨房，后来又来到台阶上。刘西雅悄悄地走进来，随手掩上房门，——母亲代替了她。

“沃洛佳！真可怕！”刘西雅很快地低声说，“四周的栅栏都拆光了。花坛全踩坏了，家家院子里都挤满了兵。他们脱下衬衫在抖虱子。就在我们的台阶前面，他们精赤条条的，用木桶里的冷水冲洗。我差点儿要呕出来。”

沃洛佳躺着，没有睁开眼睛，仍旧不作一声。

院子里的母鸡叫了起来。

“弗里德里赫在杀我们的鸡。”刘西雅说，她的声音里突然带着嘲笑。

上等兵经过穿堂走进房间，他打着响鼻，嘴巴里发出各种各样的断断续续的声音，他大概是一边走一边在用毛巾擦脸。接着，有好一会都可以听到他的响亮快活的声音，一个身强力壮的人的声音。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在回答他的话。过了一会，她抱着一卷铺盖进来，放在角落里。

厨房里在做菜，又是烤，又是煎，门虽然关着，煎东西的气味却钻了进来。他们的家成了一个过道，不断有人来来去去。从厨房里、院子里以及上等兵和兵士们住的房间里，都传来德语的谈话声和笑声。

刘西雅在语言方面很有才能。从学校毕业后，在战争的第一年里，她全年专学德语、法语和英语。她的志愿是进莫斯科的外语学院，希望将来做外事工作。现在她不由自主地听着这些兵士们的夹着粗话和说笑的谈话，而且听懂了不少。

“啊，我亲爱的朋友亚当！你好，亚当，你拿的是什么玩意儿？”

“乌克兰式的猪油。我想分点给你。”

“好极了！你有白兰地吗？没有？见它的鬼①，我们就来喝俄国伏特加吧！”

“听说，街那头有个老头家里有蜜。”

“我派小汉斯去。应当抓紧机会。鬼知道，我们在这里会不会待久，前面等着我们的又是什么。”

“前面等着我们的是什么？等着我们的是顿河和库班河，也许是伏尔加河。请你相信，那边不会比这里差。”

“在这里，我们至少活着！”

“妈的，这些该死的煤区！不是风就是尘土和烂泥，人人都像狼一样望着你。”

“有什么地方他们曾经友好地望过你？你凭什么以为，你是把幸福带给他们？哈哈！……”

有一个人走进穿堂，用沙哑的、女人般的嗓音说：

“希特勒万岁！②”

“呸，见鬼！这是彼得·芬庞！希特勒万岁！③……唉，该死④，我们还是头一次看见你穿这套黑衣服！来，让我们看看……伙伴们，来看啊，是彼得·芬庞！你想想，过了国境之后我们还没有见过面呢。”　　①②③④　原文为德语。

“人家会以为，你们是真的想念我呢。”那个女人般的嗓子嘲笑地回答。

“彼得·芬庞！你是从哪里来的？”

“你最好问我，到哪里去！上面命令我们到这个偏僻的鬼地方来。”

“你胸口挂的是什么？”

“我现在已经是分队长了。”

“哦！难怪你要发福了。党卫队里吃得一定比我们好。”

“不过他一定还是不脱衣服睡觉、不洗澡，我一闻那股味道就知道！”

“千万不要这样开玩笑，免得将来后悔。”那个女人嗓子沙哑地说。

“对不起，亲爱的彼得，谁叫我们是老朋友呢，对吗？如果玩笑都开不得，一个当兵的还有什么事可做呢！你怎么会跑到我们这里来的？”

“我在找房子。”

“你在找房子？！你们一向总可以弄到最好的房子。”

“我们占用了一所医院，房子非常大。但是我需要一个住宅。”

“我们这里有七八个人。”

“我看到了……挤得像鲱鱼！①”

“是啊，现在你是高升了，不过希望你别忘了老朋友。趁我们在这里的时候，常来玩玩。”

那个嗓子像女人的人尖声回答了一句，大伙都笑起来。他踏着钉铁掌的皮鞋，咚咚地走了出去。

“这个彼得·芬庞是个怪人！”

“怪人？他搞了个升官发财的机会，他做得对。”

“但是，你可看见过他单穿一件衬衫的时候吗？光着身子的时候就更甭提了。他是从来不洗澡的。”

“我疑心他身上生疥疮，不好意思让人家看见。弗里德里赫，你快做好了吗？”

“我要月桂叶子。”弗里德里赫阴郁地说。

“你以为仗快打完了，所以事先要给自己编一顶胜利者的桂冠②吗？”

①原文为德语。

②月桂叶子有香味，可作调味品。但月桂叶编成的桂冠是荣誉和胜利的象征，这里是取笑弗里德里赫的。

“完不了，因为我们是在跟全世界作战。”弗里德里赫阴郁地说。

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坐在窗口，一只胳膊支在窗台上，在想心事。窗外是一大片浴着夕阳的空地。在空地远远的边缘上，斜对着他们的小房子，耸立着两所单幢的白色砖房：比较大的一幢是伏罗希洛夫学校，另一幢比较小，是儿童医院。学校和医院都已经疏散，房子空着。

“刘西雅，你看，这是什么？”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把额头紧贴着玻璃，突然说。

刘西雅连忙跑到窗前。在那两幢房子左面，有一条大路穿过空地。在这条尘土飞扬的大路上，有一个很长的行列。起初刘西雅甚至不明白这是些什么人。一群男男女女，穿着医院的深色长衣，光着头，在大路上拖着腿走着；有的撑着拐杖勉强一拐一拐地走着，有的连自己的腿都不大能挪动，但还用担架抬着不知是病人还是伤员。一队戴白头巾、穿白罩衣的护士和穿普通服装的男女市民背着沉重的包袱走着。这些人是从窗口望不到的那一部城区，顺着大路走过来的。他们挤在儿童医院的大门口，有两个穿白衣的妇人试着要把大门打开。

“这是市立医院的病人！他们就这样被赶出来了。”刘西雅说，“你听见吗？你明白吗？”她转过脸来对着哥哥问道。

“我明白，我听到了，我马上就想到，那些病人怎么办？因为我在那边住过院。你要知道，那边还有伤员呢！”沃洛佳激动地说。

有好一会工夫，刘西雅和母亲看着病人搬家，又把她们所看到的情形轻声告诉沃洛佳，后来，德国兵的一阵乱哄哄的谈话吸引了她们的注意力。听声音，上等兵的房间里大概聚集了十个到十二个人。不过是这一批走了，又来了另外一批。他们是从晚上七点钟开始吃的，现在天已经全黑了，他们还在大吃大喝，厨房里还在煎什么。穿堂里，兵士的皮鞋声不断来回咚咚地响着。从上等兵的房间里传来了碰杯声、敬酒声和哄笑声。谈话时而热烈起来，时而沉寂下去，那是在上菜的时候。说话的声音愈来愈带醉意，愈来愈放肆。

厨房里的热气和油烟味钻到房主人一家的房间里，房间里又闷又热，可是她们仍旧不敢开窗。天色已经很暗，但她们好像有默契似的，没有点灯。

七月的漆黑的夜幕已经下垂，可是她们仍旧坐着，不去铺床，不敢躺下。窗外的空地上已经什么都辨不清，只有空地右面长山岗的黑黝黝的岗顶和屹立在岗顶上的区执行委员会和“疯老爷”的房子，衬着背后比较明亮的天空，还依稀可辨。

上等兵的房间里唱起歌来。他们唱歌不像普通醉汉那样，而是像吃醉的德国人那样：唱的声音完全一样的低沉，而且紧张得可怕；他们拚命想唱得又低同时又响，他们的声音甚至嘶哑了。后来他们又碰杯喝酒，喝了再唱，唱了再吃，在他们吃的时候，才算安静了一会。

突然，一阵沉重的皮鞋声从门厅里传过来，到了房主人的房门口停下了，——走过来的人好像在门外倾听。

门外的人用指头在门上重重地敲了一下。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打了一个不要开门的手势，假装她们已经睡了。接着，外面又敲了一下。几秒钟后，那人用拳头在门上使劲捶了一下，门开了，一个漆黑的脑袋伸了进来。

“有人吗？”上等兵用俄语问。“女主人！”

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门口。

“您要什么？”她轻声问。

“我和我的兵士们想请你们跟我们一块吃点东西……你和鲁意莎。稍微吃一点。”他解释道，“还有那个男孩子！……

你们也可以给他带一点东西来。稍微带一点。”

“我们吃过了，我们不想吃了。”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说。

“鲁意莎在哪里？”上等兵不懂她的话，他满身酒气，一边喘一边打着饱嗝问，“鲁意莎！我看见您了。”他咧着嘴笑笑说，“我和我的兵士们想请您跟我们一块吃一点东西。再喝一点酒，要是您不反对的话。”

“我哥哥不舒服，我不能离开他。”刘西雅说。

“你们大概是要收拾桌子吧？走，我去帮你们收拾，我们走吧。”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大胆地拉住上等兵的衣袖，跟他一起往穿堂去，随手把门带上。

厨房里、穿堂里和大摆筵席的房间里，到处都弥漫着青黄色的煤烟，熏得人流泪。圆形洋铁灯盏里发出的朦胧的黄光好像熔化在这一片乌烟瘴气之中，这些灯盏里灌满白乎乎的东西，不知是硬脂还是别的类似硬脂的东西。厨房里的桌子上、窗台上、穿堂衣架的顶板上、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和上等兵一起走进去的挤满德国兵的房间里的桌上，到处都点着这种灯盏。

德国人把桌子搬到床边，大伙围桌而坐。他们紧挤着坐在床上、椅子上和凳子上，脸上有伤疤的、阴郁的弗里德里赫坐在平时劈柴的木砧上。桌上放着几瓶伏特加，桌上、桌下和窗台上还有许多空酒瓶。桌上杯盘狼藉，堆放羊骨头、鸡骨头、咬剩下的蔬菜和面包皮。

坐在那里的德国人都不穿制服，脏衬衫的领口敞着，一个个都满脸是汗，身上毛茸茸的，从手指到肘部都是油乎乎的。

“弗里德里赫！”上等兵喊叫起来。“你怎么坐着不动？你难道不知道应该怎样伺候漂亮姑娘的母亲！”他笑起来，笑得比没醉的时候更露骨、更高兴。周围的人也都笑起来。

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感到他们是在笑她，她怀疑上等兵的话要比它实际的内容坏得多；她脸色苍白，样子可怕，默默地把桌上的残食扫到一只用过的空盘子里。

“您的女儿鲁意莎在哪里？来和我们干一杯吧，”一个年轻兵士说，他喝得醉醺醺的，面孔通红，两手哆哆嗦嗦地从桌上拿起酒瓶，眼睛搜寻着干净酒杯。他找不到杯子，就把酒斟在自己的酒杯里。“请她到这里来！德国兵请她来。听说她懂德语。让她来教我们唱俄国歌……”

他把拿着酒瓶的手一挥，鼓足气力，瞪着眼，用可怕的、低沉的声音唱起来：

伏尔加，伏尔加，亲娘伏尔加，

伏尔加，伏尔加，俄罗斯的河……①

他站起来，用酒瓶指挥着唱，瓶里的酒都泼在兵士们身上、桌上和床上。黑脸的上等兵哈哈大笑起来，也跟着唱，接着大伙都用可怕的、低沉的声音一同唱起来。

“是啊，我们要开到伏尔加！”一个眉毛湿濡濡的大胖子德国兵嚷着，竭力要盖过歌声。“伏尔加是德国的河！德国的河②。应该这样唱！”他大嚷着。接着，为了证实他的话和他本人的决心，就用力把叉子朝桌上一插，把叉子

的齿都弄弯了。　　①②　原文为德语。

他们在专心唱歌，谁也没有觉察，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拿着装残食的盘子到厨房里去了。她想涮涮盘子，可是灶上没有烧开水。“不错，他们是不喝茶的。”她心里想。

弗里德里赫在灶旁忙了一阵，用抹布衬着从灶上端下满满一锅油炸的羊肉，又走了。

“大概是把斯龙诺夫家的羊宰了。”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暗想，一面听着这些乱哄哄的、全是醉醺醺的嗓音用德语唱的古老的伏尔加河歌。但是她对这个，也像对四周发生的一切一样，已经置之漠然，因为她和她的儿女在日常生活中所习惯的衡量人类感情和行为的那种尺度，在她们目前所过的这种生活里已经不能适用。他们不仅在外表上、就连在内心里也是生活在一个跟惯常的人类关系的世界很不相同的世界里。这个世界仿佛是虚幻的，似乎只要一睁开眼睛，这个世界就会消失不见。

叶李莎维塔·阿列克对耶芙娜悄悄地走进沃洛佳和刘西雅的房间。他们在低声谈话，她一进去他们就住了嘴。

“也许，你还是铺好床躺下比较好？也许你还是睡觉比较好？”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说。

“我不敢睡下。”刘西雅轻声回答。

“这个狗东西，只要他敢再来试一次，”沃洛佳说，他突然从床上抬起身来，脸色发白，“只要他敢来试一试，我就打死他，是的，是的，打死他，我反正是豁出去了！”他又说了一遍，他苍白、瘦削，双手撑在床上，眼睛在半明半暗中闪闪发光。

这时外面又有人敲门，门慢慢地开了。上等兵在门口出现了，他贴身的衬衫塞在裤子里，一手拿着灯盏，摇曳不定的灯光照在他的又黑又胖的脸上。他伸长脖子，对坐在床上的沃洛佳和坐在哥哥脚旁凳子上的刘西雅望了一会。

“鲁意莎，”上等兵庄严地说，“您不应当讨厌每日每时都可能牺牲的兵士！我们不会对您有不好的举动。我敢说，德国兵士是高尚的人，是骑士。我们请您来陪陪我们，我的话完了。”

“滚开！”沃洛佳怀着憎恨望着他说。

“噢，你这个小伙子样子倒很神气，可惜病倒了！”上等兵亲切地说；在半明半暗之中他看不清沃洛佳的脸，也听不懂他的话。

谁也无法逆料，这一刹那可能出什么事，要不是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急忙走到儿子跟前，抱住他，把他的脸紧压在自己胸口，使劲把他按到床上。

“别开口，别开口！”她把火热的、焦干的嘴唇凑着他的耳朵说道。

“元首的军队的兵士们在等候您的答复，鲁意莎！”醉醺醺的上等兵庄严地说，他穿着贴身衬衫，露出胸口的黑毛，手里拿着灯盏，摇摇晃晃地站在门口。

刘西雅坐在那里，脸色苍白，不知怎么答复。

“好，很好！‘古特！’①”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厉声说，一面点着头急忙走到上等兵跟前。“她马上就来，懂吗？‘费尔什推埃？’②她换件衣服就来。”她用双手比划着换衣服的样子。　　①德语“好！”的译音。

②德语“懂吗？”的译音。

“妈妈……”刘西雅的声音发抖了。

“上帝没有给你聪明，你就别吭声。”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说，一面向上等兵点着头，把他送出去。

上等兵出去了。虽然隔着穿堂，房间里还是可以听见叫喊声、哄笑声和碰杯声，德国人用同样的、低沉的声音又兴高采烈地唱起来：

伏尔加，伏尔加，亲娘伏尔加……①　　①原文为德语。

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赶紧走到衣橱跟前，用钥匙打开橱门。

“你钻进去，我把你关在里面，听见吗？”她低声说。

“那怎么……”

“我们就说，你到院子里去了……”

刘西雅钻进衣橱，母亲关上橱门，上了锁，把钥匙放在橱顶上。

德国人疯狂地唱着。夜已经深了。窗外已经辨不出学校和儿童医院，辨不出上面屹立着区执行委员会和“疯老爷”的房子的长山岗。只有穿堂里的一道细光从下面门缝里透进来。

“我的天哪，难道这一切都是真的吗？”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心里想。

德国人停止了歌唱，他们中间发生了酒后开玩笑式的争论。大家都笑着攻击上等兵，他也拉开他那大胆的、从不气馁的兵士的沙嗓门，高兴地进行反击。

不多一会，他又拿着灯盏在门口出现了。

“鲁意莎呢？”

“她到院子里去了……到院子里去了。”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用手指给他看。

上等兵晃了一晃，就举着灯盏，咚咚地踏着大皮鞋，到过道里去了。只听见他咚咚地走下了台阶。兵士们哄笑着又谈了一会，后来他们的皮鞋声在过道里和台阶上咚咚地响着，也拥到院子里去了。一时安静下来了。在隔着穿堂的房间里，有人——大概是弗里德里赫——在收拾餐具，弄得叮当作响，还听见兵士们就在院子里的台阶旁边撒尿。有几个兵士不多一会就闹嚷嚷地满口醉话回来了。上等兵一直没有回来。最后，台阶上和过道里响起了他的脚步声。房门打开了，这一回上等兵已经不拿灯盏，出现在从大开着的厨房门里射出来的、阴惨惨的灯光和烟雾的背景上。

“鲁意莎……”他轻声喊道。

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像阴影似的出现在他面前。

“怎么？你没有找到她？……她没有回来，她不在。”她一面说，一面又是摇头又是摆手。

上等兵睁着迟钝的眼睛朝房间里扫视了一下。

“呜—呜—呜……”他突然醉醺醺地、生气地咕噜了一声，他的浑浊不清的黑眼睛停留在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身上。同时，他又伸出一只满是油腻的大手放在她脸上，拚命捏紧手指，差点把她的眼珠都挤出来，然后才把她推开，摇摇晃晃地走了出去。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赶快锁上了门。

德国人还乱了一阵，醉醺醺地说了些什么。后来他们连灯也不熄就睡了。

沃洛佳仍旧没有睡着，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默默地坐在他对面。他们感到精神万分疲倦，但又不想睡。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稍等了一会，就把刘西雅放出来。

“我差点儿闷死了，我整个脊梁都湿透了，连头发也湿了。”刘西雅激动地低声说。这次惊险的场面似乎激起了她的勇气。“我来轻轻地打开窗子。我快要闷死了。”

她轻轻地打开靠床的窗子，把头伸出去。夜是闷热的，但是经过房间里的闷热和屋子里发生的一切之后，空地上飘来的空气就显得非常新鲜。城里笼罩着一片寂静，好像四周并没有城市，只有他们这所里面有德国人在熟睡的小房子孤零零地屹立在漆黑的空地当中。突然，在上面过道口那边，在公园旁边，有一道鲜明的闪光霎时间照亮了天空，也照亮了整个空地、山岗、学校和儿童医院。过了一刹那，又是一道闪光，比上次的更强烈，一切又从黑暗中显现出来，连房间里有一霎时也照得通明。随着而来的，与其说是爆炸，不如说是一阵阵仿佛由远处爆炸引起的无声的空气震动，一阵接一阵地滚过空地上空，接着又是一片漆黑。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惊骇地问道。

沃洛佳也在床上抬起身来。

刘西雅心里怀着异样的恐惧凝视着黑暗，凝望着冒起这些闪光的那一边。从这里看不见的火焰的反光在那边高处摇曳着，时强时弱，一会儿照亮区执行委员会大厦和“疯老爷”房子的屋顶，一会儿又把它们投入黑暗。突然，在这道怪光的发源地，有一条火舌腾空而起，把它上面的整个天空都染成紫红色，照亮了全城和空地，房间里也亮得可以看见人脸和各样东西。

“起火了！……”刘西雅转脸朝里说，声音里带着异样的得意的口吻，接着又把目光盯着这条高腾的火舌。

“关窗。”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惊骇地说。

“反正没有人看见。”刘西雅说，好像怕冷似的瑟缩着。

她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火灾，它是怎么发生的。但是在这高腾的、猛烈的、胜利的火焰里面，有着一种涤荡灵魂的东西，一种崇高而又令人生畏的东西。刘西雅目不转睛地望着火焰，她自己也被照亮了。

火光不仅扩散在城中心的上空，而且远远地扩散到四周。不单是学校和儿童医院可以像白天那样看得清楚，连分布在空地后面、跟新一号井毗连的远远的城区也都可以看见。这片紫红的天空和大厦屋顶以及山岗上映出的大火的反光相配合，构成了一幅幻景似的、神奇的、但同时又是庄严伟大的画面。

可以感到，整个城市都醒了。从城中心那边，不断传来有人走动的声音，传来了个别的人声、叫喊声，什么地方还有卡车隆隆地响着。奥西摩兴家住的那条街上以及各家院子里的德国人都醒了，忙乱起来。没有杀绝的狗，忘掉了白天的恐怖，对着火光狂吠，只有隔着穿堂的那个房间里的德国醉鬼什么都没有听见，仍旧呼呼大睡。

熊熊大火燃烧了将近两小时，后来渐渐熄灭。远处的城区和山岗又被黑暗笼罩。只有最后的闪光有时忽然一亮，又把圆圆的山岗、一片屋顶或是暗色的锥形矸石堆显现出来。但是公园上空的时而减弱、时而又增强的紫红色火光，还是久久不熄，山岗上面的区执行委员会和“疯老爷”的房子还是久久可以看见。后来它们也渐渐暗下去，窗前空地上的黑暗也愈来愈浓了。

可是刘西雅仍旧坐在窗前，兴奋地望着起火的那一边。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和沃洛佳也没有睡。

突然刘西雅觉得，仿佛有一只猫在窗子左面的空地上一闪而过，墙下有什么东西在窸窸窣窣地响。有人偷偷地走到窗前。刘西雅本能地往后一闪，刚要把窗关上，但是有人低声唤她的名字，阻止了她：

“刘西雅……刘西雅……”

她愣住了。

“别怕，是我，邱列宁。”说着，在齐窗台的地方就出现了谢辽萨的没有戴帽子、满头粗硬的鬈发的头。“你们家有德国人吗？”

“有，”刘西雅低声说，一面惊喜交集地望着谢辽萨的大胆的含笑的眼睛。“你们家呢？”

“我们家还没有。”

“是谁？”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吓得发冷，问道。

大火远处的反光照亮了谢辽萨的脸，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和沃洛佳才认出了他。

“沃洛佳在哪里？”谢辽萨把肚子伏在窗台上，问道。

“我在这里。”

“还有谁没有走？”

“有托里亚·奥尔洛夫。别的我就不知道了，我哪儿也没有去过，我得了阑尾炎。”

“维佳·鲁基扬庆柯在这里，还有刘勃卡·谢夫卓娃也在。”谢辽萨说，“我还看见过高尔基学校的斯巧巴·萨方诺夫。”

“深更半夜，你怎么会跑到我们这里来的？”沃洛佳问。

“我先是看火，在公园那边。后来我穿‘小上海’回家，从峡谷那边看见你们的窗开着。”

“起火的是什么地方？”

“煤业联合公司。”

“啊？”

“他们的司令部设在那边。他们都只穿着裤衩跳出来。”谢辽萨轻轻地笑起来。

“你看是有人放火吗？”沃洛佳问。

谢辽萨沉默了一会，他的眼睛像猫眼似的在黑暗中闪闪发光。

“总不是自己烧起来的。”他说着又轻轻地笑起来，“你打算怎么生活？”他突然问沃洛佳。

“那么你呢？”

“你好像不知道似的。”

“那我也是一样。”沃洛佳轻松地说，“我看见你真高兴。

你知道，我多么高兴……”

“我也很高兴。”谢辽萨不情愿地说，因为他对人家的真情流露受不了。“你们家里的德国人凶吗？”

“喝酒喝了一整夜。把我们的鸡都吃光了。几次闯进我们的房间。”沃洛佳随便地说，同时又像在谢辽萨面前炫耀：他已经尝过德国人的滋味。他只是没有说上等兵跟他妹妹纠缠的事。

“就是说，还可以。”谢辽萨镇静地说，“可是他们党卫队住进了医院，

那里面原来留下四十来个伤员，他们把全体伤员都送到上杜望纳雅林子里，用自动枪扫射。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医生看见他们要把伤员运走，忍不住出来反对，结果他们干脆就在走廊里把他打死了。”

“啊，该死！……哎哟哟……这是一个多好的人啊！”沃洛佳皱着眉头说，“我在那边住过院。”

“这样的人很少见。”谢辽萨说。

“天哪，将来还不知道要怎么样呢！”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轻轻地呻吟了一声。

“我要走了，趁天还没有亮。”谢辽萨说，“我们以后要保持联系。”他望了刘西雅一眼，做了一个怪里怪气的手势，雄赳赳地说：“‘奥夫－维德生！’①……”他知道她的志愿是进外国语学院。

①德语“再见！”的译音。

他的灵活、矫捷、瘦小的身子钻进了黑暗里，马上就看不见他，也听不见他了，——他好像是蒸发掉了。

第十九章

最奇怪的是他们这么快就谈妥了。

“你在看什么啊，姑娘？德国人开进克拉斯诺顿了！你难道没有听见上杜望纳雅传来的卡车的声音？”谢辽萨站在她的脚旁，好容易抑制着呼吸，说道。

华丽雅仍旧带着那种平静的、又惊又喜的表情，默默地望着他。

“你往哪儿跑啊？”她问。

有一刹那的工夫他感到有些发慌。但是不，这个姑娘不可能是坏人。

“我要到你们学校里去，看他们怎么……”

“你怎么去法？你难道去过我们学校？”

谢辽萨说，大约两年前他曾到他们学校去过一次，参加文艺晚会。

“我总有办法溜进去。”他笑了一声。

“但是德国人会不会第一步就占领学校？”华丽雅说。

“我要是看见他们来了，我就一直往公园里跑。”谢辽萨回答说。

“你知道，最好是待在阁楼上，在那里什么都看得见，可是人家看不见我们。”华丽雅说着就在毛毯上坐起来，很快地整理了辫子和衬衫。“我知道怎么进去，我可以给你做向导。”

谢辽萨突然露出了几分踌躇的神气。

“你看，是这么一回事，”他说，“如果德国人冲进学校，我们就得从二楼跳下去。”

“那有什么办法呢。”华丽雅回答说。

“你能行吗？”

“那还用问……”

谢辽萨望了望她那结实的、晒黑的、覆着金色柔毛的腿，心里感到一阵暖意。不用说，这个姑娘是能从二楼跳下去的！

不多一会，他们俩已经穿过公园朝学校奔去。

这所红砖墙的、宽大的、两层楼的学校就在公园大门旁边，在克拉斯诺顿煤业联合公司大厦的对面，里面的教室光线充足，还有一所很大的体育馆。学校里是空的，门锁着。但是，出于他们所追求的崇高目的，谢辽萨折了一束树枝，用树枝打破楼下面对着公园深处的一扇窗户，而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可耻的。

他们在地板上踮起脚尖穿过一间教室，走进楼下走廊的时候，他们心里不禁起了敬畏之感。整个宽敞的建筑物里都是静悄悄的，最轻微的窸窣声和响声都会在四周引起空洞的回声。在这几天里面，大地上有许多东西已经起了变化，有许多人和许多建筑物都丧失了原来的名称和任务，但是还没有获得新的名称和任务。不过无论如何，这总是教育过儿童的学校，华丽雅曾在这里度过她一生中许多欢乐的日子。

他们看到钉着“教师室”的小牌的门，钉着“校长室”的小牌的门，钉着“校医室”、“物理实验室”、“化学实验室”和“图书室”的小牌的门。是的，这是学校，成年人，也就是教师们，曾在这里把知识和应该怎样在世界上生活的道理教给儿童。

看到这些放着空课桌的空教室，看到这些还保持着特殊的学校气味的房子，谢辽萨和华丽雅眼前突然浮现出他们在里面长大的那个世界。这个在过去和他们是不可分离的世界，现在却似乎一去不复返了。有一个时期，这个世界似乎是那么普通、平凡、甚至乏味。现在它突然在他们面前升起，却是这样无比的美妙、自由，充满了师生之间的坦率、真诚和纯洁的关系。现在他们，老师们和同学们，都在哪里呢？命运把他们播弄到哪里去了？霎时间，谢辽萨和华丽雅的心都膨胀了，充满了对他们当时不知珍视的那个逝去的世界的热爱，充满了面对这个崇高神圣的世界油然而生的敬畏。

他们俩都体验到同样的心情，——嘴里虽然不说，可是心里都明白；在这几分钟里，他们相互之间特别接近起来。

华丽雅领谢辽萨顺着一座狭窄的小楼梯走到二楼，再上去，到了通阁楼的小门跟前。门关着，但是这难不倒谢辽萨。他在裤袋里摸了一会，掏出一把多用的折刀，其中就有螺丝刀。他旋下螺丝钉，卸下门的把手，让钥匙孔眼露出来。

“你的本领真不错，一看就知道是一个会撬门溜锁的惯贼。”华丽雅取笑道。

“世界上除了撬门贼之外还有铜匠呢，”谢辽萨说，他转过脸来对着华丽雅笑了一笑。

他用凿子在钥匙孔里拨弄了一下，打开了门；晒得发烫的铁皮屋顶散发出来的热气，阁楼上晒热的泥土、灰尘和蛛网的气味，都向他们扑过来。

他们怕头撞在椽木上，弯着身子走到阁楼上一扇满是尘土的窗前；他们怕被街上的人看见，也不擦窗，就把脸紧贴着玻璃，两人的面颊几乎碰到一块。

他们从窗口可以看见通到公园大门的整条公园街，特别是可以看见耸立着州党委干部住的标准式房屋的那一边。正对着他们前面的街道拐角上，是克拉斯诺顿煤业联合公司的两层楼大厦。

从谢辽萨离开上杜望纳雅林子，到此刻他和华丽雅一起把脸紧贴着阁楼上满布尘土的玻璃窗，中间相隔的时间已经不短：德军部队已经进了城，

整条公园街都挤满了车辆，满眼尽是德国兵。

“德国人……原来德国人就是这样！德国人已经进了我们的克拉斯诺顿！”华丽雅心里想道。她的心扑通扑通地跳起来，她的胸部由于激动而起伏着。

谢辽萨更关心的却是事情的外表的、实际的一面；他的锐利的眼睛看到了他们从阁楼窗口看出去的视野中的一切，不自觉地把每一个细节都记住了。

学校和煤业联合公司中间相隔不到十公尺。煤业联合公司的房子比学校低。谢辽萨可以看到下面的铁皮屋顶、二楼的房间内部和楼下靠窗的一部分地板。除了公园街之外，谢辽萨还看到有些地方被房屋挡住的别的街道。他还看到被德国兵霸占的房屋的院子和后院。他渐渐地把华丽雅也吸引到他观察的范围。

“灌木，他们在砍灌木……你看，连向日葵都砍掉了，”他说，“可是这儿，在煤业联合公司里，大概要设立他们的司令部。瞧，他们那副作威作福的神气……”

德国官兵——事务员和文书——井井有条地把自己安排在煤业联合公司的上下两层。德国人的样子都很高兴。他们把全部窗子都打开，在分配给他们的房间里东看西看，在桌子抽屉里乱翻，抽着烟，把烟头扔到煤业联合公司和学校中间无人的夹道里。过了一会，房间里出现了几个俄罗斯妇女，有老有少。她们都拿着水桶和抹布，一个个都撩起衣服，开始洗地板。干净整齐的德国文书们就拿她们当做说笑的材料。

发生这一切的地点离华丽雅跟谢辽萨是那么近，谢辽萨的心里突然一动，起了一个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无情的、折磨着他同时又给他带来喜悦的念头。他甚至注意到，阁楼上的窗子很容易取下来。窗子很单薄，用几根细钉斜钉在窗框上。

谢辽萨和华丽雅在阁楼上坐了很久，他们已经聊起不相干的闲事来。

“后来你没有看到斯巧巴·萨方诺夫吗？”谢辽萨问。

“没有。”

“那就是说，她什么话都没有对他说。”谢辽萨满意地想道。

“他还要来的，他这个小伙子很可靠。”谢辽萨说。“往后你打算怎样生活？”他问。

华丽雅自尊地耸耸肩膀。

“这事，现在谁能说呢？谁也不知道将来会是个什么样子。”

“这倒是真的。”谢辽萨说，“以后可以去看你吗？你爸爸妈妈不会骂吗？”

“爸爸妈妈！……你要是愿意，就明天来吧。我还可以去叫斯巧巴。”

“你叫什么名字。”

“华丽雅·鲍尔茨。”

这时传来了长长的自动枪声，后来又是几声短的，——

大概是从上杜望纳雅林子那边传来的。

“在放枪。你听见吗？”华丽雅问。

“我们坐在这里，也许城里已经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了，”谢辽萨一本正经地说，“也许德国人已经住到你们家里和我们家里去了。”

这时候华丽雅才想起来，她是在什么情况下从家里出来的，她想，也

许谢辽萨说得对，母亲和父亲在为她担心。自尊心不让她先开口说她应该走了，但是谢辽萨却从不关心会有人惦记他。

“该回家了。”他说。”

他们就顺着原路出了学校。

他们在花园前面的栅栏旁边又站了一会。他们一块儿在阁楼上待了那一阵之后，现在都觉得有些忸怩不安。

“那么我明天来看你。”谢辽萨说。

回到家里，谢辽萨得知后来他在夜里告诉沃洛佳的消息：留在医院里的伤员们被运走和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医生遇害的事。这是当着娜佳姐姐的面发生的，是她把这件事情的经过告诉了谢辽萨。

两辆小汽车和几辆载着党卫队员的卡车开到医院门口。娜塔丽雅·阿列克谢耶芙娜走了出来，他们命令她在半小时内腾出房子。娜塔丽雅·阿列克谢耶芙娜马上关照所有能够行动的病人搬进儿童医院，但是她仍旧请求放宽腾房的限期，因为她有许多病人不能起床，而且又没有交通工具。

军官们已经坐进了汽车。

“芬庞！这个女人要什么？”一个上级军官对一个镶金牙、戴浅色玳瑁边眼镜、高大虚胖的军士说。接着小汽车就开走了。

这副浅色玳瑁边眼镜使这个党卫队军士的外表即使不像学者，起码也像一个知识分子。

但是当娜塔丽雅·阿列克谢耶芙娜向他提出请求，甚至试图用德语和他谈话的时候，他的目光透过这副眼镜对娜塔丽雅·阿列克谢耶芙娜却好像熟视无睹。他用女人般的嗓子唤来了兵士，他们并不等半小时的限期过完，就动手把病人拖到院子里。

他们把病人放在垫子上拖出来，或是干脆架着胳肢窝拖出来扔在院子里的草坪上。这时候，他们发现了医院里有伤兵。

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自称是市立医院的医生，他试图解释说，这都是些重伤员，已经丧失作战能力，所以留下来由老百姓照料。但是那个军士说，他们既然是军人，就应该算是战俘，马上要把他们送到适当的地方去。于是他们就动手把那些只穿一身内衣的伤员们拖下床来，胡乱扔进卡车，一个压着一个。

娜塔丽雅·阿列克谢耶芙娜知道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的性情急躁，请他不要待在这里，但是他不肯走开，一直站在走廊里的两扇窗子中间。他的晒黑的、发出暗色光辉的脸变成灰色的。他一直用嘴唇转动着半段吸剩的自卷纸烟，他的膝盖抖得厉害，使他有时要弯下身子用手去揉它。娜塔丽雅·阿列克谢耶芙娜不敢离开他，还请娜佳也等一切事情完毕后再走。娜佳看到那些缠着血污的绷带、衣服没有穿好的伤员被拉着走过走廊，有时简直就在地板上拖，觉得又是可怜又是害怕。她不敢哭，可是泪水却自然而然地从眼眶里流出来，但是她仍旧不走，因为她更替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担心。

两个德国兵拖着一个伤员走着。两星期前，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给这个伤员动过手术，取掉一只被迫击炮弹片炸裂的肾脏。近几天来这个伤员的情况已经显著好转，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对这次手术颇为得意。两个兵士正拖着这个伤员在走廊里走着，这时芬庞军士喊了其中的一个兵士，那个兵士扔下他正拖着的伤员的腿，跑进芬庞待的病房，另一个兵士就把伤员在地上拖着走。

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猛然离开墙边，谁都来不及看住他，他已经到了那个拖着伤员的兵士身旁。这个伤员像他们里面的多数人一样，不管遭受多大的痛苦，都不哼一声，但是他一看见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就说：

“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你看见他们的作风吗？这哪里是人！”

说着就哭起来。

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用德语对那个兵士说了几句话。多半是说，这样是不可以的。

多半是说，让我来帮忙。但是德国兵大笑起来，还是拖着伤员往前走。这时芬庞军士从病房里走出来，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就直冲着他走过去。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的脸色苍白得可怕，浑身颤抖。他几乎是向军士扑过去，声色俱厉对他说了些什么。这个军士身材高大，可是虚胖，身上的黑制服都是皱褶，胸前画着骷髅与白骨的金属徽章闪闪发光；他哑声对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说了些什么，用手枪朝他脸上戳了一下。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闪开了，又对他说了几句大概使他非常生气的话。那时，军士可怕地鼓起眼镜后面的眼睛，对准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的眉心开了一枪。娜佳看见他的眉心好像瘪陷下去，鲜血迸射出来，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就倒下了。娜塔丽雅·阿列克谢耶芙娜和娜佳跑出了医院，娜佳自己都不记得，她是怎么到家的。

娜佳坐在那里，仍旧像她从医院里跑出来的时候那样戴着护士头巾，穿着白罩衣。她一遍又一遍地讲述着。她没有哭，她脸色惨白，小小的颧骨烧得通红，发亮的眼睛并没有看见听她讲述的人。

“听见了吗，野小鬼？”父亲怒冲冲地对谢辽萨咳嗽着，“我真恨不得用鞭子抽你一顿。德国人进了城，你还到处乱跑。

差一点没把你母亲急死！”

母亲哭了。

“我为你急死了。我还以为你被打死了呢。”

“‘被打死了’！”谢辽萨突然恨恨地说，“我倒没有被打死。可是伤员们被打死了。

在上杜望纳雅林子里。我亲耳听见的……”

他走进上房，扑在床上，把脸埋在枕头里。复仇的念头使他全身发抖，他觉得呼吸困难了。在学校的阁楼上那样折磨着他、使他苦恼的念头现在找到了出路。“你们等着吧，只要天一黑！”他在床上翻来覆去，心里盘算着。任何力量都已经阻挡不住他，他一定要实现他的计划。

他们没有点灯，很早就上了床，但是大伙都非常激动，谁也睡不着。要偷偷地溜出去根本不可能，他只好公开地走出去，仿佛是到院子里去，其实却溜进了菜园。他用手刨开一个埋着燃烧瓶的坑——夜里用铲子挖很危险。他听到门响了一下，娜佳姐姐从屋子里走出来，低低地唤了几声：

“谢辽萨……谢辽萨……”

她等了一会，再唤了一声，后来门又响了一声——姐姐走了。

他在两个裤袋里塞了两瓶，怀里揣了一瓶，靠闷热的七月的夜色掩蔽着，从“小上海”绕过城中心，再度溜进公园。

公园里寂静无声，一片荒凉。但是特别寂静的却是他白天破窗而入的校舍。校舍里非常寂静，似乎他每走一步不仅校舍里可以听见，甚至全城都能听见。外面有一线朦胧的亮光射进楼梯上面高高的窗洞。谢辽萨的身形在

窗上出现的时候，他总觉得有一个隐伏在黑暗角落里的人马上会看见他，抓住他。但是他克服了恐惧，很快就到了阁楼上他的瞭望所。

他在窗子旁边坐了一会。现在隔着窗子什么都看不见了，他坐着只是为了缓一口气。

过了一会，他用手指摸到钉着窗框的钉子，拔了出来，再轻轻地取下窗框。一阵清新的空气迎面扑来，阁楼上仍旧闷热异常。经过校舍里的黑暗，特别是这儿阁楼上的黑暗之后，他已经能够辨别他前面街道上的动静。他听到卡车在城里开动，看见卡车的隐约移动的灯光。已经是夜里了，部队还继续川流不息地从上杜望纳雅那边开过来。在那边的整条大路上，都可以看到卡车的灯光在黑夜里照耀着。有几辆卡车开足了灯光，灯光突然从山岗后面射向高处，像探照灯似的远远地划破夜空。灯光不是照亮了一部分草原，就是照亮了林子里的白色叶背朝外的树木。

在煤业联合公司大厦的总入口处，军队的夜间活动继续着。卡车和摩托车不断开来。官兵们不断进进出出，步枪和马刺铿锵作声。还听到外国人的、刺耳的谈话声。但是煤业联合公司的窗上都遮着黑纸。

谢辽萨的全部感觉是那样地紧张，他的全副精神是那样地集中在一个目标上面，所以窗上遮着黑纸这个没有预料到的新情况并没有使他改变决定。他在窗子旁边至少坐了两个钟头。城里的一切都寂静下来。大厦旁边的活动也停止了，但是里面的人还没有睡。谢辽萨这是根据从黑纸边上透出的光线看出来的。但是后来二楼的两扇窗子里熄了灯，里面的人先打开一扇窗，又打开了第二扇。谢辽萨虽然看不见那个人，但是感觉到那人是在黑暗中站在窗口。楼下一些窗子里的灯光也熄了，这些窗子也打开了。

“那边是谁？①。从二楼的一扇窗里发出了一个完全是长官口吻的声音，谢辽萨隐约地辨得出有一个侧影从窗口探出身来。“那边是谁？”这个声音又问道。　　①原文为德语。

“梅耶中尉，上校先生①”下面一个年轻的声音回答道。

“换了我，是不会劝你们打开楼下的窗户的。”上面的声音说。

“闷得要命，上校先生②当然，如果您禁止的话……”

“得啦，我决不要把你们变成红焖牛肉。你们不必变成红焖牛肉。③”上面那个长官口吻的声音带笑说。

谢辽萨虽然听不懂德语，却心里怦怦乱跳地倾听着。

窗内的灯都熄了，窗帘拉起来了，窗子也一扇接着一扇地打开了。有时从窗里传出了片断的谈话声，有人在吹口哨。有时有人划了火柴，一霎时照亮了那人的脸、香烟和手指，过后还可以久久地看到房间深处的烟头的光点。

“这个国家真大，好像没边没沿，看不到尽头。④”窗口有人说，大概是对房间里面的同伴说的。　　①②③④　原文为德语。

德国人都去睡了。大厦里面和城里的一切都寂静了。只有在上杜望纳雅那边，还有卡车在行驶，车灯的刺眼的亮光划破了黑夜的天空。

谢辽萨听得见自己的心跳，它跳得似乎整个阁楼都可以听见。这里还是非常闷热，谢辽萨浑身都渗出汗来。

开着窗子的煤业联合公司大厦，沉浸在黑暗和睡梦中，朦胧地显现在他面前。他能看见楼上楼下的黑魆魆的大开着的窗洞。是的，必须马上动手……他挥动胳膊做了几次试验动作，看能够扔多远，并且大致地瞄准一下。

他一来到这里就把裤袋里和怀里的瓶子掏了出来，现在它们就在他身边。他摸到了其中的一瓶，紧抓住瓶颈，瞄准了一下，用力把它扔进楼下一扇开着的窗里。一阵耀眼的火光照亮了整个窗子，甚至照亮了煤业联合公司和学校中间的一部分夹道，在同一刹那，听到好像是打破电灯泡的那种玻璃碎裂声和轻微的爆炸声。从窗口冒出了火焰。在这一刹那，谢辽萨又把第二瓶也扔进了这个窗口，它在火焰里爆炸了，发出猛烈的响声。房间里火势已经很猛，窗框烧着了，火舌顺着墙向上窜，几乎蔓延到二楼。这个房间里有人在拚命地大喊大叫，喊叫声扩散到整座楼房。谢辽萨抓起了第三瓶，把它扔进对面二楼的一扇窗里。

他听到瓶子碎裂的声音，接着又看到火光冒起，强烈的火光甚至照亮了整个阁楼内部，但是这时谢辽萨已经远远离开窗前，到了后楼梯口。他像箭似的跑了下去，他已经没有工夫在黑暗中找寻窗子被打破的那个教室，就奔进最近的房间，——这好像是教员休息室，——急忙打开窗子，跳到公园里，弯着身子跑进公园深处。

从他扔了第三瓶的那一刻起，一直到他意识到自己是在公园里奔跑为止，他一切都是按照本能去做的，恐怕未必能回忆起这一切的经过。但是现在他明白他应该卧倒在地上，静静地趴一会，仔细听一下。

他听见有一只小老鼠在离他不远的草里窸嗦地跑过。他趴在那里看不见火光，但是从那边街上传来了叫喊和奔跑的声音。他跳起来再往前跑，一直向公园尽头那个废井的矸石堆跑过去。

他这样做，是预防万一，如果公园被包围起来，他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从这里跑出去。

现在他看到有一大片火光在天空不断扩展开来，它的紫红的反光甚至投射到这个远离起火地点的古老巨大的矸石堆上和公园里的树冠上。谢辽萨觉得自己心花怒放，飘飘欲仙。

他浑身发抖，勉强克制住不要纵声大笑。

“是要给你们吃点苦头！‘赛策恩－齐－齐希！’①‘施普莱辛一齐－道埃契？’②‘盖本－齐－埃特瓦斯！’③……”他怀着难以形容的得意的心情重复着他所记得的这些从学校里德语语法课上学来的字句。

①德语“请坐！”的译音。

②德语“您会说德国话吗？”的译音。

③德语“给我一点东西！”的译音。

火光愈来愈扩大，映红了公园的上空，连城中心的骚动的声音都传到了这里。该走了。

但是谢辽萨感到有一种不可遏止的愿望，要到今天他在那儿看见这个叫华丽雅·鲍尔茨的姑娘的小花园里再去一次，——是的，他现在知道她的名字了。

他在黑暗中轻手轻脚地溜到“木头街”后身，翻过花园的栅栏，正打算穿过边门走到街上，忽然听到门口有人压低了声音在说话。居民们仗着德国人还没有占领“木头街”，都大着胆子从家里走出来看火。谢辽萨绕着房子走到另外一头，悄悄地越过栅栏，走到门口。火光照亮了站在那里的一群妇女，他认出其中有华丽雅。

“是什么地方起火啦？”他问，目的是让她知道他来了。

“大概是在公园街上……也许是学校，”一个激动的女人的声音回答说。

“这是煤业联合公司起了火。”华丽雅甚至带着几分挑衅的口吻尖声说。“妈妈，我要去睡了。”她说，假装打了个呵欠，走进了边门。

谢辽萨本来想跟着她走，但是他听到她鞋跟咚咚地响着跑上台阶，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

第二十章

德军的主力：坦克部队、机械化步兵、重炮和榴弹炮、联络部队、辎重车、救护队和工兵队、大小兵团的司令部，一连多日经过克拉斯诺顿以及附近的城市和村庄向前移动。摩托声呜呜不停地在天空和地面滚动。大片浓密的尘土弥漫在城市和草原的上空。

在不可胜数的军队和大炮的这种沉重而有节奏的运动中，有着它的无情的秩序——秩序①。世界上似乎没有一种力量能够对抗这种势力和它那无情的铁的秩序——秩序②。 ①② 原文为德语。

有火车车厢那么高的、装着弹药和粮食的卡车，还有扁扁的、大肚子的汽油车，沉重而平稳地行驶着，用巨大的车轮压着地面。兵士们的军装看上去质地很好，裁制合身。军官们都服装漂亮。跟德国人一起来的有罗马尼亚人、匈牙利人和意大利人。这支军队的大炮、坦克和飞机带着欧洲所有厂家的商标。一个不仅仅懂得俄文的人，单是看到这些小汽车和卡车上的工厂商标就会眼花缭乱，他会感到吃惊，欧洲大多数的国家是用怎样的生产力供应了这支德国军队，此刻这支军队正在摩托的咆哮声中，在漫天的、迷雾般的可怕的尘土中，开过顿涅茨草原。

连一个对军事完全外行的小人物也会感到和看见，苏联军队在这种兵力的压力下，是不可避免地——有人觉得是一去不返地——向东方和东南方退却，愈退愈远，退向新切尔卡斯克、罗斯托夫，退过静静的顿河，退到伏尔加河，退到库班。有谁确实知道现在他们在哪里……只有根据德军的战报和德国兵士的谈话才能推测，战事在什么地方、在哪一条战线上进行，也许，你的儿子、父亲、丈夫、兄弟已经为保卫祖国抛却了头颅。

德军继续经过克拉斯诺顿前进，像蝗虫似的吃掉前面过去的部队还没有吃光的一切，同时，德军进攻部队的后勤机关，它们的司令部、供应处和后备军，却已经在克拉斯诺顿有计划地、牢牢地定居下来。

在德军统治下的头几天里，当地居民谁也搞不清，德国长官哪一些在这里是暂驻，哪一些是常驻，城里成立了什么政权；谁也不知道，除了要满足过路官兵的随心所欲的要求之外，还要居民做些什么。每家都是自顾自地生活，由于愈来愈意识到自己的束手无策和可怕的处境，各家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去适应这种可怕的新局面。

维拉外婆和叶列娜·尼柯拉耶芙娜的生活中可怕的新事件，就是在她们家里设立着一个以冯·文采尔男爵将军、他的副官以及头发和雀斑都是浅黄的勤务兵为首的德军司令部。现在老有一个德国兵在她们门前站岗。现在她们家里总是挤满了德国将军和军官，他们像在自己家里一样随便出入，有时是有事来商谈，有时只是来吃吃喝喝。满屋子都是他们讲德国话的声音以

及收音机里的德语广播和德国进行曲的声响。房主人维拉外婆和叶列娜·尼柯拉耶芙娜，却被挤在那个小房间里（隔壁厨房里不断烧着炉灶，使这边闷热得难受），还要从清早到深夜服侍这批德国将军和军官老爷们。

昨天，维拉·瓦西里耶芙娜外婆还是一个因为在村子里工作出色而著名的人物，领个人特种退休金①的人，顿巴斯一个最大的煤业联合公司的一个地质工作者的母亲，而叶列娜·尼柯拉耶芙娜也是一个有名的苏维埃干部——卡涅夫土地部主任的寡妻，她的儿子是克拉斯诺顿一所学校的一个优秀生。昨天，她们两个人还是大家熟悉的、受人尊敬的人。可是今天，她们却得绝对地、忍气吞声地听那个脸上满是浅黄雀斑的德国勤务兵的指挥。①个人特种退休金是当时苏联社会保险机关每月发给对革命或其他方面有特殊功绩者的退休金。

冯·文采尔男爵将军一心忙于运筹帷幄，根本不去注意维拉外婆和叶列娜·尼柯拉耶芙娜。他接连几小时坐着研究地图，批阅和签署副官呈给他的公文，或是跟别的将军们一起喝白兰地。有时将军发起火来，就大喊大嚷，好像是在练兵场上发号施令，那些将军们就两手笔直地贴着军裤上的双条红镶条站在他面前。维拉外婆和叶列娜·尼柯拉耶芙娜明白，配备着坦克和飞机大炮的德国军队正是按照冯·文采尔将军的意志经过克拉斯诺顿向苏联的腹地挺进，将军认为重要的是要他们向前推进、并且总是准时到达指定的地点。至于他们在经过的地方的所作所为，冯·文采尔将军并不感兴趣，正像他对于住在维拉外婆和叶列娜·尼柯拉耶芙娜家里不感兴趣一样。

不知是奉了冯·文采尔将军的命令呢，还是得到他冷冷的默许，在他身边和周围干着千百桩卑鄙龌龊的勾当。每家都有东西被抢走，维拉外婆和叶列娜·尼柯拉耶芙娜的脂油、蜂蜜、鸡蛋和牛油也都被抢走。但是这并不妨碍将军高高昂起他的狭长僵硬的脑袋，让紫红喉结稳稳地嵌在领章上的棕榈枝中间，仿佛任何卑鄙龌龊的事都钻不进将军的脑袋。

将军是个有洁癖的人；他每天要从头到脚洗两次热水澡，早上一次，临睡前一次。将军的狭长的脸上的皱纹和喉结总是洗刮得很干净，还擦香水。为将军单修了一个厕所，让他“办公”的时候可以不必蹲着，而这个厕所就要由维拉外婆每天打扫干净。将军每天早上总在一定的时候上厕所，勤务兵就守卫在旁边，听到将军一咳嗽，就把特制的卫生纸递过去。

将军虽然有洁癖，但是饭后却当着维拉外婆和叶列娜·尼柯拉耶芙娜的面大打饱嗝而不觉得不好意思，如果他一个人在房间里，他就会大放臭屁，尽管维拉外婆和叶列娜·尼柯拉耶芙娜就在隔壁房间里，他却毫不在乎。

长腿副官也极力在各方面模仿将军。他似乎仅仅是为了像他的瘦长的将军才生得这样瘦长。他也学将军那样，竭力不去注意维拉外婆和叶列娜·尼柯拉耶芙娜。

在将军和他的副官的眼里，维拉外婆和叶列娜·尼柯拉耶芙娜不仅作为人是不存在的，甚至作为东西也不存在。现在勤务兵就是她们全权的领导和主人。

维拉外婆试图要习惯这种可怕的新处境，可是从最初几天起她就发觉她不打算同这种处境妥协。维拉外婆为人很机灵，她估计满脸浅黄雀斑的勤务兵不会有这么大的权力，敢于当着长官的面把她打死。所以她就跟勤务兵争吵，胆子一天比一天大，勤务兵对她吆喝，她也对勤务兵吆喝。有一回，他发起火来，用大鞋后跟朝外婆腰里踹了一脚，但是外婆也使出全力，用煎

锅对着他的脑袋敲了一下作为回敬。说也奇怪，勤务兵脸涨得通红，那股气焰仿佛被压了下去。在维拉外婆和满脸浅黄雀斑的勤务兵中间，建立起来的就是这种奇怪而复杂的关系。可是叶列娜·尼柯拉耶芙娜仍旧处于一种严重的内心麻痹的精神状态，她僵直地仰着好像围着光圈似的盘绕着淡亚麻色发辫的头，机械地、默默地执行着要她做的一切。

有一天，叶列娜·尼柯拉耶芙娜到跟公园街平行的后街去取水，忽然看见那辆套着黄骠马的熟悉的马车迎面过来，她的儿子奥列格在车旁走着。

叶列娜·尼柯拉耶芙娜孤立无援地回头一望，就扔下水桶和扁担，张开胳膊，向儿子跑过去。

“奥列日卡……我的孩子……”她反复地说，一会儿把脸贴在他胸口，一会儿又抚摩着他的在阳光下闪着金光的淡亚麻色头发，一会儿用手掌摸摸他的胸部、肩膀、背部和大腿。

他比她高一个头；这几天来他晒黑了，脸上消瘦了，样子像大人了；但是透过这种大人的外表，却比任何时候更明显地流露出她认为是永远保留在儿子身上的那些特征。在儿子咿呀学语的时候，在他用晒黑的圆滚滚的小腿开始学步、好像被风吹得朝一边歪的时候，她就知道这些特征。他其实还不过是个大孩子呢。他用有力的长胳膊楼住母亲，他的浅色的宽眉毛下面的眼睛，像在这整整十六个半年头里望着母亲的时候一样，闪耀着明朗而纯洁的孺子的爱慕之情，嘴里不住地重复着：

“妈妈……妈妈……妈妈……”

在这几分钟里，对他们来说，无论什么人和什么东西都是不存在的：无论是在附近院子里注视着他们的两个德国兵（他们要看看这里面有没有什么破坏秩序——秩序①——的事情），还是站在轻便马车旁边怀着不同的感情望着母子相会的亲人。柯里亚舅舅是冷淡而忧郁的；玛丽娜舅母的美丽而疲倦的黑眼睛里噙着泪水；三岁的小男孩露出惊奇和任性的神情，嫌列娜姑姑不先来抱吻他；而赶车的老头却带着老年人的含蓄的表情，好像说：瞧，世界上真是什么事都有。而那些在窗口偷偷观察的善良的人们也许会想，这是姊弟相会，因为这个光着头、头发给太阳晒得变了色的、高大的青年和那个仍旧非常年轻、头上盘着柔软发辫的妇人长得非常像。他们不知道，这是奥列格·柯舍沃伊回到他母亲身边来了，就像成百成千个来不及躲开灾难的克拉斯诺顿人，现在回到自己的亲人那里，回到被德军占领的家园一样。

①原文为德语。

那些离乡背井、抛妻别母的人，这几天的日子很不好过。可是那些得以逃出德国人魔掌的人，却已经到了自己的、苏维埃的土地上。更难受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想方设法要避开德国人，但是这些努力都成为泡影，他们面临过死亡，现在他们在昨天还是属于自己的、而今天已属于德国人的故乡土地上流浪，——他们没有东西吃，没有地方住，孤孤单单，精神沮丧，听凭碰到的德国胜利者发落，在德国人眼中他们好像是罪犯。

当奥列格和他的同伴们看见德国坦克穿过开阔、明亮的草原，在一片白茫茫的闪光中冲着他们开过来的那一霎间，他们的心颤抖了，他们是初次面对着死亡。但是死神暂时还不动手。

德国摩托兵把来不及渡河的人统统包围起来，赶到靠近顿涅茨河的一块地方。所以奥列格跟他的同伴们、万尼亚跟克拉娃和她的母亲，以及新一号井井长瓦尔柯等人，大家又在这里会合了。瓦尔柯浑身都湿透了，——马

裤和上衣可以拧出水来，——纹皮靴子里也有水咕吱咕吱地响着。

在这普遍骚动慌乱的几分钟里，很少有人彼此注意，但是一看到瓦尔柯，每个人都想："瞧，连这个人都没有渡过顿涅茨河。"他呢，却朝地上一坐，多日没有刮过的、黧黑的、茨冈人那样的脸上带着深深的怨恨。他脱下质地坚固的皮靴，倒掉里面的水，拧干了包脚布，又穿上，然后转过阴郁的脸来对着青年们，突然，并不是眨眼，只是略微动了动一只黑眼睛的眼皮，似乎是说：别害怕，有我跟你们在一起。

一个头戴黑钢盔的德国坦克队军官，熏黑的脸上一副凶相，用似通非通的俄语命令人丛里的军人都走出来。已经没有武器的军人们成批地或是单独地从人丛里走出来。德国兵用枪托抵着他们的背，把他们带到一边；不多一会，在离人丛不远的草原上，军人们已经另外形成了比较小的一群。这些人的脸上、目光里都带有一种令人看了心如刀割的悲哀的神情，他们穿着很脏的军便服和满是尘土的靴子，在浴着阳光的明亮的草原中间互相紧挨着。

军人们排成了队伍，被赶到顿涅茨河的上游去。老百姓都被释放回家。

人们都离开顿涅茨河边，在草原上逐渐四散。大部分人是沿着大路往西，经过万尼亚和若拉宿过夜的庄子，向李哈雅那边走去。

维克多·彼得罗夫的父亲和给柯舍沃伊他们赶车的老头，刚看见德国坦克从草原上开过来，就赶着马车跟自己人会合。他们整个这一群，现在还包括克拉娃和她母亲，都加入了朝西往李哈雅那边退去的人流。

好一会工夫，没有人相信居然会有这样的事——放了他们而这里面没有什么圈套。大家都提心吊胆地斜睨着大路上迎面过来的德国兵的洪流。但是德国兵一个个都疲乏不堪，抹满尘土的脸上都是汗珠，他们一心惦记前面不知有什么在等着他们，对俄罗斯难民几乎望都不望。

最初的惊骇过去之后，有人迟疑地说：

"大概是德军指挥部有命令——不得凌辱当地居民……"

瓦尔柯被太阳晒得身上就像马身上那样冒着热气，他阴郁地冷笑了一声，向那些脸上抹得像鬼一样的凶狠的德国兵士的队伍点点头，说道：

"你没看见他们没有工夫吗？不然他们一定要请你吃点苦头！"

"你好像已经吃过似的！"突然有个什么人的不知气馁的声音高兴地回答说。在任何情况下，甚至在最可怕的生活情况下，只要有俄罗斯人聚集在一起，就一定会有这样的声音。

"我是已经吃过了，"瓦尔柯阴沉地表示同意。他想了一想，又加了一句："但是吃得还不多。"

下面就是瓦尔柯在岸上离开青年们到渡口去的时候，实际发生的情况。凭他那副凶猛的相貌，他总算逼着一个管理渡口的军人和他谈话。他从军人那里知道，渡口指挥部设在河的对岸。"我非要叫他和他的那些懒骨头替我整顿一下秩序不可！"瓦尔柯挨着在浮桥上开过的汽车，从一只平底船①的边上跳到另一只平底船的边上，心里愤愤地想道。正在这时飞来了几架德国俯冲轰炸机，他跟所有和他一同跳过来的人只好卧倒。过了一会德国炮队开炮了，浮桥上的人们开始惊慌起来。瓦尔柯这时也开始动摇了。

① 浮桥是由平底船连成的。

照他的地位，他不仅有权，而且应当利用最后的机会渡到顿涅茨河对岸。但是哪怕是性格十分坚强、处理问题十分审慎的人，只要他血管深处还有一股热血在沸腾，在生活中就往往会发生这种情况：有时个人的、次要的、

然而是眼前的责任却压倒了整体的、主要的、然而是长远的责任。

瓦尔柯一想到他的那些留在岸上的工人、他的朋友谢夫卓夫和共青团员们对他可能产生的想法，全身的血就涌上了他的黑脸膛，他就掉转身去。这时，整个桥面上都有人排山倒海似地向他迎面冲过来。于是他连衣服也不脱就跳到水里，朝岸边游去。

那时候，德国人已经炮轰并且围住了顿涅茨河的这边河岸，岸上的人都发疯似的顺着平底船向对岸奔去，在通往平底船的堤坡上打架，成十成百地向对岸游过去，可是瓦尔柯却用有力的双臂破浪前进，游向这边河岸。他明知道他将成为德国人报复的第一个对象，可是仍旧游过来，因为良心不容许他不这样做。

也算德国人倒霉，他们做事竟会近视到没有把瓦尔柯弄死，反而把他和其余的人一起释放。瓦尔柯原来是该往东到萨拉托夫去报到的，——他的妻子和孩子都在那边，——现在却随着逃难的人们的洪流往西走去。

没到李哈雅，这整个拼凑起来的逃难人们的队伍就已经开始分散。瓦尔柯向一群克拉斯诺顿人建议，要他们离开队伍，绕过李哈雅，前往克拉斯诺顿，远远地避开大路，走村道，否则就走荒地。

在民族和国家的艰难时刻总是如此，哪怕是一个最普通的人，他对于个人命运的考虑也是和对于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命运的关心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

经过他们那一番经历以后，头几天，无论是大人或是孩子都情绪低沉，彼此几乎互不交谈。他们不仅为自身的前途，而且也为整个苏维埃土地今后的命运感到沮丧。但是每一个人对这问题的体验又都各不相同。

情绪最稳定的是玛丽娜的三岁的小儿子，奥列格的小表弟。他毫不怀疑他所处的那个世界是稳固不变的，因为妈妈和爸爸总是在他面前。不错，有一个时候他觉得很可怕，那时候天空中有什么东西咆哮着隆隆响起来，四周发出轰隆轰隆的响声，人们又都急急奔跑着。但他正是生长在这种四周总是发着轰隆轰隆的响声、人们总是急急奔跑的时世，因此他稍稍哭了一阵也就安静下来。现在一切都已经很好了。他只觉得，旅行有点拖得太长了。中午，当他热得浑身无力的时候，他的这种感受也特别强烈，于是他就开始啼哭，问是不是快到家看见奶奶了。但是只要停下来休息一会，吃一点麦糊，用木棍捅捅地鼠的洞穴玩一会，恭恭敬敬地仰起头侧着身子绕着两匹栗色马——它们每一匹差不多都比黄骠马大一倍——走一圈，然后把小脑袋埋在妈妈的膝盖上甜蜜地睡一会，一切似乎又都恢复原来的样子，世界上也重又充满了美妙和奇怪的事物。

赶车的老大爷暗忖，在德国人统治下，他这样一个年老的小人物的生命大概不会有什么危险。但是他担心德国人在半路上就会夺去他的马。此外，他想德国人会剥夺掉他在矿上当了四十年车把式而获得的养老金，他们不但会剥夺他因为有三个儿子在前线而领到的补助金，说不定还会因为他有这么多儿子在红军里而迫害他。还有，俄罗斯在战争中能不能获胜这个问题也使他深深感到不安。根据他看到的情形，他非常担心俄罗斯不会胜利。这时，这个后脑上有一绺像麻雀羽毛的蓬乱的灰发的小老头，就非常遗憾他去年冬天不曾死掉，当时医生对他说，他的病情恶化了。但是有时他回想起他的一生和他亲身参加过的几次战争，回想起俄罗斯是伟大的、富饶的，而近十年来它变得更加富饶了，他就想，难道德国人真会有力量征服俄罗斯吗？老头

这样一想，就被一种神经质的亢奋控制住了，他搔着被太阳晒黑的皮包骨头的脚踝，稚气地撅起嘴唇，对黄骠马咂咂嘴巴，又用缰绳轻轻打它。

奥列格的舅舅尼柯拉·尼柯拉耶维奇是一个年轻的地质工作者，在煤业联合公司参加工作的最初几年里，就因为在勘探方面出色的成绩而受到提拔。他最生气的是他这样顺利地开始的工作竟突然这样令人意想不到而可怕地被打断了。他想，德国人一定要打死他，即使不打死，他也得花不少的心思去逃避给德国人做事。他知道，在任何条件下他都不会去给德国人做事，因为他觉得给德国人做事就像用四肢爬行一样地反常和别扭。

年轻的玛丽娜舅母却在计算，在德国人未来以前他们的生活是靠哪一些收入。在德国人未来之前，他们的生活是靠下列几个来源：尼柯拉·尼柯拉耶维奇的工资、叶列娜·尼柯拉耶芙娜在丈夫（奥列格的继父）去世后领取的抚恤金、维拉·瓦西里耶芙娜外婆的养老金，煤业联合公司分配给他们的房子和他们在屋旁种的菜园。现在呢，德国人来了之后，前面三项生活来源一定会被剥夺掉，其余的几项也可能被剥夺。她老是想起在渡口被炸死的儿童，为他们惋惜之余，又联想到自己的孩子，不由得就哭起来。她想起她听到的关于德国人野蛮地调戏妇女和强奸妇女的故事，那时她就想起，她是个漂亮的妇人，德国人一定会跟她纠缠，于是她一会儿害怕，一会儿又自我安慰：她可以故意穿得普通些，并且改变发式，也许，一切都会平安无事地过去的。

维克多·彼得罗夫的父亲，一个林务区长，知道回家之后，他们父子就会有性命之忧，因为他在区里是以亲身参加一九一八年的对德斗争而出名的人，儿子又是共青团员。但是当他考虑现在该怎么办的时候，他就觉得一筹莫展了。他知道，党员里面一定有人留下来组织地下斗争和游击斗争。但是他自己已经并不年轻，一生都在忠心耿耿地做一个普通的林务区长，并且一直认为，他这个林务区长会一直做到老死。他希望让一子一女受很好的教育，让他们可以自立。但是现在，当他心里暗暗起了这样的念头：他的过去可能不会被人知道，他还有可能在德国人统治下继续做林务区长，——他就感到非常烦恼和厌恶，弄得他这个魁梧有力的汉子竟想跟人打架。

这时候，他的儿子维克多却在为红军感到极度的委屈和气愤。他从小就崇拜红军和它的指挥员，战争一开始，他就做好准备，打算作为红军指挥员去参战。他在学校里领导过军事小组，按照苏沃洛夫①的教导，在他的小组里，不管下雨下雪都上军事课和体育课。红军的败退当然不能动摇它在维克多心目中的威信。但遗憾的是，他没能及时参加红军去当指挥员，如果他现在是红军指挥员，那么毫无疑问，它决不会陷入这般困难和凄惨的境地。至于他本人在德国人统治下的命运，维克多干脆不去想，而是完全信赖他的父亲和他的朋友阿纳托里·波波夫，因为阿纳托里无论在什么困难场合都会想出出人意料的、绝对正确的办法。

①苏沃洛夫（1730—1800），十八世纪俄国统帅。

可是他的朋友阿纳托里却在深深地为祖国感到痛心，他一言不发，咬着指甲，一路上都在考虑他现在应该怎么办。在战时，他在共青团的集会上做过许多关于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报告，但是没有一篇报告里面，他能够把他对祖国的感情表达成像他对他妈妈那样一个崇高的、歌声美妙的人的感情（他妈妈塔伊西雅·普罗柯菲耶芙娜身材高大、丰满，脸庞红润、慈祥，总是唱一些从他在摇篮里就为他歌唱的美妙的古代哥萨克歌曲）。他心里时刻

怀着这种对祖国的感情，当他听到心爱的歌声或是看到被践踏的庄稼和被焚烧的农舍时，这种感情就使他热泪盈眶。现在，他的祖国处于灾难之中，——这样深重的灾难，使人无论看到或是想到都不能不为之心如刀割。他应当行动，立即行动，但是又怎样行动，在什么地方行动，同谁一起行动呢？

这些想法也或多或少地激动着他所有的同伴。

只有邬丽亚不敢去想祖国的命运和她个人的命运。自从她看见新一号井的井架倒下去以后，她已经尝尽一切辛酸：跟心爱的女友以及跟母亲的离别，在那被太阳灼晒过的、被践踏过的草原上的这一段旅途和最后的渡河，——渡口那个包红头巾的妇人的血淋淋的上半截身子和那个眼睛鼓出来的男孩子似乎体现了她的全部经历，——这一切不断在邬丽亚的流血的心里翻腾着，一会儿像匕首般尖利，一会儿像磨石般沉重。她一路上都是跟在大车旁边走着，不大说话，仿佛是心情平静，只有在她眼睛里、鼻翼上、嘴唇上隐隐露出的这些阴郁的线条，才泄露出她的内心有着何等强烈的感情在汹涌起伏。

但是若拉·阿鲁秋仰茨却非常清楚，在德国人统治下他将要怎样生活。所以他就很有把握地高声议论道：

“这帮野蛮残忍的家伙！我们的人民难道能同他们妥协吗？我们的人民一定会拿起武器，就像从前被德国人占领的那些地方一样。我父亲是个性情温和的人，但是我相信他会拿起武器的。至于我母亲，照她的性格，也一定会拿起武器。如果我们的长辈都这样干，那么我们青年人该怎么办呢？我们青年应当来一个登记——先摸清情况，”若拉改正道，“然后把所有没有走的青年人登记下来，立刻同地下组织取得联系。至少我就知道留在克拉斯诺顿的有沃洛佳·奥西摩兴和托里亚·奥尔洛夫，——他们难道会什么事也不干吗？还有沃洛佳的妹妹刘西雅，这个姑娘真好，”若拉感情流露地说，“她，无论如何，绝不会什么事也不干的。”

万尼亚挑了一个除了克拉娃，别人都听不到的机会，对若拉说：

“听我说，你这个绿林好汉！说实在的，大家都同意你的话。可是……你别嚷啊。首先，这是每一个人的良心问题。其次，你不能替每一个人担保。万一有人说漏了嘴，那就要你和我们大家的好看了。”

“你为什么叫我‘绿林好汉’？”若拉问，他的黑眼睛里现出了兴奋而得意的表情。

“因为你长得黑，行动又像骑手。”

“你知道吗，万尼亚，我要是去做地下工作，一定就用‘绿林好汉’这个化名。”若拉把声音压低得像耳语似的说。

万尼亚同若拉的想法和情绪一样。但是现在他不论想到什么，那因为克拉娃就在近旁而使他产生的幸福感、他回忆起他在渡口旁边的举动时所产生的自豪感（这时他仿佛又听到柯瓦辽夫在说：“万尼亚，救救她们。”而他也觉得自己是克拉娃的救星），就会有力地闯进来。这种幸福的感觉因为有克拉娃和他分享而更加完满。克拉娃要不是因为惦记父亲，要不是母亲在悲泣，也一定会公开表示她和心爱的人一同在这里的浴满阳光的顿涅茨草原上是幸福的，尽管在地平线上一直有德国坦克的炮塔、高射炮的炮管和一批又一批德国兵的钢盔出现，——这些德国部队在摩托的吼声中和滚滚的尘埃里，在金色的麦田里疾驰着。

在所有这些对自己的命运和全体人民的命运有着不同想法的人们里

面，有两个人，尽管他们的性格和年龄也是大不相同，但是从他们所处的那种空前的精神振奋和跃跃欲试的状态来说，他们又是惊人地相似。这两个人，一个是瓦尔柯，另外一个是奥列格。

瓦尔柯是一个不多说话的人，从来没有人知道他那茨冈人的外貌下面的内心活动。他似乎交了厄运。可是他从来还不曾显得这样活跃和兴高采烈。他一路上都是步行，关心大家，乐意同青年们谈话，仿佛在考验他们，而且越来越喜欢跟他们开玩笑。

奥列格在马车上也坐不住。他高声表示不耐烦：到底几时才能看见母亲和外婆呢？他高兴地搓着指尖听若拉说话，否则就突然打趣万尼亚和克拉娃，或是羞涩地、结结巴巴地安慰邬丽亚，或是照顾三岁的小表弟，或是向玛丽娜舅母表示爱慕，或是和老大爷谈论天下大事。有时他又闷声不响地在马车旁边走着，额上露出深深的皱纹，饱满的、固执的、还有点孩子气的嘴唇上似乎浮着一丝笑意，眼睛里带着沉思的、严峻而又温柔的神气注视着远方。

他们在离克拉斯诺顿不到一天路程的地方，突然碰到一队掉了队的德国兵。德国兵熟练地——甚至不是很粗野地，而正是熟练地——把两辆马车都搜查了，他们从玛丽娜和邬丽亚的箱子里取去所有的丝织品，夺去维克多的父亲和瓦尔柯脚上的靴子，并且拿走瓦尔柯的旧金表，那只表虽然被他戴着游过水，仍然走得很准。

他们在这初次同德国人的直接接触中精神上感到很紧张，因为大家想象中的德国人还要坏得多，后来这种紧张变成相互之间的窘迫，最后又变成了一种不自然的兴奋——大伙都争先恐后地描述德国人，描述他们怎样搜查马车，取笑非常惋惜自己的丝袜的玛丽娜，甚至不放过瓦尔柯和维克多的父亲，因为他们穿着马裤而穿便鞋显得比别人更为狼狈。只有奥列格并不分享这种虚假的快活，他的脸上久久留着生硬的、凶狠的表情。

他们在夜间抵达克拉斯诺顿城郊，瓦尔柯认为夜间在城里要戒严，大家听从他的劝告不再进城，就在峡谷里过夜。这一夜月光如水。大家都很焦急，久久不能入睡。

瓦尔柯去察看峡谷通向哪里。他突然听到背后有脚步声。他转过身子，站住了，在照得露珠闪烁发光的月光下认出了是奥列格。

“瓦尔柯同志，我迫切地需要跟您谈谈。非常需要谈一谈。”奥列格略带口吃地轻声说。

“好，”瓦尔柯说，“可是我们得站着谈，因为地上湿得厉害。”他笑笑说。

“帮助我在城里找一个我们的地下工作者吧。”奥列格说，他直盯着瓦尔柯的连生在一起的眉毛下面的低垂的眼睛。

瓦尔柯猛地抬起头来，把奥列格的脸仔细研究了一会。

站在他面前的这个人是最年轻的、新的一代。

似乎是最难以结合在一起的特点——喜欢幻想和渴望行动、富于想象和讲求实际、酷爱善良和严峻无情、胸襟开阔和精明打算、热爱人间欢乐和自我克制，——这些似乎难以结合起来的特点合在一起就创造了这一代的独特的面貌。

瓦尔柯非常熟悉这一代，因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跟他本人相似。

“地下工作者你似乎已经找到了，”瓦尔柯笑着说，“至于我们以后要做些什么，我们现在就来谈一谈吧。”

奥列格默默地等待着。

“我看得出，你不是今天才作出这个决定的。”瓦尔柯说。

他说得对。伏罗希洛夫格勒刚受到直接威胁，奥列格就第一次把自己的意图瞒过母亲，到共青团区委会去，请求在组织地下小组的时候使用他。

他非常难过，因为他们不说明任何理由就对他说了下面这样的话：

“你听着：年轻人，收拾收拾自己的东西，好好地走吧，而且要快一些。”

他不知道，共青团区委会并没有建立独立的地下小组，那些留下来听地下组织指挥的团员，是早先选拔出来的。因此，他在区委会里得到的答复不仅不是粗暴无理，在某种意义上甚至还是对同志关怀的表现。所以他只得走。

但是等渡口事件的最初的紧张一过去，奥列格知道他是走不掉了的那个时候，他心里忽然明白：现在他的梦想可以实现了！逃难、跟母亲的别离、前途茫茫等等的全部重压，都从他心里消失了。他全部的精神力量，全部的热情、梦想、希望，全部的青春的热情和决心——这一切都无拘无束地迸射出来。

“因为你下了决心，你才那么精神集中，”瓦尔柯接着说，“我自己也是这种脾气。昨天我一路走着，脑子里还总是在想：我们一会儿炸矿井，一会儿看见军队在撤退，逃难的人群和孩子们在受苦受难。我心里郁闷极了！”瓦尔柯非常坦率地说，“我本来应该高兴，因为至少我可以看见家里的人，从战争开始我就没有看见过他们，可是心里老嘀咕着：‘往后不知会怎么样？……’这是昨天的情况。可是今天呢？我们的军队撤走了。我们落到了德国人手里。我看不到家里的人了。也许，永远看不见了。可是我心里反而轻松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只有一条路，就像古代乌克兰盐粮贩子只走一条路线一样。而这对我们这些人是最主要的。”

奥列格觉得，现在，在克拉斯诺顿附近的峡谷里，在照着露珠美妙地闪烁发光的月光下面，这个严峻、沉着、生着茨冈人那样连生在一起的眉毛的人，恐怕无论跟谁也没有像跟他奥列格这样推心置腹地谈过话。

“你要记住：不要跟这些青年失去联系，这是自己的弟兄，”瓦尔柯说，“不要暴露自己，可是又要跟他们保持联系。再物色一些青年，对工作合适的，坚强的。不过你要记住，没有问过我，什么事情都别做，——不然你会失败的。要你做什么和在什么时候做，我会告诉你的……”

“您知道谁留在城里吗？”奥列格问。

“我不知道，”瓦尔柯坦白地承认，“我不知道，可是我能找到。”

“那我怎么找您呢？”

“你用不着找我。即使我有住的地方，我反正也不会告诉你，但是说实话，我暂时还没有住的地方。”

尽管做人家丈夫和父亲的报丧人是非常痛苦，瓦尔柯仍旧决定头几天在谢夫卓夫家里找个藏身之所，他家的人都熟悉瓦尔柯，喜欢他。他希望靠着刘勃卡那样天不怕地不怕的姑娘的帮助，能够建立起联系，并且在比较偏僻的地方找到住处。

“你最好把你的地址给我，我好找你。”

瓦尔柯把奥列格的地址反复念了几遍，直到记住为止。

“你别怕，我能找到你，”瓦尔柯悄声地说，“如果不能很快得到我的消息，你也别担心，等着好了……现在你走吧。”瓦尔柯说，一面用宽大的手

掌轻轻地推了推奥列格的肩头。

“谢谢您。”奥列格的声音几乎听不见。

他怀着难以解释的激动向野营走去，仿佛是风吹着他飘过沾满露珠的草地。人们都已经入睡，只有马在嚼草，发出清脆的声音。可是万尼亚还双手抱着尖瘦的膝盖，坐在熟睡的克拉娃和她母亲的头旁。

“万尼亚，我亲爱的朋友！”奥列格满怀温情想道，现在他无论对什么人都怀着这样的感情。他走到同学跟前，激动地坐在他身旁潮湿的草地上。

万尼亚朝他转过脸来，在月光下万尼亚的脸显得苍白。

“喂，怎么样？他对你说了些什么？”万尼亚用有点喑哑的声音兴冲冲地问道。

“你问的是什么事？”奥列格说，他又是惊奇，同时又是慌乱。

“瓦尔柯说些什么？他知道点什么吗？”

奥列格犹疑不决地望着他。

“别打算跟我捉迷藏！”万尼亚愠怒地说，“老实说，我们又不是三岁的小孩子！”

“你怎—怎么知道？”奥列格轻声问，他愈来愈觉得奇怪，睁大了眼睛直瞪着朋友。

“要打听你的地下工作关系并不怎么困难，这种关系也像我的一样，”万尼亚笑着说，“难道你以为，我会没有想到这件事吗？”

“万尼亚！……”奥列格用他的大手抓住了万尼亚的狭长的手，牢牢地握住，万尼亚立刻也有力地握住他的手。“就是说，我们在一起吗？”

“当然在一起。”

“永远吗？”

“永远，”万尼亚说，他的声音非常轻，然而很严肃。“只要我血管里的血还在流。”

他们面对面望着，眼睛里射出光芒。

“你看，他暂时还什么都不知道。但是他说，他会找到。他是会找得到的。”奥列格怀着自豪的心情说，“你要注意，到下亚力山德罗夫卡别耽搁……”

“我不会耽搁，这你不必担心，”万尼亚坚决地摇了摇头，说道。他有点不好意思。

“我只是去把她们安顿一下。”

“你爱她吗？”奥列格俯身凑近万尼亚的脸，轻声问道。

“这种事嘴巴上一般是不讲的。”

“不，你别不好意思。这是很好的，这是非常好的。她是那—那么好，而你……对于你我简直不知道说什么好。”奥列格的脸上和声调里都带着天真的喜悦。

“是啊，尽管我们和大伙都得经受这么多的苦难，可是生活毕竟是美好的。”万尼亚说。

“对—对的，对—对的。”奥列格说的时候口吃得厉害，他的眼睛里涌出了泪水。

命运把所有这些形形色色的青年和成年人汇合在草原上，才不过一个多星期。现在，太阳在草原上空升起，他们大家最后一次一起被阳光照耀着，似乎他们已经经历了整整一生。

到了需要各自东西的时候，每个人心里都充满了那样的温情、惆怅和激动。

“嗳，小伙子们和姑娘们……”穿着马裤和便鞋的瓦尔柯独自留在峡谷中央，开始要说话，结果他只挥了挥他的黧黑的手，什么都没有说出来。

青年们交换了地址，约好互相保持联系，就告别了。他们在草原上四散之后，好久好久互相还可以看得见。偶尔有人挥着手或是手帕。但是不大一会，就有人消失在山岗背后或是峡谷里，接着另外一些人也消失了。仿佛在这伟大而可怕的时代，他们根本不曾在这似火的骄阳底下共同走过这一段路途……

这样，奥列格·柯舍沃伊就跨进了被德军占领的家园的门槛。

第二十一章

玛丽娜带着小儿子跟维拉外婆和叶列娜·尼柯拉耶芙娜一起挤在厨房隔壁的小房间里。

尼柯拉·尼柯拉耶维奇和奥列格用木板钉了两张板床，在院子里的柴房里勉强安顿下来。

维拉外婆正因为没有听众难受得要命（她总不能把那个满脸淡黄雀斑的勤务兵当做自己谈话的对象！），立刻就把一大堆城里的新闻告诉了他们。

两三天前，在几个最大的矿井的进口亭上，在高尔基学校和伏罗希洛夫学校的校舍，在区执行委员会大厦和其他一些地方，都贴了手写的布尔什维克的传单。传单下面的署名是：“联共（布）克拉斯诺顿区委会”。奇怪的是：在传单旁边贴着印有列宁和斯大林肖像的旧《真理报》。据传说，从德国兵士们的谈话中知道，在本州各区，特别是顿涅茨河沿岸，在伏罗希洛夫格勒州和罗斯托夫州的交界处，在鲍柯沃—安特拉齐特区和克烈缅斯克区，常常有游击队袭击德军运输队和德国军队。

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共产党员，也没有一个共青团员到德国卫戍司令那里去作特种登记（“叫我去自投罗网吗？——让他们自己先噎死吧！”维拉外婆说），但是有许多人已经被发现，被逮捕了。没有一家工厂开工或是机关在工作，但是，迫于德军卫戍司令的命令，人们不得不去上班，坐足规定的钟点。据维拉外婆说，机械工程师巴腊柯夫和刘季柯夫已经到克拉斯诺顿煤业联合公司的中央电机工厂去工作了。传说德国人非但没有碰他们，还任命巴腊柯夫做厂长，让刘季柯夫担任机械车间主任的原职。

“这种人有谁能料得到呢？都是老党员！巴腊柯夫上过前线，受过伤！刘季柯夫是一个大名鼎鼎的社会活动家！难道他们都疯了吗？”维拉外婆心里又是纳闷又是气愤。

她还说，德国人在城里搜捕犹太人，把他们送到伏罗希洛夫格勒附近，似乎在那边搞了一个犹太区，但是有很多人说，事实上犹太人只是被送到上杜望纳雅林子，就在那边被枪毙、被埋掉。所以玛丽雅·安德烈耶芙娜·鲍尔茨非常替丈夫担心，生怕有人出卖他。

自从奥列格离家之后，特别是德国人来了之后，叶列娜·尼柯拉耶芙

娜一直都处于一种神情恍惚的状态；奥列格一回家，她身上的这种状态就消失了，就像被一只会施魔法的手抹去了似的。她现在时刻都处在一种精神紧张和她天性固有的精力饱满的活跃状态中。她像母鹰照顾跌出鹰窠的魔雏那样在儿子身旁转来转去。奥列格常常发觉她的关注的、紧张不安的眼光盯着他，好像是说："你怎么样，我的好儿子？

你能不能忍受这一切，我的好儿子？"

可是他，经过在路上体验到的那种精神振奋以后，突然陷入了严重的精神麻痹状态。一切都不像他想象的那样。

对一个将要投身斗争的青年来说，他梦想中的斗争该是一连串不断反抗暴行和恶势力的英勇事迹。但事实上恶势力却原来是不可捉摸的，是一种平常得难以忍受和讨厌的东西。

毛茸茸的、温顺的黑狗已经死了，——奥列格从前是非常喜欢同它玩的。街道两旁院子里和庭园里的树木和灌木都被砍光了，看过去好像是赤裸裸的。而在这条赤裸裸的街道上行走的德国人似乎也是赤裸裸的。

冯·文采尔男爵将军不去注意奥列格、玛丽娜和尼柯拉·尼柯拉耶维奇，正像他不去注意维拉外婆和叶列娜·尼柯拉耶芙娜一样。

实际上，维拉外婆也没有觉得将军的举动有什么侮辱自己的地方。

"这是他们的'新秩序'，"外婆说，"我已经老了，可是照我爷爷从前对我讲的，这其实是一种很老的秩序，跟农奴制下面我们有过的那种秩序完全一样。在农奴制下面我们这里也有德国地主，他们也是像这个男爵那样神气活现，也是那样的刽子手，叫他眼睛瞎了才好！我何必跟他生气？他反正是改不了的，除非等我们的人来了，把他的喉咙割断……"

但是在奥列格的眼里，这个穿着雪亮的瘦瘦的皮靴、喉结洗得很干净的将军却是使奥列格和他的亲人以及周围所有的人遭到难堪屈辱的罪魁祸首。要摆脱这种屈辱的感觉，似乎只有打死这个德国将军才有可能，但是那时又会有另外一个将军来代替他，而且一定是一模一样——喉结洗得干干净净，皮靴雪亮。

长腿副官开始经常客气而冷淡地注意着玛丽娜，愈来愈多地要她服侍他和将军。当他望着玛丽娜的时候，他的无色的眼睛里含有一种蔑视的、同时又是孩子般的好奇的表情，仿佛他是在望着一只可以供他消遣作乐的异国的动物，但是不知道怎么对付它。

现在，副官最喜欢的消遣就是用糖果来逗玛丽娜的小儿子，等孩子伸出胖胖的小手，他就赶快把糖塞到自己嘴里。副官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做着，直到把孩子逗哭了为止。那时，副官就在孩子面前蹲下他的长腿，伸出红红的舌尖上搁着糖的舌头，故意把糖又吮又嚼，圆睁着无色的眼睛，哈哈地笑个不停。

玛丽娜对他整个的人——从他的长腿到白得不自然的指甲——都感到厌恶。在她看来，他非但不是人，甚至连畜生都不如。她憎恶他，犹如我们厌恶青蛙、蜥蜴和北螈一样。所以在他逼她服侍他的时候，她就感到一种厌恶，同时又因为她不得不听这个动物的摆布而感到恐怖。

但是要说到真正使这些年轻人的生活变得难以忍受的人，这就是那个满脸淡黄雀斑的勤务兵。勤务兵的空闲时间多得惊人，因为他是别的勤务兵、厨子以及为将军服务的总务科的兵士们的头儿。而这个勤务兵一空下来，就一遍又一遍地向年轻人追根问底，问他们为什么要避开德国人，又怎么没有

能跑掉，而且对他们说，只有笨蛋或是野蛮人才想避开德国人，这种看法他不知说了有多少遍。

不管这些年轻人是躲在他们的柴房里，是到院子来透透新鲜空气，或是在将军不在家的时候到屋子里，勤务兵都到处盯着他们。只有外婆出现，才能使他们摆脱他的纠缠。

说也奇怪，这个个子高大、双手通红的勤务兵虽然表面上对维拉外婆也像对大家一样放肆，其实他对她是有几分畏惧的。德国勤务兵和维拉外婆相互之间是用一种俄语和德语的奇怪的混合语，再加面部表情和手势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外婆的表情和手势总是非常准确的、恶狠狠的，勤务兵的表情总是非常粗野的、带有兽性的、愚蠢的、凶狠的。但是他们彼此却十分了解。

现在全家每日三餐都在柴房里吃，而且仿佛总是在偷偷摸摸地吃。他们吃的是素菜汤、蔬菜、煮土豆，代替面包的是外婆做的淡而无味的麦饼。外婆还有不少的储藏。但是在德国人把所有藏得不严密的东西都吃掉以后，外婆就只做一些素食，极力让德国人看：他们再也没有什么了。夜里，等德国人睡了，外婆再偷偷地把一小块脂油或是生鸡蛋拿到柴房里，然而这里面也含有一种屈辱的感觉——不敢在白天吃。

瓦尔柯没有消息。万尼亚也不来。而且很难设想，他们将来怎样碰头。所有的房子里都住着德国人。他们猜疑地打量着每一个外面来的人。甚至普通的会面和街上的谈话也会引起猜疑。

奥列格枕着双手躺在板床上，周围的人都已经入睡，草原上清新的空气飘进柴房开着的小门。月亮几乎圆了，它的青灰色的光辉在天空远远地四射着，照亮了脚边一块长方的泥地。这时候，奥列格想到莲娜·波兹德内雪娃就住在这儿城里，不由勾起了一种痛苦的喜悦。她那模糊的、支离破碎的、不连贯的形象，在他眼前飘过：她的眼睛，好像黑夜里的樱桃，映出两点金色的月光，——不错，春天他在公园里见过这双眼睛，也许，是梦中见过的；她的笑声，仿佛是从远处传来的，像一串银铃似的声音，甚至似乎是矫揉造作的，因为每一个声音都是异常分明，仿佛隔墙有人在敲银勺子。奥列格由于想到她就在近处，由于想到和她的离别而感到的相思的痛苦，是只有年轻人才有的，——没有情欲，没有良心的责备，只是因为想到她的模样，只是因为可以看到她而产生的喜悦。

遇到将军和他的副官都不在家的时候，奥列格和尼柯拉·尼柯拉耶维奇就到老屋里去看看。他们总闻到一股混合的香水的气味、外国烟草的气味、还有一股特别的光棍的气味；

凡是不带家属的将军们和兵士们的住房里同样都有这种气味，无论是香水味，或是烟草味，都压不住它。

有一天，在这样安静的时候，奥列格走进屋子去看看母亲。德国炊事兵和维拉外婆默默地在炉灶上做菜——各做各的。在做餐室的那间上房里，那个勤务兵穿着皮鞋、戴着船形帽，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抽烟，显然是十分无聊。他躺的那张沙发以前就是奥列格睡的。

奥列格刚走进房间，勤务兵的懒洋洋的、神色无聊的眼睛就盯在他身上。

“站住！”勤务兵说，“你，好像越来越瞧不起人了，——是的，是的，我越来越发觉是这样！”他说着就坐起来，把穿着厚鞋掌的皮鞋的大脚放到地板上。“把手垂下来，脚跟靠拢，你是在跟一个年纪比你大的人说话！”他

试图即使不能使自己大发雷霆，至少也要使自己愤怒，但是他实在热得要命，没有气力做到这一点。“ 执行命令！听见吗？你！…… ” 勤务兵叫着。

奥列格懂得勤务兵的话，他一声不响地望着勤务兵的淡黄色雀斑，突然装出一副惧怕的神气，赶忙蹲下来，拍着膝盖，大叫着：

“将军来了！”

就在这一刹那，勤务兵已经站了起来，还取下嘴里的香烟，把它放在拳头里捏灭。他的懒洋洋的脸上马上露出一副蠢笨的奴才相。他碰了一下脚跟立正致敬，双手垂得笔直，直僵僵地站着不动了。

“真是个奴才！主人不在家，就躺在沙发上……现在你就这样站着吧。” 奥列格说，他没有提高声音，可是却感到高兴，因为他能够对勤务兵说这些话，而不必担心勤务兵会听懂他；

他说了就走进母亲的房间。

母亲正站在门口，手里拿着针线，仰着头，脸色苍白。她全听见了。

“你怎么可以这样，孩子…… ” 她刚开口。

但是这时勤务兵已经吼叫着向他们冲过来。

“回来！……到这里来！…… ” 他发狂似地吼叫着。

他的脸涨得发紫，连雀斑都看不出了。

“妈妈，别—别理会这个白痴。” 奥列格说话的声音有点发抖，他没有望着勤务兵，仿佛他根本不在这里。

“到这里来！……猪猡！” 勤务兵吼叫着。

他突然向奥列格扑过来，双手抓住他上装的衣领，开始疯狂地摇晃他，那双在猪肝色的脸上显得完全苍白的眼睛直瞪着他。

“别这样……别这样！奥列日卡，让他一下，你何必…… ” 叶列娜 · 尼柯拉耶芙娜说着，试图用她的小手把勤务兵的通红的大手从儿子的胸口拉开。

奥列格也是脸色发紫，双手抓住勤务兵军服下面的皮带，他的发光的眼睛含着那样强烈的仇恨直盯着勤务兵的脸，勤务兵被他看得竟有一霎时发慌了。

“放手……听见吗？ ” 奥列格用力把勤务兵拉到跟前，用可怕的低音说，他的怒气愈来愈大，使勤务兵脸上露出的表情不是恐惧，而是怀疑他这样做法对他自己是否十分有利。

勤务兵撒了手。他们俩面对面站着，沉重地呼吸着。

“走吧，好孩子……走吧…… ” 叶列娜 · 尼柯拉耶芙娜重复说着。

“野蛮人……比野蛮人还不如，” 勤务兵压低声音说，竭力要说得带有蔑视的口气。

“对付你们这批人只能用鞭子，就像训练狗那样！”

“你才是比野蛮人还不如，因为你是野蛮人的奴才，你只会偷鸡，乱翻女人的箱子，强脱过路人的靴子！” 奥列格恨恨地直望着他的白眼睛，说。

勤务兵说的是德语，奥列格说的是俄语，但是他们的姿势和他们的脸上都非常清楚地表现出他们所说的一切，所以他们都很懂得对方的意思。奥列格说到最后几句，勤务兵就抬起他那沉重发胀的手朝奥列格的脸上使劲打了一巴掌，打得奥列格差点儿跌倒。

在出生以来整整十六个半年头里，从来没有一个人的手——无论是由于一时的气愤，或是作为惩罚——碰过奥列格一下。他从小在家里和学校里

所呼吸的空气都是纯洁的竞赛的空气，在这种环境里，粗暴地对人身使用暴力，也像盗窃，谋杀和违背誓言一样，是不可能的。奥列格一时快气疯了。他向勤务兵扑过去。勤务兵向后跳到门口。母亲急得吊在儿子的肩膀上。

“奥列格！冷静一点吧！……他会打死你的！……”她说，干燥的眼睛闪着光，身子愈来愈紧贴着儿子。

听到这阵喧闹，维拉外婆，尼柯拉·尼柯拉耶维奇，戴着白帽、军服上套着白罩衣的德国厨子都赶了过来。勤务兵像驴子一样嚎叫着。维拉外婆张开干枯的手臂，花衣袖飘动着，像抱窝鸡似的在勤务兵面前连叫带跳，把他挤进餐室。

“奥列日卡，好孩子，我求求你……窗子开着，跑吧，跑吧！……”叶列娜·尼柯拉耶芙娜凑着儿子的耳朵拚命地低语着。

“爬窗口？我才不愿意在自己家里爬窗口呢！”奥列格说，他的鼻孔和嘴唇自尊地翕动着。但是他已经冷静下来。“别怕，妈妈，放手吧，——我就这么走……我去找莲娜。”他突然说。

他迈着坚定的步子走进餐室。大家都给他让路。

“你这个猪猡，猪猡！”奥列格回头对勤务兵说，“你打人，因为你知道人家不能回手……”说了就不慌不忙地走出了屋子。

他的面颊在发烧。但是他觉得，他在精神上获得了胜利：他不仅丝毫没有向德国人让步，德国人反而见他害怕。他不愿意设想自己行动的后果。反正是那么回事！外婆说得对：管他们的“新秩序”？滚他妈的蛋！他爱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们再来看看，谁胜过谁！

他穿过边门走到跟公园街平行的街道上。他差不多一出门就碰到斯巧巴·萨方诺夫。

“你上哪儿去？我是来看你的。”矮小的、白头发的斯巧巴兴奋地说，一面非常亲切地用双手摇撼着奥列格的大手。

奥列格发窘了。

“就到这儿的一个地方去……”

他甚至要加一句“为了家里的事”，但是他说不出口。

“你的腮帮子怎么这么红？”斯巧巴放开奥列格的手，惊奇地问。他问得很不识相，好像有人特地派他来问似的。

“跟德国人打了架。”奥列格笑笑说。

“你说什么？！真棒！……”斯巧巴怀着敬意望着奥列格的发红的面颊。“那更好。老实说，我来看你，跟这方面的事也有些关系。”

“哪方面的事？”奥列格笑起来。

“我们走吧，我陪你走，不然，我们要是站着，德国人又该来找麻烦了……”斯巧巴挽住奥列格的胳膊。

“还—还是我陪你走一段。”奥列格口吃着说。

“你是不是索性把你的事搁一搁，先陪我去，行吗？”

“上哪儿去？”

“去看华丽雅·鲍尔茨。”

“去看华丽雅？……”奥列格因为一直没有去看过华丽雅而感到良心的谴责。“他们家有德国人吗？”

“没有。妙就妙在没有德国人。老实说，正是华丽雅叫我来找你的。”

这是多么幸福啊——突然置身在没有德国人的屋子里！置身在熟悉的、

绿叶成荫的小花园里，里面的花坛好像镶着毛皮，很像“莫诺马赫的金冠”①，那棵好几个树干的老槐树也依然无恙，它的翠绿的绢纱般的叶子是那样地凝止不动，仿佛是绣在草原的碧空上一般。

①“莫诺马赫的金冠”，传说是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1053—1125）从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那里得到的。金冠的边上镶皮，顶上缀珠宝，前面钉有十字架。

在玛丽雅·安德烈耶芙娜的眼里，她学校里所有的学生都还是小娃娃，她久久拥抱和亲吻奥列格，叫嚷着：

“你把老朋友都忘掉了吗？回来之后，影子也不见，——忘掉了！可是，是谁家里最疼你？是谁皱眉蹙额地在我们家一坐就是好几个钟点，听人家给他弹钢琴？是谁让你随便利用他的藏书？忘了，忘了！啊，我的奥列日卡，小奥列日卡！可是我们家里……”她捧住自己的头。“可不是——只好躲起来！”她眼睛里露出可怕的神气，说话虽然是压低声音，但是仍旧好像机车放气似的从她嘴里冲出来，仿佛整条街上都能听得见。“是的，是的，连对你也不能说躲在什么地方……在自己家里躲着，这多么屈辱，多么可怕！看来，他得到别的城市去，他的样子还不太像犹太人，——你说是吗？在这里一定会有人出卖他，可是在斯大林诺我们有可靠的朋友，是我的亲戚，是俄罗斯人……是的，他得走。”玛丽雅·安德烈耶芙娜说，她的脸上露出了忧愁的、甚至是悲切的表情，但是玛丽雅·安德烈耶芙娜实在太健壮了，悲切的感情在她脸上并没有找到相应的形式：玛丽雅·安德烈耶芙娜虽然是极端真诚，但看起来好像是假装的。

奥列格好容易才挣脱了她的拥抱。

“是的，你这个人真是没有良心，”华丽雅自尊地撅起饱满的上唇说，“回来了，也不过来看看！”

“你不是也可以来嘛！”奥列格不好意思地微笑着说。

“如果你指望姑娘们自己来看你，保证你到老还是个光棍！”玛丽雅·安德烈耶芙娜哇啦哇啦地说。

奥列格快乐地瞥了她一眼，大家都大笑起来。

“你们可知道，他已经跟德国人打过架了，——你们看，他的腮帮子多么红！”斯巧巴得意地说。

“真的打过架？”华丽雅好奇地望着奥列格。“妈妈，”她突然回过头来对母亲说，“我想，屋子里有人等你……”

“天哪，好一批秘密活动家！”玛丽雅·安德烈耶芙娜举起那双结实的胳膊，哇啦哇啦说道，“我走，我走……”

“跟军官？还是跟兵士？”华丽雅钉着奥列格问道。

除了华丽雅和斯巧巴以外，小花园里还有一个奥列格不认识的瘦瘦的青年，他打着赤脚，又鬈又硬的淡色头发偏分着，嘴唇有一点翘。那个青年人默默地坐在槐树的丫杈中间，从奥列格走进花园的那一刻起，他的神色坚定、喜欢探究的眼睛就没有离开过奥列格。在他的这道目光里和他的全部举止里，都有一种令人起敬的神气，奥列格也不由自主地常常朝他那边张望。

“奥列格！”等母亲走进了屋子，华丽雅说。她脸上带着坚决的表情，声调也很坚决。

“帮助我们同地下组织建立关系吧……不，你等一下，”她说，因为她发觉奥列格的脸上立刻露出了心不在焉的神情。但是，他马上又天真地笑了一笑。

“你一定知道应当怎么做法！以前总有许多党员到你们家去，而且我知道你不大跟孩子们交朋友，总喜欢跟大人交朋友。”

“不，可惜得很，我的关系都丧—丧失了。”奥列格带笑回答说。

“这种话你对别人去说吧，——这里都是自己人……是的！也许你觉得在他面前不便说吧？这就是谢辽萨·邱列宁！”华丽雅迅速地瞥了一眼那个默默地坐在树丫杈中间的青年，高声说。

华丽雅对谢辽萨·邱列宁的介绍没有再加补充，但是这已经足够了。

“我说的是实话，”奥列格已经是对着谢辽萨说，因为他毫不怀疑谢辽萨就是这次谈话的主要发起人，“我知道地下组织是有的。第一，有人发传单。其次，我不怀疑，煤业联合公司和澡堂起火就是他们干的事。”奥列格说，他没有发觉，在他说这几句话的时候，华丽雅的眼睛里异样地闪烁了一下，她那娇艳丰满的上唇上也微微掠过一丝笑意。“还有，我得到消息说，最近我们共青团员就可以得到指令，告诉我们干什么。”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手在发痒！”谢辽萨说。

他们开始讨论可能留在城里的男女青年。斯巧巴是个交际广阔的小伙子，全城好多男女青年都是他的朋友，他便把他们一个个淋漓尽致地形容了一番，使华丽雅、奥列格和谢辽萨听了都笑得前仰后合，把德国人和他们发起这次谈话的目的也忘在脑后了。

“莲娜·波兹德内雪娃在哪里？”华丽雅突然问。

“她在这里！”斯巧巴叫道，“我在街上碰到过她。她打扮得花枝招展，头这样昂着，”狮子鼻上满是雀斑的斯巧巴模仿她的样子轻飘飘地在花园里走了几步。“我叫她：‘莲娜，莲娜！’可是她只点了点头，就这样。”斯巧巴做了个样子。

“一点都不像！”华丽雅狡猾地用眼角瞟着奥列格，鼻子里嗤了一声。

“你记得吗，我们上次在她家里唱的歌多么好听？三个星期以前，才不过三个星期，真没有想到！”奥列格带着善良的、惆怅的笑容看了华丽雅一眼，说道。他马上急着要走了。

他和谢辽萨一同出去。

“奥列格，华丽雅对我讲了许多关于你的事，我一看见你，也真心地信任你。”谢辽萨迅速地、有点窘迫地朝奥列格瞥了一眼，说道。“我对你说这个是为了让你知道，以后我就不再提这件事了。事情是这样：并不是什么地下组织放火烧了煤业联合公司和澡堂，这是我干的……”

“怎—怎么，你一个人？”奥列格望着谢辽萨，他的眼睛放出光辉。

“就我一个人……”

他们默默地走了一会。

“只有一个人，不—不好……干是干得好，勇敢，但是……一个人总不—不好。”奥列格说，他脸上露出了亲切而又担心的表情。

“地下组织是有的，我不单是根据传单知道，”谢辽萨对奥列格的埋怨毫无反应，继续说下去。“我曾经碰到过线索，可是……”谢辽萨懊恼地挥了挥手，“没有抓住……”

他把访问福明以及这次访问的经过都详详细细地告诉了奥列格，也不隐瞒他不得已把一个假地址给了躲在福明家里的那个人。

“这件事你也告诉过华丽雅吗？”奥列格突然问道。

“没有，这件事我没有对华丽雅说起过。”谢辽萨镇静地说。

“好—好……很好—好！”奥列格抓住谢辽萨的胳膊。“你既然跟那个人有过这样一次谈话，你能不能再去看他呢？”他激动地说。

“问题就在于不行啊，”谢辽萨说，他的仿佛微肿的嘴角上现出了严峻的皱纹。“这个人被他的房东福明出卖给德国人了。他不是马上就出卖他，而是在德国人来了之后的第五天或是第六天。据‘上海’方面传说，福明似乎想通过那个人来破获整个组织，可是那个人显然很谨慎。福明等了又等，最后就出卖了他，自己也进‘警察队’做事了。”

“进什么‘警察队’？”奥列格惊叫起来：他整天待在柴房里，城里却发生了多少大事啊！

“你知道下面的那个营房吗？在区执行委员会后面，过去我们的民警队就驻在那里……现在那边是德国人的野战宪兵队，他们在自己下面搞了一个由俄罗斯人组成的‘警察队’。

据说，找到了一个叫什么索里柯夫斯基的流氓做队长。以前他在区里的一个小矿井里当过组长。现在就靠他在招募各式各样的流氓来当‘警察’。”

“他们把他弄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弄死了吗？”奥列格问。

“除非他们是傻子，才会把他弄死，”谢辽萨说，“我想，还关着。他们要从他嘴里掏出一切，可是他这种人是不会说的。大概也是关在那座营房里受折磨。那边还有一些被捕的人，只是我打听不出是些什么人……”

一个可怕的念头突然使奥列格的心揪起来：他在这里等待瓦尔柯的消息，而这个精神坚强、长着一双茨冈人那样的眼睛的人，也许已经关在山下这座营房的一间狭小的暗室里，像谢辽萨说的那样，也在受着折磨。

“谢谢你……谢谢你把这一切告诉了我。”奥列格声音喑哑地说。

于是他，一心只考虑着做法是否适当，根本没有想到会破坏向瓦尔柯提供的诺言，就把他跟瓦尔柯、以及后来跟万尼亚的谈话都告诉了谢辽萨。

他们在“木头街”上慢慢地走着，——谢辽萨赤着脚，走起来摇摇摆摆，奥列格穿着像平时一样擦得很干净的皮鞋，轻快而有力地踏着尘土。奥列格向同伴阐述他的行动计划：为了不使事业蒙受损害，必须小心谨慎地、一步一步地去找寻通往布尔什维克地下组织的道路；同时要考察青年人，记住最可靠、最坚强、对工作最适合的人，打听出城里和区里有哪些人被捕、关在什么地方，设法帮助他们；并且要不断地在德国兵士中间侦察德军司令部的一切军事措施和民政措施。

谢辽萨马上活跃起来，建议组织收集武器的工作：在战斗和撤退之后，有大批武器乱扔在城郊，甚至草原上也有。

他们俩都懂得这些事干起来是多么平凡乏味，但是这些事都是可以办得到的，于是他们俩心里的现实感觉醒了。

“刚才我们之间所说的话，以及以后我们打听到的消息和要做的事，除了我们之外，不论什么人都不应该知道，不管他们和我们多么接近，也不管我们和他们多么要好！”奥列格说，他的炯炯发光的、圆睁的眼睛望着前面。“友谊归友谊，可是……这里却是性命攸关的，”他毅然决然地说。“你、万尼亚、我——再不能让别人知道……等我们建立好联系，那边就会告诉我们该怎么做……”

谢辽萨沉默了一会：他不喜欢口头的誓言和保证。

“现在公园里怎么样？”奥列格问。

“是德国人的汽车库。四周都是高射炮。他们像猪猡一样，满地乱拱！”

“我们的公园真可怜！……你们家有德国人吗？”

“有的路过进来看看，他们不喜欢我们的房子。”谢辽萨笑了笑。“在我们家里碰头是不行的，”他明白奥列格为什么要这样问，说道：“人太多。”

“我们就通过华丽雅保持联系吧。”

“好。”谢辽萨高兴地说。

他们走到过道口，在这里紧紧地握手告别。他们的年龄相仿，在这次短短的谈话中马上就接近起来。他们的情绪是慷慨激昂的。

波兹德内雪娃家住在“干草场”区。像柯舍沃伊同柯罗斯蒂辽夫两家一样，她们家也住了半幢标准式房屋。奥列格老远就看见她们家挂着老式窗纱的窗子开着，听到钢琴声和莲娜的像银铃般分明的、做作的笑声。有一个精力非常充沛的人用有力的手指弹着奥列格很熟悉的一支浪漫曲的最初几个和音，莲娜开始唱了，但是给她伴奏的人一上来就弹错了，莲娜笑起来，接着又唱给他听：哪些地方他弹错了，应该怎么弹，于是一切又从头开始。

她的歌声和琴声使奥列格突然非常激动，以至于他有好半天无法使自己走进屋子。这些声音使他又想起也是在这里，在莲娜家里，在当时觉得是人数众多的朋友圈子里度过的幸福的黄昏……华丽雅伴奏，莲娜唱着，奥列格望着她的有点激动的脸，他望着，她的激动、她的歌声和这永远铭刻在他心里并充满他整个青春世界的琴声魅惑了他，使他感到幸福。

啊，要是他永远不再跨进这所房子的门槛，要是这种音乐、青春和初恋时模糊的激动交融在一起的感受能够永远留在他心里，那多好啊！

但是他已经走进了门道，又从门道走进了厨房。在这间位于屋子背阳一面的光线暗淡的厨房里，莲娜的母亲和一个德国兵非常和睦地、习惯地坐在一张小厨桌旁边，显然这已经不是第一次。莲娜的母亲又干又瘦，穿着式样很老的深色衣服，满头都是老式的发卷；那个德国兵，也像同奥列格打架的那个勤务兵一样，生着淡黄色头发，不过没有雀斑，身材矮胖，根据他的举止来看，也是个勤务兵。他们面对面地坐在矮凳上，德国勤务兵脸上带着自满而有礼貌的笑容，眼睛里甚至带着几分献媚的神气，他从放在膝头上的背包里取出几样东西，又把这些东西送到莲娜母亲的手里。她这个面孔瘦削、满头发卷的老妇人，就带着明知人家是在笼络她的贵族老太太的神气，同时又带着阿谀奉承的笑容，双手哆哆嗦嗦地把东西接过来放在自己膝头上。他们俩只顾忙于这件虽不复杂、但是使他们全神贯注的事，连奥列格走进来他们也没有发觉。所以他能够看清莲娜母亲的膝头上的东西：一扁盒沙丁鱼，一块巧克力，和一个细长的、四方形的洋铁盒。这种容量半公升、螺旋口、贴着黄蓝交织的鲜艳商标纸的罐头，奥列格在自己家里的德国人那里也看见过，这是橄榄油。

莲娜的母亲发现了奥列格，双手不自觉地动了一下，似乎要把膝上的东西遮盖起来。勤务兵也看见了奥列格，他捧着自己的背包，冷漠地盯着他。

就在这时候，旁边房间里的钢琴声和莲娜的歌声戛然中断，响起了她的笑声和一个男人的笑声，还有片断的德国话。

莲娜银铃般的声音，字字分明地说道：

“不，不，我来重复，我来重复①，这里是休止符，再重复一次，就马上……”　　①原文为德语。

接着她就用纤细的手指自己在琴键上弹了一遍。

“哦，是你来啦，奥列日卡？难道你没有走？”莲娜的母亲惊奇地扬起

稀疏的眉毛，故意装出亲热的声音说。“你是来看莲娜吗？”

她以出人意料的敏捷把她膝盖上的东西藏到厨桌下面的一格里，用干瘦的手指摸摸发卷有没有弄乱，接着就把头朝肩膀里一缩，鼻子和下巴一翘，走进了传出琴声和莲娜的歌声的房间。

奥列格脸上的血色已经褪了，他垂下大手，站在厨房当中；在德国勤务兵的冷淡的目光下，他马上觉得局促不安，手脚都没有地方放。

他听见莲娜在室内表示惊奇和慌乱的尖叫声。她压低声音对房间里的男子说了些什么，仿佛是在道歉，接着就蹬着高跟鞋跑过来。莲娜在厨房门口出现了，手扶着门框，她穿的灰底暗花的衣服对她纤瘦的身材显得有点沉重，纤细的脖子和浅黑的锁骨袒露着，浅黑的手臂也裸露着。

“奥列格？……”她说，她窘得连浅黑的小脸上都满泛着红晕。“我们这里……”

但是显然她根本没有准备好用什么话来解释“她们这里”在干什么。她以纯粹女性的善变不自然地笑了一笑，跑到奥列格身旁，握住他的手把他拉过去，然后又把他的手放开，说道：“我们进去，我们进去吧。”到了门口她又回过身来，偏着头再一次请他进去。

奥列格跟着她走了进去，差一点和在他身旁溜过的她的母亲撞了个满怀。两个穿着同样的灰制服的德国军官——一个侧身坐在打开的钢琴前面的琴凳上，另外一个站在窗子和钢琴中间——望着奥列格，没有好奇，但是也不懊丧，好像他是一个不管你情愿不情愿都得容忍的障碍物。

“他是我的同学。”莲娜用她那银铃似的声音说，“请坐，奥列格……你记得这支浪漫曲吧？我已经花了一个钟头，要教会他们这支曲子。先生们，我们现在来把整个曲子重复一遍！你请坐，奥列格……”

奥列格抬起他的半覆着金色睫毛的眼睛望着她，清清楚楚地、也是字字分明地说，似乎每一个字都打在她的脸上：“他们付给你什么东西？好像是植物油吧？你卖得太贱啦！……”

他转过身去，经过莲娜的母亲和生着标准淡黄头发的勤务兵的身旁，走到街上。

第二十二章

这样，刘季柯夫就消失了，等他再出现的时候已经换了新的身分。

这一段时间里他发生了什么事呢？

我们记得，他早在去年秋天就被派做地下工作。当时刘季柯夫把这件事瞒过了妻子，并且对自己的预见非常得意，因为被占领的威胁果然推迟了。

但是刘季柯夫把这件事记在心上，一直记在心上。而且普罗庆柯这个深谋远虑的人，也使他经常保持这样的精神准备状态：

“谁知道那边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得像少先队那样：

‘准备着！’——‘时刻准备着！’①……”　　①苏联少先队的口号。

在去年秋天指定的人选里面，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索柯洛娃，

一个家庭妇女，一个非党员，全城有名的妇女工作积极分子，也坚持不懈地留在自己的岗位上。克拉斯诺顿所有的居民对市苏维埃代表刘季柯夫是太熟悉了，在地下工作的情况下，他在行动方面和同人们的联系方面可能受到限制。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便应当做他的耳目、手脚，——她被指派做他的联络员。

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从她同意担任这个工作的时候起，就听从刘季柯夫的劝告，完全退出了社会活动。在她的女友中间，这种行动先是引起了怀疑，继而引起了非难：为什么在祖国这样困难的时候，一个一向非常活跃的妇女竟然退出了社会工作？可是归根到底，谁也没有任命她、推荐她做这种工作。她高兴做这种工作的时候，她是自愿来干的。人的变化是不可预测的。人家当然也可以突然决定要去专心管自己的家务。也许，是战时生活的困难促使她这样做？渐渐地大家也就把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忘记了。

她买了一头牛，——碰巧有一家人要疏散到东方去，把牛仨钱不值俩钱地卖给了她，——开始到人们家里去卖牛奶。刘季柯夫一家并不需要这么多牛奶，他们一家只有三口人：妻子叶芙多基雅·费奥多托芙娜、十二岁的女儿腊雅和他本人。但是女房东彼拉盖雅·伊里尼奇娜有三个孩子，她的老母亲也跟着她过，所以女房东也开始喝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的牛奶。左右邻居都看惯了：每天早晨，天刚刚亮，就有一个长着善良的俄罗斯式面孔、穿得很朴素、头上照农村式样包着白头巾的妇人，不慌不忙地走到彼拉盖雅·伊里尼奇娜的房子前面，把细长的手指伸进板缝，拨开门闩，自己打开栅栏门，然后轻轻地敲着台阶旁边的窗子。开门的总是起身最早的彼拉盖雅·伊里尼奇娜的母亲。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亲切地向她问好，走进屋子，过一会又提着空奶桶出来。

刘季柯夫一家在这所房子里已经住了多年。刘季柯夫的妻子叶芙多基雅·费奥多托芙娜跟彼拉盖雅·伊里尼奇娜很要好。腊雅和女房东的大女儿李莎同年，又是同班同学。女房东的丈夫是后备役的炮兵尉官，从战争的第一天起便上了前线。他的职业是细木工，比刘季柯夫小十五六岁。他自认是刘季柯夫的学生，对他就像学生对待老师那样。

远在去年秋天，刘季柯夫就打听清楚，彼拉盖雅·伊里尼奇娜因为人口太多，丈夫又不在，假如德国人来了，她是下不了决心抛下家业离开的。所以那时候刘季柯夫就计划，在必要的情况下把家属送往东方，自己仍旧留在原来的房子里。

他的女房东彼拉盖雅·伊里尼奇娜是我们人民里面不可胜数的那种单纯、诚实、纯洁的妇人。刘季柯夫知道，她什么都不会问他，她即使知道，也会故意装出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这样她的良心会觉得平静些、舒服些：她既没有承担什么义务，对她也就不能有什么要求。但是她会保持沉默，会掩护他，甚至受刑也不会出卖他，这是由于她对这个人十分信任，由于她同情他的事业，或者，只是出于妇女的富于同情的好心肠。

而且她的房子对刘季柯夫也很方便。彼拉盖雅·伊里尼奇娜的房子是紧靠以前这里的矿工楚利林的孤零零的小房子建造起来的第一批木头房子，——这一区至今还叫“楚利林诺”。她的小房子背后有一个山沟远远通到草原，也叫“楚利林”。整个这一区还被认为是偏僻的区域，它也确实如此。

七月里那个可怕的时刻来临了，刘季柯夫终于不得不向妻子说明情况，叶芙多基雅·费奥多托芙娜哭了起来，对他说道：“你年纪大了，又有病……

你到区委会找他们谈一谈吧，他们会让你走的……我们到库兹巴斯去。”她突然这样说，眼睛里露出了他所熟悉的神色。

每当她回忆起青春时代，回忆起善良的人，或是什么快意的事，就会露出这样的神色。战时有许多顿涅茨矿工带着家属疏散到库兹巴斯去，其中也有刘季柯夫的友人和他妻子从小就要好的女友。“我们到库兹巴斯去吧！”听她的口气，似乎他们现在到了库兹巴斯，也可以过着他们年轻时代在这儿故乡所过的那种美好生活。

可怜的女人，——她仿佛不了解自己的费里普·彼得罗维奇似的！

“别再对我提这件事。事情已经决定了。”他说，一面严厉地望着她的祈求的眼睛，显然，他对她的请求和眼泪都不能容忍。“你们不能留在这里，你们只会妨碍我。看着你们，我的心都碎了……”他吻了吻妻子，紧紧地搂着自己独生的爱女，久久舍不得放开。

像许多家庭一样，他们家也走得太晚，还不到顿涅茨河就回来了。但是刘季柯夫却不让妻子和女儿跟他住在一起；他把她们安顿在离城较远的一个庄子里。

在前线形势变得有利于德军的三个星期中，州党委和克拉斯诺顿区委会都在积极进行工作，给地下组织和游击队补充人员。在刘季柯夫下面也派来了一大批克拉斯诺顿区和其他各区的领导干部。

在刘季柯夫和普罗庆柯分手的那个值得纪念的一天，他像平时一样回到家里，——这是他从工厂下班回家的钟点。孩子们在街上玩，老太太怕热，躲在百叶窗紧闭的昏暗的房间里。彼拉盖雅·伊里尼奇娜坐在厨房里，晒黑的、青筋突露的手交叠着。她的还不显老的、可爱的脸上露出深思的神情，连刘季柯夫进来都没有能使她立刻觉察。她对他望了好一会而没有看出他来。

“我在你们这里住了这些年，还是第一次看见您这样坐着，不干活。”刘季柯夫说，“您是在发愁吧？别发愁。”

她一言不发地抬起一只青筋突露的手，但是又把它放在另一只上面。

刘季柯夫在女房东面前站了一会，然后迈着沉重缓慢的步子走进上房。过了一会他出来了，已经脱了帽子，解了领结，穿着便鞋，但是翻领白衬衫外面仍旧穿着那件新的黑上装。

他一边走一边用一把绿色的大梳子梳着他的浓密的花白头发。

“我有件事要问您，彼拉盖雅·伊里尼奇娜。”他仍旧用那把梳子迅速地把两撇粗硬的短口髭往两边梳，说道，“从我被接受入党的那一天起——那是在一九二四年，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我就订阅我们的《真理报》。每一份我都保留着。我在工作上非常需要它：我要做报告，要领导政治小组……我房间里的那个箱子，您也许以为那里面是破烂吧？那是我的报纸。”刘季柯夫说，接着微笑了一下。他不常笑，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微笑顿时就改变了他的面貌，使他脸上带有一种不常有的温柔的表情。“我现在怎么处理这些报纸呢？我攒了十七年。烧掉很可惜……”他带着询问的神气望望彼拉盖雅·伊里尼奇娜。

有一会工夫他们俩都不作声。

“把这些报纸往哪儿藏呢？”彼拉盖雅·伊里尼奇娜好像是在自己问自己。“可以埋起来。夜里可以在菜园里刨一个坑，干脆就连箱子一起埋下去。”她说，并不望着刘季柯夫。

“如果要用呢？可能再用的，”刘季柯夫说。

果然不出他所料，彼拉盖雅·伊里尼奇娜并没有问他，德国人来了他要苏维埃报纸做什么用，连她脸上的那种事不关己的表情都没有改变掉。她又沉默了一会，然后问道：

“费里普·彼得罗维奇，您在我们这里住了这么久，对一切都非常熟悉，可是我要问您：要是您到我们房子里来，特意来找点什么东西，您会不会发觉我们厨房里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刘季柯夫非常仔细认真地环视了一下厨房：这是外省小房子里的整洁的小厨房。作为一个手艺人，刘季柯夫只注意到：漆过的地板不是用长板条，而是用结实的短而宽的木板钉成的，木板排列在两根横档中间，两头钉牢。造这所房子的人是一个好当家人。为了牢固耐久做了这样结实的地板，使它不至于被俄罗斯式的炉子压得塌下去，同时在这种容易弄脏、需要经常擦洗的地方，也使它能经久不烂。

“我看不出有什么特别，彼拉盖雅·伊里尼奇娜。”刘季柯夫说。

“这儿厨房下面有一个老地窖……”彼拉盖雅·伊里尼奇娜从凳子上抬起身来，弯下腰，摸了摸一块地板上的一个很难察觉的黑点。“这里是环。下面还有一个小梯子……”

“可以看看吗？”刘季柯夫问。

彼拉盖雅·伊里尼奇娜挂上门钩，从炉子底下取出一把斧头。但是刘季柯夫怕在地板上留下痕迹，不愿意用斧头。他们拿了工具——刘季柯夫拿着厨刀，她拿着普通的餐刀——细心地把方盖缝隙里的变硬的垃圾剔除干净。最后他们好容易才把钉在一起的三块沉重的短木板掀了起来。

有一个四级的小梯子通到地窖。刘季柯夫走了下去，划了一根火柴：地窖里很干燥。现在甚至难以预料，这个奇妙的小地窖将来对他会有多大的用处！

刘季柯夫沿着梯级走上来，小心地盖上了盖子。

“您可别生我的气，我还有个问题要问您。”他说。“当然我以后会安排妥当，使德国人不会来碰我。可是在德国人刚来的头几天，我怕他们一发火会杀了我。所以为了防备万一，我想躲到这里。”他用指头指指地板。

“要是有兵士到我这里来过夜呢？”

“他们不会到您这里来的：这里是楚利林诺……我又不是什么要人，我就在那边坐一会……您别惊慌不安。”刘季柯夫虽然这么说，自己倒被彼拉盖雅·伊里尼奇娜脸上的满不在乎的表情弄得有点不安起来。

“我没有感到不安，我的问题不大……”

“要是德国人问，有个刘季柯夫在哪里，您就说：住是住在这里，他到乡下买吃的东西去了，一定会回来的……至于躲藏，李莎和彼季卡会帮我的忙。白天我会叫他们放哨。”刘季柯夫说了又笑了一笑。

彼拉盖雅·伊里尼奇娜用眼角瞟了他一下，突然像年轻人那样摇了摇头，笑起来。外表这么严厉的刘季柯夫倒是一个天生的教师，他懂得孩子们的心理，喜欢他们，并且知道怎样让他们喜欢他。孩子们总是跟着他。他对待他们就像对待成年人一样。他是一个多面手，差不多样样东西——从玩具到家用的东西——都能够当着他们的面做出来，而且几乎是空手做出来的。在民间，这样的人叫做“巧手”。

他对房东的孩子和自己的女儿一样疼爱，只要他动动指头，这所房子

里的孩子们都会高高兴兴地执行他的任何派遣。

“你最好领他们做自己的儿女，费里普伯伯，他们跟你在一起惯了，——他们对你比对亲老子还听话！”彼拉盖雅·伊里尼奇娜的丈夫从前常这样说。“你们以后就给费里普伯伯做孩子好吗？”他生气地望着孩子们，问道。

“不好！”他们齐声叫着，但是却团团围住费里普伯伯，紧挨着他。

在各种不同的活动领域里，可以碰到各种不同性格的党的领导干部，可是他们都有一种特别显著的、引人注目的特点。善于教育人的党的干部恐怕是他们中间最普遍的一种。这里所说的党的干部不仅是，甚至不完全是主要做党的教育工作和政治教育工作的人，而恰巧是指不论在经济、军事、行政或文化部门工作的那种善于教育人的党的干部。刘季柯夫正是属于这一类型的善于教育人的党的干部。

他不仅仅喜欢教育人，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对于他，这是自然的要求和必需；教导人和教育人，传授自己的知识和经验，这是他的第二天性。

不错，这固然使他的许多发言带有仿佛是教训的性质，但是刘季柯夫的教训并不是纠缠不清的、唠叨得令人讨厌的教训，这是他的劳动和思考的果实，并且也正是这样被人们接受的。

刘季柯夫的特点，总的说来也像这一类型的领导干部的特点一样，是言行一致。善于把他所说的一切化为行动，善于把各种不同的人团结在某一工作的周围并用这件工作的意义去鼓舞他们；这正是使刘季柯夫成为完全新型的教育者的主要特点。他所以是一个优秀的教育者，正因为他这个人是一个组织家，是生活的主人。

他的教训不会使人听了无动于衷，更不会引起人家的反感，它们打动人们的心灵，特别是年轻人的心灵，因为青年的思想愈被范例的力量所激励，就愈会发出强烈的光辉。

有时他只要说一个字或者甚至看一眼就够了。他天生不喜欢多说话，甚至非常沉默寡言。初看他似乎动作缓慢，——有人甚至觉得他是懒洋洋的，——其实他却总是处在一种镇静的、理智的、组织得有条不紊的活动状态中。他把生产工作以外的全部空闲时间非常恰当地分配在社会活动、体力劳动、阅读和娱乐上，从来没有顾此失彼。

刘季柯夫待人接物心平气和，从不发火。他在谈话中善于沉默，听取别人的意见——这是人们非常罕有的品质。因此他被公认为是一个很好的交谈者、一个热心人；好多人甚至把他们同亲人都永远不敢谈起的公事和私事讲给他听。

虽然如此，刘季柯夫却绝对不是所谓好好先生，更不是软心肠的人。他为人正直、严厉，如果需要的话，他也可以无情。

有人尊敬他，有人喜欢他，可是也有人怕他。说得更确切些，所有同他交往的人，包括他的妻子和朋友，对他都有这些感觉，不过因为各人性格不同，所以在一部分人心中占优势的是这一种，在另一部分人心中是另一种，在第三部分人心中又是第三种。如果把这些人按年龄来分，那么可以说，成年人对他又是尊敬，又是喜欢，但又是畏惧，青年是喜欢他和尊敬他，而孩子们就只是喜欢他了。

正因为这样，所以当刘季柯夫说“李莎和彼季卡会帮我的忙”的时候，彼拉盖雅·伊里尼奇娜会笑起来。

在德国人刚来的头几天，刘季柯夫躲起来的时候，孩子们的确是轮流

在街上放哨，守卫着他。

他运气很好。德国兵谁也没有到彼拉盖雅·伊里尼奇娜家里来住。因为在城里，甚至在附近都可以找到比较大、比较好的房子。德国人害怕房后的山沟：他们怕游击队。不错，德国人有时也要过来看看房子，顺手拿走一些没有藏好的东西。刘季柯夫每次都是躲在厨房的地板下面。但是谁也没有来打听他。

谦逊、温顺的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头上照农村妇女的式样扎着一条干净的白头巾，每天早晨还照常到这里来，把牛奶倒在两个瓦罐里，然后提着奶桶去刘季柯夫那里。她待在他那里的时候，彼拉盖雅·伊里尼奇娜和她的母亲总留在厨房里。孩子们还在睡觉。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从刘季柯夫那里出来，再到厨房里跟她们闲聊一会。

这样过了一星期，也许还要长些。有一天，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在把马路新闻告诉刘季柯夫之前，低声说道：

“他们要叫您去上工呢，费里普·彼得罗维奇……”

他突然完全变了样子：镇静冷漠的表情、缓慢的动作、有时几乎是纹丝不动，——刘季柯夫在自己隐蔽期间的全副伪装，霎时间都从他身上消失了。

他像猛狮那样有力地一步跨到门口，朝隔壁房间里张望了一下。那边像平时一样，一个人也没有。

“叫所有的人都去吗？”他问。

“是叫所有的人……”

“尼柯拉·彼得罗维奇呢？”

“他……”

“他去过吗？……”刘季柯夫探究地望着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的眼睛，问道。

他无需向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说明巴腊柯夫去什么地方，——这一切她都知道，事先她和刘季柯夫早已商量好了。

“去过。”她的声音仅仅能让人听见。

刘季柯夫并没有忙乱，也没有提高嗓门，——他没有这样。但是他整个胖大而沉重的身子、胖得朝下坠的脸、他的眼睛和他的嗓音，似乎都充满了精力，仿佛他身体里面一个卷得很紧的螺旋弹簧放开了。

他把两个结实的、不会弯曲的、同时又很准确的手艺人的手指伸进上装的口袋，取出一张很小的、密密麻麻写满了字的纸条，交给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

“明天早上要……要多一些！”

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很快地把纸条藏在怀里。

“您在餐室里稍微等一等。我马上让女主人们来看您……”

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提着奶桶走进隔壁的房间，彼拉盖雅·伊里尼奇娜和她的母亲跟着也走了进去。她们站着交换街头新闻。过了一会，刘季柯夫在厨房里喊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她又到了他那里。

他手里拿着一卷报纸。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看见这是一大卷一折为四的《真理报》，脸上露出了惊异的神色。

“放在奶桶里，”刘季柯夫说，“让他们也贴在那边最显眼的地方。”

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的心都跳了起来。尽管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她最初一刹那仍然觉得，刘季柯夫是接到了新的《真理报》。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忍不住了，所以在把这卷报纸塞进奶桶之前，先望了望日期。

“旧的。”她说，无法掩饰自己的失望。

“不旧。布尔什维克的真理是不会陈旧的。”刘季柯夫说。

她迅速地翻了几份。大部分都是历年的节日号，刊登着列宁和斯大林的像。她明白刘季柯夫的意图了。她把报纸卷紧，塞到奶桶里。

“免得我一会儿忘记，先跟您说一下，”刘季柯夫说，“让奥斯塔普楚克也出来工作。

明天就去……”

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默默地点点头。她不知道奥斯塔普楚克就是马特维·舒尔迦，也不知道他躲在哪里，她只知道需要把刘季柯夫的命令传到的那所房子：她也给那边送牛奶。

“谢谢您。没有别的了……”刘季柯夫伸出大手跟她握了一下，就回到房间里。

他重重地坐在椅子上，手指叉开，手撑着膝盖，坐了一会。他望了望表：现在是七点过一点。他用缓慢镇静的动作脱掉穿旧了的衬衫，取出一件洁白的新衬衫，打了领结，把两鬓和前面特别灰白的头发梳了一梳，穿上上装，走到厨房里。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走后，彼拉盖雅·伊里尼奇娜和她母亲又在那里忙碌了。

“啊，彼拉盖雅·伊里尼奇娜，要是有，请给我一点疯牛的牛奶①和面包。我要去上班了。”他说。

①指伏特加酒。

过了十来分钟，他穿得整齐、干净，戴着黑便帽，仍旧沿着平时走的路线，毫不回避任何人，在城里的街道上朝克拉斯诺顿煤业联合公司的中央工厂走去。

第二十三章

在德国军队和跟着军队而来的“新秩序”管理机关的数不清的官员中间，克拉斯诺顿来了一个非常瘦削的、头发有点灰白的中年德国人，所谓采矿营的技师施维德中尉。没有一个克拉斯诺顿人记得他是哪一天来的：他像所有的官员一样，也穿着标准军服，佩着令人莫明其妙的级别标志。

他个人占用了一座很大的、有四套房间的标准式房屋，有四个厨房。从旋维德先生在房子里出现的第一分钟起，所有四个厨房都有了足够的工作。他随身带来一大群德国官员，但是他们都不跟他住在一起。和他住在一起的是几个德国厨子、一个德国管家婆和一个勤务兵。然而很快他的仆人的人数就已经靠增添俄国妇人①而增加了；凡是职业介绍所给他送来的女仆、洗衣妇、女翻译、女裁缝，不久之后还有养牛的、养猪的和养家禽的妇女，他都一律称为俄国妇人②。施维德先生养的牛和猪真的就像变戏法似的越来越多，但是他个人特别爱吃的却是家禽。

①② 原文为德语。

事实上，这并没有使这位采矿营中尉比别的德国官员显得突出。但是他却成为城里闲谈的话题。施维德先生和同他一起前来的其他官员占据了公

园里的高尔基学校的校舍。在原来的校舍里出现了一个新机关——第十办事处。

这个军事化的机关，原来竟是最主要的经济管理机关，现在所有的矿井以及克拉斯诺顿区各个和它们有关的企业，包括它们的一切来不及运走或炸掉的财产和装备，以及一切来不及撤退或是不能够撤退的工人，都要归它管辖。这个机关不过是那个有着一长串妄自尊大的名字“东方煤业冶金业开采经营公司”的大股份公司的无数分公司之一。公司的总管理处设在重又恢复旧称“尤佐夫斯克”的斯大林诺城里。所谓“东方公司”管辖着各“矿业冶金业区管理处”。许多办事处之一的第十办事处，隶属于设在沙赫特城里的区管理处。

这一切都安排得非常好，而且计划得更妙，所以苏维埃顿巴斯的煤和金属现在只能像洪流似的源源流进德国“东方公司”的口袋。于是施维德先生就下了一道命令：原克拉斯诺顿煤业联合公司所属各矿井和工厂的全体工人、职员和工程技术人员立即前来上工。

当家乡的矿井和工厂变成了祖国的敌人的财产，当儿子和兄弟、丈夫和父亲在战场上和祖国的敌人作战，献出自己生命的时候，每一个劳动者在他被迫作出决定出去工作之前，有多少痛苦的疑虑折磨着他的灵魂啊！到中央工厂去上班的工人和职员一个个都是脸色阴沉，同时又面有愧色，人们都避免目光相遇，几乎都不交谈。

自从最后一次疏散以后，工厂的门一直大敞着，没有人去把门关上，也没有人看守它，因为再也没有人关心使留在工厂里的一切保持完整了。工厂的门开着，但是谁也不走进车间。工人们坐在院子里的垃圾和废铁中间，默默地等待着上级。他们甚至不是三五成群地聚在一块，而是单个儿，很少有两个人在一块。

这时机械工程师巴腊柯夫出现了，这是一个体格强壮而匀称的人，虽然有三十五岁，看上去却显得非常年轻。他脸上带着自信的表情，穿得不仅整洁，而且有些要出风头。他的黑领带打成蝴蝶结。他把帽子拿在手里，剃得光光的头在太阳下面闪闪发光。巴腊柯夫走到院子里这些零零落落的工人面前，彬彬有礼地同他们打招呼。他踌躇了一刹那，接着就迈开坚决的步子走进正房。工人们没有回答他的问候，默默地看他穿过机械车间的敞着的门，走进了那间小小的办公室。

德国长官并不着急。等施维德的副手费耳德纳先生和一个头发蓬松的俄罗斯女翻译穿过通行亭走进院子的时候，天气已经很热了。

造物常常有这样的安排，费耳德纳先生在体质和气质上跟他的上司恰恰相反。施维德中尉是个瘦子，性情多疑，沉默寡言。费耳德纳却是个矮胖子，大嗓门，说起话来没完没了。

他的嗓子可以发出各种不同高度的音调，老远就可以听到，并且总使人觉得，走过来的不止一个德国人，而是几个互相争吵着的德国人。费耳德纳先生穿着军装和皮靴，戴着帽顶前面翘得老高的灰色制帽。

费耳德纳由女翻译陪着走到工人们跟前，——他们一个跟着一个站起来，这使他感到某种程度的满足。他对女翻译刚把话说完，现在又要对工人们说话，中间毫不停顿，就一口气说出了一句很长的，也许是几句短的德国话。在那女人翻译的时候，他继续叫嚷着。大概，他从来不知道什么是沉默。可以猜想，从他出娘胎发出第一声叫喊以来，他就没有住过嘴，一辈子都是

在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叫嚷的状态中度过的。

他要知道这里有没有人是原来管理处的人员，接着吩咐工人们陪他费耳德纳到车间里去。这个叫叫嚷嚷的德国人带着女翻译走在前面，几个工人陪着他们向巴腊柯夫刚才进去的机械车间小办公室走去。费耳德纳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拚命昂起他的戴着帽顶翘起的制帽的脑袋，用胖拳头推开小办公室的门，走了进去。那妇人跟他进去，掩上了门。工人们都留在门外听着。

起初只听见费耳德纳的叫嚷，仿佛有好几个德国人在吵架。大家预料女翻译就要翻译他还在叫嚷的那些话了，但是使大家惊奇的是，巴腊柯夫自己竟说起德语来了。他说得很客气，很镇静，而且根据门外的工人们所能够判断的，他的外语说得很流利。

也许是因为巴腊柯夫会说德语，也许是他的话使德国人感到满意，费耳德纳的叫嚷声竟渐渐地变得愈来愈低。突然出现了奇迹：德国人住嘴了。巴腊柯夫也住嘴了。几秒钟以后，德国人再叫喊的时候，声调已经非常温和了。他们走出了小办公室——先是费耳德纳，巴腊柯夫跟着他，再后面是女翻译。巴腊柯夫冷冷地、忧郁地朝工人们看了一眼，叫他们不要走散，等他回来。然后他们又照原来的次序经过车间向大门口走去，漂亮强壮的巴腊柯夫还不断地从后面跑上来，给矮胖得滑稽可笑的德国人指点，怎么走方便些。这种情景使人看了觉得真是可怕！

过了一会，巴腊柯夫已经坐在高尔基学校的教员休息室里，现在这里是第十办事处主任施维德先生的办公室。谈话的时候，费耳德纳和那个不知来历的女翻译也在场，但是女翻译始终没有机会显露一下她的德语知识。

上面我们已经说过，施维德中尉和那个喜欢说话、感情外露的费耳德纳不同，他不是一个能说会道的人。由于不能表达自己的意思，他甚至给人一种阴沉的印象；其实他并不阴沉，而是喜欢寻欢作乐，追求生活享受。他瘦得出奇，可是食量却大得惊人。甚至难以理解，他吞下那么多的食物都往哪里放，这些东西是怎样通过他的机体的。他不论对于姑娘①，还是妇人②，——在他目前的情况下特别是对于俄国姑娘和俄国妇人③，一律都喜欢到神魂颠倒的地步。为了把她们里面意志最薄弱的人引诱到他的屋子里来，他每天晚上在他的有四套房间的公馆里举行热闹的晚会，摆上各式各样的烤肉和甜食，更不必去说各种美酒了。他总是对厨子们说：“多预备些！多预备些吃的东西！④让俄国妇人⑤吃饱，喝够！……”

的确，他连话都说不清楚，也只能靠这种手段来俘掳那种居然会到他家里来的俄国妇人⑥。　　①②③④⑤　原文为德语。

⑥原文为德语。

施维德先生没有本领把单词联成句子，这使他对所有很容易做到这一点的人都产生了怀疑。他甚至不信任他的副手费耳德纳。可以想象，施维德对别的民族的人是抱着怎样不信任的态度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巴腊柯夫的处境是极为不利的。但是，第一，使施维德先生最为惊佩的是，巴腊柯夫居然能够不是用俄语、而是用德语把单词很容易地联成句子。第二，巴腊柯夫以阿谀奉承赢得了施维德的欢心。中尉先生除了接受他的奉承之外，已经毫无办法了。

“我是少数活着的旧俄特权阶级代表之一，”巴腊柯夫说，他的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盯住施维德先生，“我从小就爱慕德国的天才，特别是经济方面的，

尤其是生产方面的……我父亲是旧俄著名的最大企业之一西门子——苏克特公司的经理。在我们家庭里，德语是第二国语。我受的教育都是从德国技术书籍得来的。现在，我有幸能够在像您施维德先生这样出色的专家领导下工作，我一定会做到您命令我做的一切……”

巴腊柯夫忽然察觉，那个女翻译正带着她甚至无法掩饰的惊奇望着他。鬼才知道，德国人是从哪里挖出了这个披头散发的女尸！她如果是本地人，她就不会不知道，巴腊柯夫并不是旧俄特权阶级活着的代表之一，而是世代相传的姓巴腊柯夫的顿涅茨矿工的光荣的代表。

巴腊柯夫的剃得精光的头上冒出了汗珠。

在巴腊柯夫说话的时候，施维德先生默默地做了一点思考工作，但是脸上并没有反映出来，过了一会，他又像肯定、又像询问地说道：

“您是共产党员……”

巴腊柯夫摆了摆手。对于这个手势和他脸上同时露出的表情，可以解释成这样：“我算是什么共产党员！”或者是：“您自己知道的，我们这儿所有的人都一定要做共产党员。”或者甚至是：“不错，我是共产党员，但是如果我来给您做事，对您反而更好。”

这个手势暂时使施维德先生感到满意。现在要向这个俄国工程师解释，使中央工厂开工是多么重要，因为要靠它来恢复矿井的装备。施维德先生把这番复杂的意思构成一句否定的话。

“什么都没有。那边什么都没有①”他说着，一面痛苦地望了望费耳德纳。

费耳德纳因为在长官面前不得不这样长久地沉默着，正感到痛苦得要命，他趁此机会就机械地喊出一连串的“没有”来证实长官的意思：

“没有机器！没有运输工具！没有工具！没有做支架的木料！没有工人！”他叫着。

他甚至惋惜他不能再叫出其他“没有”的东西。

施维德满意地点点头，想了一想，然后吃力地用俄语重说了一遍：

“稀（什）么都没有，所以②，没有煤！”　　①②　原文为德语。

他朝椅背上一靠，先望望巴腊柯夫，再望望费耳德纳。费耳德纳理解这种目光是行动的信号，就用他的大嗓门喊出“东方公司”到底希望巴腊柯夫做些什么的那一段话。

巴腊柯夫好容易才在这一连串的叫嚷中挑到一个休止的间歇，抢着插进一句话去。他说凡是他力量办得到的，他一定尽力去做。

这时施维德先生又感到不信任。

“您是共产党员。”他又说了一遍。

巴腊柯夫苦笑了一笑，又把他的手势重复了一下。

巴腊柯夫回到工厂之后，就在大门上贴出了一张长长的布告说：他，第十办事处中央工厂厂长，命令所有的工人、职员和工程师都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并且招收一切有某种专长、愿意来厂工作的人。

甚至那些肯违背自己的良心而决定去上工的人们里面最落后的人，想到巴腊柯夫工程师，芬兰战争和卫国战争的参加者，竟会自愿同意去做对德国人是最重要的企业的厂长，精神上都受到打击。但是布告上的墨迹未干，到工厂里来的不是别人，而是费里普·彼得罗维奇·刘季柯夫——就是那个不仅仅在工厂里，就连在克拉斯诺顿整个党组织里面也被称为“共产党员的

良心”的刘季柯夫。

他早上就来了，没有回避任何人，穿得干干净净，脸刮得很光，黑色上装里面穿着白衬衫，打着节日用的领带。他立时被录用了，在工厂里担任机械车间主任的原职。

地下区委的最初几张传单的出现，正巧和工厂开工同时。传单和旧的《真理报》一起贴在各个最醒目的地方。布尔什维克并没有撇下小小的克拉斯诺顿不管，听它由命运摆布，他们在继续斗争，并且号召全体居民起来作斗争——这就是传单上面的话！因此许多在和平时期认识巴腊柯夫和刘季柯夫的人，曾不止一次想过：将来我们的人回来的时候，他们还敢去瞧一瞧自己同志们的纯洁的眼睛吗？

不错，实际上工厂里什么工作都没有。巴腊柯夫陪德国长官们的时候越来越多，他很少关心工厂里在干些什么。工人们上工经常迟到，在车床旁边闲晃，一连几个钟头聚集在院子里背阴角落的草地上抽烟。刘季柯夫大概是为了讨好工人，总是鼓励他们到农村去休假，给他们开证明，仿佛他们是因公出差。工人们替居民做些小东西来赚点外快。做得特别多的是打火机，因为到处都没有火柴，汽油却可以用食物去跟德国士兵交换。

军官们的勤务兵常常拿着装满奶油或是蜂蜜的罐头跑到工厂里来，要工人们把罐头焊好，以便寄回德国去。这样的事每天总有几起。

有的工人有时试图跟刘季柯夫谈谈，——跟巴腊柯夫，是根本没有机会接近的，——问他究竟是怎么会来替德国人做事的，今后究竟该怎么生活？他们从老远的地方谈起，老是在题外绕圈子。但是刘季柯夫马上戳穿对方的花招，厉声说道：

“没关系，我们替他们干活就是了……”

或是粗暴地说：

“老弟，这件事你管不着。你来上工了没有？来了。你是我的上级，还是我是你的上级？我是你的上级……那么，就应该是我向你提出要求，而不是你向我提出要求。我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懂吗？”

每天早晨上班，傍晚下班回家，刘季柯夫都要步行穿过全城，他迈着一个患有气喘病的中年人的缓慢而沉重的步子走路。谁也想象不到，刘季柯夫竟会那么精力充沛地、迅速地、同时又是那么周密地展开了他的主要的活动。这个活动后来给小小的矿城克拉斯诺顿带来了世界性的声誉。

在他刚刚开始活动的时候，就突然获悉，他最亲近的助手之一舒尔迦竟令人不解地失踪了，这时他心里真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作为地下区委书记的刘季柯夫，知道城里和区里所有的秘密住所和接头地点。他也知道舒尔迦预定要利用的康德拉多维奇和福明的住所。但是刘季柯夫没有权利派任何一个区的联络员到这些住所去，更不能派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去。如果舒尔迦是在这两个住所里面的一处被出卖给德国人，那边的房东只要一看见联络员，就能够根据她的线索发现刘季柯夫和别的区委委员。

如果舒尔迦是平安无事的话，他早就会去问总联络处，他是不是该到工厂去上工了。他甚至不必到这所住宅里去，只要在它旁边走过就行。在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把刘季柯夫的命令传达到这所房子的那一天，大门旁边第一个窗台上马上就摆出了一盆天竺葵。但是叶夫多金·奥斯塔普楚克——他就是舒尔迦——却没有去上工。

过了相当久，等刘季柯夫搜集了所有关于去德国“警察队”做事的叛徒的材料，才知道福明是个什么人。一定就是福明出卖了舒尔迦。但这是怎么发生的，舒尔迦以后的命运又是怎样呢？

在疏散期间；区党委根据普罗庆柯的指示，在公园里埋了区印刷所的铅字；铅字埋藏地点的准确图纸到最后一刻才交给刘季柯夫。刘季柯夫非常担心铅字会被守卫汽车库的德国高射炮手和兵士发现。无论如何要找到铅字，并且要在德国哨兵的眼皮底下把铅字拿出来。这件事谁能办呢？

第二十四章

在战争的第一个冬天，父亲去世之后，沃洛佳·奥西摩兴没有在伏罗希洛夫学校念完最后的十年级，却进了克拉斯诺顿煤业联合公司工厂的机械车间去做钳工。他在刘季柯夫的领导下工作。刘季柯夫和他母亲的家庭——雷巴洛夫家很接近，所以对沃洛佳很然悉。沃洛佳在他因为患急性阑尾炎进医院以前，一直都在车间里工作。

德国人一来，沃洛佳当然不准备回车间了。但是公布了巴腊柯夫的命令，并且谣传纷纷，说所有逃避回厂的人都要被赶到德国去。在这以后，特别是在刘季柯夫去工作以后，沃洛佳和他的好朋友托里亚·奥尔洛夫之间就开始了几次非常痛心的谈话：应该采取什么行动。

在德国人统治下。去不去上工的问题，对于沃洛佳和托里亚，也像对于所有的苏联人一样，是最难以解决的良心问题之一。去上工——这是至少可以挣得一点糊口之资的最容易的方法，同时又可以避免加到拒绝替德国人工作的苏联人头上的迫害。况且，许多人的经验证明，也可以不干活，只要装出干活的样子就行。但是也像所有的苏联人一样，沃洛佳和托里亚所受的教育首先是：根本不能给敌人工作，无论是多是少都不行；相反地，敌人一来，就应当抛掉工作，用各种方法同敌人进行斗争，做地下工作，参加游击队。但是，这些地下工作者和游击队员在哪里呢？怎么去找到他们？在没有找到他们以前，这一段时间怎样生活和靠什么生活呢？

沃洛佳病后已经开始走动，他和托里亚两人躺在草原上晒太阳的时候，谈来谈去总是他们生活中的这个主要问题：他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一天傍晚，刘季柯夫自己到奥西摩兴家来了。他来的时候，屋子里正住满了德国兵，——不是拚命跟刘西雅纠缠的那个雄赳赳的上等兵带领的那一批，而是第二批，也说不定已经是第三批了，因为奥西摩兴家住的那一区是德军主流必经之地。刘季柯夫像一个有地位的人那样，迈着沉重缓慢的步子走上台阶，脱下便帽，彬彬有礼地向厨房里的兵士问好，然后敲了敲仍旧是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刘西雅和沃洛佳三人合住的那个房间的门。

“费里普·彼得罗维奇！您来看我们啦？……”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急急跑到他跟前，用她的又干又热的手抓住他的双手。

在克拉斯诺顿，有些人并不因为刘季柯夫回到工厂工作而谴责他，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就属于这样的人。她非常了解刘季柯夫，甚至认为不需要查明他这样做的原因何在。刘季柯夫既然这样做，可见是没有别的

办法，而且，也许是需要这样做。

德国人到来之后，刘季柯夫是第一个来探望奥西摩兴家的好友，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的这个猛烈的动作表现出和他见面的全部喜悦。他懂得这一点，心里非常感激她。

“我是来拖您的儿子去上工的。”他脸上带着惯常的严肃的表情说，“您跟刘西雅先装装样子陪我们坐一会，然后你们好像有事走出去，我有几句话要跟他谈谈……”他对他们三个笑了笑，他的脸色马上变得柔和了。

从他进来的那一瞬间起，沃洛佳的眼睛就没有离开过他。沃洛佳在和托里亚的谈话中，曾经不止一次说出他的猜测，他认为刘季柯夫回工厂工作并不是出于迫不得已，更不是由于胆怯，——他不是那样的人！他大概有更深一层的想法，也许这些想法同沃洛佳和托里亚头脑里一再出现的想法相差并不太远。无论如何，对这样一个人，是可以大胆地把自己的意图告诉他的。

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和刘西雅刚走出房门，沃洛佳就先开口了。

“去上工！您说——去上工！我去上工也罢，不去上工也罢，对我反正是一回事；不管我上不上工，我的目的都是一样。我的目的是斗争，无情的斗争。如果我去上工，那也无非是为了打掩护。”沃洛佳说的时候甚至带着几分挑战的口吻。

他那青年人的勇敢、天真以及因为门外有德国兵而勉强压抑住的激昂的情绪，并没有使刘季柯夫为他担心，也没有使他感到烦恼和好笑，而是使他想微笑。但是像他这样的人是喜怒不形于色的，他连眉毛都没有动一动。

“很好，”他说，“这些话，你对凡是像我这样进来串门的人都去说吧。你还不如到大街上去，随便碰到什么人都对他说：‘我要去作无情的斗争，我要掩护自己，请你们帮助我吧！’”

沃洛佳涨红了脸。

“您又不是随便什么人。”他突然脸色阴沉，说道。

“我，也许不是，但是如今这种世道，谁也不敢说。”刘季柯夫说。

沃洛佳懂得，刘季柯夫就要开始教训他了。果然，刘季柯夫开始教训起他来。

“在这种事情上，轻信是会送命的，——世道不同了。而且俗语说：隔墙有耳。你别以为，他们就那么老实，他们有他们狡猾的地方。”刘季柯夫朝门那边微微点了点头。“嗯，算你走运，我这个人是大家都知道的，我有任务让所有的人都回厂工作，我来找你也是为了这个。你对你母亲和妹妹就这么说。对这批家伙也这么说，”他又朝门那边点点头。“我们替他们干一阵……”他说完了，就抬起那双严厉的眼睛望着沃洛佳。

沃洛佳马上一切都明白了，——他的脸色甚至苍白起来。

“你所认识的可以信赖的孩子们，有谁留在城里？”刘季柯夫问。

沃洛佳说出他熟悉的三个人：托里亚·奥尔洛夫、若拉·阿鲁秋仰茨和万尼亚·捷姆奴霍夫。

“还可以再找到一些人。”他说。

“先跟你认为完全可靠的那些人建立关系，不过不要大伙一起，应当个别地建立关系。

假如你确实相信他们是自己人……”

“他们是自己人，费里普·彼得罗维奇……”

“假如你确实相信他们是自己人，”刘季柯夫好像没有听清沃洛佳的话，接下去说，“你就认真地暗示他们，没有可能，问他们同不同意……”

“他们会同意的，可是他们个个都会问，他应当做什么？”

“你就回答，自然会给他们任务。至于你，我马上就给你一个任务……”刘季柯夫便把公园里埋着铅字的事告诉了沃洛佳，并且准确地指明地点。“去侦察一下，能不能挖出来。

不行的话，就向我报告。”

沃洛佳考虑了一下。刘季柯夫并不催他答复：他知道，沃洛佳不会动摇，只是作为一个严肃的人，正在周密地考虑问题。但是沃洛佳所想的并不是刘季柯夫现在向他提出的事。

“我要对您完全坦白，”沃洛佳说，“您说，我跟孩子们应当个别地谈，——这我是懂得的。不过即使在个别谈话中，我也应当让他们明白，我是代表什么人说话的……如果我是个人行动，那是一回事；如果我说，我的任务是一个和组织有关系的人派给我的，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不会说出您的名字，而且也不会有人问，——他们又不是不懂。”沃洛佳这样说是防止刘季柯夫的反驳，但是刘季柯夫并没有反驳，只是听沃洛佳说。“当然，如果我只是以奥西摩兴的身分跟孩子们谈话，他们也会相信我……但是除了我以外，他们还是要去寻找地下组织的关系，因为对他们来说，我又不是权威，他们有的年纪比我大，而且……”沃洛佳本来想说“比我聪明”。“一般地说，他们里面有些人更关心政治，认识更清楚。因此最好告诉他们，我不是个人行动，而是代表组织。这是第一，”沃洛佳说，“第二，为了执行您交给的有关印刷所的任务，需要好几个人。这就更需要向他们解释，这是重大的任务，这个任务是哪里交下来的。这里我也有个问题要问您。我有三个朋友：一个是老朋友——托里亚·奥尔洛夫，另外两个是新朋友，不过从前我对他们就很熟悉，是患难之交。我相信他们就像相信我自己一样，——这就是万尼亚·捷姆奴霍夫和若拉·阿鲁秋仰茨。我能不能把他们找到一块儿，商量一下？”

刘季柯夫沉默了一会，眼睛望着自己的靴子，然后抬起眼睛望着沃洛佳，微微一笑，但是脸上又露出严峻的表情。

“好，把这几个孩子找到一块儿，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你是代表什么人行动的，——当然不要说出姓名。”

沃洛佳勉强克制住内心的激动，只点了点头。

“你考虑得非常有道理：应当让每一个自己人了解，在我们的一切工作后面都有党做后盾。”刘季柯夫接下去说，仿佛是在跟自己商量。他那双聪明、严峻的眼睛平静而直率地望进了沃洛佳的内心。“还有，你理解得对，在我们的党组织下面最好有自己的青年小组。老实说，我也是为了这件事来找你的。这一点既然已经谈妥，我就要给你们一个劝告，如果你愿意，也可说是一个命令：没有跟我商量，你们不要采取任何行动，——不然你们可能毁了自己，还要连累我们。要知道，我也不是单独行动的，我也要跟人商量。我要征求我的同志们的意见，也要征求派来领导我们的人的意见，在我们伏罗希洛夫格勒州就有这样的人。你把这些话告诉你的三个好朋友，你们也要互相商量。现在，话好像讲完了，”刘季柯夫笑了笑，站起身来。“你明天来上工吧。”

“还是后天吧，”沃洛佳笑着说。“可以把托里亚·奥尔洛夫带来吗？”

“我原来只想鼓动一个人替德国人干活，想不到一下子却弄到两个，”刘

季柯夫笑了笑，“带来吧，那再好也没有了！”

刘季柯夫走到厨房里，跟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刘西雅以及那个德国兵说笑了几句，不多一会便走了。沃洛佳懂得，他现在被吸收参加的秘密活动的事，决不能让亲人知道。但是他很难掩饰那极度的兴奋，不让母亲和妹妹的爱护备至的眼睛看出来。

沃洛佳开始假装打呵欠，说他明天要早起，总之，他困得要命。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一句话也没有问他，这个征兆非常不妙：沃洛佳疑心母亲已经猜到刘季柯夫跟他谈的不止是让他到厂里工作的问题了。刘西雅却开门见山地问道：

“你们谈了这么久，都谈了些什么？”

“谈了些什么，谈了些什么！”沃洛佳发火了。“你自己明知道我们谈了些什么。”

“你去吗？”

“那有什么办法？”

“替德国人干活！……”

刘西雅的声音里带着那样的惊奇和愤慨，使沃洛佳简直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们替他们干一阵……”他阴沉地重述了刘季柯夫的话，接着，对刘西雅望也不望，就动手脱衣服。

第二十五章

若拉疏散不成回来之后，马上就跟沃洛佳和托里亚·奥尔洛夫建立了无话不谈的友好关系。不过他跟刘西雅的关系却是紧张而拘谨的。若拉住在新村里的一所小房子里，德国人对这些地方瞧不上眼，所以几个朋友大多是在若拉家里碰头。

在沃洛佳接到刘季柯夫给的任务，派他去侦察铅字的情况的第二天，他们三人就聚在若拉家里。若拉住的房间小得勉强可以放下一张床和一张小书桌，不过总算是个单间。从下亚力山德罗夫卡庄回来的万尼亚就在这里找到他们。万尼亚更消瘦了，他的衣服破旧了，满身尘土，——他还没有回家去过。但是他的情绪高昂、积极。

“你还有机会见到这个人吗？”他问沃洛佳。

“干什么？”

“请他准许立刻把奥列格·柯舍沃伊吸收进我们的小组。”

“他说暂时不要吸收什么人到我们的小组里来，只是先挑选一些合适的青年。”

“所以我说，要得到他的准许。”万尼亚说，“今天，比方说在天黑以前，你能不能碰到这个人？”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急？”沃洛佳说的时候有点生气。

“我来讲给你听‘为什么’……第一，奥列格是一个真正的好青年；第二，他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就是说，是一个可靠的青年；第三，他比若拉更

熟悉高尔基学校七年级到九年级的孩子们，而留在城里的孩子们数这几班的最多……”

若拉迅速地抬起他的炯炯发光的黑眼睛望着沃洛佳，说道：

“自从我疏散不成回来之后，就向你详细介绍过奥列格的为人。还应当考虑到，他就住在公园附近，对于完成交给我们的任务最有帮助……”

若拉有一种特长，善于用准确的句子表达他的意思，使他的意思显得非常郑重，简直像是指令。沃洛佳动摇起来。但是他记得刘季柯夫对他的警告，所以仍旧没有让步。

“好吧，”万尼亚说，“我可以再给你举一个理由，可是只能单独对你说。你们不生气吗？”他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带着刚毅而又难为情的微笑转过身来对着若拉和托里亚·奥尔洛夫说。

“搞秘密工作，个人根本不可以而且也不应当生气，只要对我们的目标有利，一切都应当服从。”若拉说完就和托里亚·奥尔洛夫一起走出房间。

“我可以证明，我对你的信任超过你对我的信任。”万尼亚微笑着说，但是这次微笑已经没有难为情的表情，现在完全是一个坚决而勇敢的人的刚毅的微笑了。实际上万尼亚就是这样的人。“若拉有没有对你讲过，瓦尔柯和我们一块回来了？”

“讲过。”

“你没有把这件事告诉那位同志吗？”

“没有……”

“那么，请你注意，奥列格和瓦尔柯有联系，而瓦尔柯正在寻找布尔什维克地下组织的关系……你把这个情况告诉那位同志。同时也转达我们的请求。告诉他，我们可以为奥列格担保……”

这样，命里注定沃洛佳在他答应刘季柯夫的日期之前就到中央工厂去了。

趁沃洛佳走开的当儿，万尼亚就派“雷响”托里亚去从旁探听，柯舍沃伊家里有没有驻扎德国人，能不能到他那里去。

“雷响”从公园街那边走近柯舍沃伊家的时候，看见门口站着一个德国哨兵，一个衣服破旧、生着满头柔软的黑发的俊俏妇人，赤着脚，满面泪痕地从屋子里跑出来，跑进柴房就不见了。接着托里亚听见从那边传来她的哭声，还有一个男人的声音在安慰她。一个干瘦的、晒得黑黑的老妇人急匆匆地跑到门道里，青筋突露的手里提着一只水桶，用水桶从大桶里打了一桶水，又急急地回上房去。屋子里发生了一阵骚乱，听到一个年轻的德国人的声音在盛气凌人地发脾气，还有几个女人的声音似乎在向他道歉。托里亚怕引起注意，不能再耽搁下去，就沿着公园绕过整整这一区，顺着和公园街平行的后街走近这所房子。但是从这里他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也听不到了。托里亚看到邻家的院子也跟柯舍沃伊家的院子一样，前后都有门，可以通到两条街上。他就穿过邻家的菜园，在通菜园的柴房后墙边站了一会。

现在柴房里有三个妇女和一个男人的声音。一个年轻妇女的声音哭着说：

“就是打死我，我也不回到屋子里去！……”

那个男人的声音愠怒地劝道：

“这倒不错！叫奥列格往哪儿住？还有娃娃呢？……”

“出卖灵魂的东西！为了半公升橄榄油！出卖灵魂的东西！……你总有

一天还要听到我的消息，是的，你还会听到我的消息，你将来想到我会后悔的！”奥列格从莲娜·波兹德内雪娃家里出来，在回家的路上这样说着。嫉妒和自尊心受伤害，使他痛苦万分。血红的、灼人的夕阳直射着他的眼睛，在联成一串的红光圈里，一次又一次浮过莲娜的浅黑的秀丽的小脸、她身上那件沉甸甸的暗花衣服和钢琴旁边穿灰衣服的德国人。他不住地重复着：“出卖灵魂的东西！……出卖灵魂的东西！……”一种几乎是孩子气的痛苦使他喘不过气来。

他发现玛丽娜坐在柴房里。她双手捂着脸，覆着云一般柔软的黑发的头低垂着。家里的人都团团地围着她。

长腿副官趁将军不在，想用冷水擦擦身子凉快凉快，就吩咐玛丽娜给他拿一个盆和一桶水来。玛丽娜拿着盆提着水推开餐室的门，副官已经脱得精赤条条地站在她面前。他的身子细长、雪白，“像条蛔虫。”玛丽娜边哭边讲。他站在沙发旁边稍远的角落里，玛丽娜刚进去的时候没有发现他。突然他几乎到了她身边，带着好奇的神气轻蔑而无耻地望着她。她感到一阵强烈的恐惧和厌恶，手一撒把盆和水桶都扔了。水桶倒了，水流了一地。玛丽娜就逃到柴房里。

现在大家都等待着玛丽娜的卤莽举动的后果。

“你哭什么呀！”奥列格态度粗暴地说，“你以为他想把你怎么样吗？如果他是这儿的头，他一定不会饶你，还会叫勤务兵来帮忙。可是实际上他不过是要洗个澡。至于他当着你的面赤身露体，那是因为他压根没有想到看见你要觉得不好意思！要知道，在这些畜生眼里，我们比野蛮人还不如。你应该谢谢他们，因为他们还没有像党卫队的官兵住在别人家那样，当着我们的面拉屎撒尿呢！他们当着我们的人大小便，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哼，我可看透了这些目空一切、卑鄙下流的法西斯坏种！不，他们不是畜生，他们比畜生还不如，他们是败类！”他恨恨地说，“你哭哭啼啼，我们大伙都围着你，——嘿，倒像是出了一桩大事！——这是气人的，可耻的！如果我们暂时不能打击他们和消灭他们，我们就应该蔑视这些败类，是的，应该蔑视他们，而不是这样没出息地哭哭啼啼，像婆娘那样唠唠叨叨！他们总会得到报应的！”奥列格说。

他气冲冲地走出柴房。他一次又一次地看到这些光秃秃的庭园，看到从公园到过道口的整段仿佛是剥光了的街道和街上的德国兵，心里十分反感。

叶列娜·尼柯拉耶芙娜跟着他走了出来。

“你老不回来，我很不放心。莲娜怎么样？”她注意地、探究地望着儿子的阴郁的脸，问道。

奥列格的嘴唇像大孩子那样抖了一下。

“出卖灵魂的东西！以后你再也不要对我提起她……”

接着，也像平时一样，他不知不觉地把一切——他在莲娜家里看到的情况和他的举动——都告诉了母亲。

“不然又叫我怎么办呢！……”他高叫起来。

“你不必惋惜她，”母亲温柔地说，“你因为惋惜她，所以才这样激动，可是你不必惋惜。她既然能做出这种事，就是说她一向不是……像我们所想的那样。”她本来想说“像你所想的”，但是决定说“像我们所想的”。“但是这只暴露了她的丑恶，而不是表示我们……”

草原上的一轮明月像夏天那样低低地挂在南方。尼柯拉·尼柯拉耶维奇和奥列格都没有去睡，他们默默地坐在柴房的开着的小门旁边，望着天空。

奥列格睁大眼睛望着这挂在傍晚的蓝天上、好像围着月华的满月，月华的反光落在台阶旁边的德国哨兵身上和菜园里的南瓜叶上。奥列格望着明月，仿佛是第一次看见它。他习惯了草原上这个小城的生活，这里地上和天上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公开的，大家都知道的。但是现在呢，这一弯新月是怎样出来、怎样变大，最后，这一轮明月又是怎样升到蔚蓝的天空，——这一切他都忽略了。有谁知道，在他的生活中，和世界上一切单纯、善良而美妙的事物完全融合的那种幸福时刻会不会再来呢？

冯·文采尔男爵将军和副官一声不响地走进屋子，他们的军服窸窣作声。四周的一切都归于寂静，只有哨兵在屋旁来回走着。尼柯拉·尼柯拉耶维奇坐了一会也去睡了。可是奥列格仍旧大睁着稚气的眼睛坐在打开的小门边，全身浴着月光。

突然，他听到身后，在朝着邻家院子的柴房板壁外面，有一阵细语声。

“奥列格……你睡了吗？醒醒！”有人贴着板壁缝低声叫道。

奥列格转眼之间就到了这堵板壁旁边。

“谁？”他轻声问。

“是我……万尼亚……你那边的门开着吗？”

“我不是一个人。还有哨兵在走来走去。”

“我也不是一个人。你能溜出来吗？”

“能……”

奥列格等哨兵向通另一条街的门口走过去的时候，就贴着墙壁从外面绕过柴房。在邻家菜园的近旁，被柴房浓密的阴影遮掩着的苦艾丛里，扇形地趴着三个人——万尼亚、若拉，还有一个也像他们一样瘦长的青年，他的脸被帽子遮住了。

“呸，真是见鬼！今天夜里月亮这么好，好不容易才溜到你这里！”若拉说，他的眼睛和牙齿都发光。“这是沃洛佳·奥西摩兴，伏罗希洛夫学校的。你可以绝对信任他，像信任我一样。”若拉说，他深信他是把最高评语给了他的同伴。

奥列格在他和万尼亚中间趴下。

“老实说，我再也想不到会在这个戒严的时候见到你。”奥列格咧开嘴笑着，对万尼亚轻声说。

“你要是遵守他们的规矩，那你就得闷死。”万尼亚冷笑着说。

“你真是个好青年！”奥列格笑起来，用他的大手搂住万尼亚的肩膀。“你把她们安排好了吗？”他凑着万尼亚的耳朵轻声说。

“我能不能在你的柴房里坐到天亮？”万尼亚问，“我还没有回去过，因为我们家里有德国兵……”

“我不是对你说过，可以在我们那里过夜吗？”若拉气呼呼地说。

“到你们那里远得要命……你和沃洛佳觉得夜里很亮，可是我却会跌进潮湿的探井里，永远葬身在里面！”

奥列格明白，万尼亚要和他单独谈话。

“你可以待到天亮。”他紧搂万尼亚的肩膀说。

“我们有非常好的消息，”万尼亚用几乎听不出的低声说，“沃洛佳跟一个地下工作者建立了关系，并且已经领了任务……你自己来说吧。”

恐怕再也没有别的事能像青年们在夜里的突然出现，特别是像沃洛佳·奥西摩兴告诉他的话，那样激动奥列格的活跃的性格了。有一霎时，他甚至觉得除了瓦尔柯之外，没有别人能够交给沃洛佳这样的任务。于是奥列格几乎把脸贴到沃洛佳的脸上，望着他的狭长的深色眼睛，开始追问：

“你是怎么找到他的？他是谁？”

“我没有权利说出他的名字。”沃洛佳稍微有些狼狈地说。

“你知道德国人在公园里的部署吗？”

“不知道……”

“我和若拉现在要进行一次侦察，只有我们俩当然很困难。托里亚·奥尔洛夫也要来，可是他咳得厉害。”沃洛佳笑了笑。

奥列格有好一会工夫默默地望着他的身旁。

“要是我，我可不主张现在就办。”他说，“只要有人走近公园，他们都看得见；可是公园里在干什么我们却看不见。如果这种事在大天白日公开地办，倒比较简单些。”

公园四周围着栅栏，四面都临街。所以一向脑筋敏捷而又实事求是的奥列格，建议明天每条街上都派一个人去溜达，各人去的时间不同，任务是只要记住离这条街最近的高射炮、掩蔽部和汽车的位置。

青年们来找奥列格时所怀的那种急于行动的兴奋情绪有些低落了。但是又不得不同意奥列格的简单的理由。

读者，你有没有黑夜在密林里迷过路？或是孤苦伶仃地流落他乡？或是只身遇险？或是惨遭横祸，甚至亲人都不理睬你？或是在探索一件人们所不知道的新事物，久久不为大家所了解和承认？如果你在生活中遇到过这些灾祸或困难里的一种，你就会了解，当一个人能遇到一个在诺言、信念、勇敢、忠诚方面都是始终不渝的朋友，他的内心会充溢着多么使人欢欣鼓舞的喜悦、多么难以言传的由衷的感激和多么难以抑制的汹涌澎湃的力量啊！你在世界上已经不是孤独的，在你身旁还有一个人的心在跳动！现在，当奥列格和万尼亚单独相对，借着在草原上空移动的月亮的光辉看见朋友这张镇静的、嘲弄的、受了鼓舞的脸和这双闪耀着善良和力量的近视眼，他所体验到的正是这股欢乐的情感的奔流和它紧压在胸口的感觉。

“万尼亚！”奥列格用他的大手抱住他，把他搂在胸口，一面发出轻轻的幸福的笑声。

“我总算看到你了！你怎么耽搁了这么久？你—你不在，把我闷死了！唉，你—你这个鬼东西！”

奥列格结结巴巴地说，又把他紧搂在胸口。

“放手，你把我的肋骨都要弄断了！我又不是年轻的姑娘。”万尼亚轻轻地笑着，一面挣出他的拥抱。

“我想她是不会用链子把你拴住的！”奥列格调皮地说。

“真亏你说得出口！”万尼亚不好意思起来。“出了这一切事情之后，我怎么能不先把她们安顿好，确信她们不会遇到危险，就把她们撇下不管呢？再说，她又是个不平凡的姑娘。

心地多么纯洁，目光多么远大！”万尼亚一往情深地说。

的确，万尼亚在下亚力山德罗夫卡度过的那几天里，他已经把他十九年的生活中思索过的、感受到的和写成了诗的一切都讲给克拉娃听了。而克拉娃，这个对万尼亚无限钟情的非常善良的姑娘，也默默地、耐心地听着他。

无论他问什么，她总是欣然点头，一切都同意他。难怪万尼亚和克拉娃相处的日子愈久，他就愈觉得她的目光远大了。

“我看得出，我看得出，你一你是被俘虏了！”奥列格结结巴巴地说，眼睛里含着笑意望着朋友。“你别生气，”他发觉万尼亚讨厌他的这种口吻，就突然严肃地说，“我不过是闹着玩的，我为你的幸福感到高兴。是的，我感到高兴。”奥列格深情地说，他额头上聚起了一堆皱褶，他向万尼亚的身旁望了一会。

“你坦白地说，是不是瓦尔柯把这个任务交给沃洛佳的？”

过了一会他问道。

“不是他。这个人请沃洛佳通过你打听怎么去找瓦尔柯。

老实说，我也是为了这件事才留在你这里不走的。”

“糟就糟在我不知道。我真替他担心。”奥列格说，“可是，让我们到柴房里去吧……”

他们随手掩上了门，两人就和衣躺在窄板床上，在黑暗中还长久地窃窃细语。仿佛离他们不远并没有那个德国哨兵，四周也没有任何德国人似的。他们不知已经说过多少次：

“好，够了，够了，得稍微睡一会……”

可是又开始低声谈起来。

奥列格是被柯里亚舅舅唤醒的。万尼亚已经走了。

“你怎么不脱衣服睡觉？”柯里亚舅舅问道，他的眼睛里和嘴唇上都隐隐带着一丝嘲笑。

“睡神把勇士打倒了……”奥列格伸着懒腰，解嘲地说。

“什么勇士！你们在柴房后面草丛里的会议都被我听见了。还有你跟万尼亚说的那些废话……”

“你都听见了？”奥列格在板床上坐起来，犹有睡意的脸上带着迷惘的神气。“你怎么不给我们一个讯号，让我们知道你没有睡着呢？”

“为了不妨碍你们……”

“我真没有料到你会这样！”

“我的事，你没有料到的还多呢，”柯里亚舅舅慢条斯理地说。“比方说，你可知道，我有一架收音机在地板下面，就在德国人脚底下吗？”

奥列格大吃一惊，脸上都露出了一副傻相。

“怎—怎么？你当时没有把它交出去？”

“没有交出去。”

“那么，你是向苏维埃政权隐瞒了？”

“是隐瞒了。”

“唔，柯里亚，真—真的……我不知道你这么鬼。”奥列格说，他觉得笑也不是，恼也不是。

“首先，这个收音机是因为我工作好而奖给我的。”柯里亚舅舅说，“其次，它是进口的，是七灯机……”

“不是答应过将来要发还的吗？”

“是答应过的。要是那样，现在它就会落到德国人手里，可是此刻它却在我们的地板下面。昨天夜里我听了你的话，我就明白，它对我们的用处非常大。所以，我做得完全正确。”

柯里亚舅舅说的时候脸上没有带笑容。

“你这个人真了不起，柯里亚舅舅！我们去洗洗脸，早饭前下一盘棋玩玩……我们这里的政权是德国人的，所以我们也用不着给谁工作！”奥列格情绪很好地说。

就在这时，他们俩都听到有一个少女的清脆的声音在高声问话，嚷得全院子都听得见：

“你听着，笨家伙：奥列格·柯舍沃伊是不是住在这里？”

“你说什么？我不懂，”①台阶旁边的哨兵回答道。 ①原文为德语。

“妮诺奇卡，你见过这样的笨蛋吗？俄语一点都不懂。那你就该放我们进去，要不就叫一个真正的俄罗斯人出来。”那少女的清脆的声音说。

柯里亚舅舅和奥列格交换一下眼色，从柴房里探出头来。

在那个甚至有点手足无措的德国哨兵面前，就在台阶旁边，站着两个姑娘。和哨兵说话的那个姑娘打扮得十分艳丽，所以奥列格和柯里亚舅舅首先都注意到她。这种艳丽的印象是来自她的绚烂夺目的衣服：天蓝色的绉纱上满是红的樱桃、绿的圆点，还有亮晶晶的黄的和紫的亮片。朝阳照耀着她的头发。她前面的头发卷成金光粲然的一圈高耸着，后面卷成一个个细长的发卷，垂到颈上和肩上，这些发卷大概是照着两面镜子精心卷出来的。那件灿烂夺目的连衣裙非常合身地裹住她的腰肢，又轻盈飘逸地罩住她的穿着肉色长袜和优雅的奶油色高跟鞋的匀称丰满的双腿，使她整个给人一种非常自然、活泼、轻盈的印象。

在奥列格和柯里亚舅舅从柴房里探出头来的那一刻，这个姑娘正试着要走上台阶，而一手端着自动枪站在台阶旁边的哨兵，却用另一只手挡住她的去路。

这姑娘毫不着慌，不经意地用她的洁白的小手在哨兵的脏手上拍了一下，快步走上台阶，又扭过头来对女伴说：

“妮诺奇卡，来啊，来啊……”

女伴踌躇起来。哨兵跳上台阶，伸开胳膊在门口把那姑娘拦住。用皮带吊在他的粗脖子上的自动枪垂了下来。在德国人的没有刮过胡子的脸上挂着愚蠢而得意的微笑，他得意的是他在履行职责；这同时又是谄媚的微笑，因为他明白只有姑娘们才有权利这样对待他。

“我就是柯舍沃伊，您到这边来吧。”奥列格说，一面从柴房里走出来。

姑娘猛地朝他转过头来，眯缝起蓝眼睛望了他一下，几乎在同一刹那就蹬着奶油色的高跟鞋，跑下了台阶。

身材高大的奥列格垂着双手等着她，带着天真的、询问的、和善的神情迎面望着她，好像在说：“我就是奥列格·柯舍沃伊……只是要请您向我说明，您找我干什么？如果是为了好事，我就为您服务；如果是为了坏事，那您为什么偏偏选中了我？……”姑娘走到他跟前，仿佛是对照片似的把他打量了一会。奥列格一直没有加以注意的那个姑娘也跟着走了过来，站在一旁。

“不错；是奥列格……”第一个姑娘满意地说，仿佛是向她自己证实似的。“我们最好能跟您单独谈一谈。”她用一只蓝眼睛对奥列格微微眨了一下。

奥列格又窘又急，把两个姑娘都让进了柴房。服装艳丽的姑娘眯缝起眼睛仔细打量了柯里亚舅舅一下，又带着诧异的询问的神情把目光移到奥列

格身上。

“您可以对我说的话，都可以当着他的面说。”奥列格说。

“不行，我们要谈的是恋爱问题，是吗，妮诺奇卡？”她转过脸来向着女伴，带着轻快的微笑说。

奥列格和柯里亚舅舅也朝另外那个姑娘望了一望。她的大脸盘晒得很黑；肘部以下裸露着的丰腴而美丽的手臂几乎晒得漆黑；深色的头发浓密异常，一个个沉甸甸的、仿佛是青铜铸成的发卷围着她的双颊，一直垂到浑圆有力的肩头。在她的宽脸上，在那饱满的嘴唇、柔软的下巴和非常普通的鼻子的柔和的线条里，有着非常单纯、朴实的表情，但是她眉毛上面隆起的地方、两道剑眉和褐色大眼睛里的正直而勇敢的目光，同时又显露出有力、挑战、热情和想象力丰富的表情。

奥列格的目光不由自主地停留在这个姑娘身上，在以后的谈话中他一直感觉到她的存在，使他开始口吃起来。

等柯里亚舅舅的脚步声在院子里去远了，蓝眼睛的姑娘就把脸凑近奥列格，说道：

“我是安德烈叔叔派来的……”

“您的胆子可真不小……您对付哨兵的办法真妙啊！”奥列格沉吟了一会，笑着说。

“不要紧，奴才喜欢挨揍！……”她笑起来。

“那么您是谁啊？”

“刘勃卡。”穿着色彩鲜艳、香气袭人的绝纱连衣裙的姑娘说。

第二十六章

早在去年秋天，就选拔出一批男女共青团员归游击队司令部在敌后调遣，刘波芙·谢夫卓娃就是其中的一个。

她快要念完军医医士训练班，已经准备上前线了，但是却把她调到也设在伏罗希洛夫格勒的无线电报务员训练班。

按照游击队司令部的指示，她把这事瞒过了亲人和同学，她告诉大家，并且写信回家，说她继续在军医医士训练班学习。她的生活现在笼罩着神秘的气氛，这情况正合刘勃卡的心意。她是“女演员刘勃卡，像狐狸般狡猾”，她一向都在演戏。

当她还是一个很小的小女孩的时候，她是医生。她这个白白胖胖、蓝眼睛、小脸蛋上有两个小酒窝的小女孩，把所有的玩具都扔到窗外，单提着一只装着绷带、纱布、消毒棉花的红十字提包到处走来走去。她要给自己的父母，给所有认识的大人和孩子，给所有的狗和猫都绑上绷带。

一个比她大的男孩赤着脚从栅栏上跳下来，被碎酒瓶的玻璃扎破了脚底板。那男孩是远处人家的，刘勃卡不认识他，家里没有大人可以帮助他，可是六岁的刘勃卡却给他洗了脚，擦上碘酒，包扎起来。那男孩叫谢辽查①，姓列瓦肖夫。但是他对刘勃卡并不感兴趣，也不表示感谢。从此他就不再在她们家的院子里出现，因为他一般是瞧不起女孩子的。

她上学以后，学习起来很容易领会，很快活，好像她不是真的在上学，而是在扮演女学生。这时她已经不愿意做医生、教员或是工程师了，她要做家庭主妇，她在家无论干什么，——擦地板或是包汤团，——似乎总比妈妈做得巧，做得更带劲。但是，她也希望做恰巴耶夫②，正是要做恰巴耶夫，而不愿意做女机枪手安卡③，因为她也瞧不起女孩子。她用烧焦的木塞给自己画上恰巴耶夫式的口髭，跟男孩子打架，非打赢不肯罢休。等她稍微长大一些，她又爱上了舞蹈：俄罗斯的和外国的交际舞，还有乌克兰的和高加索的民间舞蹈。而且她还发现她有一副好嗓子，所以现在已经很清楚，她将要做一个演员。她开始在各个俱乐部和公园的露天下表演；战争爆发之后，她就特别乐意为军人表演。但是她完全不是个演员，她只是在扮演演员，她简直不知道自己干哪一行最相宜。她心里仿佛老有什么五光十色的东西在幻变、在闪耀、在歌唱，有时又突然像火焰般的猛烈燃烧。有一股活力不让她安宁；对荣誉的渴望和要自我牺牲的强烈的力量苦恼着她。她那股不顾一切的勇气和稚气的、淘气的、强烈的幸福之感，不断号召她前进和提高，使她永远向往新的东西，永远有所追求。现在她梦想在前线建立功勋：她希望做一个飞行员，最起码也得做一个军医医士，——但是结果，她却要在敌后做一个无线电报务员兼侦察员，当然，这是她求之不得的事。

非常滑稽而又奇怪的是：在克拉斯诺顿的共青团员里面，派来和她一同进无线电报务员训练班的偏偏就是她小时候给包扎过而当时非常瞧不起她的那个谢辽查·列瓦肖夫。现在她可有机会向他报复了，因为他马上就爱上了她，而她呢，当然不爱他，尽管他的嘴巴和耳朵都生得很好看，而且一般说来是一个能干的小伙子。他根本不会向女性献殷勤。他只会扛着宽阔的肩膀一声不响地坐在她面前，带着温顺的表情望着她，她却可以随意取笑他、折磨他。

①谢辽查是谢尔格的小名。

②③ 恰巴耶夫（1887—1919），苏联国内战争英雄。根据他的经历，苏联作家富曼诺夫（1891—1926）写成小说《恰巴耶夫》。安卡是这部小说中的人物。

她在训练班学习期间，学员中常常有人不再来上课。大家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提前毕业了，被派到德国人的后方去了。

这是一个闷热的五月的夜晚；浴着月光的市立公园似乎闷热得无精打采，槐树开着花，花香醉人。刘勃卡一向喜欢周围总有一大群人，她老要拖着谢尔格去看电影或是逛列宁大街。可是他说：

“你看，这儿多么美。你还嫌不好吗？”在林荫道的朦胧之中，他的眼睛带着神秘的力量闪烁着。

他们在公园里兜了一圈又一圈，刘勃卡非常讨厌谢尔格的沉默寡言，讨厌他没有照她的意思去做。

可是这时候忽然有一群男女青年嘻嘻哈哈地闯进市立公园。其中有一个是训练班里的伏罗希洛夫格勒人鲍尔卡·杜宾斯基。他对刘勃卡也不无好感，总是用他那一套“从电车运行的观点来看”的废话来逗她发笑。

她叫道：

“鲍尔卡！”

他一下子听出是她的声音，就跑到她和谢尔格跟前，马上滔滔不断地讲起来，使人无法叫他住嘴。

“跟你一块的是些什么人？”刘勃卡问。

“是我们印刷所里的。要不要介绍一下？”

“当然！”刘勃卡说。

他们立刻就认识了，刘勃卡要把大伙都拖去逛列宁大街。可是谢尔格说他不能去。刘勃卡以为他生气了，为了煞煞他的骄气，她故意挽住鲍尔卡·杜宾斯基的胳臂，四条腿歪歪斜斜地一同跑出公园，只见她的衣服在树丛里一闪而过。

第二天早上吃早饭的时候，她在宿舍里没有看到谢尔格。上课、午餐、晚餐的时候他都没有来。要打听他到哪里去了一定也是白搭。

当然，她完全没有想到昨天在市立公园里的一幕——“想它干什么！”但是到晚上她突然想起家来，想起了父母，她觉得她永远看不到他们了。她静静地躺在宿舍里的床上，和她同屋的还有五个女同学。她们都睡了。灯火管制用的黑窗幔已经拉开，月光如水，汹涌澎湃地闯进最近的开着的窗户，刘勃卡感到无限忧伤。

可是第二天，谢尔格就永远从她的记忆中消失了，仿佛压根没有过他这个人似的。

七月六日，训练班主任把刘勃卡唤去，告诉她前线战事不利，训练班要撤退，刘勃卡要留下由州游击队司令部指挥；让她先回到克拉斯诺顿家里去待命。如果德国人来了，她的行动应该不要引起怀疑。另外还给了她一个在石滩城的地址，她在离开之前应该到那边去认识一下女主人。

刘勃卡到石滩城去了一次，认识了女主人。然后她理好自己的手提箱，到最近的十字路口去“表决”①，第一辆要路过克拉斯诺顿的卡车就载走了这个大胆的、浅色头发的姑娘。

①表决时要举手，这里指举手招呼汽车停车，以便搭车。

瓦尔柯和旅伴们分手后，在草原上躺了一整天，等到天黑才穿过峡谷走到“上海”的边上，再顺着弯弯曲曲的小道和偏僻的小巷偷偷走到新一号井区。他非常熟悉他在里面长大的这个城市。

他怕谢夫卓夫家住着德国人，因此从后面偷偷地翻过栅栏，钻进院子，躲在边屋旁边，希望会有人到院子里来。他这样站了很久，已经等得焦急起来。最后，通外面的门砰的一响，一个妇人提着水桶悄悄地走过瓦尔柯身旁。他认出是谢夫卓夫的妻子叶芙洛西妮亚·米龙诺芙娜，就迎上前去。

“我的老天，这是谁啊！”她悄声说。

瓦尔柯把他的已经长满胡茬的黧黑的脸凑到她面前，她才认出了他。

“是您吗？……那么他在……”她开始说。要不是夜色昏暗，朦胧的月光难以透过满天灰色的薄雾，瓦尔柯就可以看出，她的脸色已经发白了。

“等一下。你要把我的姓忘掉，叫我安德烈叔叔。你家有德国人吗？没有？……那我们进屋去吧。”瓦尔柯沙声说，他想到要告诉她的消息而感到难受。

刘勃卡正坐在床上做针线活，看见他进来，就迎着他站起来。这不是瓦尔柯在俱乐部舞台上看惯的那个艳装盛服、穿高跟鞋的刘勃卡，而是简单朴素、家常打扮、穿着廉价的衬衫和短裙、赤着脚的刘勃卡。她的金发随便地垂到颈上和肩上。她眯缝着那双在悬在桌子上空的矿灯照耀下显得是深色的眼睛盯住瓦尔柯，并不感到惊奇。

瓦尔柯受不住她的目光，茫然打量了一下这个房间，这里还保留着主人的富裕生活的痕迹。他的目光停留在床头上挂的一张明信片上。这是一张

印着希特勒像的明信片。

“别把我们往坏里想，瓦尔柯同志。”刘勃卡的母亲说。

“安德烈叔叔。”瓦尔柯纠正她。

“哦——安德烈叔叔。”她并不带笑地改正过来。

刘勃卡神色自若地回过头去看看印着希特勒像的明信片，轻蔑地耸耸肩。

“那是德国军官挂的，”叶芙洛西妮亚·米龙诺芙娜解释道，“一直有两个德国军官住在我们这里，昨天他们才到新切尔卡斯克去了。他们一进来，就对她说：‘俄国姑娘，美丽，美丽，金发女郎。’他们嘻嘻哈哈，老是把巧克力啦、饼干啦送给她。我一看，这鬼丫头收是收下了，可是却拿起架子来，顶撞他们，一会儿笑，一会儿又侮辱他们，——你瞧，她居然有这一手！”母亲说，她对女儿的态度是含有慈爱的责备，对瓦尔柯是抱着完全的信任，相信他一切都会了解。“我对她说：‘别玩火啊。’可是她对我说：‘需要这样做。’她还来个需要这样做——她居然有这一手！”叶芙洛西妮亚·米龙诺芙娜又说了一遍。“所以您可以想象，瓦尔柯同志……”

“安德烈叔叔。”瓦尔柯又纠正她。

“安德烈叔叔……她不让我对他们说我是她母亲，叫我装做她的女管家，她说她自己是个演员。她说：‘我的父母是企业家，拥有过矿山，苏维埃政权把他们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了。’

你看，她居然想出这样的点子！”

“是的，亏她想得出。”瓦尔柯冷静地说，一面注视着刘勃卡，她站在他对面，手里拿着针线活，似笑非笑地望着安德烈叔叔。

“睡在这张床上的军官，——这是她的床，不过那时候我跟她睡在那个房间里，——忽然去翻自己的箱子，我以为他大概是要拿衬衣，”叶芙洛西妮亚·米龙诺芙娜接下去说，“哪知道他拿出了这张画像，就钉在墙上。她呢，——您简直不能想象，瓦尔柯同志，——一直走到画像跟前，上去一把就把画像扯下来！她说：‘这是我的床，不是你的，我不要希特勒挂在我床头上。’我想这一来他可要把她打死了，可是他却抓住她的手把它扭过来，夺过画像，又去钉在墙上。另外一个军官也在这里。他们哈哈大笑，笑得玻璃都震得直响，他们说：‘哎哟哟，俄国姑娘真厉害！……’我一看，她气得满脸通红，捏紧拳头，——我差点被她吓死了。是的，要不就是他们实在喜欢她，要不他们就是最笨的大笨蛋，他们只是站着，哈哈大笑着。可是她却跺着脚嚷着：‘你们的希特勒是混蛋、吸血鬼，他只配被扔到毛坑里淹死！’她还说了些这一类的话，说实在的，我以为他一定就要拔出手枪来给她一枪……可是等他们走后，希特勒的像她却不让我取下来，她说：

‘让它挂着吧，需要这样……’”

刘勃卡的母亲年纪还不太大，但是像许多年轻时难产过的普通妇女，上了年纪后往往如此，她的腰和臀部都胖得不像样，脚脖子也是肿的。她小声把这个故事源源本本地告诉了瓦尔柯，同时老是用询问的、胆怯的、甚至是恳求的目光望着他，而他总是避免同她的目光相遇。她不住地说着，仿佛在拖延时间，让他晚些对她说出她怕听的话。但是现在她把话讲完了，她激动而又害怕地怀着期待望了望瓦尔柯。

“也许，叶芙洛西妮亚·米龙诺芙娜，您还有您丈夫的衣服吧，要普通一点的，”瓦尔柯沙声说，“我穿着这样的上装和马裤，再穿着便鞋，不太合

适——一眼就看得出是个负责的人。”他苦笑了一声，说。

他的声调使叶芙洛西妮亚·米龙诺芙娜听了脸色又苍白起来，刘勃卡拿着针线活的手也垂下了。

“他怎么样了？”母亲问道，她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出。

“叶芙洛西妮亚·术龙诺芙娜，还有你，刘巴，”瓦尔柯说的声音很轻，但是很坚定。

“我没有料到，命中注定会让我带着不幸的消息来见你们，但是我不愿意欺骗你们，我又没有话可以安慰你们。您的丈夫和你刘巴的父亲，我最要好的好朋友，葛利高利·伊里奇死了，被这些该死的刽子手向和平居民投下的炸弹炸死了……我们的人会永远怀念他的！……”

母亲并没有惊呼，她把裹在头上的头巾的一角按住眼睛，轻声啜泣起来。刘勃卡的脸却变得像白纸一般，仿佛愣住了。她呆呆地站了一会，突然，她的身子好像折断了似的，人一下昏倒在地上。

瓦尔柯把她抱起来，放在床上。

照刘勃卡的性格，他等待着她的悲痛的发泄，以为她会痛哭流涕，免得憋在心里。但是刘勃卡却僵卧在床上，一声不吭，脸色惨白、死板，在她的大嘴的下垂的嘴角上露出了跟母亲一样的痛苦的皱纹。

母亲像普通的俄罗斯妇女那样，她的哀痛表现得自然、平静、朴实、真诚。眼泪不由自主地涌出来，她用头巾的角擦眼泪，或是用手擦掉它，如果泪水流到她的嘴唇上和下巴上，她就用手掌去擦。正因为她的哀痛是非常自然的，所以她还是像平时一样尽着女主人待客的本分。她倒水给瓦尔柯洗脸，为他点了一盏油灯，从箱子里取出丈夫平时在家穿的一件旧衬衫、一件上装和一条裤子。

瓦尔柯拿了油灯，到另一个房间里去换衣服。这些衣服他穿着都略嫌瘦小，但是他穿上这套衣服觉得比较自在：现在他的样子已经像个工匠了。

他开始对她们详细讲述葛利高利·伊里奇·谢夫卓夫遇难的经过。因为他知道，不管这些详情是多么令人悲痛，但是现在只有它们才能使亲人在痛苦中得到几分残酷而又难受的安慰。他自己虽然十分激动和担忧，他还是吃了很久，吃得很多，还喝了一瓶酒。他已经有一整天没有吃东西，非常疲倦，但他还是把刘勃卡从床上扶起来，跟她谈正经事。

他们走到隔壁房间里。

“我一眼就看得出，是我们的人叫你留在这里做工作的，”他说。刘勃卡听了把身子一缩，脸上也变了色，但他假装没有察觉这些。“别忙，”他看她试图反驳他，就举起一只大手说，“是谁叫你留下来，要你做什么工作，这些我都不问你，你也不必向我承认或是否认。我只请你帮我的忙……我对你也有用。”

他请她把他藏在什么地方过一昼夜，然后给他跟康德拉多维奇，就是跟他们一起炸毁新一号井的那个人，取得联系。

刘勃卡惊奇地望着瓦尔柯黧黑的脸。她一向知道，这是个聪明杰出的人物。虽然他以平等的态度和她父亲做朋友，可是她总觉得，这个人是高高在上的，而她刘勃卡却是渺小的。

现在，她被他的洞察力吓住了。

她把瓦尔柯安顿在邻家柴房阁楼上的干草堆里。邻人在柴房里养过羊，但是他们疏散了，羊也被德国人吃了。瓦尔柯就在那里熟睡了。

剩下了母女二人，她们在母亲的床上差不多哭到天亮。

母亲哭的是，她的一生，一个女人的一生，从年轻时就跟葛利高利·伊里奇结合在一起的一生，已经完了。现在她回顾着她的这一生，起初她在察里津①做女仆，谢夫卓夫是伏尔加河轮船上的年轻水手。他们总是利用轮船装货的时间在浴着阳光的码头上或是在市立公园里见面。他们婚后的初期，生活非常艰苦，谢夫卓夫还没有找到职业。后来他们搬到顿巴斯这里来，起初生活也不容易，但是后来葛利高利·伊里奇步步上升，报上开始登载他的事迹。他们分到了这套三居室的住宅，家里也富裕起来了，他们很高兴他们的刘勃卡能像公主那样长大起来。

①察里津是斯大林格勒的旧称，一九六一年改称伏尔加格勒。

现在这一切都完了。谢夫卓夫已经不在人世，而她们这两个孤苦无靠的女人，一老一少，却留在德国人手里。于是眼泪便自然而然地从叶芙洛西妮亚·米龙诺芙娜的眼中流出来。

这时候，刘勃卡却老是神秘地、亲热地低声安慰她：

“别哭，妈妈，亲爱的，现在我已经有了技术。等我们赶走了德国人，战争结束之后，我就到无线电台去工作，我要成为一个出名的无线电报务员，他们会派我做台长。我知道你怕吵，你就跟我住在电台的宿舍里。那边总是非常安静，四周都有隔音装置，一点儿声音都透不进来，人也不多。我们的小家庭可以弄得干干净净，舒舒服服，就是我们俩住在一块。

在电台旁边的小院子里，我要铺上草皮，等我们攒一点钱，我就搭个鸡栏养小鸡，你可以养莱亨鸡和越南南部的大肥鸡。”她眯着眼睛，搂住母亲的脖子悄悄地低语着，她的指甲纤细的白嫩的小手在黑暗中看不见地做着手势。

这时外面有人轻轻地用手指敲窗。母女二人同时听到这声音，她们松了手，停止哭泣，凝神倾听了一下。

“会不会是德国人？”母亲温顺地低声问。

但是刘勃卡知道德国人不会这样敲。她光着脚跑到窗前，微微掀起用来遮窗的被子的一角。月亮已经下去了，但她从黑屋子里能够辨别出庭园里有三个人影：靠窗口是一个男的，稍远一些是两个女的。

“你们要什么？”她隔着窗高声问道。

那个男的把脸贴近玻璃。刘勃卡认出了这张脸。仿佛有一股热浪涌到她的喉头。现在，在这样的时候，在生活最艰苦的时刻，他来得是多么及时啊！……

她不记得她是怎么从房间里跑出去的，好像有一阵风把她刮下了台阶：她怀着满腔的感激和悲戚，用她的灵活有力的胳臂一把搂住青年的脖子，把她的泪痕纵横的脸和在母亲的搂抱中变得热烘烘的整个半裸的身体紧贴着他。

“快……快……”刘勃卡说，她挣脱出他的拥抱，拉着他的手走上台阶。接着她想起了他的旅伴。“跟你一起来的是谁？”她问，一面仔细瞧着两个姑娘。“奥丽雅①！妮娜！……我亲爱的！……”她用有力的胳膊把她们俩一齐搂住，使她们的头靠近自己的头，热情地轮流吻她们的脸。“这里来，这里来……快……”刘勃卡狂热地低声说。

①奥丽雅是奥尔迦的小名。

第二十七章

他们站在门口，不敢进去，因为他们满身尘土，实在太脏。谢尔格·列瓦肖夫好久没有刮过脸，穿着又像司机、又像装配工人的衣服；奥丽雅和妮娜两个姑娘的体格都很结实，只是妮娜略微胖些，两人的脸都是古铜色的，深色的头发上仿佛敷着一层尘土，两人都穿着同样的深色衣服，肩后背着背包。

这是伊凡卓娃家堂姊妹，因为她们的姓同五一村的伊凡尼兴娜两姊妹——李丽亚和东妮亚——相象，所以常被弄错，甚至有过这样的说法："如果你看到伊凡卓娃家两姊妹里有一个是白白的，那么这两姊妹就是伊凡尼兴娜家的。"（因为李丽亚·伊凡尼兴娜的皮肤是白白的。战争一开始她就到前线去做军医医士，后来渺无音讯。）

奥丽雅和妮娜·伊凡卓娃的家住在离谢夫卓夫家不远的一所标准式房屋里，她们的父亲们和谢夫卓夫在同一个矿井里工作。

"我亲爱的！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刘勃卡拍着她的雪白的手问；她推测伊凡卓娃姊妹是从新切尔卡斯克回来的，因为姐姐奥丽雅在那边的工业大学念书。但奇怪的是，谢尔格怎么会跑到新切尔卡斯克的呢。

"我们已经不在原来的地方了，"奥丽雅谨慎地说，她微微撇了撇干裂的嘴唇笑了一笑，她整个的脸以及满是尘土的眉毛和睫毛似乎都皱成一团。"你知不知道，我们家有没有德国人？"她问的时候，眼睛迅速地打量着房间。这是她在流浪时期养成的习惯。

"住过，像我们这里一样。今天早上走了。"刘勃卡说。

奥丽雅看到墙上的印着希特勒肖像的明信片，她的鼻子和眼睛歪扭得更厉害，做出一副又像嘲笑、又像蔑视的怪相。

"为了保险吗？"

"让它挂着吧。"刘勃卡说，"你们大概要吃点东西吧？"

"不，如果家里没有德国人，我们就回家去。"

"就是有德国人，你们又怕什么？有许多被德国人赶到顿河或者顿涅茨河的人，现在都在陆续回家……要不你们就直说——到新切尔卡斯克走亲戚去了，现在才回家。"刘勃卡很快地说。

"我们并不怕。我们会这么说的。"奥丽雅谨慎地回答着。

她们谈话的时候，妹妹妮娜不作一声，她的大眼睛带着挑战的神情一会儿移到刘勃卡身上，一会儿移到奥丽雅身上。谢尔格把晒得发白的背包扔在地上，把手背在背后，倚着炉子站着，眼睛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观察着刘勃卡。

"不，他们不是在新切尔卡斯克。"刘勃卡暗忖。

伊凡卓娃姊妹走了。刘勃卡取下遮在窗上的被子，吹熄吊在桌上的矿灯。房间里的一切——窗子、家具、人脸——

都成了灰色的。

"你要洗脸吗？"

"你知不知道，我们家有没有德国人？"谢尔格问，这时她很快地到门

道里去了一趟又跑了回来，拿来了一桶水、一个脸盆、一个漱口杯和一块肥皂。

“我不知道。这一批走了，那一批又来了。你把你的制服脱了吧，别不好意思！”

他脏得要命，水从他的胳臂上和脸上流到盆里，已经完全成了黑的。但是看到他的粗大有力的手，看到他用有力的、男性的动作在手上擦肥皂，又用手捧着水冲洗，刘勃卡感到很愉快。他的脖子晒得黧黑，耳朵大而好看，嘴的轮廓既漂亮又带有英勇的气概。两道眉毛并没连在一块，它们在靠鼻梁的地方生得比较密，连鼻梁上也长着毛，但是眉梢却比较细而稀，微微弓起，额头有几道深深的皱纹。看他用这双大手洗着脸，偶然向她投来一瞥，对她微笑，她也感到很愉快。

“你是在哪儿碰上伊凡卓娃姊妹的？”她问。

他把水撩在脸上，鼻子呼哧呼哧地响着，一句话也不说。

“你既然来找我，就表示你是信得过我。你现在又犹豫些什么？我们就像是一棵树上的两片叶子。”她温柔地小声说。

“给我一块手巾，谢谢你。”他说。

刘勃卡沉默起来，不再问他别的。她的蓝眼睛里露出了冷冷的表情。但是她照旧招呼谢尔格，她点起煤油炉，放上水壶，给客人端来吃的东西，倒了一小杯伏特加。

“这我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尝过了。”他对她微笑着说。

他喝干了酒，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天已经蒙蒙亮。透过灰色的薄雾，东方的玫瑰色愈来愈鲜明，而且已经有些泛出金光。

“没想到会在这里碰见你。我是来瞎碰的，哪知道居然碰上了……”他慢吞吞地自言自语说。

他的话里似乎含有疑问：跟他一同在无线电报务员训练班学习的刘勃卡，怎么会待在家里。但是刘勃卡并不打破这个闷葫芦。她感到生气的是，谢尔格过去知道她的脾气，一定以为她这个喜怒无常的小姑娘是在使性子，其实她很痛苦，非常伤心。

“你总不是一个人在这里吧？你的爸爸、妈妈在什么地方？”他问道。

“你管他们在什么地方呢！”她冷冷地回答。

“出什么事了吗？”

“吃吧，吃吧。”她说。

他对她望了一会，然后又斟了一小杯酒，喝了之后，又继续吃，但是已经不开口了。

“谢谢你。”他吃完了，用袖子擦擦嘴，说道。她发觉，他在流浪期间变得粗野了，但是使她感到伤心的并不是这种粗野，而是他对她的不信任。

“你们这里大概没有烟吧？”他问。

“有……”她走到厨房里，给他拿来家里种的烟叶。她父亲每年种几畦烟叶，一年收几次，晒干后，要抽的时候就用剃刀把它切碎，装上一烟斗。

他们俩，浑身被烟笼罩着的谢尔格和刘勃卡，默默坐在桌旁。刘勃卡出来之后母亲单独待着的那个房间里，仍然是静悄悄的。但是刘勃卡知道母亲没有睡着，她还在哭。

“我看得出，你们家有伤心的事。我从你脸上看得出来。你从来不是这

样的。”谢尔格慢腾腾地说。他的目光里充满亲切、温柔的表情，这在他那有些粗犷的漂亮的脸上是出人意外的。

“现在大家都有伤心的事。”刘勃卡说。

“要是你知道，在这一段时间里我看见了多少血啊！”谢尔格非常沉痛地说，他全身都被一团团的烟雾笼罩着。“用降落伞把我们空投到斯大林诺州……那时候有那么多的人被捕，所以我们甚至奇怪，我们的接头地点怎么居然会没有出事。人们被捕倒并不是因为有人出卖，而是因为德国人撒下了那样的密网，不管你有罪没罪一抓就是几千，显然，谁要是有一丝儿嫌疑，就会落到那个网里去……矿井的井筒里都塞满了尸体！”谢尔格激动地说。

“我们是单独工作，但是保持着联系，可是到后来连一点线索都找不到了。我的搭档被打断胳臂，割掉舌头，要不是我在斯大林诺的街上偶然碰到妮娜，接到撤退的命令，说不定我也完蛋了。斯大林诺州委会还设在我们克拉斯诺顿的时候，她和奥丽迦就做联络员，——她们这已经是第二次到斯大林诺了。正巧这时候知道德国人已经到了顿河的消息。她们明白，派她们前来的那些人已经不在克拉斯诺顿了……我按照命令把发报机交给了地下州委的无线电报务员，我们就决定一同回家，所以我们就回来了……我真替你担心死了！”突然从他的心坎里涌出了这句话。“要是你也像我们一样被空投到敌后，而且又剩下你一个人，那可怎么办呢？要不就是出事被捕，德国人在什么地方的刑讯室里折磨着你的肉体和灵魂，”他克制着自己，轻声地说，他的目光已经不是带着亲切、温柔的神情，而是无比热情地透入她的心灵了。

“谢辽查！”她说，“谢辽查！”说着就把覆着金发的头伏在手上。

他用他的血管膨胀的大手小心地摸了摸她的头和胳臂。

“他们让我留在这里，——你自己懂得是为了什么……吩咐我等候命令，可是眼看就要一个月了，人也不来，消息也没有。”刘勃卡没有抬起头来，轻轻地说。“德国军官好像苍蝇见了蜜那样纠缠不休。我有生以来是第一次假装成不是我原来的样子，天晓得我在搞些什么鬼名堂，一直要东躲西闪，真别扭，自己为自己伤心。昨天有人疏散不成回来，说我父亲在德国人空袭顿涅茨河的时候被炸死了。”刘勃卡咬着自己的鲜红的嘴唇说。

太阳升到草原上空，耀眼的阳光照在覆着露珠的耐火瓦屋顶上又反射过来。刘勃卡猛地抬起头来，抖了抖发卷。

“你该走了。你打算怎样生活？”

“跟你一样。你自己刚说过：我们是一棵树上的两片叶子。”谢尔格带着笑说。

刘勃卡送谢尔格穿过院子从后门出去。她很快把自己收拾一下，不过尽量穿着得朴素些：她要到“鸽房”去找康德拉多维奇老头。

她出去得正是时候。有人拚命敲她们家的门。她们的房子靠近伏罗希洛夫格勒公路，这是德国人敲门借宿。

瓦尔柯在干草棚里挨了一整天的饿，因为不能进去看他。到夜里，刘勃卡才从母亲房里爬窗出来，把安德烈叔叔带到“干草场”，康德拉多维奇约他到那边一个熟识的、为人可靠的寡妇家里会面。

在这里，瓦尔柯才得知康德拉多维奇跟舒尔迦见面的全部经过。瓦尔柯跟舒尔迦是同乡，都是克拉斯诺顿人。他在年轻时代就认识舒尔迦，近年来因为州里的工作对他也了解。

所以现在瓦尔柯毫不怀疑，舒尔迦就是留在克拉斯诺顿做地下工作的

人员之一。问题是怎么去找他呢？

“那就是说，他不信任你吗？”瓦尔柯带着有些粗鲁的冷笑向康德拉多维奇问道。“真笨！”他不明白舒尔迦为什么要这样做。“别的做地下工作的你不知道吗？”

“不知道……”

“你的儿子怎么样啦？”瓦尔柯阴郁地霎了霎眼。

“谁知道他，”康德拉多维奇垂下眼皮。“我开门见山地问过他：‘你要去给德国人做事吗？你老老实实对你老子说，好让我知道你会干出什么事来。’可是他说：‘我又不是个傻瓜，会去给他们做事！就这样我也可以混下去！……’”

“一听就知道，他是个机灵人，不像父亲，”瓦尔柯冷笑了一声。“可是你得利用这一点。你应该到处去大事宣传，说他在苏维埃政权下曾受过审讯。这样对他既有利，你借此也可以落个清静，省得德国人来找麻烦。”

“唉，安德烈叔叔，我想不到你会拿这样的笑话来教导我！”康德拉多维奇的低沉的声音里含着愠意说。

“唉，老兄，亏你还是个上年纪的人，你想保持着清白的名声去战胜德国人吗！……你有没有去上工？”

“还有什么工作？矿井都炸掉了！”

“唔，那你没有到工作的地方去报到？”

“我有些不明白你的意思，井长同志……”康德拉多维奇甚至惶惑起来，因为瓦尔柯所说的，跟他康德拉多维奇打算在德国人统治下生活的计划是背道而驰的。

“那就是说，你没有去。可是你得去，”瓦尔柯镇静地说。

“工作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方式。对我们重要的是保存自己人。”

瓦尔柯这一夜就留在这个寡妇家里，但是第二夜他又换了住处。他的新住处只有瓦尔柯无限信任的康德拉多维奇一个人知道。

瓦尔柯靠着康德拉多维奇和刘勃卡，还有刘勃卡推荐给他的谢尔格和伊凡卓娃姊妹的帮助，花了几天的工夫探听出德国人在城里着手进行的工作，还跟留在城里的某几个党员以及他熟悉的非党人士建立起联系。但是他仍然不能发现舒尔迦或者别的留下来做地下工作的人。他觉得，能使他和州里的地下组织建立联系的唯一线索是刘勃卡。但是根据刘勃卡的性格和她的举动看来，瓦尔柯猜测她大概是个侦察员。时机不成熟，她决不会向他露出一点口风。他决定单独行动，希望所有通往一个终点的道路迟早能够汇合起来。于是他派刘勃卡去找奥列格，现在奥列格对他能有用处了。

“我可—可以亲自去见见安德烈叔叔吗？”奥列格问，竭力不露出他的激动。

“不，亲自去看他不行。”刘勃卡带着神秘的微笑说，“说实在的，我们的问题是恋爱问题啊……妮诺奇卡，过来，认识一下这个年轻人！”

奥列格和妮娜尴尬地互相握了手，两人都有些窘。

“不要紧，你们彼此很快就会搞熟。”刘勃卡说，“我现在就要离开你们，你们挽着手到什么地方去溜达溜达，开诚布公地谈一谈，你们打算怎样生活……希望你们玩得快活！”她说完之后，把充满狡猾神情的眼睛闪了一闪，鲜艳的连衣裙一飘，就轻盈地走出了柴房。

他们面对面站着：奥列格是慌张而窘迫，妮娜的脸上带着挑战的神气。

“我们不能待在这里，”她有点勉强地、但是平静地说，“我们还是出去走走吧，你最好挽住我的胳臂……”

在院子里踱来踱去的柯里亚舅舅，看见外甥挽着这个陌生姑娘从院子里走出去，他的一向沉着的脸上不禁露出极度的惊讶。

奥列格和妮娜都还非常年轻和缺乏经验，他们久久都无法摆脱忸怩不安的感觉。他们每次互相触碰一下就会窘得说不出话来。他们觉得，相互挽着的胳臂就像是一块烧红的铁。

根据昨天大伙谈妥的计划，奥列格应当去侦察公园通公园街的那一面，所以他带妮娜顺着这条路线走。公园街上和公园附近的每一幢房子里几乎都住着德国人。但是他们一出门，妮娜马上就谈起正经事来。她说话的声音是轻轻的，仿佛是在说什么知心话：

“你不能去见安德烈叔叔，你可以跟我保持联系……你别因为这个生气，我也从来没有见过他……安德烈叔叔希望知道，你们里面有没有这样的青年，他能探听出我们的人有哪些被关在德国人的监狱里……”

“有一个青年，非常机灵大胆，他已经着手干了。”奥列格赶紧说。

“安德烈叔叔要你把你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不管是关于自己人的还是关于德国人的。”

奥列格把谢辽萨告诉他的关于被福明出卖给德国人的那个地下工作者的话、沃洛佳夜里通知他的事、以及万尼亚说的地下工作者正在寻找瓦尔柯等等的话，都告诉了她。他还立刻把若拉的地址给了妮娜。

“安德烈叔叔可以放心大胆地把自己的住处告诉他。而且他也认识若拉！这样，若拉就可以通过沃洛佳把一切传达给有关方面……在—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奥列格带着笑说，“我已经数到三尊高射炮，在学校的右边，靠里面；旁边是一个掩蔽部，可是看不见卡车……”

“还有学校屋顶上的一架四挺合组的机枪和两个德国人呢？”她突然问道。

“这我倒没有发现。”奥列格惊奇地说。

“从屋顶上往下看，整个公园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她甚至带着一点责备的口吻说。

“那么，你把一切也仔细观察了？难道你也是受人委托的吗？”奥列格目光炯炯地追问说。

“不，我是看着玩的。这是我的习惯。”她说了又醒悟过来，带着挑战的神气从两道有力的弯弯的眉毛下面迅速地瞟了奥列格一眼——她自己是不是暴露得太多了。

但是他还相当天真，对她并没有怀疑。

“啊哈……卡车原来在那边——整整一排！把鼻子埋在地里，只有车身的边露在外面，那边还有一个行军灶在冒烟呢！

看见吗？只是你不要朝那边看。”奥列格津津有味地说。

“而且也没有必要去看：他们不撤掉学校屋顶的那个瞭望哨，铅字反正是没法挖出来。”她平静地说。

“对—对……”他高兴地望望她，笑了。

他们彼此已经习惯，不慌不忙地走着，妮娜的丰满柔软的大手信任地一动不动地放在奥列格的手上。他们已经走过了公园。在他们右面的标准式房屋旁边，沿街停放着德国人的车辆，有卡车，有各种牌子的小汽车，有流

动电台，有救护车，到处都是德国兵。左面是一片空地，在空地尽里边一所兵营式的砖砌建筑物旁边，有一个佩着淡蓝底白边肩章的德国中士在教一小队穿便衣的俄罗斯人操练。他们持着德国枪，时而列队，时而散开，匍匐前进，进行徒手肉搏。他们都上了年纪，袖子上套着 A 字臂章。

“弗里茨的宪兵……在训练‘警察’逮捕我们的弟兄。”妮娜说，她的眼睛闪动了一下。

“你怎么知道的？”他想起谢辽萨告诉他的话，问道。

“我已经看见过他们。”

“简直是败类！”奥列格怀着厌恶的感情憎恨地说，“这批家伙就该千刀万剐……”

“的确应该。”妮娜说。

“你想做游击队员吗？”他忽然问。

“想啊。”

“可是，你能想象得出，什么是游击队员吗？游击队员的工作完全不是装装样子的，这是多么崇高的工作啊！他打死一个法西斯，打死两个，打死一百个，可是第一百零一个却可能打死他。他完成一个任务、第二个任务、第十个任务，可是在执行第十一个任务的时候却可能失事。你知道，这种工作需要多大的自我牺牲精神啊！……游击队员从不吝惜个人的生命。他从不把自己的生命放在祖国的幸福之上。需要履行对祖国职责的时候，他决不会吝惜自己的生命。他决不出卖同志和暴露同志。我真想做个游击队员！”奥列格说的时候怀着那样深切、真挚、天真的热情，使妮娜不禁抬起眼来看他，她的眼睛里也露出一种非常天真的和无限信任的神气。

“你听我说，难道我们一定要有事才能见面吗？”奥列格忽然说。

“不，那为什么？我们可以见面……在有空的时候。”妮娜说的时候有些忸怩。

“你家住在什么地方？”

“你现在没有事吧？……你要不要就送我回家？我想把你介绍给我姐姐奥丽雅。”她说，其实她自己也不完全相信她正是想要这样做。

奥丽雅和妮娜两姊妹住在俗称“八家宅”的那一区。妮娜的父母占了半幢标准式房屋，奥丽雅的父母住了另外半幢。

妮娜把奥列格带到家里，就让妈妈去招待他。

奥列格本来早熟，在自己的乌克兰家庭里又养成尊敬长辈的习惯，他跟本来就很健谈的、显得年轻的瓦尔瓦拉·德米特利耶芙娜毫无拘束地交谈起来。而且他很想博得妮娜的母亲的好感。

等妮娜回来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了伊凡卓夫两兄弟家里的一切。奥丽雅的父亲和妮娜的父亲是亲兄弟，都是矿工，现在都在前线。他们是奥廖尔州人，以前在富农家里当过长工，后来移居到顿巴斯，弟兄俩都在这里和乌克兰姑娘结了婚。奥丽雅的母亲是远处来的，是切尔尼戈夫省人，瓦尔瓦拉·德米特利耶芙娜是当地人，是顿涅茨的腊斯守普诺耶村的。瓦尔瓦拉·德米特利耶芙娜年轻时候也在矿井里干过活，这一点对她有着一定的影响。她跟普通的家庭妇女不大一样。她为人勇敢果断，善于识人。她一眼就看出这个小伙子不是平白无故来的，她用充满聪明而狡猾的神色的眼睛研究他，在奥列格不知不觉之间她已经把他研究得清清楚楚了。

不过，他们谈得很投机。妮娜回来的时候，看见他们俩并排坐在厨房

里的长凳上有说有笑。奥列格高兴地晃着腿，搓着指尖，非常有感染力地仰脸大笑，引得瓦尔瓦拉·德米特利耶芙娜不禁也跟着他一起大笑起来。妮娜瞅了他们一眼，把手一拍，也大笑起来——他们三个人都觉得非常快活、轻松，仿佛他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似的。

妮娜说，奥丽雅现在有事，但是请奥列格务必要等她。过了两小时奥丽雅才来。对奥列格来说，这两小时是在无忧无虑的闲聊中不知不觉地过去的。但实际上这却是克拉斯诺顿地下工作的全部环节最后联结起来的真正决定性的时刻。在这段时间里，奥丽雅已经到离“八家宅”很远的“小上海”去看了瓦尔柯，向他汇报了妮娜从奥列格那里打听到的一切。

奥丽雅一到，笼罩着她妹妹屋子里的快乐气氛就有些低落了。不错，就奥丽雅的性格来说，她对待奥列格的亲切的态度已经是罕有的了；明朗和蔼的微笑使她的总是显得有些冷僻的、容貌不端正而引人注目的脸活泼起来，她甚至占了妮娜的座位，挨着他坐在长凳上。但是奥丽雅很难加入他们的杂乱无章的、热烈的谈话，因为这种谈话对于任何一个局外人都是毫无意义的。刚去看过瓦尔柯的奥丽雅，内心充满了完全不同的情绪。奥丽雅比妮娜来得严肃——这并非就她感受的深度而言，而是就她能够立刻化思想感情为重大的实际行动的能力而言。此外，由于年纪比较大一点，奥丽雅从她们俩一同做斯大林诺州委联络员的时候起，对于她们所做的工作的实质就比她妹妹知道得多一些。

她在奥列格旁边坐下，取下头巾，露出挽在脑后的一个沉甸甸的深色发髻，就没有开口。尽管她极力要做出快活的样子，也露出笑容，她的眼睛仍旧是冷淡的，好像她在这里年纪最大，甚至比妮娜的母亲还大。

但是瓦尔瓦拉·德米特利耶芙娜是个机灵而敏感的人。

“我们干吗要坐在厨房里？”她说，“我们到里面去玩‘捉傻子’吧！……”

他们到了餐室里。瓦尔瓦拉·德米特利耶芙娜很快地走到旁边她跟妮娜睡觉的卧室里，拿了一副被许多人的手摸得发黑的、显得沉甸甸的纸牌回来。

“妮诺奇卡当然是跟奥列格做朋友了？”奥丽雅好像是无意地说。

“不，我跟妈妈做朋友！”妮娜的脸一红，挑战似地望了奥丽雅一眼。她心里非常想跟奥列格做朋友，但是她毕竟不能一下子就暴露自己的心事。

奥列格根本不懂得这里面有文章，他揣摩妮娜的母亲既然是个老矿工，打牌一定也是个老手，就叫起来：

“不—不，我跟妈—妈做朋友！”

由于他的口吃，他不是把这句话喊出来，而是像小牛那样低声地哞哞叫出来，这显得非常可笑，大伙都噗哧一声笑了，连奥丽雅也不例外。

“老跟小，——你们可要留点神，丫头们！”瓦尔瓦拉·德米特利耶芙娜说。

大家的情绪又高起来。

老矿工果然是一个玩“捉傻子”的能手，但是奥列格像平时玩牌一样，太沉不住气，所以他们一上来就输了。不动声色的奥丽雅暗中捉弄奥列格。瓦尔瓦拉·德米特利耶芙娜虽然输了，却不时狡猾地偷眼看他：她非常喜欢这个孩子。

最后，他们好不容易才赢了第四局。奥丽雅发了牌。奥列格朝自己手里一看，看见满手的牌都坏透了。忽然，他的眼睛里也露出了狡猾的神气，

他朝瓦尔瓦拉·德米特利耶芙娜抬起眼睛，竭力想捉住她的视线。他们的目光刚接触，他就把自己的饱满的嘴唇好像预备接吻那样一撅，但是立即又让它恢复原状。在瓦尔瓦拉·德米特利耶芙娜那双围着皱褶、但是仍然非常年轻的眼睛里，好像有火星闪烁了一下。但是她连眉毛都没有动，立刻就打出了红方块：果然不出奥列格所料，老矿工非常懂得这种暗号。

奥列格高兴得都要抑制不住了。现在他们保证一直可以赢了。“老和小”兴高采烈地互相打着暗号，一会儿抬起眼睛望天，表示“黑梅花”，一会儿把眼睛斜到一边，表示“黑桃”，一会儿用食指摸摸下巴，表示“红心”。两个天真的姑娘愈玩愈用心，却老是输，可是她们决不甘心承认她们是输定了。妮娜满脸通红，非常激动。她们每输一局，奥列格都要搓着指尖哈哈大笑。奥丽雅比较老练，她终于明白这里面一定有些蹊跷，就以她特有的耐性和不露声色的本领，一步一步地开始监视对方。不多一会，她就恍然大悟，于是她抓住奥列格撅起他的饱满的嘴唇的机会，用足气力把叠成扇形的纸牌朝他嘴唇上打了一下，再把纸牌朝桌上一摔，摔得纸牌都飞散开来。

“哼，你们这两个骗子！”她用她的平静而沉着的声音说。

瓦尔瓦拉·德米特利耶芙娜大笑起来，毫不生气。妮娜愤愤地从桌旁跳起来，但是奥列格也跟着她站了起来，双手握住她的一只温柔的黧黑的手，把额头靠在她的肩上，请她原谅。最后，四个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奥列格真不想回家，可是已近黄昏，六点钟以后城里就戒严。奥丽雅说，他最好现在就走。为了表示坚决，她就和大家告别，回自己家里去了。

妮娜陪奥列格走到被夕阳斜照的小台阶上。

“真不想走！”他坦白地承认。

他们在台阶上站了一会。

“你们那边是个小花园吗？”奥列格快快地问。

妮娜默默地拉着他的手，陪他围着房子走了一圈。他们站在房子阴影里的茉莉丛中。茉莉长得异常繁茂，简直成了小树。

“你们这里真好，我们那边什么都让德国人砍了。”

妮娜没有作声。

“妮娜，”他用孩子似的请求的声音说，“妮娜，我可以亲亲你吗？……不，只要亲亲脸蛋儿，懂吗，只要亲亲脸蛋儿……”

他并没对她有任何举动，他只是在请求，可是她甚至把身子向后一闪，窘得说不出话来。

但是他并没有发现她的窘态，仍旧带着稚气的自然的神情望着她。

“不，你要知道，你可能误了钟点。”妮娜说。

奥列格对于他可能由于吻一下脸蛋儿就会误了钟点的这种说法，也并不觉得奇怪。当然，妮娜样样都对。他叹了口气，微笑了一下，把手伸给她。

“不，你一定要常到我们这里来玩。”妮娜把他的大手久久地握在她的温柔的手里，抱歉地说。

奥列格因为结识了新朋友，同时也因为他的事业正在形成而感到幸福。他饥肠辘辘地走回家去，但是，显然今天他注定吃不到东西。柯里亚舅舅在他们家门口迎着他走来。

“我已经守了你好半天：‘麻子’（他们这样称呼勤务兵）

一直在找你。”

“见他的鬼！”奥列格不在意地说。

“不管怎样，最好躲一躲他。你可知道，维克多·裴斯特利诺夫来了，是昨天回来的。

他在顿河附近被德国人赶了回来。我们去看看他，好在他的女房东那里没有德国人。”柯里亚舅舅说。

维克多·裴斯特利诺夫是个青年工程师，是柯里亚舅舅的同事和朋友，他用一个不寻常的消息来迎接他们：

“你们听到没有？斯塔庆柯被任命为市长了！”他恶狠狠地把嘴一咧，高声叫道。

“哪个斯塔庆柯？计划处主任吗？”连柯里亚舅舅都吃了一惊。

“就是他。”

“别开玩笑！”

“谁有工夫开玩笑。”

“不过那是不可能的！他这个人性情平和，办事勤快，一辈子没有得罪过别人……”

“就是那个性情平和、一辈子没有触犯过别人的斯塔庆柯；随便哪一次宴会，哪一次打牌，都少不了他；大家都说他：这个人是自己人，这是个大大的好人，这个人很可爱，这个人真讨人欢喜，这个人做事很有分寸。’就是这个斯塔庆柯当了我们的市长。”维克多·裴斯特利诺夫像刺刀那样又细又尖，瘦骨嶙峋，他说着说着，不由全身翻腾着怒火，恨得唾沫四溅。

“真的，让我们来冷静地想一想，”柯里亚舅舅还是不肯相信，“在工程师里面，没有一次请客不请他，我自己就不知跟他干过多少杯伏特加！我从来没有听他说过什么越轨的话，一般地说，我没有听他粗声粗气地说过一句话……即使他有点什么历史问题，大家对他的底细也很清楚：他父亲是个小官吏，可是他本人却从没有牵连进什么案件……”

“我也跟他喝过伏特加！可是现在他却会因为跟我们有交情，首先把我们抓起来，要么就给他做事，要么就……”裴斯特利诺夫用细长的手指朝天花板上做了个打活结的手势。

“这个讨人欢喜的人，你可没料到吧！”

他们没有去注意一直没有开口的奥列格，心里还难受了半天：他们认识多年，博得大家好感的这个人，怎么会一变而为德国人手下的市长呢。最简单的解释是：德国人对斯塔庆柯以死相威胁，叫他出任市长。但是敌人为什么偏偏会选中斯塔庆柯呢？过了一会，内心的声音，在生活中最可怕的关键时刻确定人的行动的内心深处的纯洁的心声告诉他们：如果选中他们这些普通的、平常的苏联工程师的话，他们是宁死也不肯堕落到这种地步的。

不，显然问题并不这样简单，斯塔庆柯并非仅仅是在死的威胁下才同意做市长的，面对着这个令人不解的现象，他们只能一次又一次地说：

“斯塔庆柯！真是怪事！……不，真是难以想象！请问，那还有什么人可以相信呢？”

于是他们只好耸耸肩膀，摊开双手。

第二十八章

斯塔庆柯是克拉斯诺顿煤业联合公司计划处主任，年纪还不老，大约在四十五岁到五十岁之间。他的确是革命前在消费税务局里干差事的一个小官吏的儿子，的确从来“没有牵连进”什么案件。按他所受的教育来说，他是个经济工程师，他一生都在各个经济部门里做经济计划师。

他在擢升的梯子上，说不上是步步高升，不过也不是老在一个地方不动。可以说，他不是一层一层地上升，而是一级一级地往上爬。但他对于他在生活中所占的位置总是不满足。

他不满足，并非因为，警如说，他的勤劳的天性、他的精力和知识，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因而使他未能从生活中获得他理应获得的东西。他不满足，是因为他未能不花一点劳动、精力和知识而坐享种种生活享受。至于那种不劳而获的生活是可能的而且是舒服的，这他在旧时代，在他年轻的时候就亲眼目睹过；而现在呢，他却喜欢从书本里阅读有关这一方面的东西——有关旧时代或是国外生活的东西。

不能说，他想做一个富得像神话里的富翁、大企业家、大商人或是大银行家，——这也需要他操心劳神：无休无止的竞争、对手、罢工，还有什么该死的危机！但是世界上不是也有稳当的收入吗，——一种什么地租或是一个清闲而受尊敬的差事，拿一笔高薪，——这种情况到处都有，只是“我们这里没有”罢了。“我们这里”生活的整个发展向斯塔庆柯表明：他的年龄虽在增加，可是他离他生活的理想却越来越远。因此他憎恨他所生活的这个社会。

但是，斯塔庆柯虽然对社会制度和自己的命运不满，他却从来不曾采取过什么手段去改变它们，因为他谨小慎微，事事害怕。他甚至不敢肆意饶舌，他是最普通、最平常的聊闲天的人，谈话范围从不越出谁的酒量大小以及谁跟谁同居。不管跟他关系亲疏远近，他从不指名道姓地批评人；但是他喜欢笼统地谈谈机关里的官僚主义啦，商业部门里缺乏个人主动性啦、青年工程师受的教育“今不如昔”啦、饭店和浴室的服务态度生硬啦等等。他从不对任何事物表示惊奇，而且认为，人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要是有人讲到盗用巨额公款、神秘的谋杀案或是家庭纠纷，斯塔庆柯就这样说：

“我个人并不感到惊奇。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您知道，我曾和一位女士住在一起，她很有教养，而且，已经结了婚，可是，她居然偷我的东西……”

像大多数人一样，他的衣着、家里的陈设和一切盥洗用具都是国产品，都是用本国原料制造的。在同出过国的工程师们往来的时候，斯塔庆柯喜欢在杯酒之间有些老实又有些狡猾地强调这一点。

“是咱们苏联的！”他用那胖胖的、但是和他的臃肿的体格相形之下显得特别小的胖手拉着他的条子上装的袖口说。

旁人也弄不明白，他这样说是表示自豪呢，还是在指摘。

但是他在内心里对同伴们的外国货领带和牙刷却万分羡慕，以致他整个深红色的秃头上都渗出了汗珠。

“这小玩意可爱极了！”他说。“真是难以想象，打火机、小折刀、香水喷，都在一块！不，咱们怎么也做不出这样的东西。”这位公民说道，而他的国家却是一个有成千上万的普通农妇开着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在集体农庄的田地里干活的国家。

他称赞外国电影，虽然他并没有看过。他可以一天几次、每次花上几小时去翻阅外国杂志，不是公司里偶然弄来的矿业经济方面的杂志，——他

对这种杂志不感兴趣，因为他不懂外文，而且也不想学，——而是同事们有时带回来的那些时装杂志，总之是里面有许多服装优雅的女人和尽可能袒胸露臂的女人的那种杂志。

但是在他的这些言谈、趣味、习惯和嗜好之中，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使他跟别人有显著的区别。因为有许许多多在兴趣、工作、思想和爱憎方面跟他完全不同的人，在同斯塔庆柯的交谈中，在某种场合也流露出和他相似的趣味或看法，但是他们却不去想这些趣味或看法在他们的生活中是占着第十位还是末位，也许只是占一个偶然的位置，可是在斯塔庆柯的生活中这些趣味或看法却是他整个本性的流露。

他这个肥胖臃肿、行动迟缓、脸和秃头都是深红色，说话用的是又轻又低的胸音、一双小眼睛像老酒鬼那样通红、与人无忤而又庄重得体、不露声色的人，也许会这样活下去，也许会活到老死也交不到一个好朋友，但是在他所憎恶的白天和夜晚的办公时间里，在他担任常委的工会委员会的会议上，在喝酒和打牌时，却受到一致的接待，并且不管他个人愿望如何，在职务上慢慢地一级一级地升上去。他也许会这样活下去，如果……

斯塔庆柯一开头就很清楚，他这个不露声色的人所生活的国家是抵挡不住德国的。这并不是因为他掌握两国资源的情况，也不是因为他对国际形势了如指掌（这二者的情况他根本不知道，而且也不想知道），而是因为这个不符合他生活理想的国家是抵挡不住照他看来是完全符合他生活理想的那个国家的。早在六月的那个星期天，当斯塔庆柯听到莫洛托夫的广播演说①的时候，他已经在内心感到某种不安，一种在必须乔迁之前所产生的激动。①指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当时苏联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所作关于法西斯德国入侵苏联的广播演说。

每次传来红军放弃一些城市、离国境愈来愈远的消息时，他也越来越明白乔迁是势在必行了。基辅被占领的那一天，斯塔庆柯似乎已经走上了通往新居之路，而且胸怀宏图，决心将它好好安排和布置一番。

所以到德军开进克拉斯诺顿的那一刻为止，斯塔庆柯在精神上大致也经历了拿破仑逃出埃尔巴岛回到巴黎所走过的同样的路程。

斯塔庆柯去进谒冯·文采尔将军的时候，先后受到哨兵和勤务兵的长时间的粗暴的阻拦。该他倒楣，正巧从屋子里走出了维拉外婆。斯塔庆柯一向非常怕她，自己也莫名其妙地连忙脱帽向外婆低低一鞠躬，装出他只是借道穿过院子从这条街到那一条街上去的样子。外婆并没有发觉这有什么可奇怪的。他站在庭园门口，总算好不容易等到了那个年轻副官。

肥胖的斯塔庆柯脱下帽子，连跑带跳地紧跟在德国军官后面。那副官根本对他看也不看，也不去仔细地听他的话，只是用手指向他点点德军卫戍司令部。

本城卫戍司令是党卫队冲锋队长斯托倍，他的模样跟斯塔庆柯年轻时候在《田地》①杂志刊登的帝王相会的照片上经常看到的那些中年普鲁士宪兵好像是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冲锋队长斯托倍的体质是容易中风的类型，两撇花白的口髭都捻得紧紧的，像海马的尾巴一样。他的浮肿的、好像灌满啤酒的脸上布满了密网般的青黄色血管，鼓出的眼睛是混浊不清的玻璃瓶的颜色，分不出眼白和瞳人。①《田地》是一八七〇至一九一七年在彼得堡出版的附有插图的周刊，在小资产阶级读者中间发行很广。

“您是要到警察队来做事吗？”冲锋队长斯托倍开门见山地嗄声问道。

斯塔庆柯难为情地把头一偏，把他那双手指的颜色和形状都像进口罐头小香肠的又短又肥的手紧贴着大腿，说道：

“我是个经济工程师，我很想……”

“去见宪兵站长勃柳克纳上士！”斯托倍不等他说完就嘶哑地叫了一声，接着把眼白和瞳人不分的、颜色很淡的眼睛一瞪，吓得斯塔庆柯从卫戍司令面前踉踉跄跄地倒退到门口。

宪兵队设在一所单层的长形兵营里，这里很久没有粉刷，表面已经剥落。这座兵营紧挨着小山，在区执委会下面一些，和俗称“八家宅”的城区中间隔着一片空地。从前的市民警局和区民警队都设在那边，斯塔庆柯在战前因为家里失窃曾经毫无拘束地到这里来过几次。

斯塔庆柯由一个持枪的德国兵陪着，走进他熟悉的昏暗的走廊，他突然吓得向后一缩，因为他差一点同一个身材很高、比他高出半截的人撞个满怀。他抬起眼睛一看，认出这个戴老式鸭舌帽的人就是克拉斯诺顿著名的矿工伊格纳特·福明。福明没有人陪。他穿着擦得雪亮的靴子，身上的衣服跟斯塔庆柯的同样体面。这两位衣冠楚楚的先生眨眨眼就公开了，仿佛互不相识。

宪兵队办公室从前是克拉斯诺顿民警队队长的办公室。在接待室里，斯塔庆柯迎面看见面包厂的发货员舒尔卡·雷班德，他的黧黑的、头骨突露的小脑袋上戴着斯塔庆柯非常熟悉的红顶的库班黑皮帽。全城的人都认识这个德国侨民舒尔卡·雷班德，因为他给各个机关的食堂、市消费合作社的面包摊和面包店分发面包。除了“舒尔卡·雷班德”之外，没有人叫他别的名字。

“瓦西里·伊拉利翁诺维奇！……”舒尔卡·雷班德暗暗吃惊地说，但是，他看到斯塔庆柯背后的兵士，就把话咽了下去。

斯塔庆柯把秃头略微向前一歪，说道：

“啊，雷班德先生！我要来……”他接着说的不是“服务”，而是“效劳”。

雷班德先生踮起脚尖，放慢脚步，然后门也不敲就钻进了站长办公室。显然，舒尔卡·雷班德现在是“新秩序”——

秩序①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了。　　①原文为德语。

他在里面待了很久。后来接待室里听到长官唤人的铃声，一个德国文书拉直身上鼠皮色的制服，把斯塔庆柯带进办公室。

勃柳克纳上士实际上并不是一般的上士，而是宪兵队的骑兵军士。而且这里实际上也不是宪兵队，而是克拉斯诺顿的宪兵站。这一区的宪兵队设在罗文基城。不过勃柳克纳上士不仅仅是骑兵军士，而且是宪兵队的骑兵上士。

斯塔庆柯走进办公室的时候，勃柳克纳宪兵站长并不是坐着，而是背着手站着。他个子很高，不很肥胖，但是圆滚滚的肚子下垂着。他眼睛下面浮肿，柔软多皱，颜色发暗，如果仔细研究它的起因，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勃柳克纳宪兵站长起床以后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站着而不是坐着①。①指他患有痔疮或别的病。

“按我所受的教育和工作经验，我是个经济工程师，我很想……”斯塔庆柯不好意思地垂下头，把紧并在一起的小香肠似的手指贴在条纹裤上，说道。

勃柳克纳宪兵站长回过头来对着雷班德，嫌恶地用德语说道：

“告诉他，我受元首的委托，任命他为市长。”

就在那一秒钟里，斯塔庆柯已经在设想，他认识的人里面，有哪些以前不理睬他、或是对他没规没矩的人，现在要仰他的鼻息了。于是他低低地垂下立刻渗出汗珠的秃头。他觉得他是在大大地对勃柳克纳宪兵站长表示由衷的感谢，其实他只是无声地翕动着嘴唇和鞠着躬。

勃柳克纳宪兵站长掀起制服下摆，露出被裤子紧裹着的、下垂的、像西瓜一样滚圆的肚子，从衣袋里掏出金烟匣。他取出一支烟，用覆着黄色皱皮的大手准确地把香烟直接插到嘴里。他想了一下，又从烟匣里取出一支烟递给斯塔庆柯。

斯塔庆柯不敢拒绝。

然后，勃柳克纳宪兵站长望也不望，就在桌上摸到一包狭长的、开过封的巧克力，仍旧望也不望，掰下联在一起的几小方块，一声不响地递给斯塔庆柯。

“这不是普通所谓的人，而是理想的化身。”斯塔庆柯后来常对妻子说。

雷班德陪斯塔庆柯去见上士的副手巴尔德先生。巴尔德先生只是个普通的骑兵军士，他的体格、举止态度、甚至连那又轻又低的胸音都酷似斯塔庆柯，要是斯塔庆柯穿上德国制服，他们两个就叫人难以区分了。斯塔庆柯从他那里接到关于组织市政府的指示，弄清了“新秩序”——秩序①下面的全部政权机构。

①原文为德语。

按这个机构来说，以市长为首的克拉斯诺顿市政府只不过是德国宪兵站办公室下面的一个科。

这样，斯塔庆柯就成了市长。

而现在维克多·裴斯特利诺夫和柯里亚舅舅却面对面站着，摊开双手说：

“那还有什么人可以相信呢？”

那天晚上，舒尔迦和康德拉多维奇分手之后，他除了到“上海”去找福明，已经没有别的选择。

根据外表的特征来看，福明给他的印象很好，——现在舒尔迦也只能根据外表来构成第一个印象了。舒尔迦高兴的是，当他说出暗号的时候，福明并没有露出激动和过分的匆忙，只是仔细把他打量了一眼，朝四下一望，然后让他走进上房，这才说出对答的暗号。福明非常沉默寡言，什么话都不问，只是注意地听着，对一切吩咐都回答：“会办好的。”还有一点使舒尔迦看了高兴的是，福明连在家里也穿着上装和背心，打着领带，挂着有金链的表——他认为这些都是一个在苏维埃时代培养出来的有教养、有知识的工人的特征。

有几件小事虽然没有使舒尔迦不快，——这些事是那么微不足道，所以不能使他明确地表示态度，——但他总觉得有些叫人不舒服。福明的老婆是一个浑身是肉、身强力壮的妇女，一双狭小的斜眼离得很宽，笑起来露出一口稀疏的大黄牙，使人看了很不愉快；他觉得，从他们认识的最初一刻起，她对他舒尔迦似乎就有些过分地阿谀和逢迎。就在当晚，他还无意中发觉，福明（舒尔迦已经马上称他伊格纳特·谢苗诺维奇了）有点吝啬：舒尔迦老老实实地说，他饿得要命，可是福明说，在食品方面，他们大概会有些紧张。以他们那样的富裕，他们的确不能说是好好地款待了他。但是舒尔迦看他们吃的跟他一样，心里就暗想，他是不可能知道他们私生活的一切情况的。

这些细节并不能破坏福明给舒尔迦的总的好印象。可是，哪怕舒尔迦不加任何选择、纯粹是偶然碰到的世界上最坏最坏的坏蛋，也要比福明好一些。因为在克拉斯诺顿的全体居民里面，福明是个最可怕的人，他之所以可怕，特别因为他早就不是人一九三〇年以前，伊格纳特·福明（那时他根本不叫伊格纳特·福明）在他的故乡沃罗涅什州的奥斯特罗果日斯克区，是一个出名的最有钱有势的人。他用本人的名义和通过别人出面的方法，占有三座庄园和两个面粉厂，还拥有两架马拉收割机、大批耕犁、两架簸谷机、一架脱粒机、十来匹马、六头牛、一座占地几俄亩①的果园、一个有一百箱蜜蜂的养蜂场，除了经常给他干活的四个雇农以外，他还能逐渐使用好几个乡的农民的劳力,因为在这几个乡里有许多人在物质上都要依靠他。

① 一俄亩合一·〇九二公顷，约合十六市亩。

伊格纳特·福明在革命前也很富有，但是更富有的是他的两个哥哥，特别是继承父亲产业的大哥。伊格纳特·福明最小，在一九一四年大战前结了婚，父亲就分了一笔财产给他，让他独立门户，所以他很生父亲的气。但是革命后，福明从德国前线回来，就非常巧妙地利用自己表面的贫穷，装做是一个受旧政权欺侮的人，他说自己不仅没有财产，赞成革命，而且对革命的敌人决不宽恕，他就以这样的身分混进村里从贫农委员会起的各种苏维埃政权机关和社会机构。福明利用这些政权机关，再抓住他两个哥哥也像他一样确实是富有而且憎恨苏维埃政权的事实，使大哥和二哥先后遭到审讯和流放，然后侵占了他们的财产，撵走他们的家属，让她们拖儿带女去讨饭度日。他毫不可怜这些幼小的孩子，主要是因为他自己没有孩子而且也不会有孩子。这样，在区里他就恢复了原状。在一九三〇年以前，他虽然拥有这些财富，政府机关的好多代表却认为他是苏维埃土地上的特殊现象——

富有，但又完全是自己人，就是所谓开明老板。

但是他势力所及的那几个乡的农民都知道，这是一个残忍无比的吸血富农，十分可怕。

所以当一九三〇年集体农庄开始建立，人民在政府的支持下开始剥夺富农的财产的时候，当时还用自己原来姓名的福明也遭到了人民复仇的浪涛的冲击。福明被剥夺掉一切，被判放逐到北方，但是地方当局看他是个有名的人，而且似乎很老实，在放逐以前并没有把他拘禁起来。福明便靠看妻子的帮助，在一个夜晚打死了村苏维埃主席和村支书，——在那些日子里，主席和支书都不住在自己家里，而是住在村苏维埃的办公室里。在福明窥伺他们的这天夜里，他们出去做客，喝得酩酊大醉地回来。福明打死了他们，带着老婆先逃到李斯基，然后再逃到顿河罗斯托夫，他在那边有可靠的自己人。

到了罗斯托夫，他买了几张有铁路工厂工人伊格纳特·谢苗诺维奇·福明名字的证件，这些证件上表扬他是一个有功的工人。他给他老婆也弄到了适当的证件。这样，他就在顿巴斯出现了，因为他知道那边人手非常缺，不会追究他的来历。

他坚信他迟早总会等到出头的日子，可是他暂时给自己规定了一条明确的行动方针。首先他知道他得好好地劳动：第一，因为这样有利于他隐瞒身分；第二，凭他那套熟练的技术和本领，好好地劳动可以使他得到富裕的生活；第三，因为他过去尽管非常富有，他还是养成了劳动的习惯。此外，他拿定主意不要表现得太突出，不要参加社会活动，对上级要顺从，还有，千万不要批评任何人。

久而久之，这个隐姓埋名的人就成了一个受当局重视的人，他们认为他不仅是一个勤恳诚实的工人，而且非常谦虚，纪律性很强。他有足够的自制力毫不改变他的这条行动方针，甚至到德军逼近伏罗希洛夫格勒时还是如此。但是他毫不怀疑德国人一定会到来。只有在别人问他，如果德国人来了，他肯不肯把他的房子让地下组织使用的时候，他才突然被那样强烈的幸灾乐祸的感情和可以复仇的喜悦所控制，险些露出了马脚。

就连舒尔迦非常欢喜的这件事，——福明在家里也穿着上装、打着领带、带着怀表，——也并不是因为福明十分注意整洁（他平时虽然也像所有的工人一样，穿得干干净净，但是只穿普通的家常便服），而是因为他时刻在等待德国人来临，为了博得德国人的欢心，就从箱子里取出了他最好的行头。

在斯塔庆柯先去晋见勃柳克纳宪兵站长，再去见巴尔德副宪兵站长的时候，舒尔迦就躺在那个营房里另外半边的一间又小又暗的单人牢房里，他遭到毒打，浑身是血。

营房的这一半是几间禁闭室，当中有一条窄走廊，通向民警局办公室的走廊。在过去，这半边是克拉斯诺顿唯一的拘留所。

“新秩序”，秩序①，就在于：拘留所的几个单人牢房和普通牢房里现在都挤满了男女老少。这里面有城里人和来自哥萨克村镇的人，他们因为被怀疑为苏维埃工作人员、游击队员、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而遭拘捕；有人因为言语或行动侮辱了德国的荣誉，有人因为隐瞒自己的犹太血统，有人因为没有证件，或是仅仅因为他们是人而被拘捕。　　①原文为德语。

几乎不给这些人吃的，不但不让放风，连大小便也不准出来。牢房里恶臭难闻，营房里早已霉烂的旧地板上污秽不堪，浸透了尿和血。

不管所有的牢房是怎么挤，马特维·舒尔迦或是叶夫多金·奥斯塔普楚克——他被捕时用的名字——仍旧被单独关着。

在被捕的时候，他就被打得遍体鳞伤，——他抵抗，他力大无比，使德国人很久制服不了他。后来，到了监狱里，勃柳克纳宪兵站长、巴尔德副宪兵站长、逮捕他的党卫队分队长芬庞、“警察队长”索里柯夫斯基和德国“警察”福明都打过他，他们希望趁他神志没有清醒以前就立刻摧毁他的意志。但是如果在正常状态下都不能从舒尔迦那里探出一点口风，那么，当他处在残酷的斗争中，就更不可能从他那里探听出什么来了。

他是那样地强壮，即使现在到了遍体鳞伤和浑身血污的地步，他躺着也不是因为筋疲力尽，而是强迫自己躺着休息一下。假如他再被带去审讯，他一定还能全力以赴地去斗争。他的脸火辣辣地发痛，一只眼睛被打出血，肿了起来。一支胳臂被芬庞分队长用铁棒在手腕上部打了一下，万分疼痛。舒尔迦一想到德国人在什么地方也同样折磨着他的妻子和他的孩子，由于他舒尔迦的缘故折磨着他们，可是他却毫无指望去搭救他们，他的心都要碎了。

但是比肉体痛苦和这种精神折磨使他更感痛苦的是，他想到自己没有履行职责就落进了敌人的魔掌，而且还是咎由自取。

在他的处境下，他似乎可以自然而然地为自己开脱，说他的失败并不怨他，而是因为别人把不可靠的接头地点给了他，——这种想法仅仅在他刚刚被捕的时候钻进过他的头脑，但是立刻就被他抛开了，认为这是对弱者的虚假的安慰。

凭他自己的生活经验，他知道任何社会活动的成功都必须依靠许多人，

尽管在这些人里面会有人对自己这部分工作执行不力或者甚至会犯错误。但是既然被派到非常的环境中去做非常的工作而又没有把工作做好，那只有精神懦弱的可怜虫才会埋怨这是别人的过错。纯洁的内心的呼声告诉他，因为他是一个特殊的人，有着过去的地下工作的经验，所以才被选拔出来担任这个非常环境中的非常工作，希望他能运用他的意志、经验和组织才能去克服种种危险、困难、艰苦、障碍，并纠正与这个工作有关的别人的错误。这就是舒尔迦在他的失败中不能埋怨别人也没有埋怨别人的缘故。他意识到他不仅是个人失败了，而且也履行不了自己的职责。这种想法折磨着他的灵魂，比任何别的痛苦都更为可怕、更为痛心。

不肯缄默的、正直的内心的声音提醒他，他总有什么地方、什么事情做得不对。他痛苦地一再在自己的脑海里回忆他跟普罗庆柯和刘季柯夫分手后他所说和所做的一切详情细节，但是他找不出自己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有什么事情做得不对。

舒尔迦以前和刘季柯夫根本不认识，可是现在却不断地为他担心，特别是因为交给他们两人的工作能否完成，现在完全要靠刘季柯夫了。但是在可怕的磨难中，在难忍的烦恼中，他的心却更经常地怀念他们共同的领导人和他个人的朋友普罗庆柯，并且问道：

“你在哪里，伊凡·费奥多罗维奇？你怎么样？你活着吗？你是在打击该死的敌人吗？你能胜过他们吗？你的妙计能超过他们吗？会不会你也像我一样，你的灵魂也在受着煎熬？或是乌鸦已经在草原上啄食你的快乐的眼睛？……”

第二十九章

普罗庆柯跟刘季柯夫和舒尔迦分手之后，就和妻子动身前往以北顿涅茨河对岸的米佳金森林为根据地的队伍里去。他们得绕一个大弯，才能绕过已经被德军占领的地区。普罗庆柯总算使他的“迦济克”渡过了顿涅茨河，夜里游入游击队的根据地，当时德国坦克已经开进米佳金镇——这一带的森林就是因为这个镇而得名的。

森林，森林……这哪里能算森林？这些分布在不大的地域上的灌木林，哪里比得上白俄罗斯或是布良斯克的森林——游击队的光荣的诞生地！在米佳金森林区，连大的队伍都没有地方躲藏，更谈不上展开军事行动了。

幸而普罗庆柯和他的妻子来到根据地的时候，游击队已经离开根据地，在通向西方的大路上同德国人作战了。

这个几乎是州里最大的游击队，竟会没有隐蔽的基地！普罗庆柯事后想起来非常懊悔，他在来到这儿的第一天怎么没有或是没有能够从他头脑里闪过的这样简单明了的念头里得出种种结论。

伏罗希洛夫格勒州划分成几个区，由地下州党委的书记们领导。普罗庆柯就是这些书记之一。受他领导的有几个区委和许多附属于它们的地下小组。各区还有特殊的破坏小组，其中一部分受当地的地下区委领导，另一部分直接受州委领导，还有一部分却受乌克兰游击队司令部，或者甚至受游击

队总司令部领导。

为这个分布到各处的地下网服务的，有一系列保密性更为严格的接头地点、掩蔽处、粮食基地、武器基地以及使用技术和通过专门的联络员进行联系的联络机关。除了各区的普通接头地点，普罗庆柯和本州地下工作的其他领导人还掌握一些只有他们知道的地址：一部分用来跟乌克兰游击队司令部联系，另一部分是本州领导人用来相互联系，再有一部分用来和各区的领导人或是游击队指挥员们联系。

在每个区的境内都有几支小游击队在活动。此外，每个区里还建立了一个规模较大的游击队，按照原来的意图，应该有一个州委书记待在那边，领导那个区的地下工作。大家认为，待在大游击队里可以保证州委书记有相对的安全，也就是说，有较大的活动自由。

伏罗希洛夫格勒地下工作的领导们用来联系的总接头地点是乌斯片斯克区的一个大村庄奥烈霍沃的诊疗所。普罗庆柯指定他的联络员克谢尼雅·克罗托娃的姐姐，当地的医生瓦连京娜·克罗托娃做房主人。普罗庆柯还在克拉斯诺顿的时候，克谢尼雅·克罗托娃已经住在她的当医生的姐姐家里，普罗庆柯应该从克谢尼雅·克罗托娃那里得到有关其他各区在德国人占领后的情况的第一批消息。

普罗庆柯把米佳金森林的游击队的粮食和武器总保管的责任交给他的助手，并让他兼各区间的联络主任之后，就坐车前往自己的部队。实际上他不是坐车去的，而是走路去的。整个地区都麇集着德国兵。尽管普罗庆柯曾安慰自己，认为他无论去哪里都可以乘坐他的“迦济克”，他甚至贮存了起码够用一年的汽油，结果还是得把那辆多灾多难的“迦济克”开进林中一个采泥场的洞里，封住洞口。给普罗庆柯担任联络员兼侦察员的叶卡杰林娜·巴夫洛夫娜把丈夫取笑了一阵，他们就一同步行到游击队去了。

普罗庆柯跟那个师长在克拉斯诺顿区党委大厦商量联络问题，只是几天以前的事，可是周围的一切已经起了多大的变化啊！当然，同师团的任何协同动作都已经谈不上了。这个师团在卡缅斯克附近的顿涅茨河上坚守了奉命坚守的时间、丧失了早已不是满员的人员的四分之三以上，然后撤离阵地，走了。师团遭受了这样惨重的损失，似乎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在老百姓口中，没有人说它是“被粉碎了”，也没有人说它是“陷入了包围”或是“撤退了”，大家都说它“走了”。它也确实是走了，当德国大兵团已经在北顿涅茨河和顿河中间的广大地域作战的时候，它走了。

这个师团在敌占区走着，它通过河流和草原，且战且走，利用草原上小河的陡岸做防线，它时而消失，时而又在另外的地方出现。在它走得还不太远的头几天，老百姓关于这个师团作战的传说还流传到这里。但是师团愈来愈向东去，直奔给它指定的一个遥远的地方，这个地方大概是非常遥远，所以关于师团的传说就连痕迹都没有了，人民的心里只记得它的光荣事迹和传奇般的故事。

普罗庆柯的游击队独立作战，成绩不坏。一上来，游击队就在一次公开的战役里歼灭了敌军几个小分队。游击队消灭掉队的敌军官兵，焚烧汽油车，截夺辎重车，到村里去捉德方行政管理人员并处以死刑。关于别的游击队活动的消息还没有来，但是普罗庆柯根据口头的传说，猜到别的游击队开始得也不错。老百姓的传说夸大了游击队的战绩，但这只是说明，他们的斗争得到人民的支持。

敌人调了大批兵力来对付游击队，但是普罗庆柯拒绝了指挥部要他们返回根据地的建议，夜里悄悄地把游击队调到顿涅茨河右岸。这里，谁也没有料到游击队会来，所以他们在德军后方造成了空前的恐慌。

但是，在小小的草原地区里活动，一天比一天困难，因为这里人口稠密，矿山、庄子、哥萨克村落几乎都互相衔接。队伍要不断地移动。只有靠普罗庆柯的计谋、靠他非常熟悉本区的地形、再加上优良的武装，才能够使队伍走掉而暂时没有受到巨大的损失。但是敌人老跟在屁股后头，这样在原地不停地兜圈子，究竟能支持到几时呢？

以森林地带或是地广人稀的草原地带的游击队为榜样建立起来的那种大型的游击队，在人烟稠密的顿巴斯工业区是不适宜的。普罗庆柯得出这个结论的时候，灾祸已经在叩门了。

克谢尼雅·克罗托娃送来的消息使他心里好像被扎了一刀。在伏罗希洛夫格勒近郊活动的一个大游击队受敌人包围，被打垮了，待在这个游击队里的州委书记雅柯温柯牺牲了。按照雅柯温柯的游击队和普罗庆柯的游击队的类型建立起来的卡吉耶夫卡游击队里，总共只有以游击队指挥员为首的九名战士遇救。敌人在作战时遭受了三倍的损失，但是敌人的损失再大，也不足以抵偿在战斗中牺牲的著名的卡吉耶夫卡矿工近卫队！该队指挥员通知普罗庆柯，说他在招募新战士，目前只能以小队活动。鲍柯沃—安特腊戚特游击队突围了，总算没有遭到巨大的损失。它立刻分为几个小队，在一个总的指挥部下面活动。一些不大的游击队——鲁别让斯基、克烈缅斯基、伊万诺夫斯基以及其他各区的游击队的活动都很顺利，几乎没有损失。波巴斯仰斯基区的游击队是本州最大的游击队之一，一开始就分成几个小队活动，受一个总的指挥部指挥，当地人民高度评价它的战果，给队取了个外号叫“鬼见愁”。

至于各区像雨后春笋般产生的新的队伍——由当地居民、掉队的红军指战员组成的队伍——它们全都是以小股游击队的形式出现。

这是生活本身的命令。

普罗庆柯获悉这些情报之后，他总共只要花几个小时就可以把他的游击队也化整为零，但是命运连这几个小时都不肯给他。

德国人在黎明时包围了他们，但是现在已经夕阳西下，靠近黄昏了。

从前这里有一条小溪流入北顿涅茨河。小溪早已干涸，连附近马卡罗夫·雅尔村的居民都记不起这里什么时候有过水。原来是小溪的地方留下了一个树林郁茂的峡谷。它的上端很窄，愈到口子的地方愈宽，形状像一个三角形，树林像一条宽带子一直通到河岸。

普罗庆柯伏在峡谷上端最难防御那个地段的矮树丛里。他的柔软的、深黄色的、农民式的胡子已经留得很长。德国人的一粒子弹从他的右太阳穴上面擦过，擦掉一小块带头发的头皮，血流到鬓角上，凝住了，但是他并不觉得。他伏在树丛里，用自动枪射击，旁边还有一支闲着，让它冷却。

叶卡杰林娜·巴夫洛夫娜伏在离丈夫不远的地方，她脸色严峻、苍白，也在射击。她的一切动作都是简练而准确的，充满潜在的精力和她自己都没有觉察到的天然的优美，——从旁边看起来，她似乎只是用手指操纵着自动枪。伏在她右边的是纳烈日内老头，马卡罗夫·雅尔的集体农民，或是照他自称，“老对德战争”的机枪手。

纳烈日内的十三岁的孙子，在给自动枪装弹盘，他的周围都是弹药箱。

在弹药箱后面的洼地上，指挥员——他没有跟普罗庆柯在一起，而是待在河岸上——的副官一直抓着晒热的电话听筒，用暗语咕哝着：

“喂，我是妈妈……我是妈妈……是谁？你好，阿姨！……李子不够吗？跟侄子拿吧……喂，我是妈妈，我是妈妈……我们这里一切都很好。你们那里呢？狠狠地揍他们一顿！……小妹妹！小妹妹！小妹妹！你怎么睡着啦？小兄弟请你在左边加把火……”

不，折磨着普罗庆柯的灵魂的并不是他本人和妻子可能牺牲的念头，甚至不是对别人生命的责任感，而是他意识到：这一切都是可以预见的，他们本来可以不至于陷入现在这样的困境。

他还是把队伍分成了几个小队，给每个小队都派了队长和政治副队长，并且给每个小队指定了以后可以做根据地的地方。以前的指挥员和他的副手以及参谋长应该指挥这些新的小队里面的一个队。对于所有这些小队说来，他们应当代表总指挥部，因为他们现在人数不多，所以仍旧以米佳金森林做根据地。

普罗庆柯叫队长们和战士们做好准备，在峡谷里守到夜里，然后由他率领大家突破敌人的包围圈冲到草原上去。为了使大伙在突围之后容易走掉，普罗庆柯把小队分得更小，三五个人一组，这些小组应该各自设法脱逃。纳烈日内老头答应把他和他的妻子暂时藏在一个可靠的地方。

普罗庆柯知道，一部分人在突围时将要牺牲，一部分人将要被俘，也会有人并没有牺牲，但是由于胆小，已经不会到指定的地点，不会到根据地来了。这一切形成沉痛的精神重担压在普罗庆柯的心上。但是他非但没有把自己的心情告诉任何人，而且他的脸色、手势以及他的一举一动，都和他内心的感受恰恰相反。他身材矮小匀称，红润的脸上长满深色的农民式的大胡子，伏在灌木林里，准确地向敌人射击，一面还跟纳烈日内老头说着笑话。

纳烈日内的脸有些像摩尔达维亚人，甚至像土罗克①人：一把好像涂着树脂的、漆黑的鬈曲的胡子，一双灵活的、闪闪发光的乌黑的眼睛。他像太阳底下的草茎那样浑身干瘪，肩膀和手上尽是骨头，然而宽阔有力，他的动作看起来似乎有些迟缓，但是充满了潜力。

①土罗克是土耳其的主要民族。

他们的处境虽然困难，但两人似乎都很满意，因为他们能趴在一起，相互之间可以进行说不上是很复杂的谈话。

大概每过半小时，普罗庆柯就要眼睛里闪烁着狡猾的神气，说道：

“喂，柯尔聂·季霍诺维奇①，有点热吧？”

①柯尔聂·季霍诺维奇是纳烈日内的名字和父名。

听了这种话，纳烈日内就这样回敬他：

“凉快是说不上，但是还不热，伊凡·费奥多罗维奇。”

如果德国人逼得特别紧，普罗庆柯就说：

“如果他们有迫击炮，向我们扔些黄瓜，那我们就要热得够呛了！是吗，柯尔聂·季霍诺维奇？”

听了这种话，纳烈日内也是不慌不忙地回敬说：

“要很多很多的黄瓜才能把这样的林子打烂，伊凡·费奥多罗维奇……”

忽然，透过连珠炮似的自动枪声，他们俩都听到摩托车的轧轧声远远地从马卡罗夫·雅尔那边传来，声音愈来愈响。

他们甚至有一刹那工夫停止了射击。

“听到吗，柯尔聂·季霍诺维奇？”

“听到了。”

普罗庆柯把眼睛朝妻子那边转动了一下作为警告，撅起嘴做了一个暗号让她不要出声。

有一队摩托兵，沿着从这里看不见的大路开来支援德国人。大概，峡谷里各处都听到了摩托车的响声。电话铃狂热地响起来了。

太阳已经西沉，但是月亮还没有升起。暮色还没有降临，阴影却已经消失。天空里，还有许多幽静的、淡淡的色彩在变幻着颜色。在地上，在高高矮矮的树木上、人脸上、步枪上以及遍地皆是的空弹壳上，总之在一切东西上面都笼罩着这种准备马上被黑暗吞掉的、异样的、逐渐暗淡的微光。这种既非白昼、又非夜晚的朦胧状态，只滞留了几秒钟。突然，仿佛有一种黄昏时候的雾气或是露水，开始在空中扩散，落在灌木林上和地面上，渐渐浓密起来。

从马卡罗夫·雅尔那面传来的摩托车的轧轧声愈来愈响，散播到整个地区。时而这里时而那里展开了对射，河边的枪声愈来愈激烈了。

普罗庆柯看了看表。

“得开溜了……杰辽兴！在二十一点正……”他没有转脸，就对电话机旁的副官说。

普罗庆柯已经跟分布在小树林里的各个游击小队的指挥员约好，听到他的信号，各个小队都集合到通草原洼地里的一株老榆树旁边。他们就应当从这里突围。现在这个时机已经成熟了。

为了转移德国人的注意力，守卫在紧靠顿涅茨河边的小树林的两个游击小队应当比别的小队多坚持一会，仿佛他们是在作最后的、不顾一切的渡河的尝试。普罗庆柯迅速地环顾了一下，看看可以派谁到他们那边去传达命令。

在守卫峡谷上端的游击队员里面，有一个克拉斯诺顿青年——共青团员叶夫盖尼·斯塔霍维奇。在德国人到来以前，他曾在伏罗希洛夫格勒的防空防化学指挥员训练班学习。他的文化水平高，举止沉着，加上在他身上很早就显示出来的善于做社会工作的能力，使他在游击队员中间显得很突出。普罗庆柯在几件不同的工作上考验过斯塔霍维奇，打算派他去跟克拉斯诺顿的地下组织取得联系。现在，普罗庆柯在自己左面看见了他的苍白的脸和汗湿的、蓬乱的浅色头发，要是在别的时候，他的头发一定是以漂亮而自然的波浪式覆在他的傲然昂起的头上。这青年人神经紧张得厉害，但是自尊心不容许他退进峡谷深处。这一点使普罗庆柯看了很高兴。他就派斯塔霍维奇前去。

斯塔霍维奇勉强笑了一笑，把瘦削的身子弯得靠近地面，朝河岸跑去。

“喂，柯尔聂·季雷诺维奇，你也别耽搁！”普罗庆柯对这个勇敢的老头说，他也是留下来和一个游击小队一同掩护撤退的。

从躲在河边的游击队员们开始佯装要渡顿涅茨河的那一刻起，德军主力就在这里的顿涅茨河岸集中，他们的全部火力都对着这一部分树林和河面。子弹的唿啸声和它们落在矮树丛里发出的劈啪声融成一片刺耳的响声。子弹好像在空中爆开，人们就呼吸着赤热的铅灰。

游击队指挥员接到斯塔霍维奇送来的普罗庆柯的命令之后，就派大部分游击队员到洼地上的集合点去，自己却带领十二个人留下来掩护撤退。斯

塔霍维奇怕待在这里，很想跟别人一起走，但是又觉得不好意思，所以他就利用没有人注意他的机会，躲到矮树丛里，趴在地上，翻起衣领，希望能把耳朵稍微掩住一点也好。

在炮火不那么集中、不那么震耳欲聋的瞬息，可以听到德军刺耳的口令声。个别的德军小队已经从马卡罗夫·雅尔那边的什么地方突进了树林。

“时候到了，伙伴们，”游击队指挥员突然说道，“跑步走！……”

游击队员们立刻停止射击，跟在指挥员后面就跑起来。虽然敌人的火力非但没有减弱，反而不断增强，但是在树林里奔跑的游击队员们却感到四周寂静无声。他们拼命奔跑，可以听到彼此间的呼吸声。不多一会，他们看到了挨个儿趴着隐蔽在洼地里的同志们的暗色身形。他们扑到地上，爬到他们身边。

“啊，愿老天保佑你们！”站在老榆树旁边的普罗庆柯夸奖地说，“斯塔霍维奇在这里吗？”

“在。”指挥员不假思索地回答说。

游击队员们互相看了一下，并没有发现斯塔霍维奇。

“斯塔霍维奇！”指挥员挨个儿细瞧着洼地里游击队员们的脸，轻声唤道。但是斯塔霍维奇不在。

“唉，伙伴们，你们也许太糊涂，连他被打死了也没有发现！也许，他受了伤，被你们撇下了！”普罗庆柯发火了。

“我又不是个小孩，伊凡·费奥多罗维奇！”指挥员觉得受了委屈。“我们从阵地上撤退的时候，他好好的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在密林里跑的时候，彼此也没有失散……”

这时，普罗庆柯看见虽然是高龄却很矮捷的纳烈日内的身形隐蔽地穿过灌木林向他爬过来，他后面是他的十三岁的孙子和几个战士。

“啊，我亲爱的！我的朋友！”普罗庆柯掩饰不住自己的感情，高兴地叫起来。

突然他转过身来，尖声地拖长声音喊了一声，使大家都能听见：

“准—备！……”

伏在地上的游击队员们的姿势里出现了山猫似的动作。

“卡佳！”普罗庆柯轻轻地说，“你别落在我后面……如果我什么时候……如果有过什么……”他挥了挥手，“要请你原谅我。”

“你也要原谅我……”她微微低下了头，“如果你能安全地出去，而我……”

他不让她说完，就说：

“我也是一样……你就讲给孩子们听。”

他们来不及再多说别的。普罗庆柯尖声叫道：

“开火！前进！”

接着他第一个跑出了洼地。

他们弄不清，他们究竟剩下多少人、他们跑了多久。似乎，他们已经没有呼吸，也没有心脏了；他们一声不响地跑着，有人还一面跑一面射击。普罗庆柯回过头去，看见了卡佳、纳烈日内和他的孙子，这给他增添了力量。

突然，在后面和右面的草原上响起了摩托车的吼声，它远远地散布在黑夜的空气中。前面的什么地方也已经响起摩托声；这种声音似乎是从四面八方把奔跑的人们包围起来。

普罗庆柯发出信号，人们就纷纷四散，伏在地上，利用朦胧的月光和起伏的地形，像蛇那样毫无声息地爬过去。转眼之间，人们已经一个接一个地从眼前消失了。

普罗庆柯、卡佳、纳烈日内和他的孙子单独留在浴着月光的草原上只不过几分钟。他们到了集体农庄的瓜田中间，这片瓜田向前向上伸延，一共有好几公顷，大概是沿着一个长山岗的背面，在天空中隐约可见它的岗顶。

“稍微等一下，柯尔聂·季霍诺维奇，我已经透不过气来了！”普罗庆柯说着就扑到地上。

“加油，伊凡·费奥多罗维奇。”纳烈日内迅速地向他低下头，呼吸的热气喷到他的脸上，说着。“我们不能休息，翻过小山就是那个村子，他们可以把我们藏起来……”

于是他们就跟着纳烈日内继续在瓜田里爬过去，纳烈日内偶尔转过他那目光锐利、留着鬈曲的黑胡子的燧石般的脸来，望望普罗庆柯和卡佳。

他们爬上岗顶，看见前面村里窗上不见灯光的白色农舍，村子的一头离他们大约二百米。瓜田一直延展到最近一排农舍篱笆前面的大路旁边。几乎就在他们爬上岗顶的同一刹那，有几个德国摩托兵在这条大路上驰过，折进了村中心。

自动枪火仍旧时远时近地闪烁着；有时觉得，有人在还击，深夜的这些枪声在普罗庆柯心里唤起了痛苦和忧郁。纳烈日内的浅色头发的孙子完全不像他爷爷，他有时带着询问的神气胆怯地抬起稚气的眼睛望望普罗庆柯，——看着这双眼睛令人心里很不是滋味。

村里传来德军的詈骂声和急骤的枪托捣门声。一会儿寂静下来，突然又传来了一阵孩子的哭叫或是妇人的哀号，这哀号逐渐变为啼哭，后来又变为高声的哀告和呼号，打破了夜的寂静。有时在村里村外，都有摩托车在吼叫——一辆、好几辆、甚至好像有整整一队在疾驰。明月在天空大放光彩，普罗庆柯、卡佳、纳烈日内祖孙俩都伏在地上，个个都浑身湿淋淋，冷得瑟缩发抖，卡佳的一只脚被靴子磨破了，又疼又痒。

他们就这样趴着，等到村里和草原上的一切都沉寂下来。

“喂，是时候了，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了。”纳烈日内低声说。“我们要一个一个地爬，一个跟着一个。”

村里传来德军巡逻队的脚步声。偶尔在这里那里有火柴或是打火机的火光一闪。普罗庆柯和卡佳留下来，趴在村中心一家农舍后面的乱草堆里，纳烈日内带着孙子翻过了篱笆。

有好一会工夫听不见他们的声息。

公鸡啼了头遍。普罗庆柯忽然冷笑了一声。

“你笑什么？”卡佳轻声问道。

“德国人把公鸡都杀光了，全村只有两三只公鸡！”

他们是第一次关心地、意味深长地互相望了望对方的脸，只有在眼睛里露出了笑意。这时，篱笆后面传出了低语声：

“你们在哪里？到房子跟前来……”

一个身材瘦长、骨骼结实、头上包白头巾的妇女，隔着篱笆在寻找他们。她的黑眼睛在月光下闪闪发亮。

“站起来吧，别怕，没有人。”她说。

她搀着卡佳跨过篱笆。

“您叫什么名字？”卡佳轻声问道。

“玛尔法。”那妇女说。

“啊，‘新秩序’怎么样？”普罗庆柯带着苦笑问她。这时候，他、卡佳、纳烈日内老头和他的孙子都已经坐在农舍里的一盏小油灯下。

“‘新秩序’是这样的：德国卫戍司令部派人到我们这里来过，要我们每头牛每天要交六公升牛奶，每只鸡每月要交九个蛋。”玛尔法说，她的黑眼睛带着几分羞怯的神情不好意思地斜睨着普罗庆柯。

她已经快五十了，但是她端菜和收拾杯盘的动作还像年轻妇女那样利落。刷白的农舍收拾得干干净净，还装饰着绣花手巾。满屋都是孩子——一个比一个小。十四岁的儿子和十二岁的女儿被从床上唤了起来，现在到外面放哨去了。

“过了两星期，又来了上交牲口的新任务。您看，我们村里不过一百来户，可是已经接到第二次任务，要交二十头牲口，——您看，这就是‘新秩序’。”她说。

“你不用生气，玛尔法大婶！早在一九一八年我们就领教过了。他们来得快，去得也快！……”纳烈日内说了忽然哈哈大笑起来，露出了结实的牙齿。他的燧石般的晒黑的脸上那双土罗克人似的眼睛，射出英勇而狡猾的光辉。

甚至难以想象，说这话的就是刚刚死里逃生的人。

普罗庆柯用眼角瞟了卡佳一眼，她的严峻的脸色变得温和了，露出了和悦的笑容。经过多日的战斗和这次令人惊心动魄的脱逃之后，这两个已经并不年轻的人使普罗庆柯和卡佳感到一股蓬勃的青春的朝气。

“据我看，玛尔法大婶，不管他们怎么剥夺你们，你们总还是有点东西。”普罗庆柯对纳烈日内挤挤眼，朝桌上点点头说。玛尔法“出于大方”，已经摆出了一桌子的奶渣、酸奶油、黄油和脂油煎蛋。

“您难道不知道，在一个地道的乌克兰农家，无论你怎么搜刮，总是吃不尽偷不光的，除非你打死了女主人！”玛尔法开玩笑地回答说，她像少女那样窘得满脸通红，还带着一种有些粗鲁的坦率，普罗庆柯和纳烈日内听了都不禁用手捂着嘴噗哧一笑，卡佳也笑了。“我把什么都藏起来了！”玛尔法自己也笑了。

“唉，你这个聪明的女人！”普罗庆柯说，把头转动了一下。“现在你算是什么人——是集体农庄庄员呢，还是单干户？”

“在德国人没有走之前，我好像是个休假的集体农庄庄员，”玛尔法说，“可是在德国人眼里，我们根本什么都不是。他们认为我们全部集体农庄的土地都属于日耳曼……他们叫什么——拉伊希①？柯尔聂·季霍诺维奇，他们是怎么叫的？”

“是叫他妈的什么拉伊希！”老头冷笑着说。

“他们召开了大会，在会上宣读了什么文件，那个坏蛋叫什么啦？叫罗森堡②，还是叫什么，柯尔聂·季霍诺维奇？”

①德语“国家”或“帝国”的译音。

②罗森堡是希特勒德国主要战犯之一，纳粹党的外交负责人，一九四一至一九四四年任东方被占领区事务部长、一九四六年被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是叫他妈的什么罗森堡！”纳烈日内回答。

“那个罗森堡说，我们可以领取土地去自己耕种，可是轮不到所有的人，只给那些肯给日耳曼拉伊希好好干活的人，自己有牲口和机器的人。可是您瞧，哪来的什么机器，他们无非是赶着我们用镰刀去收割集体农庄的小麦，而且麦子又是拿去给他们的拉伊希的。我们这些妇女早已忘了怎么用镰刀收割了！我们到了地里，躺在小麦地里阴凉的地方，睡大觉……”

“那么村长呢？”普罗庆柯问。

“我们的村长是自己人。”玛尔法回答说。

“唉，你这个聪明的女人！”普罗庆柯又说了一遍，又把头转动了一下。“你们家当家的在哪里？”

“他在哪里吗？在前线。我的高尔杰依·柯尔尼延柯在前线。”她严肃地说。

“请你照直说：你有这么一大群孩子，你掩护了我们，难道你不替你自己和孩子们担心吗？”普罗庆柯忽然用俄语问道。

“我才不担心呢！”她用年轻的黑眼睛望了望他，也用俄语回答。“他们要砍头尽管砍。我不怕。我知道我是为什么死的。可是也请您告诉我：您跟我们的人，跟前线的人有没有联系？”

“有。”普罗庆柯回答。

“那就请您告诉我们的人，叫他们打到底。叫我们的丈夫们不要顾惜自己。”她怀着一个普通的、正直的妇女的信念说道，“我要这么说：也许，我们的爸爸，”她好像是用她孩子们的口气说，“说不定，我们的爸爸从此回不来了，说不定，他会在战斗中牺牲，可是我们会知道，他是为什么牺牲的！等我们的政权回来，它就是我的孩子们的爸爸！……”

“聪明的女人！”普罗庆柯第三次温柔地说，接着垂下了头，半晌没有抬起来。

玛尔法安排纳烈日内祖孙俩睡在屋里；她把他们的武器藏起来，就不替他们担心了。普罗庆柯和卡佳却被她带到外面一个荒废的地窖里，地窖上面长满杂草，里面像墓穴里似的寒气砭骨。

“稍微有些潮湿，我给你们拿来了两件皮袄。”她羞怯地说，“这儿来，这儿有麦秸……”

他们单独留下了，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他们坐在麦秸上半晌没有出声。

突然，卡佳用温暖的双手抱住普罗庆柯的头，把它紧紧搂在自己胸口。

他心里充满了柔情。

“卡佳！”他说，“这种游击战我们全部都要按照另一种方式来进行了。一切的一切都要按照另一种方式，”他脱出她的拥抱，非常激动地说，“噢，我心里是多么痛苦啊！……为了那些牺牲的人心痛，是我们的无能造成了他们的牺牲。不过他们总不至于全部都牺牲了吧？我想，大多数都可以冲出来吧？”他这样问着，仿佛在寻找支持。“没有关系，卡佳，没有关系！我们在人民中间还可以找到成千上万像纳烈日内、像玛尔法那样的人，可以找到千千万万！……不！这个希特勒可以把整个德意志民族弄得稀里糊涂，可是我却不信，他能骗得过伊凡·普罗庆柯，——办不到，那是不可能的！”普罗庆柯愤怒地说，他没有觉察他说的已经是乌克兰语，虽然他的妻子卡佳是俄罗斯人。

第三十章

就像肉眼看不见的地下水，在树根和草根下面，在土壤底下，沿着土地的裂缝和空隙毫无声息地不断渗向各个方向那样，在德国人统治下，千百万居住在我国土地上的各个民族的男女老幼，走过草原，顺着林中小道、山径和峡谷，走过陡峭的河岸，沿着城乡的大街小巷，穿过闹市和黑夜的峡谷，从一个地方向另一个地方移动。

有的人被赶出故乡，有的人重返故乡，有的人要找寻不会被人认出来的地方，有的人穿过战线到自由的苏维埃土地上去，有的人突围而出，有的人逃出德国俘虏营或是集中营，有的人仅仅是迫于贫困出来寻衣觅食、有的人（游击队员、地下工作者、在敌后从事破坏活动的人、鼓动员、敌后侦察员、伟大人民的撤退了的伟大军队的侦察员）拿起武器同压迫者斗争，——他们不住地走着，走着，像砂子一样难以胜数……

在太阳底下，有一个身材矮小、面色红润的人从顿涅茨河那边沿着草原上的大路走过来。他一身普通的农民打扮，留着深黄色的柔软的农民式的胡子，肩后背着一个粗麻袋。像他这样行路的人，有成千上万……怎么能认得出他是什么人呢？他有一双蓝眼睛，但是你总不能去细看每个人的眼睛，而且光看眼睛又怎能看得出一切呢？也许，这双眼睛里跳动着魔里的火星，可是遇到宪兵队里的骑兵军士先生甚至宪兵队里的骑兵上士先生的时候，它们就成了最普通的人的眼睛。

这个身材矮小、留着深黄色胡子、一身农民打扮的人走进伏罗希洛夫格勒城，就消失在街头的人群里面。他进城来干什么？也许，他的麻袋里装的是牛油、或是乳渣、或是鸭子，拿到市场上来换些钉子、棉布或是食盐吧？也许，这就是普罗庆柯本人，这个可怕的人物甚至能够破坏卫戍司令部第七处顾问舒尔茨博士的政权！……

在小矿城郊外，靠近通向草原的一条又窄又暗的山沟上端，在一所木头房子里，在唯一的那扇窗上有被子遮着的房间里，在点着小油灯的桌旁，坐着两个人：一个已经中年以上，脸上的肉沉重地往下坠着，另一个是精力充沛的青年，暗金色睫毛底下的眼睛睁得大大的。

在这一老一少的身上，有着共同的东西，它甚至表现在：他们俩在这样的深夜，在被德军占领的这些不幸的日子里，还穿得引人注目地整洁、还打着领带。

“你们要培养因为我们的故乡顿巴斯而感到自豪的感情。你记不记得我们老一辈的同志们——阿尔焦姆①、克里姆·伏罗希洛夫、巴尔霍明柯——是怎样斗争的？”上年纪的那个人说，他的严厉的眼睛里反射出来的好像不是这暗淡的灯光，而是那些早已过去的战斗的光辉。“你记得吗？你能不能把他们的事迹讲给青年们听听？”

①阿尔焦姆（真名：费多尔·安德烈耶维奇·谢尔盖耶夫，1883—1921），一九〇五年参加共产党，一九〇五和一九一七年革命的积极参加者，顿巴斯革命运动的组织者。

青年坐在那里，天真地把头偏向比右肩略高的左肩。

“我记一记得……我能一能讲。”他略微有些口吃地回答。

“什么是我们顿巴斯的光荣呢？”上年纪的那个人接着说，“不管我们是多么困难，无论是在国内战争时期，是在以后的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以及现在的战争时期，我们始终都光荣地履行我们的天职。你要使青年们对这一点有深刻的感受……”

上年纪的那个人停了一下。青年尊敬地望着他，没有作声。上年纪的那个人接下去说：

“你们要记住：警惕性——是地下工作之母……你看过电影《恰巴耶夫》吧？”他问的时候没有带笑容。

“看过。”

“恰巴耶夫为什么会牺牲？他牺牲是因为他的巡逻队睡着了，让敌人逼近了。要时刻警惕，不管是黑夜或是白天，要严格认真……索柯洛娃·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①你认识吗？”　　①俄罗斯人习惯，姓放在前面表示郑重。

“认识。”

“你怎么认识她的？”

“她以前和妈妈一起做妇女工作。现在她们也很要好……”

“不错……凡是只有你我两人应该知道的事，都由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来传达。至于普通的联系——都通过奥西摩兴，像今天一样。我们以后不能再见面……”接着，刘季柯夫似乎要防止青年露出委屈的或是难受的表情，再不然就是抗议的表情，突然对他高兴地微笑着。

但是奥列格脸上并没有露出任何一种这样的感情。刘季柯夫对他表现了这样的信任，——居然让他到自己家里来，而且还是在城里戒严的时候，——这使奥列格心里充满了骄傲和无限的忠诚。他咧开嘴巴稚气地笑着，也高高兴兴地说道：

“谢谢！”

一个谁也不认识的青年，蜷缩着身子睡在草原的洼地里；太阳晒着他，他的衣服上冒出蒸气。他从河里爬上来在草上留下的湿印已经被晒干了。如果夜里他连湿衣服也不脱就倒在草原上睡着了，足见他泅水过河时一定累坏了！

但是太阳刚开始灼人，青年就醒来继续上路了。他的浅色头发晒干了，自然而然地就现出了天然的、漂亮的波纹。第二夜他在一个矿村里的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家投宿，他们看在他差不多是同乡的份上，留他过了一宿：他说他家在克拉斯诺顿，在伏罗希洛夫格勒念书，现在要回家去。然后，他就在大天白日公开地走进克拉斯诺顿。他不知道他父母的情况，也不知道家里有没有德国人住着，所以他先去找他的同学沃洛佳·奥西摩兴。

沃洛佳家里住过德国人，现在已经走了。

“席尼亚！……你从哪儿来的？”

但是沃洛佳的这位同学却带着他平时那副有些倨傲和冷淡的腔调说：

“你先告诉我，你现在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这是沃洛佳的老同学，共青团员叶夫盖尼·斯塔霍维奇，对他不必隐瞒，——当然，这不是指组织方面，而是在谈到个人的看法和心情方面，——于是沃洛佳就把有关他个人的一切都对斯塔霍维奇说了。

“唔……”斯塔霍维奇说，“这很好。我料想你也不会改变……”

他说这话的时候带着几分鼓励的口吻。但是，他大概是有资格这样说

的。他跟沃洛佳一样，不仅渴望参加地下斗争，——沃洛佳因为要保密，只说渴望参加，——他已经在游击队里打过仗，而且，据他说，是游击队司令部正式派他来的，准备在克拉斯诺顿也组织这项工作。

“好极了！……”沃洛佳怀着敬意说，“我们应当马上去看奥列格……”

“这个奥列格是个什么人？”斯塔霍维奇自尊地问，因为沃洛佳是怀着极大的敬意说出奥列格的名字。

“老兄，这个小伙子很了不起！……”沃洛佳含糊地说。

不，斯塔霍维奇不认识奥列格。不过如果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青年，那又为什么不去看看他呢？

一个态度非常严肃、身穿便服而有军人风度的人，在鲍尔茨家门口轻轻地敲门。

只有小刘霞一个人在家。妈妈拿了些东西到市场上去换食物去了，而华丽雅……不，家里还有爸爸，但这正是最可怕的事。爸爸戴着黑眼镜，一眨眼就躲进了衣橱。刘霞的心紧揪着，她装出一副大人的神气走到门口，尽量壮着胆问道：

“谁啊？”

‘华丽雅在家吗？”门外有个男人的声音问道，这是个悦耳的男高音，但有些忸怩。

“她不在家……”刘霞悄悄地等候着。

“您开开门，别害怕，”那个声音又说，“跟我说话的是谁？”

“刘霞。”

“刘霞？华丽雅的妹妹吗？您开开门，别害怕……”

刘霞开了门。台阶上站着一个她不认识的、身材高大匀称的、彬彬有礼的年轻人。刘霞把他当作是成年人。他的眼睛很和善，非常严肃的脸上透出一股英勇的气概。他眼睛里带着笑意望着刘霞，举手对她行了个礼。

“她一会儿就会回来吗？”他很有礼貌地问。

刘霞欣然接受了这个敬礼。

“我不知道。”她仰起脸来望着他的脸，说道。

他脸上露出了失望的神气。他默默地站了一会，后来又举手行了个礼。他刚照军人的姿势向后转过身去要走，刘霞连忙问道：

“有什么话要我转告吗？”

他眼睛里霎时间露出嘲弄的神情，说：

“请您告诉她，就说未婚夫来了……”

他说完就跑下了台阶。

“您马上就要走吗？她怎么去找您呢？”刘霞非常激动，在他后面急忙说道。

但是她的声音太胆怯而且说得太迟了。他已经走远了，沿着“木头街”向过道口那面去了。

华丽雅有了未婚夫……这使刘霞很激动。这件事当然不能告诉爸爸。这件事对妈妈也讲不得。“我们家里谁也不认识他！……但是，也许他们还不准备结婚吧？”刘霞安慰看自己，想道。

几个年轻人——两个几乎还像男孩子的青年和两个姑娘——在草原上散步。在这种绝对没有人散步的可怕的时候，为什么会有两个青年和两个姑娘在草原上散步呢？他们散步的时间是在平常日子里的工作时间，地点离城

老远。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散步并没有人禁止。

他们是一对一对地散步。一个青年长着微鬈的硬发，赤着脚，动作灵活敏捷，跟他一块的姑娘皮肤晒得黑黑的，打着两条金色的辫子，裸露着的手脚上都覆着柔毛；另外一个青年个子矮小，浅色头发，脸上有雀斑，跟他一起的姑娘样子文静，衣着朴素，眼睛里透出一副聪明样子，她叫安托妮娜·马什谦柯。这两对有时离得老远，有时又聚在一处。他们从早到晚一直在不知疲倦地散步，在耀眼的太阳底下晒得口渴难忍。那个线头发的青年脸上的雀斑被晒得好像多出了两倍。他们每次回到碰头地点的时候手里和衣袋里都带着东西：子弹、手榴弹，有时是一支德国步枪、一支手枪、一支俄罗斯式步枪。这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因为他们散步的地方是在上杜望纳雅车站附近，撤退的红军曾在这个地区进行过最后的激战。他们不是把这些武器交给德军卫戍司令部，而是把它们搬到小树林旁边一个隐蔽的地方埋起来。但是没有人看见他们。

有一次，那个带头的、动作敏捷的小伙子找到一个装着炸药的地雷，就当着那个梳两条金色辫子的姑娘的面，用他的灵巧的手指异常精确地取出里面的炸药。

毫无疑问，这一带一定有许多地雷。所以他要教会大家怎样取出地雷里的炸药。将来地雷也会有用处。

梳两条金色辫子的姑娘到黄昏才回家，皮肤晒得很黑，疲倦而又兴奋，——这种情形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刘霞瞅空把她拉到小花园里，眼睛在黑暗中闪烁着，用低得可怕的声音把未婚夫的事告诉她。

“什么未婚夫？你尽瞎说些什么呀？”华丽雅有点狼狈，生气地说。

一种想法是，这也许是德国人派来的密探，还有一种相反的想法是，布尔什维克地下组织知道华丽雅的活动，所以派人来寻找她。这两种假定很快都被推翻了。虽然华丽雅满脑子都装满冒险小说，像塞满了炸药的地雷那样，她本质上却像她们这一代人一样，是个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人。她在脑子里把所有认识的人一个个回想，忽然恍然大悟了。去年春天……戏剧小组在列宁俱乐部举行告别演出，——欢送凡尼亚①·杜尔根尼奇进塞瓦斯托波尔高射炮兵学校。他扮演未婚夫，华丽雅扮演未婚妻……“未婚夫”！……唔，当然是他！

①凡尼亚是伊凡的小名。

凡尼亚·杜尔根尼奇！他平时总是扮演滑稽老头的角色。当然，这里不是莫斯科艺术剧院。凡尼亚说：“我的目的是要让从第一排到末一排的观众都笑得流眼泪。”这一点他是完全做到了。不管他演什么，演《可怜的女人》①也好，演《初次约会》②也好，他总化装成老园丁达尼雷奇的模样。可是凡尼亚是在前线呀，他怎么会来到克拉斯诺顿的呢？他是一个红军中尉。去冬他被派到斯大林格勒去重新学习使用高射炮打坦克的时候，曾到城里来过。

①乌克兰作家卡尔片柯－卡雷（1845—1907）的剧本。

②乌克兰作家瓦西尔钦柯（1878—1932）的剧本。%%%“你总是这样，妈妈，这跟你有什么关系？我只是不想吃晚饭！”华丽雅说了就跑出去找奥列格去了。

凡尼亚·杜尔根尼奇到克拉斯诺顿了！

一个个子矮小、皮肤白皙的姑娘在一片无垠的土地上跋涉。她已经穿过整个波兰和整个乌克兰，像数不清的人群的砂土中的一颗砂粒，像一颗失散的种籽……她就这样走到五一村，敲着一所小房子的窗。

“如果你看到伊凡卓娃家两姊妹里有一个是白白的，那么这两姊妹就是伊凡尼兴娜家的……”

在前线杳无音信的李丽亚·伊凡尼兴娜回到老家来了。

这个消息，邬丽亚是从玛雅·毕格里万诺娃和莎霞·庞达烈娃那里听到的。李丽亚，善良快活的李丽亚，她们这一伙人的灵魂，她们中间第一个离开家庭和女伴的人，第一个投身到这个可怕的、斗争的世界的人，一去没有音信、已经被埋葬而又复活的人，回来了！

她们三个朋友——纤瘦的、举动像男孩子的莎霞，像茨冈姑娘那样肤色浅黑的玛雅（她的饱满的下唇自尊地撅着，她一向很积极，甚至在德国人统治下也还保持着纠正别人和教育别人的习惯），还有梳着两条有波纹的黑辫子的邬丽亚（她的辫子垂到胸前，贴在德国兵光临过他们家之后几乎是她唯一留下来的那件蓝底白点的家常衣服上），——她们三个朋友就一直奔向住在离学校不远的村中心的伊凡尼兴家。

村里已经一个德国人都没有了，在这里奔跑甚至感到很异样。姑娘们心里充满自由之感，不自觉地变得活泼起来。邬丽亚的黑眼睛开始发亮，脸上露出了快活的、在她是非常难得的顽皮的微笑，而且这个微笑好像立刻在她朋友们的脸上和周围的一切东西上面都得到了反映。

她们刚跑到学校跟前，一扇校门上贴的一幅色彩鲜明的宣传画就投入了她们的眼帘。姑娘们都不约而同地一口气跑上台阶。

宣传画上画着一个德国家庭。一个面带笑容的中年德国人，戴着帽子，围着工作围裙，穿着条子衬衫，打着蝴蝶领结，手里拿着一枝雪茄。一个浅黄头发、也是面带笑容、显得年轻的胖胖的妇人，戴着软帽，穿着粉红色衣服，身边围绕着一群不同年龄的孩子，从两腮鼓鼓的一岁光景的胖小子起，一直到金发蓝眼睛的大姑娘。他们站在一所高瓦顶的农舍的门口，屋顶上有几只大嗉囊的鸽子在嬉戏。这个男子、这个妇人以及所有的孩子，都笑眯眯地迎着一个手提白搪瓷桶向他们走来的姑娘，最小的孩子还伸出了小手。这个姑娘穿着鲜艳的无袖女衫，围着镶花边的白围裙，戴着跟女主人一样的软帽，穿着雅致的红鞋。她生得很丰满，鼻子高高地翘起，面色红润得不自然。她也笑着，露出雪白的大牙。这幅画的远景是晾麦棚、高高的瓦顶上有鸽子嬉戏的畜栏、一角蓝天、一片麦穗累累的麦田和畜栏旁边几头肥大的花母牛。

宣传画的下面用俄文写着：“我在这里找到了安身的地方，也找到了家。”右下角写着：“卡佳”。

在城里驻有德国兵的期间，邬丽亚、玛雅和莎霞相互之间特别接近起来。如果她们哪一家住着德国兵，另外一个朋友的家里却空着，她们甚至就互相借宿。但是在整个这段时间里，她们仿佛根据默契，彼此都不涉及她们生活中最重大最主要的问题——在德国人统治下怎样生活的问题，觉得谈这个问题的时机还不成熟似的。所以现在，她们也只是交换了一下眼色，默默地走下台阶，又同样默默地向伊凡尼兴家走去，彼此望也不望一眼。

两姊妹中的妹妹东妮亚，快活得容光焕发，从小屋里跑出来迎接她们。东妮亚生着大鼻子和一绺绺浓密的深栗色头发，两条长腿还不像少女的腿，但又已经不是小女孩的腿了。

“姑娘们！你们听到消息了吗？天哪！我是多么高兴啊！”

她一开口，眼睛里就泪汪汪的。

满屋子都是姑娘们。其中最引邬丽亚注目的是新近回来的伊凡卓娃姊

妹，奥丽雅和妮娜，她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看见她们了。

但是李丽亚是怎么啦！她生着浅色的头发和一双非常善良的、快乐的眼睛，一向都像个奶油面包似的，又白、又干净、又软、又圆。现在她站在邬丽亚面前，拱腰驼背，两只胳臂软弱无力地贴着干瘪的身子耷拉着。苍白的小脸上是一层不健康的晒黑的颜色，脸上只有瘦削的大鼻子显得很惹眼，还有那双眼睛看起人来还带着原来的善良的表情……不，也不是原来那样了！

邬丽亚默默地、猛地一下搂住李丽亚，把她的小脸紧压在自己胸口，久久不肯放开。可是等李丽亚抬起脸来望着邬丽亚的时候，脸上并没有露出温柔或是感动的表情。她的善良的眼睛里带着恍惚而疏远的神情，仿佛她的经历使她和童年的朋友疏远了，她们的普通的、日常的感情已经不能引起她的共鸣，不管这些感情是表现得多么真挚和多么强烈。

莎霞抢过李丽亚，拉着她就在房间里旋转起来。

“李丽卡！这真是你吗？……李丽卡，好朋友，我的宝贝！你怎么这么瘦！可是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我们会让你吃得胖胖的。你不知道，你来了我们是多么幸福，李丽卡，你是我们的幸福！”莎霞表达感情的方式是率直的、急遽的，她一边说一边拉着李丽亚在房间里旋转。

“你把她放下吧！”玛雅自尊地撅起她的饱满的、任性的下唇，笑着说。她也搂住李丽亚，把她吻了一阵。“讲吧，讲下去吧！”玛雅马上说。

李丽亚在椅子上坐下来，姑娘们都走过来把她团团围在中间。李丽亚就用平静的、低低的声音继续讲下去：

“不错，我们跟男人在一起是不方便，但是我很高兴他们没有把我和我们一营的弟兄们拆散，这使我不单是高兴，简直感到幸福。要知道，撤退的时候我们一路上都是一块走的，不知牺牲了多少人啊……你们知道，姑娘们，看到自己人牺牲、心里总是非常难受。特别是到后来每个连队里只剩下七八个人，每个人的名字你都叫得出来，那时候，每个人都像亲人，有一个牺牲，你心里就像剜掉一块肉……我记得，去年我受了伤，他们把我送进哈尔科夫一所很好的医院，可是我心里老是挂念着：‘唉，我不在，他们在营里不知怎么样了？’我天天给他们写信，他们也都写信给我，有的单独写，也有集体写的，可是我老在想：‘几时才能见面，几时才能见面呢？’后来让我去休假，假满后有可能把我调到另一个部队里，我就去请求司令，结果他把我安插到我们的梯队里……在哈尔科夫，我总是步行，因为有一次乘电车碰到一件事使我非常伤心。我看见，我们还有人互相推搡，互相辱骂，我不是为我自己，而是为他们伤心，——我的眼泪流出来了，像我这样一个军人还要流眼泪，真是不好意思，——我心里突然为这些人感到气愤和遗憾。我心里想：‘要是你们知道，我们前线每天都有人牺牲，不声不响、二话不说地牺牲了；要是你们知道，他们是怎样互相关心，而不是关心自己；要知道，这就是你们的丈夫、父亲和儿子……你们只要想到这一点，你们就不会这样态度粗暴，互相侮辱，你们就会彼此让路，说最亲切的话，如果无意中得罪了什么人，就会安慰他，抚摸他的脑袋……’”

她这样讲的时候用的是平静的、低低的声音，她的眼睛仿佛不是望着她的朋友，而是透过她们眺望着遥远的地方。她们都安静下来，身子倾向她，发亮的眼睛一直盯着她，听着她讲。

“我们在俘虏营就住在露天地里。下雨的时候，我们在雨里直哆嗦；给

我们吃的尽是菜皮麸子汤，要不就是土豆皮煮的汤，可是干的是挖路的重活。我们的弟兄们像蜡烛融化那样消瘦下去。日子一天天过去，好多人都死了。我们妇女们，”李丽亚说的是“我们妇女们”，而不是“我们姑娘们”，“我们妇女们总算比男人支持得长久一些。那边有个小伙子，是我们营里的费迦中士，我跟他很好，非常要好。”李丽亚轻声说，“他老是打趣我们妇女，说：‘你们姊妹们身体里有储备。’有一回，要把我们赶到另外一个俘虏营去，他实在支持不住，押送的兵士就把他枪杀了。但是他没有马上就死掉，他还活了一会，我走过的时候他一直望着我，可是我已经不能拥抱他、亲吻他了，因为不然他们也会把我打死……”

李丽亚接着讲述他们怎样被赶到另一个俘虏营里，那个俘虏营里管妇女的是一个名叫葛特鲁德·葛贝希的德国女监工，这个母狼把姑娘们折磨得要死。李丽亚讲述，她们这些妇女商量好，不是自杀，便是干掉葛特鲁德·葛贝希。有一天夜里，她们在树林里干完活回来时骗过了卫兵，埋伏着，等葛特鲁德·葛贝希一出来，就用军大衣蒙住她，把她闷死了。然后，她们几个妇女和姑娘就逃跑了。但是她们不能一同走过整个波兰和乌克兰，只好各奔前程。李丽亚吃尽千辛万苦，只身跋涉几百几千公里，先是波兰人，后来是我们的乌克兰人掩护她，给她吃的。

这一切都出自李丽亚之口，——她以前跟她们大伙一样，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克拉斯诺顿姑娘，一个白白胖胖的善良的小姑娘。很难想象，就是她，闷死了葛特鲁德·葛贝希，后来又靠这双青筋突露的小脚走过德国人占领的波兰和乌克兰全境。这使每个姑娘都想到自己：“要是这一切临到我的头上，我能不能挺得住，我将怎样行动呢？”

她还是以前的李丽亚，但是她已经变了。不能说，她的经历使她变成了硬心肠，她没有在朋友们面前炫耀自己，也没有自高自大。不，她已经备尝生活的辛酸。在某种意义上她待人接物甚至更善良，好像她懂得了人的价值。虽然她肉体上和精神上似乎都有些枯萎，但是人类的这种伟大的善良的光辉却照亮了她的消瘦的脸庞。

姑娘们都又来亲吻李丽亚，每人都想抚摸她或者至少也要触碰她一下。只有年纪比较大的大学生舒拉①·杜勃罗维娜，态度比别人都矜持，她因为玛雅跟李丽亚亲热，已经在妒忌了。

①舒拉是亚历山德拉的小名。

“姑娘们，每个人都是泪汪汪的，这像什么话呢！”莎霞叫起来。“我们来唱一个歌吧！”

她本来要唱《黑黝黝的山岗睡不醒》，但是姑娘们马上嘘她：村里住的人良莠不齐，而且也可能有“警察”偶然走过。她们想挑选一支古老的乌克兰歌谣，东妮亚建议唱《土窑》这支歌。

“这是我们喜欢的歌，好像又没有什么错可挑。”东妮亚羞怯地说。

但是大家觉得，心里本来已经够憋闷的，唱这支《土窑》更会使大家大哭起来。于是五一村的姑娘里面的主要歌手莎霞就唱起了：

晚霞中有一青年，
他徘徊在我家门前，
那青年呀闭口无言，
单把目光向我闪一闪……

大家都跟着唱起来。这支歌里没有什么可以使“警察”听了刺耳的东西。但是姑娘们常在收音机里听到心爱的皮雅特尼茨基合唱团演唱这支歌。

正因为她们常常收听到莫斯科广播的这支歌，她们现在仿佛是随着这支歌从五一村到莫斯科去了。

姑娘们从小过惯的那种生活，对她们说来就像云雀生活在田野里那样自然的生活，现在随着这歌声又进入这个房间。

邬丽亚在伊凡卓娃姊妹旁边坐下，但是正唱得高兴的姐姐奥丽雅只是亲热地使劲握住邬丽亚的胳膊，她的眼睛里仿佛燃着蓝色的火焰，使她那容貌不端正的脸甚至变得美丽起来。

妮娜带着挑战的神气从两道有力的、弯弯的眉毛下面四面打量着，突然向邬丽亚低下头来，热情地凑着她的耳朵说：

“卡苏克问你好。”

“哪一个卡苏克？”邬丽亚也低声问道。

“奥列格。对我们说来，”妮娜郑重地说，“从现在起，他以后一直就叫卡苏克。”

邬丽亚望着前面，感到困惑。

姑娘们唱着歌，变得活跃起来，脸上也现出了红晕。她们是多么希望能够忘掉——哪怕就在这一刹那——围绕着她们的一切，忘掉德国人、“警察”，忘掉她们要到德国人的职业介绍所去登记，忘掉李丽亚经历的苦难，忘掉她们的母亲已经在家里着急，女儿怎么老不回来！她们是多么希望一切都能像以前一样！她们一支唱完，又唱一支。

“姑娘们，姑娘们！”李丽亚忽然用她的低低的、动人的声音说，“我关在俘虏营里的时候，和后来我夜里赤着脚、挨着饿走过波兰的时候，我不知有多少次想起我们的五一村，想起我们的学校和你们大伙儿，想起我们怎样聚在一块，唱着歌走到草原上去……这到底是为了谁，又是为了什么要把这一切都破坏、踩烂的呢？他们这批家伙在世界上到底还嫌有什么不满足呢？……邬丽亚！”她忽然说，“你念首好诗给我们听吧，记得吗，像从前……”

“念什么呢？”邬丽亚问。

姑娘们七嘴八古地说出邬丽亚喜爱的诗，这些诗她们不止一次听她朗诵过。

“邬丽亚，你就朗诵《恶魔》①吧。”李丽亚说。

①俄国诗人莱蒙托夫（1814—1841）的长诗。

“朗诵《恶魔》的哪一段呢？”

“随你便。”

“让她全部都朗诵吧！”

邬丽亚站起身来，从容地把手臂垂在两旁，既不矜持，也不忸怩，带着不会写诗也不会在舞台上朗诵诗的人们所固有的大方自然的朗诵姿态，用沉着流畅的低沉的声音开始了：

悲戚的恶魔，谪放的精灵，
飞翔在罪恶的大地上空，
美好的日子的回忆，
在他面前纷至沓来……
在那些日子，他渴求智慧，
透过永恒不散的云雾，
观察散布在太空的

天体的运行；
在那些日子，他这个造物的幸运的长子，
还在信仰，还在热爱！……

真是怪事，就像姑娘们唱过的那些歌曲一样，邬丽亚朗诵的诗立时也获得了活生生的、重大的意义。仿佛姑娘们现在注定要过的那种生活与世上创造出来的一切美好事物——不管这些事物的性质和它们是在什么时候创造出来的——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而长诗中对恶魔又像同情、又像谴责的说法，既符合姑娘们的心情，又同样感动她们。

古往今来
人类的一切沉痛的
贫困、操劳和不幸，
比起我的哪怕是片刻的无人承认的
痛苦，又算得了什么？

邬丽亚朗诵着。而姑娘们也感到，世界上的确是没有人在像她们那样受苦。

这时天使已经展开他的金色的翅膀背起塔玛拉①的罪恶的灵魂，而地狱的精灵却从深渊里向他们升起。

消逝吧，怀疑的阴郁的精灵！
邬丽亚朗诵着，双手平静地垂在身旁。
……考验的日子已经过去；
连同尘世易朽的衣服
罪恶的枷锁也从她身上落下。
你要知道，我们等待她已经很久了！
有些人的一生只是
难以忍受的痛苦
和难以达到的欢乐的一瞬，
她的灵魂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个……
她用惨痛的代价
赎出了自己的一切怀疑……
她曾痛苦过，也曾热爱过——
于是天国为爱情打开了大门！

①塔玛拉是《恶魔》中的女主人公。

李丽亚把她的生着浅色头发的头埋在手里，像孩子般放声大哭起来。姑娘们百感交集，都跑过来安慰她。她们生活在其中的那个可怕的世界又进到屋里来了，仿佛又毒害了她们中间每一个人的灵魂。

第三十一章

自从阿纳托里·波波夫、邬丽亚·葛洛莫娃、维克多·彼得罗夫和他父亲疏散不成回到克拉斯诺顿的那一天起，阿纳托里就不住在家里，而是躲在波高烈莱庄的彼得罗夫家里。德国人的行政机构还没有深入到村里，彼得

罗夫一家在那里行动还很自由。

德国人离开后，阿纳托里才回到五一村。

妮娜转告他和邬丽亚，要他们——最好是城里不大有人认识的邬丽亚——马上跟奥列格建立联系，拟出一批可靠的、愿意跟德国人斗争的五一村男女青年的名单。妮娜暗示说，奥列格不仅是以个人的名义行动；她还传达了他的几点劝告：跟每一个人个别谈话，不要说出其他人的姓名，当然，也不要说出奥列格，不过要让对方明白，他们并不是以个人的名义行动。

后来妮娜走了。阿纳托里和邬丽亚就走到把他们两家的园子隔开的小峡谷的斜坡上，在一棵苹果树下坐下。

暮色降临到草原上和花园里。

波波夫家的园子被德国人糟蹋得相当厉害，特别是樱桃树，好多结了樱桃的树枝都被折断，但是园子外表上还是那么整洁、舒适，像他们父子俩一同管理的时候一样。

阿纳托里的一位热爱本行的自然科学老师，在阿纳托里从八年级升到九年级的时候赠给他一本关于昆虫的书：《梨树上的害虫》。书已经很旧，缺了头几页，因此无从知道它的作者。

在波波夫家的花园门前，耸立着一棵很老很老的梨树，比那本书还要老，阿纳托里对这棵树和这本书都非常喜爱。

苹果树是波波夫一家的骄傲，秋天苹果快熟的时候，为了防止顽童们来偷苹果，阿纳托里总是搭个铺睡在花园里。要是碰到下雨不得不睡在屋里，他就安装一套信号装置：用细绳拴住苹果枝，细绳的那头接在从花园里拉进窗口的绳子上。只要碰到一棵苹果树，就会有一串空罐头哗喇喇地掉到阿纳托里的床头，他就会光穿一条裤衩冲到园里去。

现在他和邬丽亚坐在这个花园里，态度严肃，聚精会神，充分感觉到自从和妮娜谈话之后他们已经走上了新的生活道路。

“邬丽亚，我们从来没有好好地谈过心，”阿纳托里说，由于靠近她而有些局促不安，“但是我早就尊重你。我想，现在是时候了，我们应该坦白地谈一谈，把自己心里的话都谈出来……我想，如果认识到正是你和我才能担负起把五一村的男女青年组织起来的工作，这并不是夸大我们的作用，或是骄傲自大。所以我们应当首先决定我们自己准备怎样生活……比方说，职业介绍所正在进行登记。我个人是不准备去职业介绍所。我不愿意也不准备替德国人做事。我对你起誓，我决不离开这条路！”他用沉着有力的声音说，“如果必要，我可以隐蔽起来，躲起来，我可以转入地下，但是我死也不会离开这条路！”

“托里亚，你还记得在我们的箱子里乱翻东西的那个德国上等兵的手吗？那双手是那么脏，尽是老茧，抓住东西就不肯放，现在我好像一直看见这双手就在眼前，”邬丽亚轻轻地说，“就在我回来的头一天，我又看到这样的手，它们在我们的床上和箱子里乱翻，它们把母亲的、我的和姐姐的衣服剪成他们的三角围巾，它们甚至在没有洗过的脏衣服里翻找也不嫌脏，而且它们还想挖到我们的灵魂里来……托里亚！我有好几夜坐在我们家的小厨房里睡不着觉，——你知道我们家的厨房跟正房完全是隔开的，——我坐在漆黑的厨房里，听着德国人在屋子里大喊大嚷，逼着我的生病的母亲侍候他们。我这样坐了不止一夜，我在检查我自己。我一直在想：我有没有足够的力量？我有没有权利走上这条路？后来我想通了，我没有别的路。是的，我只能走这

条路，不然我就根本无法生活。我拿我的母亲起誓，我只要有一口气，我决不离开这条路！”邬丽亚的乌黑的眼睛望着阿纳托里，说。

邬丽亚和阿纳托里都深深激动。好一会工夫他们谁也没有作声。

“我们来计划一下，先跟谁谈，”阿纳托里抑制住激动，嗄声说，“我们从姑娘们开始，好吗？”

“当然要有玛雅·毕格里万诺娃和莎霞·庞达烈娃。当然还有李丽亚·伊凡尼兴娜。跟着李丽亚的还有安东妮娜。我想还有安格林娜·萨莫欣娜、妮娜·盖拉西莫娃。”邬丽亚一个一个地举出名字。

“那么我们的那个积极分子呢？啊，她叫什么来的，——

就是那个少先队辅导员。”

“是维丽柯娃吗？”邬丽亚脸上露出了冷冷的神气。“你知道，我有话要告诉你。在艰苦的日子里，我们往往会对这件事或那件事发表激烈的意见。但是每人心里一定要有一样神圣的东西，对这种神圣的东西，就像对自己的母亲一样，是不能嘲笑的，不能无礼地带着讥笑来议论的。可是维丽柯娃这种人……谁知道她是什么样的？……我反正是不信任她……”

“那就放一放吧，我们将来再仔细考察考察。”阿纳托里说。

“那还不如要妮娜·米纳耶娃呢。”邬丽亚说。

“那个浅色头发的胆小的姑娘吗？”

“你不要这样想，她不是胆小，她是怕羞，其实她有着非常坚定的信念。”

“那么亚历山德拉·杜勃罗维娜呢？”

“她的事，我们去问问玛雅。”邬丽雅笑了。

“你听我说，你为什么不提你最要好的朋友瓦丽雅·费拉托娃呢？”阿纳托里忽然惊奇地问。

邬丽亚半晌没有作声，阿纳托里也看不出她脸上反映出什么样的感情。

“是的，她是我最好的朋友，我还是那样爱她，谁也没有像我那样了解她的心地是多么善良，但是她不能走上这条路，她太软弱，我怕她只能做牺牲品。”邬丽亚说，她的嘴唇和鼻翼似乎微抖了一下。“那么小伙子里面有哪些人呢？”她问，似乎想转移话题。

“小伙子里面，当然有维克多，我已经跟他谈过。你既然提出莎霞·庞达烈娃，当然你是提得对的，那么就该有她的哥哥瓦西里。当然还有叶夫盖尼·谢毕辽夫和符拉箕米尔·腊高静……此外，我想，还有鲍利斯·葛拉万，你知道他吗？就是从比萨拉比亚疏散过来的那个摩尔达维亚小伙子……”

他们就这样一个一个地挑选着他们的男女同伴。已经残缺、却还很大的月亮悬在树后，发出红光，园中浓密而分明的树影纵横交错，整个大自然充溢着令人不安的神秘气氛。

“住在我们两家的德国人都走了，这是多么幸福啊！我看见他们就来气，特别是现在。”邬丽亚说。

邬丽亚自从回来以后，就单独住在跟一排边屋相连的那个巴掌大的小厨房里。现在她点亮灶上的油灯，眼睛望着前面，在床上坐了一会。她单独面对着自己和自己的一生，像一个人在精神上作出重大决定的时刻那样，极端坦白地正视自己的灵魂。

她在床前蹲下来，从床底下拖出一只手提箱，再从箱底的内衣下面摸出一本破旧不堪的漆皮簿面练习本。她从上次离家以来，就不曾摸过它。

第一页上字迹模糊的铅笔字，好像是全部内容的题词，它本身就说明

了为什么邬丽亚要有这样一个本子以及这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

在人的一生中往往有一个决定他今后精神命运的时期，那时他的精神发展发生转变。据说，这个转变要到少年时代才会到来。这不对：对许多人说来，它在美妙的童年时代就已经到来了。

（波米亚洛夫斯基①）　　①波米亚洛夫斯基（1835—1863），俄国作家，重要作品有《神学校随笔》。

看到她在几乎还是儿童时代就记下了这样符合她目前精神状态的东西，她怀着惆怅、愉快、而又惊奇的心情随便挑选着读下去：

在战役中，必须善于利用每一分钟并且具有当机立断的能力。

有什么东西能够对抗人的坚强意志呢？意志包含着整个灵魂，包含着种种愿望——就是说，要恨、要爱、要怜悯、要高兴、要生活，总之，意志是每一个人的精神力量，是要创造或是破坏某种东西的自由的憧憬，是能从无中创造奇迹的创造力！……

（莱蒙托夫）

我惭愧得恨不得钻到地里去。惭愧啊，惭愧，——不，还不止是惭愧，——嘲笑别人穿得不好是可耻的！我甚至记不起，我是什么时候养成这个习惯的。可是今天对妮娜·米的这件事——不，我甚至不能写……不管我想起什么，都要使我脸红，使我全身发烧。我甚至跟李兹卡·乌接近起来，因为我们常常一块嘲笑穿得不好的人，可是她的父母……这一点不必写，总之她这个人太坏。可是今天，我这样傲慢地，正是傲慢地把妮娜嘲笑了一顿，甚至把她的上衣从裙子里拉出来，可是妮娜说……不，我不能重复她的话。但是凭良心说，我从来没有过这么坏的思想。这件事的发生是因为我希望生活中的一切都是美丽的，可是结果却完全相反。我简直没有想到，有很多人还过着穷困的生活，特别是妮娜·米，她总是被人欺侮的……我发誓，妮诺奇卡，我以后永远不再这样，永远不再这样了！

接下去显然是第二天加上去的铅笔字：“那么你去请她宽恕，是的，是的，是的！……”

翻过两页，上面写着：

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是应当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①（尼·奥斯特洛夫斯基）

这个米·尼毕竟是可笑的！当然，我不讳言，我（有时）喜欢跟他一起玩。而且他跳舞跳得很好。但是他太喜欢强调自己的军衔和夸耀自己的勋章，而这一点正是我根本不在乎的。昨天他提起我早已料到但是又极不愿意听的话……我把他嘲笑了一顿，一点也不可怜他。至于他说他要自杀，那是撒谎，是他的卑鄙作风。他胖得要命，他应该上前线去，背着枪行军。我决不同意，决不，决不！……

我们谦逊的指挥官中最勇敢的指挥官，我们勇敢的指挥官中最谦逊的指挥官——我所记得的柯托夫斯基②同志就是这样的。

愿他的英名和光荣永垂不朽！（斯大林）　　①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1904—1936）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名句。

②柯托夫斯基（1881—1925），苏联国内战争英雄，红骑兵的优秀指挥员之一。

邬丽亚一直低头翻阅她学生时代的练习本，后来她听见边门轻轻地响

了一下，什么人的小脚轻盈地跑过小院来到厨房门口。

没有敲门，门就打开了，瓦丽雅两眼发直地跑到邬丽亚跟前。她跪倒在泥地上，把脸埋在邬丽亚的膝头上。

她们半晌没有开口，邬丽亚感到瓦丽雅的胸部在起伏不停，心在怦怦地跳。

“你怎么啦，我亲爱的瓦丽雅？”邬丽亚轻声问道。

瓦丽雅仰起脸来，湿润的嘴半张着。

“邬丽亚！”她说。“他们要把我赶到德国去。”

瓦丽雅虽然深深厌恶德国人和他们在城里的所作所为，可是看见德国人却怕得要命。从他们进城的第一天起，她就一直在担心，生怕随时会有什么祸事临到她或是她母亲的头上。

要大家到职业介绍所登记的命令公布之后，瓦丽雅一直没有照这个命令去做，因此她觉得自己是一个走上对抗德国政权的道路的罪犯，终日等待他们来逮捕她。

这天早上，她去市场的时候碰到几个已经去登记过的五一村人：他们正去上工，去修建一个小矿井，五一村地区有不少这样的小矿井。

那时瓦丽雅羞于向邬丽亚承认自己的软弱，就偷偷地瞒着她去登记。

职业介绍所设在山岗上一座白色平房里，离区执委会不远。有几十个年轻人和中年人，主要是妇人和姑娘，排队站在门口。瓦丽雅老远就在队列中认出了五一村学校的同班同学维丽柯娃。瓦丽雅根据她矮小的身材、好像是贴上去的光滑的头发和两条向前翘着的又短又尖的小辫，认出是她，就走到她跟前，想排在前面一些。

在战争的岁月里，人们得花不少的时间排队——排队领面包、排队领食品、排队领食品券，甚至在被动员参加后方劳动的时候也要排队。那时候，每个人都竭力想排在前面些，如果有人利用熟人关系或是利用职位不排队，大家就会争吵不休。但是，这并不是那种队列。

这是排队去德国人的职业介绍所，谁也不抢先到那里去。维丽柯娃用她那双彼此靠得很近的凶狠的眼睛对瓦丽雅默默地望了一眼，就让她站在自己前面。

队列移动得相当快，——两个两个地进去。瓦丽雅把手帕包着的公民证捏在出汗的手里，按在胸口，和维丽柯娃一同走进去。

在办理登记的房间里，正对门放了一张长桌，桌子后面坐着一个肥胖的德国上等兵和一个脸色非常娇嫩红润、下巴长得特别的俄罗斯妇女。瓦丽雅和维丽柯娃都认得她：她在克拉斯诺顿的好几个学校里——也包括五一村学校——教德语。说来也奇怪，她的姓也是聂姆庆诺娃①。

①聂姆庆诺娃的字根是从“德国女人”（俄语音译“聂姆卡”）来的。

姑娘们向她问了好。

“啊……我的学生！”聂姆庆诺娃说，她垂下深色的长睫毛，不自然地笑了笑。

房间里的打字机嗒嗒地响着。左右两边的门口都排着不长的队。

聂姆庆诺娃询问了瓦丽雅的年龄、父母的姓名和住址，把它们记录在一张长长的表格上。同时她又把所有这些材料翻译给德国上等兵听，于是他再把这一切用德文记录在另一张表格上。在聂姆庆诺娃问她的时候，右面的房间里有人出来，又有人进去。突然瓦丽雅看见一个眼泪汪汪的年轻妇女，

头发蓬乱，脸憋得通红。她急急地穿过房间，一只手扣着上衣的钮扣。

这时聂姆庆诺娃又向瓦丽雅问了什么。

“您说什么？”瓦丽雅目送着那个头发蓬乱的年轻妇女，问道。

“你身体健康吗？没有什么毛病吗？”聂姆庆诺娃问。

“不，我很健康。”瓦丽雅说。

维丽柯娃忽然在后面拉拉她的衣服，等瓦丽雅回过头去，维丽柯娃的那双彼此靠得很近的眼睛却冷冷地望着她的身旁了。

“去见所长！”聂姆庆诺娃说。

瓦丽雅机械地转到右面的队列，又回过头来望望维丽柯娃。维丽柯娃正在机械地回答那些同样的问题。

所长办公室里静悄悄的，只是偶尔从门后传来简短的、不很响亮的德语吆喝声。在询问维丽柯娃的时候，从所长办公室里走出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他慌慌张张，脸色苍白，也是边走边扣着制服的钮扣。

这时瓦丽雅听到矮小的维丽柯娃用她那刺耳的声音说道：“您自己知道，奥丽迦·康斯坦丁诺芙娜①，我有肺病——呐，您听见吗？”维丽柯娃说了之后，就像表演似的对着聂姆庆诺娃和大胖子德国兵呼吸起来，上等兵朝椅背上一靠，眼睛像公鸡眼似的睁得滚圆，惊奇地望着维丽柯娃。维丽柯娃的胸部果然呼哧呼哧地响起来。“我需要家里人照顾，”她丝毫不以为耻地望望聂姆庆诺娃，又望望上等兵，接下去说，“但是如果城里有工作，我就会很高兴，非常高兴！不过我恳求您，奥丽迦·康斯坦丁诺芙娜，给我一个脑力方面、文化方面的工作。我会很高兴在新秩序下面工作，很高兴！”

①奥丽迦·康斯坦丁诺芙娜是聂姆庆诺娃的名字和父名。

“我的天哪，她怎么讲得出这种话？”瓦丽雅怀着剧跳的心走进所长办公室的时候这样想道。

她面前站着一个穿军服的、脑满肠肥的德国人。他的油光水滑的灰红色头发从当中分开。他上身虽然穿着军服，可是下面却穿着黄皮短裤和棕色袜子，裸露的膝盖上的汗毛像羊毛一样。他草草地、冷漠地打量了瓦丽雅一眼，就叫道：

“把衣服脱掉！把衣服脱掉！”

瓦丽雅孤立无援地朝四下望了一望。房间里只有一个德国文书坐在桌子后面，他旁边放着一叠叠旧的公民证。

“把衣服脱掉，听见吗？”那个德国文书说的是乌克兰语。

“怎么？……”瓦丽雅满脸都涨得通红。

“怎么！怎么！”文书模仿着她的声调说，“把衣服脱下来！”

“快些！①快些！”裸露着毛茸茸的膝盖的军官吆喝着。突然，他把手伸到瓦丽雅面前，用那洗得干干净净的、也是长着红毛的、骨节粗大的手指扳开瓦丽雅的牙齿，朝嘴巴里望了一望，就动手来解她的衣服。

瓦丽雅由于恐惧和受辱哭了起来，她急忙动手脱衣服，可是内衣越急越脱不下来。

军官来帮她脱。她脱得只剩鞋子。德国人草草地把她打量了一下，嫌恶地摸摸她的肩膀、大腿、膝盖，接着，转过脸去对着文书，仿佛他是在给兵士检查体格似的，简短地说道：

“合格！②”　　①②　原文为德语。

“公民证！”文书并不望着瓦丽雅，伸出手来，叫道。

瓦丽雅用衣服遮着身子，啜泣着把公民证递给他。

“住址！”

瓦丽雅说了。

“把衣服穿起来。”文书把她的公民证朝一堆公民证里一扔，阴沉地低声说，“什么时候去集合站，会通知你。”

瓦丽雅到了街上才清醒过来。烈日当空，照着房屋、满是尘土的大路和被晒枯的草地。

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下雨。周围的一切都被晒坏了，晒干了。热空气摇曳着。

瓦丽雅站在大路当中没到脚踝的厚厚的尘土里。她忽然呻吟了一声，就倒在尘埃里。她的衣服像气泡似的鼓了起来，又瘪下去。她把脸埋在手掌里。

维丽柯娃使她清醒过来。她们从耸立着区执委会大厦的山岗上走下去，经过民警局，穿过“八家宅”，回到五一村去。

瓦丽雅觉得身上一会儿发冷，一会儿又出大汗。

“你这个傻瓜，真是个傻瓜！”维丽柯娃说，“你这真叫活该！……你要知道，这是德国人啊，”维丽柯娃怀着敬意，甚至是谄媚地说，“应该知道怎么去迎合他们！”

瓦丽雅和她并排走着，并没有听见她的话。

“唉，你啊，真是个傻瓜！”维丽柯娃愤愤地说，“我不是给你递了个暗号吗？应该让他们明白，你愿意在这里帮助他们，他们很赏识这一点。还应该说：身体不好……那边委员会里的医生是市立医院的娜塔丽雅·阿列克谢耶芙娜。她给每个人都会批一个‘免’或是‘不完全合格’，那边的德国人只是个医士，屁也不懂。傻瓜，真是个傻瓜！他们已经把我派在以前的牲畜采购办事处工作，还发给口粮……”

邬丽亚的第一个动作是对瓦丽雅表示怜惜。她搂住瓦丽雅的头，开始默默地吻她的头发和眼睛。后来脑子里就产生了搭救瓦丽雅的计划。

“你应该逃走，”邬丽亚说，“是的，是的，逃走！”

“可是往哪儿逃呢，我的天哪！往哪儿逃呢？”瓦丽雅一筹莫展，同时又急躁地说，“我现在什么证件都没有了！”

“我的好瓦丽雅，亲爱的，”邬丽亚温柔地低声说，“我懂得，周围都是德国人，不过这究竟是我们的国家，它大得很，周围的人也还是和我们一起生活过的那些人，办法总会有的！

我来帮助你，青年们和姑娘们也都会帮助你。”

“那么妈妈呢？你怎么能这样说，邬丽亚！他们会把她折磨死的！”瓦丽雅哭了起来。

“你这个人真是，你别哭呀！”邬丽亚气愤地说。“要是你被赶到德国去，你以为她心里会舒服些吗？难道她就受得了吗？”

“邬丽亚……我的好邬丽亚……你为什么还要折磨我？”

“你说的话叫人听了真反感，这……这简直可耻、可恶……我瞧不起你！”邬丽亚硬起心肠说，“是的，是的，我瞧不起你这种窝囊劲儿，瞧不起你的眼泪……周围不知有多少苦难，不知有多少人，多少壮健、有力、优秀的人在前线、在法西斯的集中营里、在刑讯室里牺牲。你想想，他们的妻子、母亲的心里是什么滋味？但是她们照样在工作、斗争！可是你年纪轻轻的，所

有的道路都随你走，又有人愿意帮助你，你反而哭哭啼啼，还要别人可怜你。我是不会来可怜你的，是的，是的，不可怜你！”邬丽亚说。

她猛然站起身来，走到门口，背着双手抵着门站着，乌黑的眼睛里含着愤怒望着前面。

瓦丽雅把脸埋在邬丽亚的床上，默默地跪着。

“瓦丽雅！我亲爱的瓦丽雅！……你回忆一下，过去我们是怎样相处的吧。我的宝贝！”邬丽亚突然说，“我的宝贝！”

瓦丽雅嚎啕大哭起来。

“你回忆一下吧，我有没有劝你干过什么坏事？你记得吗，有一次是为了几只李子，还有一次游泳的时候你嚷着游不到岸上，我说我要亲手把你淹死？亲爱的瓦丽雅！我求求你……”

“不，不，你已经抛弃了我！是的，你上次动身的时候，你心里就丢弃了我，从此我们中间就没有什么友谊了。你以为我没有感到这一点吗？”瓦丽雅痛哭着，非常激动地说，“可是现在呢？……现在我在世界上完全是孤零零的……”

邬丽亚没有回答她。

瓦丽雅站起身来，并不望着邬丽亚，用手帕擦了擦脸。

“瓦丽雅，我是最后一次对你说，”邬丽亚冷冷地轻声说道，“要么就是你听我的话，我们马上去唤醒阿纳托里，他会把你送到波高烈莱，到维克多家里去，要么就是……你别让我伤心。”

“永别了，亲爱的邬丽亚！……永别了……”瓦丽雅忍住眼泪，从小厨房里跑到浴着月光的院子里。

邬丽亚几乎忍不住要跟在后面去追赶她，不断亲吻她那整个不幸的、泪痕纵横的脸庞。

她吹熄油灯，打开小窗，和衣在床上躺下。她毫无睡意。她倾听着草原上和村里传来的夜晚的隐隐约约的声响。她老是觉得，她在这里躺着，可是德国人已经到了瓦丽雅家里，要把她带走，临别的时候已经没有人来对可怜的瓦丽雅说几句安慰她、鼓励她的话了。

突然，她觉得似乎听到软软的泥地上有脚步声，菜园里的叶子也簌簌地响着。脚步声越来越近，来的似乎不止一个人。应该钩上门，关上窗，但是沙沙的脚步声已经到了窗下，窗口现出了一个白发上戴着乌兹别克小帽的头。

“邬丽亚，你睡了吗？”阿纳托里轻声问道。

邬丽亚已经到了窗前。

“出事了，”阿纳托里说，“维克多的父亲被抓走了。”

邬丽亚看见了维克多的脸，他走近窗前，月光照在他的脸上，他的眼睛蒙着一层阴影，苍白的脸上露出刚毅的神情。

“什么时候抓走的？”

“今天晚上。来了一个德国人，一个党卫队员，穿着黑衣服，人胖胖的，镶金牙，浑身臭气，”维克多恨恨地说，“跟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个兵士和一个‘警察’，那个‘警察’是俄罗斯人……他们打了他。然后把他带到林场办事处，那边停着一辆卡车，装满了被捕的人，他们把所有被捕的人都送到这儿来了……我跟在卡车后面整整跑了二十公里……要是你前天不走，说不定他们也会把你抓去。”维克多对阿纳托里说。

第三十二章

舒尔迦自从被投入监狱以来，已经过了不少昼夜，他根本记不清日期了。他的牢房里几乎整天都是黑的，只有天花板下面的一条窄缝里可以射进一点光线，窄缝外面装着带刺铁丝，又被屋檐半遮着。

舒尔迦感到自己是孤独的、被大家遗忘了的。

有时候，有些妇女，做母亲的或是做妻子的，好容易求得德国宪兵或是俄罗斯“警察”里的什么人的同意，让她们把食物和内衣转交给被捕的儿子或丈夫。但是舒尔迦在克拉斯诺顿没有亲人。除了刘季柯夫和康德拉多维奇老头之外，他接近的人里面没有人知道他留在克拉斯诺顿做地下工作，没有人知道关在这间牢房里的无名的叶夫多金·奥斯塔普楚克就是舒尔迦。他懂得，刘季柯夫也许根本不知道他出了什么事，即使知道，也没有门路来跟他联系。所以舒尔迦并不指望刘季柯夫的帮助。

唯一跟他发生关系的是那些折磨他的人，这就是那些德国宪兵。他们里面只有两个人会说俄语：一个是满头黑发的、骨头突出的小脑袋上戴着库班皮帽的德国翻译，另外一个是两个拳头就像两只马蹄、穿着镶黄条的肥大的老式哥萨克马裤的“警察队长”索里柯夫斯基——关于这个人可以这样说，他比所有的德国宪兵都坏，如果还有可能比他们更坏的话。

舒尔迦从被捕的最初一刻起就不隐瞒他是个在党的人，是个共产党员，因为隐瞒这一点是无益的，同时也因为这种坦白和实话会给他增强力量，使他可以跟折磨他的人进行斗争。

不过他只说自己是个普通干部。但是折磨他的那些人哪怕再笨，也能从他的举止仪表上看出这是谎话。他们要他供出他的同谋。因此他们不能也不愿意把他弄死了事。宪兵站长勃柳克纳或是副宪兵站长巴尔德每天要审问他两次，希望通过他来破获克拉斯诺顿的布尔什维克组织，借以向本州的最高野战司令官克列尔少将邀功。

他们一遍一遍地审问舒尔迦，要是他把他们惹火了，他们就打他。但是更多的时候他们是派党卫队分队长芬庞来拷打他。芬庞是个嗓门像村妇、镶金牙、戴浅色玳瑁边眼镜、有点秃顶的胖军士。这个军士身上臭气熏人，连副宪兵站长巴尔德和宪兵站长勃柳克纳闻了都要皱鼻子，要是他靠他们太近，他们就会对他冷嘲热讽。芬庞军士完全冷漠地拷打和折磨这个不但上了绑、而且还有几名兵士抓着的舒尔迦。他打人有一套办法，很熟练。这是他的职业，他的工作。当舒尔迦不受审而待在自己牢房里的时候，芬庞军士就不去碰他，因为他对没有上绑、也没有兵士抓着的舒尔迦是害怕的，同时还因为这不是芬庞的工作时间，而是他的休息时间，这时他总待在专门拨给他和他的兵士们用的监狱院子的门房里。

但是不管他们怎么折磨舒尔迦，不管这种折磨拖得多长，他的态度总是毫不改变。他还是那样不听摆布，暴躁倔强，大家都被他弄得筋疲力尽，总之，他只会使他们感到麻烦。

舒尔迦的表面生活尽管是在这样绝望到无可挽救、单调得令人痛苦的

状况下度过，他的精神生活却格外紧张而深刻。像一切正直的、清白的人面临死亡时那样，他现在正以明察秋毫的力量和异常老实的态度来观察自己和自己的一生。

他以极大的毅力排除杂念，不去想念妻子儿女，以免心肠发软。但是他却怀着更大的温情和热爱想到就在这儿城里离他不远的他青年时代的朋友——李莎·雷巴洛娃和康德拉多维奇。使他伤心的是，甚至连他的死，在他们眼里也许可以洗刷他的过错的死，他们都不会知道。是的，他已经知道，他是为什么进了这个黑暗的牢房；他痛苦，因为他意识到已经铸成大错，他甚至无法向人们解释他错在哪里，好让自己的心灵可以轻松一些，使别人不致重蹈他的覆辙。

有一次白天，舒尔迦早晨被提审之后正在牢房休息，他听到牢房外面有人在放肆地谈话，牢门带着凄楚的声音打开了，牢房里走进了一个人，戴着“警察”臂章，武装带上挂着一个拖着黄带子的沉甸甸的手枪皮套。在走廊里值班的那个留小胡子的德国宪兵站在门口。

舒尔迦已经习惯黑暗，转眼之间他就看得清清楚楚：进来的那个“警察”还非常年轻，差不多是个孩子，黑头发，一身黑制服。他看不清楚舒尔迦，有些手忙脚乱，又竭力要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他慌慌张张地转动着小野兽般的眼睛四下打量，忙得全身摆动。

“现在你也进了兽笼了！现在我们要把门关上，让你尝尝滋味。进去吧！”小胡子宪兵说了几句德语，哈哈大笑起来，就在那个年轻“警察”背后砰的把门关上了。

舒尔迦在漆黑的地上略微抬起身来，“警察”迅速地朝他弯下身子，他的黑眼睛里射出的惊慌的、锐利的目光使舒尔迦感到震动。他低声说：

“您的朋友在等待机会。下星期夜里您等着，事先我会通知你……”

一转眼，“警察”又挺直身子，脸上露出一副蛮横的神气，声音含糊地说：

“你吓不了我……对吗？……我可不是那种人……该死的德国鬼子！”

德国兵大声笑着把门打开，快活地高声说了一句什么。

“哈，吃到苦头了吧？”年轻“警察”在舒尔迦面前摇晃着瘦削的身子，说。“算你运气，我是个老实人，而且不认识你……哼，你这个家伙！”他突然叫了一声，把一只细瘦的胳膊挥动了一下，轻轻地推了推舒尔迦的肩膀，又用指头在他肩膀上按了一下，就在这轻轻的一按里面，舒尔迦又感到了一种亲切的意味。

“警察”出了牢房，门砰的关上了，钥匙在锁孔里响了一声。

当然，这可能是圈套。不过他已经落进他们的魔掌，他们随时都可以弄死他，那又何必要来这一套呢？这可能是试探要取得他信任的第一招，希望舒尔迦在适当的条件下会把这个“警察”当自己人，来向他暴露自己。难道他们真以为他会这么天真吗？

于是舒尔迦心里突然产生了希望，血液在他的饱受折磨的勇士般的身体里奔腾起来。

就是说，刘季柯夫还活着，并且在活动？就是说，他们在那边还惦记着他？他怎么能有其他的想法呢！……

战友们对他的关怀使他产生的感激、重又产生的可以搭救家人的希望、可能摆脱折磨和焦虑的喜悦——这一切都在他心里汇成一个要斗争、要活下

去的强有力的召唤。于是他，这个怀着内疚的高大的中年汉子，想到自己可以活下去并且还能履行自己的职责的时候，喜悦的热泪不禁在心头沸腾。

隔着板门和墙壁，他日夜都可以听到监狱的全部生活。他听到人们被带进带出、受着折磨、在墙外的院子里被枪杀。有一天夜里，他被牢房里和走廊里的喧闹声、谈话声、脚步声、宪宾和“警察”的德语和俄语的吆喝声、武器的磕碰声、妇女和孩子的啼哭声吵醒了。

这给人的印象是在把人从监狱里提出去。又听到卡车的摩托吼叫着，一辆跟着一辆从院子里开走。

果然，第二天中午舒尔迦被提审经过走廊的时候，他觉得监狱里已经空了。

这天夜里第一次没有人来打扰他。他听到有一辆卡车开到监狱门前，接着，宪兵和“警察”们压低嗓门咒骂着，好像彼此感到惭愧似的，匆匆地把抓来的人分别送进牢房。人们默默地、沉重地拖着腿在走廊里走过。整夜都有被捕的人送来。

舒尔迦被叫起来去受审问的时候，离天亮还有很久。这次带他出去没有给他上绑，所以他明白，这一次不会拷打他。果然，他们没有把他带到和其他牢房并排的专设的刑讯室里，而是把他带进宪兵站长勃柳克纳的办公室。舒尔迦看到勃柳克纳只穿着衬衫，露出了裤子的背带（办公室里闷热不堪，他的军官制服挂在圈椅上），副宪兵站长巴尔德全身军装，另外还有翻译舒尔卡·雷班德和三个穿鼠皮色军服的德国兵。

门外响起沉重的脚步声，头戴老式哥萨克帽的“警察队长”索里柯夫斯基怕把头碰到门框，低着头走进办公室。在他后面，舒尔迦看到一再折磨过他的芬庞军士和几名党卫队兵士抓着一个脸上多肉而威严的高大的中年汉子。那人的家服被剥掉一半，光着脚，双手反绑着。舒尔迦认得这是他的同乡彼得罗夫，这位同乡是一九一八年游击斗争的参加者，他们已经有十五六年没有见过面了。彼得罗夫显然已经很久没有光脚走过路，他的脚受了伤，连在地板上走都感到疼痛，他的多肉的脸上到处青一块紫一块的。从舒尔迦最后一次看见他以来，他老得并不多，只是肩膀宽了一些，腰围粗了一些。

他的态度阴沉，但是很有尊严。

“你认识他吗？”宪兵站长勃柳克纳问。

舒尔卡·雷班德向舒尔迦翻译了这句话。

彼得罗夫和舒尔迦都装出彼此是初次见面的样子。在审问的时候他们始终都保持着这种态度。

宪兵站长勃柳克纳对板着脸、光着脚默默站在他面前的彼得罗夫吆喝道：

“哼，你撒谎，撒谎，你这个老狐狸！”他拚命跺着他的擦得雪亮的皮鞋，连他的低低下坠的肚子都在不住地跳动。

后来索里柯夫斯基就挥动着大拳头殴打彼得罗夫，直到把他打倒在地为止。舒尔迦恨不得向索里柯夫斯基扑过去，但是内心的声音告诉他，这样做反而会害了彼得罗夫。此外，他觉得现在到时候了，他最好能保持双手不被捆绑起来。所以他克制着自己，鼻翼翕动着，默默地望着彼得罗夫遭受毒打。

后来他们俩都被带走了。

这一次舒尔迦居然没有挨打，但是他亲眼目睹的事情却使他极度震动，

以致在这一昼夜之内的军二次审问的末尾，连他那样强壮的身体都支持不住了。舒尔迦不记得他是怎样被带回牢房的，他完全陷入了昏迷不醒的状态。是门上钥匙的转动声又使他脱离这种状态。他听到门口的喧闹声，但是不能清醒。后来他仿佛觉得门开了，有人被推进他的牢房。舒尔迦使劲睁开眼睛。一个留着乌黑的茨冈式胡子、乌黑的眉毛连在一起的人弯着腰站在他面前，打算要看清楚舒尔迦的脸。

这个人没有认出舒尔迦，不知是因为他从亮的地方到了漆黑的牢房不习惯黑暗呢，还是舒尔迦已经变了样。但是舒尔迦马上认出了他：这是一位同乡，也是一九一八年战争的参加者，新一号井井长瓦尔柯。

“安德烈……”舒尔迦轻声说。

“马特维吗？这真是命运啊！命运！……”

瓦尔柯用急遽而又猛烈的动作搂住欠起身来的舒尔迦的肩膀。

“我们想尽方法要救你出来，想不到命中注定我自己也落到了你这里……来，让我看看你，”过了一会瓦尔柯用沙哑刺耳的声音说。“他们把你折磨成这样！”瓦尔柯放开舒尔迦，在牢房里来回踱着。

他的天生的茨冈人般的急躁性情仿佛苏醒了，或是牢房却这么小，所以他真像是一只关在笼子里的猛虎。

“看样子，你也挨了打了。”舒尔迦平静地说，说完抱着膝盖坐了起来。

瓦尔柯满身是土，上装的一只衣袖扯掉了一半，一条裤腿在膝盖处撕破了，另一条裤腿也开了绽，前额上有一道横的伤痕。不过他仍旧穿着靴子。

“看样子，你是打过架了？……跟我一样。”舒尔迦设想着这一切的经过，高兴地说，“好，别胡思乱想了。坐下，讲讲那边的情况……”

瓦尔柯盘腿在地上坐下，面对着舒尔迦，他的手碰到肮脏滑腻的地板，不禁皱起眉头。

“当惯了负责干部，对这个不习惯了。”他说的是自己，又苦笑了一声。“对你讲什么呢？工作，我们的工作，正常地进行着。唔，只是我……”

突然，这个大老粗整个的脸都痛苦得歪扭起来，使舒尔迦看了，背上不由起了一阵寒颤。瓦尔柯把手一挥，把自己的黑脸埋到手掌里。

第三十三章

从瓦尔柯和刘季柯夫之间建立起联系的那一天起，区里一切怠工和破坏活动的秘密线索就都交给了他，因为他非常熟悉克拉斯诺顿煤业联合公司各个矿井的情况。

巴腊柯夫工程师跟第十办事处、跟施维德本人、特别是跟施缩德的副手费耳德纳都很接近；费耳德纳跟他的沉默寡言的上级不同，喜欢随便乱讲。这使巴腊柯夫总能知道行政当局的经济措施，通过他又使瓦尔柯也知道这些情况。

在巴腊柯夫和费耳德纳照例的会面之后，过了几个小时，在克拉斯诺顿的街上就会突然出现一个谦逊文静、容貌不端正的脸被晒成古铜色的姑娘。一个局外人，哪怕是一个观察入微的人，也难以发现这二者之间有着什

么联系。这个谦逊的姑娘奥丽雅·伊凡卓娃把西红柿拿到一家去卖，又到另外一家去串门，可是过不多久，德国行政当局的一切美好的计划就都令人莫名其妙地化为泡影。

奥丽雅现在是瓦尔柯的联络员。

但是巴腊柯夫从费耳德纳那里听来的不仅是经济措施。本城宪兵队的官员不分昼夜地在施维德中尉家里饮酒作乐。他们自己之间随便说出的话，费耳德纳先生也都随随便便地照搬给巴腊柯夫听。

为了考虑用什么方法营救舒尔迦和其他关在克拉斯诺顿监狱里的人，刘季柯夫有好几宿夜不成寐。但是有很长一个时期，他都无法跟监狱里建立联系。

联系是凡尼亚·杜尔根尼奇设法建立起来的。

杜尔根尼奇出身于刘季柯夫非常熟悉的一个克拉斯诺顿的可敬的家庭。家长瓦西里·伊格纳季耶维奇是一个因为残疾而退休的老矿工。他的妻子费奥娜·伊凡诺芙娜是沃罗涅什省的已经俄罗斯化的乌克兰人。在一九二一年闹饥荒的时候，他们迁移到顿巴斯来。凡尼亚那时还是个吃奶的孩子。费奥娜·伊凡诺芙娜一路都抱着他，小姐姐就拉着母亲的衣裾步行。

他们一路上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到了米列罗沃，有一个合作社的工作人员留他们住宿。

这一对中年夫妇没儿没女，他们要求费奥娜·伊凡诺芙娜把婴儿送给他们抚养。父母起初动摇了，后来又变了主意，他们流了一阵眼泪，争吵了一阵，结果到底没有把他们的亲骨肉送给别人。

他们就这样历尽千辛万苦走到索罗金矿山，在这里安家落户。一直到凡尼亚长大了，已经快要毕业而且在戏剧小组里经常参加演出的时候，他的父母还喜欢讲给客人听，米列罗沃的合作社工作人员怎样要收养他们的儿子，可是他们没有把他送掉。

在德军突破南方方面军的日子里，反坦克炮炮兵连连长杜尔根尼奇中尉奉令死守阵地。

他在顿河卡拉奇区不断击退德军坦克的进攻，直到所有的炮手都失去作战能力，他自己也受伤倒地为止。他跟一些被打散的连队和炮兵连的残部一同被俘，一个德军中尉看他受了伤不能行动，对他开了一枪，但是他没有被打死。一个哥萨克寡妇对杜尔根尼奇悉心护理了两个星期。他回家的时候衬衫底下还交叉地裹着绷带。

凡尼亚·杜尔根尼奇通过他在高尔基学校的两个老同学阿纳托里·柯瓦辽夫和瓦西亚·庇罗若克，跟监狱里建立起联系。

要想再找到一对在外貌和性格上比这两个老同学更为不同的朋友，恐怕是很困难的。

柯瓦辽夫是一个力大无比的小伙子，像草原上的橡树那样敦敦实实，行动迟缓，为人善良到天真的地步。他从小就立志要做一个著名的举重运动员，尽管他追求的姑娘常拿这一点取笑他，他也不在乎。她说，在体育界，站在最高梯级上的是棋手，举重运动员是站在最低一级，比举重运动员再低的就是变形虫了。他的生活很有规律，不喝酒，不抽烟，冬天也不穿大衣，不戴帽子，每天早上在冰窟窿里洗澡，每天练习举重。

而庇罗若克却是瘦削灵活，性情急躁，一双热情的乌溜溜的眼睛好像小野兽的眼睛一般。姑娘们喜欢他，他也喜欢她们。他爱打架，如果说他对

哪一项运动感兴趣的话，那就只有拳击。一般地说他喜欢冒险。

杜尔根尼奇悄悄地派他的已经结婚的妹妹到庇罗若克家去借唱片，她就把庇罗若克连唱片一起拖来了，而庇罗若克又拖来了他的好朋友柯瓦辽夫。

过了不多久，他们俩居然带上 A 字臂章，在一个佩淡蓝肩章的德国中士的领导下，跟着一排“警察”在公园附近的空地上练习起他们的新的专门技能来——这使克拉斯诺顿的全体居民，特别是直接认识柯瓦辽夫和庇罗若克的年轻人感到极大的愤慨。

他们的专职是维持市内秩序。派给他们的差事是在市政府、第十办事处、区农业指挥部、职业介绍所和市场上值岗，夜间在各个地段巡逻。“警察”臂章是信任他们可以跟德国宪兵来往的标志。所以庇罗若克不仅打听出舒尔迦关在哪里，甚至钻到他的牢房里去，让他知道战友们在设法营救他。

营救！计谋和行贿在这里都用不上。要救出舒尔迦和其他的人只有用劫狱这个办法。

区地下组织对这样的战斗行动已经能够胜任了。

这时候组织里已经补充了好些红军军官，他们就是以前躺在克兹斯诺顿医院里的伤员，由于谢辽萨、他姐姐娜佳和助理护士鲁莎的努力而被救出来的。

杜尔根尼奇一出现，刘季柯夫在地下区委下面建立起来的青年小组就获得了战斗的领导人——这里“战斗的”这个词是按它的直接意义讲的，那就是指军事方面的领导。

逢到有战斗行动，地下区委就要变成一个司令部，区委领导人巴腊柯夫和刘季柯夫也要相应地变为部队的指挥员和政委；他们希望把青年的组织也照这样建立起来。

在八月的这些日子里，巴腊柯夫和刘季柯夫一直都在准备组织一支战斗队伍去劫狱。杜尔根尼奇和奥列格受他们的委托，也在挑选一批青年去参加这次战斗行动。杜尔根尼奇和奥列格吸收了万尼亚·捷姆奴霍夫、谢辽萨·邱列宁、刘巴·谢夫卓娃和已经上过火线的叶夫盖尼·斯塔霍维奇来协助工作。

尽管邬丽亚一心急于执行她的新任务，她也非常了解尽快跟奥列格见面的意义，但是她还是非常不习惯对父母撒谎，同时家务事又忙得要命，因此她跟维克多和阿纳托里谈话之后，直到第二天傍晚才抽空去看奥列格，偏偏奥列格又不在家。

冯·文采尔男爵将军和他的司令部东移了。给邬丽亚开门的是柯里亚舅舅，他马上认出了她，但是她觉得，他们虽然在一起饱经患难，而且又有这么久没有见面，可是他看到她非但没有露出高兴的样子，甚至态度也不很亲切。

维拉外婆和叶列娜·尼柯拉耶芙娜都不在家。玛丽娜和奥丽雅面对面坐在椅子上缠毛线。

玛丽娜一看见邬丽亚，就丢下毛线卷，一边高兴地叫着，一边跑过来把她搂住。

“我亲爱的邬丽亚！你到哪儿去啦？这批坏蛋真该死！”她高兴得眼睛里涌出了泪水说，“你看，我把上衣拆了，打算给儿子织一套小衣服。我想，上衣反正要被抢掉，小孩身上的衣服也许不会来碰！……”

接着她开始回忆他们共同的旅途、孩子们在渡口遇难、保育院主任死

于空袭、德国人抢去她们的绸衣服等等。她说话还是那么快。

奥丽雅张开黧黑有力的胳膊绷着毛线。她脸上带着神秘的、在邬丽亚看来仿佛是惊惶不安的表情，眼睛眨也不眨，默默地望着前面。

邬丽亚认为不能说明她是来干什么的，她只说了维克多的父亲被捕的消息。奥丽雅没有改变姿势，迅速地朝柯里亚舅舅瞥了一眼，柯里亚舅舅也瞥了她一眼。邬丽亚突然明白，柯里亚舅舅的态度并不是不亲切，他是在为邬丽亚所不了解的一件事担心。于是邬丽亚突然也感到了一种模糊的不安。

奥丽雅仍旧带着那样神穆的表情稍微歪着嘴笑笑说，她和妮娜妹妹约好在公园附近会面，马上就可以一块儿回来。她这句话并不是对着某个人说的，说了就站起身来出去了。

玛丽娜只顾说话，毫不怀疑她周围发生了什么事。

过了一会，奥丽雅带着妮娜一起回来了。

“刚巧有几个伙伴提起你。我们要不要过去看看？我就给你介绍一下。”妮娜不带笑地说。

她默默地领着邬丽亚走过几条街道和几座院子，向城中心什么地方走去。她一路上都没有瞧过邬丽亚，她的圆睁着的褐色眼睛里带着恍惚而凶狠的神气。

“妮娜，出了什么事啦？”邬丽亚悄声问。

“他们大概马上就会告诉你。我什么都不能说。”

“你知道，维克多·彼得罗夫的父亲被捕了。”邬丽亚又说了一遍。

“是吗？这是可以料到的。”妮娜挥了挥手。

她们走进一所跟四周的房屋一样的标准式房屋。邬丽亚从没有来过这里。

一个身材魁梧的老头和衣半躺在一张宽阔的木床上，他的头埋在几个拍得鼓鼓的枕头中间，只露出宽大的额头、多肉的鼻子和浓密的浅色睫毛。一个骨骼粗大、皮肤晒得黄黑的瘦削的中年妇女，坐在床边的椅子上做针线活。两个年轻漂亮、光着大脚的妇女，闲着没事坐在窗前的长凳上；她们好奇地对邬丽亚望了一眼。

邬丽亚向她们问了好。妮娜很快地把她带到另一个房间里。

在这个大房间里，有几个年轻人和一个姑娘围桌而坐，桌上摆着冷盘、酒杯和几瓶伏特加。邬丽亚认出了奥列格、万尼亚·捷姆奴霍夫和在战争初期给五一村人做过报告的叶夫盖尼·斯塔霍维奇。有两个青年她不认识。那个姑娘是刘巴，就是邬丽亚在那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在她家门口看见的“女演员刘勃卡”。她们相遇的情景又非常鲜明地浮现在邬丽亚眼前，所以她在这里看见刘巴，不禁大吃一惊。但是在同一瞬间她全都明白了，对刘巴那一天的举动的真相，她也恍然大悟了。

妮娜把邬丽亚带进去之后，马上就退了出去。

奥列格站起来迎接邬丽亚，他有点窘，用目光给她找个坐的地方，然后咧开嘴对她笑了一笑。在邬丽亚即将知道一个不可理解的、令人不安的消息之前，这一笑突然使她感到极大的温暖……

在维克多的父亲被捕的那天夜里，城里和区里所有来不及撤退的党员几乎全部被捕，被捕的还有苏维埃机关干部、从事这种或那种社会活动的人、许多教员和工程师、著名的矿工和某些隐藏在克拉斯诺顿的军人。

这个可怕的消息一早就传遍全城。但是只有刘季柯夫和巴腊柯夫知道，

德国宪兵队的这次行动给地下组织造成了多大的损失，虽然这次行动并非由某人的失败所引起，而是由于德国人想防患于未然。“警察队”的“密网”里捕获到的人们里面，有许多人是要参加袭击监狱警卫队的。

奥丽雅和妮娜跑来找奥列格。她们的晒成古铜色的、瘦削的脸上透出来的苍白色霎时也传给了他。她们转达了康德拉多维奇的话，说安德烈叔叔夜里被捕了。

瓦尔柯躲藏的地方，除了康德拉多维奇之外，是无人知道的，可是却突然遭到搜查。事后才知道，他们要搜索的并不是瓦尔柯，而是女主人的已经撤退的丈夫。这件事发生在一所“小上海”式的房子里，进行搜查的福明马上认出了瓦尔柯。

据女主人说，瓦尔柯在被捕时态度镇定，但是后来福明打了他一记耳光，他突然发起火来，把这个“警察”打倒在地上。那时就有几个宪兵朝他扑过来。

奥列格让家里人陪着奥丽雅，自己跟妮娜跑去找杜尔根尼奇。无论如何必须见一见庇罗若克或是柯瓦辽夫。杜尔根尼奇叫他妹妹跑到他们两家去了一次，但是她打听得来的消息却叫人完全摸不着头脑，又叫人不安。据他们的父母说，他们俩昨天天一黑就出去了。可是过了一会，他们的同事“警察”福明就到他们家里来，打听他们可能在什么地方，他因为没有碰到他们，说话非常粗暴无礼。后来夜里他又来了一次，不住地说：“他们会有苦头吃的！……”柯瓦辽夫和庇罗若克快天亮才各自回家，都喝得烂醉。柯瓦辽夫是一向不喝酒的，这就格外令人奇怪了。他们对家里说，他们在一个卖私酒的女人家里喝了个通宵，家里把福明的那些恐吓的话转告他们，但是他们毫不理会，倒下去就睡。第二天早上来了几个“警察”，逮捕了他们。

奥列格通过妮娜把这一切通知了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索柯洛娃，要她一有机会就把这一切转告刘季柯夫。他们召集了谢辽萨、刘勃卡、万尼亚和斯塔霍维奇来开会。会议是在杜尔根尼奇家里开的。

邬丽亚走进去的时候，斯塔霍维奇和万尼亚正在争论，邬丽亚马上也被这场争论吸引住了。

“我不懂，这叫什么逻辑？”斯塔霍维奇说，“我们做了种种准备要营救奥斯塔普楚克，我们抓紧时间准备，搜集了武器，动员了年轻人，可是等安德烈叔叔和其他的人被捕了，那就是说时机更成熟，需要更迫切了，反而有人叫我们还要等待……”

斯塔霍维奇在青年中间的威信大概很高。万尼亚惶惑起来，用他那有点喑哑的低音问道：

“那你建议怎么办？”

“我建议至迟在明天夜里就劫狱。要是我们不空谈，一早就开始行动的话，今天夜里就可以劫狱了。”斯塔霍维奇说。

他发挥了他的意见。邬丽亚发现，从她战前在五一村共青团集会上听他做报告以来，他已经大大地改变了。虽然他那时就能灵活地运用像“逻辑”、“客观上”、“我们来分析一下”等等书本上的词汇，但是那时他的态度还没有这样自信。现在他说起话来不慌不忙，不做手势，昂着他那浅色头发自然地向后梳的头，瘦长的手捏成拳头放在桌上。

他的建议显然使大家吃惊，没有人敢马上回答他。

“你是在鼓动大家感情用事，无非就是这样……”万尼亚终于羞怯地、

但是声调非常坚定地说，“我们不必躲躲闪闪。虽然我们从来没有讲过这一点，但是我想，你一定也跟大家一样，充分了解我们并不是根据自己个人的倡议来让青年们去做这样严肃的工作。除非有新的指示，否则我们连动一动指头的权利都没有。这样不但救不了人，反而会再断送一批……事实上我们又不是小孩子！”他突然生气地说。

“我可不知道，也许是不信任我，所以没有全部告诉我。”斯塔霍维奇傲慢地抿起嘴唇。“我反正直到现在还没有接到过一个明确的战斗指令。我们老是等着，等着。一直要等到人们真的被杀害……要是他们现在还没有被杀死的话。”他态度生硬地说。

“我们大家都同样为他们难受，”万尼亚带着生气的声调说，“但是你难道当真以为我们自己的力量已经够强了吗？……”

“五一村人里面有没有勇敢忠诚的青年？”斯塔霍维奇老气横秋地直望着邬丽亚，突然向她问道。

“当然有。”邬丽亚说。

斯塔霍维奇一声不响地望了望万尼亚。

奥列格缩着脑袋坐在那里。他的大眼睛时而严肃地注视着斯塔霍维奇，又望望万尼亚，时而直望着前面，默默沉思，他的眼睛仿佛蒙上了一层薄膜。

谢辽萨低着头不作声。杜尔根尼奇没有参加争论，他目不转睛地望着斯塔霍维奇，好像在研究他。

这时刘勃卡坐到邬丽亚身边来。

“你认得我吗？”刘勃卡轻声问道，“你记得我父亲吗？”

“那是在我面前发生的……”邬丽亚把谢夫卓夫遇难的详情轻声告诉了她。

“唉，我们不知要经受多少苦难！”刘勃卡说，“你知道，我恨透了这批法西斯分子和‘警察’，我恨不得亲手杀了他们！”她说，眼睛里露出天真而残酷的神色。

“对啊……对啊……”邬丽亚轻声说，“有时我觉得心里充满了复仇的渴望，我甚至为自己担心起来。我怕我会做出什么轻率的举动。”

“你喜欢斯塔霍维奇吗？”刘勃卡凑着她的耳朵问道。

邬丽亚耸了耸肩。

“你知道，他太爱表现自己。不过他是对的。这样的青年当然能找得到，”刘勃卡说的时候想到谢尔格·列瓦肖夫。

“不过问题不光在有没有这样的青年，而在于谁来领导我们。”邬丽亚轻声回答说。

奥列格仿佛跟她约好似的，这时说话了：

“问题不在于青年人，勇敢的青年总是有的，整个问题全在于组织。”他用年轻响亮的声音说出这句话，比平时口吃得更厉害，大家都望了望他。“要知道，我们毕竟不是组织……我们是聚一聚集起来谈谈的！”他的眼睛里带着天真的表情。

“要知道，有党。我们怎能不受它的领导，不通过它，就自己行动呢？”

“本来就应该从这里谈起，不然倒变成我是在反对党似的。”斯塔霍维奇说，他的脸上同时露出了狼狈和懊丧的表情。

“直到现在我们都是跟你和凡尼亚·杜尔根尼奇发生关系，而不是跟党发生关系。你们至少可以跟我讲明白，你们召集我们来是为了什么？”

“这就是为了，”杜尔根尼奇说话的声音非常平静镇定，大家听了都转过头来向着他，“要使大家有所准备。你怎么知道今天夜里一定不会来叫我们呢？”他直望着斯塔霍维奇，问道。

斯塔霍维奇没有作声。

“这是第一。第二，”杜尔根尼奇接下去说，“我们不知道柯瓦辽夫和庇罗若克出了什么事。我们难道可以盲目行动吗？我从来不容许自己说弟兄们的坏话，但是万一他们出了问题呢？不跟被捕的人联系，我们怎么能随便采取行动呢？”

“这一点由我来负责，”奥列格急急地说，“他们的家属一定会送东西进去，可以给谁递一张字条——夹在面包里，或是瓶子里。我可以通过妈妈组织这件工作……”

“通过妈妈！”斯塔霍维奇鼻子里嗤了一声。

奥列格的脸涨得通红。

“可见你并不懂得德国人。”斯塔霍维奇带着轻蔑的口吻说。

“不应当迁就德国人，应当叫他们适应我们。”奥列格勉强克制住自己，避免望着斯塔霍维奇。“你—你的意见怎么样，谢辽萨？”

“最好是去劫狱。”谢辽萨不好意思地说。

“对啊……人力是有的，不用担心！”

斯塔霍维奇觉得有人支持，马上有了精神。

“我所以说，我们这里没有组织，也没有纪律。”奥列格满脸通红地说，说着就站起身来。

这时妮娜打开了门，庇罗若克走了进来。他鼻青脸肿，一只手也包扎着。

他那副样子非常痛苦，又那么怪，大家都不由朝着他欠起身来。

“你是在什么地方搞成这样的？”杜尔根尼奇沉默了一会之后问道。

“在‘警察队’里。”庇罗若克站在门口说。他的乌溜溜的、小野兽般的眼睛充满了孩子般的痛苦和狼狈的神情。

“那么柯瓦辽夫呢？你在那边没有看见我们的人吗？”大家都向庇罗若克问道。

“我们什么人都没有看到：他们把我们拉到‘警察队长’

办公室里揍了一顿。”庇罗若克说。

“你别装得像不懂事的孩子那样，把经过情形好好地讲一讲，”杜尔根尼奇没有提高嗓门，生气地说，“柯瓦辽夫在哪里？”

“在家里……在休息。可是有什么好讲的？”庇罗若克说，他突然发起火来。“白天，就在这次抓人之前，索里柯夫斯基把我们叫去，吩咐我们傍晚前带着武器到他那里去，他说要派我们去捉人，可是促什么人，他没有说。这是他第一次叫我们办事，至于是不是单派我们去，是不是大规模地捉人，这些我们当然都不知道。我们回家的时候心里就想：‘我们怎么能去捉自己人？我们一辈子也不能原谅自己！”我就对托尔卡说：‘我们上卖私酒的女人西纽哈那里去吧，喝醉了酒，就不去，事后就说我们喝醉了。’唔，我们考虑来考虑去——他们究竟会把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又没有嫌疑。大不了吃一顿耳光，把我们赶走了事。结果正是这样：把我们押了几个钟头，审问了一下，打了一顿耳光，就把我们赶出来了。”庇罗若克十分狼狈地说。

形势虽然严重，可是庇罗若克那副样子实在又可怜又可笑，总的说起

来，这一切又像孩子般地蠢笨，所以大伙的脸上都露出了尴尬的微笑。

“可是有—有的同志还以为他们能够袭—袭击德国宪兵队呢！”奥列格说的时候口吃得厉害，眼睛里露出了无情的、愤怒的神气。

他觉得对不起刘季柯夫：他第一次委托青年人做一件重大的工作，就发生了这么严重的幼稚轻率、无组织、无纪律的情况。他在同志们面前感到惭愧，因为他们大家对这件事都和他有同感。他对斯塔霍维奇的浅薄的自尊心和虚荣心感到愤慨，同时他又感到，斯塔霍维奇仗着自己有战斗经验，所以自以为有权对他奥列格组织整个工作的方法表示不满。奥列格觉得，是他的软弱和他的过错造成了工作的失败，所以他心里充满了严厉的自我谴责，他鄙视斯塔霍维奇，但是他更为鄙视自己。

第三十四章

这批青年人在杜尔根尼奇家里开会的时候，瓦尔柯和舒尔迦正站在宪兵站长勃柳克纳和他的副手巴尔德面前，就在几天前他们把舒尔迦叫去跟彼得罗夫对质的那间办公室里。

他们俩年纪都不轻，身材都不高，肩膀都很宽，两个人并排站着，就像是林中空地上的两株兄弟橡树。瓦尔柯略微瘦些，面色黧黑阴沉，连在一起的眉毛下的眼珠闪着凶光。舒尔迦的满布斑点的大脸，虽是浓眉大眼，样子英勇，却露出一种明快平静的神色。

被捕的人实在太多，所以这几天在宪兵站长勃柳克纳、副宪兵站长巴尔德和“警察队长”索里柯夫斯基的办公室里，都在同时进行审讯。但是他们却一次也没有来惊动瓦尔柯和舒尔迦。甚至他们的伙食也比以前单独给舒尔迦的要好一些。这几天，瓦尔柯和舒尔迦一直听到他们牢房墙外有人在呻吟，有人在咒骂，有脚步声、忙乱声、武器的碰击声、水盆水桶碰得叮当作响的声音，还有冲洗地板上血迹时的泼水声。有时从远远的一间牢房里隐约传来孩子的啼哭声。

后来提审他们的时候，没有给他们上绑，他们俩由此断定，德国人大概试图用软功和诡计来收买和蒙骗他们。但是为了防止他们破坏秩序——秩序①，宪兵站长勃柳克纳的办公室里，除了翻译之外还有四名武装的兵士，带他们进来的芬庞军士，也握着手枪站在他们背后。 ①原文为德语。

审讯从确定瓦尔柯的身分开始，瓦尔柯报了自己的姓名。全城的人都知道他，连舒尔卡·雷班德也认得他，在舒尔卡·雷班德给他翻译宪兵站长勃柳克纳的问话的时候，他看到雷班德的黑眼睛里露出了惊骇的表情和强烈的、几乎是他个人的好奇。

宪兵站长勃柳克纳又问瓦尔柯，他是不是早就认识站在他旁边的这个人，这个人是谁。

瓦尔柯微微冷笑了一声。

“我们是在牢房里认识的。”他说。

“他是谁？”

“告诉你的主子，叫他别装傻，”瓦尔柯阴沉地对雷班德说，“他总该明

白，我知道的只限于这位公民自己对我说的。”

宪兵站长勃柳克纳沉吟了一会，像猫头鹰那样眼睛睁得滚圆。这种眼神明白地显示：他问不下去了；要是他审问的人不上绑、不挨打，他就不知道该怎样审问。这种眼神也显示，他感到非常难受和无聊。后来他说：

“如果他希望得到符合他身分的待遇，就让他把跟他一起留下做破坏工作的人都供出来。”

雷班德翻译了。

“我不知道这些人。而且，我并不认为会来得及留下一批人。

我是因为来不及撤退，从顿涅茨河回来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证实这一点。”瓦尔柯说，他那双茨冈人那样的黑眼睛先是盯着雷班德，然后又盯着勃柳克纳站长。

在宪兵站长勃柳克纳的脸的下部，在脸和脖颈相连的地方，胖肉叠成倨傲的皱褶。他这样站了一会，然后从桌上的烟匣里取出一支没有牌子的雪茄，用两根指头捏着它递给瓦尔柯，一面问：

“您是工程师吗？”

瓦尔柯是一个有经验的经济工作人员；他原先是矿工，早在国内战争结束的时候就被选拔出来，三十年代已经从工业大学毕业。但是把这些告诉德国人未免太无聊，所以瓦尔柯就装做没有发觉递给他的雪茄，对宪兵站长勃柳克纳的问题作了肯定的答复。

“一个人有您这样的文化水平和经验，在新秩序下面可以得到更高的地位、更好的物质待遇，只要他愿意。”宪兵站长勃柳克纳表示难受似地把头一偏说，他手里仍旧拿着雪茄要递给瓦尔柯。

瓦尔柯一声不响。

“您接啊，接雪茄啊……”舒尔卡·雷班德用咝咝的、很低的声音说，眼睛里露出恐惧的神色。

瓦尔柯好像没有听见似的，仍旧一声不响地望着宪兵站长勃柳克纳，他的茨冈人那样的黑眼睛里带着高兴的表情。

宪兵站长勃柳克纳拿着雪茄的又黄又皱的大手哆嗦起来了。

“整个顿涅茨煤区跟所有的矿井和工厂，现在都由东方煤业冶金业经营公司接管，”宪兵站长勃柳克纳说完之后，长长地喘了一口气，好像说出这句话非常费劲似的。然后他把头更偏了一些，用一个坚决的动作把雪茄递给可尔柯，说道：“我受公司的委托，请你担任本地办事处总工程师的职位。”

舒尔卡·雷班德听到这几句话，完全发愣了。他把头缩到肩膀里，翻译时仿佛嗓子眼里在发痒。

瓦尔柯默默地对宪兵站长勃柳克纳望了一会，他的黑眼睛眯缝起来。

“我可以同意这个建议……”瓦尔柯说，“如果能够给我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

他居然使声音里带有谄媚的调子。他最担心的是，舒尔迦会不懂得，宪兵站长勃柳克纳的这个惊人的建议会给他们打开怎样的前途。但是舒尔迦没有朝他做任何的动作，连瞅也没有瞅他，他大概全都懂得。

“条件吗？”宪兵站长勃柳克纳的脸上露出了狞笑，这使他的脸带有野兽般的表情。

“条件是一般的：把你们的组织——全部组织，全都告诉我！……这件事您得给我办到！马上就办到！”勃柳克纳站长看了看表。“十五分钟之后您

就可以自由；一小时之后您就可以坐在办事处您的办公室里。”

瓦尔柯马上全明白了。

“我不知道什么组织，我是偶然被抓来的。”瓦尔柯说，声调跟平时一样。

“啊，你这个坏蛋！”宪兵站长勃柳克纳幸灾乐祸地叫起来，好像急于要证实瓦尔柯对他的话正确理解到什么程度似的。“你是他们的头儿！我们全都知道！……”他无法控制自己，就把雪茄戳到瓦尔柯的脸上。雪茄折断了，这个宪兵的捏成一撮的手指就戳到瓦尔柯的嘴唇上。他手上的香水气味令人作呕。

在同一瞬间，瓦尔柯猛然挥动一只黧黑有力的胳膊朝宪兵站长勃柳克纳的眉心打去。

宪兵站长勃柳克纳气得像猪猡那样哼了一声，折断了的雪茄从他手里落下来，他就直挺挺地、嘭的一声倒在地上。

最初的几秒钟，大家都愣了，宪兵站长勃柳克纳还直挺挺地躺在地上，滚圆绷紧的肚子比他的笨重的身子高出很多。

接着，勃柳克纳站长的办公室里就闹了个天翻地覆。

副宪兵站长巴尔德个子不高，可是胖得厉害，他态度镇静，在全部审讯时间里都默默地站在桌旁，缓慢地、好像要打瞌睡似地转动着那双富有经验的水肿的蓝眼睛，均匀地呼哧呼哧地呼吸着。在他一呼一吸的时候，他的穿灰军服的肥胖、稳重的身子就像发了酵的面团似的一起一落。等他从发愣的状态中清醒过来，血就涌到他的脸上，他站在原地哆嗦起来，大叫道：

“抓住他！”

芬庞军士和几名兵士一齐向瓦尔柯扑过去。芬庞军士虽然站得最近，却没有抓住瓦尔柯，因为在这一瞬间，舒尔迦嘴里可怕地、沙哑地、令人不解地大吼一声：“嘿，你啊，我们沙皇的西伯利亚！”他挥起一拳，打得芬庞军士一头栽到办公室远远的角落里，接着舒尔迦又低下宽阔的头顶，像一头发怒的公牛，向兵士们冲过去。

“啊，好极了，马特维！”瓦尔柯狂喜地说，他企图挣脱德国兵士们的手，向臃肿的、脸涨得发紫的副宪兵站长巴尔德冲过去，这时巴尔德正伸出两只瓦灰色的厚实的小手，向兵士们吆喝道：

“不要开枪！……捉住他们，捉住这两个该死的东西！”

舒尔迦力大无比，怒火冲天，手、脚和脑袋并用，把兵士们打得东倒西歪。瓦尔柯脱了身，终于向副宪兵站长巴尔德扑过去，巴尔德人虽然胖，可是却灵活有劲得出人意外地绕着桌子躲开他。

芬庞军士又企图来支援长官，但是瓦尔柯像要咬人似的呲牙咧嘴，一皮靴踢中他的胯下，芬庞军士就倒了下去。

“啊，好极了，安德烈！”舒尔迦满意地说，一面像公牛似的横冲直撞，把兵士们摔得老远。“从窗口跳出去，听见吗！”

“那边有铁丝网……你先冲到我这边来！”

“嘿，我们沙皇的西伯利亚！”舒尔迦吼了一声，猛力挣脱兵士们的手，就到了瓦尔柯身旁，他一把抓住宪兵站长勃柳克纳的圈椅，把它举过头顶。

本来要朝他扑过来的兵士们都闪开了。瓦尔柯呲着牙，黑眼睛里露出得意洋洋的凶光，捞起桌上摆的东西——墨水缸、镇纸、金属的杯托——就狠命地、怒不可遏地乒乒乓乓向敌人扔过去，吓得副宪兵站长巴尔德卧倒在地上，用一双胖手抱住秃头，而原来紧缩在墙边的舒尔卡·雷班德，轻轻地

尖叫了一声，就钻到沙发下面去了。

瓦尔柯和舒尔迦最初投入搏斗的时候，他们都像视死如归的勇敢而坚强的人们那样，心里充满了将要最后解脱的感觉。这种最后的、无所畏惧的生命力的迸发使他们的气力增强了十倍。但是在搏斗的过程中他们突然明白，敌人不能、也没有权打死他们，敌人没有接到上级的命令这样做。这样一想，他们心里更充满了那样的胜利的感觉，那样的完全自由的感觉和可以畅所欲为的感觉，仿佛他们简直是不可战胜的了。

他们肩并肩地背靠墙站着，浑身鲜血，样子可怕，怒气冲天，谁也不敢逼近他们。

后来，宪兵站长勃柳克纳清醒过来，又命令兵士们去捉他们。舒尔卡·雷班德利用混战的机会，觑空从沙发底下溜到门外。几分钟后，办公室里又冲进了几个兵士，于是房间里所有的宪兵和“警察”都一齐向瓦尔柯和舒尔迦扑过去，把两个英雄打倒在地上。他们为了泄愤，就对他们俩拳打脚踢，甚至在瓦尔柯和舒尔迦不省人事之后，还久久折磨着他们。

这是黎明前黑暗寂静的时刻。一弯新月已经西沉，而民间称为“启明星”的那颗皎洁的晨星还没有上升。大自然本身仿佛疲乏不堪，已经团目酣睡，最甜蜜的睡意粘住了人们的眼皮，连监狱里困倦的刽子手和受难者也都入睡了。

在这黎明前黑暗寂静的时刻，舒尔迦首先从跟他面临的可怕的命运有天渊之别的深沉、安宁的睡梦中醒来。他醒来之后，在漆黑的地板上翻了一会身，就坐了起来。几乎在同一刹那，瓦尔柯也发出一声轻微的呻吟，醒来了，——这甚至不是呻吟，而是叹息，轻得几乎听不出的叹息。他们俩坐在漆黑的地板上，他们的浮肿的、满是血疤的脸紧挨着。

这个窄小黑暗的牢房里透不进一丝亮光，但是他们觉得，他们能够看见对方。他们看到的对方是坚强而美好的。

“你真是个哥萨克大力士，马特维，愿老天给你力气！”瓦尔柯嗄声说。他突然用双手撑地，把整个身子朝后一仰，纵声大笑起来，仿佛他们俩都是自由的。

舒尔迦也跟着他沙哑地、亲切地大笑道：

“你也是个结实的哥萨克，安德烈，哈，真棒！”

在这万籁俱寂的黑夜里，他们的勇士般的可怕的笑声震撼着监狱的四壁。

早上没有给他们拿来吃的，白天也没有提审他们。这一天一个人也没有提审。监狱里静悄悄的；一阵模糊不清的谈话声，好像叶丛底下溪水的潺潺声，从牢房墙外传进来。中午，一辆摩托声轻微的小汽车开到监狱跟前，过了一会又开走了。舒尔迦已经习惯于辨别牢房外面的各种声音，他知道这辆汽车是宪兵站长勃柳克纳或是他的副手或是他们俩出进监狱时乘坐的。

“他们去见长官去了。”舒尔迦严肃地轻声说。

瓦尔柯和舒尔迦互相瞥视了一下，一句话也没有说，但是他们的目光却向对方说明，他们俩，瓦尔柯和舒尔迦，都知道他们的死期近了，他们对此也有了准备。大概，这件事监狱里所有的人也都知道了，——所以周围笼罩着这样庄严肃穆的气氛。

他们这样默默地坐了几个小时，各自在扪心自问。暮色已经渐渐来临。

“安德烈，”舒尔迦轻轻地说，“我还没有对你讲过，我是怎么落到这里

来的。你听我说……”

他在独自一人的时候，关于这一切想得很多。但现在，他是把它告诉一个跟他的联系较之世界上任何别的联系都更为纯洁和密切的人，这时他似乎又看见了他年轻时代的朋友李莎·雷巴洛娃的诚恳的面孔，看见操劳在她脸上刻下的皱纹，看见她跟他见面以及分别时脸上的那种急躁而又慈祥的表情，痛心的悔恨使他几乎呻吟起来。

于是舒尔迦毫不宽恕自己地告诉瓦尔柯，李莎·雷巴洛娃对他说了些什么，他怎样自以为是地回答了她。她怎样像母亲似的望着他，不愿意他离去。但他对不可靠的接头地点的信任竟超过了对自己内心的朴质自然的声音的信任，还是走了。

他愈往下讲，瓦尔柯的脸色就变得愈阴沉。

“纸上的东西！”瓦尔柯叫道，“你记得伊凡·费奥多罗维奇对我们说的话吗？……你对纸上的东西反而比对人还相信，”他声调悲壮地说。“是的，我们常常是这样……纸上的东西是我们自己写的，可是后来不知怎么反而让它控制了我们……”

“这还没有完呢，安德烈，”舒尔迦悲痛地说，“我还要把康德拉多维奇的事讲给你听……”

接着他告诉瓦尔柯，他怎样怀疑从年轻时代就认识的康德拉多维奇。他听到康德拉多维奇的儿子的历史，听到康德拉多维奇在同意让地下组织使用自己住所的时候隐瞒了这段历史，因而对他产生了怀疑。

舒尔迦重新回想起这一切的时候，不禁大为震惊，他怎么会让在普通人生活中屡见不鲜的普通事件在他眼中玷污了康德拉多维奇，但是他对素不相识、而且有着许多令人不快的特点的福明，却会发生好感。

瓦尔柯已经听康德拉多维奇亲口讲过这一切，现在他变得更阴沉了。

“形式！”瓦尔柯嗄声说，“习惯于只重形式……我们有许多人看惯了现在大家的生活比我们父亲一辈在旧时代过得好，喜欢从形式看人，希望每一个人都清洁整齐。康德拉多维奇是个老实人，可是在形式上不合适，你就觉得他有污点。而那个该死的福明，却在形式上完全合适，清洁整齐，可是他比黑夜还要黑……我们从前忽视了他的污点，亲手给他刷白，提拔他，表扬他，使他合乎形式，可是后来就是这种形式遮住了我们的眼睛……现在，你还要为它送掉性命。”

“这是实在的，千真万确的，安德烈，”舒尔迦说，尽管他们谈话的内容非常令人痛心，他眼睛里却突然迸射出明朗的光辉。“我在这里不知坐了多少个白天和夜晚，可是我没有一个小时不想到这件事……安德烈！安德烈！我是个做基层工作的人，我没有资格说，我一生中有多少工作落到我的肩上。现在我回顾自己的一生，我就看出我错在哪里，看出我并不是今天才犯错误。我已经四十六岁了，可是二十年来我老在一个地方，所谓在县的范围里，忙忙碌碌！总是做副手……真的！我们这种人从前叫县干部，现在叫区干部。”舒尔迦苦笑了一声。“我周围有许多新的工作人员升上来，还有许多是我的同伴，跟我一样的区干部，升了上去，可是我还拉着那辆旧车。并且习惯了老一套！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可是我习惯了。而习惯了——这就是说落后了……”

舒尔迦的声音突然停止，他激动得用两只大手捧住了头。

瓦尔柯懂得，舒尔迦是在临死前洗涤自己的灵魂，现在既不能责备他，

也不能为他辩白，所以只是默默地听着。

“对我们来说，什么东西可算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值得我们为它生活、为它劳动和牺牲呢？”舒尔迦又开口了。

“这就是我们的人，人！世界上还有什么比我们的人更美好的呢？为了我们的国家，为了人民的事业，他们肩负起多少的劳动和苦难！在国内战争时期，他们的定量是八分之一磅的面包，但是他们并不抱怨。他们排队等待去从事重建工作。他们宁愿穿得破破烂烂，也不肯拿自己首创的苏维埃制度去换衣着用品。在这次卫国战争中，他们心甘情愿地、满怀豪情地献出自己的头颅，承担任何的苦难和劳动——连孩子们也挑起这副担子，更不必说妇女了。这些都是我们的人，像你我一样的人。我们都是来自普通人民，所有我们最优秀、最聪明、最有才华和最有名望的人都是来自普通人民！我不用对你说，我一生都是为他们出力……我们这里的情形你是知道的：你老在这些工作里面打转，工作都是最重要、最迫切的，可是渐渐地你已经不能觉察，事物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发展，人是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唉，安德烈！我从李莎·雷巴洛娃家里出来的时候，看见那儿有三个青年和一个姑娘，我猜想两个是她的儿女，还有两个是他们的同学……安德烈！你不知道他们有着怎样的眼睛啊！他们是怎样地望了我一眼！有一天夜里我在这儿牢房里醒来，突然浑身发抖。共青团员！一定是共青团员！我怎么会不理会他们？怎么会有这种情形？这是为什么呢？我知道是为什么。区里的共青团员们不知有多少次来找我：‘马特维叔叔，给青年们做一次报告吧，讲讲收割、播种的情形，讲讲我们区的发展计划，或者讲讲州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情况，可讲的题目多得很。’可是我对他们说：‘我没有时间，你们是共青团员，你们自己去想办法吧！’有时实在推不掉，只好答应，可是后来做这次报告可费劲啦！你明白，这儿要向州土地部汇报，那儿又有协作和划界的例会，而这儿还要赶到矿山管理处主任家里去，哪怕待一个小时也行，——你瞧，他已经五十岁了，可是他的小男孩刚过周岁，他对这件事非常得意，所以就像过命名日和办受洗礼宴一样，——你不去，他会见怪——于是你一天到晚就忙这些，事先没有准备就跑去给其青团员做报告。脑子里记得什么就说什么，左一个‘整个说来’，右一个‘整个说来’，你挖空心思胡吹一通，连自己都听不下去，更不用说青年人了。啊，真丢人！”舒尔迦突然说，他的大脸涨得发紫，他把脸藏在手掌里。“他们希望听你说些教导他们应该怎样生活的良言，可是你却给他们‘整个说来’、‘整个说来’……谁是我们青年的第一个教育者？教师。教师！这个词是多么了不起啊！……我们都是教区学校毕业的，你大概比我早毕业五年，不过你一定也记得我们的教师尼柯拉·彼得罗维奇吧。他在我们的矿上教书教了十五六年，最后因为肺病去世。我到现在还记得，他讲给我们听，宇宙——太阳、地球和行星——是怎样形成的，也许他是第一个动摇了我们对上帝的信仰、打开我们的眼睛去观察宇宙的人……教师！说起来很容易！在每个孩子都可以受教育的我们的国家里，教师——这是最重要的人。我们的孩子的未来，我们的人民的未来，都掌握在教师手里，都在他的宝贵的心里。在街上看见教师，在五十米之外就应该向他脱帽致敬。可是我呢？……想起来也惭愧：我们这里每年都发生修理校舍的问题、取暖的问题，校长们在办公室门口抓住我，钉着我要木料，要砖头，要石灰，要煤。可是我老是开句玩笑敷衍了事，说什么不是我的事情，让区里去办吧。你知道，我并不认为这样做是可耻的。我的想法非常简单：采煤的计划完成

了，粮食收购的任务超额完成了，秋耕地翻过了，肉类上交了，羊毛上交了，给州委书记的贺信也发出去了，——现在你们别来麻烦我了。这难道不是真的吗？……这我是很晚很晚才懂得的，可是懂得之后，我心里到底舒服些。我自己到底是个什么人呢？”舒尔迦带着善良、羞怯、负疚的笑容说。“我是人民的血肉，我来自他们的底层，我是他们的儿子和公仆。早在一九一七年，听了列昂尼德·雷巴洛夫的话我就懂得，除了为人民服务以外，没有更高的幸福。也是从那时开始，我成了共产党员。你记得我们那时候的地下工作和游击斗争吗？我们这批一字不识的父母的孩子是从哪里找到这种精神力量和勇气来抵挡并且战胜德国占领者和白党的呢？那时候，我们以为战胜他们是最困难的事，以后就可以轻松些。哪知道最困难的事却在后头。你记得吗，贫农委员会、余粮收集制、富农匪帮、马赫诺匪帮，突然，这些都完了！来了新经济政策！你去学做生意吧。啊？好吧，我们就开始做生意，而且也学会了！”

“你记得我们是怎样恢复矿井的吗？”瓦尔柯突然非常兴奋地说，“那时候我刚巧复员回来，他们就提拔我，让我做现在已经采空了的那个老掉牙的矿井的井长。真够呛。哎哟哟！……一点业务工作的经验都没有，专家怠工，机器停转，没有电，银行不贷款，没有钱给工人发工资，列宁却发来一封一封的电报——送煤来啊，救救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对我说来，这些电报就像是神圣的召唤。我早就看见过列宁，就像现在看见你这样，那还是在十月革命时期的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那时我还是一个刚从前线回来的士兵。我记得，我走到他跟前，用手摸摸他，因为我不相信这是像我一样的血肉之躯……好吧，我把煤送去了！”

“是啊，不错……”舒尔迦高兴地说，“那几年咱们这些县干部或是区干部挑过多少重担啊！我们不知碰到多少麻烦！从苏维埃政权成立以来，有谁像咱们区干部那样挨过那么多的骂！所有苏维埃政权的工作人员，不论是从前的和现在的，大概谁也没有像我们那样老是挨训！”舒尔迦说时脸上带着幸福的表情。

“是啊，要说挨训的话，我想我们经济工作人员不见得比你们少。”瓦尔柯带着苦笑说。

“不，不错，”舒尔迦用充满热情的声音说，“不管我把自己骂得多厉害，还是应该给咱们这批区干部立一块纪念碑。我开口闭口老是说——计划、计划……可是你倒试试看，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像钟表一样，千百万公顷的土地要耕种，麦子要收割，要脱粒，要交给国家，要按照劳动日分配。还要磨面粉，还有甜菜、葵花子、羊毛、肉类缴售，还要发展牲畜，还要修理拖拉机和我们的全部技术设备，这种设备全世界都没有，他们连做梦都没有见过！……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穿得好，吃得好，饭后还要来一杯加糖的茶。咱们这批热心的区干部就这样马不停蹄地忙碌着。为的是满足人们的这种需要。可以说，咱们这批区干部在粮食和原料方面是把整个卫国战争都背在肩上了……”

“那么经济工作人员呢？！”瓦尔柯又是愤愤不平同时又非常兴奋地说。“对啦，如果要为什么人立纪念碑，就该为他们立！如果说有人背负过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现在又背负着整个卫国战争，那就是他们！难道不对吗？在农村里那算什么计划？在工业方面才是计划呢！在农村里哪谈得上什么速度？在工业方面才谈得上速度！我们学会了建设什么样的工厂啊！又干

净，又精致，像钟表一样！还有我们的矿井呢？资本家的矿井，有哪一个能比得上我们的新一号井？那真叫是宝贝！他们那些资本家已经习惯了享现成福。可是我们要讲速度，要大规模地建设，所以永远很紧张：工作人手不够，建筑材料不够，运输工具落后，大大小小的困难不知有多少，可是我们仍旧不断地前进。不，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这是巨人！”

“对，一点不错！”舒尔迦脸上露出快活和幸福的样子说。

“我记得，在一次集体农庄的会议上叫我们去参加决议起草委员会。在那儿谈到咱们区干部。一个年纪轻轻、戴眼镜、当时被称做红色教授的人，非常傲慢地谈到我们的弟兄，说我们落后啦，不读黑倍尔啦，还说我们不是每天洗脸啦。于是那边就对他说：‘最好是培养您去做区干部，那您一定会变得聪明起来……’哈—哈—哈！”舒尔迦高兴地笑起来。“当时人们把我当做农村工作专家，真是非同小可——所以常常把我从一个村子调到另一个村子，去帮助农民消灭富农，帮助他们搞集体化……不，那是伟大的时代，那个时代谁也忘不了。全体人民都行动起来了。我们真是废寝忘食……当时有许多农民摇摆不定，可是在这次战争以前，连最落后的人也感到了那些年代的伟大成绩……真的，在战前我们的生活的确开始过得比较好了！”

“你还记得当时我们井上的情况吗？”瓦尔柯说，他的茨冈人那样的眼睛微微闪着光。

“我一连几个月不回家，就睡在井上。真的，你现在四面望望——你简直不相信：难道这一切都是我们亲手搞出来的？说实在的，有时我觉得这一切并不是我自己做的，而是我的一个近亲做的。现在我只要闭上眼睛，就看见在建设中的我们的整个顿巴斯和我们的国家，还有我们所有的夜战……”

“是啊，在历史上，随便什么人都没有像我们那样肩负过那么多的工作，可是你看，我们并没有被压得直不起腰来。所以我要问：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啊？”舒尔迦带着天真稚气的表情说。

“可是我们的敌人却以为我们是怕死的，这些笨蛋！”瓦尔柯冷笑了一声。“我们布尔什维克对于死已经习惯了。不管什么样的敌人都想杀害我们布尔什维克！沙皇的刽子手和宪兵杀害我们，十月革命的时候军官学校学生杀害我们，白党、世界各国的干涉军、马赫诺匪帮和安东诺夫匪帮①杀害我们，富农用短筒枪朝我们开枪，可是靠着人民的爱护，我们仍旧活着。现在让德国法西斯匪徒来杀死我们吧，可是到末了躺在地上的还是他们，而不是我们。对吗，马特维？”

①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一年间社会革命党人安东诺夫在旧唐波夫省组织了一次富农的反苏维埃叛乱，红军依靠当地人民的积极支持，扑灭了这次叛乱。

“这是千真万确的，安德烈！……我永远会感到骄傲，因为命运让我，一个普通的工人，能在我们党内通过自己的生活道路，正是我们的党给人们打开了通往幸福生活的大道……”

“千真万确，马特维，这是我们最大的幸福！”瓦尔柯怀着在他这样严峻的人说来是出人意外的感情说道，“另外我还有这样的幸运，在我临死的时候有你马特维这样的同伴……”

“我真心感谢你这样称赞我……我一看就知道，你的灵魂有多美，安德烈……”

“我们死后，愿留在世界上的我们的人能够幸福！”瓦尔柯轻声地、庄严地说。

安德烈·瓦尔柯和马特维·舒尔迦就这样在临死的时候相互倾诉衷肠，卸下良心上的重担。

第三十五章

午后，宪兵站长勃柳克纳和副宪兵站长巴尔德到离克拉斯诺顿大约三十公里的罗文基城的区宪兵队去了。党卫队分队长彼得·芬庞临时调到克拉斯诺顿宪兵站上工作，他知道这两位站长是送审讯材料到区宪兵队去，然后从那边得到如何处置被捕者的命令。但是彼得·芬庞凭他的经验已经知道，将是怎样的命令；他的上级对这一点也知道，因为他们临行之前就吩咐芬庞派党卫队的兵士去封锁公园地区，不准任何人走进公园。而埃德华·鲍尔曼中士手下的一小队宪兵，又被派到公园里去挖一个大坑，如果里面的人一个紧挨一个站着，要能够容得下六十八个人。

彼得·芬庞知道，他的上级一定要很晚才会回来。因此他派分队副带着兵士们到公园去，自己却留下来待在监狱的门房里。

最近几个月来，他一直忙得不可开交，没有一分钟的机会可以单独待着，所以他不仅不能从头到脚洗一下，甚至衬衣也不能换，因为他怕脱了衬衣会被人看到他身上带的东西。

等宪兵站长勃柳克纳和副宪兵站长巴尔德走了，党卫队兵士和宪兵们也到公园里去了，监狱里的一切都安静下来，这时芬庞军士就到监狱厨房里去找厨子，向他要一锅热水和一个盆来洗澡，至于冷水，门房口的木桶里总是有的。

一连热了多日之后，初次刮起冷风，刮得低垂的雨云满天飘散。这是一个阴暗的日子，像秋天。这些煤区的整个自然界都显露出它最难看的方面。这个四面受风、满眼都是标准式房屋和煤灰的小城，当然也不例外。门房里光线充足，可以洗澡，但是彼得·芬庞非但不愿意有人猝然闯进来看到他，也不愿意窗外有人看见他，所以他放下窗上的黑纸，开了电灯。

尽管他从战争开始以来就过惯了他现在过的那种生活，他也闻惯了自己身上的臭味，但是，当他终于能够把衣服脱光，身上毫无负担地光着身子过一会，他仍旧体验到难以形容的快感。他天生就胖，随着年龄的增加，简直变得臃肿不灵，穿上黑制服就要浑身大汗。衬衣几个月没有换，浸透了发酸的汗水，变得又粘又臭，再加上制服的里子褪色，就变得黑里透黄。

彼得·芬庞脱掉衬衣，一丝不挂，身上虽然好久没有洗，但是皮肤生来很白，胸口和两条腿上都长着浅色的鬈毛，连背上也有一些。他脱掉衬衣之后，就发现他身上原来还有一条特殊的禁欲带。这甚至不是禁欲带，而是更像旧时兵士佩的长子弹带。这是用橡胶布做的一条长带，上面分为许多小袋，每只小袋上都钉着小钮扣，带子挂过双肩，在胸前十字交叉，又在腰部上面缠了一圈。带子两头用两条肮脏的白丝带拉紧，在腰间打了个活结。这些像子弹夹那么大小的小袋里，大部分都装得鼓鼓的，只有一小部分还空着。

彼得·芬庞解开腰间的丝带，取下这条带子。这条带子在他身上绑的时间太久，使他的白胖的身上好像生过褥疮似的，留下了颜色不健康的深色

痕印——背上和胸口是交叉形，腰上面是一道圆箍。彼得·芬庞解下带子，——它的确是非常长，又非常重，——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桌上，马上就开始拚命地搔痒。他用他的又短又粗的手指猛烈地、下死劲地浑身搔着，他搔着胸膛、肚皮、两腿，并且不断设法要搔到脊梁，一会儿越过左肩，一会儿越过右肩，一会儿用右手从肩胛骨下面伸过去，用大拇指搔着，舒服得不住地哼唧和呻吟。

等他痒得稍微好些，他就小心地解开制服里面的口袋，摸出一只像烟袋的小皮袋，把里面的三十来颗金牙倒在桌上。他本来打算把它们分装到带子上的两三个还没有装满的小袋里去。但是他既然有机会能够单独留在这里，他就禁不住要欣赏一下其他装满了的小袋里的东西。他已经有很久没有看到它们了。于是他仔细地把钮扣一个一个地解开，把小袋里的东西都分别排列在桌上，一堆堆，一叠叠，不多一会已经摊满一桌，的确是洋洋大观！

这里有世界各国的货币——美元和英国先令、法国法郎和比利时法郎、奥地利克朗、捷克克朗、挪威克朗、罗马尼亚列伊、意大利里拉。它们是按照国家分类的，金币归金币，银币归银币，纸币归纸币，其中居然还有一叠整整齐齐的苏联“蓝票”——票面值一百卢布的钞票，他虽然并不希望从这些钞票得到什么物质利益，但他还是把它们留在身边，因为他的贪婪已经发展为收藏狂了。这里有一堆堆的小件金首饰——戒指、镶宝戒指、别针、胸针——有的镶着宝石，有的没有宝石，另外还有一堆堆的宝石和金牙。

天花板底下被蝇粪玷污的电灯，射出晦暗的灯光，照着桌上的这些钱币和珠宝。他光着身子、浑身是毛、秃脑袋瓜、戴着浅色的玳瑁边眼镜，叉开双腿坐在凳子上，欣赏着这些珠宝，偶尔还搔几下痒，情绪兴奋，非常自得其乐。

这些小玩意和钱币虽然很多，他在摩挲和把玩每一枚钱币和每一件小玩意的时候，还是能讲得出这是他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从什么人身上抢来或是剥下来的，牙齿是从什么人嘴里拔下来的，因为自从他得出结论，他不这样做就是傻瓜的时候起，这就成了他生活中唯一的乐趣，其余的一切不过是生活的表象而已。

他不仅拔死人的金牙，也从活人嘴里拔。不过他还是宁愿从死人嘴里拔，因为拔起来没有特殊的麻烦。他只要看见一群被捕者当中有人镶金牙，他就发现自己巴望这一套审讯手续赶快结束，可以快些杀死他们。

这些钱币、金牙和小玩意后面的被杀害、受折磨、被抢劫的男女老幼实在多得不可胜数，所以当他望着这一切的时候，愉快兴奋和自得其乐的感觉里总不免掺杂着某种不安。然而这种不安并非发自他彼得·芬庞本人，而是发自想象中的一位衣冠楚楚的先生，一位道地的绅士，他的肥胖的小指上戴着宝石戒指，头上戴着昂贵的浅色软礼帽，脸刮得精光，道貌岸然，满脸露出对彼得·芬庞不以为然的神气。

这是一个大富翁，比拥有金银珠宝的彼得·芬庞更为富有。但是此人仍然认为自己有权责备彼得·芬庞，认为他发财致富的方法是卑鄙的。所以彼得·芬庞就跟这位绅士进行着没完没了的、然而是非常亲切的辩论。因为说话的只有彼得·芬庞，他在这场辩论中是站在一个富有生活经验的、实事求是的现代人的立场上，他的立场要高得多，坚定得多。

“嘿—嘿，”彼得·芬庞说，“归根到底，我决不坚持要终身干这个行当。归根到底，我还是要做一个普通的实业家或是商人，好吧，哪怕开个小铺子

也成，但是我总要弄点本钱吧！是的，我很懂得，您对您自己和对我是怎么想的。您是这么想的：‘我是个绅士，我所有的企业都是公开的，每个人都看得见我收入的来源；我有家庭，有孩子；我的外表整洁，衣冠楚楚，对人有礼貌，我没有做过不可告人的事；如果跟我谈话的女性站着，我也站着；我阅读书报，我加入两个慈善团体，我在战时捐过巨款给医院添置设备；我爱好音乐，喜欢花草树木，喜欢海上的月色。可是彼得·芬庞却谋财害命。他甚至毫不厌恶地去拔人家嘴里的金牙，他还把这一切藏在身上，免得被人看见。他只好几个月不洗澡，身上臭气熏人，因此我有权责备他。’……嘿—嘿，对不起，我最亲爱和最尊敬的朋友！您别忘了我已经四十五岁，我做过水手，我到过世界各国，世界上发生的事，哪一桩我没见过！……您是否知道我这个常常远渡重洋的水手不止一次有机会看到的情景：在南非、印度或是印度支那，每年都有上百万的人可说是饿死在最可敬的公众的面前。不过，何必说得那么远呢！甚至在战前繁荣的幸福年代，您也可以看到，几乎在世界各国的首都，都有许多街区住着失业的人，他们当着最可敬的公众的面死去，有时甚至死在古教堂的门口。要说他们是存心跟自己过不去而找死吧，叫人是很难同意的！谁不知道，有些最可敬的人，道地的绅士，只要对他们自己有利的时候，就肆无忌惮地把成百万身强力壮的男女工人从他们的企业里赶出去。这些男女由于不甘心屈服于自己的处境，每年都大批大批地被关在监狱里受罪，或是干脆就在街上和广场上被杀死，而且是完全合法的，靠着军警的帮助！……我给您举出了几种不同的方法，我还可以多举一些，每年在地球上用这些方法杀害的人上百万，其中不单有健康的男子，而且还有孩子、妇女和老人，老实说，杀害他们就是为了增添您的财富。关于战争，我就不用提了！在战争时期为了增加您的财富，在最短期间进行特大规模的屠杀。我最亲爱和最可敬的朋友！我们何必躲躲闪闪？我们可以开诚布公地说：如果我们要别人替我们干活，那我们每年就得用这种或那种方法把他们杀掉相当的数量！我使您讨厌，无非是因为我是站在所谓绞肉机的底座，我是这个行当的粗工，我的工作性质使我不能洗澡，身上发出臭味。但是您一定会同意，就是您永远少不了像我这样的人，越往后，您就越需要我。我跟您血肉相连，我是您的化身，如果把您翻过面来，让人家看看您的真面目，其实您跟我完全一样。时机到了，我也会洗个澡，变得非常干净，也许，就成为一个小铺子的老板，您在我的铺子里可以买到上等香肠……”

彼得·芬庞跟想象中那个脸上刮得精光、道貌岸然、裤子烫得笔挺的绅士进行的就是这种原则性的辩论。这一次，也像往常一样，彼得·芬庞在战胜了绅士之后，心里高兴到极点。他把一堆堆的钱币和珍宝藏进原来的小口袋，仔细扣上钮扣，然后才开始洗澡。他舒服得直打响鼻，尖叫着，把肥皂水泼了一地，但是这完全不用他操心，兵士们会来擦掉的。

他并没有洗得十分干净，不过总算使身上轻松一下。他又缠上这条带子，把它在腰里系好，穿上干净内衣，把脏的藏起来，再穿上黑制服。然后他掀开黑纸的一角，朝窗外望了一望，监狱的院子里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已经变成本能的经验提醒他，长官马上要回来了。他走到院子里，在门房旁边站了一会，让眼睛习惯黑暗，但是仍旧无法习惯。冷风把沉重的乌云吹过城市和整个顿涅茨草原的上空；乌云也看不见，但是它们好像在互相追赶，它们的潮润的、毛茸茸的边缘互相擦碰，似乎发出沙沙的声音。这时彼得·芬庞听到低低的摩托声愈来愈近，还看到汽车的遮掉半边的前灯的两个

光点，汽车经过以前是区执行委员会、现在是德国人的区农业指挥部的大厦旁边，从山上开下来；灯光使大厦的一边侧厅隐约从黑暗中显现出来。长官从区宪兵队回来了。彼得·芬庞穿过院子，从后门走进监狱，守门的宪兵认出是分队长来了，向他行了个持枪礼。

牢房里的人们，也听到汽车压低了摩托声开到监狱跟前。整天笼罩着监狱的那种异样的寂静，马上就被走廊里的脚步声、钥匙开锁声、砰砰的关门声、各个牢房里发出的嘈杂声以及远远那间牢房里那个婴孩的熟悉的令人心酸的啼哭声打破了。这啼哭声突然提高，变成刺耳的凄厉的嚎叫声，——

那婴孩鼓起最后的力气拚命地叫嚷，他已经声嘶力竭了。

舒尔迦和瓦尔柯听到牢房里渐渐逼近的乱哄哄的声音和一个婴孩的啼哭声。有时他们觉得，他们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在热烈地说着什么，一会儿提高嗓门，一会儿恳求，后来好像也哭了。接着锁孔里的钥匙响了一下，宪兵们从带婴孩的女人的牢房里出来，走进了隔壁的牢房，那里马上就吵闹起来。但是即使在这时候，透过这种吵闹声，似乎也可以听到那个女人哄孩子的非常凄凉而温柔的声音，以及那孩子仿佛在给自己催眠似的、渐渐微弱的声音：

“啊……啊……啊……啊……啊……啊……”

宪兵们走进了瓦尔柯和舒尔迦隔壁的牢房，他们俩才明白，为什么宪兵们走到哪里，哪里的牢房里就发出吵闹的声音：原来宪兵们在把被监禁者的手都绑起来。

他们最后的时刻到了。

隔壁牢房里人很多，宪兵们在那边搞了好一会。最后他们出来了，锁上了牢房，但并不马上到瓦尔柯和舒尔迦这边来。他们站在走廊里，匆匆地交换一下意见，后来走廊里有人跑出大门口。安静了一会儿，只听见宪兵们在叽咕。后来走廊里响起几个人走近牢房的脚步声，有人说着德语表示满意，接着，芬庞军士带着几个宪兵用电筒朝牢房里照了一照，走了进来；他们都握着手枪准备着，门口还有五六名兵士。显然，宪兵们怕这两个人会像往常一样跟他们动武。但是舒尔迦和瓦尔柯对他们甚至没有嘲笑；他们的精神已经远远地离开这个尘世的忙碌。他们安静地让宪兵们反绑了手，后来芬庞用手比划着，要他们坐下来把他们的脚绑上，他们就让宪兵们在他们的脚脖上绑上绳子，这样他们只能迈着小步，而不能逃走。

后来他们又被单独留下来，他们又默默地在牢房里坐了一会，等德国人把所有被监禁的人都绑上。

现在走廊里响起了迅速而有规律的脚步声；脚步声越来越响，后来充满了整个走廊。兵士们先是原地踏步，后来按照口令立定，又把枪靠到脚边，把皮靴碰得啪的一响，来了个转身。牢房的门都砰砰地响起来，他们开始把被监禁的人们带到走廊里。

舒尔迦和瓦尔柯在黑暗中待得实在太久，走廊里天花板下的电灯光虽然十分晦暗，他们仍然不禁眯起了眼睛。后来他们就开始打量身旁的人和队列里比较远的、在走廊两头的人们。

跟他们隔开一个人，是一个高大的中年汉子，那人光着脚，衬衣上全是血污，也像他们一样，脚上绑着绳子。瓦尔柯和舒尔迦认出了那人是彼得罗夫，不禁都倒退了一步。彼得罗夫被打得遍体鳞伤，衬衣粘在肉上，像粘在一大片伤口上那样，而且已经干了，——大概，每动一下都会使这个强壮

的人疼痛难忍。他的一边面颊被刀子或是刺刀直戳到骨头，伤口已经溃烂。彼得罗夫认出了他们，对他们低下了头。

但是，在走廊远远的尽头，在监狱出口处的情景，却使瓦尔柯和舒尔迦由于怜悯和愤怒而发抖；几乎所有被监禁的人们也都带着痛苦、恐怖和惊异的表情望着那边。那边站着一个年轻妇人，脸色虽然疲惫不堪，但是表情坚强有力。她穿着深红色衣服，手里抱着一个婴孩。她的抱着婴孩的胳膊和婴孩的身体被绳索捆绑着，好像孩子是紧紧地永久被粘连在母亲身上。婴孩还不满一岁，长着稀稀的、后脑上略微鬈曲的金发，柔软的小头靠在母亲肩上，眼睛闭着，但是他没有死，他睡着了。

舒尔迦突然想到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泪水从眼睛里涌出来。他怕被宪兵们和自己人看见他的眼泪，会对他舒尔迦乱加猜测，所以当芬庞军士终于点完被监禁者的人数，让两排兵士在两旁把他们押到院子里去的时候，他感到高兴了。

夜色是这样的黑，人们并排站着彼此都看不见。他们四个人一排，排成一队，被团团围着带出了大门；电筒时前时后、时而又在两旁亮起来，照亮着道路和被监禁者的队伍；他们就这样沿着大街被带上坡去。冷风以同样的强度单调地刮过城市上空，用潮湿的气流围绕着他们。乌云低低地在头顶上奔驰，仿佛可以用手摸到它们，还可以听到它们的潮润的沙沙声。人们贪婪地用嘴吞咽着空气。队伍缓慢地、肃静无声地走着。走在前面的芬庞军士有时回过头来，打开挂在胳臂上的大电筒照射着队伍，那时从黑暗中就重又现出身上绑着婴孩的妇人的身形，她走在第一排边上，风把她的深红色衣服的下摆吹向一边。

舒尔迦和瓦尔柯并排走着，他们的肩膀互相碰撞。舒尔迦的眼睛里已经没有泪水。瓦尔柯和舒尔迦愈往前走，他们头脑里一切个人的东西，甚至那最重要的最宝贵的东西，那直到最后一分钟还隐隐使他们十分激动和焦灼而使他们不愿死去的东西，也就离他们愈远。庄严肃穆的气氛展翅覆盖着他们。一种难以名状的清澄的宁静降临到他们的心头。于是他们迎风前进，在这些低低压在头顶、沙沙作声的乌云底下，默默地迎着他们的死亡从容走去。

队伍在公园大门口站住。芬庞军士从制服里面的口袋里掏出一张公文，他、宪兵站的埃德华·鲍尔曼中士和指挥守卫公园的党卫队兵士的分队副，都用电筒照着，先后仔细读了这张公文。

然后中士用电筒的闪动的亮光照着，把队伍的人数重点了一遍。

公园的大门缓慢地、带着吱吱的响声打开了。队伍改为两人一排，被带领着沿列宁俱乐部和高尔基学校中间的林荫大道走进去。以前直属克拉斯诺顿煤业联合公司的各个联合企业的管理处，现在就设在学校里。他们刚走过校舍旁边，芬庞军士和鲍尔曼中士就折进了旁边的小道。队伍也跟着他们转了弯。

风吹弯了树木，树叶都被吹向一边。树叶战栗着，互相碰撞着，它们的不肯缄默的、嘈杂而又单调的响声充满了周围黑暗的空间。

他们被带到公园的荒凉的尽头，甚至在晴朗的日子那儿也是足迹罕到的地方，再过去就是一片荒地，上面孤零零地耸立着德国“警察学校”的砖砌大厦。在这儿四面有树木的长方形空地正中央，挖了一个长坑。人们还没有看见这个坑，就闻到一股挖出来的湿土的气味。

队伍被分为两股，带到坑的两面，瓦尔柯和舒尔迦也被拆散了。人们

碰在翻挖出来的土堆上，都跌跌撞撞，但是他们马上被枪托打得站起来。

突然间，几十支电筒照亮了这个漆黑的长坑，照亮了它两旁的土堆，照亮了人们饱受折磨的脸，也照亮了把林中空地密密包围起来的德国兵士的寒光闪闪的刺刀。所有站在坑边的人们，都看到披着黑橡胶布斗篷的宪兵站长勃柳克纳和副宪兵站长巴尔德，站在坑尽头处的树下。在他们后面，靠边一点，站着身穿灰色衣服、肥胖臃肿、眼睛鼓出、脸色紫红的瓦西里·斯塔庆柯市长。

宪兵站长勃柳克纳做了个手势。芬庞军士就把挂在胳膊上的电筒高举在头顶上，用他那嘶哑的村妇般的嗓音轻声下了个命令。兵士们向前跨了一步，用刺刀把人们推向坑边。人们踉踉跄跄地走着，脚不断陷在泥土里，默默爬上了土堆。只听见兵士们的喘息声和风吹树叶的飒飒声。

舒尔迦在他被绑的双腿所容许的限度之内，费力地迈步走上土堆。他在电筒的闪光中看见人们怎样被抛到坑里；他们有的跳下去，有的倒下去，有的一声不响，有的发出抗议的或是悲痛的呼声。

宪兵站长勃柳克纳和副宪兵站长巴尔德站在树下动也不动，斯塔庆柯却拚命向被抛进坑里去的人们深深鞠躬——他喝醉了。

这时舒尔迦又看见了那个穿深红色衣服的妇人和绑在她身上的婴孩；孩子什么没有看见，也没有听见，他只感到母亲身上的温暖，仍旧把头搁在她的肩上睡着。她怕把孩子惊醒，两只手又没法动，只好坐到土堆上，用腿移动着，自己滑到坑里去。舒尔迦后来再没有看见她了。

“同志们！”舒尔迦用沙哑有力的声音说道，他的声音盖过了一切的声响。“我的好样的同志们！光荣归于你们，人们会永远纪念你们！伟大的……”

一把刺刀从背后戳进他的肋骨中间。舒尔迦鼓起全身巨大的力量不让自己倒下去，而是跳进坑去，他的声音又从坑里震响起来：

“伟大的、给人民指示正确道路的共产党万岁！”

“消灭敌人！”瓦尔柯在舒尔迦身边威严地高呼道，命运注定他们在坟墓里又站在一起。

坑里塞满了人，连身子都不能转动。最后的精神紧张的一瞬到来了：每人都准备好接受一颗铅弹。但是给他们准备的并不是这样的死。泥土像雪崩似的纷纷撒到他们的头上、肩上、衬衫领上、嘴里和眼睛里。于是大家明白了，是要把他们活埋。

舒尔迦提高嗓子唱起来：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瓦尔柯的低沉的嗓音跟他唱起来。越来越多的声音，先是近处的，后来是愈来愈远的声音，都和他们的声音汇合起来了，《国际歌》的歌声像缓缓的浪涛从地下腾向黑暗的、乌云密布的天空。

在这黑暗可怕的时刻，“木头街”上一所小房子的门悄悄地打开了，玛丽雅·安德烈耶芙娜·鲍尔茨和华丽雅，还有一个身材不高的人，一齐走下台阶，那人衣服穿得很多，背着背包，拿着手杖。

玛丽雅·安德烈耶芙娜和华丽雅一边一个拉着那人的手，沿着街道向草原走去。她们的衣服不住被风刮起。

走了几步那人停下了。

“黑得很，你还是回去吧，”他几乎是用耳语说。

玛丽雅·安德烈耶芙娜拥抱着他，他们就这样站了一会。

“再见了，亲爱的玛丽雅。”他说了就无可奈何地挥了挥手。

于是玛丽雅·安德烈耶芙娜就留下了，而他们父女二人，就手搀着手继续前进。华丽雅要陪着父亲走到天明。以后，不管他的视力多么差，他也得独自设法走到斯大林诺城，到了那边他打算躲在妻子的亲戚家里。

有好一会工夫，玛丽雅·安德烈耶芙娜还能听到他们的脚步声，后来连脚步声也听不见了。寒冷的、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包围着她，但是玛丽雅·安德烈耶芙娜的心里却更为黑暗。全部生活——工作、家庭、梦想、爱情、孩子——这一切都瓦解了，崩溃了，前面是一片空虚。

她站在那里，无力挪动；风呼啸着，吹得她的衣服乱卷；

可以听到低悬在头上的乌云发出轻轻的沙沙声。

突然间，她觉得，她神经错乱了……她凝神听了一会……不，这不是她的幻觉，她又听到了这个声音……有人在唱歌！在唱《国际歌》……不能肯定这歌声来自何方。这歌声和风的怒号声以及乌云的沙沙声交织在一块，随着这些音响一起飘扬到整个黑暗的世界。

玛丽雅·安德烈耶芙娜的心似乎停止了跳动，她浑身颤抖起来。

第三十六章

仿佛是从地下传到她耳朵里：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奴隶们起来，起来！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我，奥列格·柯舍沃伊，在加入‘青年近卫军’队伍的时候，对着我的战友，对着祖国灾难深重的土地，对着全体人民，庄严宣誓：绝对执行组织的任何任务；对于有关我在‘青年近卫军’的一切工作严守秘密。我发誓要毫不留情地为被焚毁、被破坏的城市和乡村，为我们人民所流的鲜血，为矿工英雄的死难复仇。如果为了复仇而需要我的生命，我将毫不犹豫地献出它。如果我因为禁不住拷打或是由于胆怯而破坏这神圣的誓言，那就让我的名字和我的亲人遗臭万年，让我本人受到同志们的严峻的手的惩罚。以血还血，以命抵命！”

“我，邬丽亚娜·葛洛莫娃，在加入‘青年近卫军’队伍的时候，对着我的战友，对着祖国灾难深重的土地，对着全体人民，庄严宣誓……”

“我，伊凡·杜尔根尼奇，在加入‘青年近卫军’队伍的时候，对着我的战友，对着祖国灾难深重的土地，对着全体人民，庄严宣誓……”

“我，伊万·捷姆奴霍夫，庄严宣誓……”

“我，谢尔盖·邱列宁，庄严宣誓……”

“我，刘波芙·谢夫卓娃，庄严宣誓……”

……

……

这个谢尔格·列瓦肖夫，上回他第一次来找她，敲她的窗，她跑出去迎接他，后来他们一直谈到天亮，那时候，他大概完全不了解她，——谁知道他想到哪里去了！

不管怎样，她这次出门，还没有走，就遇到谢尔格·列瓦肖夫这第一个难题。他们是老同学，当然，刘勃卡不能不跟他打个招呼就走。安德烈叔叔没有被捕的时候，谢尔格就遵照他的劝告进了办事处的车库当卡车司机。刘勃卡派了街上的一个顽童去找他，——顽童们跟刘勃卡关系都很好，因为她的性格跟他们差不多。

谢尔格一下班就来，可是时间已经很晚了。他就穿着他从斯大林诺回来时穿的那身工作服——在德国人统治下连矿工都不发工作服。他身上非常脏，精神疲倦，脸色阴沉。

追根究底地问她到哪里去、去干什么——这种事他是不会做的，但是，显然他脑子里整个晚上都在琢磨这件事，他那叫人难受的沉默把刘勃卡惹火了。到末了她忍不住跟他大发了一通脾气。她是他的什么人——是妻子，还是情人？现在，生活中还有这么多的事等着她去做，她根本顾不上去谈情说爱。他到底有什么名分来折磨她？他们不过是同学，她并没有义务向他解释，她是到她需要去的地方料理家务去的。

她仍旧看得出，他并不十分相信她要去办的事，他无非是在吃醋，这使她感到几分满足。

她需要好好地睡一觉，可是他老赖着不走。他的脾气犟得要命，他会坐上一夜不走，最后刘勃卡还是把他撵走了。但是如果在她离开的期间他一直这样闷闷不乐，她还是觉得于心不忍，所以她送他到院子里，在大门口挽住他的胳膊，紧挨着他站了一会儿才跑回屋子，马上脱掉衣服，钻到母亲的床上。

当然，说服妈妈也很伤脑筋。刘勃卡知道，面对着生活厄运束手无策的妈妈，孤零零地留下来是多么难受，不过妈妈非常老实，容易受骗，所以刘勃卡就紧偎着妈妈，对她编了一大套使她不会怀疑的话，后来就在母亲床上睡着了。

天蒙蒙亮，刘勃卡就醒了，她一面哼唱着，一面收拾行装，准备上路。她舍不得把好衣服弄坏，决定穿家常的衣服，但是仍然要尽量穿得鲜艳一些，可以惹人注目。至于她那件最漂亮的天蓝色真绉纱的连衣裙、天蓝色的鞋子、镶花边的内衣和丝袜，她都放在小手提箱里。起先她只穿贴身衬衫和短裤，对着两面勉强可以照得见整个头部的普通小镜子卷头发，嘴里哼唱着，把头转来转去地搞了将近两个小时。由于站得太累，她把重心轮换放在两只奶油色的、结实的、小小的脚趾也很结实的光脚上。然后她套上束腰带，用小手擦擦粉红色的脚底，穿上肉色麻纱袜和奶黄色皮鞋，把那件薄薄的，窸窣作声的，印着豌豆、樱桃、还有天晓得是什么花花绿绿的玩意儿的连衣裙朝身上一套。这时她还是不停地哼唱，但是一边穿衣服一边已经在嚼什么东西了。

她感到轻微的激动，这不仅没有使她胆怯，反而给她壮了胆。归根到底，她真是幸福，因为她可以行动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她可以不必再白白耗费自己的精力了。

两三天前的一个早上，一辆不大的、有着长方形车厢的绿色汽车，就是从伏罗希洛夫格勒运食物给德国行政机关的官员们的那种货车，在谢夫卓夫家的小房子旁边停下。开车的宪兵对坐在他身旁的带自动枪的兵士说了一

句什么，就跳下车来，走进屋子。刘勃卡迎着他走出来，他已经进了餐室，在东张西望。他迅速地朝刘勃卡瞥了一眼。他还没有开口，她已经根据他脸部某些难以捉摸的线条和举止，看出他是俄罗斯人。果然，他说的是地道的俄语：

“汽车要加水，您这儿有没有水？”

一个俄罗斯人，而且还穿着德国宪兵制服——他也不打听打听，他是跑到谁家来了！

“滚你的蛋！懂吗？”刘勃卡圆睁着蓝眼睛，泰然地直瞪着他，说。

她根本连想也没有想，冲口就对这个穿军服的俄罗斯人说出了这句话。要是他胆敢碰她一下，她就会哇哇叫着奔到街上，惊动整个街区的人，大喊大嚷着说她让那个兵士到峡谷里去取水，他因此就要打她。但是这个奇怪的开车的宪兵一动也没有动，他只冷笑了一声，说：

“您做事太莽撞。这对您没有好处……”他迅速地张望了一下，看看他们背后有没有人，就急急地说：“瓦尔瓦拉·纳乌莫夫娜叫我捎个口信，她非常想念您……”

刘勃卡的脸色苍白了，不由地朝他挪动了一下。但是他把细长的黑手指放到嘴唇边，阻止她发问。

他跟着刘勃卡走到门道里。她双手提着满满的一桶水，探索地窥视着司机的眼色。但是他对她望也不望，接过水桶就向汽车走去。

刘勃卡故意不跟着他，而是从门缝里观察：她希望等他送还水桶的时候能向他打听点消息。哪知那个司机把水灌进散热器之后，就把水桶朝庭园里一扔，很快地坐进车子，砰的一声关上车门，车子就开动了。

这样一来，刘勃卡就得到伏罗希洛夫格勒去一趟。当然，她现在受“青年近卫军”的纪律的约束，不能不通知奥列格一声就走掉。不错，她以前也曾向他暗示过，说她在伏罗希洛夫格勒认识一些人，可能有用。现在她对他说，碰巧有个适当的机会可以去看看。但是奥列格没有马上允许她，请她稍等一下。

使她感到惊奇的是：在他们谈话之后总共只过了一两个小时，妮娜·伊凡卓娃就来到刘勃卡家，告诉她同意她去，而且还说：

“到了那边，你把我们的人死难的经过、他们的姓名以及他们在公园里被活埋的情形，统统告诉他们。你再说，尽管这样，工作还是大有开展，这是上级同志请你这样转告的。关于‘青年近卫军’，你也告诉他们。”

刘勃卡忍不住了，问道：

“卡苏克怎么知道，到了那边可以谈这一切的呢？”

妮娜在斯大林诺做地下工作时就养成小心谨慎的习惯。所以她只耸了耸肩，但是继而一想，刘勃卡也的确可能不敢把交待她说的话对那边讲，于是她就用平淡的声调说：

“大概上级同志知道你去找谁。”

刘勃卡甚至觉得奇怪，这么简单的理由她怎么会没有想到。

刘勃卡像其他参加“青年近卫军”的人一样（沃洛佳除外），既不知道，也不想去打听奥列格跟克拉斯诺顿的成年地下工作者里的什么人有联系。但是刘季柯夫却很清楚，刘勃卡被留在克拉斯诺顿是为了什么目的，她跟伏罗希洛夫格勒那边的什么人有联系。

是一个寒冷的日子，乌云低低地在草原上空奔驰。刘勃卡一手提着小

手提箱，另一只胳臂上搭着一件薄大衣，站在开阔的伏罗希洛夫格勒公路上。冷风吹拂着她的色彩鲜艳的连衣裙，吹得她两颊通红，但是她并不觉得冷。

公路上常有卡车吼叫着在她身旁疾驶而过，车上的德国兵和上等兵嘻嘻哈哈地硬请她上去，有时还对她做下流的手势，但是她鄙视地眯起眼睛，不去理睬他们。后来她看见有一辆车身低而长的浅色小汽车向她驶近，司机旁边坐着一个德国军官，她就随随便便地举起了手。

军官迅速地朝后座转过身去，显露出背部褪色的制服，大概，有上级坐在那里。汽车发出煞车的吱吱声，停了下来。

“请坐！快些！①”军官把车门打开一点，嘴角微露笑意，对刘勃卡说。他又砰的一声关上车门，伸过手去打开后座的车门。

刘勃卡低下头，拿着小手提箱和大衣，轻快而麻利地上了车，车门在她身后砰的一声关上了。

汽车猛的开动，迎风发出啸声。

刘勃卡旁边坐着一个干瘦而结实的上校，他的灰黄的脸刮得精光，厚嘴唇耷拉着，头上戴着褪色的高顶军帽。德国上校和刘勃卡带着两种形式完全相反的傲慢互相对视着——上校是因为他有权力，刘勃卡是因为她毕竟非常心慌。坐在前面的青年军官也转过脸来望着刘勃卡。

“您要我们把您送到哪儿去？②”脸刮得很光的上校带着布西门人③的笑容问道。　　①②　原文为德语。

③布西门人是南非的一个部族。

“我一点儿也不懂！”刘勃卡曼声说道，“请您说俄语，不然就别开口。”

“到哪儿去，到哪儿去……”上校把一只手不明确地朝远方挥了一下，用俄语说道。

“谢天谢地，老母鸡咕咕叫了。”刘勃卡说，“伏罗希洛夫格勒，还是叫鲁干斯克……‘费尔什推埃’？嗳，对了！”

她一开了口，她的恐惧就消失了，她马上恢复了那种潇洒自然的态度，这种态度可以使任何一个人，包括这个德国上校在内，把刘勃卡所说和所做的一切都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事。

“请问，现在几点钟？……表，表，真是个笨蛋！”刘勃卡说，一面用手指敲敲自己的手腕。

上校把他的长胳臂伸直，让衣袖往上缩些，然后机械地弯过胳臂，把戴在皮包骨头的、长着稀疏的烟灰色汗毛的胳臂上的方手表送到刘勃卡面前。

归根到底，只要愿意，总是可以相互了解的，并不一定要语言相通。

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她是演员。不，她不在剧院里演戏，她是唱歌和跳舞的。当然，在伏罗希洛夫格勒她有好多可以下榻的地方，好多有地位的人都认识她，因为，她是一位著名实业家的女儿。这位实业家在哥尔洛夫卡拥有许多矿井。可恨苏维埃政权剥夺了他的一切，后来这个不幸的人死在西伯利亚，撇下了妻子和四个孩子——都是姑娘，都长得非常漂亮。

是的，她是最小的。不，她不能接受他的殷勤招待，因为这会损害她的名誉，而她绝不是那种人。她的地址吗？她是绝对肯给的，但是她还没决定究竟住在哪里。如果上校准许，她就跟他的中尉讲定他们怎样可以找到对方。

“好像您比我更有希望，鲁道尔夫！”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一定为您尽力，上校先生①”　　①原文为德语。

离前线远不远？前线的情况好得很，这样漂亮的姑娘尽可以不必为它操心。反正，她可以高枕无忧。斯大林格勒指日可下。我们已经向高加索挺进，——这能使她满意吗？……在顿河上游，战线并不怎么远，是谁告诉她的？……哦，是这些德国军官！可见，喜欢这样随便乱讲的并不止他一个……据说，所有漂亮的俄国姑娘都是间谍。这是不是真的？……不错，情况所以如此，是因为在这一段战线上的是匈牙利人，当然，他们比这些臭气熏人的罗马尼亚人和意大利佬要好些，不过他们这批家伙都靠不住……战线长得要命，斯大林格勒消耗大量的人力。要把这一切东西供应给前线，您倒来试试看！我可以在手纹上给您说明，——把您的小手掌给我……

这条粗线是通斯大林格勒的，这条断断续续的是通莫兹多克，——您的性格非常善变！……现在您把这个放大一百万倍，您就会明白，德国军队的军需官非要有钢铁般的神经不行。不，她不应该认为，他只会给当兵的采办军裤，他也有漂亮姑娘们用的一些漂亮的小玩意，比方脚上穿的，比方这里用的，——她明白他指的是什么吧？也许，她不会拒绝巧克力吧？尘土这么大，喝口酒总不妨事吧！……一个姑娘不喝酒，这是非常自然的，但是——这是法国酒啊！鲁道尔夫，停车……

他们停在离一个分布在公路两边的哥萨克大村庄二百来米的地方，下了车。这里有一条尘土飞扬的坡路通到山沟边上的村道，山沟下面长满柳树，斜坡上风吹不到，满是已经枯萎的草。中尉让司机把车开到通山沟的村道上。风吹起了刘勃卡的衣服，她就双手按着衣服跟着汽车在军官们前面跑，鞋子不断陷在被踩碎的干土里，鞋子里立刻就灌满了沙土。

刘勃卡几乎没有看到过中尉的脸，她一直只看到他的褪色的制服的后背。现在中尉跟开车的兵士从汽车里拿出一只软皮箱和一只淡黄色的、编得极细的、沉甸甸的篮子。

他们在山沟斜坡上背风一面的密密的枯草上坐下。不管他们好劝歹劝，刘勃卡总不肯喝酒。但是这里的台布上摆了这么多美味可口的东西，要是拒绝不吃才傻呢，何况她是个演员，一个实业家的女儿，于是她就放量吃了。

她非常讨厌鞋子里的沙土，她索性脱下奶黄色的皮鞋，抖掉沙土，再用小手掌擦擦穿着麻纱袜的小脚底，坐着的时候就这样光穿袜子，让脚透透气，——她就这样解除了一个实业家的女儿会不会这样做法的那种内心的疑虑。大概，这做得很对，至少这两个德国军官是把这看做理所当然的事。

她还是很想知道，在最接近克拉斯诺顿和穿过罗斯托夫州北部的那一段战线上的师团多不多，——她已经听那些在她们家过宿的德国军官们说过，罗斯托夫州的一部分还在我们手里。她老是表示担心，战线会在这个地方被突破，害得她又要受布尔什维克的奴役，这种担心使这个比较感情用事而不大实事求是的上校大为不满。

到后来，对德国军队这种不信任的态度把上校惹恼了，于是他就又骂了一句——该死的！①——满足了她的好奇心。　　①原文为德语。

正当他们在这儿吃点心的时候，从村庄那边的公路上传来了愈来愈响的杂乱的脚步声。

起初他们没有去理会它，但是它从老远的地方传过来，愈来愈响，充塞着周围的整个空间，仿佛有一个长得没有尽头的队伍在行进，甚至从这里

山沟斜坡上也可以看到公路上漫天的尘土被风吹往一边和吹向高处。传来了个别的人声和叫喊声。男的——粗声粗气；女的——哀怨凄婉，好像在恸哭亡人。

德国上校、中尉，还有刘勃卡，都站了起来，从山沟里探头张望。一大队由罗马尼亚官兵押着的苏军俘虏，不断从村庄那边沿着公路走出来。许多老老少少的哥萨克妇女跟在队伍旁边奔跑，叫喊，哭泣，她们有时冲过罗马尼亚兵士的警戒线走近队伍，把面包灯、西红柿、鸡蛋，或是整个大面包甚至小包裹投到那些从队伍里向她们伸出来的乌黑、干瘦的手里。

战俘们穿的是撕破的、变成黑色的、沾满尘土的军裤和军便服，衣不蔽体。大多数是赤着脚或是穿着破烂不堪的鞋子，有的穿着破破烂烂的树皮鞋。他们的胡子长得老长，骨瘦如柴，穿的衣服好像是披在骷髅上。他们向那些在队伍旁边奔跑、叫喊、被兵士们用拳头和枪托驱赶着的妇女投去明朗的微笑，在这些脸上看到这样的微笑真是可怕。

刘勃卡从山沟里探出头来瞥了一下，一刹那间她已经只穿着袜子顺着干燥的细土路跑上公路，冲进了队伍。她都不记得，她是在什么时候和怎样从台布上抓起雪白的小面包和其他的吃食。她把小面包和一块块食物塞到向她伸过来的又脏又黑的手里。一个罗马尼亚司务长打算抓住她，她就东躲西闪；他的拳头雨点似的落在她身上，可是她低着头，不住用两只臂肘左右招架，嘴里喊着：

“你打吧，打吧，狗腿子！只是别打脑袋！”

一双有力的手把她从队伍里拉出来。她不知怎样到了公路旁边，看见德国中尉正在使劲挥手打那个罗马尼亚司务长的耳光。上校在大发雷霆，样子像一只呲着牙的身子细长而筋肉强壮的狗。他面前直挺挺地站着一个穿浅绿色制服的罗马尼亚占领军的军官，用古罗马语不连贯地、嘟嘟囔囔地说着什么。

但是等奶黄色皮鞋重又穿到她的脚上，德国军官的汽车载着她驶向伏罗希洛夫格勒的时候，她已经完全平静下来。最奇怪的是，德国人竟然把刘勃卡的这番举动也当做是合情合理的事。

他们畅行无阻地通过德军检查站，开进了城。

中尉转过身来问刘勃卡，把她送到哪里。刘勃卡已经完全能控制自己，就把手直朝街上一挥。到了一所她认为和矿主的女儿的身分相称的房子旁边，她就请他们停车。

刘勃卡把大衣搭在胳臂上，由给她提着手提箱的中尉陪同，走到她从未来过的这所房子的门口。这时她踌躇了一下：她要不要在这里就设法摆脱中尉，还是碰上第一家就当着他的面敲这家的门？她迟疑不决地望了望中尉，哪知他完全误解了她的目光，竟用空着的那只手把她拉过去。在同一瞬间，她甚至并不特别恼火地在他的绯红色的面颊上相当重地打了一下，就顺着楼梯跑上去。中尉把这也当做理所当然的事，他脸上带着旧小说里称为陪笑脸的那种笑容乖乖地提着刘勃卡的手提箱跟着她。

她上到二楼，就非常坚决地用小拳头把第一扇门擂了一阵，好像她是出门很久才回家似的。来开门的是一个瘦高个儿太太，面带怒容，神情高傲，脸上还保留着如果不是当年的美貌，那也是对美貌绝对关心的痕迹。刘勃卡真是交了好运！

“丹凯—勋，赫尔—雷特能！①”刘勃卡把她所有的德语词汇都搬了出

来，非常大胆地说。她的发音难听无比，说了就伸手去接手提箱。

开门的太太带着无法掩饰的恐怖表情望着德国中尉和这个衣服鲜艳夺目的德国女人。

“等一下！②”中尉放下手提箱，动作迅速地从挂在肩上的图囊里摸出一个笔记本，用一支外面没有上漆的粗铅笔在一张纸上写了几个字，撕下来递给刘勃卡。

①德语“非常感谢，中尉先生！”的译音。

②原文为德语。

这是一个地址。刘勃卡既来不及看，也来不及考虑矿主的女儿在这种场合该怎么做。她迅速地把地址塞到胸罩里面，随便地对那个举手敬礼的中尉点了点头，就走进了前厅。刘勃卡听见那位太太在她身后关了门，上了不知多少道的锁、门闩和搭链。

“妈妈！是谁？”一个女孩从房间里面问道。

“别嚷！我马上就来！”那位太太说。

刘勃卡一手提着手提箱，一只胳臂上搭着大衣走进房间。

“他们叫我到你们家来住……我不会妨碍你们吧？”她亲切地朝女孩望了一眼说，一面打量这所宽敞、家具讲究、然而无人照管的住宅：这里住的可能是一个医生或是工程师，或是教授，但是显然，当初为了那个人把这所住宅布置得这么好，而现在那人已经不在这里了。

“到底是谁叫您住到这儿来的呀？”那个女孩带着平静的惊奇问，“是德国人呢，还是什么人？”

女孩显然刚回家。她戴着咖啡色的帽子，两腮吹得鲜红。这是一个胖乎乎的女孩，约莫十三四岁，胖胖的脖子，鼓鼓的两腮，身体结实，好像个白蘑菇，上面给安上一双灵活的栗色小眼睛。

“塔莫奇卡！”那位太太严厉地说，“这跟我们完全没有关系。”

“妈妈，要是人家把她送到我们屋子里来住，怎么叫没有关系呢？我不过是想知道知道。”

“对不起，您是德国人吗？”那位太太困惑地问。

“不，我是俄罗斯人……我是个演员。”刘勃卡不十分肯定地说。

大家沉默了一会，这时女孩对刘勃卡已经完全明白了。

“俄罗斯演员都已经撤退了！”

说了之后，“白蘑菇”气得满脸通红，从房里跑了出去。

这样，刘勃卡当场就得喝干这破坏胜利者在被占领区的生活乐趣的满杯苦酒。不过她懂得，还是赖在这所房子里对她有利，而且就是以她刘勃卡现在被接待的那种身分赖在这里。

“我住不长，我要找一个可以久住的地方，”刘勃卡说，不过她还是非常希望这所房子里的人对她态度友好些，所以她就加了一句：“真的，我很快就会找到！什么地方可以换衣服？”

半小时以后，穿着天蓝色绉纱连衣裙和天蓝色鞋子的俄罗斯女演员已经把大衣搭在胳臂上，走到把城市分成两部分的洼地里的铁路过道口，然后顺着一条没有铺好的石子路，上坡去石滩城。她是到城里来巡回演出的，并且要找一个固定的住所。

第三十七章

普罗庆柯是个谨慎的人，他认为最好尽量不去利用留给他的秘密接头地点，其中也包括伏罗希洛夫格勒方面的接头地点。但是在最重要的地区书记雅柯温柯遇难之后，普罗庆柯到伏罗希洛夫格勒去就成为十分必要的了。他是个勇敢的人，他冒着危险去利用老关系，——去找他妻子的女友，一个性情温和、个人生活不幸的单身妇女。她名叫玛莎·舒宾娜。她原来在机车制造厂里当制图员，在工厂第一批和第二批疏散的时候，她纯粹是出于热爱故乡而没有从伏罗希洛夫格勒撤退。不管怎样，她坚信故乡决不会沦陷，有一天她会有用的。

普罗庆柯听了妻子的劝告，决定去找玛莎，这是他们夫妇坐在玛尔法的地窖里那一夜决定的。

普罗庆柯不能带妻子走：他们在伏罗希洛夫格勒工作多年，两人在一起太引人注意。而且从工作考虑，卡佳也是留在这里更为相宜——可以跟区里的游击队小组和地下组织联系。

所以他们当时在地窖里就决定，卡佳还是装做亲戚留在玛尔法家里，等住熟之后，如果有可能，就在附近村里找个教书的工作。

可是当他们作出这样决定的时候，他们不由地想到，自从他们共同生活以来，他们还是第一次要分别，而且是在他们可能永远不能再相见的这种时候分别。

他们沉默起来，久久拥抱着坐在那里。突然他们感到，他们这样拥抱着坐在这个黑暗潮湿的地窖里是美好而幸福的。

正像在许多结合已久的，由于观点的一致，而且不仅由于丈夫的、也由于妻子的劳动生活，还由于有了子女而牢牢结合起来的家庭里一样，他们的关系已经不需要经常的外表的感情流露。他们的感情深藏在内心里，好像灰烬里的热炭，遇到生活考验、社会动荡、痛苦和欢乐的日子，它就会突然发出熊熊的火焰。啊，那时在记忆中就多么鲜明地浮现出他们在鲁干斯克公园的最初几次相会、荡漾在城市上空的这种浓郁的槐花的香味、展开在他们青春岁月之上的繁星密布的夜空、青年时代的海阔天空的梦想、第一次肉体接触的欢乐、第一个孩子出生时感到的幸福、以及由于性格不同而产生的最初的酸涩的果实！不过这仍然是多么美妙的果实啊！吃了这种果实，只有脆弱的灵魂才会分离，坚强的灵魂是会永世结合在一起的。

对爱情来说，严峻的生活考验和对初恋的生动的回忆，都是同样不可缺少的。前者把人联系在一起，后者令人永葆青春。共同的道路把人联系在一起的力量是伟大的，假如可以用“你可记得？……”这寥寥几个字来表达的感情永远能使你们激动。这甚至不是回忆。这是水恒的青春的光辉，是更向前进、走向未来的召唤。把它保存在自己心坎里的人是幸福的……

普罗庆柯和卡佳坐在玛尔法的漆黑的地窖里所体验到的正是这样的幸福之感。

他们坐在那里默默无言，但是他们心里却鸣响着：“你可记得？你记得吗？……”

他们特别难以忘怀的是他们最后表白爱情的那一天。他们已经有好几个月经常会面，实际上，根据他的可以为她赴汤蹈火的言谈和举动，她已经一切都明白了。但是她总不让他倾吐心底里的话，自己也没有向他许下任何

诺言。

头天晚上他说服她第二天到他宿舍的院子里来找

他，——他在州委党校里学习。她同意来，这就是他的一大胜利：就是说，她在他的同学面前已经不感到怕羞，因为下课后这几个钟点里，院子里总是挤满了学员们。

她来的时候宿舍的院子里都是人。学员们正在院子当中玩打棒游戏，他也在玩。他穿着乌克兰式衬衫，没有束带子，敞着领口，兴高采烈。他跑到她面前问了好，说："你等一下，我们马上就完……"这时院子里所有的学员都望着他们，后来大家闪开一点，让个地方给她，于是她也来看游戏，但是她只望着他。

她一向总因为他的个子不高而感到有些不好意思，可是现在她仿佛是第一次看见他的全身，看到他是多么强壮、敏捷和顽皮。最复杂难打的棒子他只要一棍就能把它们打出去。

她觉得，这一切他都是为她做的。他不断地在耍弄对手。

那时列宁大街初次浇上柏油，天气炎热，他们在发软的柏油路上走着，非常幸福。他穿着那件乌克兰式衬衫，但是腰里已经束上带子，披散下来的亚麻色头发是波浪形的。他在她身边走着，不停地说着。走过一个摊子的时候，他买了些干枣，放在纸袋里拿着。枣子是热的，很甜，可是只有她一个人吃，因为他老在说话。她记得最清楚的是在这样美妙的柏油路上竟没有垃圾箱，连枣核都没有地方吐，她只好把枣核含在嘴里，希望等拐到一条较差的街上再吐掉。

突然他住了嘴，用那样的眼光望了望她，把她看得不好意思起来。接着他说：

"我现在就要在大街上当着人家的面吻你！"

那时她身上的那股犟劲发作了，她含着愠意瞟了他一眼，说：

"你敢试一试，我就把枣核都吐到你脸上！"

"多吗？"他非常正经地问。

"有十一二颗！"

"我们跑到公园里去吧？跑步走！……"他喊了一声，不容她思索，一把就抓住她的手。他们就一路上嘻嘻哈哈，旁若无人地朝公园跑去。

"你可记得？……你记得吗，那一夜公园里多么美？……"

现在，在这黑洞洞的地窖里，就像当年在星空下的鲁干斯克公园里一样，卡佳信任地把她的发烫的脸藏在丈夫的有力的令人感到舒服的肩膀、脖子和长满柔须的面颊中间。他们就这样坐到破晓，没有一丝睡意。后来普罗庆柯把妻子紧紧搂了一下，接着把脸移开一点，放松了手。

"该走了，是时候了，我的小燕子，我亲爱的小鸽子！"他说。

但是她仍然不肯把脸从他肩上移开，他们又这样一直坐到外面通明大亮。

普罗庆柯派柯尔聂·季霍诺维奇祖孙俩到米佳金根据地去打听队伍的情况。他花了很多时间向老头说明，应该怎样采取小组行动，怎样由农民、哥萨克和定居在各个村里的复员军人组成新的游击小组。

玛尔法招待他们吃饭的时候，一个老大爷，玛尔法的远亲，终于突破孩子们的警戒线闯进来，正好赶上吃饭。对什么事都感兴趣的普罗庆柯就抓住老大爷问长问短，想了解了解一个普通乡下老头对目前局势的估计。这个

老大爷就是给柯舍沃伊和他的亲属赶车的那个饱经沧桑的老头，他的黄骠马到底还是被过路的德国军需官们抢去了，因此他只好回乡去投靠亲戚。老大爷一听就明白，跟他说话的不是个普通人，他就七拉八扯地谈起来：

“你瞧，是这么回事……三个多星期以来一直有他们的军队开过去。开过去的兵力可真大呀！红军现在是不会回来了，不会回来了……战事已经在伏尔加对岸，在古比雪夫附近进行，莫斯科被包围了，列宁格勒被占领了，还有啥好说的呀！

希特勒说，他要用围困法拿下莫斯科。”

“我相信你已经把这些谎话信以为真了！”普罗庆柯眼睛里带着魔鬼般的火星说，“你瞧，老朋友，咱俩个子差不多，你们你的衣服给我一身，我把我的留给你。”

“哦，原来如此！”老大爷一下子全都明白了，用俄语说道，“衣服我马上给你拿来。”

个子矮小的普罗庆柯自己虽然并不老，但是胡子已经留得相当长，他就穿着这个老大爷的衣服，背着背包进了石滩城，闯到玛莎家里。

他乔装打扮在故乡的街道上行走，心里觉得很不是滋味。

普罗庆柯在这里出生，又在这里工作过多年。许多企业、机关、俱乐部的房屋和住宅都是他亲眼看着——并且大部分是由于他的努力——兴建起来的。比方说，他记得怎样在市苏维埃主席团会议上订出兴建这个小公园的计划，他怎样亲自监督布置和栽种灌木。他本人在故乡的市政建设上不知花了多少心血，可是在市委还总是有人责怪，说院子和街道不够清洁，这倒也是事实。

现在一部分房屋被炸毁了。在保卫战最激烈的时候，大家都没有注意到，这种破坏使城市变得多么难看。但是问题甚至不在这里：相隔不过几个星期，这个城市已经变得满目荒凉，仿佛新的主人连自己也不相信他们是搬来久居的。街道不洒水，不打扫，小公园里的鲜花都枯萎了，草坪上杂草丛生，纸片和烟蒂旋风似的在浓密的红色尘土里盘旋。

这里是煤都之一。以前运到这儿来的货物比运到国内其他许多地区的要多。街上的人群都衣冠整齐，色彩华丽。可以感到，这是南方的城市：总是有许多水果、鲜花、鸽子。现在却是人群稀少，色调灰暗，不引人注目了。人们都穿得马虎、单调，仿佛是故意不修边幅似的。给人的印象是，他们似乎连脸也不洗。给街道增添表面色彩的是敌人官兵的制服、肩章和证章，最多的是德国人和意大利人，但也有罗马尼亚人和匈牙利人。只听到他们说话的声音，只有他们的汽车乱揿着喇叭满街飞跑，卷起阵阵的尘土。普罗庆柯有生以来还没有感到过对这个城市和它的居民怀着这样深切的爱怜之情。

他有这样的感觉：他有过一个家，但是他被赶出这个家，现在他偷偷地回到老家，眼看着新的主人们在盗窃他的财产，用脏手掠夺他所珍惜的一切，作践他的亲人，而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毫无办法。

在妻子的女友身上也打着这种普遍的抑郁和邋遢的烙印：她穿的是破旧的深色衣服；亚麻色的头发胡乱挽了一个髻；好久不洗的脚上穿着便鞋，显然，她就是这样脚也不洗就上床睡觉的。

“玛莎，怎么可以这样消沉！”普罗庆柯憋不住了。

她无动于衷地望望自己身上，说：

“是吗？我倒没有注意。大家都是这样生活，而且这样也比较好：省得

他们来纠缠不清……再说，城里也没有水……”

她不作声了。普罗庆柯这才注意到，她是多么消瘦，她的房间里空空荡荡，不像个家的样子。他猜想她大概经常忍饥挨饿，早把东西变卖一空了。

“啊，我们来吃点东西吧……这都是一个好心的妇女给我预备的，真是个聪明的女人！”他在他的背包旁边忙起来，不好意思地说。

“我的天，问题难道是在这里吗？”她用双手捂住脸。“请您带我走吧！”她突然感情激动地说，“带我到卡佳那里去，我情愿尽我的力量服侍你们！……我情愿做你们的仆人，只要不天天受这种窝囊气，只要不这样慢腾腾地等死，没有工作，生活又没有任何目的！……”

她像平时一样对他称“您”，虽然她跟卡佳从小就是朋友，从他跟卡佳结婚起就认识他。他以前也猜到，她所以不肯对他称“你”，是因为不能排除她这个普通制图员和他这个重要干部之间的悬殊之感。

普罗庆柯的宽阔的前额上出现了一条深深的皱纹，他的灵活的蓝眼睛里露出严峻的、关切的神色。

“我要直截了当地跟你谈一谈，也许很不客气，”他说，并不望着她。“玛莎！要是问题只关系到你和我，我就可以带你到卡佳那儿去，把你们俩藏起来，我自己也躲起来。”他带着严厉的苦笑说。“但是我是国家的公仆，我希望你也能尽最大的力量为我们的国家服务：我不但不带你离开这里，我还要让你去赴汤蹈火。你要对我直说：你同意不同意？你有没有这样的力量？”

“干什么我都同意，只要不过我现在过的这种生活！”她说。

“不，这不是答复！”普罗庆柯严厉地说，“我给你指的出路并不是为了拯救你的灵魂，我是问你：你同意不同意为人民和国家服务？”

“我同意。”她轻轻地说。

他迅速地隔着桌角向她弯过身去，抓住了她的手。

“我要跟这儿城里的自己人建立联系，可是这儿出过事。哪一个接头地点可靠，我没有把握……你应当拿出勇气和魔鬼那样的狡猾，去检查我给你的那些接头地点。你肯不肯去干？”

“我去。”她说。

“你要是出了事，他们会慢慢地折磨你，让你不死不活。

你不会泄露吧？”

她沉默了一会，仿佛在检查自己的灵魂。

“我不会泄露。”她说。

“那么你听着……”

在昏暗的灯光下，他把身子向她弯得更近（近到使她看见他的秃鬓上的一个新伤痕），给了她一个就在石滩城的秘密接头地点，他认为这一个比其他的可靠些。他特别需要这个接头地点，因为通过它，他可以跟乌克兰游击队司令部联系，并且不仅可以了解一个州里的情况，而且还可以了解苏联各地的情况。

玛莎表示愿意立刻就去。这种缺乏经验的表现和天真的牺牲精神的结合，使普罗庆柯心里深受感动。狡黠的火星顽皮地从他的一只眼睛里跳进了另一只眼睛里。

“这怎么行！”他带着高兴的、亲切的谴责口吻说。“这需要做细致的工作，就像在时装公司里工作一样。你要大摇大摆地大天白日去，我会教你怎么做和做些什么……我还要保证我的后方不出问题呢！你住的是谁的房

子？”

玛莎在机车制造厂的一个老工人的小房子里租了一间屋子。这座小房子是石头砌的，当中有一条过道，过道的一头通大街，一头通到用石砌矮墙围着的院子。小房子的一半有一间屋子和一个厨房，另一半是两个小房间，玛莎就租了其中的一间。老头的子女很多，但是他们早已跟他分开：儿子有的在军队里，有的疏散了，女儿们结婚后都住在别的城市里。据玛莎说，房东为人谨慎仔细，爱读书，虽然有点孤僻，但是为人正直。

“我就说您是我的舅舅，从乡下来的，我母亲也是乌克兰人。我就说是我自己写信叫您来的，要不然我的日子不好过。”

“你把你舅舅带去见见房东：我们来看看，他这个人怎么孤僻法！”普罗庆柯干笑着说。

“那算是什么干活，拿什么来干活啊？”那个“孤僻人”阴郁地嘟囔着，偶尔抬起鼓出的大眼睛望望普罗庆柯的胡子和他右边秃鬓上的伤痕。“我们两次亲手把设备从厂里搬出来，德国人也轰炸过我们好几次……我们造过机车，造过坦克和大炮，可是如今我们反而修理起煤油炉和打火机来了……当然，车间里还有一些零件留下来，要是去收罗收罗，厂里这儿那儿还有好多设备，不过要知道，这需要所谓真正的主人。可是如今……”他挥了挥捏成拳头的干枯、粗糙的小手。“这些人都不是认真办事的人！……目光短浅，而且——都是些贼。你信不信，一个厂里一下子来了三个主人：一个是克虏伯①派来的，从前这个厂是哈特曼的，克虏伯收买了他的股票；还有两个主人是铁路管理局和电力公司——电力公司把我们的热电站抢到手里，虽然我们的人在撤退前把发电站炸了……他们在厂里东晃西晃，结果把厂分成三份。真叫人哭笑不得：一个被破坏了的工厂，他们居然还要给它竖起界标，就像沙皇时代农民给自己的一小块土地竖桩子那样。连厂里的那些路上，也像被猪拱过那样挖了好多坑，截成一段一段。他们分了赃，竖起界标，就各自把残存的设备运回德国去。至于比较小比较次的东西，他们就拿去到处兜售，像旧货市场的投机商人一样。我们的工人讥笑说：‘上帝赐给我们的老板真不赖！’弟兄们这些年来，你自己知道，已经习惯了什么样的规模，可是给这批家伙干活，弟兄们不但不愿意干，连瞅着他们都别扭。总之是叫人哭笑不得……”

①克虏伯是德国最大的军火康采恩的老板之一。

他们——留着长胡子的普罗庆柯、默不作声的玛莎、驼背的老太婆和“孤僻人”——坐在油灯光下，好像是一群穴居人。他们的怪诞的影子时聚时散，在墙上和天花板上显得非常高大。“孤僻人”快上七十了，他身材矮小瘦弱，脑袋很大，使他支持着这个脑袋很费劲。

他说话声调阴沉而单调，只听到一种“布—布—布”的声音。但是普罗庆柯乐意听他讲话，不单是因为这老头说得有理，说的是实话，还因为他喜欢听到一个工人能这样认真而详细地向一个偶然遇到的农民介绍德国人统治下的工业情况。

普罗庆柯终于憋不住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我们在乡下都这么想：他们压根儿不打算在我们乌克兰发展工业，他们的工业都在德国，他们只要我们的粮食和煤。乌克兰好像是他们的殖民地，我们就像是他们的黑奴……”普罗庆柯觉得“孤僻人”在惊奇地望着他，就干笑了一声，说：“我们乡下人这样议论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人民大大地成长了。”

“哦，不错……”“孤僻人”对普罗庆柯的议论已经毫不感到奇怪，说道，“好吧——就算是殖民地。那么，他们把农业推进一步了吗？”

普罗庆柯轻轻地笑起来：

“冬小麦我们插种得稀稀拉拉，有的播在残留着冬麦茬和春麦茬的地里，翻地用的是斫柴刀。你自己明白，我们能播得了多少种！”

“就是那么回事！”“孤僻人”对这事也不表示惊奇，说道。

“他们不会经营。他们搞惯了敲榨勒索，像骗子那样夺取别人的东西，他们就靠这个生活，上帝宽恕，他们还打算带着这种文化去征服全世界呢，真是一批愚蠢的畜生。”他不带恶意地说。

“唉，老头，比起像我这样的庄稼人，你可强得太多啦！”

普罗庆柯高兴地想道。

“您来看您外甥女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人看见您？”“孤僻人”声调不变地问。

“看倒是没有人看见，可是我怕什么？我证件都齐全。”

“这我明白。”“孤僻人”回避地说，“不过这里有规矩，我应该给您向‘警察局’报一下，假如您待不久，就不如免了。伊凡·费奥多罗维奇，因为我一眼就认出了您，所以照直告诉您，要知道，您到我们厂里不知来过多少次，万一坏人也认出了您……”

不，妻子说得不错，她一直对他说他的运气好。

第二天一清早，玛莎到一个接头地点去过之后，带了一个陌生人来见普罗庆柯，那人跟“孤僻人”招呼，好像他们昨天还见过面，这使普罗庆柯和玛莎非常惊讶。普罗庆柯从此人嘴里知道，“孤僻人”是留下做地下工作的自己人。

普罗庆柯也是从这个人嘴里初次听到，德国人已经深入国土：这是伟大的斯大林格勒大战开始的日子。

以后几天，普罗庆柯一直忙于检查和部分地恢复城里同全州的联系。

在活动最紧张的这个时候，给普罗庆柯跟本城组织接上关系的那个人带了“女演员刘勃卡”来见他。

普罗庆柯听完刘勃卡所能讲的关于被关在克拉斯诺顿监狱里的人们死难的详情之后，闷闷地坐着，半晌说不出话来。他为舒尔迦和瓦尔柯惋惜，深深惋惜。“两个多么好的哥萨克！”他心里想。突然他想起了妻子：“她一个人在那边不知怎么样了？……”

“是啊……”他说，“艰苦的地下工作！这样艰苦的地下工作世界上还从来不曾有过……”他在房里来回地踱着，一面仿佛是自言自语似的跟刘勃卡谈话。“有人把我们的地下工作比做那一次武装干涉时期在白党下面的地下工作，可是这哪儿能比呢？这批刽子手的恐怖手段毒辣透顶，白党跟他们一比简直像孩子，这批魔王杀的人要用百万来计算……可是我们也有当时所没有的优越性：我们的地下工作者和游击队，有我们党和国家的全部威力、有我们红军的力量做后盾……我们游击队的自觉性比较高，组织比较严密，技术——武器和通讯工具等等也比较强。这些情况应该向老百姓说明……我们的敌人有着任何人都没有的弱点：他们笨拙得要命，什么事都按照指示去做，按照时刻表去做，他们在我们的老百姓中间生活和行动完全是两眼漆黑，什么都不懂……这是应该利用的一点！”他在刘勃卡对面站住，说，接着又从一个角落踱到另一个角落。“这一切都应该向老百姓说明，让老百姓不要怕

他们，让老百姓学会骗他们。应该把老百姓组织起来，——他们本身就会产生力量：到处都要建立可以在矿井、在农村活动的地下小组。人们不应该躲到树林里去，——我们，去他妈的，偏要待在顿巴斯！应该到矿井去，到农村去，甚至到德国机关里去——到职业介绍所、市参议会、办事处、农业指挥部、‘警察局’、甚至到秘密警察机关里去。用破坏、怠工、无情的恐怖行动从内部来瓦解他们的一切！……把当地的居民——工人、农民、青年——组织成小组，五个人一组，但是到处都要有，不要有死角……他们全是吹牛！敌人在我们这儿吓得牙齿打战！”他说时怀着满腔仇恨，这种情绪也感染了刘勃卡，使她开始呼吸困难起来。这时普罗庆柯记起了刘勃卡“受上级委托”转告他的话，“就是说，你们的工作很得手？在别处也是这样。不过，做这种工作要没有牺牲是不可能的……你叫什么名字？”他又在她对面停下来，问道。

“哦，这不像话：这么好的姑娘不可能是刘勃卡，应该是刘巴①！”快乐的火星在他的一只眼睛里跳了一跳。“啊，你再说说你要些什么？”

①刘巴是刘波芙的爱称，刘勃卡是昵称。

刘勃卡有一霎时觉得，她眼前非常鲜明地呈现出他们七个人排列在一起站在室内的情景。低低的乌云在窗外奔跑。每一个走到队列前面的人都脸色苍白，宣读誓词的声音都提得很高，达到响铃似的调子，遮盖了那虔敬的颤抖。由奥列格和万尼亚起草、经他们全体通过的誓词，这时突然离开了他们，高升到他们头上，比法律更为森严，更为不可动摇。刘勃卡回忆起这幅情景，她的脸色由于重又感到激动而发白，脸上那双稚气的、射出冷酷刚强的光芒的蓝眼睛也显得异常富于表情。

“我们需要指导和帮助。”她说。

“你们是谁？”

“‘青年近卫军’……我们的指挥员是伊凡·杜尔根尼奇，他本来是一个红军中尉，因为受伤曾陷入过包围。政委是奥列格·柯舍沃伊，他是高尔基学校的学生。现在我们有三十来人宣过誓表示忠诚……我们是五个人一组，正像您所说的，是奥列格建议这样做的……”

“大概是上级的同志告诉他这样做的。”普罗庆柯恍然大悟地说。“不过反正一样，你们的奥列格是好样的！……”

普罗庆柯非常兴奋地坐到桌旁，叫刘勃卡坐在他对面，要她报出全体总部委员的名字，并且把每个人都描述一下。

刘勃卡说到斯塔霍维奇的时候，普罗庆柯垂下了眉角。

“等一下。”他说，一面碰碰她的手，“他叫什么名字？”

“叶夫盖尼。”

“他是一直和你们在一起的呢，还是从别处来的？”

刘勃卡叙说了斯塔霍维奇怎样在克拉斯诺顿出现，关于他自己他是怎么说的。

“你们对这个小伙子要小心，要审查他。”普罗庆柯就把斯塔霍维奇从游击队里失踪的怪事告诉了刘勃卡，“希望他没有落到过德国人手里。”他沉思着说。

刘勃卡的脸上表现出的不安由于她不喜欢斯塔霍维奇而更加强烈。有一会工夫她一声不吭地望着普罗庆柯，后来她脸上的线条舒展了，眼睛亮了起来，她平静地说：

“不，这是不可能的。大概，他只是因为胆怯，所以就溜了。”

“你为什么这样想？”

“小伙子们很早就知道他是个团员，他虽然自高自大，可是干这种事还不至于。他的家庭非常好，父亲是个老矿工，几个哥哥都是共产党员，都在部队里……不，那是不可能的！”

她的异常清晰的推断使普罗庆柯感到惊讶。

“聪明的姑娘！”他眼睛里带着她所不了解的忧虑说，“有过一个时候，我们也是这样想的。是的，你看见吗，事情是这样的。”他像对小孩说话似的对她非常简单明了地说，“世上还有不少堕落的人，在他们看起来，思想就像是暂时穿一下的衣服，或是像一个面具，——法西斯分子在全世界培养着千千万万这样的人，——可是也有些人只不过是意志薄弱，经不起打击……”

“不，不可能的。”刘勃卡说，她是指斯塔霍维奇。

“但愿如此！不过他既然胆怯过，也可能还会胆怯。”

“我告诉奥列格。”刘勃卡简短地说。

“我说的话，你全明白吗？”

刘勃卡点点头。

“那么就这样干吧……在这儿城里，你不是跟带你来的那个人联系吗？就跟他保持联系吧。”

“谢谢您。”刘勃卡的眼神变得高兴起来，她抬起眼睛望着他，说。

他们俩都站起身来。

“你向‘青年近卫军’的同志们转致我们布尔什维克的战斗的敬礼。”他用他的动作准确的小手小心地捧住她的头，先吻了吻她的一只眼睛，又吻了吻她另一只眼睛，然后轻轻地推开了她。“去吧。”他说。

第三十八章

在伏罗希洛夫格勒的这几天，刘勃卡完全由带她去见普罗庆柯的那个人领导。她跟那个德国军需上校和他的副官的关系，以及她住到一家没有识破她身分的人家，这些情况对那个人都非常重要。

她无需去学密码，因为现在用的密码跟她离开训练班前所学的还是一样，但是现在她必须随身带一个发报机，因为从伏罗希洛夫格勒发报很不容易。

那人教她怎样常常变换地点，以免被敌人测出她的方位。而且她自己也不应该老待在克拉斯诺顿，她应该到伏罗希洛夫格勒和其他点上去走走，非但要保持她已有的联系，还要在军官——德国人、罗马尼亚人、意大利人和匈牙利人——

中间发展新的关系。

她甚至跟她下榻的那家女主人讲妥，以后她来伏罗希洛夫格勒，就住在她们家里，因为别人给她介绍的那些房子她都不中意。那个像白蘑菇的女孩对刘勃卡仍旧极端蔑视，但是女孩的母亲懂得，刘勃卡总比德国官员少些

麻烦。

刘勃卡除了再去利用顺路的德国汽车之外，没有别的办法。但是现在她已经不再拦截小汽车，相反，载着兵士的卡车对她更合适。兵士们比较和气，脑子也不大机灵，因为她箱子里的乱七八糟的东西里面现在已经藏着这个宝贝呢。

她终于坐上一辆卫生队的带篷卡车。篷车里除了五六个看护兵之外，虽然还有一个军医主任和几个军医，但是他们全有几分醉意，而刘勃卡早就确信，喝醉的军官比清醒的容易受骗。

原来他们是运酒精到前线医院去的，一只只很大的扁罐子里装了许多酒精。刘勃卡突然想到，要是能从他们手里多弄到一些酒精该有多好，因为可以利用酒精来买通一切，并且可以拿来换取各种东西。

结果，她说服了军医主任不要深更半夜地开着这辆笨重的大篷车赶路，劝他们到克拉斯诺顿她的一个熟人家里去过一夜，因为她也要到那边去巡回演出。等她们一大帮醉醺醺的德国军官和兵士拖到家里，母亲真被她吓了一大跳。

德国人喝了个通宵，刘勃卡既然自称是演员，就不得不为他们表演舞蹈，她好像是在剃刀刃上跳舞，不过总算又骗过了他们：她同时向军官和士兵卖弄风情，士兵由于吃醋，不让军官们向刘勃卡献殷勤，气得那个军医主任竟用靴子朝一个看护兵的肚皮上踢了一脚。

他们玩得正高兴的时候，刘勃卡忽然听到从街上传来一阵连续不断的警哨声。一个“警察”在高尔基俱乐部附近吹警哨，一直把哨子放在嘴里使劲吹着。

刘勃卡一时没有懂得，这是告警的信号，但是哨声越来越响，渐渐朝她们家逼近。窗外很快地响起一阵很响的脚步声，又突然消失了，——有人沿街往下跑，往紧挨山沟的小“上海”那边跑去。过了一会，那个拚命吹哨的“警察”又踏着沉重的皮靴在窗外跑过。

刘勃卡和那些还能走动的德国人都跑到台阶上。夜是静悄悄的，黑暗而温暖。渐渐远去的刺耳的哨声和跳舞似的圆锥形的电筒光，标志出沿街往下奔跑的“警察”的路线。接着，仿佛跟他呼应似的，从市场那边和隔着山沟的空地后面，——从宪兵站那里，——甚至从离这儿很远的第二过道口那边，也传来了岗警的哨声。

德国军医们鸦雀无声地在台阶上站了一会，一个个东倒西歪，因为他们身上那根把人体支持在垂直状态的主轴被酒溶解了。后来那个军医主任派一个看护兵拿来电筒，用一道电光在庭园里荒芜的花坛上、残缺的木栅栏上和几棵折断的丁香树上照了一阵。后来他又照了照院子里的带篷卡车，大家就回屋去了。

就在这个时候，已经把追踪者甩得老远的奥列格，看见从宪兵站跑出来截断他去路的几个“警察”，打着电筒在山沟后面的空地上探照。他马上明白，他在小“上海”是躲藏不了的：这里都是些土房子，德国人不肯住在这儿，因而有几条狗幸存下来，它们一哄叫，就会把他暴露。奥列格考虑到这一点，马上就往右折进了“八家宅”，把身子贴着最近一所标准式房屋的墙。一两分钟以后，一个“警察”蹬着大皮靴咚咚咚地从旁边跑过去。他在离得很近的地方跑过，哨声几乎震聋了奥列格的耳朵。

奥列格等了一会，然后尽量隐蔽着自己，沿着他刚跑过的那条街的后

身朝山岗走去，刚才他就是从那边过来的。

从他在俱乐部的台阶上发现了“警察”，以及他后来躲避“警察”沿街奔跑的时候，他的兴奋增强为不可遏止的欣喜，可是，现在这种兴奋却被不安的情绪代替了。奥列格听到了市场、宪兵站和第二过道口那个区域的哨声，这时他才明白，他的疏忽大意不仅使他自己，而且还使谢辽萨跟华丽雅以及斯巧巴跟托霞陷进危险的境地。

这是他们初次带着奥列格和万尼亚所写的传单出马，是要让居民们知道“青年近卫军”成立的第一个措施。

他们不知费了多大的劲才否定了斯塔霍维奇的建议。斯塔霍维奇认为可以在一夜之间把传单贴遍全城，一下子造成印象。奥列格对斯塔霍维奇比较了解，他并不怀疑斯塔霍维奇的动机是真诚的，但是他斯塔霍维奇怎么会不懂，参加这项工作的人越多，就越容易出事！可恼的是谢辽萨像平时一样，也喜欢走极端。

但是杜尔根尼奇和万尼亚支持奥列格的建议——只在一个地区贴传单，过几天再到另外一个地区去贴，然后在第三个地区贴，这样每次都可以让“警察”扑空上当。

奥列格建议青年们一定要一对一对地去——一个拿传单，另外一个抹浆糊；一个贴的时候，另一个就把玻璃瓶藏起来，而且一定要一个小伙子跟一个姑娘一起去：如果碰上“警察”，就说是在谈恋爱，所以要在这种不合规定的时候出来散步。

他们决定用蜜汁来代替浆糊。打浆糊需要有地方，这件事本身就会给“警察”提供线索，更不必说浆糊会在衣服上留下痕迹了。此外，用浆糊要有刷子和瓶子，拿起来很不方便，而蜜汁只要盛在一个有塞子的小瓶里，可以直接从瓶口往传单的背面倒上一点。

除了在夜里贴传单之外，奥列格还拟了一个非常简便的、白天在热闹场所——电影院、市场、职业介绍所附近——散发传单的计划。

他们选了新一号井区以及紧挨着它的“八家宅”和市场作为第一次夜间活动的地点。市场派给谢辽萨和华丽雅，“八家宅”派给斯巧巴和托霞。新一号井区由奥列格自己担任。

当然，他很想跟妮娜一起去，但是他却说他要跟玛丽娜——他的漂亮的舅母——一起去。

他们决定让杜尔根尼奇留在家里，以便在青年人还毫无经验、初次出马的时候，每一对在工作完毕之后能够马上把经过情况向指挥员汇报。

但是，等大家散了之后，奥列格不禁沉吟起来：他有什么权利把一个三岁孩子的母亲拖进这种危险的工作，而事先跟柯里亚舅舅——孩子的父亲——连商量都没有商量一下？

当然，破坏他自己制定的规则是不好的，但是奥列格已经被一种孩子般的冲动所支配，所以他竟然决定单独前去。

傍晚，城里还可以自由走动的时候，奥列格把几张传单塞在上衣里面的口袋里，把装着蜜汁的小玻璃瓶塞进裤袋，就从家里出来了。他经过奥西摩兴和捷姆奴霍夫住的那条街，到了通五号井的大路横过山沟的地方。这个山沟再往右就把“八家宅”和宪兵站所在的空地分隔开来。山沟的这一部分荒无人烟。奥列格沿着山沟朝右拐，快到小“上海”，就从一个仿佛是通山沟的低地爬上山岗。伏罗希洛夫格勒公路在山岗上经过，山岗绵亘起伏，高

耸在整个这一部分城市之上。

奥列格在山岗中间躲躲藏藏，几乎快走到伏罗希洛夫格勒公路跟城中心通五一村的大路交叉的地方。他在这里躺下来等待天黑。透过被晒枯的野草的草茎望出去，他很清楚地看到交叉路口、在公路那一边的五一村边、堆着巨大矸石堆的已经炸毁的新一号井、在刘勃卡住的那条街上较低一头的高尔基俱乐部、“八家宅”、伏罗希洛夫学校和宪兵站所在地的空地。

直接威胁着奥列格的“警察”岗哨是在十字路口，那里有两个“警察”站岗。其中一个几乎不离开路口，即使由于无聊容许自己溜达一下，也只是顺着公路走步。另外一个是在从路口到新一号井这一段大路上巡逻，或是再往前走到高尔基俱乐部，再沿着刘勃卡住的那条街走到小“上海”。

邻近的一个岗哨在市场区，也有两个“警察”站岗。其中一个经常站在市场范围之内，另一个则在从市场到小“上海”通大“上海”那一段来回巡逻。

夜是漆黑的，又是这样的静谧，连每一声窸嗦声都听得见。现在奥列格只能依靠自己的听觉了。

他要在新一号井进口处和高尔基俱乐部贴几张传单。（他们决定不在住房上贴传单，以免连累居民。）奥列格偷偷地走下山岗，向最靠边上的一幢标准式房屋走去。刘勃卡住的那条街就是从这里开始的。隔着广场，新一号井的进口岗亭正对着奥列格。

他听见巡逻警和岗警在聊天。有一瞬间他甚至看见他们的脸低下来凑近打火机。必须等巡逻警沿着街向下走去，否则奥列格可能在空旷的广场上被他碰到。但是那两个“警察”还老是站在那里低声交谈。

巡逻警终于走了，不时打着电筒照路。奥列格站在房背后，听着“警察”的脚步声。脚步声刚走远，奥列格就走到街上。沉重的脚步声还清晰可闻。巡逻警还在打着电筒照路，奥列格可以看见他走过了高尔基俱乐部。“警察”终于不见了：刘勃卡家后面就是通山沟的陡坡。只有远处依稀可见的闪亮的反光表示“警察”仍旧不时在用电筒给自己照路。

像所有在撤退时炸毁的大矿井一样，新一号井也没有开工。但是奉施维德中尉的命令，井上成立了一个由德国山矿营官员组成的管理处。一部分来不及或是不能疏散的工人每天早上来做“修复”工作——在官方文件里这样称呼清除满院废物的工作：几十个人没精打采地在院子里晃荡，用手推的板车运走废物和垃圾。

现在这里是寂静而阴沉的。

奥列格在矿井院子的砖围墙上贴了一张传单，又在进口岗亭上贴了一张，然后在布告板上各种公告和命令上面再贴上一张。他不能在这里久留，倒不是怕被看守人发现——那老头夜里睡得很死——而是怕巡逻警在回来的路上可能经过矿井，照一下岗亭。但是听不见巡逻警的脚步声，远处也没有电筒的光亮：巡逻警可能在小“上海”逗留了。

奥列格穿过广场，朝俱乐部大厦走下去。城里这所最宽敞、最不舒服、又是最冷的房子完全不适于住人，现在空着。它正面临街，大清早起，“八家宅”、五一村和近处庄子里出来的人，都要沿着这条街上市场去，这条街也是从城里去伏罗希洛夫格勒和卡缅斯克的交通要道。

奥列格正往房子的正面墙上贴传单，忽然听到“警察”从下面山沟里走上来的脚步声。

奥列格绕过房子，躲在房后。

“警察”的脚步声愈来愈清楚。但是“警察”刚沿街上来走到大厦旁边，他的脚步声就听不见了。奥列格呆住了，等待“警察”走过俱乐部，他站了一分钟、两分钟、五分钟，但是还听不见脚步声。

要是那个“警察”走过来的时候忽然照了照俱乐部的正面，发现了传单，现在正站下来看呢？当然，他马上要把它们撕下来，并且就会发现它们是刚贴上去的。那时可以料到，他会打着手电绕着大厦走一圈：刚贴了传单的人除了躲在这所大厦后面，是无处可躲的！……

奥列格屏息凝神地倾听着，但是只听见自己的心跳。他非常想离开墙边拔脚飞奔，但是他懂得这只会害了自己。不，唯一的办法是弄清楚那个“警察”究竟到哪儿去了！

奥列格从屋角后面探出身子——一点可疑的声音都没有。他扶着墙，把脚高高地提起，再小心翼翼地放下，悄悄地朝街道那面移动。有几次他停下来细听，但是周围都是静悄悄的。他这样走到第二个屋角跟前，然后用一只手抵着墙，另一只手抓着墙角，探出头来望了一望。突然他的手底下有一块被雨水浸蚀的旧灰皮碎裂了，带着奥列格觉得是吓人的响声掉在地上。在同一瞬间，奥列格看到了大厦门口下面台阶上的香烟的火光，他这才明白，“警察”只不过是坐下来休息休息，抽支烟。香烟的火光马上往上升起，台阶上发出一阵响声，奥列格抵着墙角用力一挣，就沿着街朝下面山沟里跑去。响起了刺耳的警哨声，有一瞬间奥列格竟陷进了圆锥形的电筒光里，但是他马上连窜带跳地冲了出去。

说句公道话，从这个直接的危险发生的那一刻起，奥列格就没有做过一个冒失的举动。

他可以在一分钟里面在“八家宅”把“警察”搞糊涂，自己躲到刘勃卡或是伊凡卓娃家里去，但是奥列格没有权利连累她们。他可以假装往市场那边跑，实际上却躲在连魔鬼都找不到他的“上海”。但是这样会连累谢辽萨和华丽雅。于是奥列格就朝小“上海”跑去。

现在，形势逼得他还是非拐到“八家宅”不可的时候，他也不打算深入这个区，免得连累斯巧巴和托霞。他回头朝山岗那边跑，朝他可能被岗警拦截的十字路口跑去。

为朋友担心和担心整个行动可能失败的念头折磨着他。但是当他听到小“上海”那边狗的狂吠声，他还是又被孩子般的淘气的心情控制住了。他想象，追逐他的那个巡逻警和宪兵站的“警察”们怎样相遇，怎样在研究这个人怎么会不见影踪，怎样打着电筒搜索周围这块地方。

市场上不再有警哨声。奥列格又到了岗顶，他根据电筒的闪光看出，跑来拦截他的“警察”们正在穿过空地回宪兵站去，而追逐他的那个巡逻警还站在远远的街头，打着电筒在照一座房子呢。

那个“警察”有没有发现贴在俱乐部大厦的传单？……不，当然没有发现！否则他决不会坐在门口台阶上那样悠闲地抽烟。他们马上会把整个“八家宅”闹得天翻地覆，搜寻他奥列格的！

他心里觉得一松。

奥列格照约好的信号在杜尔根尼奇的百叶窗上轻轻敲了三下，这时天还没有亮。杜尔根尼奇轻手轻脚地开了门。他们踮着脚尖走过厨房和睡着人的上房，到了杜尔根尼奇单独住的小房间里。油灯高放在小橱上。显然杜尔

根尼奇还没有睡。他看到奥列格时丝毫没有露出高兴的样子，他的脸色严峻而苍白。

“有—有人出事了吗？”奥列格结结巴巴地问，他的脸色也发白了。

“没有，现在大家都齐了。”杜尔根尼奇避免跟他的目光相遇，说道。“你坐下……”他向奥列格指指凳子，自己在凌乱的床铺上坐下：显然，他整夜是一会儿在小房间里踱来踱去，一会儿在这张床上坐下。

“怎么样？顺利吗？”奥列格问。

“顺利。”杜尔根尼奇并不望着他，说。“他们都到我这里碰过头——谢辽萨、华丽雅、斯巧巴、托霞……那么你是一个人去的吗？”杜尔根尼奇抬起眼望望奥列格，又垂下了。

“你怎—怎么知道的？”奥列格带着小孩子做了错事的神情问道。

“我们都替你担心。”杜尔根尼奇回避地说，“后来我憋不住了，就跑去找尼柯拉·尼柯拉耶维奇，一看，玛丽娜在家。大伙都要在这里等你，但是我劝他们不必。我说，要是他出了事，再被他们发现我们深更半夜在这里聚了一大帮人，那就更糟。你自己知道，明天这一天大伙的工作多么艰巨——

又是市场，又是职业介绍所……”

奥列格心里越来越感到内疚，虽然他还没有完全认识内疚的原因。他匆匆讲了讲他怎样急急地从矿井转到俱乐部，在俱乐部旁边又发生了什么事。他追忆这一切情况的时候，还是兴奋起来。

“唔，后来，等一切都平安无事地过去之后，请原谅，我干了点淘气的，在回来的路上又在伏罗希洛夫学校贴了两张传单……”

他满面笑容地望着杜尔根尼奇。

杜尔根尼奇默默地听他讲完，站起身来，双手插在口袋里，把坐在凳子上的奥列格从上到下打量了一会。

“我有几句话要对你说，不过你别生气……”杜尔根尼奇用他的低低的声音说，“这是你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去干这种事。懂吗？”

“不—不懂。”奥列格说。“事情是成功了。要样样事情都顺顺当当是不可能的。这不是散—散步，这是斗争，那里是有敌人的！……”

“问题不在于敌人。”杜尔根尼奇说，“无论是你是我，都不能耍孩子脾气。是的，我虽然年纪比较大，可我这句话也是对我自己说的。我尊重你，你是知道的，所以我才这样跟你谈话。你是个意志坚强的好青年，你的知识大概也比我丰富，不过你是个小孩子……要知道，我好不容易才说服他们不要去帮你的忙。我虽然在劝别人，可是自己倒差点儿要去了。”杜尔根尼奇苦笑着说。“你也许以为，我们五个人光是为了你在这儿担惊受怕的吗？不，我们是为了整个事业担忧。老弟，现在时候到了，应该习惯你已经不是你，而我也已经不是我……我整夜责备自己不该让你去。现在如果没有必要，我们怎能为了一些小事就拿自己去冒险？不，老弟，我们没有这个权利！你得原谅我，我要总部把这一条作为决议通过。

那就是说，没有特殊指示，禁止你和我参加任何行动。”

奥列格带着稚气的表情默默地、严肃地望着他。杜尔根尼奇的口气变得缓和一些。

“老弟，我说你的知识或许比我丰富，并没有说错。”他带着几分遗憾的口吻说，“这跟受的教育有关。我小时候跟谢辽萨一样，整天赤着脚满街跑。我虽然进过学校，可是真正的知识还是在成年之后得到的。你要知道，你母

亲毕竟是个教师，你的继父又是一个有政治修养的人，可是我的两个老的，你是知道的。”杜尔根尼奇脸上带着和善的表情指指通上房的门。“时候已经到了，你应该把你的这些知识运用到真正的事业上去，明白吗？至于捉弄捉弄‘警察’，这，老弟，是无足轻重的事。大伙期待你做的也不是这样的事。要是认真地讲……”杜尔根尼奇意味深长地用大拇指指指背后高高的什么地方，“他们那些人，你要知道，对你有多大的期望啊！……”

“啊，你真—真是个好青年，凡尼亚！”奥列格高兴地望着他，惊异地说。“你说得对，噢，你完全正确！”他说了又把头转动了一下，“好，既然如此，你就让总部通过一个决议吧……”

他们笑了起来。

“不管怎样还是要祝贺你成功，我差点忘了……”杜尔根尼奇把手伸给他。

奥列格到家的时候已经东方发白。准备到他家来做客的刘勃卡也正是在这时候送走了她的德国人。她通宵没有睡，但是望着这辆装满德国醉鬼的带篷卡车，由醉醺醺的司机驾驶着在街上歪歪斜斜地开过去，她不由得大笑起来。

母亲一直在大骂刘勃卡，但是女儿把她夜里从卡车上搬下来的四大罐酒精给她看。母亲虽是个老实人，却也明白刘勃卡这样做是有她的打算的。

第三十九章

乡亲们！克拉斯诺顿的居民们！矿工们！集体农庄庄员们！德国人全是撒谎！莫斯科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仍旧是我们的！希特勒说战争要结束是吹牛。战争刚激烈起来。

红军还要回到顿巴斯。

希特勒要把我们赶到德国去，让我们在他的工厂里成为杀害自己的父亲、丈夫和儿女的凶手。

假如你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在自己的故乡，在自己家里拥抱你们的丈夫、儿子、兄弟，那你们就不要到德国去！德国人折磨我们，蹂躏和杀害优秀的人们，想以此来恫吓我们，叫我们屈服。

打击该死的侵略者！与其在奴役中生，毋宁在斗争中死！祖国在危难中。但是它有足够的力量来粉碎敌人。“青年近卫军”将在自己的传单上报导全部真相，不管它对俄罗斯是多么痛苦。真理必胜！

请读我们的传单，把它们藏起来，使它们的内容家喻户晓，乡里皆知。

杀死德国侵略者！

“青年近卫军”

这张从学校练习簿上撕下来的小纸片，贴在人头攒动的市场尽头的那块布告板上（以前这块板的两面挂着区报《社会主义祖国》，现在挂的是黄黑两色的德国宣传画），它是从哪儿来的呢？

天刚亮，村里和哥萨克村镇里的人们就拿着大包小包趁星期日前来赶集。有的妇女也许只拿来一只用破布包着的小母鸡，有人家里蔬菜收成好，

或是还剩下去年的麦子磨的面粉，就用手推车把自己的家私推来。牛连影子都不见了，都被德国人牵走了，马是更不用提了！

这些手推车，再过多少年人民也忘不了它们！这不是运土的那种式样的独轮车，而是可以装运各种东西、安着两只高轮子的手推车，——人们两手抓住它的扶手推着走。成千上万的人推着它们穿过整个顿巴斯，从这一头到那一头，不管酷热和尘土，不管下雨和泥泞，不管严寒和大雪，他们有的是带着家当到市场求售，但更多的是给自己寻找安身之所或是葬身之地。

天蒙蒙亮，附近各个村里的人就把蔬菜、粮食、家禽、水果和蜂蜜拿到市场来。城里人也是一早就把东西拿出来——有人拿的是帽子，有人拿的是头巾，有人拿的是裙子，有人拿的是长统靴，再不就是钉子或是斧头、或是盐、或是放了多年的印花布，也许，甚至是从祖母传家的箱底翻出来的白棉布或是式样古老的滚花边的衣服。

在这种时世，除非是罕有的大胆之徒或是笨蛋，再不然就是卑鄙小人才会为了牟利到市场去，——在这种时世，是贫穷和不幸驱使人们上市场去。现在德国马克在乌克兰土地上通用，可是有谁知道它是真是假，靠不靠得住，而且老实说，谁手里才有马克呢？不，还是祖传的老办法好：物物交换——在兵荒马乱的年头它解决了多少困难啊……于是人们一清早就麇集在市场上，互相绕来绕去不知转了多少圈。

大伙都看见：市场尽头的布告板仍旧像多年以来一样竖在那里。最近几个星期以来，它上面一直挂着德国宣传画。突然，在一幅宣传画上，而且恰恰是在那幅扇形地排列着德军在莫斯科的阅兵式、德国军官在彼得保罗要塞旁边的涅瓦河里洗澡、以及德国军官在斯大林格勒滨河街上挽着我们的姑娘们散步的那些照片的宣传画上，——出现了一张白纸，上面用化学铅笔溶化出来的墨水整整齐齐地写满了字。

先是有一个人动了好奇心，后来又有两个人和更多更多的人走过去，转眼之间布告板旁边已经挤了一小堆人——大部分是妇女、老头和半大的男孩。大家都伸长脑袋，想读一读这张传单。谁肯放过这围观一张写满了字的白纸条的人群，何况还是在市场上！

一大群人蜂拥在贴着传单的布告板旁边。前面的人默默地站着，但是不肯走开。一股难以克制的力量迫使他们把这张传单读了一遍又一遍。后面的人拚命要往前挤，他们吵吵嚷嚷，火气很大，打听那上面写些什么。虽然没有人答腔，又挤不进去，但是这越来越大的人群已经知道，从练习簿上撕下的这张小纸上说些什么：“德军在红场举行阅兵式，是谎言！

德国军官在彼得保罗要塞旁边洗澡，是谎言！他们跟我们的姑娘们在斯大林格勒大街上溜达，是谎言！世界上不再有红军，战线由英国人雇佣的蒙古人守着，是谎言！”这一切都是谎言。真实的情况是城里留着自己人，他们知道真实情况，他们在勇敢无畏地把这唯一的真相告诉人民。

一个带“警察”臂章、个子非常高的人，走进人丛，他的格子裤的裤脚塞在小牛皮的长统靴里，同样的格子上衣下面挂着饰有黄穗的沉甸甸的手枪匣，他那戴着老式帽子的狭长的脑袋高耸在人丛之上。人们回过头来一看，认出是福明，顿时流露出恐惧或是讨好的神气，给他让开一条路。

谢辽萨把帽子拉得压在眉毛上，一面朝人后面躲，免得福明认出他，一面用眼睛在人丛中寻找庇罗若克。找到了他，谢辽萨就朝福明那边丢了个眼色。庇罗若克很了解谢辽萨要他干什么，——他已经跟在福明后面向布告

板挤过去了。

庇罗若克和柯瓦辽夫虽然被开除出“警察队”，但是他们跟所有的“警察”都还保持着友好关系，因为那些“警察”根本不认为他们的行为有什么可以非议的。福明回头一看，认出是庇罗若克，就没有对他说什么。他们一同挤到这张传单前面。福明打算用指甲把它刮下来，但是传单牢牢地贴在德国宣传画上，刮不下来。福明就在宣传画上挖了一个小洞，把传单连同宣传画的一角一起撕下来，把它揉成一团，塞进上衣袋里。

“挤在这儿干吗？有什么好看的？走开！”他转过他那阉人般的蜡黄的脸朝着人群，低声吆喝起来，他那双灰色小眼睛从围绕着它们的无数的皱褶里鼓了出来。

庇罗若克像条黑蛇似的在福明周围滑来绕去，用男孩的高音喊叫着：

“听见没有？……还是趁早散开吧，先生们！”

福明张开两条长胳膊，居高临下地望着人群。庇罗若克有一刹那好像贴在他身上。人群闪开了，开始四散。庇罗若克也往前跑了。

福明阴沉地踏着沉重的小牛皮靴在市场上走过去。人们丢下自己的买卖不做，都望着他的后背，——有的带着恐惧，有的带着惊讶，有的带着幸灾乐祸的表情：在福明背上的格子衣服上贴着一张纸条，上面用粗大的印刷字体写着：

你为了一块香肠、为了一口伏特加和一包马合烟把我们的人出卖给德国人。可是你得用你的狗命来抵偿。你小心着吧！

谁也不来拦住福明，他就背着这个不祥的警告，穿过整个市场到“警察队”去。

谢辽萨的生着浅色鬈发的头和庇罗若克的满头黑发的小脑袋在市场这边那边的人丛里时隐时现，在许多转动的身体中间移动着，好像彗星在它们的古怪的轨道上运行。他们并不是单独的：突然在一个拐角上钻出了文静温和、衣着朴素、小眼睛聪明灵活的托霞的覆着亚麻色头发的小脑袋。如果托霞的小脑袋在这里，你就可以在附近去找她的伙伴斯巧巴的生着白发的头。谢辽萨的锐利的浅色眼睛常跟人群里维佳的温柔的深色眼睛目光相遇，——碰到了又分开。还有梳着两根金黄色辫子的华丽雅老是在小货摊周围打转；她双手提着一只用粗毛巾盖着的篮子，至于她在做些什么买卖，那可谁也没有看见。

于是人们就在自己的小篮里，空袋里，要不就直接在柜台上一棵卷心菜下面或是在黄灰色的、深绿色的或是皮上好像写满象形文字的西瓜下面发现了传单，——有时这甚至不是传单，只是一个窄窄的纸条，上面用印刷字体写着这一类的话：

打倒希特勒的两百克，苏维埃的一千克万岁！①　　①指在苏维埃政权时，每人每天有一千克面包，而在希特勒统治下，每人只发二百克面包。

于是人们的心就颤抖起来。

谢辽萨已经不知是第几次绕过一排排的小摊子，到了卖主拿着货物兜售的旧货市场，不料迎面碰到市立医院的娜塔丽雅·阿列克谢耶芙娜医生。她穿着满是尘土的运动鞋站在许多妇女中间，孩子般胖胖的小手里捧着一双小号码的、相当旧的女鞋。她认出了谢辽萨，感到很狼狈。

“您好！”他也手足无措地说，接着摘下了头上的帽子。

在娜塔丽雅·阿列克谢耶芙娜的眼睛里霎时间又露出了他所熟悉的直率、无情和讲求实际的神情，她用胖胖的小手敏捷地包起鞋子，说道：

“好极了。我正要找你。”

谢辽萨和华丽雅应当一块从市场去职业介绍所，第一批被赶往德国去的年轻人今天要从那儿出发往上杜望纳雅去。华丽雅忽然看见谢辽萨跟一个圆滚滚的、梳着妇人发式的、从远处看来好像是个姑娘的女性，从市场的人丛里出来朝李方查的土房那边走去，随即消失在土房后面。自尊心不容许华丽雅跟着走过去。她的饱满的上唇微微颤抖了一下，眼睛里露出冷冷的神情。于是她就提着篮子，跨着高傲的步子朝职业介绍所走去，篮子里土豆底下还留着几张传单必须送到新的地方去。

山岗上职业介绍所的白色平房前的小广场，已经被德国兵团团围住。今天要离开故乡的年轻人，拿着包裹和手提箱的他们的父母和亲人，还有纯粹是看热闹的人，都挤在封锁线前面山岗的斜坡上。最近几天，天色一直阴沉灰暗。从早上就刮起的大风，一个劲儿猛烈地驱赶着乌云在天空飘浮，不让它下雨。风把山岗两面斜坡上的妇女和姑娘们的各种颜色的衣服刮得不住飘荡，把一阵阵沉重的尘土刮得沿着区执委会和“疯老爷”房子旁边的大路滚过去。

这群痛苦得发呆、一动不动、一言不发的妇女和男女青年，给人一种凄惨的印象。在有的地方，他们即使交谈，也是压低声音，或是耳语，甚至不敢大声啼哭：有些做母亲的只用手挥掉眼泪，做女儿的却突然把眼睛埋在手帕里。

华丽雅停在山岗斜坡上的人群旁边，她从那里可以看到新一号井区和部分铁路支线。

不断有人从城里各个角落走过来。在市场上散发了传单的青年人，几乎也全部转移到这里来了。突然，华丽雅看见了谢辽萨，他怕帽子被风刮掉，低着头沿铁路路基走过来。有一会工夫看不见他，后来他又从山岗的鼓肚后面出现，他不走大路，一边走一边环视着人群，他老远就看见华丽雅。她的饱满鲜艳的上唇自尊地抖动了一下。

华丽雅不朝他看，也不问他什么。

“是娜塔丽雅·阿列克谢耶芙娜……”他明白华丽雅在生气，就轻轻地说。

他弯身凑着她的耳朵低声说：

“在克拉斯诺顿村有一大批青年……他们只是自己在干。

你去告诉奥列格……”

华丽雅是总部的联络员。她点点头。这时他们看见邬丽亚沿着大路从“八家宅”那边走过来。跟她一块还有一个他们不认识的戴着帽子、穿着大衣的姑娘。邬丽亚和这个姑娘扭过脸去避着尘土，抬着一只箱子顶风走过来。

“假如需要到那边去，你同意吗？”谢辽萨又低声说。

华丽雅点点头。

职业介绍所所长施普利克上尉终于明白，要是不去催促那批年轻人，他们就会和他们的亲人在封锁线旁老这样站着。他走到台阶上。他的脸刮得很光，身上穿的已经不是热天他在介绍所里和外出时穿的皮短裤，而是全副军装。他由文书陪着走出来，高喊了一阵，让要走的人来拿证件。文书又用乌克兰语把这话重复一遍。

德国兵士不让亲属和送行的人走进封锁线。告别开始了。母亲和女儿们已经不再克制自己，放声痛哭起来。男青年还硬撑着，但是当母亲们、祖母们、姊妹们在他们怀里颤抖着，在井下工作了几十年、不止一次面对过死亡的年迈的父亲们低下头来擦掉口髭上的眼泪的时候，他们的脸真令人惨不忍睹。

“是时候了……”谢辽萨竭力不让华丽雅看出他的激动，严峻地说。

她勉强克制着不要大哭，并没有听清他的话，只顾机械地穿过人丛向职业介绍所那边挤去。她又同样机械地从土豆底下取出一折为四的传单，把它塞进什么人的大衣或是短外衣的口袋里，或是干脆塞到箱子把手下面或是绑篮子的绳子下面。

在紧靠封锁线的旁边，突然有一群人惊慌失措地从职业介绍所那边涌过来，把华丽雅挤开了。送行的人里面有不少是半大的男孩、年轻姑娘和年轻妇女。他们里面有人在送别姊妹或是兄弟时，无意走进了封锁线，就再也出不来了。这使德国兵非常高兴，于是他们就动手乱抓最先碰到的青年和姑娘的手，把他们拉进封锁线。响起了一片叫喊声、哀求声和哭泣声。有一个妇女歇斯底里大发作。青年人吓得潮涌似的离开了封锁线。

谢辽萨不知从什么地方钻出来，脸上带着痛苦和愤怒的表情抓住华丽雅的手，把她拖出人丛，直朝妮娜走去。

“谢天谢地……要不然这批坏蛋……”妮娜用她的温柔的、肤色浅黑的大手抓住他们俩的手。“今天五点钟在卡苏克那里……你去通知捷姆奴霍夫和斯塔霍维奇。”她低声对华丽雅说。“你们没有看到邬丽亚吗？”接着就跑去找寻邬丽亚：妮娜跟华丽雅一样，是总部的联络员。

华丽雅和谢辽萨互相挨着又站了一会，——他们非常不愿意分开。看谢辽萨的神气，似乎他有什么非常重要的话马上要说出来，但是结果他什么也没有说。

“我要走了。”华丽雅温柔地说。

不过她仍旧站了一会，后来对谢辽萨微笑了一下，回头望了望，忽然害羞起来，就提着篮子，闪动着两条晒黑的结实的腿，从山岗上飞快地跑了下去。

邬丽亚站在封锁线旁等待瓦丽雅从职业介绍所出来。一个德国兵让瓦丽雅提着箱子走了进去，又过来抓住邬丽亚的手，但是她不慌不忙地、冷冷地望了他一眼。有一瞬间他们的目光相遇了，兵士的眼睛里闪现出还带点人味的表情。他放了邬丽亚，扭过身去，突然对一个不戴帽子、头发浅黄的年轻妇女狠狠地吆喝起来，因为她不肯放开她的儿子，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最后那妇女离开了儿子，原来要被赶到德国去的并不是她儿子，而是她。那少年像小孩似的哭哭啼啼地望着她，她在职业介绍所门口最后一次对他笑了一笑，就拿着包裹进去了。

邬丽亚和瓦丽雅在瓦丽雅家的摆着秋天花朵的小房间里搂抱着坐了一整夜。瓦丽雅的老母亲一会走过来摸摸她们的头，亲吻她们，一会给瓦丽雅整理手提箱里的东西，一会悄悄地坐在角落里的小圈椅里：瓦丽雅走后，就剩下她孤零零的一个人了。

瓦丽雅哭得浑身无力，也安静了下来，偶尔在邬丽亚的怀抱里微微抽搐几下。邬丽亚却恐惧地意识到即将发生的那件事是无法避免的，她心软了，变得像大人了，她怀着孩子的同时又是母性的感情一直默默地抚摸着瓦丽雅

的亚麻色的头发。

在灯光如豆的昏暗的斗室里，只能看见她们的脸和手——两个姑娘和一个老母亲的脸和手。

但愿能够永远不看见这件事就好了！不看见瓦丽雅和她母亲的诀别，不看见提着箱子在狂风怒号中的这次没有尽头的旅途，不看见在德国兵士封锁线前的这最后一次的拥抱！

然而这一切都发生了，发生了……这一切还要延续下去……邬丽亚带着满脸肃杀之气站在德国兵士的封锁线旁，眼睛盯着职业介绍所的门。

走进封锁线的少年、姑娘和年轻妇女都按照一个胖子上等兵的命令把自己的包裹和手提箱留在小广场的墙边，——说是行李将用汽车运送，——然后走到屋子里去。聂姆庆诺娃在上尉的监督下发给每人一张卡片，这是唯一可以在全部旅程中向任何一个德国当局的代表证明他们身分的证件。卡片上既没有持有者的名字，也没有他的姓，上面只有一个号码和城市的名字。他们拿着这张卡片走出来，上等兵就把他们排进沿着广场排列的行列。

现在瓦丽雅也走出来了，她用眼睛搜寻到女友，朝她走了几步，但是上等兵看到她要走就用手拦住她，把她推进正在排队的行列里。瓦丽雅被排进第三或是第四行的远远的一头，于是两个朋友彼此就再也看不见了。

这次惨绝人寰的离别的痛苦给了人们显示爱的权利。人群里的妇女一边试图越过封锁线，一边向孩子们喊着最后几句告别的话或是叮咛。可是行列里的年轻人，大部分是姑娘们，却好像已经属于另一个世界：他们低声回答，或是只挥动一下手帕，或是默默地、泪珠滚滚地凝望着亲人的脸。

但是这时施普利克上尉手里拿着一个很大的黄纸夹从屋子里走出来。人群安静下来。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

“立正！①”上尉发令。

“立正！②”胖子上等兵用可怕的声音重复一遍。　　①②　原文为德语。

队列里的一切都静止了。施普利克上尉在第一前面走过，用一根结实的手指戳着前后衔接排列的每四个人的排头，把全部的人数点了一遍。行列里有两百多人。

上尉把纸夹交给胖子上等兵，把手一摆，就有一队兵士跑过来清除被人群堵塞的道路。

队列按照上等兵的口令转过身，徐徐移动，由胖子上等兵领头的押送兵押着，缓慢地、好像无可奈何地在大路上走去。

人群被兵士们挤开，就拥到队列两旁，跟着队列走，一时啼哭声、哀号声和叫喊声融成一片拖长的呻吟声，随风飘散。

邬丽亚一边走一边踮起脚尖，老想在队列中找到瓦丽雅，最后终于看到了她。

瓦丽雅把眼睛睁得大大的，朝队列两面张望，寻觅着女友，她眼睛里露出了因为在最后一分钟不能看见邬丽亚而感到痛苦的神情。

“我在这儿，亲爱的瓦丽雅，我在这儿，我跟你在一起！……”邬丽亚大声喊着，但是渐渐被人群挤开。

但是瓦丽雅既看不到她，也听不到她，仍然带着这种痛苦的表情张望着。

邬丽亚被挤得离队列愈来愈远，有几次她还看到瓦丽雅的脸，后来队

列在“疯老爷”的房子背后朝第二过道口走下去，瓦丽雅也看不见了。

“邬丽亚！”突然在邬丽亚面前出现的妮娜说，“我正在找你。今天五点钟在卡苏克那里……刘勃卡来了……”

邬丽亚没有听清妮娜的话，只是默默地用那双可怕的黑眼睛望着她。

第四十章

奥列格的脸色略微有点发白，他从上衣里面的插袋里摸出一个笔记本，一边聚精会神地翻阅，一边坐到桌旁。桌上放着一瓶伏特加、几个酒杯和没有盛任何小吃的盘子。大伙也默不出声，脸色严肃地坐下来：有的坐在桌旁，有的坐在沙发上。大伙都默默地望着奥列格。

不久前他们还不过是同学，无忧无虑，顽皮淘气，可是从他们宣誓的那一天起，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似乎都跟以前的自己告别了。他们仿佛断绝了以前的轻率的友谊关系，进入了一种新的、更崇高的关系——思想一致的友谊、组织上的友谊、每人誓为解放祖国土地而流血的友谊。

在柯舍沃伊家的大房间里（它跟所有标准式房屋里的大房间一样），没有漆过的窗台上满是没有熟透的西红柿，一张胡桃木长沙发是给奥列格做床用的，叶列娜·尼柯拉耶芙娜的床上放着好多拍得鼓鼓的、套着花边枕套的枕头，——这个房间还能使他们回想起在父母庇护下无忧无虑的岁月，但同时它已经成为秘密活动的场所。

奥列格也已经不是奥列格，而是卡苏克了：这是他继父的姓，他继父年轻时是乌克兰相当有名的游击队员，在去世前一年是卡涅夫土地部的主任。奥列格拿他的姓来做自己的化名；在他心里，对于游击斗争的最初的传奇性想象以及继父给予他的多方面培养勇敢性格的锻炼——田间劳动、狩猎、骑马、在德涅泊河上划船，——都和这个姓联系着。

他打开他用暗号记着一切的那一页，请刘巴·谢夫卓娃发言。

刘勃卡从沙发上站起来，眯起了眼睛。她的充满如此难以想象的艰险、会见和冒险的整个旅途都浮现在眼前，——

这些事就是讲两夜也讲不完。

昨天白天她还提着这只她觉得十分沉重的手提箱站在十字路口，可是现在她又到了自己的朋友中间了。

照她事先跟奥列格讲好的那样，刘勃卡首先向总部委员们传达普罗庆柯告诉她有关斯塔霍维奇的一切。当然，刘勃卡没有讲出普罗庆柯的名字，虽然她一眼就认出他，——她说她偶然碰到了一个以前跟斯塔霍维奇同在一支游击队里的人。

刘勃卡是个直率大胆的姑娘，在她不喜欢某人的场合下甚至有些无情。所以她并不讳言那人的推测，说斯塔霍维奇可能落到过德国人手里。

在她讲述这一切的时候，总部委员们对斯塔霍维奇连望都不敢望。可是他坐在那里表面上倒很镇定，瘦削的双手放在桌上，眼睛直望着前面，——他脸上的表情坚强有力。但是一听到刘勃卡的最后几句话，他的脸刷地变了色。

他使自己保持的那种紧张状态松弛了，嘴巴和双手松开了。他突然委屈地、惊讶地、同时又公然地对大伙扫视了一下，马上变得像孩子似的。

“他……他是那么说的吗？……他能够那样想吗？”他重复说了几遍，一面带着这种受委屈的孩子的表情直望着刘勃卡的眼睛。

大伙都不作声，于是他把脸埋在手掌里，这样坐了一会。

然后他把手从脸上拿开，轻轻地说道：

“我受到这样的怀疑，说我……那他为什么不对你说，我们已经被追逐了一个星期，而且上级对我们说过，应当分成小组散开的呢？”他抬起眼睛望着刘勃卡说，接着又公然望了望大伙。“我躺在矮树林里的时候，心里想：他们为了逃生准备突围，即使不是全体，也要有一大部分会牺牲，我也可能和他们同归于尽，可是我能够逃生，将来还可以有用。这是我当时的想法……现在，我当然明白这是一种借口。炮火这么猛……真可怕。”斯塔霍维奇天真地说。“但是无论如何我不认为我是犯了滔天大罪……要知道，他们也是要逃生……天已经黑了，我心里想：我游泳游得很好。我一个人可能不会被德国人发觉。等大伙都跑了，我还躺了一会，这边的炮火停了，后来在另外一个地方响起来，非常猛烈。我想：是时候了，——我就仰游起来，只露出鼻子，我游得很好，先游到河心，后来就顺着水势游。我就是这样逃出性命来的！……可是竟会引起这样的怀疑……这怎么行？……这个人自己，归根到底，不是也逃出性命了吗？……我心里想，我既然游泳游得好，我就来利用这一点吧。于是我就仰游起来。我就是这样逃出性命来的！……”

斯塔霍维奇坐在那里，头发蓬乱，样子像个小孩。

“好吧，就算你是这样逃出来的。”万尼亚说，“那你为什么对我们说，你是游击队司令部派来的呢？”

“因为他们确实是要派我的……我心里想：我既然活下来了，那就什么也没有改变！……归根到底，我并不是仅仅逃出一条命，我过去要、现在也要跟侵略者斗争。我有经验，我参加过游击队组织，而且参加过战斗；——这就是我要这样说的理由！”

大家心情都非常沉重，经斯塔霍维奇这么一解释，大伙都感到轻松些。不过这毕竟是一桩非常不愉快的事件。要是没有这件事多好！

大伙都明白，斯塔霍维奇说的是实话。但是大伙都觉得他做得不好，对于他自己的做法讲得也不好。这件事既使人气恼，又令人不解，叫人不知道拿他怎么办。

实际上，斯塔霍维奇也并不是外人。他也不是一个贪图名利地位或是追求个人利益的人。他这种年轻人从小就跟重要人物接近，在他还不能了解人民政权的真正内容和目的，还不能了解使用这种权力的权利是由这些重要人物用顽强的劳动和意志锻炼而取得的时候，他就已经因为经常采用这些人物表现权力的某些表面方式而染上了不良习气。

他是个聪明孩子，样样事一学就会。他在学生时代就受到本城重要人物的注意，其原因是因为他的党员哥哥们也是重要人物。他从小就出入于这些人的圈子，惯于在同龄的孩子中间谈起这些人来就像谈自己的平辈一样。他表面上很有学问，善于在口头上和文字上把不是他自己的、他还想不出来的、而是他常常听到的别人的意见运用自如。他在他的生命史上还毫无成就，可是在共青团区委干部中间已经被认为是积极分子。至于那些和他素不相识的普通团员，只看见他在所有的会议上不是坐在主席台上就是在台上做报

告，一向更是把他当作要不是区一级、便是州一级的干部。对于他经常出入其间的那些人的工作的真正内容他虽然不了解，但是对于他们之间的私人关系和职务关系、谁跟谁是对头、谁支持谁等等情况，却了如指掌，于是在他的头脑里就形成一种关于如何使用权力的艺术的错误观念，仿佛它不是在于为人民服务，而是在人事关系上耍权术，以便得到更多的人的支持。

他模仿这些人彼此之间的带着嘲弄的、居高临下的态度，模仿他们直言无忌和独立的见解，但是他不懂得这种态度后面有着多么不平凡的和艰苦的生活经历。他总是故作矜持，来代替青年特有的活泼的和直接的感情流露，用矫揉造作的轻轻的声音说话，特别是在电话里跟生人说话的时候。总之，他在对待同学的关系上善于强调出自己是高人一等的。

这样，他从小就习惯了自命不凡；对他，人类共同生活的普通准则是不一定要遵守的。

到底为什么他应当牺牲，而不能像别人，像刘勃卡碰到的这个游击队员那样逃命？游击队陷入这种处境，过错并不在他斯塔霍维奇，而在别的比较负责的人，那么，此人有什么权利可以这样怀疑他呢？

在大伙踌躇不决，没有开口的时候，斯塔霍维奇甚至因为自己这种推论而稍微振作起来。但是谢辽萨忽然毫不留情地说：

“另外一个地方响起了炮火，可是他倒仰游着一走了事！炮火是因为游击队要突围才引起的，这时候每个人都很宝贵。

结果，岂不变成大家冲出去是为了救他了吗？”

指挥员杜尔根尼奇坐在那里仍旧保持着军人的姿势，脸上露出异常正直、果断的神色，眼睛并不望着谁。他说：

“一个战士必须执行命令。可是你在战斗中开了小差。简而言之——你是临阵脱逃。在我们前线，这是要枪毙的，或是关进惩戒营。这样的人要用血才能赎自己的罪……”

“我并不怕流血……”斯塔霍维奇说，脸色都苍白了。

“你只知道自高自大，再也没有别的！”刘勃卡说。

大伙都望了望奥列格：他对这件事到底怎么看法？于是奥列格非常平静地说：

“凡尼亚·杜尔根尼奇已经都说了，说得不能再好了。根据斯塔霍维奇的表现，很显然，他根本目无纪律……这样的人能不能待在我们队伍的总部里？”

奥列格这么一说，大伙心里要说的话都冲出来了。青年人群情激昂地痛斥斯塔霍维奇。

他们不是一起宣誓的吗？——斯塔霍维奇干了这样的亏心事，他怎么还能起誓，他怎么可以不把这种行为坦白出来？这位同志可真行，居然敢玷污这样神圣的日子！当然，一分钟也不能把这样的同志留在总部里。姑娘们，刘巴和邬丽亚，对斯塔霍维奇鄙视到极点，甚至不屑发言，这是使他最为难堪的。

他变得十分狼狈，卑屈地望着人，竭力要窥探大家的眼色，一再重复说：

“你们难道不相信我？随便给我怎样的考验吧……”

这时奥列格的确表现出他已经不是奥列格，而是卡苏克了。

“可是你自己总该明白，不能把你留在总部吧？”他问。

斯塔霍维奇只得承认，当然不能再把他留在总部。

“重要的是要你自己明白这一点。”奥列格说，“至于任务，我们会给你，而且不止一个。我们要考验你。你的五人小组仍旧留给你。你可以有不少机会来恢复你的好名誉。”

刘勃卡这时说话了：

“他的家庭这么好，——简直气人！”

他们表决把叶夫盖尼·斯塔霍维奇开除出“青年近卫军”总部。他垂着头坐着，后来站起身来，克制着自己说道：

“这使我非常痛苦，你们自己懂得。但是我知道——你们不能不这样做。所以我并不怪你们。我可以起誓……”他的嘴唇颤抖起来，于是他就跑了出去。

大伙心情沉重地沉默了一会。这第一次对同志的严重的失望使他们很难受。忍痛采取断然措施毕竟是很难下手的。

但是奥列格却咧开嘴笑了一笑，略微有些口吃地说：

“他还—还会改正的，伙伴们，真的！”

杜尔根尼奇也用他的低低的声音支持他说：

“你们以为前线没有这种情形吗？一个年轻战士起初会胆怯，可是后来他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战士呢！”

刘勃卡觉得，是时候了，应该详细讲述跟普罗庆柯会面的经过了。她虽然没讲她是怎么到他那里的，——一般地说，她无权讲述她的活动的另一面，——但是她甚至在房里踱了几步，向大伙描述他怎样接待她和说了些什么。当刘勃卡讲到游击队司令部的代表表扬他们、夸奖奥列格，以及在告别时亲吻刘勃卡，大家都活跃起来。大概，他的确对他们很满意。

他们又是激动，又是高兴，甚至还有几分惊奇，因为他们从一个新的角度认识了自己。

他们互相握手道贺。

“不，万尼亚，你只要想一想，你只要想一想！”奥列格带着天真而幸福的表情对万尼亚说，“‘青年近卫军’成立了，连州的领导都承认它了！”

刘勃卡搂住邬丽亚，像亲吻姐姐那样亲吻了她。她跟邬丽亚从那次在杜尔根尼奇家里开会以后就成了朋友，但是见面后还没有来得及向她问好。

后来奥列格又看了看自己的笔记本。于是上次会议被推为五人小组的组织者的万尼亚就建议，再内定几个五人小组的组长——组织不是要发展嘛。

“也许，我们从五一村开始吧？”他透过他那教授式的眼镜，高兴地对邬丽亚望了一眼，说道。

邬丽亚站了起来，双手贴在身旁。大伙脸上突然都情不自禁地反映出一个少女的美在这些纯洁的心灵里不能不唤起的那种美好、幸福和无私的感情。但是邬丽亚并没有发觉他们对她的这种欣赏。

“我们，就是托里亚和我，提名维嘉和玛雅。”她说。她忽然看见刘勃卡在激动地望着她，“至于‘八家宅’方面，让刘巴挑选吧：将来我们就是邻居。”她用平静舒畅的低沉的声音说道。

“你真是，你怎么啦！”刘勃卡的脸红了，她忙不迭地摆着雪白的小手，表示实际上她哪里算得上什么组织者！

但是大伙都附议邬丽亚的建议，刘勃卡只好马上乖乖地不开口了：一

刹那间她想象自己是“八家宅”的组织者，这使她非常得意。

杜尔根尼奇认为，提出昨夜他跟奥列格商定的那个建议的时机到了。他讲述了奥列格贴传单的全部经过，讲到这不仅会使奥列格个人，而且会使整个组织遭受怎样的危险。接着他就提议应该通过一项决议：没有总部批准，永远禁止奥列格参加任何行动。

“我想，这甚至不用解释。”他说，“当然，这项决议对我也应该适用。”

“他是对—对的。”奥列格说。

于是他们一致通过了这项决议。接着谢辽萨站了起来，样子非常窘。

“我也有两件事要报告。”他嘟起好像有点肿的嘴唇，面色阴郁地说。

大伙忽然觉得非常好笑，甚至有一会儿没有让他讲。

“不，我先要讲讲这个福明。我们对这个坏蛋难道还能容忍吗？”谢辽萨气愤得脸色发紫，突然这样说道。“这个犹大①出卖了奥斯塔普楚克和瓦尔柯。我们还不知道，有多少我们的矿工埋在他的黑心里！……我要建议什么？……我建议干掉他。”谢辽萨说。“你们可以把这件事交给我去办，因为我迟早总要把他干掉。”他说。突然大伙都明白，谢辽萨是真会把福明干掉的。

①犹大是耶稣的门徒之一，后出卖耶稣。此处泛指叛徒。

奥列格的脸变得非常严肃，额头现出一条条很粗的皱纹。

总部所有的委员都没有作声。

“那又有什么呢？他说得对。”杜尔根尼奇用平静的、低低的声音说，“福明是存心在出卖我们的人。应该绞死他。绞死在我们的人可以看到的地方。还要在他胸口留一张纸，说明为什么要绞死他。这样才能杀一儆百。其实，这又算得了什么？”他说话时口气残酷，这在他是很出人意外的。“他们反正也不会放过我们！……把这件事交给我和谢辽萨吧……”

在杜尔根尼奇对谢辽萨表示支持之后，大伙心里仿佛都轻松了。因为不管他们心里对叛徒的仇恨有多么深，他们在最初一刻还是难以越过这一步。但是杜尔根尼奇说的话很有分量，这是他们的年长的同志，是红军指挥员，就是说，是应该这么办。

“当然，我们做这件事应该得到上级同志的批准。”奥列格说。“但是要请求批准先要有我们全体的意见……我把谢辽萨关于福明的提议先提付表决，然后再表决委派谁。”他说明道。

“问题够清楚了。”万尼亚说。

“不错，问题很清楚，不过我还是要把关于福明的问题单独提出来。”奥列格阴沉而固执地说。

于是大家明白了奥列格为什么对这一点要这样坚持。他们宣过誓。每个人应当在自己心里重新决定这件事。他们在严肃的气氛中表决了处死福明，并且委派杜尔根尼奇和谢辽萨去干。

“决定得对！对付他们这批坏蛋就应当这样！”谢辽萨说时眼睛里闪耀着热情的光辉，“我现在来报告第二件事……”

医院的娜塔丽雅·阿列克谢耶芙娜医生，就是那个长着胖胖的小手、眼睛里带着无情而讲求实际的表情的女人，告诉谢辽萨，在离城十八公里一个也叫克拉斯诺顿的村子里，有一群青年已经组织起来准备跟德国占领军作斗争。娜塔丽雅·阿列克谢耶芙娜本人并没有参加这个小组，她是听村里（她母亲在那里长住）跟她同住的女教师安托妮娜·叶里谢延柯说，才知道有这个小组，并且已经答应帮他们跟城里建立联系。

根据谢辽萨的提议，总部委派华丽雅去跟这个小组联系，这是缺席委派，因为妮娜、奥丽雅和华丽雅这些联络员并不出席总部的会议，而是和玛丽娜一起坐在院子里的柴房里给总部望风。

叶列娜·尼柯拉耶芙娜和柯里亚舅舅到玛丽娜的亲戚家的那个区里去住几天，——带了些东西去换粮食。“青年近卫军”总部就利用这个机会在这里开会。维拉外婆装出她相信孩子们是聚起来开晚会的，她把玛丽娜舅母和她的小儿子都带到柴房里去。

他们还在讨论的时候，天已经黑了，维拉外婆出人不意地走了进来。她的一只眼镜腿已经断了，用黑线绑着挂在耳朵上，她从眼镜上面朝桌上一望，看见那瓶伏特加并没有动过，杯子也是空的。

“你们茶总要喝一点吧，我正好给你们热好了！”她这么一说，弄得那批地下工作者大为狼狈。“我已经劝玛丽娜带着孩子在柴房里睡下了，那边空气比较新鲜。”

外婆把华丽雅、妮娜和奥丽雅带进来，拿来了茶壶，还从五斗橱（不是食橱）下面的一只抽屉里摸出了几块糖，然后关上百叶窗，点上油灯，就出去了。

现在，只剩下这批年轻人留在这盏冒烟的油灯下，小小的火焰摇曳不定，从昏暗中只显出偶然照到的一部分脸、一部分衣服和物件，这时候，他们的确很像从事秘密活动的人了。

他们的声音也显得更喑哑、更神秘了。

“你们想不想收听莫斯科？”奥列格轻轻地问。

大伙都把这句话当做开玩笑。只有刘勃卡微微一颤，问道：

“怎么收听莫斯科？”

“只是有一个条件：什么都别问。”

奥列格到院子里去了一下，转眼就回来了。

“请你们稍微耐心等一下。”他说。

他隐没在柯里亚舅舅的黑房间里。

青年人默默地坐着，不知道该不该相信。可是此时此地哪能开这样的玩笑！

“妮诺奇卡①，来帮帮忙。”奥列格唤道。

①妮诺奇卡是妮娜的小名。

妮娜走到他那里去。

这时突然从柯里亚舅舅的房间里传出了这样熟悉的、但是大伙几乎已经忘掉的、不很响的咝咝声，轻轻的噼啪声和音乐声：什么地方在跳舞。一直有德国进行曲夹进来。一个从容不迫的中年人的声音用英语列举地球上被打死的人数，还有一个人不停地说着德语，说得很快，语无伦次，好像生怕别人不让他说完似的。

突然透过空气中的轻微的噼啪声——空气像波涛那样从浩瀚的空间涌进室内——播音员列维丹的熟悉的声音用柔和悦耳的微带低音的调子非常清晰地、庄严地、照常地、流畅地开始播音。

“……苏联情报局发布……九月七日战报……晚间消息……”

“记下，记下！”万尼亚忽然咝咝地低声叫起来，自己马上抓起一支铅笔。“我们明天就把它发出去！”

这个来自自由土地的自由之声隔着千里迢迢的空间说着：

“……九月七日，我军在斯大林格勒西面和西南面，同时在新罗西斯克和莫兹多克等地区与敌人激战……其他战线上无重大变化……”

伟大战役的回声好像冲进了室内。

青年们和姑娘们的身子都绷得像琴弦一样前倾着，他们的脸好像圣像上的面容，眼睛在油灯光下显得又黑又大，他们都不出一声地倾听着这来自自由土地的声音。

在门口，维拉外婆倚门站着，没有被任何人发觉，她的满布皱纹的古铜色的瘦脸很像但丁的脸。

第四十一章

电灯只供德国机关使用。通办事处和卫戍司令部的线路不是沿街，而是沿着跟邻家院子搭界的地方拉过去，有一根电线杆正好紧靠柯里亚舅舅家的房子。于是柯里亚舅舅就利用了这个方便。收音机藏在他的房间里，在五斗橱下面的地板底下，要开收音机的时候就把电线从气窗里拉出去，用一根装着搭钩、绕着电线的长竿，挂在电线杆的主线上。

情报局战报……他们无论如何要有一个印刷所！

沃洛佳、若拉和“雷响”托里亚在公园里只挖到残余的铅字。埋铅字的人当时可能手头没有包装的东西，匆匆把铅字倒在坑里，用土盖起来。而给汽车和高射炮装置挖战壕的德国兵可能起初搞不清这是什么玩意。他们把一部分铅字连一起扔散了，后来明白过来，才报告了上级。大概，铅字被交到什么地方去了，但是还有一些零星的铅字留在坑底。青年人化了几天工夫在地里耐心挖掘，在离开图样上标注的地方大约几米的半径以内找到一些残余的铅字，就一古脑儿都拿来了。这一点铅字不能满足刘季柯夫的需要，所以他准许沃洛佳把铅字让给“青年近卫军”使用。

万尼亚的大哥亚力山大现在在部队里，以前的职业是印刷所工人。他长期在当地的《社会主义祖国报》的印刷所里工作，过去万尼亚常到他那边去找他。所以现在由万尼亚监督，沃洛佳制造了一架小小的印刷机。金属部分是沃洛佳偷偷地在机械车间里旋出来的，若拉担任的工作是做一个装这些东西的箱子和几只排字用的字盘。

若拉的父亲是细木匠。虽然与若拉的期待相反，无论是他父亲，甚至是性格很强的母亲，在德国人来后都没有拿起武器。但是若拉仍然毫不怀疑，他会逐步使他们参加他的活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认为他母亲的性格太刚强，应当最后才教她干，现在先从父亲着手。若拉的父亲是一个性情温和的中年人，个子比儿子矮一个头，儿子完全像母亲，性格像她，个子像她，乌黑的头发也像她。若拉的父亲对于地下工作者竟把这样细致的定货通过他的未成年的儿子交给他，感到大为不满。他瞒着妻子把箱子和字盘做好。当然，他不会知道，现在若拉和沃洛佳自己都已经成了重要人物——

成了五人小组的组长了。

两个青年人现在好得要命，一天不见面都不行。只是对刘西雅，若拉仍旧保持着紧张矜持的关系。

这无疑是人们性格不合的一个例子。他们俩都爱读书，但是若拉喜欢政治、科学内容的书，而使刘西雅激动的主要却是书中的激情，应当指出，她比他大几岁。不错，当若拉试图展望朦胧的未来时，他想到刘西雅将要精通三种外国语而颇为得意，但是他仍然认为学这一门课不够扎实，而他试图使刘西雅成为建筑工程师的做法也许又有些冒失。

总之，他们只要一见面，从第一分钟起，刘西雅的闪烁发光的浅色眼睛和若拉的坚决的黑眼睛，就会像钢刀那样交锋。所以，只要他们碰到一块（大多不是单独的），全部时间他们都是唇枪舌剑地互相反驳、攻击。刘西雅的反驳是傲慢的、挖苦的，若拉的反驳却特意表示克制，是教导式的。

终于有一天，他们四个青年人——若拉本人、沃洛佳、“雷响”托里亚和万尼亚聚集在若拉的房间里。万尼亚是他们的年纪较大的同伴和领导者，现在与其说他是诗人，还不如说是“青年近卫军”大部分传单和口号的起草者，所以他当然要比大伙更关心印刷所。现在印刷机已经装好。“雷响”托里亚像对着木桶那样咳嗽着，气喘吁吁地捧着它在房间里来回走了几趟，为的是证明到了紧急关头，一个人就可以把印刷机搬走。

他们已经有了一把平刷和一只滚筒。若拉的父亲一辈子尽跟颜料和油漆打交道，他制造了一种照他所说的“独创的混合剂”来代替印刷用的油墨。他们马上动手把字母分类放进字盘。可是近视眼万尼亚把所有的字母都看成“0”字，他坐在若拉的床上，直说他不明白怎么能用这一个字母做成俄语里所有的字母。

偏偏在这个时候有人在遮着窗帘的窗上敲了几下，但是他们并不着慌：德国人和“警察”从来还没有光临过新村这个辽远的尽头。果然，来的是奥列格和杜尔根尼奇。他们在家里怎么也待不住了，他们也希望快些在自己的印刷所里打出几张样子来。

但是后来才知道，他们根本不是那样的老实人！杜尔根尼奇悄悄地唤了一声若拉，他们就一同走到菜园里，奥列格却像没事人似的留下来给沃洛佳和托里亚帮忙。

杜尔根尼奇和若拉躺在田埂旁边。常被乌云遮住的太阳晒在身上已经有些秋意；雨后的泥土和草还是潮润的。杜尔根尼奇俯身凑着若拉的耳朵轻轻说了几句话。果然不出他所料，若拉立刻非常坚决地回答他说：

“对！这样又公正，又可以教训其他的坏蛋！……我当然同意。”

在奥列格和杜尔根尼奇得到地下区委批准之后，就需要做一件极为细致的工作——要在青年人中间找出一些这样的人：他们去干这件事不仅是出于正义感和纪律感，他们的高度的道义上的责任感也已经化为无比坚强的意志力，使他们的手不会发抖。

杜尔根尼奇和谢辽萨首先提出谢尔格：这是一个严谨的青年人，亲身经历很多。然后他们选定了柯瓦辽夫：他勇敢、善良、体力非常强。他们需要这样的人。谢辽萨原来还提出庇罗若克，但是杜尔根尼奇把他否定了：庇罗若克太喜欢冒险。至于他的好朋友维佳，谢辽萨因为体恤他就自动在头脑里把他取消了。最后他们选中了若拉。他们果然没有看错人。

“你们有没有任命法庭人员？”若拉问。“用不着他们来审问老半天，重要的是要让被告自己看到，他是由法庭判处死刑的。”

“我们自己来成立一个法庭。”杜尔根尼奇说。

“我们要用人民的名义来审判他。在此时此地我们就是人民的合法代

表。”若拉那双威武的黑眼睛闪了一闪。

“嘿，这小伙子算了不起！”杜尔根尼奇心里想。

“最好还要一个人。”他说。

若拉考虑了一会。他想到沃洛佳，但是沃洛佳的心灵太敏感，干不了这种事。

“我的五人小组里有一个腊箕克·尤尔金。你认识吗？是我们学校的。我想他倒合适。”

“他还是个孩子。事后他心里会觉得不舒服。”

“没有的事！孩子们根本不会觉得舒服不舒服。我们大人才会老觉得有些不舒服。”若拉说，“至于孩子们，你知道，他们根本不在乎。他这个人既沉着，又肯卖力！”

有一次，若拉的父亲在自己的披屋里替他们干木工活的时候，若拉撞见母亲朝钥匙孔里偷偷地张望，他弄得没有办法，只好对她说，他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人，他的同学也都是成年人了：如果他们大伙明天就结婚，请她也不必大惊小怪。

若拉和杜尔根尼奇回来得正是时候：铅字整理好了，沃洛佳已经排了几行扎起来。若拉马上把刷子朝“独创的混合剂”里一蘸，沃洛佳把纸一放，就用滚筒滚过去。印出来的文字围着一圈表示哀悼的星框框，原来沃洛佳因为没有经验，在机械车间里把那些铅条磨得不够低。此外，字母还大小不同，不过这也只好将就了。最重要的是他们面前放着真正排印出来的文字，而且大伙都可以看到沃洛佳排出来的东西：

别跟凡尼亚单独出去别让人神经紧张我们反正知道你心里的秘密哎呀呀。

沃洛佳说明这几行他是献给若拉的，他拚命选用带有“B”的字，甚至“哎呀呀”①这个词也是为了这个字母而排上去的，因为在他们的印刷所里，字母“B”最多。他没有排标点符号，只是因为他忘记应当把它们也当做字母那样排上去。

奥列格感到万分兴奋。

①“哎呀呀”的原文是“CBDDB”，其中有两个B字母。

“你们知道五一村有两个姑娘要求接受她们入团吗？”他用大眼睛望着大伙，问道。

“在我的五人小组里也有一个小伙子想入团。”若拉说。这个小伙子就是那个腊箕克·尤尔金，因为若拉的五人小组里目前只有腊箕克·尤尔金一个人。

“我们可以在‘青年近卫军’印刷所里印一些临时团证！”奥列格高兴得叫起来，“要知道，我们有权接受青年人入团：我们的组织是经过正式批准的！”

这个脑袋狭长、戴着老式帽子、一双蟒蛇眼似的眼睛藏在无数的皱褶中间的人，尽管他的瘦长的身子还在东奔西走，尽管他的手脚还在活动，这个人反正已经是死的了。

不论他站岗也罢，去捉人也罢，复仇之神都日夜跟踪着他。当他和他老婆仔细观看从刚被他打死的人家里抢来的什物的时候，复仇之神就在窗外监视着他；复仇之神知道他的每一件罪行，把它们一笔一笔都记在帐上。复仇之神化做一个动作像猫儿一般敏捷、生就一双夜眼、几乎还是孩子模样的

青年跟踪他。要是福明知道这个赤脚的复仇之神是多么严厉无情，他一定会马上停止一切显示生命迹象的动作。

说福明已经是死人，是因为现在支配他的一切行为的甚至不是大发横财的渴望，也不是报仇之心，而是隐藏在循规蹈矩和衣冠楚楚的面具底下的无所不包的、无穷无尽的怨恨——恨自己的生活，恨所有的人，甚至恨德国人。

这种怨恨逐渐使福明的心灵空虚，但是从来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可怕和绝望，因为支持他生存的最后那根尽管卑鄙、不过总算是精神上的支柱崩坍了。本来，不管他是多么作恶多端，他还是一心想爬上掌权的地位，到那时人人都得怕他，因为怕他就要尊敬他，对他卑躬屈节。而能够像旧社会里有钱人那样受到众人的尊敬，他就可以获得一个富裕的、不仰人鼻息的安身之处了。

可是到头来，他在生活中不但没有获得，而且也毫无希望获得公认的可靠的资财。他偷窃那些被捕的人和被杀害的人的东西，德国人对这种事虽然装糊涂，可是他们也瞧不起他，把他看做一个雇佣的、卖身投靠的、黑心的恶棍和小偷。他知道，只有在他替他们卖命，为了确立他们的统治继续替他们卖命的时候，他们才需要他，一旦这个统治确立起来，有了合法的秩序——秩序①的时候，他们就会把他一脚踢开或是干脆把他干掉。

① 原文为德语。

不错，有许多人怕他，但是连这些人也像其他所有的人一样，都蔑视他，避开他。而如果有生活中确立不了自己的地位，得不到人们的尊敬，那么即使是交给妻子的不义之财，也不能给他带来丝毫的满足。他和他妻子过的生活比禽兽还不如：禽兽还有因为享受阳光和食物而感到的乐趣，还能繁衍后代。

福明跟所有的“警察”一样，除了参加逮捕和搜查之外，还担任警卫工作——在街上巡逻或是在机关附近站岗。

这一夜他在办事处附近站岗，办事处占用的是公园里面高尔基学校的校舍。

风一阵阵地吹得树叶簌簌作响，不时在细长的树干丛里呻吟，旋卷着林荫道上的潮树叶。下着雨，——不是雨，而是蒙蒙细雨，——头顶上笼罩着漆黑的、朦胧的天空，但是在这片朦胧后面似乎仍然有着月亮或是星星，一簇簇的树木也好像是一个个朦胧的黑点，它们的潮润的边缘和天空融成一片，仿佛是溶化在天空里。

砖砌的校舍和夏季剧场的冷落的高大建筑物像两块黝黑的巨石，隔着林荫道对峙而立。

福明穿着长长的黑色秋大衣，钮扣扣得紧紧的，领子竖起，在两座房屋中间的林荫道上来回走动，并不进入公园深处，好像他是被链索拴着。有时他停在木拱门下面，倚柱而立。

他正这样站着，顺着有人家居住的公园街朝黑暗中张望的时候，突然有一只手从后面死劲搂住他的下巴底下，掐住他的喉咙，——使他甚至不能吭声，——再把他的身子往后一扳，扳得他的脊椎骨都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接着他就倒在地上了。在同一刹那他感到他身上有好几双手。一只手照旧掐住他的喉咙，另一只手像铁钳一样钳住鼻子，还有人把一团东西塞到他的痉挛地张开的嘴里，又用一块好像是粗毛巾的东西把他的脸整个下半部紧紧扎

住。

等他清醒过来，他的手脚都被绑着，仰脸躺在木拱门下面。混沌的、雾气（而不是光）弥漫的天空，好像被一条黑色的弧线切开，悬在他的上面。

几个黑色的人形一动不动地站在他的两旁，他看不见他们的脸。

其中一个人的匀称的侧影在夜色中显得轮廓分明，那人望了望拱门，轻轻地说：

“这儿正合适。”

一个身材瘦小的男孩敏捷地动着尖尖的臂肘和膝盖，攀上拱门，在拱门正中忙了一阵。

突然，福明看见自己的头顶高处悬着一个粗大的绳圈，在朦胧的微光中晃悠。

“打个猪蹄扣。”下面一个年纪较大的男孩严峻地说，他的黑帽舌朝天翘着。

福明一听到他的声音，就突然想起自己在“上海”的摆着几桶橡皮树的上房，想起坐在桌旁的那个脸上斑斑点点的人的结实的身形以及这个男孩。于是福明就把他那蛆虫般的细长身子在冰冷的湿地上拚命地扭动。他扭动着离开他们让他躺的那个地方，但是一个穿着像水手呢衣的宽大的短上衣的人一脚又把他踢回原来的地方，那人个子敦实，双手有力，肩膀宽得出奇。

福明认出了这个人就是跟他一起在“警察队”共事、后来被开除的柯瓦辽夫。除了柯瓦辽夫之外，福明还认出了办事处的一个司机，也是一个宽肩膀的棒小伙子，今天他在站岗之前顺路弯进汽车库里去抽支烟的时候，在那里还看见过他。按福明当时的处境来说，尽管非常奇怪，但他脑子里还是闪过一个念头：德国行政当局常常抱怨办事处的汽车多次莫名其妙地出事故，大概这个司机就是罪魁祸首，应当把这件事向上级告发。但是在这一瞬间，他听到上面有一个略带亚美尼亚口音的声音轻轻地、庄严地说道：

“遵照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命令……”

福明霎时间安静下来，抬眼望了望天，又看见自己上面朦胧的微光中的粗大的绳圈，还看见一个瘦瘦的男孩用两腿盘住拱门，安静地坐在上面朝下望。但是这时带亚美尼亚口音的声音停止了。福明突然感到万分恐惧，他又拚命地在地上扭动起来。有几个人上来用有力的手抓住他，扶他站起来，坐在横木上那个瘦瘦的男孩就扯下缚着他下颚的毛巾，把绳圈套进他的脖子。

福明拚命要把塞在嘴里的那团东西吐出来，但是他悬空抽搐了几下，就吊住不动了，他双脚略微离开地面，黑色长大衣上的全部钮扣都扣着。杜尔根尼奇把他的脸转过来对着公园街，用一枚别针把一张纸条别在他的胸口，说明伊格纳特·福明是为了什么罪行被处死的。

后来他们分手了，各走各的路，只有小腊箕克跟若拉到新村去过夜。

“你觉得怎么样？”若拉用非常低的声音问那不住哆嗦的腊箕克，他的黑眼睛在黑暗中闪闪发光。

“困得要命，简直没有办法……因为我一向睡得很早。”腊箕克说着就用安静而温顺的眼睛望了望若拉。

谢辽萨站在公园里的树下沉思。现在，自从他打听出他在福明家里看见的那个和善的大汉被房东出卖给德国当局的那一天他就发誓要干的事，终于完成了。谢辽萨不仅坚持要执行判决，他还为这件事献出了他的全部体力

和精力，现在，这件工作完成了。心满意足的感觉，成功的兴奋，迟来的最后的复仇的火花，极度的疲倦，想干干净净地洗一个热水澡的愿望，想跟人亲切愉快地聊聊什么非常遥远的、非常单纯的，就像树叶的低语、小溪的潺流、或是照射在倦极而闭上的眼皮上的阳光那样的快事的异常的渴望，——这一切都在他心里起伏着。

现在最幸福的事莫过于跟华丽雅在一起了。但是他从来不敢在夜里去看她，尤其是有她的母亲和小妹妹在场。而且华丽雅也不在城里：她到克拉斯诺顿村去了。

结果是：在这个不平常的、朦胧的、不断飘着蒙蒙细雨之夜，谢辽萨身上只穿一件湿透了的衬衫，赤着溅满泥泞和冻得发僵的双脚，冷得浑身哆嗦，去敲万尼亚的窗子。

他们俩坐在厨房里，放下黑窗幔，点着油灯。火花不时噼啪作响，灶上放着一只家用的大水壶在烧水，——万尼亚到底还是决定让朋友洗个热水澡，——谢辽萨盘着光脚，紧挨在灶旁。风一阵阵吹打着窗子，把千万粒小雨珠撒在窗上。雨珠打窗的不断的沙沙声，还有把这儿厨房里的灯焰都吹得微微晃动的风势，告诉这对朋友，现在一个单身旅人在草原上是多么糟糕，而两个人待在温暖的厨房里又是多么舒服。

戴着眼镜、赤着脚的万尼亚用他的有点喑哑的低音说着：

“我现在仿佛也看见他①在那座小小的木房里，暴风雪在周围咆哮，只有乳娘阿琳娜·罗箕奥诺夫娜陪伴着他……暴风雪咆哮着，乳娘坐在纺车旁边，纺车嗡嗡地叫着，炉火噼啪地响着。我非常了解他，我自己就是来自农村，我母亲，你是知道的，也是一个大字不识的女人，也是农村来的，像你母亲一样……我现在还记得我们的小木房；我躺在炉炕上，那时大概六岁，亚力山大哥哥从学校回来，教我念诗……要不然，我记得，就是把畜群里的绵羊赶出来，我骑上一头羔羊，用树皮鞋夹紧它叫它快跑，可是它把我摔下来了。”

①指俄国诗人普希金，他在一八二四年被幽禁在米哈依洛夫斯柯耶村，在那里和他的乳娘孤独地过了将近两年。

万尼亚突然不好意思起来，沉默了一会，后来又开口了：

“当然，朋友当中有人来的时候，给他带来极大的欢乐……我可以想象，比方说，像普欣①来看他的时候……他听到铃声，他心里想：‘这是什么？说不定是宪兵来抓我吧？’不料来的是普欣，他的朋友……要么他就跟乳娘对坐着；远远的什么地方有一个被雪封住的村子，没有灯火，因为那时候是点松明的……你记得‘风暴用尘雾遮蔽了天空……’②吗？你大概记得。我念到这个地方总是很感动……”

①普欣（1798—1859），十二月党人，普希金中学时代的同学。当普希金被幽禁在米哈依洛夫斯柯耶村的时候，他曾专程来看望他。

②这是普希金的诗《冬天的黄昏》的第一句。

于是万尼亚不知为什么站到谢辽萨面前，有点喑哑地念道：

……我们来同干一杯酒，
我不幸的青年时代的好女伴，
让我们以酒浇愁，酒杯在哪儿？
这样快乐就会涌上心头。
唱支歌儿给我听吧，唱那山雀
怎样安静地在海那边栖息，

唱支歌儿给我听吧，唱那少女

怎样清晨到井边把水汲……①　　①这八行诗是《冬天的黄昏》的第三段。

谢辽萨嘟着好像微肿的嘴唇，挨着灶安静地坐着；他的眼睛里含着严峻而又温存的表情望着万尼亚。灶上水壶的盖子开始跳跃，壶里的水兴冲冲地发出汩汩声和咝咝声“诗念够了！”万尼亚好像醒悟过来。“把衣服脱掉！我，老弟，要给你洗个头等的澡。”他兴致致勃勃地说，“不，老弟，都脱掉，都股掉，有什么可害臊的！我还预备了一个澡擦子呢。”

谢辽萨脱衣服的时候，万尼亚拎下水壶，从俄罗斯式炉炕底下拖出一只盆，把它放在凳子上，又在凳子角上放了一块用剩的、味道难闻的普通洗衣皂。

“在坦波夫州我们的村子里，有一个老头。他呀，你知道，在莫斯科的一个商人桑杜诺夫那里当了一辈子擦背的。”万尼亚叉开细长的光腿，骑在凳子上说着，“你知道，做擦背的是什么意思吗？瞧，比方你进了澡堂。比方你是个老爷或是懒得自己洗澡，你可以叫一个擦背的，他这个大胡子就会来给你擦。明白吗？这个老头，他说他一生中起码给一百五十万人擦过背。你以为怎么样？他还以此自豪呢：把这么多人洗干净了！不过，你知道，过个星期又脏了，因为这是人的本性！”

谢辽萨笑嘻嘻地脱下最后一件衣服，把盆里的水掺热一些，舒服地把长着鬈曲硬发的脑袋浸到水盆里。

“你的衣服真好得令人羡慕，”万尼亚边说边把他的湿衣服挂在灶上面，“比我的还要好……可是你，我看得出，是很有条理的。脏水就倒在这个桶里，再来一次，别怕溅出来，我会擦掉……”

突然他脸上露出了有点粗野而又温顺的笑容；他把身子弯得更低，怪得怪样地垂下瘦削的双手，使它们突然显得有些沉重和发胀，再把他的低音变得更重浊地说道：

“请把身子转一下，阁下，我要擦背了……”

谢辽萨默默地把澡擦子打上肥皂，斜睨了朋友一眼，鼻子里还嗤了一声。他把澡擦子交给万尼亚，双手抵着凳子，把脊椎骨突露、晒得很黑、虽瘦而肌肉发达的脊梁朝着万尼亚。

万尼亚眼睛看不清楚，笨手笨脚地动手给他擦背，谢辽萨却用出人意外的老爷腔调咕噜道：

“你这是怎么回事，我的老弟？没有劲啦？还是偷懒？我对你不满意，我的老弟……”

“可是吃的是什么啊？您自己评评理看，阁下！”万尼亚一本正经地、歉然地用低音回答。

这时厨房门开了，戴着玳瑁边眼镜、卷起袖子的万尼亚和光着身子、背上涂着肥皂的谢辽萨回过头来，只见万尼亚的父亲穿着贴身衬衫衬裤站在门口。他站在那里，又高又瘦，垂着沉重的双手，——万尼亚刚才就是想把自己的手弄成那样，——用颜色灰白得令人难受的眼睛望着他们。他这样站了一会，什么也没有说，就转过身去带上门走了。可以听到他拖着脚步沙沙地从穿堂走进上房。

“暴风雨过去了。”万尼亚神色自若地说。但是他给谢辽萨擦背已经没有原来那样带劲了，“您赏点小费吧，阁下！”

“上帝会赏的。”谢辽萨回答，他并不完全有把握，对擦背的应不应该这样说，接着叹了口气。

“是啊……我不知道你们家里怎么样，不过我们跟我们的爹妈免不了要有些麻烦。”万尼亚态度严肃地这样说的时候，谢辽萨已经洗得干干净净，面色红润，头发也梳过，又坐在灶旁的小桌旁边了。

但是谢辽萨并不担心父母跟他找麻烦。他心不在焉地望了望万尼亚。

“你能不能给我一小张纸和一支铅笔？我马上要走了。我有几句话要写。”他说。

趁近视眼万尼亚装出他还要把厨房里收拾一下的时候，他写了下面的话：

华丽雅，我从没有想到，你单独一人走了之后我会这样痛苦。我老是在想：你不知怎么样了？让我们永远不再分开，什么事都一起干吧。华丽雅，如果我牺牲了，我有一个请求：你到我的坟前来，轻声说几句温柔的话来悼念我。

他赤着脚，冒着这一阵阵呻吟着的凄风和这砭骨的蒙蒙细雨，沿着山沟和洼地，又在小“上海”的郊外走了一大段路——他又进了公园，到了木头街，要赶在黎明时分把这张字条交给华丽雅的小妹妹刘霞。

第四十二章

在一个天色阴暗的清晨，华丽雅跟娜塔丽雅·阿列克谢耶芙娜一同在草原上走着。娜塔丽雅·阿列克谢耶芙娜麻利地、一本正经地在光滑而潮湿的路上移动着那双穿着球鞋的胖胖的小脚；可是华丽雅这次远行的全部乐趣，却被“妈妈不知怎么样了？”这个念头所破坏。

她这是初次独当一面地出马，这个任务使她本人难免会遇到危险，但是，妈妈呀，妈妈！……当华丽雅带着毫不在乎的神气说她不过是到娜塔丽雅·阿列克谢耶芙娜家里去做客，住上几天的时候，妈妈是怎样地望了望女儿啊！现在，父亲不在家，母亲如此孤独的时候，女儿的这种自私的做法会使母亲感到多么寒心哪！……万一妈妈已经起了疑心呢？……

“我要带您去见的托西雅·叶里谢延柯是一个女教师，她是我母亲的邻居，更确切地说，托西雅和她母亲跟我母亲同住在一所有两个房间的房子里。这个姑娘有主意、性格很坚强，年纪比您大得多，我坦白地说，我没有带一个有大胡子的地下工作者，而带了一个漂亮的小姑娘去见她。一定会使她感到纳闷。”娜塔丽雅·阿列克谢耶芙娜说。她说话一向只注意她的话的意思是否准确，毫不在乎这些话会使对方产生什么印象。“我很了解谢辽萨，他是个非常严肃的孩子，在某种意义上讲，我相信他甚至超过相信我自己。如果谢辽萨对我说，您是区组织派来的，那一定没错。所以我要帮您的忙。要是托西雅对您不够开诚布公，您可以去找柯里亚·苏姆斯柯依。根据托西雅对他的态度，我个人相信他在他们中间是最主要的人物。他们虽然向托西雅的母亲和我的母亲暗示，好像他们在谈恋爱，而我，尽管由于工作大忙，连自己个人的生活还没能安排好。但是对于年轻人的事倒很清楚。我知道苏姆

斯柯依爱的是李达·安德罗索娃，一个专好卖弄风情的姑娘。”娜塔丽雅·阿列克谢耶芙娜不以为然地说。“不过毫无疑问，她也是他们组织里的一员。”她纯粹为了公平起见添了这么一句。“如果您需要苏姆斯柯依本人跟区的组织联系，我可以利用我的区职业介绍所医生的职权，给他两天病假。他在那边一个小矿井里干活，准确地说。是在摇绞车……”

“那么德国人也相信您出的证明吗？”华丽雅问。

“德国人！”娜塔丽雅·阿列克谢耶芙娜叫起来。“随便什么样的证明书，只要它是官方人员出的，他们非但相信，而且还服从……这个小矿井的管理人员是自己人，俄罗斯人。

虽然在井长下面，像各处一样，也有一个技术队里的中士，一个上等兵，为人粗暴凶狠到极点……在他们看来，我们俄罗斯人的脸都一模一样，所以他们搞不清谁来上工，谁没有来。”

这个村子里没有一棵树木，只是零零落落地分布着一些兵营式的大房子、巨大的黑色矸石堆和僵立不动的井架。一切果然都不出娜塔丽雅·阿列克谢耶芙娜所料。华丽雅注定要在这个好像无法安身的环境里，在这样一批人中间度过两个昼夜，他们不大肯相信这个有着深色长睫毛和金黄色发辫的姑娘就是威望很高的“青年近卫军”的代表。

娜塔丽雅·阿列克谢耶芙娜的母亲住的是人口比较稠密的旧村，这里的田庄联成一片。

这边的房子甚至都有个小园子。但是园里的灌木都已经发黄。由于过去的几场雨，满街都是齐腰深的泥浆，这泥浆显然注定要留到冬天了。

这几天，有一支罗马尼亚部队不断经过村子朝斯大林格勒的方向开去。它的大炮和大车套着在挽索里挣扎的瘦马，在这泥浆里一停就是几个钟头。赶车人的声音就像草原上的风笛，他们用俄语大声叱骂，使全村都能听见。

托西雅是一个二十三四岁的美丽的姑娘，乌克兰式的厚实丰满的体格，一双异常热情的黑眼睛。她开门见山地对华丽雅说，她要责备区地下核心组织不该对克拉斯诺顿村那样的矿村估计过低。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位领导来访问克拉斯诺顿村？为什么不应他们的请求派一个可以指导他们工作的负责同志前来？

华丽雅认为自己有权说明，她只代表在地下区委领导下工作的青年组织“青年近卫军”。

“那么‘青年近卫军’总部委员当中为什么不来人呢？”托西雅闪动着那双厉害的眼睛，说。“我们的组织也是青年组织呀。”她自尊地加了一句。

“我是受总部委托的人。”华丽雅撅起娇艳的上唇，自尊地说道。“至于派一个总部委员到一个在工作上还没有任何表现的组织里来，那是冒失的，不符合秘密活动的原则……只要您在这方面稍微懂得一点的话。”华丽雅加了一句。

“没有任何工作表现？！”托西雅气得大叫起来，“好一个总部，居然会不知道自己各个组织的工作！我又不是傻瓜，会把我们的工作告诉一个我们不认识的人。”

要不是把柯里亚·苏姆斯柯依的姓名抬出来，她们这两个自尊心都很强、面貌可爱的姑娘可能就这样谈崩了。

不错，在华丽雅提到苏姆斯柯依的姓名时，托西雅假装她不认识这么个人。但是华丽雅马上就直截了当地、冷冷地说，“青年近卫军”知道苏姆

斯柯依在组织里的领导地位，要是托西雅不肯带她去见他，她自己也会找到他。

“我倒很想知道，您怎么去找到他。”托西雅有点发慌地说。

“哪怕是通过李达·安德罗索娃也行。”

“李达·安德罗索娃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对您采取跟我不同的态度。”

“那就更糟……我要自己去找他，我可能因为不知道他的住址而无意中给他招来麻烦。”

于是托西雅只好屈服。

等她们到了苏姆斯柯依家里，整个情况都转变了。他住在村边的一所宽敞的乡下房子里，屋后就是草原。他父亲从前是在矿上赶车的，他们的全部生活都是半乡村式的。

苏姆斯柯依的鼻子很大，肤色浅黑的聪明的脸上充满了古代哥萨克祖先的勇毅、机智而又豪爽的神气，使他的脸显得很动人。他眯起眼睛听完了华丽雅的傲慢的和托西雅的热情的解释，默默地请两个姑娘走出屋子。她们随着他顺着搁在那里的梯子爬上阁楼。阁楼上有一群鸽子哗啦啦地腾空飞去，有几只落在苏姆斯柯依的肩上和头上，还极力要落在他的手上。

最后，他把一只手向一只筋斗鸽伸出去，那只鸽子好像是按照模型剪下来似的，白得耀眼，真正如同白鸽般的纯白。

阁楼上坐着一个体格像真正的赫古力士①的青年。他一看见这个陌生的姑娘，就慌得要命，连忙用干草盖住他身边的什么东西。但是苏姆斯柯依对他做了个手势：一切都没有问题。赫古力士微微一笑，推开了干草，华丽雅看见了一架收音机。

“沃洛嘉·日丹诺夫……华丽雅·聂伊兹薇斯特纳雅②吧，”苏姆斯柯依不露笑容地说。“我们三个人——托西雅、沃洛嘉和我这个地狱里的罪人——就是我们组织里的三人领导小组。”他说，他身上停满了咕咕乱叫、跟他表示亲热、又像要突然振翼飞去的鸽子。

①赫古力士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大力士。

②聂伊兹薇斯特纳雅是俄语“不知道”的译音，意思是不知道华丽雅姓什么。

在他们商量苏姆斯柯依能不能跟华丽雅一起到城里去的时候，华丽雅感到赫古力士的目光停留在她身上，看得她不好意思起来。华丽雅知道，在“青年近卫军”里有一个大力士柯瓦辽夫，他因为力气大，为人善良，近郊的人都管他叫“王子”。但是这一个的面貌和体态都是异常高贵匀称，他的脖子好像是青铜铸出来的，他使人感到有一种安详和美的力量。不知为什么，华丽雅忽然想起了瘦小赤脚的谢辽萨，一阵温存的幸福之感叫她心酸，竟使她沉默起来。

他们四人一齐走到阁楼边上，苏姆斯柯依突然抓住蹲在他手上的那只筋斗鸽，随便从下面把它一扬，用足力气把它送上阴暗的、下着蒙蒙细雨的天空。其余的鸽子也都从他肩上飞起。大伙都从屋顶上的斜天窗里观看那只筋斗鸽。它直冲上去，像天神一般消失在天空里。

托西雅拍了下巴掌，往下一蹲，带着兴高采烈的神气尖叫起来，大伙都回过头来望她，也笑起来。她的声调里和眼睛里都带着兴高采烈的表情，好像对大伙说：“你们以为我厉害吗，那你们最好瞧一瞧，我是个多么好的姑娘！”

第二天一早，华丽雅和苏姆斯柯依已经走上草原里进城的大路。一夜之间，满天的阴霾好像都被洗净，从清晨起阳光就照射着，所以周围都已经干了。四周的草原上枯草满目，不过在初秋的风光里，草原好像染上一层熔化了的铜的颜色，依然是美丽的。空中不断飘荡着一根根细长的蛛丝。德军的运输机不断朝斯大林格勒那个方向飞行，使草原上充满了飞机的轰隆声，过了一会，草原上又变得静悄悄的。

走到半路，华丽雅和苏姆斯柯依在一个山岗的斜坡上躺下来休息，晒晒太阳。苏姆斯柯依抽起了烟。

突然，一阵在草原上自由飘散的歌声传到他们的耳际，这支歌听起来如此熟悉，它的旋律立刻在华丽雅和苏姆斯柯依的心里鸣响起来。《黑黝黝的山岗睡不醒》……这是他们这些顿涅茨草原居民的心爱的歌曲。但是这支心爱的歌曲，它今天早晨怎么会在这里唱起来？……华丽雅和苏姆斯柯依用臂肘撑起身子，心里也重复着离他们愈来愈近的歌词。唱歌的有两个声音，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都非常年轻，唱得拚命地响，好像是在向全世界挑战：

太阳晒焦的
黑黝黝的山岗睡不醒，
白茫茫的迷雾
层层移动不停……
穿过绿油油的田野
和喧哗的树林，
顿涅茨草原上
来了一个年轻人……

华丽雅敏捷地溜上岗顶偷偷地一望，然后探出半个身子，大笑起来。

在大路上，沃洛佳和他的妹妹刘西雅引吭高歌，手拉着手朝他们这边走过来。

华丽雅冲下山岗，迎着他们像儿时那样飞奔过去。苏姆斯柯依并不感到十分惊讶，慢吞吞地跟在后面走过去。

“你们上哪儿去？”

“到乡下去看爷爷，想弄点粮食。跟在你后面的是谁？”

“是自己人，村里的柯里亚·苏姆斯柯依。”

“我可以再给你介绍一个同情我们的人，我的亲妹妹刘西雅，她刚才在草原里对我说了真心话。”沃洛佳说。

“华丽雅，您倒评评理看：这是不是太岂有此理？大伙都了解我，可是我的亲哥哥反而什么事都对我保密。其实我都看在眼里！到末了，我在他房间里发现了印刷所里用的铅字，还有他用来洗铅字的什么臭溶液，一部分他已经洗干净了，一部分还没有洗，结果今天忽然……华丽雅！您知道今天出了什么事吗？”刘西雅朝走近的苏姆斯柯依迅速地瞥了一眼，突然尖叫起来。

“别忙。”沃洛佳严肃地说。“我们机械车间的工人都亲眼看见了，这一切就是他们告诉我的……总之，他们走过公园，一看：大门上吊着一个穿黑大衣的人，胸口别着一张字条。起初他们还以为是德国人绞死了我们的什么人。等走到跟前一看，却原来是福明。啊，你知道那个坏蛋，那个‘警察’吗？字条上写着：‘对所有出卖我们自己人的叛徒，我们都要这样处置。’讲完了……你明白吗？”沃洛佳把嗓门压低到耳语声说。“干得真棒！”他高叫起来。“在大天白日吊了两个钟头！这是他的岗位，附近没有一个‘警察’。

看见的人不知有多少，今天闹得满城风雨，谈的都是这件事。”

不管是沃洛佳或是华丽雅，都不但不知道总部要处死福明的决议，甚至料想不到会有作出这个决议的可能。沃洛佳确信这是布尔什维克的地下组织干的。但是华丽雅忽然脸色惨白，这种惨白竟透过她的被晒成金黄色的皮肤泛了出来：她知道有一个人能干这件事。

“那你知不知道，我们这方面一切都顺利吗，没有损失吧？”她好容易控制住自己的嘴唇，问道。

“干得真漂亮！”沃洛佳高叫起来，“神不知，鬼不觉，一切都很好。但是我家里却闹翻了天……妈妈硬说是我绞死了这个狗娘养的，她预言我也要被绞死。我本来已经打算推动刘西雅，所以我就说：‘你看，妈妈耳朵有点聋，又好像发烧似的，总之咱们该到爷爷那里去一趟了。’”

“柯里亚，我们走吧。”华丽雅忽然对苏姆斯柯依说。

到进城还剩下的那一段路，华丽雅拚命地赶，差点把她的伙伴累垮了；可是他不清楚她发生变化的理由。现在，她的鞋后跟已经咚咚地踏上自家的台阶。苏姆斯柯依有些发窘地跟着她走进了餐室。

餐室里，玛丽雅·安德烈耶芙娜穿着紧裹着她的胖胖的身体的深色衣服，小刘霞脸色苍白，浅金黄色的头发垂到肩上，她们俩沉默而紧张地面对面坐着，好像在过命名日。

玛丽雅·安德烈耶芙娜一看见大女儿进来，连忙站起身来，要想说什么，可是又透不过气来，就扑到女儿面前。有一刹那她怀疑地一会望望女儿，一会望望苏姆斯柯依，后来她忍不住了，就发疯似地亲吻着女儿。直到现在华丽雅才明白，她母亲也跟沃洛佳的母亲一样，心里痛苦万分：她怀疑她的亲闺女华丽雅参与了处死福明的活动，正是为了这个缘故这几天才不在家的。

华丽雅忘掉了站在门口发窘的苏姆斯柯依，两眼望着母亲，脸上流露出这样的表情：“妈妈，我能对你说什么呢，啊，能说什么呢？”

这时小刘霞一声不响地走到华丽雅眼前，递给她一张字条。华丽雅机械地打开字条，甚至来不及读，只认出了字迹。一个孩子般的、幸福的微笑使她的晒黑的、风尘仆仆的脸容光焕发起来。她很快地回过头来望了苏姆斯柯依一眼，连脖子和耳朵都红了。华丽雅抓住母亲的手，把她拉进另一个房间。

“妈妈！”她说。“妈妈！你脑子里尽在胡思乱想。但是你难道看不出，你难道不明白，我们——我和所有的同伴的生活目标是什么？你难道不明白，我们非这样生活不行？妈妈！”

华丽雅盯着母亲的脸说，她满心喜悦，脸色通红。

玛丽雅·安德烈耶芙娜的健康的脸色覆上了一层苍白，它甚至露出受到鼓舞的神情。

“我的女儿！上帝保佑你！”无论在校内校外毕生从事反宗教教育的玛丽雅·安德烈耶芙娜说。“上帝保佑你！”说完她就哭起来。

第四十三章

不了解子女的精神世界的父母们，看到子女卷进隐蔽的、神秘的、危险的活动，是痛苦的。可是他们无法理解子女活动的天地，更无法禁止这种活动。

早上喝茶的时候，万尼亚看到父亲脸色阴沉，对儿子看都不看，已经预感到暴风雨即将来临。果然，等妮娜姐姐到井边取水回来，带来福明被处死的消息，说大家对这事都在纷纷议论，暴风雨果然来临了。

父亲的脸变了色，瘦削的面颊上的肌肉鼓了起来。

“我们大概可以在自己家里，”他并不望着儿子，挖苦地说，“获得更清楚的情报……”他说话有时喜欢插进这样的辞汇。“怎么不吭声？讲吧。你跟那边——怎么说呢——是比较接近的。”父亲轻轻地说。

“跟谁比较接近？是跟‘警察’吗？”万尼亚脸色苍白起来，说道。

“昨天谢辽萨来干什么？在戒严时间？”

“谁去遵守它什么戒严不戒严！好像妮娜在这种时候不去赴约会似的！他来随便聊聊，又不是第一次。”

“别撒谎！”父亲大喝一声，用手朝桌上砍了一下。“干这种事是要坐牢的！要是他不可惜自己的脑袋，我们做父母的凭什么要负责任？”

“爸爸，你要说的不是那回事。”万尼亚轻轻地说了就站起身来，根本不理父亲在拍桌大嚷：“不，是说那回事！”只管自己说下去，“你是想知道我是不是参加了地下组织吧？这就是你想知道的。不，我没有参加。福明的事我也是刚听妮娜说的。我要说的只有这句话：福明这个狗东西就应当得到这样的下场！从妮娜的话里你也可以看得出，大伙也都这么说。而且你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我不隐瞒：我是在尽我的力量帮助我们的人。我们大家都应该帮助他们，何况我是团员。

至于我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你和妈妈，那无非是怕你们白操心。”

“你听到没有，娜斯塔西雅·伊凡诺芙娜？”父亲差点气疯了，用那双灰白的眼睛望了望妻子，“瞧，他是多么体恤我们！……你简直是不知羞耻！我为你们劳碌了一辈子……你忘啦，一幢房子里住上十二家，都横七竖八地睡在地上，光是孩子就有二十八个？为了你们这些孩子，我和你们的母亲累得筋疲力尽。你看看她。我们送亚力山大上学，可是没能让他念到毕业，妮娜也是这样。我们把全部希望都放在你身上，可是你自己偏偏要把脑袋往绞索里钻。你看看你妈！她为你把两眼都哭坏了，可你一点也看不见。”

“那么，照你的意思，我应当怎么办？”

“去做工！妮娜在做工，你也得去。她这个会计都在干粗活，你算什么？”

“替谁做工？替德国人？好让他们可以多杀些我们的人？等我们的人来了，我第一个就去做工……你的儿子，我的哥哥，在红军里，你倒吩咐我去帮德国人的忙，好让他们快些打死他！”万尼亚气愤地说。

他们已经面对面地站着。

“那么吃什么呢？”父亲大声嚷着，“难道让你最关心的人出卖你的脑袋？出卖给德国人！别说远的，就拿我们这条街上的人来说，你了解他们吗？你知道谁整天在想些什么？我倒知道！他们都是自顾自，各有各的私心。就只有你，在关心大家！”

“不对！……在你帮忙把国家的财产送到后方去的时候，你有什么私心？”

“不必拿我来说。”

“不，就是要拿你来说！为什么你要以为你比别人好？”万尼亚一只手的指头撑着桌子，倔强地低下他的戴着玳瑁边眼镜的头，说道，“私心！人人都为自己！……可是我倒要问问你：你那时候已经领了退职金，明明知道你要留在这里，明明知道像你这样一个有病的人去搬运那些不属于你自己的财产，忙得几宿不睡觉，会伤身体，那时候你心里又存着什么私心呢？这样的人难道世界上只有你一个？按科学道理这也说不通！”

因为是星期天，妮娜姐姐这时候在家。她皱着眉头坐在自己床上，不去看两个争吵的人；像平时一样，别人也猜不出她在想什么心事。母亲是一个善良的妇女，早衰得厉害，身体很弱。她整个的生活圈子不是在地里干活，就是围着锅台转。她最担心亚力山大·费奥多罗维奇在火头上会诅咒万尼亚，把他撵出去。在父亲说话的时候，她讨好地向他点头，希望他能发点慈悲，而在儿子说话的时候，她又装出笑容望着老伴，挤着眼，仿佛叫他还是耐着性听听儿子的话，原谅他，尽管他们老两口都明白儿子的话是多么没有道理。

父亲站在房间当中，洗旧了的斜领衬衫外面罩着长长的上装，两腿像老年人那样半佝偻着，破旧的裤子在膝盖的地方鼓起，还打着补钉，脚上穿着便鞋。他一会儿把两个拳头痉挛地按在胸口，一会儿无可奈何地把手垂下，嘴里嚷着：

“我不是根据科学，我是根据生活来证明的！”

“那么，科学不是来自生活吗？……不光是你一个人，别人也在寻求正义！”万尼亚怒气冲冲地说，这在他的性格来说是出人意外的。“可是你反而害臊，不好意思承认自己的优点！”

“我用不着害臊！”

“那么，你倒来证明一下，我怎么不对！大喊大叫说服不了我。我可以顺从，不吭声——这无所谓。可是我还是要凭良心行事。”

父亲突然一下子垮了，灰白的眼睛变得暗淡无光。

“瞧，娜斯塔西雅·伊凡诺芙娜，”他尖声说，“我们教出了这样的好儿子……教成了，就用不着我们了。阿裘①！……”他把两手一摊，扭转身就走了。

①法语“别了”的译音。

娜斯塔西雅·伊凡诺芙娜迈着碎步跟着他走出去。妮娜仍旧坐在床上，头也不抬，也不做声。

万尼亚漫无目的地从这个角落走到那个角落，后来坐下来，但是没能抑制住良心上的痛苦。他甚至尝试像以前那样写一封诗体信给哥哥，尽情地吐诉一下：

我忠实的好朋友，

我最好的哥哥，亚力山大……

不：

我最好的朋友，我的亲哥哥……

不，诗体信写不好。而且也没法把它寄到哥哥手里。

这时万里亚明白了他该怎么办：应该到下亚力山德罗夫卡去看看克拉娃。

叶列娜·尼柯拉耶芙娜更加痛苦，因为她自己拿不定主意，是应该阻止儿子的活动呢，还是去帮助他。她也像所有的母亲一样，有一种忧虑——为儿子担心害怕——每天不断地折磨着她，使她干不动活，睡不好觉，使她身心交瘁，使她脸上有了皱纹。有时这种担心简直要使她失去理性：她想冲

进去，大嚷一阵，硬把儿子从他给自己安排的可怕的命运中拉出来。

可是在她身上就具有她的丈夫，奥列格的继父，她一生中唯一挚爱的人的特点。她自己身上就有这样一股战斗的火焰在翻腾着，使她不能不同情儿子。

她常常感到生他的气：他怎么能把心里的事瞒着她，瞒着自己的妈妈，他过去不是一向非常坦白、亲切有礼、温顺听话的吗！尤其可恼的是，她的母亲，维拉外婆，明明参加了外孙的秘密活动，也瞒着女儿；柯里亚弟弟，从种种迹象看来，也是秘密活动的参加者。甚至一个完全不相干的女人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索柯洛娃——柯舍沃伊家的人管她叫波里雅阿姨——现在好像也比亲妈更接近奥列格。这是怎样开始的，在什么时候开始的，从什么事开始的呢？

以前，叶列娜·尼柯拉耶芙娜和波里雅阿姨关系亲密，形影不离，人们提到一个，就不能不想起另一个。她们的友谊是已经有过不少经历的、成熟的妇人之间的友谊；共同的工作和共同的观点把她们联系在一起。可是从战争开始以来，波里雅阿姨却突然深居简出，不再到柯舍沃伊家来串门，即使叶列娜·尼柯拉耶芙娜因为过去的交情去看她，波里雅阿姨也好像因为她养着一头牛，因为她在卖牛奶，因为叶列娜·尼柯拉耶芙娜可能责备她为了个人利益而逃避造福祖国的工作，而显得局促不安。所以叶列娜·尼柯拉耶芙娜打心底都觉得不可能跟波里雅阿姨谈这个问题。这样，她们的友谊就自然而然地中断了。

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再度来到柯舍沃伊家的时候，德国人已经在城里作威作福了。

她带着一颗打开的、流血的心来到他们家里，于是叶列娜·尼柯拉耶芙娜又认出了原来的她。她们现在常聚在一块谈心，但是像往常一样，叶列娜·尼柯拉耶芙娜说得总比较多，温顺谦虚的波里雅阿姨只是用自己聪明而疲倦的眼睛望着她。可是，不管波里雅阿姨是多么沉默寡言，叶列娜·尼柯拉耶芙娜还是不能不察觉，她，她的老友，好像已经把奥列格迷住了。只要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一来，他总待在旁边，而且叶列娜·尼柯拉耶芙娜常常看到他们之间忽然掠过的闪电似的一瞥——有话要互相诉说的人们的一瞥。果然，叶列娜·尼柯拉耶芙娜要是有事离开一下再回到屋子里来，她总可以感到，他们因为她回来而中断了他们的特殊的谈话。波里雅阿姨走的时候，如果叶列娜·尼柯拉耶芙娜要送她出去，她总是忸妮地、急急忙忙地说："不，不，别送啦，列娜，我自己出去。"可是如果奥列格要送她，她就从来不这么说。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这种事叫一个母亲的心怎么受得了？在生活中这种不幸的时候，全世界的人里面究竟有谁更了解儿子，同情他的事业和思想，用爱的力量来保护他呢？可是真实的声音告诉她，儿子有生以来头一次瞒着她，正是因为不信任她。

像所有年轻的母亲一样，她对自己的独子的优点看得更多，不过她对自己的儿子的确很了解。

自从城里开始出现有着"青年近卫军"的神秘署名的传单起，叶列娜·尼柯拉耶芙娜就毫不怀疑她的儿子非但参加了这个组织，而且还在里面起着领导作用。她感到激动、自豪，而又痛苦。但是她并不认为可以用话套出儿子的真话。

只有一次她仿佛是随便问起：

“你现在跟谁最好？”

他带着在他是出人意外的狡猾故意把话头一转，仿佛这是以前关于莲娜·波兹德内雪娃的谈话的继续，有点忸怩地说：

“我跟—跟妮娜·伊凡卓娃好……”

母亲不知为什么不点穿他，假意说：

“那么莲娜呢？”

他一声不响，摸出日记本交给她，于是母亲在日记里读到了儿子现在对莲娜的看法以及对自己以前迷恋莲娜的种种想法。

但是这天早上她从邻人那里听到处死福明的消息时，她不由得差点发出野兽般的叫喊。

她克制住自己，就倒在床上。维拉外婆像木乃伊那样直僵僵地、神秘地走过来，在她额头上放了一块冷毛巾。

像所有的父母一样，叶列娜·尼柯拉耶芙娜一分钟也没有怀疑过，儿子是参预了处死福明的活动。原来儿子经常出入的那个世界就是这样的，原来斗争就是这么残酷！有着怎样的惩罚在等待着他？……她心里还没有琢磨出来对儿子该怎么说，但是无论如何必须打破这种可怕的神秘气氛，这样活下去可不行！……

可是这时候，她的皮肤晒得黑黑的儿子像平时一样穿得整整齐齐，洗得干干净净，正把头缩在一边比另一边略高的肩膀里，坐在柴房里的板床上。那个大鼻子、皮肤浅黑、动作灵活的苏姆斯柯依坐在他对面的柴垛上，两人下棋下得正来劲呢。

他们在聚精会神地下棋，只是偶尔好像随便瞎聊几句。一个经验不足的人听到这样的对话内容，可能认为他碰到的是两个为非作歹的老手。

苏姆斯柯依那边车站上有一个粮站……第一次脱粒的麦子刚运过去，柯里亚·米朗诺夫和帕拉古塔就放进了象鼻虫……

沉默。

柯舍沃伊　麦子已经收割了吗？

苏姆斯柯依　他们硬逼着把全部都割下来……但是多数是一垛一垛和一捆一捆地竖在那里：脱粒机和运送的工具都没有。

沉默。

柯舍沃伊　应当把麦垛烧掉……你的堡垒①受威胁了！　①棋子名，等于中国象棋的车。

沉默。

柯舍沃伊　在国营农场里有你们自己人，很好。我们在总部讨论过并且决定：在各个庄子里一定要有自己的小组。你们有武器吗？

苏姆斯柯依　不多。

柯舍沃伊　应当去搜集。

苏姆斯柯依　到哪儿去搜集呢？

柯舍沃伊　到草原上。还有就是到他们那儿去偷，他们非常粗心大意。

苏姆斯柯依　对不起，将军……

柯舍沃伊　老兄，它要让你这个侵略者吃点苦头！

苏姆斯柯依　侵略者不是我。

柯舍沃伊　可是你像一个仆从国那样爱挑衅！

苏姆斯柯依冷笑着　还不如说我的处境更像法国。

沉默。

苏姆斯柯依　如果我不该问，就请你原谅：绞死这个家伙有你们参加吧？

柯舍沃伊　谁知道它。

“好。”苏姆斯柯依显然很满意地说，“我认为，应该多打死他们几个，哪怕是暗杀也成。而且与其搞掉几个奴才，还不如打死几个主子。”

“绝对应该。他们非常粗心大意。”

“你看，我大概要认输了。”苏姆斯柯依说，“这个局面没有出路，我也该回家了。”

奥列格整整齐齐地收好棋子，然后走到门口张望了一下又回来。

从他们坐下来下棋的那一刻起，中间并没有发生任何情况，可是现在奥列格和苏姆斯柯依已经面对面地垂手直立（他们俩一般高矮，不过奥列格的肩膀较宽），眼睛里带着朴实而自然的神情。

“宣誓吧……”

苏姆斯柯依从军便服的小口袋里摸出一张小纸片，脸色苍白起来。

“我，尼柯拉·苏姆斯柯依，”他压低声音念着，“在加入‘青年近卫军’队伍的时候，对着我的战友，对着祖国灾难深重的土地，对着全体人民，庄严宣誓……”他激动得迸出了金石之声，但是他怕被院子里听见，重又压低了嗓门，“……如果我因为禁不住拷打或是由于胆怯而破坏这神圣的誓言，那就让我的名字和我的亲人遗臭万年，让我本人受到同志们的严峻的手的惩罚。以血还血，以命抵命！”

“我祝贺你……从今以后你的生命就不属于你，而属于党，属于全体人民了。”奥列格热情地说，一面握了握他的手。

“你去接受全体克拉斯诺顿村小组的宣誓……”

最要紧的是要在妈妈已经睡着或是假装睡着的时候回家，轻手轻脚地脱掉衣服躺下。那时就不用把眼睛避开妈妈的明亮的、痛苦的目光，不用装出生活中一切如常的样子了。

他踮起脚尖走路，自己都感到自己又高又大，他走进厨房，再悄悄地推开门走进室内。

百叶窗像平时一样关得严严的，还遮上黑布。今天生过火，屋子里闷热得叫人难受。为了不弄脏台布又可以放得高一些，油灯搁在一只倒扣着的旧白铁罐上，照出了黑暗中熟悉的物件的凸面和棱角。

一向总是那么有条不紊的母亲，不知为什么衣服也没有换，头发也没有松开，坐在已经铺好被子的床上，骨节粗大的浅黑的小手交叉着放在两膝中间，两眼望着油灯的火焰。

屋子里是多么静啊！柯里亚舅舅现在差不多每天都到他的朋友裴斯特利诺夫工程师家里去，这时他也已经回来睡了，玛丽娜也睡了，小表弟大概也早已撅着小嘴睡了。外婆也睡了，居然没有打鼾。连钟的滴答声都听不到。只有妈妈没有睡。我亲爱的！……

但是千万不要为感情所动……就像这样一声不响地踮起脚尖走过去躺下，上了床就可以马上假装睡着了……

个子高大的他踮起脚尖走到母亲跟前，在她面前跪下，把脸埋在她的双膝里。他感到她的手在抚摩自己的面颊，感到她的独特的体温，闻到一股

若有若无的、好像从远处飘来的茉莉的幽香以及另外一种略带苦味的、不知是苦艾还是茄叶的气味，——什么气味反正都一样！……

“我亲爱的！我亲爱的！”他目光炯炯地仰脸望着她，低声说道，“你是一切一切都明白的……我亲爱的！”

“我一切都明白。”她向他低下头，并不望着他，低语说。

他想看她的眼睛，可是她老把眼睛藏在他的丝一般柔滑的头发里，不断低声说着：

“不论什么时候……不论在哪里……别怕……要坚强……我的小鹰……直到最后一口气……”

“好了，啊，好了……该睡了……”他低声说，“要我给你把发夹取掉吗？”

于是他就像小时候那样，两手在她的头发里摸索着发夹，把它们一只一只地取出来。她仍旧把头伏在他的胳臂上，把脸藏起来。他把发夹统统取掉，让她的辫子松下来，于是两条散开的辫子就带着花园里苹果坠地的声音落下来，遮住了妈妈的全身。

第四十四章

万尼亚要到下亚力山德罗夫卡去几天，应当得到总部的批准。

“你知道，问题不单是去看看女朋友。”他对奥列格说，“我早已计划把组织哥萨克庄子里青年的全部工作都委托她去做。”万尼亚有点忸怩地说。

但是奥列格对于万尼亚提出的这样正当的理由似乎充耳不闻。

“你再等一两天。”他说。“可能要另外给你一个任务……不，不，也—也在那边。”奥列格一看万尼亚的脸上露出戒备的神气，就突然咧开嘴笑着说。万尼亚不愿意别人猜出他真实感情的时候，脸上总要露出这副神气。

最近几天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一再要求奥列格推荐一个聪明的年轻人给刘季柯夫使用。这个年轻人要在克拉斯诺顿到下亚力山德罗夫卡这条专门的路线上做联络员。所以奥列格就想到了万尼亚。

波里雅阿姨转达刘季柯夫的愿望时，再三强调说：

“不过要一个头脑非常清楚、非常可靠的。要头脑最清楚和最可靠的……”

就在万尼亚和奥列格谈话之后的第二天，眼睛近视的万尼亚已经光脚穿着球鞋，头上包着一块扎着四个角的手帕，在不很炎热的阳光下，沿着草原上的村道上路了。路边没有收割的庄稼都是稀稀拉拉的。

万尼亚整个身心都意识到他的使命的重大，专心致志地在思考他的这个新任务，——而专心致志地思考问题正是眼睛近视的万尼亚在旅行时最显著的特征，——他在草原上走着，经过许多居民点，但是对于一路上碰到的事物几乎都没有注意。

一个外来的人，——如果会有这样的人，——来到被德国人占领的农村地区，看到展现在他视野里的异常凄惨、截然不同的景象，一定会感到吃惊。他会碰到几十个几百个瓦砾场，那里，原来的大小村庄只剩下一些炉灶

的残架和烧焦的木头，还有就是一只孤零零的猫，在烧得半焦、长满野草的台阶上晒太阳。他也会碰到连德国人的足迹都没有到过的庄子，如果不算那些偶然闯进来一两次抢劫财物的德国兵。

可是也有这样的村庄：那里的德国政权是按照它认为对自己最有利和最方便的形式建立起来的；那里所受的直接的军事抢劫，也就是过路军队进行的抢劫，以及形形色色的野蛮暴行，比起俄罗斯在德国军事占领统治下必然要受到的蹂躏来，在程度上毫无差别；那里德国人的经营可说是表现得最地道的。

下亚力山德罗夫卡庄正是属于这一类的庄子。克拉娃和她母亲就是在这个庄子里的一个母系的亲戚家里找到安身之处。

她们投靠的那个哥萨克是母亲的亲兄弟，在德国人来以前，他是集体农庄的一个普通庄员。他既不是工作队长，又不是饲马员，而是一个普通庄员，带着家属参加工作队，在公有的田地里干活，靠劳动日所得和自己园地上的收获过活。

所以，克拉娃的舅舅伊凡·尼卡诺罗维奇和他全家，从德国人一来，也就不折不扣地遭受到在德国统治时期一个普通农户所必然遭受的痛苦。他们在进攻的德军路过的时候遭受劫掠，凡是被德军看到的牲畜、家畜和存粮都被抢劫一空，那就是说损失惨重，但是还没有被抢得精光，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农民能像俄罗斯农民那样，具有那种世代相传的在乱世隐藏财物的经验。

在军队已经过去、“新秩序”——Ordnung 开始建立之后，伊凡·尼卡诺罗维奇和其他的人都得到通知，以前规定给下亚力山德罗夫卡集体农庄永久使用的土地，现在也像全部土地一样将成为德国的财产。但是，“新秩序”——OrdEnung——通过基辅的德国专员的嘴巴说，这片土地（过去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经历了无数周折才联成一大片的集体农庄的土地），现在将重新划成小块，归每个哥萨克个人使用。但是！这个措施要到所有的哥萨克和农民都有了私人的农具和畜力的时候才能实行。现在他们既不可能有农具和畜力，所以土地仍旧保持原状，不过已经算是德国的财产。为了耕种土地，村庄里应设村长一人，由俄罗斯人担任，但是归德国人指派，——村长已经被派出来，——而农民们必须每十户编成一甲。

每甲设甲长一人，由俄罗斯人担任，但是归德国人指派，——甲长也都派出来了。农民靠自己在这块土地上的劳动可以领到一份定量的口粮。为了使农民积极肯干，就得让他们知道，只有现在干活卖力的人，将来才能领到一块土地归个人使用。

德国政府目前不能供应机械和机械用的燃料，也不能供给马匹，让农民可以在这大片土地上好好地干。农民只好用大镰刀、镰刀和厨刀对付，至于畜力，就得用私人的牛。谁要是舍不得自己的牛，他就很难指望在将来获得归个人使用的土地。虽然这种劳动方式需要的劳动力特别多，可是德国当局不仅不极力把这些劳动力保留在原地，反而想方设法把身体最壮、劳动力最强的那一部分农民赶到德国去。

由于德国政府目前还统计不出所需肉类、牛奶和鸡蛋的确数，所以第一次先向下亚力山德罗夫卡庄征收下列物品：每五户牛一头，每户猪一头，还要每户土豆五十公斤、鸡蛋二十个和牛奶三百公升。但是！因为可能还要，——这种需要果然经常发生，——所以哥萨克和农民不准为自己食用宰杀牲

口和家禽。如果万不得已非要宰猪的话，那也要四户联合起来才能宰一头，同时他们还必须给德国政府交三头猪。

为了向伊凡·尼卡诺罗维奇家以及他同村的人征收这一切，除甲长和村长之外，还设立了一个以桑德斯特派员为首的区农业指挥部的机构。这位特派员怕热，也像施普利克上尉那样穿着制服和裤衩在大小村庄里巡视，哥萨克妇女一看到他就画十字和吐唾沫，好像看到魔鬼似的。这个区农业指挥部隶属于人员更多的、以格柳克尔特派员为首的州农业指挥部；格柳克尔虽然穿长裤，但是他已经是高高在上，所以不会下乡。而这个州农业指挥部又隶属于以施坦德尔少校为首的农业小组，或是简称“农工组”。这个农业小组已经高到极点，简直没有人看见过它。但是连这个农业小组也不过是以刘德博士为首的第九经济指挥部，或简称“九经部”的一个处。至于这个第九经济指挥部，它一方面属于伏罗希洛夫格勒城的野战司令部，不客气地说，那就是宪兵局，而另一方面，它又属于驻基辅的德国专员下面的国家地产管理总局。

伊凡·尼卡诺罗维奇以及他同村的人都感到头顶上压着一级比一级高的官衔繁多、说着听不懂的语言、但是又要人供养的二流子和盗贼，每天身受到这批家伙的活动的祸害。他们明白德国法西斯政权非但是野兽的政权，——这是一目了然的，——而且是办事马虎的、盗窃成风的、也可以说是愚蠢的政权。

那时，伊凡·尼卡诺罗维奇和他同村的人以及附近大大小小村庄（贡多罗夫斯卡雅、达维多夫、马卡罗夫·雅尔等等）的居民，就开始拿出一个有自尊心的哥萨克才会使用、而且应该使用的对付愚蠢政权的办法来对付德国政权，——他们开始蒙骗它。

蒙骗德国政权的办法，主要表现为：在地里装出干活的样子而并不真正劳动；糟蹋浪费，如果有可能，就“盗窃”自己家里生产的东西；另外就是隐藏牲畜、家禽和粮食。为了便于蒙骗，哥萨克和农民就设法让自己人当甲长和村长。像任何一个野兽的政权一样，德国政权也找到足够的野兽让他们坐在村长的位置上，但是，常言说：“人无千日好”。德国政权派过村长，可是不久村长就不见了，失踪了。

克拉娃十八岁，这些事她都不关心。她痛苦，只是因为生活变得非常不自由，不能念书，没有女伴，父亲又情况不明。她想念万尼亚，她的美梦做得非常明确具体，——等这一切混乱现象一结束，他们就结婚，他们将生儿育女，他们要带着子女过非常美满的生活，——她就用这样的梦想来排遣生活中的烦恼。

她还用看书来消磨时光，但是在下亚力山德罗夫卡，书非常难找。她听说新的区政府给庄子里派来一个新的女教师来代替已经疏散了的那一个，她就认为，向这个女教师借书总不是什么不体面的事。

女教师住在学校里原先那个女教师住的小房间里，据邻居们传说，她使用的还是原来的家具和什物。克拉娃敲了敲门，不等回答，就用一只丰满有力的手把门打开。她走进这个背阴的、窗帘也放下的房间，开始斜着眼打量究竟是谁住在里面。女教师侧面对着克拉娃，弯着腰在用鸡毛掸掸窗台。她回过头来一看，一条弯弯的浓眉突然抬了起来，她猛地向后一退，把身子紧靠着窗台。后来她把身子伸直，重又仔细地打量了一下克拉娃。

“您……”

她话没有说完，脸上就露出抱歉的微笑，迎着克拉娃走过来。

这是一个体态匀称、头发浅黄的妇人，穿着普通的衣服，灰色的眼睛里射出直率、甚至严厉的目光，嘴巴轮廓分明，因此在她脸上不时出现的那种单纯明朗的微笑更显得动人。

“学校里住过德国人，学校放图书的书橱被打破了。连厕所里都能看到书的散页，不过多少还留下几本，我可以带您去看看。”她说话发音准确而纯正，只有优秀的俄罗斯教师才能说得这样好。“您是本地人吗？”

“可以说是本地人。”克拉娃犹豫地说。

“您为什么说话要有保留？”

克拉娃狼狈起来。

女教师直望着她。

“我们坐下吧。”

克拉娃还是站着。

“我在克拉斯诺顿看见过您。”女教师说。

克拉娃偷眼看她，没有作声。

“我以为您已经走了。”女教师带着明朗的笑容说。

“我哪儿也没去。”

“那，您就是送什么人。”

“您怎么知道的？”克拉娃又是害怕，又是好奇地斜着眼睛望着她。

“我知道……可是您别慌……您大概在想：这个女教师是德国当局派来的，并且……”

“我什么也没想……”

“您是在想啊。”女教师笑起来，她的脸都成了粉红色的。

“那么您是送什么人？”

“父亲。”

“不，不是父亲。”

“不，是父亲。”

“好，就算是吧，那您父亲是做什么的？”

“煤业联合公司的职员。”克拉娃满脸通红地说。

“您请坐，跟我别客气。”

女教师亲热地微微碰了碰克拉娃的手，克拉娃坐了下来。

“您的朋友走了吗？”

“什么朋友？”克拉娃的心都跳起来了。

“别瞒我，我都知道。”女教师眼睛里严厉的神情完全消失了，和善而热情的微笑使她的眼睛闪闪发光。

“就是杀头，我也不说！”克拉娃突然发起狠来，心里这样想。

“我不知道您在说些什么……这样是不好的！”克拉娃说了就站起身来。

女教师已经无法克制自己，纵声大笑起来。她高兴得把晒黑的双手时而叠起，时而分开，她那生着浅黄头发的脑袋左右摆动着。

“我亲爱的……请原谅……您的心事是明摆在外面的。”她说了就很快地站起来，用一个有力的动作抓住克拉娃的肩膀把她拉过来，身子略微挨近她，“我都是开玩笑，您别怕我。我不过是个俄罗斯教师，——人总要活下去，可是即使在德国人统治下也不一定要教坏的东西。”

有人在门上用力地敲了几下。

女教师放开克拉娃，很快地走到门口，把门打开一条缝。

“玛尔法……”她欣喜地说，声音不高。

一个身材很高、骨骼强壮的妇女走进室内。她披着洁白耀眼的围巾，晒得黧黑的赤脚上全是尘土，腋下夹着一包衣服。

“您好，”她说，带着询问的神情望了克拉娃一眼。“我们好像住得很近，可是弄到今天才来拜望您！”她高声对女教师说，笑得露出结实的牙齿。

“您叫什么名字？……克拉娃！我送您到教室里去，您去看看有什么书。不过您不要走，我一会就完事。”

“事情怎么样？啊，怎么样？”卡佳回来之后，激动地问着。

玛尔法用一只操劳过度的晒黑的大手捂住眼睛坐着，她的还很娇嫩的嘴唇的两角露出痛苦的皱纹。

“我不知道该高兴还是该难受。”她把手拿开，说道。“波高烈莱庄的一个小伙子到我家来，说我的高尔杰依·柯尔尼延柯活着，做了俘虏。卡佳，替我出个主意吧！”她抬起头来说，接着用俄语说起来：“俘虏们在波高烈莱的林场里做工，有卫兵看守着。他们大约有六十来人，替军队伐木，我的高尔杰依也在那边。他们住在木屋里，不准出来……他饿得都浮肿了。叫我怎么办呢？还是我到那边去一趟？”

“他的口信是怎么捎给你的？”

“那边也有老百姓在做工。有一次他觑空偷偷地告诉庄子里的一个人。德国人不知道他是本地人。”

卡佳默默地望了她一会。这是生活中别人无法出主意的一种情况。玛尔法可能在这个波高烈莱庄待上几个星期，自己弄得痛苦不堪，结果仍旧看不到丈夫。他们顶多能够彼此远远地望见一眼，但是这只会在她丈夫的肉体痛苦上再增添一些难以忍受的精神折磨。甚至连偷偷地给他扔点吃的东西都办不到：不难想象，这是怎样的一个战俘营！

“你凭自己的良心去做吧。”

“要是你，你去吗？”玛尔法问。

“我会去的。”卡佳说着叹了口气，“你也会去，不过是没用……”

“我也说——是没用……我不去了。”玛尔法说了又用手捂住眼睛。

“柯尔聂·季霍诺维奇知道吗？”

“他说，要是准许他带了游击队去，也许可以把他救出来……”

卡佳的脸上露出烦恼和发愁的神情。她知道，柯尔聂·季霍诺维奇指挥的游击小组，不能为这个次要的目的使用。

现在德军最重要的交通线都通过伏罗希洛夫格勒州。凡是归普罗庆柯指挥的一切和他重建的一切，现在毫无例外都是用来使远在顿巴斯千百公里之外的伟大的斯大林格勒战役获得胜利。

本州所有的游击队分成许多小组，现在都在公路上、土路上以及往东和往南的三条铁路上活动。就这样，力量还嫌不够。所以普罗庆柯就把本州所有地下区委的活动都转到大路上来进行破坏活动。他的驻地现在只有卡佳、玛尔法和联络员克罗托娃知道。

卡佳对这一点非常清楚，因为所有不计其数的联系的线索都汇合在一起掌握在她的万无一失的小手里，然后从她那里单线通向普罗庆柯。所以她对由玛尔法转达的柯尔聂·季霍诺维奇的这一项间接提出才不作答复，虽然她明知玛尔法心里是暗暗地抱着这个希望才来看她的。

卡佳跟丈夫的联系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玛尔法，更准确地说，是通过玛尔法的住处。

但是卡佳没有问起普罗庆柯的近况：她知道，要是玛尔法关于他什么都不说，那就是没有消息。

克拉娃站在书橱前面，——这里都是童年读过的书籍。和童年伴侣的重逢，勾起她无限的惆怅。看着这些空空的黑书桌，令人感到凄凉。夕阳斜照在窗上，在这幽静而浓密的夕照里，似乎含着一丝惆怅的、无可奈何的告别的微笑。克拉娃本来感到奇怪，女教师怎么会认识她，可是现在她觉得生活在世上是这样地忧伤，她甚至不再为刚才那种好奇而烦恼了。

“挑了几本吗？”女教师直望着克拉娃，她的轮廓分明的嘴唇紧闭着，但是灰色眼睛的深处含着悲伤的神色，“您看，生活有时显得很残酷，要把人活活拆散。”她说，“可是在年轻时候我们整天忙乱，没有懂得，给我们安排的生活，就是我们一辈子要过的生活了……要是我能重新变得像您那样，我就可以懂得这个道理。可是现在我甚至无法把这个意思向您表达出来……如果您的朋友来了，请您一定把他介绍给我。”

卡佳没有料到，这时万尼亚已经来到下亚力山德罗夫卡，并且是直接带着任务来见她的。

万尼亚把密码文件——关于克拉斯诺顿地下区委的活动的报告——交给了她。卡佳也对他口头传达了普罗庆柯的要求：将克拉斯诺顿地下组织发展为战斗的游击队伍，并加强大路上的破坏活动。

“请转告他们，前线的情况很不错。也许，很快我们大伙都要手拿武器去作战了。”卡佳说，一面探究地望着坐在她面前的这个四肢不匀称的青年，好像希望知道他的眼镜后面究竟藏着什么似的。

万尼亚弓着背坐在那里，很少说话，不断用手去理他的披散下来的头发。但是，要是这个女人能知道在他心里燃烧着怎样的熊熊之火，该多好啊！

不过他们到底还是畅谈起来。

“人们的命运变得真可怕！”卡佳听万尼亚讲完舒尔迦和瓦尔柯遇难的悲惨故事，这样说道。“您所说的奥斯塔普楚克，他全家还留在敌占区，也许已经被折磨死了，要不然就是那可怜的女人带着孩子在陌生人中间流浪，心里还希望有一天他会来救她和他们的孩子，可是他已经不在人世了……就拿刚才来找我的那个女人来说……”卡佳讲起玛尔法和她的丈夫，“近在眼前，可是连见一面都办不到。将来还会把他赶到更远的地方去，他会死掉……他们这批家伙作恶多端，就是把他们千刀万剐也不为过！……”她把结实有力的小手紧握成拳头，说道。

“波高烈莱就在我们附近，我们有一个小伙子住在那边。”万尼亚想起了维克多·彼得罗夫，说道。他头脑里闪过一个模糊的想法，但是连他自己还没有把它想清楚。“俘虏人数多不多？警卫队大不大？”他问。

“请您想一下，在克拉斯诺顿我们的人里面，能做组织工作的人有哪些还活着？”她想起了什么心事，突然问道。

万尼亚举出几个人的名字。

“那么，在陷入包围后留下来或是因为别的原因留下来的军人里面有些什么人？”

“这样的人很多。”万尼亚想起了被隐藏在老百姓家里的伤员：他从谢辽萨那里知道，娜塔丽亚·阿列克谢耶芙娜暗地继续给他们治疗。

“您去告诉派您来的人，要跟他们建立联系，把他们吸收过来……你们也会很快很快就需要他们。需要他们来指挥你们年轻人。你们虽然都是好样的，但是他们年纪比你们大。”

卡佳说。

万尼亚讲了讲他的计划，要在克拉娃家里为“青年近卫军”设一个跟村里的青年联系的接头地点，并且请她在这方面帮助克拉娃。

“最好别让她知道我是谁，”卡佳笑着说，“我们可以做朋友。”

“但是您究竟是怎么认识我们的？”万尼亚忍不住了。

“这我永远也不会告诉您，不然您会弄得非常窘。”她说，脸上突然露出了狡猾的表情。

“你们有什么秘密？”克拉娃不无妒意地向万尼亚问道。那时天色已经漆黑，他们坐在伊凡·尼卡诺罗维奇家的上房里。克拉娃的母亲早就把万尼亚当做自家人一样，特别是在渡口事件之后。她在一条哥萨克人用的蓬松柔软、暖和得令人昏昏欲睡的鸭绒褥子上，放心地入睡了。

“你能保密吗？”万尼亚凑着她的耳朵问。

“这还用你问……”

“你起誓！”

“我起誓。”

“她告诉我，有一个我们克拉斯诺顿的人躲在附近，她让我转告他的家属，后来我们又随便聊了一阵……克拉娃！”他抓住她的手，庄严地轻声说，“我们建立了一个跟侵略者作斗争的青年组织，你愿意加入吗？”

“你参加这个组织了吗？”

“当然。”

“那我当然加入！”她把她的非常温暖的嘴唇贴到他的耳朵上，“我不是你的吗，懂吗？”

“我要听你宣誓。誓词是我跟奥列格写的，我能背出来，你得把它背熟。”

“我会把它背熟，因为我完全是属于你的……”

“你得把这儿和附近庄子里的青年组织起来。”

“我会替你把他们全组织起来。”

“你对待这件事别那么轻率。要是失败，就有性命的危险。”

“那么你呢？”

“我也是这样。”

“我准备跟你一起死。”

“不过我想，我们俩最好还是都能活着。”

“当然，那好得多。”

“你知道，他们那边已经给我预备了床铺，我得走了，不然不方便。”

“你何必到那边去？我不是属于你的吗？啊，你明白吗，我完全是属于你的。”克拉娃把她的温暖的嘴唇凑着他的耳朵低语说。

第四十五章

到九月底，五一矿山（连同“八家宅”和新一号井区）的“青年近卫军”组织已经成为最大的地下青年组织之一。以前五一学校高年级学生里面所有最积极的青年都被吸收进这个组织。

五一村人自己安装了一架收音机，散发用墨汁写在学校练习簿纸张上的情报局战报和传单。

为了这架收音机，不知费了多少周折！他们到处寻找，在各处的屋子里发现了一些早已报废的、损坏了的廉价收音机，就把这些收音机偷出来。鲍利斯·葛拉万，一个跟着父母从比萨拉比亚逃难出来、定居在克拉斯诺顿的摩尔达维亚人，——小组里叫他阿列科①，——负责用它们来装成一架可以使用的收音机。可是有一次他带着机器的个别零件和真空管回家的时候，半路上被一个“警察”抓住。

①阿列科是普希金的长诗《茨冈》的主人公。

葛拉万在“警察队”里只讲罗马尼亚语，他大喊大叫，说“警察队”剥夺了他全家的生活资料，因为他需要这一套材料来做打火机，他赌咒发誓地说他要到罗军司令部去控诉：因为总有一些过路的罗马尼亚部队的军官在克拉斯诺顿过夜。在葛拉万家里查出几只做好的打火机和几只在制造中的打火机——他的确是靠做打火机来赚点钱贴补生活。于是“警察队”释放了这个“盟国”的“代表”，虽然还是没收了他的收音机零件。但是他仍旧用剩下的那些零件装成了一架收音机。

五一村人通过李丽亚·伊凡尼兴娜跟附近一些庄子发生独立的联系，李丽亚从俘虏营逃回来把身体养好后就到苏霍多尔庄去做教师。他们是武器的主要供应者。他们在草原上，有时跑得老远到顿涅茨河边的战区去搜集武器，还从过夜的德国官兵和罗马尼亚官兵那里偷武器。等五一村所有的年轻人——组织的成员——都武装起来了，多余的武器就交给谢辽萨储藏起来，地点只有谢辽萨和极少数人知道。

就像整个“青年近卫军”组织的灵魂是奥列格·柯舍沃伊和伊凡·杜尔根尼奇，克拉斯诺顿村组织的灵魂是柯里亚·苏姆斯柯依和托西雅·叶里谢延柯一样，五一村组织的灵魂就是邬丽亚·葛洛莫娃和阿纳托里·波波夫。

阿纳托里·波波夫被总部任命为五一村小组的指挥员，以他在共青团里获得的组织经验以及他素有的严肃态度，他在五一村青年所做的一切工作里都贯注了严格的纪律性和以全体青年的特别协调的工作为依据的大胆果断的精神。

邬丽亚却是一切创举的发起人、五一村人的大部分告民众书和传单的起草人。这个苗条修长的姑娘，梳着两条沉甸甸的黑辫子，眼睛里有时迸射出明亮、强烈的光芒，有时充满神秘的力量，与其说是顽皮，不如说是文静；与其说是热情，不如说是恬淡，然而又是两者兼备。现在才看出，这个姑娘早在跟大家毫无区别地一同学习、到草原上散步、像大伙一样唱歌跳舞、朗诵诗篇、辅导少年队员的时候，就已经在女友和同学们中间积累了多么巨大的精神威望。

青年的特点是能不凭研究和经验，而只是从第一瞥、第一句话、第一个动作来辨别什么是表面的，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枯燥乏味的，什么是生动活泼的；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有意义的。邬丽亚现在并没有特别亲密的女友，她对大家都同样关怀、和气、严格。但是姑娘们只要看见她，跟她交谈上三言两语，就足以使她们感到，邬丽亚所以这样并不是由于精神贫乏，

在这后面有着一个充满感情与思考、充满对人的不同评价、充满对人的不同态度的巨大的世界。这个世界能够以出人意料的力量表现自己，特别是在一个人理应受到它的道义上的批评的时候。像邬丽亚这样性格的人，哪怕能得到她的一视同仁的对待，都会被视为奖励，如果她能有一刹那微微打开她的心灵，那更不知要怎样令人受宠若惊了。

她对所有的男青年也是同样地一视同仁。他们中间不但没有人能说她对他比对别人好，而且也没有一个人哪怕敢于在内心作这种奢望。只要看到她的目光和举动，每个男青年都会明白他所接触的人不是妄自尊大，更非感情贫乏，而是一个具有严谨的、内在的、充满真正热情的世界的人。这种热情还没有找到一个对象可以向之无保留地、大量地、尽情地倾注，但它又不能一点一滴地把自己消耗掉。因此邬丽亚就被青年人对特别坚强而纯洁的姑娘们产生的那种不自觉的、关切的、无私的崇拜包围着。

正是由于这一点，而不仅仅由于她的聪明和她读书很多，她才自然而然地、毫不费力地、甚至不自觉地占有了五一村男女同伴的心。

有一天，姑娘们聚在伊凡尼兴娜姊妹家里，——现在那里成了她们经常聚会的地方，——在做伤员用的绷带包。

绷带是刘勃卡从到她家来玩的卫生队官兵那里偷来

的，——她是顺手牵羊偷来的，对它并没有重视。但是被邬丽亚知道之后，马上就给它派了用处。

“我们的男青年每人都应该随身带一个绷带包，因为他们跟我们不一样，他们要作战。”她说。

而且，她大概已经知道一点什么消息，所以才说：

“我们要全体出动的时候很快就要到了。那时候我们就需要好多好多绷带……”

事实上，邬丽亚不过是用自己的语言转达了万尼亚在总部会议上说的话。至于万尼亚是从哪里知道的，她却不晓得。

这样，她们就坐在这里做绷带包，连这个以前被认为是性情孤僻、有些个人主义的大学生舒拉，现在也参加了这个工作，因为她由于爱玛雅也加入了“青年近卫军”。纤瘦的莎霞开口说道：

“姑娘们，你们知道我们大伙现在像什么人？就像那些过去在矿上工作，后来靠退休金过活或是靠子女供养的老太婆。这样的人我在我奶奶家里不知见过多少。她们也像这样，一个一个地来到我奶奶家里，坐在一块：有的织毛线，有的做针线活，有的玩牌，还有的帮奶奶削土豆，都一声不响……她们老是不吭声，后来有一个站了起来，伸了个懒腰，说：‘诸位老奶奶，我们想法来提提神怎么样？’老奶奶们都暗自笑了一笑，另外一个就说：‘喝点酒提提神又不罪过。’她们马上就来凑份子，每人十五戈比。一转眼，桌上已经放了半瓶白酒，这些老太太能喝得了多少？她们只喝了一丁点，就这样用一只手托着腮帮子唱起来：‘啊，你呀，我的镀金戒指……’”

“唉，这个莎霞真是，净想出这种稀奇古怪的故事儿！”姑娘们哄笑起来，“我们要不要也像那些老奶奶那样，来喝点什么？”

但是这时妮娜来了，她现在已经难得来跟姑娘们随便坐坐，现在她总是以总部联络员的身分前来的。至于这个总部在什么地方，它是由哪些人组成的，姑娘们都不知道。“总部”这个词儿使她们联想到一些成年人，他们处于地下状态，可能是待在地下的掩蔽部里，四壁都挂着地图，他们本人也

带着武器，他们能马上用无线电跟前线联系，也许，甚至能跟莫斯科联系。现在，妮娜进来，把邬丽亚叫出去，姑娘们心里已经明白，妮娜是带着新任务来的。果然，过了一会邬丽亚回来说，她要出去。然后她把玛雅叫到一边，对她说，要姑娘们分别把绷带包带回家去，又让她带七八个送到邬丽亚家里，因为可能很快就用得着。

过了不到一刻钟，邬丽亚已经撩起裙子，两条修长匀称的腿先后跨过篱笆，从自家的小花园里爬进波波夫家的小花园。那里，在老樱桃树浓荫下枯干的草地上，燕麦色头发上压着乌兹别克式小帽的阿纳托里·波波夫和深色头发上没有戴帽子的维克多，正面对面地趴着在研究本区地图。

他们老远就发现了邬丽亚，当她走近的时候，他们继续看着地图，低声交谈。邬丽亚把胳膊一弯，随便地把落到胸前的辫子甩到背后，拉拉腿上的裙子，抱住膝盖在旁边蹲下来，也来研究地图。

把邬丽亚找来商量的那件事，阿纳托里和维克多已经知道了。这对于五一村人是第一次严重的考验："青年近卫军"总部委派他们去解救在波高烈莱庄的林场做工的一批战俘。

"警卫队住的地方远吗？"阿纳托里问。

"警卫队住在大路的右边，在庄子里面。可是营棚是在左边相当远的地方，就靠近那个小树林，你记得吗？以前那儿是个仓库。他们只搭了一些铺板，在四周围了一圈铁丝网。总共只有一个哨兵……我想，最好不要去惊动警卫队，只要干掉那个哨兵……不过很可惜，应该把他们统统干掉才好。"维克多带着恶狠狠的神气说。

维克多自从父亲遇害之后大大地改变了。他穿着深色平绒短上衣，不时用那双勇敢的眼睛闷闷地望着阿纳托里，嘴里嚼着一根干草，好像无可奈何似地说道：

"夜里俘虏们被锁在里面，不过可以让葛拉万带工具去，他干起来可以不出一点响声。"

阿纳托里抬起眼睛望着邬丽亚。

"你的意见怎么样？"他问。

邬丽亚虽然没有听到他们前半段话，但是根据从他们一开始活动就在他们之间自然而然形成的、只要听半句话就能领会对方意思的理解力，立刻抓住了维克多所以不满的要点所在。

"我非常理解维克多的心情：不错，我们恨不得把那个警卫队全部都消灭掉。但是要干这样的事，我们还不够成熟。"

她用她那平静舒畅的低沉的声音说。

"我也是这么想。"阿纳托里说，"应当采取最快最简单的办法来达到目的。"

到第二天黄昏时分，他们一个一个地来到顿涅茨岸边波高烈莱庄附近的树林里集合。他们是五个人：阿纳托里和维克多，他们的同学符拉箕米尔·腊高静和他们中间最年轻的叶夫盖尼·谢毕辽夫，还有鲍利斯·葛拉万。他们都带着手枪。维克多还带着父亲留下的一把古老的芬兰刀，现在他老把它插在平绒短上衣底下的腰带里。葛拉万随身带着剪铁丝的钳子、撬棍和螺丝刀。

是南方初秋的一个清新的繁星之夜，没有月亮。青年人趴在河边陡峭的右岸下边。紧挨河岸的灌木丛在他们头顶上轻轻摆动，河水微微发出亮光，几乎是无声地流动着。只有在下游崩塌的岸旁，静静的水流不知是渗透过崩

塌的泥土的孔隙，还是把一根柳枝拉过去又放开，发出了吮吸和咂嘴的声音，好像牛犊在吮吸母牛的奶。对面草原上低低的河岸，消失在一片朦胧的、银灰色的雾霭里。

他们要等到哨兵半夜换岗的时候。

这个初秋的夜晚，对岸这片呈现银灰色的雾霭和这种好像是孩子吮吸和咂嘴的声音，是如此神秘和优美，使每个青年面对这样的美景都无法排除一种异样的心情：难道他们真要离开这条河流和这种声响，进入袭击德国哨兵、清除铁丝网和撬门开闩的斗争吗？这条河和这些声响对他们是这样的亲切和熟悉，而他们即将去做的事对他们却是破天荒第一遭，——他们里面甚至没有人能够想象这将是怎么一回事。但是他们彼此隐瞒着这种心情，只是低声交谈着他们觉得亲切的事情。

“维嘉，你记得这块地方吗？就在这儿，对吗？”阿纳托里问。

“不，还要下面一点，呐，就在那边崩塌了的和发出好像吮吸声音的地方。我是从对岸游过来的，我老是担心你会被拖到下游，直卷到漩涡里去。”

“想起来真是后怕，我真是吓得要死。”阿纳托里带着稚气的微笑说，“我已经被水呛得快要憋气了。”

“我和任尼亚①·莫什柯夫从树林里出来，——唉，真糟糕！主要的是我还不会游泳。”腊高静说，他是一个非常瘦削的长腿小伙子，帽子压到眼睛上，帽舌长得使人根本看不见他的脸。

①任尼亚是叶夫盖尼的小名。

“不，要不是莫什柯夫穿着衣服就从悬崖上跳下去，保管你不能把他拖起来。”他对维克多说。

“当然拖不起来。”维克多承认道。“关于莫什柯夫，还听到些什么消息吗？”

“什么也没有。”腊高静说，“他只是个少尉，而且还是在步兵里！这是最下级的指挥员，老兄，他们死起来就像嗑瓜子一样容易……”

“不，你们的顿涅茨太文静了，可是我们的德涅斯特，那才是河！”葛拉万用一只臂肘撑起身子说，他的白牙齿在黑暗中闪闪发亮，“水流得很急！真美！在我们那边，你要是沉下去，那准没有命了。还有，你听我说，你们这里的树林算得了什么？我们也住在草原上，但是我们德涅斯特河流域的森林有多好啊！黑杨、紫杉，你抱都抱不过来，树顶几乎要戳着天……”

“你要是能住在那边多么好。”谢毕辽夫说，“人们不能住在他们喜欢的地方，真是气人……都是这些战争和种种原因……要不然每个人都可以住在他喜欢的地方。你要是喜欢巴西——就请吧。我可是要安安静静地住在顿巴斯。我个人特别喜欢这里。”

“不，你听我说：你要是想过真正安静的生活，那么等战争结束后你到我们的索罗卡来吧，那是我们的一个县城，最好是到我们村里来，它的名字，老兄，又响亮，又有历史意义——叫沙皇格勒。”葛拉万轻轻笑着说。“不过，你知道，别来担任工作繁忙的职务。比方说，千万别当牲畜采购站的代表！来担任当地红十字会的主席吧！你只要管管理发馆，根本没事干，可以整天喝酒。真的，这个职务真值得羡慕！”葛拉万眉飞色舞地说。

“你小声点，别太高兴了！”阿纳托里善意地说。

于是他们又听到了河上这种吮吸声和咂嘴声。

“时候到了……”阿纳托里说。

刚才他们还有的那种向往大自然和幸福生活的朴实自然的心情，马上就消失了。

维克多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他领着大家，绕过空旷的采林区，沿着林间小路的边上走去，鱼贯地进入一个小树林，小树林后面就是从这里看不见的营棚。他们在这里趴了一会，凝神倾听着。周围异常寂静。维克多做了一个手势，他们就往前爬去。

现在他们已经趴在小树林的边缘。高高的营棚黑黝黝的屹立在他们前面。这是一所单坡屋顶的普通营棚，但是里面关着人，所以显得阴森可怕。营棚周围的地形完全是光秃秃的。

营棚左面有一个黑色的哨兵的身形。再左面是一条大路，路那边就是村头的小房子，但是从这儿看不见。

离换班还有半小时光景，这一段时间他们一直都趴着，目不转睛地望着哨兵的凝然不动的暗色身形。

最后他们听到了从左前方传来的愈来愈响的脚步声。还没有看到过来的人，就已经听到有两个人步伐整齐地来到大路上，朝他们渐渐走近。这是哨岗派班人和换班的。他们的暗色身形已经走近哨兵，哨兵一听到他们的声音，就“立正”不动了。

听到了压低的德语口令声、枪的喀嚓声和鞋后跟叩地的声音。两个人形远去了，在碾平的大路上又响起了脚步声，声音愈去愈远，愈来愈低，在黑夜里消失了。

阿纳托里略微扭过头来向着谢毕辽夫，但是他已经爬到小树林的深处。谢毕辽夫应该穿过村边，在警卫队住的小房子附近占一个瞭望的位置。

哨兵好像笼子里的狼，沿着铁丝网来回走动。他把枪挎在背后，快步走着，可以听见他在搓手：大概他刚刚睡醒，感到很冷。

阿纳托里摸到了维克多的突然发烫的手，轻轻地握住它。

“要不要咱俩一块去？”他突然把嘴唇凑近他的耳朵，轻轻地说。

这已经是友情的弱点。维克多摇摇头表示反对，又朝前爬去。

阿纳托里、葛拉万和腊高静屏息凝神地注视着他和那个哨兵。维克多每发出一点窸嗦声，他们就觉得他会暴露自己。但是维克多愈爬离他们愈远，现在他的平绒短上衣已经和地形融成一片，既看不见他，也听不到他的任何动静了。他们一直盯住哨兵的暗色身形，但是哨兵仍旧沿着铁丝网来回走着，什么也没有发生，似乎已经过了好长时间，天都快亮了……

好像还是在少先队时代的那个几乎被淡忘的儿童游戏里，一心一意想骗过站岗的同学那样，维克多匍匐前进，但是不让肚皮贴地，而是轮换挪动着变得灵活异常的手脚，先挪动一只手，然后挪动一只脚，接着又挪动一只手和一只脚。哨兵朝他这个方向走过来的时候，他就停下不动；等哨兵回去的时候，他又继续爬，但是克制着不让自己爬得太快。

他的心扑通扑通地跳着，但是心里并没有恐惧。在他开始爬行以前，他一直强制自己想到父亲，为的是可以一次又一次地唤起复仇之感。但是现在他已经把这件事忘得干干净净：他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怎样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偷偷爬到哨兵跟前。

他就这样爬到了方方正正地围住营棚的铁丝网的拐角上，停下不动。哨兵走到对面的拐角上，又折了回来。维克多拔出芬兰刀，用牙齿咬住它，迎着哨兵爬过去。他的眼睛对黑暗已经非常习惯，连铁丝他都看得清清楚楚，

他觉得哨兵对黑暗一定也很习惯，等哨兵走到他紧跟前的时候，一定会看见地上有人。但是哨兵走到铁丝网中间的通道上，却停下了。维克多知道，这不是平常的通道，那里设置着某种类似带刺铁丝网架的东西。维克多紧张地等待着，但是哨兵并没有取下肩后的步枪，反而把两手插在裤袋里，就这样背对着营棚，微低着头呆立不动了。

突然维克多也产生了他的屏息等待着他动手的朋友们所产生的同样的感觉，——他也觉得已经过了很久，天快亮了。所以，他不再考虑哨兵现在容易发现他，特别是容易听到他的动静（因为不再有哨兵自己的脚步声盖过其他的声响），就照直朝他爬去。他们中间相隔不过两公尺，可是哨兵仍旧那样站着，双手插在裤袋里，背着枪，戴船形帽的头低着，身子微微有些晃动。维克多不记得，他是又爬了几下还是马上一跃而起，但是他已经站在哨兵身边，举起了芬兰刀。哨兵睁开眼睛，很快地转过头来，——这是一个瘦削的、中年以上的德国人，满脸胡茬。哨兵的眼睛里露出了疯狂的眼神，但是他没有来得及从裤袋里拔出手来，只发出了一声轻轻的奇怪的声音：

“哦嗨……”

维克多使出全身之力把芬兰刀朝他下巴左面的脖子里捅进去。芬兰刀齐刀柄刺进了锁骨旁边的软肉里。德国人倒了下去，维克多也倒在他身上，他想再戳一刀，但是德国人已经开始痉挛地抽搐，嘴里冒出血来。维克多退到一边，把血淋淋的芬兰刀一扔。突然他开始大呕大吐起来，他赶紧用左胳膊的衣袖捂住自己的嘴，免得被人听见他呕吐的声音。

这时他看见阿纳托里在他面前，阿纳托里把芬兰刀塞给他，低声说：

“拿着，别留下痕迹……”

维克多藏起芬兰刀，腊高静就挽住他的胳臂，说：

“到大路上去！……”

维克多摸出手枪，跟腊高静一起跑上大路，他们就在这里埋伏下来。

葛拉万怕在黑暗中被这些带刺铁丝网架勾住衣服，就以行家的熟练手法迅速地使用着钳子，在铁丝网的两根柱子中间开出一条通路。他跟着阿纳托里直奔到营棚的门口。葛拉万摸到了门闩，——这是可以上锁的普通铁闩。葛拉万把撬棍插进锁环，把它拧断。他们拉开铁闩，万分激动地把门打开。一般令人窒息得无以复加的、热烘烘的臭气向他们扑来。里面的人醒了，他们的左右和前面都有人微微动着，有人害怕地、半睡半醒地询问着。

“同志们……”阿纳托里说，但是他激动得说不下去了。

响起了几声压低的欢呼，但是有人对欢呼发出嘘声。

“你们穿过树林走到河边，再沿着河往上游或者往下游走。”阿纳托里克制住自己，说道。“这里有个高尔杰依·柯尔尼延柯吗？”

“有！”有人从一堆蠕动的人体中间回答道。

“回家去吧，你妻子在等着你……”阿纳托里走出营棚，站在门口。

“亲爱的……谢谢你们……救命恩人……”阿纳托里听到各种声音说。

前面的人已经跑到了带刺铁丝网架跟前，但是葛拉万拦住他们，把他们引到铁丝网中间的通路上。俘虏们都拥过来，忽然旁边有人双手抓住阿纳托里的肩膀，欣喜若狂地轻声叫道：

“是托里亚？……是托里亚？”

阿纳托里颤抖了一下，把脸凑近抓住他的那个人的脸。

“任尼亚·莫什柯夫……”阿纳托里说，不知怎么竟然不觉得惊讶。

“我听出了是你的声音。”莫什柯夫说。

“你等一下……我们一块走……”

阿纳托里、维克多和莫什柯夫跟其他青年分了手，在一个灌木丛生的窄峡谷的谷底坐下来休息的时候，离天亮还很远。莫什柯夫赤着脚，身上的破衣服发出臭味，头发脏得纠结在一起。

现在看来简直是奇迹，他们竟然从俘虏营里救出他们在这次行动前在顿涅茨河岸上还提到的莫什柯夫。阿纳托里虽然疲倦，但是又兴奋又喜悦。他不断回忆着这次马到成功的行动的每个细节，表扬维克多、葛拉万和别的年轻人，一会又回到他们怎样救出莫什柯夫的话题。维克多阴沉地、简短地回答着，莫什柯夫一直不吭声。最后，阿纳托里也沉默了。

峡谷里非常黑暗和宁静。

突然，在顿涅茨河下游的什么地方升起一片红光。它猛地升了起来就映红了大半边天，起火地点的天空像红幕似的越来越低，连峡谷里都被照亮了。

“这是在什么地方？”维克多轻声地问。

“在贡多罗夫斯卡雅附近。”阿纳托里沉吟了一会说。“这是谢辽萨。”他压低声音说。“烧的是麦垛。他现在每天夜里都在放火……”

“从前我们在学校里念书，面前展现的是那样宽阔而光明的生活大道，哪想到现在会被逼得去干这种事！”维克多突然十分激动地说，“而且没有别的办法……”

“伙伴们！我真的自由了吗？伙伴们！”莫什柯夫沙声说，他双手捂住脸就倒在枯干的草上。

第四十六章

到了这样的时候：卡车、小汽车和汽油车动辄被地雷炸掉，使无家可归的人都不敢走公路和土路，他们只好推着手车费力地走村道或是干脆在草原上走。

南方马特维叶夫岗和新沙赫京斯克之间的公路上发生重大事故的传说还没有消散，北方旧别利斯克和别洛沃德斯克之间有整个汽油车队出事的新的传说又接踵而来。

通往斯大林格勒的主要公路上的克烈片卡河上的钢骨水泥桥，突然被炸得飞到半空。甚至无法理解，这是怎么发生的：桥梁坐落在大居民点鲍柯沃—普拉托沃，并且有德国兵严密防守。过了几天，沃罗涅什——罗斯托夫干线上的卡缅斯克附近的铁路大桥也倒坍在河里了。这座桥由一排配备着四挺重机枪的德国自动枪手守卫着，桥被炸毁时的爆炸声十分强烈，在夜里竟轰隆隆地传到了克拉斯诺顿。

奥列格猜测，这次爆炸大概是克拉斯诺顿和卡缅斯克两处地下党组织共同努力的结果。

他这样猜测，是因为在发生爆炸的两星期前，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又代表刘季柯夫向他要一个联络员派往卡缅斯克方面去。

奥列格选中了奥丽雅·伊凡卓娃。

在两个星期里面，奥丽雅一次也没有在“青年近卫军”的活动圈子里露过面。虽然奥列格从妮娜那里知道，奥丽雅回过克拉斯诺顿几次，又走了。在这次著名的爆炸事件发生后两天，奥丽雅才重新在奥列格家里出现，又来谦逊地执行她的“青年近卫军”总部联络员的日常职务。奥列格懂得，什么也不能向她打听，可是有时他发现自己在好奇地、很感兴趣地望着她的脸。但是她仿佛并没有觉察，照旧是那样平静、沉着、很少说话。她那线条有力而不端正的脸上没有表情，极少露出笑容，好像是天生为了保密似的。

到这时候，已经有“青年近卫军”三个固定的战斗小组，在本区的各条大路上和远远超出本区的范围以外活动。

一个小组在克拉斯诺顿和卡缅斯克之间的大路上，它主要是袭击德国军官乘坐的小汽车。领导这个小组的是维克多·彼得罗夫。

第二个小组在伏罗希洛夫格勒到李哈雅的各条大路上，它袭击汽油车：消灭司机和警卫队，把汽油倒在地里。领导这个小组的是从俘虏营里被救出来的红军少尉任尼亚·莫什柯夫。

第三个小组是谢辽萨·邱列宁的小组，它到处活动。它拦截载运武器、粮食和军服的德军卡车，追杀失散和掉队的德国兵士，——甚至在城里追杀他们。

各小组的战斗员常常集合起来执行任务，任务完成以后再一个个地散开；各人在草原上都有一定的地点埋藏自己的武器。

自从莫什柯夫在俘虏营里被救出来以后，“青年近卫军”又多了一个有经验的领导者。

经过那番磨难之后，莫什柯夫身体又复原了，他强壮结实，像一棵小橡树，走起路来不慌不忙，摇摇摆摆，脖子上围着一条毛线织的围巾，使他显得非常胖。他脚上穿的皮靴和套鞋都是在他们消灭谢维烈夫卡庄的“警察派出所”时打死的一个和他身材相仿的“警察”脚下剥下来的。看样子他好像脾气很大，其实心地非常善良。在军队里待过，特别是在前线入党以后，他就养成了坚毅的精神和自觉的纪律性。

凭着他的钳工专长，他也进了第十办事处所属工厂的机械车间，并且依照刘季柯夫的建议，被委任为“青年近卫军”总部的委员。

虽然“青年近卫军”已经有了几次辉煌的战绩，但是没有丝毫的迹象显示出这个组织的存在使德国人感到不安。

好像肉眼不能察觉的地下水的涓涓细流终于汇成大小河川一样，“青年近卫军”的活动也是不为人察觉地注入了千百万人的隐蔽得很深的、广泛的运动，——这些人都力求赶快恢复他们在德国人到来以前所处的那种合乎自然的地位。所以在这无数次反对德国人的大小行动与事件里，德国人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看出“青年近卫军”的特别的迹象。

战线现在已经移得很远，驻扎在克拉斯诺顿的德国兵竟觉得这个城市几乎像是德国的一个偏僻的小县城了。要不是大路上的游击队活动，这里的“新秩序”似乎已经永远确立下来。

东西南北各处的战线全都寂静下来，好像在倾听伟大的斯大林格勒战役的炮声。在九月以及后来在十月的关于斯大林格勒地区和莫兹多克地区的每日战报里，已经有着一种非常习惯和固定的东西，使人觉得情况要永远这样继续下去。

从东方经过克拉斯诺顿被赶往西方的俘虏的洪流完全停止了。但是由西向东的德国的和罗马尼亚的军队、辎重车、大炮和坦克却络绎不绝；它们一去就不再回来，而新的军队还是源源不断地开过去，克拉斯诺顿也经常日夜不断有德国官兵和罗马尼亚官兵逗留，这也使人觉得，这种情况要永远这样继续下去。

在柯里亚舅舅和柯舍沃伊两家的房子里，同时有一个德国军官——受伤休假后重返前线的“飞行好手”——和一个带着勤务兵的罗马尼亚军官住了几天。勤务兵是一个快活的小伙子，会说俄语，碰到什么就偷什么，一直偷到大蒜头和家庭照片的镜框。

罗马尼亚军官是个小矮个儿，留着两撇乌黑的小胡子，两只小眼睛鼓出来，动作非常灵活，连鼻尖都经常在动，他穿一身浅绿军服，打着领带，佩着有金穗带的肩章。他住在柯里亚舅舅的小房间里，但是整天不在家，换了便服满城乱串，调查矿井、机关和军队的情况。

“你的主人怎么穿便服？”柯里亚舅舅问勤务兵，他跟那个勤务兵几乎已经有了交情。

快活的勤务兵鼓起腮帮子，用巴掌朝腮帮子上一拍，像杂技团小丑那样噗的一声喷出一口气，非常亲切地说：

“他是个间谍！……”

在这次谈话之后，柯里亚舅舅就再也找不到他的烟斗了。

那个德国”飞行好手”把叶列娜·尼柯拉耶芙娜挤到外婆那里，把奥列格挤到柴房里，自己住在大房间里。这是一个皮肤白皙、眼睛通红的大汉，身上挂满因为在法兰西和哈尔科夫作战有功而获得的勋章。他被卫戍司令部送到这儿来的时候，喝得烂醉如泥；他所以会在这里待上几天，无非是因为他继续日夜狂饮，怎么也不能清醒过来。他拚命要把屋子里所有的人（除了罗马尼亚人，因为他根本没有发觉他们的存在）都拉来跟他一同狂饮；要是没有人陪他聊天，他简直连一秒钟都过不下去。他用令人作呕的德国腔的俄语说明他要先打垮布尔什维克，然后打垮英国人，再打垮美国人，到那时候就会天下太平。但是在临行之前，他却陷入了极度的忧郁。

“斯大林格勒！……哈！……”他竖起紫红色的食指说。

“布尔什维克在打炮……砰！我就要完蛋了！……”从他的血红的眼睑里涌出了伤心的泪珠。

临行之前，他刚好清醒到可以在人家院子里用毛瑟枪打死几只母鸡的程度。这些鸡他无处可藏，只好把它们的腿缚住，在他收拾行李的时候，它们就躺在台阶旁边。

罗马尼亚勤务兵把奥列格叫到跟前，指指那些鸡，鼓起两腮，像杂技团小丑那样噗的一声喷出一口气。

“这就是文明！”他亲切地说。

于是奥列格就再也看不到他的铅笔刀了。

在“新秩序”下的克拉斯诺顿，也形成了像在什么海德堡或是巴登—巴登①那样的一批“社会精华”——一级一级不同官衔和不同地位的人。站在这架梯子顶上的是宪兵站长勃柳克纳、宪兵副站长巴尔德和第十办事处首脑施维德中尉。这位中尉一向习惯于在德国企业中那种一成不变的、各方面都事先筹划好的、清洁整齐的环境里工作。关于他管辖下各企业的工作情况中使他感到棘手的问题，他曾对巴腊柯夫谈过；他自己也没有发觉，这种令

人棘手的状况怎么竟逐渐变成了他独特的经营方针。事实上，如果没有工人，没有机器，没有工具，没有运输工具，没有坑木，而且老实说，没有矿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也就不会有煤。所以如果仅就他每天早上经常检查俄国马夫是否用燕麦喂了办事处的德国马匹和签署公文来说，他倒是在认真执行他的职务。其实他是以更大的精力把其余的时间花费在他私人的鸡鸭棚上、猪圈上、牛栏上以及举行晚会招待德国行政官员上面。 ①海德堡和巴登—巴登都是德国城市名。

在这个梯子稍低的梯级上站着施维德的副手费耳德纳、施普利克上尉和穿短裤的特派员桑德斯。再低一些是“警察队长”索里柯夫斯基和市长斯塔庆柯。斯塔庆柯态度非常庄严，一早就喝得醉醺醺的，在一定的钟点携带雨伞规规矩矩地踏着泥泞到市参议会去，也是这样准时地从市参议会回家，好像他真是在管理什么大事似的。在梯子最下一级的是芬庞军士和他手下的兵士，执行一切命令的也就是他们这批家伙。

在十月间大雨如注的日子里，这个令人喜爱的小矿城是多么荒凉和不幸啊！到处都是泥泞，没有燃料，没有电灯，屋前没有栅栏，庭园里的树木被斫伐一空，空房子里的窗玻璃都被打碎，里面的东西被过路的兵士偷走，家具也被德国当局的官员拿去陈设他们的住宅。人们都形销骨立，衣服破烂，不名一文，大家见面的时候彼此都不相识了。所以常常连最普通的人也会因为这样的念头突然停在街心发愣或是半夜在床上醒来：“难道这都是真的？这会不会是梦？会不会是幻觉？

我是不是神经错乱了？”

只有突然不知从何处出现在墙上或是电线杆上的小小的、被雨水打湿的传单，用“斯大林格勒”这几个字像烈火般燃烧着人们的灵魂，还有大路上经常发生的爆炸的轰隆声，才一次又一次地向人们宣告：“不，这不是梦，也不是幻觉，这是现实。斗争在进行着！”

滂沱的秋雨随着秋风已经下了几个昼夜，有一天，一辆车身低矮的灰色的德国汽车把刘勃卡从伏罗希洛夫格勒送回来，一个年轻的德国中尉先跳下车，给她拉着车门，等她头也不回地拎着小手提箱跑上自家台阶的时候，他还向她行了一个敬礼。

这一次，她母亲叶芙洛西妮亚·米龙诺夫娜实在忍不住了，等她们睡下的时候，她说：

“你应该检点一些，我的小刘巴……你知道，人家在怎么议论吗？‘她跟德国人打得火热’……”

“人家是这么议论的吗？这倒不错，妈妈，这对我甚至十分有利。”刘勃卡说着就笑起来，不多一会就蜷起身子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万尼亚知道她已经回来，就冒着雨，踩着没膝的泥泞，用两条长腿几乎是跑过他住的那条街和“八家宅”中间的大片空地，连门也不敲就跑进了谢夫卓夫家的宽敞的上房。这时，他已经冻僵了。

只有刘勃卡一个人在家，她一手拿着一面小镜子照着，另一只手一会整理她那没有梳过的松散的发卷，一会抚摸穿着绿色家常连衣裙的腰部，光着脚在房间里沿着对角线走来走去，嘴里说着下面这一类的话：

“嗳，你这个刘勃卡—小刘巴！凭哪一点男孩子们要这么喜欢你，我简直弄不明白……你到底有哪一点好看？呸，你大嘴巴，小眼睛，面貌不端正，身段……唔，身段倒还不错……不，身段的确不错……不过，要是仔细研

究……要是你去追求他们倒也罢了，可是根本没有这回事。呸！去追求男孩子！不，我简直不明白！……”

于是，她就对着小镜子左顾右盼地抖着发卷，光脚板清脆地打着拍子，在房间里沿着对角线跳起切乔特卡舞来，一面哼着：

刘勃卡，小刘巴，

我亲爱的小刘巴……

万尼亚不动声色地对她注视了一会，认为该咳嗽一声的时机已经到了。

刘勃卡非但没有感到狼狈，反而露出近乎挑战的神气，不慌不忙地放下镜子，转过身来。她认出是万尼亚，就眯起蓝眼睛，清脆地大笑起来。

“谢辽查·列瓦肖夫的命运我完全清楚了。”万尼亚用有点喑哑的低音说，“他不得不到女皇那里给你弄一双女靴来啦①……”

①这句话出自俄国作家果戈理（1809—1852）根据乌克兰民间传说写成的小说《圣诞节前夜》。这篇小说叙述铁匠瓦库拉爱上了奥克桑娜，但是奥克桑娜娇纵成性，要铁匠弄到女皇穿的靴子才答应嫁给他。瓦库拉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弄到了女皇的靴子回来。

“你可知道，万尼亚，这真是怪事，我爱你甚至要超过爱这个谢辽查！”刘勃卡嘴里虽这么说，但是毕竟有点窘。

“可是我的眼睛近视得厉害，说老实话，我觉得所有姑娘们的脸都是一个模样。我只能凭声音来辨别她们，而且我喜欢的姑娘嗓门要低低的，像祭师那样。可是你的嗓子，你知道，就像银铃一样！”万尼亚沉着地说，“你家里有人吗？”

“没有人……妈妈到伊凡卓娃家去了。”

“我们坐下来吧。还有，你把镜子放好，免得我神经紧张……刘波芙·葛利高利耶芙娜！除了你的日常工作之外，你有没有考虑到伟大的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快要到来了？”

“当然啰！”刘勃卡说，虽然凭良心说，她把这事简直给忘了。

万尼亚朝她弯下腰来，凑着她的耳朵轻轻说了几句话。

“啊，真妙！真了不起！想出了这样的好主意！”于是她就真心诚意地对准万尼亚的嘴巴吻了一下，使他窘得几乎掉下了眼镜。

……“好妈妈！你以前染过什么衣服没有？”

母亲莫名其妙地望着刘勃卡。

“比方你有一件白上衣，可是你想把它变成……蓝的。”

“当然染过，好闺女。”

“那么红的你也染过吗？”

“什么颜色还不是都一样……”

“你教教我吧，妈妈，也许我要给自己染点什么东西。”

……“玛鲁霞姑姑，你染过衣服没有，把一种颜色染成另外一种颜色？”沃洛佳·奥西摩兴问他的玛鲁霞姑姑，她带着孩子就住在离奥西摩兴家不远的一所小房子里。

“当然染过，沃洛佳。”

“有两三个枕头套，你能不能给我染成红的？”

“不过有时候它们很容易掉色，沃洛佳，那时你的腮帮子和耳朵都要染红了。”

“不，我不预备枕它，我只是白天把它套上，纯粹是为了好看……”

……“爸爸，我确信，你不单会做漆木料的油漆，还会做漆金属的油漆。你能不能把一条被单染成红的？你知道，这些地下工作者又来向我请求：“给我们一条红被单。”啊，我对他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呢！”若拉这样对父亲说。

“染倒可以染。不过……到底是一条被单！要是被妈妈知道了呢？”父亲担心地回答说。

“请你们把这个问题在你们中间彻底明确一下，你们俩究竟谁是一家之长——是你呢，还是妈妈？到底是谁？……问题很清楚：红被单是非要不可的。”

华丽雅收到谢辽萨的那张字条之后，从来没有跟他提起过这张字条，他也从来没有问过她。但是从那一天起他们已经分不开了。天一亮，他们就想见面。通常是谢辽萨到“木头街”来，在她们家里，玛丽雅·安德烈耶芙娜，特别是小刘霞，对这个长着一头粗硬的鬈发，甚至在十月的这些寒冷多雨的日子里都打赤脚的瘦削的小伙子不仅习惯，而且很喜欢他，虽然有她们在场的时候他大多是不作声的。

有一次小刘霞甚至问道：

“您为什么这么不爱穿皮鞋？”

“光脚跳起舞来方便些。”谢辽萨笑着说。

可是从此以后，他来的时候就总是穿着皮鞋，——他只是找不出时间来修补它。

在“青年近卫军”的队员中间突然对染布发生兴趣的那些日子里，有一天，谢辽萨和华丽雅要在夏季剧场放映电影时散发传单——这已经是第四次了。

过去名叫列宁俱乐部的夏季剧场，设在一座高高的、用木板搭的长形建筑物里，舞台上从来没有幕幔，看上去很不舒服，遇到放电影的日子就在前面挂一幅布幕。人们坐在凳脚埋在地里的白木长凳上，座位越到后排越高。在德军占领克拉斯诺顿以后，这里就放映德国影片，大部分是战事新闻片；有时也有外地的戏班子来演出几个杂技节目。剧场的座位不编号，票价一律，占到什么座位全凭观众的气力和劲头。

华丽雅像平时一样，挤到场子里靠近后排的那一边，谢辽萨却留在靠近前排的入口这一边。熄灯后，当场内还在进行抢座位的争夺战的时候，他们就把传单扇形地朝观众撒出去。

响起了一阵叫喊声和尖叫声。传单被争先恐后地抢去了。谢辽萨和华丽雅走到约定的老地方，在支撑着建筑物的、从舞台数过来是第四根的柱子旁边碰头。像平时一样，总是观众比座位多。谢辽萨和华丽雅留在站在走道里的观众中间。一道圆锥形的、尘埃弥漫的、一闪一闪的蓝光从放映室射到银幕上，这时谢辽萨用胳臂肘微微碰了碰华丽雅的胳臂肘，再朝银幕的左面使了个眼色。一面深红色的、正中有一个白圆圈和一个黑A字的德国法西斯大旗，从顶灯那里挂下来，遮住了整个这部分的舞台。由于场内空气的流动，旗子微微飘动着。

“我到台上去，你随着大伙出去，跟女查票员瞎扯一会……要是有人来打扫场子，至少也要拖它五六分钟。”谢辽萨凑着华丽雅的耳朵轻轻地说。

她默默地点点头。

银幕上，在德文的片名上面，出现了用俄文加写上去的白字：《她的第一次经历》。

“等一会来看你好吗？”谢辽萨有些胆怯地问。

华丽雅点点头。

在换最后一部胶片之前，灯光刚灭，谢辽萨就离开华丽雅消失不见了。他消失得不见影踪，这是谢辽萨特有的本领。在站着人的走道里，没有一处看得出有人移动过。可是她仍旧很好奇，想知道他是怎么干的。华丽雅一面向出口处挤，一面用眼睛盯着银幕右边的小门，——谢辽萨只有通过这扇小门才能不被人察觉地溜上舞台。电影放完了。观众乱哄哄地涌向出口，灯亮起来，可是华丽雅却始终什么也没有看见。

她随着大伙出了剧场，在出口对面的树下站住。公园里又黑、又冷、又潮湿。树叶还没有掉光，潮湿的残叶拂动时发出好像叹息的声音。现在已经是最后一批观众在走出剧场。华丽雅跑到女查票员面前，弯下腰，借着从剧场打开的门口照射出来的微光，在那块被微光照亮的长方形的地上，好像要找寻什么东西。

“您在这里捡到一个小钱包没有，皮的？”

“你这个姑娘真是，人刚散，叫我到哪儿去找！”上年纪的女查票员说。

华丽雅弯着腰，用手指在被人践踏的泥地上东摸一下，西摸一下。

“它准是就在这里的什么地方……我走出来的时候掏了一下手帕，走了没有几步，一看——钱包没有了。”

女查票员也开始在周围寻找。

谢辽萨并不是从小门进去，而是直接越过乐池的小栏杆爬上了舞台。这时，他正在那里使劲扯着舞台上的旗子，打算把它从舞台顶灯上拉下来，但是它被什么东西绊住了。谢辽萨再攀上一点，往上一蹿，用胳臂勾住旗子，让身子悬空荡着。挂旗子的绳断了，谢辽萨差点连旗子一起跌进乐池。

半明半暗的空场子的门大开着，面对着公园。他一个人站在舞台上，不慌不忙地把那面法西斯大旗整整齐齐地对折起来，然后一折为四，再对折一下，使它可以藏在怀里。

看门人从外面关上放映室的门，从黑暗中走到被场内射出来的光线照亮的地方，走到正在找寻钱包的女查票员和华丽雅跟前。

“灯！你好像不知道为这个要挨骂似的！”看门人生气地说。“把灯熄掉，我们要锁门了……”

华丽雅跑到他面前，抓住他的衣襟。

“亲爱的，等一会吧。”她恳求地说。“钱包丢了。没有灯什么也看不见，请你再等一会吧！”她重复说了一遍，一面拉住他的上衣不放。

“在这里怎么找得着！”看门人心有些软下来，不由地也用眼睛在周围寻找着。

在这一刹那间，一个男孩把帽子低低地压到眼睛上，从阒无一人的剧场里跳出来，他的肚子大得出奇，两条细腿跟他的大肚子相形之下显得特别细瘦，他身子一纵，撒开这两条细腿就跑，一面发出凄楚的声音：

“咪—咪—咪……”

接着就在黑暗中消失了。

华丽雅还假惺惺地说了一句：

“唉，真可惜！……”

但是她憋不住要笑出来，只好用手捂住脸，憋着气，几乎是跑出了剧场。

第四十七章

自从奥列格跟母亲说明白之后，他的活动已经没有阻碍了：整座房子都卷进了这个活动，亲人都是他的助手，母亲是他们中间的第一个。

谁也说不出，这个十六岁的青年，是怎样在他心里把前辈最宝贵的经验、书本对他的潜移默化、从继父讲的故事里吸取来的东西、特别是他的直接领导人刘季柯夫现在给他的教导，融合在一块的。谁也说不出，这一切在他心里又是怎样跟他和他的同伴们共同体验到的最初的失败的教训以及最初取得的成就的经验结合起来的。但是随着“青年近卫军”活动的展开，奥列格对同伴们的影响愈来愈大，他本身也愈来愈意识到这一点。

他是这样地平易近人、热爱生活、天真直率，不要说是凌驾于同伴之上的念头，哪怕是对他们、对他们的意见和经验有丝毫的不够重视，也是他应心所憎恶的。但是他愈来愈意识到，他们的事业的成败，大部分要取决于他奥列格对于一切情况能够预见的程度或是犯错误的多少。

他总是意气风发，总是精神愉快，同时又非常认真、谨慎、严格。遇到只和他个人有关的事情，他还显出有孩子气，——他想亲自去贴传单，烧麦垛，偷武器，以及伏击德国人。

但是他已经明白他对整个工作和大家所负的责任，所以他总是克制着自己。

他跟一个年纪比他大的姑娘产生了友谊。那个姑娘性格异常淳朴、大胆、不大说话、富有浪漫主义气息。她的沉甸甸的深色发卷垂到她的有力的圆圆的肩膀上，两臂黧黑而好看，褐色的大眼睛，两道弯弯的眉毛，眉宇之间带着挑战、热情和富于想象力的神情。这个姑娘就是妮娜·伊凡卓娃，她能猜透他的每一个瞥视、每一个动作的用意，并且总是绝对地、勇敢地、准确地执行他的任何委托。

他们总是忙着写传单、写临时共青团团证、搞某某地方的计划，他们可以一连几小时在一块不开口而不感到无聊。可是他们如果谈起来，他们的思想就会翱翔在大地之上。凡是人类的伟大精神所创造、而又为少年的视野所能及的一切，都在他们的想象面前飞翔。有时他们俩会无缘无故地感到非常高兴，他们只是笑个不停——奥列格的笑是不可遏止的，像小孩那样，搓着手指尖，连眼泪都笑出来；妮娜的笑是带着少女那种文静的、信任的喜悦，不然就是突然温柔地、甚至有点神秘地笑着，仿佛有什么事情瞒着他似的。

有一次，他非常不好意思地要求妮娜允许他念一首诗给她听。

“谁的，是你写的？”她惊奇地问。

“不。你听我念……”

开始的时候他口吃得厉害，但是念了最初几行之后突然镇静下来：

高唱起战歌吧，我的女友，
不要丧气，不要忧愁。
我们亲爱的
红翼的雄鹰

很快就会飞来，
把一切地窖和牢狱的门通通打开。
你睫毛梢上的泪珠
将被阳光晒干。
你又会像五一节那样
快乐、自由。
为了亲爱的祖国，我的女友，
我们去复仇……

“这里我还没有全部写完。”奥列格说着，又不好意思起来。

“这里应该写，我们怎样一起去参军……你愿意去吗？”

“你这是献给我的吗？是献给我的吗？……”她说，目光炯炯地注视着他。“我一听就知道这是你写的。为什么你以前没有说过你会写诗？”

“我不好意思说。”他咧开嘴笑道，心里因为她欣赏这首诗而感到得意。“我早就在写诗。可是我从来没有给别人看过。我最不好意思给万尼亚看。因为他，你是知道的，写得多么好啊！我这算得了什么……我觉得，我的诗格不对，韵脚也是硬凑的。”他说，因为他的诗受到妮娜的赞赏而感到高兴。

是的，恰恰就在生活最艰苦的这段岁月里，奥列格进入了他最幸福的精神焕发的青春时期。

在十月革命节的前夕，十一月六日的下午，“青年近卫军”总部全体成员在柯舍沃伊家集会，联络员华丽雅、妮娜和奥丽雅也来参加。奥列格决定用隆重接受腊箕克·尤尔金入团来庆祝这个节目。

这个长着一双文静、温顺的眼睛的腊箕克，现在已经不是对若拉说“因为我一向睡得很早”的那个男孩了。在参加处死福明的行动以后，他就被编进谢辽萨的战斗小组，参加对德国卡车的夜袭。在奥列格致开会词和后来谢辽萨介绍他的情况时，他一直颇有把握地坐在门口的椅子上，眼也不霎地直望着对面的窗户。有时他不禁起了好奇心，想知道到底是些什么人在决定他的命运。于是他就把灰色长睫毛下泰然自若的目光转向坐在像宴会时那样铺着台布的大餐桌周围的总部委员们。但是两个姑娘——一个浅色头发，另外一个黑头发——马上就态度非常亲切地对他微笑，而且她们俩都长得那么美，使腊箕克突然感到一阵异乎寻常的窘迫，连忙把目光移开。

“有—有没有问题要问腊箕克·尤尔金同志？”奥列格问。

大伙都不吭声。

“让他说说自己的简历。”杜尔根尼奇说。

“你说说自己的简—简历吧。”

腊箕克站起身来，眼睛望着窗户，用他在教室里回答问题那样响亮的声音说道：

“我于一九二八年生在克拉斯诺顿城。在高尔基学校念书……”腊箕克的简历到这里就完了，但是他自己觉得大少，就有些犹豫地加了一句：“从德国人来了以后，现在已经不上学了……”

大伙又沉默了一会。

“你担任过社会工作没有？”万尼亚问。

“没有担任过。”腊箕克像孩子那样深深地叹了口气，说道。

“共青团的任务你知道吗？”万尼亚透过他的玳瑁边眼镜注视着桌上，又问道。

“共青团的任务是打击德国法西斯侵略者，打到他们一个都不剩。”腊箕克非常明确地说。

“怎么样，我认为这个小伙子的政治认识非常清楚。”杜尔根尼奇说。

“当然接受！”刘勃卡说，她满心希望腊箕克的一切都顺顺当当。

“接受，接受！……”别的总部委员也说道。

“谁赞成接受腊箕克·尤尔金同志做共青团员？”奥列格满面笑容地问，一面自己举起了手。

大伙都举起了手。

“——一致通过。”奥列格说了就站起身来，“你到这边来……”

腊箕克脸色有些苍白起来，走到桌前。杜尔根尼奇和邬丽亚严肃地望着他，把身子挪开一些，让他站在他们中间。

“腊箕克！”奥列格庄严地说，“我受总部的委托，授给你这张临时的共青团团证。要像爱护自己的荣誉一样爱护它。团费可以缴在自己的五人小组里。等红军回来的时候，共青团区委会把这张临时团证给你换一张正式的……”

腊箕克伸出一只晒黑的瘦削的手，接过了团证。团证的大小跟正式的一样，用绘图和画地图用的厚纸制成，对折着。正面上方用不整齐的小号印刷体铅字印着：“杀死德国占领者！”下面一点印着：“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再下面一点，字体略微大些：“共青团临时团证”。在团证的里页，左面写着腊箕克的姓、名和父名，他的出生年份；下面一点是入团日期：“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六日”，再下面一点是——“克拉斯诺顿‘青年近卫军”共青团支部发。书记：卡苏克”。

团证的右面划着格子，以便登记缴纳的团费。

“我把它缝在短袄里面，永远带在身边。”腊箕克说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出来，一面把团证藏进短袄里边的口袋里。

“你可以走了。”奥列格说。

大伙都向腊箕克握手道贺。

腊箕克出来走到公园街上。没有下雨，但是风很大，很冷。时间将近黄昏了。今夜腊箕克要带领一个三人小组去执行一项巨大的节日任务。感觉到揣在怀里的团证，腊箕克脸上带着幸福而严肃的神情沿街走回家去。走到通第二过道口的斜坡上，经过现在被农业指挥部占用的区执委会大厦旁边的时候，他微微缩起下巴，把嘴唇分开，吹出一声刺耳的口哨——他只是要让德国人知道，世界上有他存在着。

今天夜里不单是腊箕克，差不多整个组织都要参加一项巨大的节日任务。

“别忘了：谁完了事就到我这儿来！”奥列格说，“除了五一村人！”

五一村人在伊凡尼兴娜姊妹家里举行庆祝十月革命节的晚会。

室内剩下了奥列格、杜尔根尼奇、万尼亚和联络员——

妮娜和奥丽雅。奥列格的脸上突然露出激动的神情。

“姑—姑娘们，亲—亲爱的，时—时候到了。”他说，口吃得非常厉害。他走到柯里亚舅舅的房门口，敲了一下门，“玛丽娜舅母！时—时候到了……”

玛丽娜穿着大衣，边走边包着头巾，从房间里走出来，柯里亚舅舅跟在她后面。维拉外婆和叶列娜·尼柯拉耶芙娜也从自己的房间里走出来。

奥丽雅和妮娜都穿上外衣，跟玛丽娜走出屋子——她们负责在附近几条街道望风。

这是一个危险的大胆举动：在家家户户还没有睡觉、街上还人来人往的时刻去干这事。

可是这个机会又怎能错过呢？！

夜色浓了。维拉外婆放下黑窗帘，点起油灯。奥列格走到院子里去找玛丽娜。她已经离开了墙边。

“一个人也没有。”

柯里亚舅舅从气窗口探出头来四下张望了一下，把电线的一头递给奥列格。奥列格把它搭在长竿上，再把长竿紧贴着电线杆挂到电线上，这样，长竿和电线杆在黑暗中看起来就合而为一了。

奥列格、杜尔根尼奇和万尼亚坐在柯里亚舅舅房里的写字桌旁，手里拿着铅笔准备着。

维拉外婆腰板挺得笔直，脸上带着令人莫测高深的表情，叶列娜·尼柯拉耶芙娜身子向前倾着，脸上带着天真的、有些担心的神情，她们坐在稍远的床上，眼睛都盯着收音机。

只有柯里亚舅舅的那只又稳又准的手，才能这样毫无声息地一拨就拨到需要的波长上。

他们正好听到欢呼声。空气里的放电的干扰，使他们听不清楚说话的声音：

“同志们！今天我们庆祝我国苏维埃革命胜利二十五周年。自从我国建立苏维埃制度以来，迄今已二十五年了。我们现时已进到苏维埃制度存在的第二十六年的前夜……”

杜尔根尼奇的脸色镇静而严肃，万尼亚几乎把眼镜凑到练习簿上，他们都在迅速地记录。记录并不难：斯大林说得很从容。有时他停顿一下，这时就可以听到他朝杯子里倒水、又把杯子放好的声音。不过最初他们还是全神贯注地听着，惟恐漏掉一点声音。后来等他们适应了他讲话的节奏，他们中间的每一个才全身心地意识到他们所参加的那件事是不平常的，几乎是不可能的。

一个人要是没有尝过在不生火的斗室里或是掩蔽部里对着油灯枯坐的滋味，——那时不仅户外秋寒逼人，他自己也备受屈辱、作践和贫困，——没有用冻僵的手在秘密的收音机上找过自由祖国的音波，他就永远不会了解，他们是怀着怎样的感情谛听着莫斯科传来的这篇演说……

“……食人生番希特勒说道：‘我们要把俄国消灭，使它永远不能翻身。’看来是很明显的，虽然是有点蠢笨。”

大厅里的笑声传到这里，立刻也在他们脸上引起了微笑，维拉外婆甚至捂住了嘴。

“我们没有抱定任务要去消灭德国，因为不可能消灭德国，犹之不可能消灭俄国一样。

但是，消灭希特勒的国家却是可能，并且是应当的……我们第一个任务，也就正是要消灭希特勒国家及其罪魁祸首。”

暴风雨般的掌声引得他们也想用热闹的举动来表现一下自己，但是这一点他们办不到，他们只好交换着眼色。

一切不自觉地蕴藏在这些人——从十六岁的男孩到老妇人——的爱国

热忱里的想法，现在都用事实与数字的直截了当的语言被表达出来，在他们身上复苏了。

这是他们，这些身受着不可想象的痛苦与磨难的普通人，现在在向全世界说话：

“希特勒恶党……蹂躏和残杀我国各沦陷区中的和平居民：男女老幼，我们的兄弟姊妹……只有那些丧尽天良、行同野兽的下等败类，才能以这种岂有此理的手段来对待手无寸铁的无辜人民……我们知道干出这些岂有此理的罪行的凶犯，即‘欧洲新秩序’的建设者，所有这些新任命的总督和普通省长、驻防司令和副司令是些什么人。成千成万受害的人们都知道他们的名字。让这些刽子手知道，他们决逃脱不了对自己罪行所应负的责任，受害的各国人民要惩治凶犯的这双铁手是决不会饶恕他们的……”

这是他们的希望和复仇之心在说话……

包围着他们这个受敌人铁蹄践踏的小城的广大世界的呼吸、祖国大地的强有力的震抖、夜晚的莫斯科的脉搏，都冲进室内，使他们的心因为意识到他们是属于这个世界而感到无比幸福……

欢呼声盖过了演说中的每一句祝辞。

“我们的游击队男女队员光荣啊！”①

“你们听到了吗？……”奥列格叫了起来，一面用发亮的、幸福的眼睛望着大伙。

①以上五段引文的译文，见斯大林：《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中文本第54、65、66、67页，人民出版社。

柯里亚舅舅关了收音机，突然降临了可怕的寂静。这还是刚才的事，可是现在已经什么都没有了……气窗不时发出吱吱的响声。秋风在窗外呼啸。他们孤单单地坐在这昏暗的斗室里、千里迢迢的苦难的道路把他们跟刚才还在喧腾的世界隔开了……

第四十八章

夜是这样的漆黑，即使把脸紧紧地凑在一起彼此也看不见。潮湿的寒风满街刮着，到十字路口就变成旋风；它把屋顶刮得哗啦啦地响，它在烟囱里呻吟，在电线中间呼啸，碰到电线杆就发出呼呼的声音。非要像他们那样熟悉这个城市，才能踏着寸步难行的泥泞在一片漆黑中丝毫不差地走到门楼……

从伏罗希洛夫格勒公路到高尔基俱乐部的这一段大路上，夜里通常有一个值班的“警察”在巡逻。但显然是泥泞和寒冷把他赶到什么地方的屋檐底下去了。

门楼是砖砌的，——这不是门楼，而是一座塔，上面像城堡一样有着垛口，下面有一个小办公室和一条通往矿井区的过道。门楼左右两面是砖砌的高墙。

宽肩膀的谢尔格和身轻似燕、两腿有力的刘勃卡，他们俩好像是生就了搭配着来完成这个任务似的。谢尔格弓起一只膝盖，向刘勃卡伸出双手。她看不见他的手，但是她把小手一下子就搭在他的手上，轻轻地笑起来。她

把一只穿着高腰套靴的脚踩在他的膝盖上，在同一刹那已经到了他的肩膀上，接着就把手放在砖围墙上。他牢牢握住她的高腰套靴上面的小腿，免得她跌下来。她的衣服像旗子似的在他头顶上飘拂。她用胳膊紧紧攀住墙的那边，肚皮贴在墙头上：要她用手把谢尔格拉上来，力气还不够，但是用这种姿势她就能支撑得住，于是他牢牢地抱住她的腰，两只脚抵着墙，靠两臂之力把自己提上来，然后迅速有力地把两手先后挪上墙头。现在刘勃卡只要腾出个地方给他就行了，——他已经到了她的旁边。

厚厚的砖墙的面是倾斜的，又潮湿，非常容易滑下去。但是谢尔格把额头贴到塔墙上，再把双臂伸开平贴在墙上，站得很稳。现在刘勃卡自己已经顺着他的脊梁爬到他的肩上，——他毕竟是非常有力的。塔的垛口跟她的胸部一般高，所以她很容易爬到了塔上。风非常猛烈地刮着她的连衣裙和短上衣，似乎眼看就要把她刮倒。但是现在最困难的已经过去了……

她从怀里掏出一卷东西，摸到了横头贴边里穿的细绳，不等它迎风展开就把它绑在旗杆上。她刚一松手，风就非常猛烈地把它吹开，使刘勃卡的心都激动得扑通扑通地跳起来。她再取出比较小的一卷，把它绑在旗杆脚上，让它挂在垛口里面。她还是照老办法顺着谢尔格的脊梁下到墙上，但是不敢往烂泥里跳，只好耷拉着腿坐下。谢尔格跳了下去，伸出了手，在下面轻轻唤了她一声。她看不见他，只从声音上感觉到他。她的心突然停止了跳动，——她向前伸出手去，眯起眼睛往下跳。她正好落在他的手上，搂住了他的脖子，他就这样把她抱了一会。但是她挣脱出来，跳到地上，呼吸的热气喷到他的脸上，她兴奋地低声说：

“谢辽查！我们去拿吉他好吗？”

“行！我还要换件衣服，你的套靴把我浑身都踩脏了。”他幸福地说。

“不用，不用！就是这副样子他们也会接待我们！”她高兴地笑起来。

派给华丽雅和谢辽萨的城中心，是最危险的一区：区执委会大厦和职业介绍所前面都有德国哨兵站岗，第十办事处旁边有“警察”值班，山下是宪兵站。但是黑暗和风对他们有利。谢辽萨选中了“疯老爷”的空屋，当华丽雅在房子对着区执委会的那一面望风的当儿，谢辽萨就爬上了大概还是“疯老爷”在世时安放的通阁楼的、现在已经腐朽的梯子，——在十五分钟之内一切都搞好了。

华丽雅感到冷得厉害，可是她很高兴一切这么快就完事了。但是谢辽萨弯下身子凑着她的脸，笑眯眯地轻声说：

“我身上还存着一面呢。让我们到办事处去！”

“那么‘警察’呢？”

“不是有消防梯吗？”

不错，消防梯是在对着大门的那一面。

“走吧。”她说。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里，他们往下走到铁路支线上，在枕木上走了好久。华丽雅觉得，他们已经是向着上杜望纳雅那边走，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谢辽萨像猫一样，在黑暗里也看得清楚。

“就在这里。”他说，“不过你要跟着我走，不然左面就是一个斜坡，你会一直滑到‘警察’学校里去……”

风在公园里的树木中间怒号，刮得秃枝互相撞击，枝上的冷露水滴了华丽雅和谢辽萨一身。谢辽萨很有把握地、迅速地带她沿着林荫道走过去，

华丽雅猜到他们已经快到学校了，因为屋顶哗哗地响得厉害。

现在已经听不见谢辽萨走上铁梯时铁梯的震动声。他老是不下来……在黑暗里华丽雅一个人站在铁梯脚旁。秃枝发出碰击声。这个夜晚是多么凄凉可怕啊！她的妈妈、她华丽雅、还有小刘霞在这个可怕的黑暗世界里又是多么软弱无助……还有父亲呢？他这个几乎双目失明的人，万一无处容身，此刻还在什么地方踯躅呢？……华丽雅想象着顿涅茨草原的整个无垠的空间，炸掉的矿井，驻扎着宪兵的，没有灯光的、潮湿的城镇和乡村……突然她觉得谢辽萨永远不会从这个哗啦啦响着的屋顶上下来了，她失去了勇气。但是就在这一刹那她感到梯子的震动，她的脸上便又露出了冷冷的、毫不在乎的神气。

“你在这儿吗？……”他在黑暗里微笑着。

她感到他向她伸出一只手，便把自己的手也伸过去。他的手冷得像冰一样。这个瘦削的青年，穿着那双在泥泞里已经走了好几个小时的百孔千疮的皮鞋（里面一定都是水），破旧的短袄敞着，——他有什么事没有经历过啊？……她双手捧住他的面额，面颊也冷得像冰一样。

“你完全冻僵了。”她并不把手从他脸上缩回，说道。

他立刻安静下来，他们就这样站了一会。只有秃枝在碰击着。后来他轻轻地说：

“我们不要再绕弯儿了……我们往后退，翻篱笆进去……”

她缩回了手。

他们从奥列格的邻居住的那边向奥列格家走过去。突然谢辽萨抓住华丽雅的手，他们俩都把身子贴着墙。华丽雅被弄得莫名其妙，就把耳朵凑到他的嘴边。

“对面有两个人走过来。他们听到我们也站住了……”他轻声说。

“这是你的想象！”

“不，他们站在那儿呐……”

“我们就从这儿走进院子吧！”

但是他们刚从邻居那边绕过房子，谢辽萨又让华丽雅站下：那两个人在房子对面也做了同样的动作。

“一定是你的想象……”

“不，他们站在那儿。”

奥列格家的门开了，有人走出来，正碰上了谢辽萨和华丽雅要避开的那两个人。

“是刘勃卡吗？你们怎么不进来？”是叶列娜·尼柯拉耶芙娜的低低的声音。

“嘘……”

“是自己人！”谢辽萨说了就抓住华丽雅的手，把她拖了进去。

在黑暗里只听到刘勃卡吃吃的笑声。她和拿着吉他的谢尔格跟谢辽萨和华丽雅都笑得透不过气来，互相抓住了手，跑进了奥列格家的厨房。他们一个个都像落汤鸡似的，浑身稀脏，可又是这样欢天喜地，所以维拉外婆一看见他们就举起罩着花衣袖的瘦长的胳膊，说道：

“哎哟，我的老天爷！”

像这样在德国人已经统治了三个多月的城市里，在没有生火的房间里，在油灯光下举行的这个晚会，他们有生以来还是头一次参加。

真奇怪，一张沙发上怎么能坐得下他们十二个青年人。他们互相紧挨着，低着头，轮流出声地读着报告，他们的脸上不自觉地反映出一部分人今天坐在收音机旁，以及另一部分人在这次踏着泥泞的夜征中所体验到的心情。他们的脸上反映出将他们中间某些人联系在一块、又像电流似的传给别人的爱，同时又反映出年轻的心灵在接触到人类的伟大思想、特别是在接触到能够表达他们目前生活中最重要事物的思想时所产生的那种共同的无比幸福之感。他们的脸上流露出友情、灿烂的青春、以及前途光明那种幸福的表情……置身在他们中间，连叶列娜·尼柯拉耶芙娜都感到自己是年轻而幸福的。只有维拉外婆因为年纪大，阅历多，只是用浅黑的手掌托着瘦削的脸，怀着某种担心和突如其来的爱怜凝望着这些年轻人。

青年们读完了报告，都沉思起来。外婆的脸上露出了狡猾的神气。

“嗳，小伙子们和姑娘们，”她说，“我望着你们，心里就想：这哪行呢？这么伟大的节日！你们朝桌上看看！那瓶酒可不是为了摆样子的！应当把它喝掉！”

“啊，我的姥姥，你是最好的姥姥！……来吧，来喝吧！……”奥列格叫起来。

要紧的是别大声地嚷。谁一提高嗓门，大伙就齐声嘘他，这使大伙觉得非常好笑。他们决定还是要轮流在房子附近望风；最有趣的是，谁要是向旁边的男同伴或是女同伴献殷勤或是得意忘形，就会被赶出去望风。

在正常情况下，白头发的斯巧巴很能高谈阔论，但是如果他喝了一点酒，他就只能讲他心爱的东西。他的满是雀斑的小鼻子上覆满了汗珠，他开始对他旁边的妮娜大讲其红鹤。大伙都嘘他，于是他立刻被赶到外边望风去了。他回来的时候正好大伙把桌子推到一旁，谢尔格正拿起吉他。

谢尔格弹奏的姿势是俄罗斯工人中间特别流行的那种俄罗斯式的、轻松随便的姿势，弹奏时弹奏者的整个姿势，特别是面部，对发生的事情要表现出漠不关心的神情：他既不看跳舞的人，不看观众，当然也不看乐器，他并不特别看着什么，而他的手却要自然而然地弹出令人非常想跳舞的曲子。

谢尔格拿起吉他，弹起战前很流行的一支外国波士顿舞曲。斯巧巴向妮娜冲了过去，他们就旋转起来。

这种外国舞当然数“女演员刘勃卡”跳得最好。男子中间却推杜尔根尼奇第一。他身材修长匀称、态度潇洒，是一个真正的军官。所以刘勃卡先跟他跳，然后跟奥列格跳，奥列格在学校里也算是一个最优秀的跳舞能手。

可是斯巧巴老是不肯放开一声不吭的、变得好像木头人似的妮娜，跟她跳各种舞，一面没完没了地向她解释，雄红鹤和雌红鹤的羽毛有多大的差别，雌红鹤会下多少蛋。

突然妮娜的脸涨得通红，变得难看起来，她说：

“斯巧巴，跟你跳舞真别扭，因为你太矮，老要踩我的脚，而且你尽说蠢话。”

她挣出他的怀抱，逃跑了。

斯巧巴想赶到华丽雅那里去，可是她已经跟杜尔根尼奇跳起来了。于是他只好拉住奥丽雅。这个姑娘安静严肃，比妹妹更不爱说话，所以斯巧巴尽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她大讲其不平凡的红鹤了。

可是他对于刚才受到的委屈还是耿耿于怀，在一个适当的机会就用眼睛搜寻了一下妮娜。她正在跟奥列格跳舞。奥列格从容沉着地转动着她的丰

满健美的身体，她的嘴唇上自然而然地露出微笑，眼睛里也闪现着喜悦，使她显得异常美丽动人。

维拉外婆忍不住嚷起来：

“这算是什么舞！外国人怎么会想出这种东西！谢辽查，来一个‘高巴克’①！……”

①“高巴克”是乌克兰的一种民间舞。

谢尔格连眉毛都没有动就改弹起“高巴克”来。奥列格两下就跳过整个房间，过去搂住外婆的腰。外婆毫不忸怩，轻快得出人意外地蹬着鞋子，马上跟他一起跳了起来。只要看她的深色裙边怎样平稳地在地板上旋转，就可以看出外婆舞艺的高超——她跳得很稳，她的那股冲劲与其说是在腿上，还不如说是在胳膊上，尤其是在她的面部表情上。

民族特色无论在哪里都不如在歌唱和舞蹈里那样发挥得淋漓尽致。奥列格的衬衫领子敞着，额上的头发底下冒出了汗珠，他带着一副调皮的神情，这种神情不是流露在他的嘴唇上，甚至不是在眼睛里，而是流露在微微抖动的眉梢上。他随便地、几乎是一动不动地昂着他的大头和肩膀，带着一股不要命的劲头，用蹲着跳的姿势跳起来，使人在他身上，也像在他外婆身上一样，一眼就可以看出是真正的乌克兰人。

明眸皓齿的美人儿玛丽娜为了过节戴上了所有的项链。她憋不住了，把鞋后跟一蹬，双手一摊，仿佛放出什么法宝似的，就旋风似的绕着奥列格跳起来。但是柯里亚舅舅追上了她，于是奥列格又抱住外婆的腰，他们就蹬着鞋后跟，分成两对跳起来。

“噢，累死人了，老骨头不成了！”外婆满脸通红，忽然叫了一声就倒在沙发上，用小手帕不住地扇着。

大家乱哄哄地动起来，鼓起掌来，跳舞中断了，但是对一切都无动于衷的谢尔格还在弹着“高巴克”，好像这一切跟他完全无关似的，后来他把手朝弦上一放，乐句弹到一半就戛然终止。

“乌克兰占上风了！”刘勃卡叫起来。“谢辽查！来一个咱们自己的吧！”

谢尔格还没有来得及拨动琴弦，她已经跳起“俄罗斯”舞，马上就那样抑扬有致地蹬着她的鞋跟，使人们除了望着她的脚，已经无暇旁顾。她就这样平稳地昂着头和双肩走了一圈，来到谢辽萨面前，把一只脚一蹬，又朝后退了几步，让一块地方给他。

谢辽萨带着俄罗斯工人无论在演奏或跳舞时特有的那种超然物外的面部表情，轻轻地蹬着那双修过多次的破皮鞋，态度随便地向刘勃卡走过去。他就这样恰如其分地走了几步，重又向刘勃卡走过去，接着把脚一蹬，后退了几步。她掏出小手帕，向他走去，蹬了一下脚，又轻盈地绕了个圈子，非常巧妙地昂着她的端然不动的头，只是偶尔几乎使人不可觉察地、随随便便地向观众略一回顾，在这回顾里，似乎只有鼻子在动。谢辽萨冲过去追她，两腿瞬息万变地倒动着，脸上仍然带着那种超然的表情，垂着双手，但是他对跳舞的那股忘我的热情，却是由他的两脚以随便的、有点滑稽可笑的劲头表现出来的。

刘勃卡随着吉他加速的节奏陡地变换了拍子，猛然朝谢辽萨转过身来，但是他仍旧向她进攻，带着这样不顾一切的神气、这样热烈的绝望的爱蹬着皮鞋，蹬得鞋子上小块的干泥巴都四下飞散。

他跳舞的特点是登峰造极的节奏感，——这是一种大胆，然而是深藏不露的大胆。刘勃卡却用她那丰满有力的腿做出鬼知道是什么样的动作，她

脸上泛出了粉红色，金黄色的鬈发起伏着，好像是纯金制成的一般。所有望着她的人，脸上都露出了这样的表情：“真不愧是‘女演员刘勃卡’！”只有对刘勃卡一往情深的谢尔格并不看她，他的脸好像老僧人定似的，只有他那刚健的神经质的手指迅速地在琴弦上移动着。

谢辽萨做了一个不顾一切的手势，仿佛把帽子在地上扣了一下，毅然决然地向刘勃卡走过去，一面随着音乐的节奏用小手掌拍着膝盖和鞋底，就这样把刘勃卡赶进包围着他们的观众的圈子，然后他们俩同时把鞋后跟一蹬，都停下了。周围响起了一片笑声和鼓掌声，刘勃卡却突然感伤地说：

“这就是咱们自己的……”

后来她就不再跳舞，只坐在谢尔格旁边，把一只雪白的小手搭在他的肩上。

这一天，“青年近卫军”总部得到地下区委的准许，发了一笔救济金补助某些经济最困难的军属。

“青年近卫军”的经费来源与其说是队员缴纳的队费，还

不如说是靠暗中出售他们从德军卡车上偷来的香烟、火柴、衬衣、各种食品、特别是酒精得来的钱。

午后，沃洛佳去看他的姑姑玛鲁霞，交给她一包苏联纸币：它们和马克同时流通，不过价值非常低。

“玛鲁霞姑姑，这是我们地下工作者送给你和卡列丽雅·亚力山德罗夫娜的。”沃洛佳说，“给孩子们买点东西庆祝一下伟大的节日吧……”

卡列丽雅·亚力山德罗夫娜是玛鲁霞姑姑的邻居，也是一位指挥员的妻子。她们两家都有孩子，两家都非常贫苦：德国人非但把她们抢劫一空，还用卡车搬走了大部分家具。

卡列丽雅·亚力山德罗夫娜和玛鲁霞姑姑决定用请客来庆祝节日，她们买了点私酿烧酒，烤了一点白菜和土豆馅的麦饼。

卡列丽雅·亚力山德罗夫娜跟母亲和孩子住在一起，到八点钟的时候，沃洛佳的母亲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他妹妹刘西雅、玛鲁霞带着两个小女孩，都在她家会齐。青年人推说要到同学家里去，答应晚些来。大人喝了一点酒，因为这样的节日却不得不偷偷地庆祝而嗟叹了一阵。孩子们轻轻地唱了几支苏联歌。母亲们都流了泪。刘西雅觉得非常无聊。

后来她们打发孩子们去睡了。

若拉来得相当晚。他浑身烂泥，一到光亮的地方，就感到非常不好意思，加上青年人都没有来，他只好坐在刘西雅旁边。由于不好意思，他只喝了刘西雅端给他的半杯烧酒就醉了。等沃洛佳和“雷响”托里亚来的时候，若拉神情非常抑郁，连同学们的到来都没有能使他摆脱这种失望的状态。

两个青年人也喝了点酒。大人们只顾自己谈话。刘西雅听了这几个青年人交换的一言半语，就已经明白，他们并不是做客去的。

“在哪儿？”沃洛佳隔着“雷响”托里亚向若拉弯过身去，轻声问道。

“医院。”若拉阴郁地回答。“你们呢？”

“我们的学校……”沃洛佳的狭长的深色眼睛闪耀着大胆和狡猾的光辉，把身子更弯向若拉，兴奋地凑着他的耳朵说起来。

“怎么样？不是假的吧？”若拉有一霎时摆脱了原来的状态，问道。

“不，是真的！”沃洛佳说，“学校很可惜，不过没关系，将来我们再盖新的！”

刘西雅因为他们瞒着她在干什么秘密活动很生气，就说：

“你要是约了人来，就该待在家里。整天有一些男孩子和女孩子跑来打听：‘沃洛佳在家吗？沃洛佳在家吗？’”

沃洛佳笑起来，打岔说：“我——就像瓦西卡·布斯拉依①一样：‘大伙都到瓦西卡家里来！’”

①瓦西卡·布斯拉依即瓦西里·布斯拉耶夫，古代诺夫哥罗德壮士歌中的主人公，勇敢豪迈，酷爱自由。

生着一头灰色的鬈发、四肢骨骼粗大的“雷响”托里亚突然站起身来，不十分清晰地说：

“我向大家祝贺伟大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

他因为喝醉了，胆子壮起来。他两颊通红，眼睛里露出狡猾的神气，开始拿一个叫费莫奇卡的姑娘来打趣沃洛佳。

若拉并不专对着什么人，用他的亚美尼亚人的黑眼睛阴沉地望着面前的桌子，说道：

“当然，这并不合乎时代，但是我很了解毕巧林①……当然，这也许不符合我们社会的精神，但是在某些场合，他们正是罪有应得……”他沉默了一会，又阴郁地加了一句：“我指的是女人……”

①毕巧林是俄国作家莱蒙托夫（1814—1841）所著长篇小说《当代英雄》中的主人公。

刘西雅引人注意地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到“雷响”托里亚面前，温柔地吻着他的耳朵，一面说道：

“亲爱的托里亚，你完全醉了。”

总之，出现了这样不协调的气氛，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就带着她素有的急躁和处理问题的实际态度说，该各自回家了。

玛鲁霞姑姑因为要料理家务和照顾孩子，一向是天一亮就醒。她把脚伸进拖鞋，披上家常的衣服，很快地生起炉子，放上水壶，一边想着心事走到对着空地的窗前。空地左面是儿童医院和伏罗希洛夫学校的校舍，右面山岗上是区执委会和“疯老爷”的房子。突然，她发出一声轻轻的叫喊……在阴霾满布、奔驰着低低的碎云的天空下面，在伏罗希洛夫学校的校舍上，迎风招展着一面红旗。风时而非常有力地把它拉紧，使它整个伸展成一个抖动的长方形，时而又把它微微放松，那时它就打着皱褶垂下来，它的边缘不住地卷起又展开。

在“疯老爷”的房子上飘扬着一面更大的红旗。一大群德国兵和几个穿便服的人站在搁在房子旁边的梯子附近，仰望着旗子。梯子上站着两个兵士，一个站在梯子搭着房顶的地方，另外一个站得低些，他们时而望望红旗，时而跟站在下面的人交谈几句。但是不知为什么他们谁也不肯再往上爬，去把红旗拔掉。在这最高点上，红旗庄严地飘扬着，全城都望得见。

玛鲁霞姑姑糊里糊涂地甩掉拖鞋，把脚伸进皮鞋，连头巾也不披，头也不梳，就跑去找她的邻居去了。

卡列丽雅·亚力山德罗夫娜穿着贴身的衬衣，微肿的腿正跪在窗台上，两手抓住窗框，脸上带着欣喜欲狂的表情望着红旗。眼泪顺着瘦削、黝黑的面颊滚滚地流下来。

“玛鲁霞！”她说，“玛鲁霞！这是为我们苏联人挂的。他们记得我们，我们并没有被我们的人遗忘。我……我祝贺你！……”

于是她们就互相扑过去拥抱起来。

第四十九章

红旗不仅在“疯老爷”的房子和伏罗希洛夫学校上面飘扬。红旗也在第十办事处，在以前的区消费合作社，在十二号、七至十号、新二号、新一号等等矿井上面，在五一村和克拉斯诺顿村的矿井上面飘扬着。

老百姓从城区的四面八方汇集来看红旗……一些大厦和放行亭旁边挤得水泄不通。宪兵和“警察”为了驱散人群，累得筋疲力尽，但是他们谁也不敢去把旗子取下；每面旗子底下都系着一块白布，上面写着黑字：“埋有地雷”。

芬庞军士爬到伏罗希洛夫学校校舍的顶上，发现有一根电线从红旗那里通进阁楼的窗口。阁楼的房顶下面果然有一枚地雷，甚至没有遮蔽起来。

宪兵站或党卫队里都没有人会排除地雷。宪兵站长勃柳克纳派自己的汽车到罗文基的区宪兵队去接地雷工兵。但是连罗文基也没有地雷工兵，于是汽车又直驶伏罗希洛夫格勒。

下午一点多钟，从伏罗希洛夫格勒来的地雷工兵排除了学校阁楼上的地雷，可是其他地方却都没有发现地雷。

在克拉斯诺顿有人悬挂红旗来庆祝伟大十月革命节的消息，传遍了顿涅获矿区所有的城市和乡村。德国宪兵站的这件丢脸的丑事已经瞒不过在尤佐夫卡的本州野战司令克列尔少将。所以勃柳克纳宪兵站长奉命无论如何要破获地下组织，否则就要取消他肩章上的银线，把他降为士兵。

勃柳克纳宪兵站长对于他要去破获的组织毫无概念，他采取的办法是任何宪兵队和秘密警察处于他的地位都会那样做的，那就是他又撒下了他的“密网”（以前谢尔格曾这样称呼过它）：在城里和区里逮捕了好几十个无辜的人。但是不管这个网有多密，它仍然没有能捉到悬旗事件的主使人——区党委里的什么人，也没有捉到“青年近卫军”的一个队员。德国人再也没有料到，实际上完成这件工作的组织竟会是由一批男孩和女孩组成的。

确实也是令人难以料到这一点，如果在最恐怖的逮捕之夜，出色的地下工作者斯巧巴却歪着他的长着白发的脑袋，吮着铅笔在他的日记本上写下了这样的话：

五点钟谢尼卡来找我，叫我到“鸽房”去做客，他说：那边有漂亮姑娘。我们去了，坐了一会，有两三个姑娘还不错，可是其余的都不行……

十一月下半月，“青年近卫军”从各个庄子里的自己人那里获悉，德国人正把一大群牲口，有一千五百头之多，从罗斯托夫州赶到后方去。这群牲口已经在卡缅斯克附近过河到了顿涅茨河右岸，在顿涅茨河与卡缅斯克—贡多罗夫斯卡雅大道中间移动。押送这群牲口的除了几个来自顿河的乌克兰牧人之外，还有一个携带步枪的警卫队——后勤部队里十二三个上年纪的德国兵。

就在得到这个消息的当天夜里，谢辽萨、彼得罗夫和莫什柯夫的三个小组都带着步枪和自动枪，集中在流入北顿涅茨河的一条小河河岸上的林木郁茂的山谷里，待在那条大道通过的木桥附近。侦察员报告说，在离他们约莫五公里的地方，牧人和兵士们扒开了粮垛来喂牲口，就让牲口在这些粮垛

中间过夜。

下着冰冷的夹雪的大雨，雪融化着，在脚底下变成稀泥浆。青年人的脚上从草原带来的烂泥有几普特①重，他们挤做一团，靠身上的热气来互相温暖，一面开着玩笑说：

“真不错，进了疗养所了！”　　①普特是俄国重量单位，一普特合十六·三八公斤。

黎明显得这样阴暗、朦胧、昏沉，久久没有清醒过来，它好像在犹豫：“天气这样恶劣，值不值得起来，要不要回去再睡上一觉！……”但是责任感在黎明心里战胜了早晨种种贪懒的念头，于是黎明来到了顿涅茨大地上。在雨、雪和雾的混合物中可以看得见三百步以内的东西。

这三个小组都由杜尔根尼奇率领，青年人奉了他的命令，埋伏在小河的右岸，——德国人应当从那边走出来过桥，——用冻得弯不过来的指头端着步枪准备着。

奥列格也来参加这次行动。斯塔霍维奇也来了，他们把他带出来，以便在战斗中考验他。他们俩也趴在那边岸上，不过在下面一点的河湾上。

自从斯塔霍维奇被开除出总部以来，在这一段时间里他参加了“青年近卫军”的许多工作，差不多已经恢复了他的好名声。他能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因为在“青年近卫军”大多数队员的心目中，他的名誉根本就没有丧失过。

即使原则性很强的人，有时也难免会犯温情主义，因此，人们如果对某人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的固定看法，就非常不愿意改变它，甚至认为似乎不便改变它，尽管不容驳斥的事实已经证明，此人根本不像他表面给人的印象那样。“他会改好的！……我们谁也不是没有弱点。”人们在这种场合总这样说。

非但是对于斯塔霍维奇的为人一无所知的“青年近卫军”的普通队员，就连大部分接近总部的人，对斯塔霍维奇的态度也照旧没变，好像他没有出过什么问题一样。

奥列格和斯塔霍维奇默默地趴在一座遍地落叶的灌木丛里，观察着湿淋淋的、光秃的、小丘起伏的地形，透过在迷雾中飘动的雨雪之网，尽目力所及望得远些。而迎着他们，已经越来越响地传来了千百头牲口的各种各样的哞哞声，这些声响融成一片刺耳的噪音，好像是魔鬼在吹他的风笛。

“它们渴了。”奥列格轻轻地说，“他们会让它们在小河里喝水。这对我们正合适……”

“你看！你看！”斯塔霍维奇兴奋地说。

在他们的左前方，在迷雾中出现了一片红色的头：一个头、两个头、三个头、十个头、二十个头、许许多多的头，都生着古里古怪的细角，这细角几乎是笔直往上长，尖尖的角端再朝里弯。头倒是像母牛的头，但是普通的母牛，即使是无角母牛，虽没有角，在两耳中间也有两个像瘤一样明显隆起的地方，而角就是由这里长出来的。隔着弥漫在地面的浓雾虽然还看不见这些动物的躯体，可是看得出，它们的角是直接从光滑的头顶长出来的。它们，这群动物，就像喀迈拉①一样从迷雾里出现了。　　①喀迈拉是古希腊神话中狮头蛇尾羊身的吐火的巨怪。

它们大概不是这个畜群中的第一批，而是左翼最靠边的一批。在它们后面很远的地方，可以听到一片有力的吼声，可以感到有无数互相磨蹭着的

躯体的有力的移动和上千只牛蹄震撼着大地的声音。

就在这时，奥列格和斯塔霍维奇又听到从前面大路右方渐渐临近的兴致勃勃的德语谈话声。听他们的声音就可以感觉得出，这批德国人已经休息过了，情绪很好。他们精神饱满地在烂泥里走着，皮靴发出咕吱咕吱的响声。

奥列格和斯塔霍维奇伛着身子，几乎是奔跑着转移到青年们趴着的地方。

杜尔根尼奇左臂挂着自动枪，站在岸上一个粘土质的小峭壁旁，离桥不过十米，他从湿漉漉的枯草丛中微微探出头来望着大路的远方。他脚边坐着好像是怒冲冲的、淡红色头发的莫什柯夫。莫什柯夫脖子上围着毛线围巾，左臂也挂着自动枪，朝桥上望着。青年人一个跟在一个后面趴着，跟河岸形成一条对角线。这条线上最前面的是谢辽萨，最后一个是维克多，他们俩也都带着自动枪。

奥列格和斯塔霍维奇在莫什柯夫和谢辽萨的中间趴下。

那批上年纪的德国兵的悠然自得的谈话声似乎已经到了头顶上。杜尔根尼奇屈下一膝，端着自动枪准备着。莫什柯夫趴了下去，拉好卷起来的湿棉衣，也端起自动枪。

奥列格带着天真稚气的神气望着桥上。忽然桥上响起一阵皮靴声。一群德国兵，穿着泥污的大衣，有的随随便便地抓着步枪的皮带，有的把步枪甩在背后，走上桥来。

在前面的几个兵士中间，有一个蓄着中世纪德国雇佣兵①式的浓密浅色胡子的高个子上等兵。他边走边讲着什么，不时回过头去，好让后面的人也能听到他的话。他四面张望着，常常朝趴在岸上的青年人那边转过脸去，兵士们也怀着行人对陌生地方的不自觉的好奇望着桥下左右两面的河水。但是他们没有料到会在这里发现游击队，所以也就没有看见他们。

① 德国雇佣兵是十五至十七世纪常被德国诸侯用来镇压农民起义的军队。

就在这一瞬间，杜尔根尼奇的自动枪已经发出一连串尖锐的、震耳欲聋的响声，跟着他开枪的是莫什柯夫，还有别的人，接着步枪的子弹也纷飞起来。

这一切发生得这样突然，而且跟奥列格想象的不一样，所以他竟没有来得及开枪：在最初一瞬间，他是怀着孩子般的惊奇望着这一切，后来他心里一动，才想起他也该开枪，但是在这一瞬间，一切都已经结束了。桥上已经看不到一个兵士；大部分兵士都倒下去了，刚上桥的两个兵士正回身朝大路上逃跑。谢辽萨，后面跟着莫什柯夫，再后面是斯塔霍维奇，都一跃跳上河岸的上部，开枪把他们打死。

杜尔根尼奇和另外几个青年跑到桥上。那边还有一个德国兵蜷缩着，他们把他也干掉了。然后他们拖着这批兵士的腿把他们全部拖到矮树丛里，以免被大路上走过的人看见，武器就随身带走。牲口在河边排着，长达几公里，它们都在喝水——有的就站在岸边喝，有的把两条前腿或者四条腿都站到水里去喝，有的涉水到对面去喝，——它们喝着水，扇动着潮湿的鼻翼，发出非常有力的、连续不断的吸水声，好像这里有几只水泵在开动。

在这个浩浩荡荡的畜群里，夹杂着红色的、蓝灰色的、有花斑的、行动非常迟缓的普通耕牛；粗角、宽胸，好像用铁铸在分趾蹄上的种牛；品种不同的母牛，姿态优雅的没有生过牛犊的母牛和两胁鼓起、奶没有挤掉、乳房膨胀、红红的乳头鼓胀着的、正在发情期的母牛；形状奇怪、不跟别的牛

混在一起、颜色浅红适中、两只角直接从平坦的头顶长出来的牛；高大的、白毛上带着黑花和红花的荷兰牛，它们带着这一身花纹，样子庄重，好像它们是头上戴着软帽、身上围着围裙似的。

赶牛的牧人都是些年迈的老大爷。他们在自己的生涯中好像染上了他们放牧的牛群的慢吞吞的脾气，再不就是在战争中习惯了命运的变幻无常，所以他们并不注意就在近旁发生的射击，却在畜群后面的一块湿地上团团坐下，抽起烟来。

但是他们一看到这批带枪的人，马上就站了起来。

青年人恭敬地脱帽向他们问好。

“你们好，同志先生们！”一个样子像蘑菇、两脚朝外撇的老头说，他穿的麻布衬衫上加了一件没有鞣过的羊皮背心。

他手里拿的是短柄皮鞭，跟别人拿的很长的赶牛鞭不同；从这一点看来，他大概是他们的领队。显然，他想让他的伙伴们安心，就扭过头去对他们说：

“这是游击队！……”

“对不起，诸位。”奥列格又把帽子略微提了一下再戴好，说道：“德国人的警卫队已经被我们解决了，请你们赶快把牲口赶到草原上去让它们散开，免得落到德国人手里……”

“唔……赶散！”沉默了一会之后，另外一个样子灵活的矮老头说，“这是我们自己的牲口，从顿河赶来的，我们干吗要让它们流落在外地？”

“怎么，你们还打算把它们赶回去吗？”奥列格咧开嘴笑着说。

“不错，赶是赶不回去了。”矮老头马上忧郁地对奥列格的说法表示同意。

“要是把它们赶散，也许还会被自己人牵去……”

“哎—哟—哟！这么一大群！”矮老头捧住了头，突然又是绝望又是得意地说。

大家这才懂得，这些老头被迫把大批牲畜从故乡赶往人地生疏的德国，心里是什么滋味。青年人不禁可怜起牲畜和老头来了。但是事情又不容拖延。

“老大爷，把你的鞭子给我！”奥列格说了就从矮老头手里拿过赶牛鞭，朝畜群走去。

这群阉牛和母牛慢慢地喝足了水，解了渴，逐渐走到对岸去。一部分牛分散开来，朝光秃潮湿的地面呼着气，搜寻残留的干草。一部分牛让雨淋着脊背，没精打采地站着或是四面张望着，好像在说：牧人们，你们在哪里，今后我们怎么办呢？

奥列格仿佛是驾轻就熟，非常有把握地、不慌不忙地在有的地方用手一推，有的地方拍拍牛的肚子或是脖子，有的地方打着响鞭，在畜群中间给自己开出一条路。他过了河，挤进牲口最密集的地方。穿羊皮背心的老头拿着鞭子过来帮忙。

其余的老头和全部青年人也都跟了过来。

他们吆喝着，用鞭子抽着，花了不少工夫才好不容易把这群牲口分为两股。

“不，这不是办法。”穿羊皮背心的老头说，“还是用自动枪扫射吧，反正是个完蛋……”

“哎—哟—哟！……”奥列格好像痛苦得皱着眉头，可是几乎在同一刹那，他脸上就不自觉地露出了残忍的表情。他从肩上摘下自动枪，朝牲口群

里扫了一梭子弹。

几头阉牛和母牛倒了下去；另外有几头受了伤，吼叫着呻吟着向草原上直奔。整个这一半的牲口嗅到了火药味和血腥气，也扇形地朝草原上拥过去，震得大地都发出隆隆的声音。

谢辽萨和莫什柯夫也用自动枪朝另外一半畜群开枪，那一半牲口也跑走了。

青年人跟在后面跑着，碰到有几十头牛挤在一块，就朝它们开枪。整个草原都充满了枪声、牲口的哞哞声和吼叫声、牛蹄的顿踏声、鞭子的抽打声，以及人们的可怕而凄厉的吆喝声。有一头种牛在奔跑时中弹，突然停下来，慢慢地弯下前腿，鼻孔朝下重重地向前栽下去。有一些中弹的母牛哞叫着抬起它们美丽的头，又无力地垂下去。周围这一带，遍地狼藉着牛的尸体，在笼罩着迷雾的黝黑的土地上呈现着一片红色……

在青年们一个个地散开、各自回家的时候，他们还久久碰到在草原各处流浪的阉牛和母牛。

过了一会，在草原上空升起一缕袅袅的细烟。这是谢辽萨受杜尔根尼奇的委派，放火烧那座直到如今还奇迹般完整无恙的木桥。

奥列格和杜尔根尼奇一路回去。

“你注意到没有，这些母牛的角好像是直接从头顶上长出来的，到了上面又朝里弯，几乎要碰在一起？”奥列格兴奋地问道。“这是萨尔斯克草原东部的牛，说不定还是阿斯特拉罕草原的牛呢。这是印度种……还是金帐汗国①时代留下来的……”

①金帐汗国是十三世纪上半叶蒙古的汗拔都在中亚细亚和东欧广大地域上建立的封建汗国。

“你怎么会知道的？”杜尔根尼奇将信将疑地问道。

“我小时候，我的继父每逢为了这些事情东奔西走的时候，总带我去，他在这方面是个行家。”

“今天斯塔霍维奇倒表现得挺好！”杜尔根尼奇说。

“是—是的……”奥列格迟疑地说。“那时候我跟着继父到处跑。你知道吗，德涅泊河、阳光、草原上的大牲畜群……那时候谁能想到我……想到我们……”奥列格又好像痛苦得皱着眉头，把手一摆，一直到家都没有再开口。

第五十章

自从德国人用欺骗手段把第一批城里的居民赶到德国去之后，人们都学乖了，懂得这对他们有怎样的危险，就设法逃避，不到职业介绍所去登记。

德国人到他们家里和街道上搜捕他们，好像奴隶制时代在丛林里搜捕黑人那样。

由野战司令部第七科在伏罗希洛夫格勒出版的《新生活报》，逐期登载被赶往德国的子女们写给他们亲人的信，从信上来看，好像他们在德国过着丰衣足食的自由生活，工资也很优厚。

克拉斯诺顿偶尔也接到青年人的来信，他们大多是在东普鲁士做最低下的工作——当雇工和女仆。来信没有经过检查机关的涂改，从字里行间可

以猜出许多言外之意，但是信里只简略地谈到生活的表面情况。不过大多数的父母却根本接不到来信。

在邮局工作的一个女人告诉邬丽亚，从德国寄来的信件都归宪兵队专派到邮局的一个懂俄语的德国人检查。他把信件扣留下来，锁在桌子的一只抽屉里，等积压多了再把它们烧掉。

邬丽亚受“青年近卫军”总部的委派，来负责反对招募青年人以及把他们赶往德国的全部工作：邬丽亚写传单，散发传单，把有被赶走危险的青年们安顿在城里工作，或是靠娜塔丽雅·阿列克谢耶芙娜帮忙取得因病豁免的证明，有时甚至把登了记又逃跑的人藏在各个庄子里。

邬丽亚来做这件工作不仅因为是受委派，同时也是出于一种内心的责任感：大概，她因为未能帮助瓦丽雅逃避可怕的命运而感到有些内疚。加上她和瓦丽雅的妈妈都得不到瓦丽雅的任何消息，这种内疚的心情便愈来愈使她苦恼。

十二月初，靠邮局里那个女人帮忙，五一村的青年人夜间从检查员的桌子里偷出一批没有投递的信，现在这些信就放在邬丽亚面前的一个布袋里。

随着寒冷的到来，邬丽亚又搬回屋子里和全家住在一块。像大部分“青年近卫军”的队员一样，邬丽亚也把她参加组织的事瞒着家里。

当父母为她担惊受怕，要设法为她找工作的时候，她曾经历了不少痛苦的时刻。母亲卧病在床，一会用她那双大野鸟似的黑眼睛狂乱地望着她，一会哭起来。而老马特维·马克西莫维奇却多年来第一次斥骂了女儿。他的脸直到愈来愈秃的头顶都涨得发紫。尽管父亲的骨骼魁伟，拳头很大，但是看了他的愈来愈秃的头上剩下的鬈发和他对女儿无可奈何的情景，却使人觉得他十分可怜。

邬丽亚说，只要父亲和母亲再说一句嫌她在家吃闲饭，她就要离开这个家。

马特维·马克西莫维奇和玛特辽娜·萨维里耶芙娜都着了慌：她是他们的爱女啊。于是第一次看出来，老马特维·马克西莫维奇已经管不住女儿，母亲也因为病重，不能坚持自己的主张。

邬丽亚因为要隐瞒自己的活动，所以对于做家务事特别卖力。如果她出去的时间久了，就推说因为生活备受屈辱、内容贫乏，只有跟女友们谈谈才能一吐积郁。可是她愈来愈经常地发现母亲对她的悲哀而长久的凝视，——母亲好像望进了她的灵魂。而父亲甚至好像怕见邬丽亚，有她在场的时候他大都是一声不吭。

阿纳托里的情况就不同了：自从父亲上了前线，阿纳托里就成了一家之长。母亲塔伊西雅·普罗柯菲耶芙娜和小妹妹都崇拜他，样样事情都听他的。所以现在邬丽亚并不是在自己家里，而是在阿纳托里家里，——这一天他到苏霍多尔去看李丽亚去了，——她坐在这个信袋面前，把细长的手指伸进被检查机关剪开的一封封信，取出信笺，草草地浏览一下头几行，就丢在桌上。

一个个的姓名、对父母姊妹的朴实动人的称呼以及习惯的问候在邬丽亚眼前闪过。信多极了，单把它们浏览一下也花了她不少的时间。但是其中并没有瓦丽雅的来信……

邬丽亚伛着身子坐着，双手放在膝盖上，脸上带着一筹莫展的表情望

着前面……屋子里静悄悄的。塔伊西雅·普罗柯菲耶芙娜和阿纳托里的妹妹已经睡了。小小的灯火和从火焰端冒出的一缕油烟随着邬丽亚的呼吸摇曳着，时起时落。她头上的挂钟用它那难听的声音数着分秒："滴—答……滴—答……"阿纳托里家的小房子和邬丽亚家的小房子都是跟村子隔开的，所以邬丽亚从小就有着一种他们的生活是和外界隔绝的感觉，尤其是在秋天和冬天的夜晚。阿纳托里家的小房子结构坚固，已经略带冬意的尖细的风声勉强能透过百叶窗传进来。

在这个充满神秘险恶的音响的世界里，对着这时起时落的灯焰，邬丽亚觉得自己完全是孑然一身，形单影只……

造物为什么要这样安排，使人永远不能向别人倾吐衷肠？……为什么像邬丽亚和瓦丽雅那样从幼年时代心灵就融洽无间，而她邬丽亚却不能抛弃自己的家，排除日常对家务的操心，放弃种种的生活习惯，抛下亲人和朋友，全力以赴地去营救瓦丽雅呢？为什么不突如其来地在那里出现，到她身旁去，擦干她的眼泪，替她打开通向自由的道路呢？……"因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你把你的心不单献给了一个瓦丽雅，——你把它献给了祖国土地的解放事业。"内心的声音这样回答她。"不，不，"她自言自语地说，"你不要寻找借口替自己辩护，甚至在还不嫌晚的时候你也没有去做这件事，因为你心里没有感情，你原来也跟大伙是一样的。"

"但是这件事难道现在就办不到了吗？……"邬丽亚心里想。于是她陷入了天真的幻想：她找到一批勇敢的、乐于服从她的号召的人，他们克服了重重障碍，骗过了一个个德国警卫司令，于是在那里，在那可怕的国家里，邬丽亚找到了瓦丽雅，对她说："我尽了一切力量，我不惜自己的生命来救你，现在你自由了……"啊，要是能够这样就好了！……但是这是不可能的。没有这样的人，而她邬丽亚又势单力薄……不，一个朋友——一个男青年——就能办到这件事，要是瓦丽雅有这样的朋友的话。

但是她，邬丽亚自己又何尝有这样的朋友呢？要是邬丽亚落到这种地步，有谁肯来为她这样出力？她没有这样的朋友。恐怕世界上也找不出这种朋友……

但是世界上不是总有一个人会被她爱上的吗？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她描绘不出他的模样，但是他活在她的心里，——他高大、强壮、真诚、目光勇敢而和善。一种难以言传的对恋爱的渴望使她心潮澎湃。闭上眼睛，忘掉一切，献出自己的一切……在她的反映出朦胧的金色灯焰的黑眼睛里，这种感情的强烈的、欢乐的反光时而闪耀，时而消失……

忽然有一声好像是呼唤似的低幽的呻吟传入邬丽亚的耳朵。她全身颤抖了一下，她的轮廓纤细的鼻孔也颤抖起来……不，这是阿纳托里的妹妹在睡梦中发出的一声呻吟。大堆信件仍放在邬丽亚面前的桌上。一缕缕游丝似的油烟从小火舌上冒出来。从百叶窗外面微微传来低低的风声。挂钟老是在数着它的"滴—答……滴—答……"

邬丽亚的面颊上泛出了红晕。连她自己也不明白她有什么事情需要感到羞愧：是因为她沉湎于幻想放下工作不做呢，还是因为在她的幻想中有某种她不好意思再往下想的念头呢？于是她对自己生起气来，开始细心翻阅，寻找可以利用的信件。

邬丽亚站在奥列格和杜尔根尼奇面前，说：

"唉，要是你们能把那些信读一遍哪！真是可怕！……娜塔丽雅·阿列

克谢耶芙娜说，在这段时间里，德国人已经从城里弄走了将近八百人。而且已经又拟定一张一千五百人的黑名单，有地址和其他种种材料……不，应当采取恐怖手段，或是在他们要送走一批人的时候进行袭击，或是把这个施普利克打死！……”

“打死他是应该的，不过他们还会派一个新的来。”奥列格说。

“消灭这些名单……我知道怎么办：应当放火烧掉职业介绍所！”她带着复仇的表情突然说道。

谢辽萨和刘勃卡由维佳协助来一同完成的这件工作，是“青年近卫军”所做的最难办的工作之一。

这几天已经有了冬意，到夜里冻得相当厉害，街上的泥块和汽车在烂泥里压出的沟槽也冻得挺硬，一直到晌午太阳晒得暖洋洋的时候，才有些融化。

集合地点在维佳家的菜园里。他们沿着铁路支线走，然后在没有路的山岗上走。谢辽萨和维佳带着一桶汽油和几只燃烧瓶。他们都带着武器。可是刘勃卡的全部武器却只有一瓶蜜汁和一份《新生活报》。

夜是这样地静，连最轻微的声音都听得见。只要绊一下或是不小心把油桶弄得发出丁当的响声，就会把他们暴露。夜又是这样地黑，像他们那样熟悉地形的人，有时都不能确定他们是到了什么地方。他们跨一步，站下来听听，然后再跨一步，又站下来听听……

时间拖得无穷无尽的长，好像永无尽头。尽管这种情形非常奇怪，但是等他们听到职业介绍所旁边哨兵的脚步声，他们反倒不大害怕了。在黑夜里，哨兵的脚步声时而清晰可闻，时而完全消失，也许这时候他是站下来倾听，也许不过是在台阶旁边休息片刻。

职业介绍所的正面很宽，台阶面对着农业指挥部。他们还没有看到它，但是根据哨兵的脚步声，知道他们已经来到职业介绍所的侧面，所以他们就从左面绕过它，打算从长长的后墙那边进去。

为了减少响声，维佳就留在这儿离职业介绍所大约二十米的地方，谢辽萨和刘勃卡俩悄悄地走到窗前。

刘勃卡在下面一扇窗子的长方形玻璃上涂满了蜜，再贴上报纸。谢辽萨用力压玻璃，使它破裂而不碎落，然后把碎片取下。做这种工作需要有耐性。他们用同样的办法处理了第二扇玻璃窗。

搞完这个他们休息了一会。哨兵在台阶上踏步，显然他觉得很冷，因此他们只好耐心等他走开：他们怕他在台阶上会听见刘勃卡在屋子里走动的脚步声。哨兵一走，谢辽萨就把身子略微往下一蹲，把双手十指交叉，伸到刘勃卡面前。刘勃卡抓住窗框，一只脚踩在谢辽萨的手上，把另一只脚跨过窗台，又用一只手抓住里面的墙，骑上了窗台，这时她感到窗框下部的板条硌她的腿。但是她已经顾不得这些小事。她把那条腿慢慢地伸下去，让它碰到地板。现在刘勃卡已经进到里面了。

谢辽萨把汽油桶递给她。

她在里面待得时间相当久。谢辽萨非常担心，生怕她在黑暗里撞在桌椅上。

等刘勃卡又在窗口出现的时候，她身上已经散发出强烈的汽油味。她对谢辽萨笑笑，把一条腿跨过窗台，再把一只手和头伸出来。谢辽萨夹住她的胳肢窝，帮她爬出窗口。

谢辽萨一个人站在发出汽油气味的窗口，一直等到他估计刘勃卡和维佳已经走得相当远的时候。

那时他从怀里摸出一只燃烧瓶，使劲把它扔进窗洞里。爆燃的火光非常强烈，有一霎时竟照得他眼花缭乱。他没有再扔其余的几瓶，就沿着山岗朝铁路支线奔去。

哨兵喊叫着，在他后面开枪，有一颗子弹高高地在他头顶上嘘的一声飞了过去。周围的地形一会被一种死白色的光照亮，一会又隐入黑暗。突然一根火柱腾空而起，把四周照得如同白昼一般。

这一夜邬丽亚和衣躺着。她有时蹑手蹑脚地（免得惊醒别人）走到窗前，微微掀开黑窗帘的一角。但是周围是一片漆黑。邬丽亚在为刘勃卡和谢辽萨担心，有时她觉得她不该想出这个主意。长夜漫漫，邬丽亚疲不可支，不觉打起盹来。

突然她醒了过来，向门口冲去，轰隆一声撞倒了椅子。母亲也醒了，吃惊地、迷迷糊糊地问了一句，但是邬丽亚没有回答她，只穿一件单衣服就冲到院子里。

山岗后面的城市上空红光满天，可以听到遥远的枪声，邬丽亚觉得她还听到了喊叫声。

火光的反照甚至把这辽远城区人家的屋顶和院子里的边屋都从黑暗中显现出来。

但是火景并没有在邬丽亚心里引起她所期待的那种感觉。天空的火光和它在边屋上的反照、叫喊声、枪声和母亲的惊骇的声音，——这一切在邬丽亚心中交织成一种模糊的担心的感觉。她是在为刘勃卡和谢辽萨担心，她特别担心的是：怕在这样搜索他们的时候会影响到他们的整个组织。她又担心，怕在这次迫不得已而采取的危险的破坏活动中会使她丧失存在于世界上和她在自己心灵里感到的那种至高至善的东西。这种担心害怕的滋味，邬丽亚还是初次体验到。

第五十一章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在伏罗希洛夫格勒州各区的几十架秘密的收音机，收听了苏联情报局的《最新消息》，获悉苏军已经切断供应斯大林格勒城下德军战线的两条铁路，俘获了大批俘虏。普罗庆柯一步一步地、一天一天地准备起来的，受他指导的那全部看不见的地下工作突然公开化，开始采取全民运动的规模来反对“新秩序”了。

每天都有苏军在斯大林格勒城下节节胜利的消息传来。于是那原先像期待、像希望一般在每个苏联人心里朦胧发光的一切，突然像沸腾的热血涌上他的心头：“他们要来了！”

十一月三十日清晨，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像平时一样提着奶桶来给刘季柯夫送牛奶。刘季柯夫丝毫没有改变从他进厂工作以来所规定的生活秩序。这是星期一早上，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看到刘季柯夫已经穿上他那套因为经常接触金属和机油而发亮的旧衣服，——他准备去上工。从前，

在被占领以前，刘季柯夫在工作时间也穿这套衣服。他到了他的小小的办公室，再罩上一件蓝色长工作服。不同的只是从前这件工作服就放在办公室的柜子里，现在刘季柯夫是把它卷起来夹在腋下带着。工作服已经放在厨房里的矮凳上，等待他吃完早点去拿。

从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的脸上，刘季柯夫知道她又带来了消息，而且是好消息。刘季柯夫和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出于礼貌跟彼拉盖雅·伊里尼奇娜说笑了几句，（虽然这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在他住在她们家的这几个月里，彼拉盖雅·伊里尼奇娜始终那样，从没有流露出她觉察到什么。）

就走进他的小房间去了。

“瞧，这是特地为您抄来的……昨天晚上收的。”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激动地说，她从怀里摸出一张密密麻麻地写满小字的小纸片。

昨天早上她带给他的是苏联情报局关于苏军在中线、在维里基—鲁基和尔热夫地区大举进攻的《最新消息》。现在这是我军到达顿河东岸的消息。

刘季柯夫半晌一动不动地望着那张纸条，然后抬起严峻的眼睛望着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说：

“完蛋了……希特勒完蛋了……”

据目击者说，德国兵投降时说的就是他用的这些词。但是他说这话的时候态度非常严肃，并且拥抱了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她眼睛里涌出了喜悦的泪水。

“要复制吗？”她问。

最近他们几乎没有散发自己的传单，而是散发苏联飞机在约定地点投下来的铅印的苏联情报局的公报。但是昨天的公报非常重要，所以刘季柯夫吩咐发一次传单。

“让他们把两个公报并在一块，今天夜里贴出去。”他说。他从口袋里摸出打火机，把纸片放在烟灰缸上烧掉，捻碎了灰末，再推开通风小窗，把灰末吹到菜园里。

一阵寒气向刘季柯夫迎面扑来，他突然把目光停留在菜园里被冻坏的向日葵叶和南瓜叶上覆盖着的霜上。

“冷得厉害吗？”他有些担心地问。

“跟昨天一样。水洼子连底都结了冰，还没有化冻。”

刘季柯夫的前额上现出了皱纹，他呆呆地站了一会，在想什么心事。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还等待他再发出别的命令，可是他仿佛把她忘了。

“我走了。”她轻轻地说。

“好，好。”他好像醒悟过来似的答应了一声，接着重重地发出一声长叹。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听了不禁暗自想道：“不知他身体可好？”

刘季柯夫的身体是不好：他患有痛风和气喘病。不过这些病他早就有了，所以并不是为了这个引起他的沉思。

刘季柯夫知道，在他们那种情况下，灾祸总是来自你意想不到的那一头！

作为组织的领导人，刘季柯夫的地位是有利的。他的地位之所以有利，就在于他不跟德国行政当局直接打交道，他可以违背它的命令行动而对它不负责任。向德国行政当局负责的是巴腊柯夫。但正因如此，凡是有关生产的事，根据刘季柯夫的指示，巴腊柯夫总是尽力做得让行政当局和工人觉得他是一个替德国人卖力的厂长。他尽力这样做，只有一件事除外：对刘季柯夫

所干的反对德国人的事，巴腊柯夫应当视若无睹。

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精力充沛、办事积极、调度有方的巴腊柯夫全力以赴地从事建设，——这是有目共睹的；而不惹人注目的、谦逊的刘季柯夫则把一切都破坏掉，——这是没有人看见的。工作没有在进行吗？不，一般地说它甚至是在进行，不过进度比预期的要缓慢。原因呢？原因仍旧是那一套："没有工人，没有机器，没有工具，没有运输工具，既然什么都没有，那就怨不得别人。"

根据巴腊柯夫和刘季柯夫之间的分工，巴腊柯夫恭恭敬敬地从上级那里接受一大堆命令和指令之后，一面把它们的内容通知刘季柯夫，一面展开狂热的活动来实现这些指示和命令。而刘季柯夫则又把一切都破坏掉。

巴腊柯夫要恢复生产的狂热活动一无成就。但是它却出色地掩护着巴腊柯夫的另一种成绩显著的活动；在那种活动中，巴腊柯夫的身分是在通过克拉斯诺顿和附近各区的各条大路上进行的游击队袭击和破坏活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

在瓦尔柯牺牲后，刘季柯夫就担负起在本城和本区所有煤矿企业和其他企业里组织怠工的工作，首先是在中央电机工厂里组织怠工的工作，因为要恢复矿井和其他企业里的设备，主要取决于这个工厂。

区里的企业很多，德国行政当局由于找不到必要数量的忠实走狗，因此无法对这些企业进行监督。老百姓历来称做"磨洋工"的那种情形，到处都是：人们不是在干活，而是在"磨洋工"。

自觉自愿地担负起主要"磨洋工的"脚色的，也大有人在。

譬如，柯里亚舅舅的朋友裴斯特利诺夫在第十办事处担任着类似办事员或是文书的职务。按他所受的教育和能力来说，他都是工程师，可是他在办事处里非但自己啥事都不干，而且把矿上所有啥事都不干的人都聚集在自己周围，教他们怎样让矿井里其他所有的人也不干活。

从某一个时期起，康德拉多维奇老头常来找他。在谢夫卓夫、瓦尔柯和舒尔迦等一批同伴牺牲之后，康德拉多维奇老头成了孤零零的一个人，像空旷的高地上一株干枯的老橡树。

老头心里有数，德国人是看在他儿子的份上而不来碰他，他儿子在贩卖私酒，结交"警察"和宪兵队里的下级军官。

尽管如此，儿子在罕有的肯说真心话的时候还是肯定地说，德国政权对他不及苏维埃政权对他有利。

"大伙都穷得要命，谁也没有钱！"他甚至带有几分悲哀地承认道。

"你等着吧，等你兄弟从前线回来，你就可以归天了，那里没有忧愁，也没有叹息。"老头用他那低哑的声音沉着地说。

康德拉多维奇照旧哪儿也不去工作，整天在各个小矿井里和矿工家里晃荡，而且无形之中搜集了德国行政当局在各个矿井的形形色色卑鄙龌龊、胡作非为和差错失算的材料。作为一个经验丰富、技术高明的老工人，他瞧不起德方管理人员在经营方面的无能；他的看法愈得到证实，他的蔑视也随之愈加增强。

"青年工程师同志们，你们自己倒来评评看。"他对裴斯特利诺夫和柯里亚舅舅说，"什么都在他们手里，可是全区一天只出两吨！唔，我懂得，那是资本主义，而我们，可以说是替自己干的。但是他们到底有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可是我们只有二十五年，——他们多少也该学到一点经验吧！再说这

批全球闻名的大老板，这批大名鼎鼎的财政专家，还进行过世界性的掠夺呢！呸，算了吧！”老头用他的可怕的低音沙哑地说道。

“暴发户！到了二十世纪，他们连掠夺也没有搞成：一九一四年他们吃了败仗，现在又要垮了。他们掠夺成性，可是没有创造性的想象力。实际生活中的上层人物尽是些流氓和小市民……全世界的人都亲眼看到，他们的经营方法是完全失败了！”裴斯特利诺夫恨恨地呲着牙说。

于是这两个青年工程师和这个年迈的工人就不太费劲地草拟出一套计划，每天怎样来破坏施维德花费在采煤上的那一点努力。

好几十个人的活动就是这样支持着地下区党委的活动。

刘季柯夫在他本人工作的工厂里来做这一切是比较困难和危险的。他遵守着这样的规则：不停歇地完成本身在生产中不起决定性作用的一切小件定货，对大件定货却无限期地一拖再拖。从他们在德国人管理下开始工作的最初几天起，工厂里就在给几个大矿井修理几架压力机和抽水设备，但是直到现在一样也没有修好，什么都恢复不起来。

然而又不能太叫巴腊柯夫厂长为难，使他所采取的措施全部落空。因此某些工作也做到完成或是接近完成，但是意外的事故又使整个工作停顿下来。马达不断损坏，——里面只是被撒了点砂子。在修理马达的时候，就安上发动机来代替，但是忽然发动机也出了毛病，因为在汽缸烧得太热的时候灌进了冷水。刘季柯夫在每个车间里都有自己人来做这种毫不显眼的破坏活动。他们表面上服从他们的车间主任，但是事实上只执行刘季柯夫的指示。

最近巴腊柯夫招雇了许多新工人，这些人以前都是军人。在锻造车间里有两个共产党员——红军军官——在做锻工。这两个人是夜间在各条大路上进行大规模破坏活动的游击小组的指挥员。为了给自己人找借口脱产，就广泛采用以出差为幌子的办法，名义上是到分布在其他各区的工厂去采购工具或是添置设备。而为了避免引起没有被吸收进地下组织的工人们的怀疑，也派他们去出差。工人们都相信，确实是弄不到设备和工具，而上级也看到，厂长和各车间主任都在想方设法。工作无法进展是有正当理由的。

工厂成了克拉斯诺顿地下组织的主要中心：无人知道的力量都集中在一处，总在手边，跟他们联系很简单、很方便。

但是危险也就在这里。

巴腊柯夫的工作做得大胆、沉着、有组织、有计划。作为一个军人和工程师，他对细小的事情也不放过。

“你知道，我的工作安排得连水都泼不进。”他在得意的时候对刘季柯夫说。“我们考虑问题为什么总要拿我们是比他们笨这一点作为我们的出发点呢？”他说，“既然我们是比他们聪明，我们就一定可以用计谋胜过他们。而且我们一定会胜过他们！”

刘季柯夫把他的沉重的下巴垂到胸口，因此他的脸显得更往下坠，——这一向是刘季柯夫不满意的征兆，——他说：

“你说得太轻松了。这是些德国法西斯分子。他们并不比你聪明，也不比你狡猾，这是确实的。但是他们不必弄清楚你有理没理。他们一看见工作不在进行，就要砍你的脑袋，连眉头都不会皱一下。然后再派一个坏蛋来代替你。到那时候我们大伙不是完蛋，就是得逃跑。可是我们没有权利逃跑。不，老弟，我们是走在刀刃上，你如果已经小心谨慎了，你还得加倍地小心谨慎。”

黑夜里，刘季柯夫在他的小屋里躺在床上沉重地翻来覆去的时候，考虑得愈来愈多的就是这些事，所以他就难以入睡。他还想到日子在一天天地过去，过去……

完成定货的期限拖得愈长，记在巴腊柯夫帐上的过错、破绽、事故积得愈多，他在德国行政当局面前的地位也就愈尴尬。然而更危险的是：久而久之，厂里的工作人员逐渐明白，而且也不可能不明白，在这个工厂里是有人在有意识地进行破坏。这种人的圈子愈来愈扩大，其中有不少是经验丰富的工人。

经常跟德国人周旋、会说德语、在生产工作中要求严格的巴腊柯夫，在工人圈子里被认为是德国方面的人。大伙都避着他，所以在这儿工厂里对他恐怕不会产生怀疑。怀疑只能落到刘季柯夫身上。在克拉斯诺顿，相信刘季柯夫是真心替德国人做事的人毕竟是极少数。他是属于过去被称为“工人阶级的良心”的那一类型的俄罗斯工人。大家都知道他的为人，信任他，——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车间里直接听命于刘季柯夫的有几十个人。不管刘季柯夫怎样装聋作哑，不管他的态度是多么谦虚，从事生产工作的人还是不能不注意到，刘季柯夫每逢遇到困难、好像有些犹豫或是有点慌乱时随便说出的指示，总是不利于生产的。

他的活动是由许多小事构成，其中每一件单独来看都不惹眼。但是日积月累，小事一件件地积累起来就变成一件大事，刘季柯夫也就变得越来越受人注意了。刘季柯夫周围的人绝大多数是自己人。他猜测在他的下属之中有不少是像他的女房东彼拉盖雅·伊里尼奇娜那样的人。他们样样都看到，他们同情他，可是关于这类情况无论是对他，对别人，甚至对自己都不露声色。但是泄露秘密毋需很多卑鄙小人，有时只要一个懦夫就足以败事。

交给工厂最重要的工作是修复克拉斯诺顿最大的水塔，这个水塔要供应一批矿井的用水，还要供应城中心区和工厂本身的用水。修复水塔的工作大约是在两个月以前交给巴腊柯夫的，他又把这件工作交给了刘季柯夫。

像所有其他工作一样，这件并不复杂的工作的进度也是违反常理的。但是水塔是极其需要的。费耳德纳先生几次亲自来检查工作，对工作进展的缓慢大发雷霆。甚至在水塔已经修好之后，刘季柯夫还借口水塔应当经过试用而不肯交工。这一年冷得很早，早晨愈来愈寒冷，可是整个输水系统里面还都是水。

到星期六这一天快下班的时候，刘季柯夫来验收水塔。他老是在挑毛病，说水箱和水管漏水，所以特别细心地把螺帽和龙头拧紧。工长跟在他后面，看不出一点毛病，但是也不便开口。工人们在外面等着。

最后，刘季柯夫和工长一起走到外面的工人那里。刘季柯夫从上装口袋里掏出烟袋和折成卷烟纸大小的《新生活报》，默默地请工人们抽他自己种的、连根切碎的烟叶。大伙都活跃起来，伸手来取烟叶。现在连自种烟叶都成了稀罕东西。一般抽的都是掺着一半干草的烂糟糟的杂拌，——这种烟叶各处都叫做“老奶奶的垫子”。

他们默默地站在水塔旁边抽烟。工人们偶尔带着询问的神气一会儿望望工长，一会儿望望刘季柯夫。刘季柯夫把烟蒂扔在地上，用靴子把它踩熄。

“唔，现在似乎都齐了，完工了。”他说，“这件工作今天大概已经没有人可交了，时候太晚了。我们等到星期一再说吧……”

他感到，大伙都有些惶惑不解地望了望他，因为天气甚至从傍晚起就冷得厉害。

“最好把水放掉。”工长迟疑地说。

“难道已经到冬天了吗？”刘季柯夫严厉地说。

他非常不愿意跟工长的目光相遇，可是偏偏竟遇到了。于是刘季柯夫明白，工长心里也是一清二楚。大概，其余的人也都清楚，突然间这个场面变得非常尴尬。刘季柯夫定了定神，随便地说道：

“咱们走吧……”

于是大伙都鸦雀无声地离开了水塔。

当刘季柯夫打开通风小窗，看到冻得发黑的向日葵叶上和南瓜叶上的浓霜时，他心里就想起了这件事。

果然不出刘季柯夫所料，工作组的全班人马都在水塔旁边等着他。什么水管都胀裂啦，整个输水系统都报废啦，一切都得从头做起之类的话，根本连说都不用对他说。

“真可惜……可是谁能料得到呢！会这么冷！”刘季柯夫说，“怎么办呢，我们不必灰心丧气。水管子应当换掉。水管子虽然哪儿都没有，可是我们要想办法找到……”

大伙都忐忑不安地望着他。他心里明白，大伙都佩服他的胆量，但是又为他所做的事担心，更为他的泰然自若的态度担心。

不错，跟刘季柯夫一起工作的都是自己人。但是碰运气的事究竟能维持多久呢？

巴腊柯夫和刘季柯夫根据相互之间不成文的规定，从来不在工作以外会面，使别人无从想到他们的友谊，甚至无从想到他们会由于工作以外的关系而有来往。如果有紧急的事要谈，巴腊柯夫就把刘季柯夫叫到办公室来，而在叫刘季柯夫的前后一定也把别的车间主任找来。

这一次迫切需要谈一谈。

刘季柯夫走进他在车间的小办公室里，把老是卷着夹在腋下的工作服丢在椅子上，脱下帽子和大衣，摸摸灰白的头发，用梳子梳了梳他的剪得很短的硬胡子，就到巴腊柯夫那里去了。

厂长办公室设在院子里一所不很大的砖房里。

到了寒冷的季节，克拉斯诺顿大多数机关和私人住房里，室内都比外面还冷，可是这个厂长办公室里却不一样，它也像凡是有德国人工作和居住的机关和住宅里那样暖和。巴腊柯夫坐在他的温暖的办公室里，身穿大翻领的、宽大的呢短衫，露出里面熨平的浅蓝衣领，打着鲜艳的领带。巴腊柯夫人瘦多了，晒黑了，这使他显得更年轻。他留起头发，前面还耸起一簇有波纹的鬈发。由于他这簇耸起的鬈发和下巴上的一个小涡，同时还有这双大眼睛里的非常明亮、正直、勇敢的目光和两片紧闭的、线条有力的、饱满的嘴唇，在目前这种环境里，他给人的印象确实是双重的。

巴腊柯夫坐在办公室里根本什么事都不干。他看见刘季柯夫来了非常高兴。

“你已经知道了吧？”刘季柯夫在他对面坐下，气喘吁吁地问。

“这真是活该！”巴腊柯夫的饱满的嘴唇上掠过了一丝笑意。

“不，我说的是公报。”

“我也知道了……”巴腊柯夫有他自己的收音机。

“嗳，我们乌克兰这儿不知要怎么样？”刘季柯夫干笑着用乌克兰语问道。他是俄罗斯人，但是在顿巴斯长大，所以他有时也随便说几句乌克兰语。

“要这样。”巴腊柯夫学着他的腔调回答说，“我们要准备一个总的……”巴腊柯夫把双臂环抱，做了个圆圈，使刘季柯夫一看就完全明白，巴腊柯夫要准备一个“总的”什么。

“只要我们的人一逼近……”巴腊柯夫用手在桌子上面不肯定地转动了一下，又动了动手指。

“对……”刘季柯夫对他的搭档很满意。

“明天我就可以把整个计划给你拿来……我们推迟并不是由于人手不够，而是因为棒子和糖果没法凑……”巴腊柯夫因为无意把这句话说得押了韵，不由好笑起来。他指的是人手足够，但是步枪和子弹不够。

“我去对青年人说，让他们加把劲，——他们有办法弄到。问题倒不在于水塔。”刘季柯夫突然把话题转到实际上最使他不安的问题上，说道。“问题不在于水塔。问题在于……

你自己也懂问题所在。”

在巴腊柯夫的鼻梁上现出一道很深的皱纹。

“你知道我要向你提什么建议吗？让我来把你解雇吧。”他坚决地说，“我挑你的错，说你让水塔冻裂了，所以把你解雇。”

刘季柯夫沉吟起来：的确，这倒不失为一个解决的办法。

“不行，”过了一会他说，“我没有地方可躲。即使有地方躲，也不行。他们马上会明白真相，那时候你就要完蛋，别人也要跟着一起遭殃。要丢掉像我们现在这样的地位，——不，这不合适。”他坚决地说。“不，我们要看看我们那边战线的情况。要是我们的人来得快，我们就非常热心卖劲地替德国人干活，即使过去有人对我们有所怀疑，马上也会觉得他是看错了，因为在德国人形势不妙的时候，我们反倒卖力了！反正将来一切还是要落到我们手里！”

这个异常简单的办法在最初一刹那使巴腊柯夫感到惊讶。

“可是如果战线逼近的话，他们就会叫我们去修武器。”他说。

“要是战线逼近，我们就扔下他妈的一切，打游击去！”

“这老头真行！”巴腊柯夫高兴地想道。

“应当建立第二个领导中心。”刘季柯夫说，“要建立在工厂外面，没有你我参加，作为后备。”他本来想说几句像：“这个中心，当然也可以不要，但是小心些总没错……”之类的半开玩笑、让巴腊柯夫安心的话，但是他感到这种话对他自己和巴腊柯夫都不需要，所以就说：“现在我们这儿的人都有了经验，万一出了什么事，没有你我，他们也能应付自如。

对吗？”

“对。”

“应该召开一次区委会了。我们的区委会还是在德国人来以前召开的呢。党内民主到哪儿去了？”刘季柯夫严厉地望了望巴腊柯夫又对他挤挤眼。

巴腊柯夫笑了起来。区委会他们确实没有召开过，因为在克拉斯诺顿的条件下几乎没有可能召开。但是一切最重要的问题他们都是在跟区里其他领导人商量之后才做出决定的。

在回自己的小办公室路过车间的时候，刘季柯夫看到莫什柯夫、沃洛佳和托里亚，——他们在互相挨着的台钳旁干活。

刘季柯夫假装检查工作，沿着靠墙的、有半个车间那么长的工作台走过去，——钳工们都在这张工作台上干活。青年人刚刚还在逍遥自在地抽烟聊天，现在出于礼貌拿起了锉刀。

刘季柯夫走近的时候，莫什柯夫抬起眼睛望着他，带着凶狠的冷笑低声说：

“怎么样，他要把您赶走吗？”

刘季柯夫懂得，莫什柯夫已经知道水塔的事，所以问起巴腊柯夫。莫什柯夫跟其他的青年人一样，也不知道巴腊柯夫的底细，把他当作是德国方面的人。

“别提啦……”刘季柯夫摇摇头，真像刚挨了训斥似的。

“怎么样？”他一面问，一面向沃洛佳的台钳弯下腰，好像在查看零件，接着透过刺一般的口髭轻声说：“叫奥列格今天夜里到我家来，像上次那样……”

“青年近卫军”——这是克拉斯诺顿地下组织里的又一个薄弱环节。

第五十二章

红军已经不仅在斯大林格勒地区和顿河地区获得胜利，而且在北高加索和维里基—鲁基地区也获得了胜利。他们的胜利愈显著，“青年近卫军”的活动开展得也就愈广泛，干得愈大胆。

“青年近卫军”已经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大组织，全区都有支队，队员有一百多人。而且它还有协助者。

这个组织在发展，而且不能不发展，因为它的活动在展开。归根结蒂，这就是它的使命。确实，青年人感到，比起他们最初开始活动的那个时候来，他们好像变得比较引人注目了。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在某种意义上讲这是难免的。

但是“青年近卫军”的活动开展得愈广泛，德国法西斯秘密警察和“警察局”在它周围撒开的“密网”的网口收得也愈紧。

在一次总部的会议上，邬丽亚突然说：

“我们里面有谁懂得莫尔斯电码？”

谁也没有问，要懂得它干什么，谁也没有以此来取笑邬丽亚。也许，自从他们开始活动以来，总部的委员们是第一次想到他们有被捕的可能。不过这是一种转瞬即逝的考虑，因为他们目前还没有受到任何威胁。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奥列格被找去跟刘季柯夫个别谈话。

他们从第一次会面后就没有再见过，彼此都发现对方有了很大的改变。

刘季柯夫的头发更见斑白了，人似乎更宽更胖了。可以感觉得出，这并不是由于身体健康。他们谈话的时候他常常站起来，在小房间里来回走几步。奥列格可以听到他呼吸的声音，——大概，他那肥大的身躯使他有些不胜负担。只有他的目光依旧那样严厉，没有露出丝毫的倦意。

而刘季柯夫注意到奥列格是成长了，甚至体格也发育良好。这是一个正在青春焕发时期的完全成长了的小伙子。他的脸颧骨高高的，线条似乎显

得更有力、更分明了，只有在他的大眼睛里和饱满的嘴唇的皱纹里偶尔露出原有的孩子气，特别在他微笑的时候。但是在这次会面中，他更多是处于沉思状态，弓着背坐着，耸着肩膀，缩着脑袋，额上现出很宽的皱纹。

刘季柯夫几次三番回到同一个话题，详详细细地、追根问底地向他询问“青年近卫军”原有的以及新建的小组的情况，要求知道组员的姓名和特点。可以感到，他所关心的与其说是事情的表面情况，——这些他通过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都知道得清清楚楚，——还不如说是关心组织的内部情况，特别是奥列格对自己组织的看法以及他对这个组织内部情况的了解。

刘季柯夫希望知道，组织的成员之间彼此认识的范围有多大，总部跟各小组的联系、各小组之间的联系和协作是怎样进行的。他想起了驱散牲畜的那次行动，就仔仔细细地问了好半天，在技术上，总部是怎样把当前的行动通知各小组，在小组内部组长又是怎样通知组员，以及他们是怎样集合的等等。他也希望知道一些比较日常的措施，——比如说贴传单，——这主要也是从联系和领导方面着眼。

我们再说一遍，刘季柯夫跟任何人谈话的特点是，他总让对方有机会发表意见，而不急于表示他自己的看法。他从不取悦跟他谈话的人，可是，不管他跟老的或是小的谈话，他都能自然而然地做到像跟平辈谈话一样。

奥列格意识到这一点。刘季柯夫跟他谈话就好像跟一个政治领导人谈话一样，仔细倾听他的意见。换了别的时候，刘季柯夫对待他的这种态度一定会使他心里充满了幸福的自豪感。但是现在他却感到，刘季柯夫对“青年近卫军”并不十分满意。刘季柯夫仔细地向他了解情况，常常突然站起来，开始来回走着。这是他素来没有的情形。后来他不再问了，只是来回走着。奥列格也沉默起来。最后刘季柯夫在奥列格对面的椅子上重重地坐下，抬起那双严厉的眼睛望着他。

“你们成长了：组织成长了，你们自己也成长了。”刘季柯夫说，“这很好。你们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帮助。人民已经感觉到你们，有一天他们会对你们说出感激的话。可是我要说，你们那边的情况并不妙……没有经我批准，再也不要吸收什么人到组织里来，——人够了，如今这种时候，连最胆小最懒惰的人也会来帮我们的忙，他们不一定要参加组织，懂吗？”

“懂。”奥列格轻声地说。

“至于联系……”刘季柯夫沉默了一会，“你们的工作是手工业式的。大家彼此川流不息地串门。特别是在你家和杜尔根尼奇家的周围。这是很危险的。要是我，比方说，是你们那条街上的一个普通居民，也一定会注意到：为什么每天，要不就是在夜里不准通行的时候，老有些男孩子和女孩子往你们家跑？他们干吗老这么跑来跑去？连我这个普通居民都要这样想。何况那些在搜寻你们的人，不用说，这更要引起他们的注意了。你们是年轻人，有时聚在一块也许并不是为了谈政治，而不过是玩玩，是吗？”刘季柯夫带着亲切而又带点狡猾的笑容问道。

奥列格有点窘，只好笑着点了点头。

“这不成。得忍受一点寂寞。等我们的人来了，我们就可以尽情玩乐。”刘季柯夫非常严肃地说，“就是总部的会也要少开。现在进入军事时期。你们既然有指挥员，有政委，你们就照在前线战斗环境里那样工作吧。至于联系的方法，那也得跟你们组织的水平相适应。

你们最好能想出一个地方，人人都可以随便去，而又不使人觉得奇怪。

现在高尔基俱乐部里在干什么？”

“空着。”奥列格说。他想起他在俱乐部墙上贴传单，险些被“警察”抓住的情况。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心里想。“它无论做机关或是做住宅都不合适，所以空在那里。”奥列格解释说。

“你们去请求长官，把它办成一个名副其实的俱乐部。”

奥列格沉默了一会，他的额上聚起了皱纹。

“我不理解。”他说。

“这并没有什么要理解的：就是为青年人和居民办的俱乐部。你们去把那些不问政治、一心只想玩乐、闷得发慌的男女青年组织起来，成立一个有你们参加的发起人小组，再去找市长先生，让他批准借用这所房子做俱乐部。你们就对他说，我们要在文化上用‘新秩序’的精神为居民服务。你们就说，只是让青年人跳跳舞，免得他们整天游荡，脑子里尽胡思乱想！这个卑鄙家伙本人当然是一点做不了主，不过他会去请示上级。他们会批准的。他们自己就无聊得要命。”刘季柯夫说。

奥列格的头脑具有的并不是琐碎庸俗的小聪明，而是和他的年龄不相称的异常实际的机智。他马上就猜到，可以把总部委员安插在俱乐部里，再通过他们跟五人小组的组长们保持联系。但是要他违背自己的意志去卷入这个违反人性的世界，要他不管通过什么形式去参与这个令人反感的世界的肮脏事，却使他的良心感到不安。要他本人在人们中间树立歪风邪气，或者哪怕是从旁协助……不，什么都可以，只有这个不行！他一言不发地低下了头，不敢再看刘季柯夫一眼。

“果然不出我的意料。”刘季柯夫态度平和地说，“你不明白！要是你明白了，你就可以给我和整个组织帮一个大忙。”刘季柯夫站起来，在房间里沉重地走了几步。“小小的孩子，却怕……玷污自己……纯洁的人是不会被玷污的！他们的那批宣传员有什么屁用？他们只要在俱乐部里多安一个大喇叭，它就会大喊大嚷。应当把这个俱乐部掌握在我们手里。我们的宣传不用大喊大叫，可是要比他们的宣传有力。老实告诉你，连我们也要在你们这件工作里插手。当然，我们要做得连你们都看不出来，这一点要请你们原谅。至于节目，你们要搞一些不偏不倚的东西。要是你们能把像莫什柯夫、万尼亚或是沃洛佳那样的青年放到这件工作里去，——要是让刘巴去，那就更好，——他们会把这件工作给你安排得停停当当。”

甚至在奥列格同意他的建议之后，老刘季柯夫还在谆谆劝导他的青年伙伴。奥列格因为方才一时受了不正确情感的影响，心里很不愉快。

“我所以要说这些，是因为你对我说的那一番话，你的同伴们也会对你说的，我要让你知道怎样答复他们。”刘季柯夫说。于是他又孜孜不倦教导着奥列格。

万尼亚、莫什柯夫、再加上两个跟“青年近卫军”没有关系的姑娘，事先取得新一号井管理当局的支持，就去找斯塔庆柯市长。他们的确是代表在这件事上结合起来的青年。

斯塔庆柯在没有生火的、肮脏的市参议会里接见他们。他像平时一样喝得醉醺醺的。他把手指肿胀的小手放在绿呢台毯上，眼睛盯着万尼亚。万尼亚的态度谦逊有礼，说话文绉绉的，他的眼睛透过玳瑁眼镜并不是望着市长，而是望着绿呢台毯。

“城里谣言纷纷，仿佛德军在斯大林格勒城下受到挫败，因此青年人的脑子里就有些……”万尼亚用细长的手指不明确地凌空动了一下，“动摇起来。我们得到保耳先生，”他说出山矿营派在新一号井的全权代表的姓，“和另一位先生的支持，”他又说出市参议会教育科长的姓，“那件事，市长先生，您大概已经知道了。最后，我们代表忠于‘新秩序’的青年当面来请求您，瓦西里·伊拉利翁诺维奇，因为我们知道您最富有同情心……”

“诸位，从我这一方面……孩子们。”斯塔庆柯突然亲切地叫了一声。“市参议会……”他眼睛里涌出了眼泪。

斯塔庆柯也好，“诸位”或是“孩子们”也好，都知道市参议会本身屁大的事也做不了主，一切都要由宪兵站长来决定。但是斯塔庆柯是“赞成派”：他——果然不出刘季柯夫所料——“自己就无聊得要命”。

这样，获得宪兵站长的批准之后，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九日，在高尔基俱乐部首次举行歌舞晚会。

观众坐的坐，站的站，有的穿着大衣，有的穿军大衣，有的穿皮大衣。俱乐部里没有生火，但是观众超出俱乐部所能容纳的一倍，所以不大一会从蒙着水汽的天花板上就开始往下滴水。

前排坐的有勃柳克纳宪兵站长、巴尔德宪兵副站长、施维德中尉和他的副手费耳德纳、特派员桑德斯带着农业指挥部的全体人员、施普利克上尉带着聂姆庆诺娃、斯塔庆柯市长、“警察队长”索里柯夫斯基夫妇和不久以前派来帮助他的侦查员库列肖夫。库列肖夫外表文质彬彬，圆脸上长满雀斑，蓝眼睛，稀疏的红眉毛，身穿黑色长大衣，头戴红色帽顶上有两条交叉的金带的库班帽。出席的还有保耳先生、尤纳先生、贝凯尔先生、勃洛什凯先生、施瓦尔茨先生以及山矿营的其他上等兵。出席的还有翻译舒尔卡·雷班德、宪兵站长的厨子和施维德中尉的厨师长。

稍后几排坐着过路的德国部队和罗马尼亚部队的兵士、宪兵和“警察”，在满场衣服灰暗、头巾和帽子敝旧的本地居民当中，他们的制服颇为引人注目。芬庞军士没有来，他工作太忙，而且一般地说他也不爱玩乐。

“贵宾们”坐在质地结实的旧布幕前，幕的四边都装饰着画有镰刀斧头的苏联国徽。但是幕拉开之后，观众就在舞台的后景上看见一幅“元首”的彩色巨幅画像，这是靠当地的力量画的，面部比例有几分不对，不过仍旧非常逼真。

晚会以一出古老的轻松喜剧开始。杜尔根尼奇扮演一个老头——未婚妻的父亲。他忠于他的传统和自己的艺水原则，化装得像园丁达尼雷奇。克拉斯诺顿的观众在自己心爱的演员出场和退场时都报以掌声。德国人没有笑，因为勃柳克纳宪兵站长没有笑。但是等喜剧演完的时候，勃柳克纳宪兵站长几次把一只手掌放到另一只手掌上。那时德国人也鼓起掌来。

弦乐队的台柱是本城两位最优秀的吉他演奏家维克多·彼得罗夫和谢尔格·列瓦肖夫。

他们演奏了圆舞曲《秋梦》和《我能不能走到小河边》。

俱乐部负责人兼报幕员是斯塔霍维奇，他身材细长，穿一套黑色西服，皮鞋擦得雪亮，态度庄重地走上舞台。

“鲁干斯克州游艺团演员……刘波芙·谢夫卓娃！”

观众鼓起掌来。

刘勃卡穿着天蓝色的绉纱连衣裙和天蓝色的高跟鞋出场，由华丽雅弹

着一架音调非常不准的钢琴伴奏，唱了几支忧郁的和几支快活的小调。她的演唱大受欢迎，观众鼓掌经久不息，促她再次出场。她像旋风似的跑上舞台时已经穿着她的色彩绚烂的花连衣裙和奶黄色皮鞋，手里拿着口琴，开始用丰满的双腿跳起天晓得叫什么名堂的舞来。德国人狂叫起来，在她退场时报以热烈的喝彩声。

身穿黑色西服的斯塔霍维奇又出来报幕：

“模仿茨冈情歌的讽刺歌……符拉箕米尔·奥西摩兴！吉他伴奏谢尔格·列瓦肖夫！……”

沃洛佳把两支胳臂拚命朝后弯，僵硬地伸着脖子，出人不意地、猛然发疯似地跳起舞来，一边唱着《噢，妈妈，我闷得慌哪》。神情阴郁的谢尔格弹着吉他，像梅菲斯特①那样跟在他后面，亦步亦趋。

①梅菲斯特是德国作家歌德（1749—1832）根据关于浮士德的传说写的诗剧《浮士德》中的恶魔，与浮士德形影不离。

观众们哄堂大笑，德国人也笑。

沃洛佳应观众的要求再唱一支。他带着他那独特的硬邦邦地转动脑袋的姿势唱着，主要是对着“元首”画像：

嗳，告诉我，告诉我，流氓无赖汉，
你是谁家子，你从何处来？
噢，只要太阳一升，
你就要束手就擒，
你就要一命归阴……

人们从座位上站起来，乐得直嚷。沃洛佳出来谢幕的次数难以数计。

晚会以柯瓦辽夫领导的小组的杂技节目告终。

这边在俱乐部里举行着歌舞晚会，奥列格和妮娜却在那边收听了“最新消息”：苏军在顿河中游地区大举进攻，收复了新卡里特瓦、康杰米罗夫卡和鲍古恰尔，那就是说，今年七月德军在南方突破以前所占领的那些据点，现在都被收复了。

奥列格和妮娜复写这条消息一直写到天亮。他们突然听到头顶上发动机的隆隆声，这种发动机的特别的声响使他们感到愕然。他们跑到院子里。在严寒晴朗的天空，肉眼可以看见苏联轰炸机在城市上空飞行。它们不慌不忙地飞行着，发动机的隆隆声充塞了整个空间。它们在伏罗希洛夫格勒前面的什么地方投下几枚炸弹。轰轰的炸弹声连克拉斯诺顿都能听见。

敌人的歼击机没有上去迎击苏联轰炸机，过了一会，高射炮队才开起炮来，可是轰炸机还是不慌不忙地经过克拉斯诺顿上空返航。

第五十三章

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二月这些有历史意义的月份里，苏联人，尤其是处于德军大后方的苏联人，无法看到以“斯大林格勒”这个象征性的词使世界人民永志不忘的那个历史事件的真正规模。

斯大林格勒——这不仅是在一个成为一片废墟的城市里紧靠伏尔加河

的一条狭窄地带上展开的史无前例的对敌防御战。这个敌人集中了数量庞大无比的兵力，组合了各种各样的兵种，配备着如此充足的最新技术装备，这在全部人类史上任何一次最大规模的战争中都是空前的。

斯大林格勒——这是新的苏维埃制度培养出来的军事长官的统帅天才的伟大表现。在不到一个半月的极短时期内，按照分为三个阶段来实现的一个统一、完整的计划——在伏尔加河沿岸和顿河草原空前辽阔的战场上实现的计划，——苏军包围了敌军二十二个师，击溃了他们三十六个师。总共只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就消灭和俘虏了被包围的敌人。

斯大林格勒——这是新的苏维埃制度所产生的人们的组织天才的最好明证。要了解这一点，只要想象一下：有多大的人力和军事技术装备按照一个统一的计划和统一的意志行动起来；为了实现这个计划，曾经储备了和创造了多少后备的人力和物力；为了把这些人力和物力调往前线并且给他们以粮食、服装、弹药和燃料的供应，需要多少组织者的努力和物资；最后，为了使成千成万有军事经验、有政治素养的指挥员和军事长官，从士官到元帅，来领导这个行动并且把它变为千百万武装人员的有意识的行动，又曾做了怎样的有世界性历史意义的学习工作和教育工作。

斯大林格勒——这是有统一计划的新社会的经济比无政府状态的旧社会经济优越的最高标志。没有一个旧型的国家在受到由欧洲大部分国家的工农业所武装和供应的数百万敌军深入国土历时一年半之后，在它遭受了无法想象的物质破坏和蹂躏的一年半之后，还能够在经济方面解决这样一种进攻的任务。

斯大林格勒——这是摆脱了资本家的锁链的人民的精神力量和历史智慧的表现。

像所有的苏联人一样，普罗庆柯也无法知道他自己目击和参与的那个事件的真正规模。

但是，靠着无线电的联系，还有通过联络员跟乌克兰游击队司令部和即将最先向乌克兰境内挺进的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的联系，关于苏军攻势的性质和规模，普罗庆柯较之其他在伏罗希洛夫格勒州对敌斗争的苏联人，是要知道得多一些。

普罗庆柯在伏罗希洛夫格勒逗留了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正足以开展本城全部四个地下区委的活动。但是到获悉苏军突破顿河中游德军战线的消息时，普罗庆柯已经几次变换自己的住所。从十一月底开始，他主要就留在本州北部各区。

没有人暗示普罗庆柯，说他目前正是应该待在北方这几个区里。但是凭他普通的常识或是直觉，他知道目前他更需要待在最靠近苏军战线的地方，待在游击队能够最先跟苏联正规部队配合作战的地方。

普罗庆柯日夜盼望的时机——可以将零星的游击小组重新合并为能够作大规模战斗行动的游击队的时机，渐渐临近了。

普罗庆柯现在住在别洛沃德斯克区一个村子里，在玛尔法的亲戚家里。从俘虏营里被救出来的近卫军中士高尔杰依·柯尔尼延柯——玛尔法的丈夫——也藏在那里。柯尔尼延柯在村里建立了一个游击小组，这个游击小组除了本身的任务以外，还要保卫普罗庆柯，不让他发生任何意外。别洛沃德斯克区所有各个游击小组的指挥员，就是克拉斯诺顿高尔基学校的学生夏天去劳动的那个国营农场的场长，也就是把最后一辆卡车交给玛丽雅·安德烈耶

芙娜·鲍尔茨让孩子们撤退的那个场长。现在普罗庆柯就是下令给这个场长，命令他把别洛沃德斯克区所有的小组集合起来，编成一支有二百来人的游击队。

在普罗庆柯的报务员收到密码消息，获悉德军战线在东北方的新卡利特瓦到莫纳斯蒂尔申纳这一段和在东方的契尔河上鲍柯夫斯柯叶地区被深入突破的时候，全世界的人民还不知道苏军在顿河中游地区已经发动了强大的新攻势。同时普罗庆柯接到命令，要他将全部由他指挥的游击队都调到敌人北方的交通线上，就是调到康杰米罗夫卡和马尔柯夫卡，以及东方的交通线上，就是调到米列罗沃、葛路鲍卡雅、卡缅斯克和李哈雅等处。这是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的命令。

“我们的时候来到了！”普罗庆柯扬扬得意地说完就拥抱住报务员。

他们像弟兄那样亲吻了一下。突然普罗庆柯轻轻地推开报务员，大衣也没有穿就从屋子里跑了出去。

是一个严寒晴朗的夜晚，星斗满天。最近几天老是飘雪，屋顶和远处的山岗都在雪衣下面静静地沉睡。普罗庆柯站在外面并不觉得冷，他觉得胸口发胀，他贪婪地吸着寒冷的空气，抑制不住的热泪从他眼睛里滚出之后就在面颊上冻住了。

普罗庆柯约莫要走一小时才能到寓所。他把报务员和收发报机一齐带走。身强力壮的近卫军中士柯尔尼延柯刚完成消灭各个庄子里的“警察”岗哨的战斗行动回来，已经睡得很熟。但是普罗庆柯刚一摇他的肩膀，把自己收到的消息告诉他，他的睡意马上就消失了。

“在莫纳斯蒂尔申纳附近！”柯尔尼延柯欢呼起来，眼睛也发亮了，“我自己就是从那边战线来的，我就是在那边被俘的……过不了几天我们的军队就要来到这里，记住我的话吧！”

这个老兵激动得发出了咯咯的声音，急忙穿起衣服来。

所有北部的游击小组都归柯尔尼延柯指挥，所以他得立即去马尔柯夫卡到康杰米罗夫卡之间的这个地区。而普罗庆柯本人则应由携带收发报机的报务员和两名游击队员护送，前往那个国营农场场长所领导的游击队根据地高罗箕希村：普罗庆柯懂得，最好是待在游击队里的时候现在已经到了。

在这些劳碌奔波的日子里，他从伏罗希洛夫格勒带来的他妻子的女友玛莎，一直在做他的联络员。果然没有辜负他的期望，她是那种性格坚强、忠心耿耿的人，这种人平时在生活中非常谦虚，一定要有组织家的锐利的眼光才能从群众中把他们选拔出来。但是这些具有这种性格的人一旦被选中之后，就会发挥超人的工作能力，而且达到完全忘我的地步，所以具体完成他们的上级和领导所交下的任务的担子，都落在他们肩上。没有这种人的帮助，甚至最重大的任务也仍然无法实现。

玛莎昼夜奔忙。如果跟她一起工作的人试图想象一下她生活中和工作中最大的特点，他们就会因为谁也不记得她什么时候睡过觉而感到吃惊。即使她去睡觉，那也睡得非常之少，主要的是，睡得无人察觉，仿佛她是根本不睡觉似的。

这个女人的灵魂里燃烧着没有人看到的伟大的工作热情。使她的灵魂感到温暖的唯一的个人的喜悦，就是她意识到她并不是孤独的。她虽然不能跟她的女友卡佳来往，——她只能通过玛尔法跟卡佳保持联系，——但是玛莎知道，她唯一的好友就在近处，她们都在为着共同的事业工作。而对于普

罗庆柯，玛莎是无私地献出了整个心灵，因为他在许多人中间发现了她，信任她。所以，为了他的这种信任，她可以为他献出生命。

普罗庆柯全神贯注在这些巨大事件上，他本人也在竭尽全力促进这些事件的发展。他向玛莎发出了最后几个命令：

“到了玛尔法那里，你要亲自跟米佳金游击队的指挥员会面。他的活动地区是通葛路鲍卡雅和卡缅斯克的大路。让他立即出动，日夜活动，不让敌人有喘息的机会。至于卡佳那里，让玛尔法去通知她，叫她立刻丢下她的教师工作，——

到这儿来……”

“到这所房子里来？”玛莎又问了一遍。

“到这所房子……至于你，一刻也不要耽误，到克谢尼雅·克罗托娃那儿去。你找得到路吗？”

“找得到。”

普罗庆柯向玛莎交代任务的时候，给了她这个地址：乌斯片卡村，医疗所，瓦连京娜·克罗托娃医生。瓦连京娜的妹妹克谢尼雅现在担任普罗庆柯的妻子卡佳和顿涅茨河以南所有区委之间的联络员。

“告诉克谢尼雅，活动地区是在通李哈雅、通沙赫特、通新切尔卡斯克、通罗斯托夫、通塔冈罗格的那些大路上。”普罗庆柯接着说，“要日夜活动，不让敌人有喘息的机会。凡是战线即将逼近之处的居民点，都要去占领，把敌人吸引过来……卡佳的总接头处看来是要撤了。今后总接头处就在玛尔法那里。我来换一个口令……”他俯身凑着玛莎的耳朵，对她说了口令，“不会忘记吧？”

“不会。”

他想了一会，说：

“就是这些。”

“就是这些吗？”她抬起眼睛望着他。其实她要问的是：

“那么我呢？”但是她眼睛里丝毫没有流露出来。

普罗庆柯的记忆力很强，他在头脑里检查了一下，有没有什么事遗漏。于是他想起他没有给玛莎交代今后的工作。

“哦……你到了克谢尼雅那里，就听她指挥。以后你们俩就给玛尔法做联络工作。用我的名义告诉她们，不要再派你到任何地方去。”

玛莎垂下了眼睛。她想象她马上就要一个人只身上路，离开我们的军队旦夕之间就可以到来的这些地方，愈走愈远。是的，过不几天，现在她跟普罗庆柯站的这块地方已经不会留下一个敌人，他们大伙梦寐以求、不惜为之牺牲自己生命的那个光明世界就要回来了。

“好吧，玛莎，”普罗庆柯说，“你和我都没有时间……谢谢你做的一切……”

他紧紧地拥抱她，在她的嘴唇上吻了一下。她有一刹那工夫在他的胳臂里默不出声，答不上话来。

她穿得像德军后方最贫苦的妇女，背上背囊，就走出农舍。普罗庆柯没有出来送她。于是，在这破晓前的时刻，她这个面貌并不年轻但同时还非常像少女、具有钢铁意志而不惹人注意的妇人，就踩着吱吱作响的雪，踏上了她的孤独遥远的征途。

隔了一会，普罗庆柯带着他的一小群人也出发了。这是一个严寒的、

寂静的早晨。透过死气沉沉的迷雾，现出冬日阴冷的朝霞。在这里，无论在地上或是天空，都感不到一线生气，听不到一点声音，甚至一丝风声。极目四望，是一片白茫茫的大地，在峡谷的洼地和山岗的斜坡上，有些地方露出了点点灰色的灌木丛。周围的一切都披着雪入梦了。一切是这样地令人不舒服，是这样地贫乏、寒冷、荒凉，似乎要永远这样下去似的。可是普罗庆柯在这片无垠的荒漠上走着，却是心花怒放，胜利的炮声在他心里隆隆地响着。

从普罗庆柯在这个寂静的早晨出发去游击队之后还不到五天，在一个迟暮时分，就有一个戴人造毛里子的德国风帽的游击队员，把普罗庆柯的妻子卡佳带到高罗箕希附近一所空房子里来和他相会。好像分裂为几个部分的大会战的炮声，震天动地，在这片辽阔无垠的土地上隆隆作响。普罗庆柯浑身黑硝烟，坐在那里望着妻子的美丽的脸庞。

周围的一切都乱成一团，沸腾起来，发出光亮。到了夜间，几十公里以外都可以看到亮晶晶的信号弹的闪光，甚至可以看到炮火的闪光。天上地下都隆隆作响。大规模的坦克战和空战展开了。普罗庆柯的部队里的人已经知道，迎着他们冲过来的是新近获得近卫军团称号的坦克军团，所以他们总摆脱不掉这样一种幻觉：仿佛他们真的听到了无数坦克的钢甲相撞的轧轧声。我方和敌方的飞机在天空盘旋，在空中画出一道道的白色螺旋线，这些螺旋线往往连续几个小时凝挂在凛冽的空气里。

混乱的德军后勤部队沿着平路机平过的大路向西方和西南方缓慢地退却，可是无数的村道还在普罗庆柯的控制之下。在惨败时碰到胜利者神速进攻的情况下往往如此：还有招架之力的德军部队只顾着要击退这个主要的严重的危险，他们已经无暇顾到游击队了！

在许多大大小小的居民点里，特别是在注入北顿涅茨河的卡梅什纳雅、杰尔库耳、叶夫苏格这几条河流的两岸，都有德军驻防。这些地方事先都筑了永久工事，现在又匆匆忙忙地添造了新的工事。在每一个筑有这种防御工事的居民点周围，甚至在它已经被进攻的苏军绕过并且已处于苏军控制的情况下，都展开了激烈持久的战斗。德军驻防部队都顽抗到底，直到最后一个士兵，因为希特勒下了命令：不准后退，不准投降。可是在村道上逃跑的三三两两的德国官兵——先前被击溃或被俘的队伍的残部——却都成了游击队的囊中之物。

在这五天之内，有一些几个月来几乎一直空闲着的德军后方机场都变成作战机场，受到苏联空军的全力袭击。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苏军攻势的神速。德国的远距离轰炸机队也急忙把基地转移到大后方。

他们俩单独坐在一所空阒无人的农舍里。卡佳刚脱下农民穿的皮袄，脸还冻得通红，普罗庆柯因为睡眠不足而脸色发黑。魔鬼似的火星不时从普罗庆柯的一只眼睛跳进另一只，他说：

“我们一切都是按照近卫坦克军团政治部的指示行动，而且干得挺好！”他笑了起来，“卡佳，我叫你来，是因为这件事让别人做我不放心。你猜是什么事？”

她还能感到他最初猛烈的拥抱和在她眼皮上的亲吻，她的眼睛还是湿润的，并且因为望着他而放光。但是他除了现在他所关心的那桩最重要的事，已经不能再谈别的。于是她马上猜到他叫她来干什么。不，她连猜都不用猜，她一看见他，心里就明白了。过不了几个小时，她又要离开他上路，——她知道到哪儿去。为什么她会知道，这一点她是无法解释的。

这只是由于她爱他。于是卡佳只用点头来回答他，接着又抬起她那双湿润发亮的眼睛望着他。在她的轮廓分明、饱经风霜、甚至有些严峻的脸上，这双眼睛显得非常美丽。

他一跃而起，检查了门有没有闩上，就从图囊里摸出几张四开纸那样大小的卷烟纸。

“你看……”他小心地把纸摊在桌上说，“你看，文字我全部都译成了密码。可是地图却没法译成密码。”

的确，纸的正反两面都用削得极尖的铅笔写满了那么小的小字，简直难以想象，这是人的手写出来的。在一张纸上精密地画着伏罗希洛夫格勒州的地图，上面布满了小小的方块、圆圈和三角。这些记号当中最大的不过蚜虫那么大，最小的只有针尖那么大，单凭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这件精密绝伦的工作是花费了多大的劳力。这是五个月来细心搜集、根据最新材料加以核对和补充的有关敌人主要防线、设防据点、火力阵地的部署和机场、高射炮兵、汽车库、修理厂的位置，有关德国军队、驻防军的数目和他们的装备以及有关其他许多材料的情报。

“告诉他们，跟我的这些材料相比较，在伏罗希洛夫格勒和顿河沿岸有好多情况已经发生变化，变得对敌人有利。可是在顿涅茨河前面的一切，就不会变化了。再告诉他们，德国人在大大地增强米乌斯河的防御。结论他们自己会做，不用我来教他们。可是我要告诉你：如果德国人在增强米乌斯河的防御，这就意味着，希特勒对于他们能不能守住罗斯托夫没有信心。明白吗？”

普罗庆柯响亮而高兴地笑起来，就像他平时在家庭圈子里，特别是跟孩子们在一起，在他罕有的十分悠闲的时间那样笑法。有一瞬间他们忘掉了他们俩要做的事。普罗庆柯双手捧住她的头，又微微推开，用充满柔情的目光注视着她的脸，不断地重复说：

“啊，你是我的小燕子，我的小燕子……哎哟！”他叫起来，“最重要的消息我还没有对你说呢：我们的军队已经进入了乌克兰的土地。你看……”

他从图囊里摸出一张拼贴起来的很大的军事地图，把它摊在桌上。最先映入卡佳眼帘的就是用红蓝铅笔描画得很粗的伏罗希洛夫格勒州东北地区的已经被苏军收复的许多居民点。

一股热浪涌上了卡佳的心头：这些居民点里有几个离高罗箕希非常之近。

普罗庆柯和卡佳会见之时，伟大的斯大林格勒战役的第二、第三阶段尚未完成，第二包围圈还没有将斯大林格勒的德军集团军群完全包围。但是在那天夜里已经知道，驰援被围在斯大林格勒的德国集团军群的德军已在科杰尔尼柯沃地区被击溃，并且已经接到我军在北高加索进攻的最初消息。

“李哈雅—斯大林格勒铁路有两处被我军切断，就在这里的车尔尼雪夫斯卡雅和塔青斯卡雅。”普罗庆柯高兴地说，“可是莫罗佐夫斯克还在德国人手里。现在这里，沿卡利特瓦河差不多所有的居民点都被我们收复了。我们越过了米列罗沃—沃罗涅什铁路从米列罗沃到康杰米罗夫卡北部的这个居民点的这一段。但是米列罗沃还在德国人手里。他们大大增强了它的防御。不过好像我们的军队已经绕过了它，——你看，坦克已经冲到多么远的地方……”普罗庆柯的手指沿着卡梅什纳雅河在米列罗沃西面移动，又朝卡佳望了一眼。

卡佳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地图，她看的正是我军最接近高罗箕希的那些地方，她的眼睛里露出了鹰隼的神色。普罗庆柯懂得她为什么要这样看，就不做声了。卡佳把视线从地图上移开，朝前面望了一会。这已经是她平时的、聪明的、沉思的、微带忧郁的眼神了。普罗庆柯叹了口气，把这张画着地图的卷烟纸放到大地图上面。

“你看这儿，这一切你都应当记在心里，你在路上已经没有可能再看这张图了。”他说。“你把这几张纸藏好，以便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总之，可以吞下去。你还要好好地想想：你要装扮成什么人？我想，你可以扮做难民。一个逃难的教师，就说是从契尔来的。你从赤色分子那里逃出来。你对德国人和‘警察’就这么说。至于对当地居民……对当地居民你就说：你是从契尔到旧别尔斯克去投亲的，——一个人活不下去。好人会可怜你，留你过宿，坏人也挑不出什么毛病。”普罗庆柯并不望着妻子，用有些喑哑的声音轻轻地说。“你要记住，按照我们这儿所理解的战线，是没有的。我们的坦克在进攻——这边有，那边也有……你要绕过德军防御点，别让他们看见你。但是到处都会有偶然碰到的和过路的德国人，对这种人更要小心。等你走到这个地界，就不要再往前走，就在那里等待我们的军队。

你看，这里连我的地图上也什么都没有画上，那边的情况我们一点都不知道，你又不能去向人打听，——有危险。你去找一个孤老婆子或是单身妇女，住在她家。战斗一发生，你就钻到地窖里去躲着……”

其实这一切对卡佳的嘱咐都是多余的。但是他满心想帮助她，哪怕提些建议也好。要是他能替她前去，他真不知道要多么高兴呢！

“你一动身，我马上就通知那边，说你已经出发。要是没有人来接你，你就对最先碰到的我们的懂事的人说明，请他陪你去坦克军团政治部……”突然有一颗调皮的火星在他眼睛里跳了一下，他说：“你到了政治部以后，别高兴得忘了你还有个丈夫，你请他们转告我，就说你已经平安到达。”

“我还不愿意这样说呢。我要说：你们要么赶快进攻，把我那口子救出来，要么就放我回到他那里去。”卡佳说着，不由地笑了起来。

普罗庆柯突然感到为难。

“我本来不想谈这个问题，可是看来是不说不成了，”他说着脸色就变得严肃起来，“不管我们的军队进攻得多快，我也不能等待他们。我们的工作是跟德国人一同撤退。我们的军队到这儿来，我们就要跟着德国人到那边去。现在我们跟德国人的关系真是如胶似漆。

我要从这边打击他们，一直打到最后一个德国人离开我们的伏罗希洛夫格勒州的土地。不然的话，我们的旧别尔斯克、伏罗希洛夫格勒、克拉斯诺顿、鲁别让斯克、克拉斯诺鲁奇斯克的游击队和地下工作者不知会对我有怎样的想法？……至于你要回到我这儿来，那也欠考虑：这已经毫无必要。你听我说……”他向她弯下身子，把他的结实的手放在她的纤细的手指上，紧握着。“你不要留在军团里，你在那边没事可做，你可以请求调到方面军军事委员会下面。你会见到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你可以请求他让你去看看孩子们。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应该得到这种权利。可是孩子们呢？现在连他们在哪里，我们都不知道——在萨拉托夫呢，还是在别处？他们是不是还活着，身体不知可好？”

卡佳望着他，什么也不回答。遥远的夜战的隆隆声震撼着这座和庄子隔开的小房子。

普罗庆柯的心里对她——他的伴侣和爱妻——充满了爱怜。因为只有他知道，她，他的卡佳，实际上是多么温柔善良，她是以怎样超人的性格的力量克服着种种危险和困苦，忍受着屈辱，面临过死亡并且经受了亲友死亡的痛苦。普罗庆柯希望让他的卡佳赶快离开这里，到有着自由的人，有着光明和温暖、有着孩子的地方去。但是他的卡佳想的却不是这些。

她目不转睛地望着普罗庆柯，后来她把手抽出来，在他的朝后梳的亚麻色头发上温柔地抚摩了一下。这几个月来，他两鬓的头发更朝上退，因此他的高高的前额就越发显得高了。

她在这柔软的亚麻色头发上温柔地抚摩了一下，说道：

“你不用说，你什么都不用对我说……你不用说，我自己全知道，让他们该怎样使用就怎样使用我吧，我不准备请求让我到什么地方去。只要你在这里，我就要永远靠近你，只要他们能允许我……”

他还想反驳她，但是突然他整个的脸变得柔和了。他抓住她的双手，把自己的脸埋在她的手掌里。过了一会，他才抬起他的蓝眼睛望着她，非常轻柔地说：

“卡佳……”

“是的，该走了。”她说了就站起身来。

第五十四章

护送卡佳的是当地一个像熊一样魁伟的老头，大伙都管他叫“福马老头”。旅途开始的时候，卡佳和福马老头还有机会交谈三言两语，那时她就打听出他姓柯尔尼延柯。他是无数的柯尔尼延柯——这里草原上最早的乌克兰老住户——中的一个，而且也像所有的柯尔尼延柯一样，是高尔杰依·柯尔尼延柯的远亲。

后来他们就没有机会谈话了。

他们连夜赶路，一会儿走村道，一会儿走草原。雪不过刚覆盖住田野，路并不难走。在北边和南边的地平线上有时现出汽车的灯光，转眼又消失不见。南北两面都是平路机平过的大路。所以离得虽远，还是能听到汽车在行驶。南面是在米列罗沃地区被击溃的德军部队在撤退，北面是巴兰尼柯夫卡——我军收复的第一个伏罗希洛夫格勒州的居民点——

的敌军在撤退。

卡佳和福马老头是往东去，但是他们常常要变换方向，绕过草原上的村子和设防据点。

卡佳觉得路途十分漫长，不过他们还是越来越接近战区：大炮沉重的喘息变得更清晰，地平线上忽而这边忽而那边炮火的闪光也看得更清楚了。黎明时开始落起干雪珠，它减弱了各种声响，而且什么都看不见了。

卡佳穿着难民穿的破旧的毡鞋，背着麻袋，浑身是雪。周围的一切——这魁伟的福马老头（他戴的皮帽的帽耳朝上翻起，但是没有系上，所以朝两面张开）、这沙沙的脚步声、还有这在眼前不住闪动的雪珠，——都像是一幅幻景。卡佳心里迷迷糊糊，处于半睡状态。突然她感到脚底下踩到了硬

土。福马老头站住了。卡佳把脸凑近了他，心里立刻难受起来：到这里他们应当分手了。

福马老头带着亲切关怀的神情望着她的脸，他的黝黑的手顺着他们刚走上的那条村道指过去。卡佳顺着他指的方向望了一望。天快亮了。老头把两只大手放在她肩上把她拉到面前，他的口髭和胡子弄得她的耳朵和面颊痒酥酥的，他热烘烘地对她耳语说：

“顶多不过二百俄丈①。您懂吗？”

“再见啦。”她轻轻说了一句作为回答。

①一俄丈合二·一三公尺。

她沿着村道走了不多几步，就回过头来望望：福马老头仍旧站在大路上。卡佳明白，老头一直要站在那里，等她从他的视野里消失才走。果然，她走了五十米光景，还能辨出他的侧影，——身材魁伟的老头浑身披雪站在那里，像个圣诞老人。等她第三次再回过头来，福马老头已经看不见了。这是卡佳能够指望有自己人帮助的最后一个村子，再往前走就只能靠自己了。这个小村坐落在一排坐西朝东的高高的工事后面，那些工事只是德国人在这里匆促筑起来的防线的一部分。普罗庆柯曾对卡佳说过，最舒适的房子都被据守防御点的那些小分队的军官和参谋部占用了。

普罗庆柯警告过妻子，如果她到达时满村都是从卡梅什纳雅河的德军防线被赶过来的部队，她的情况就可能复杂起来。这条小河注入顿涅茨河的支流杰尔库耳河，在靠近罗斯托夫州州界的地方从北往南流，几乎跟康杰米罗夫卡—米列罗沃铁路平行。卡佳要去的村子就在卡梅什纳雅河畔，她应当在那里等待我军到达。

卡佳透过雪网远远望见近处的一所农舍的侧面，就从村道上拐了弯，穿过田野绕过村子，眼睛一直望着这些屋顶。她知道她要去的农舍是数过去的第三所。天愈来愈亮。卡佳走到这座小小的房子跟前，把身子贴近百叶窗紧闭的窗子。屋子里寂静无声。卡佳没有敲窗，而是照人家教她那样搔了几下。

好一会没有人答应。她的心怦怦地跳起来。过了一会，屋里有人轻轻地应了一声，——这是个十来岁的男孩子的声音。卡佳又搔了一阵。有一双小脚在泥地上啪哒啪哒地走过来，门开了一条缝，让卡佳走进去。

屋子里非常暗。

“您是哪儿来的？”一个孩子的声音轻轻地问道。

卡佳说出了暗号。

“妈妈，你听见吗？”那男孩说。

“轻一点……”一个妇人的声音低声答应道，“你又不是不会讲俄罗斯话①。她是俄罗斯人，你难道听不出？到这边来吧，请在床上坐。萨什柯，你告诉她在哪里……”

①孩子讲的是乌克兰语。

孩子冰冷的手握住卡佳的在无指手套里焐得暖和和的手，拉着她走。

“等一下，让我把皮袄脱掉。”她说。

但是迎面伸过来一只妇人的手，从孩子手里接过卡佳的手，把她拉过去。

“就这样坐着吧。我们这里很冷。您没有看见德国巡逻兵吧？”

“没有。”

卡佳放下背包，取下头巾抖了抖雪，然后解开皮袄，就在身上拉着下

摆把雪抖掉，才挨着那妇人在床上坐下。孩子几乎是悄没声儿地在另外一边坐下，——卡佳不是听到，而是凭母性的直觉感到他是紧挨着母亲，挨着她的温暖的身子。

“村里德国人多吗？”卡佳问。

“并不怎么多。他们现在连过夜都不在这里过，多数是在那边地窖里过夜。”

“地窖里……”孩子干笑了一声，“是在掩蔽部里！”

“反正是一码事。听说，现在他们这里要有部队来增援，他们打算在这里坚守阵地。”

“请问，您是叫迦林娜·阿列克谢耶夫娜吗？”卡佳问。

“就叫我迦丽亚①吧，我年纪还不大，我叫迦丽亚·柯尔尼延柯娃。”

①迦丽亚是迦林娜的小名。

已经有人对卡佳说过，她还要遇到一家姓柯尔尼延柯的。

“您是到我们部队里去吗？”孩子轻轻地问。

“是到我们部队里去。能通过吗？”

孩子沉默了一会，然后带着神秘的表情说：

“常常有人通过……”

“是很久以前吗？”

孩子没有回答。

“我怎么称呼您？”那妇人问道。

“身分证上是维拉……”

“维拉就维拉吧，这儿都是自己人，他们会相信的。要是有人不信，他也不会说什么。

也可能有这样的坏人会出卖您，可是现在谁敢？”妇人带着镇静的冷笑说，“有谁不知道，我们的军队快要来了……您收拾收拾，在床上躺一会，我给您盖上被子，您好暖和暖和。我跟儿子两人一块睡，这样可以暖和些……”

“那我不是把你们挤走了？！不，不，”卡佳连忙说，“我随便在长凳上或是地上躺一会就成，我反正睡不着。”

“您会睡着的。我们反正要起来了。”

农舍里的确很冷，——可以感到，入冬以来屋里就没有生过火。卡佳已经习惯在德国人的统治下屋里都不生火。至于吃的——简单的汤啦、粥啦、或是土豆啦，居民也都凑合着烧点木片或是麦秸做一下。

卡佳脱了皮袄和毡靴躺下。女主人给她盖了一条棉被，再压上皮袄。卡佳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一声低沉可怕的巨响惊醒了她。她在睡梦中与其说是听到，还不如说是整个身子感觉到这个响声。她还没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就在床上抬起身来，在这一瞬间又接连来了几声爆炸，那巨响和爆炸引起的空气的震荡充塞着周围整个世界。卡佳听到一阵低沉的发动机的吼声，——有几架飞机连续低低飞过村子上空，立刻就以陡急的曲线升高。卡佳并不是知道，她只是凭声音辨别出来，这是我们的“伊尔”①。

①“伊尔”是苏联一种轰炸机的型号。

“是我们的！”她高兴得叫起来。

“是，是我们的。”男孩沉着地说，他坐在窗前的长凳上。

“萨什柯，穿起衣服来。维拉，应该怎么称呼您呢，您也穿好衣服！飞机虽是我们的，可是它们一丢炸弹，你就起不来了！”迦丽亚说，她手里拿着一把苦艾扎的扫帚站在屋子当中。

屋子里虽然很冷，迦丽亚却裸露着胳臂，光脚站在泥地上，孩子坐在那里，衣服也没有穿好。

“它们什么也不会丢下来。”男孩怀着意识到自己比妇女们强的优越感说道，“它们在轰炸工事。”

他，这个瘦弱的男孩，长着一双成年人的严肃的眼睛，坐在长凳上，两条光腿交叉着缩在凳子底下。

“我们的‘伊尔’——在这种天气还出来！”卡佳激动地说。

“不，那是夜里结的霜。”男孩察觉她把视线投到结了霜花的窗上，这样说道，“天气很好，虽然没有太阳，可是雪已经停了……”

卡佳在她的教师生涯中跟他那样年龄的孩子相处惯了，所以能够感到男孩对她很感兴趣，而且也非常希望她能注意到他。但同时男孩的自尊心又非常强，无论在他的姿势或是声调里，都毫不使人感到他有过分的要求。

卡佳听到村前什么地方一连串猛烈的高射机关枪声。尽管她万分激动，她还是能听出，德国人在这儿还没有高射炮队。这意味着，这条防御线只是目前才突然变成重要防线的。

“我们的军队快些来就好了！”迦丽亚说，“我们连地窖都没有。以前我们部队撤退的时候，德国飞机来轰炸，我们就躲到邻居的地窖里，再不然就往田里跑，趴在荒草里或是趴在田埂上，捂住耳朵等着……”

又是几下炸弹爆炸声——一下，两下，三下——把这所小农舍震得直晃动，接着我们的飞机又怒吼着飞过村子再升向高空。

“哎哟，我的乖乖！”迦丽亚叫了一声就蹲了下去，用手捂住耳朵。

听到飞机声就蹲下去的这个妇女，是这一区的游击队总接头处的女主人。从俘虏营逃出来或是突围的红军兵士主要就是通过迦丽亚的家过去的。卡佳知道，迦丽亚的丈夫在战争一开始就牺牲了，两个小的孩子也在被占领期间患赤痢死去。在迦丽亚的这个不自觉的动作里——蹲得矮些躲避危险，哪怕是塞住耳朵听不见也好——含有一种非常天真、非常合乎常情的东西。卡佳跑到迦丽亚面前，把她搂住。

“别怕，别怕！……”卡佳爱怜地叫起来。

“我并不是害怕，不过农村妇女好像应该这样……”迦丽亚抬起她的长着黑痣的脸，神情镇静自若地望着她笑起来。

卡佳在这个小农舍里过了一整天。需要有万分的忍耐才能挨到天黑，——她恨不得快些出去迎接我们的军队。我们的“伊尔”由战斗机护航，整天在轰炸村前的工事。出动的“伊尔”并不多，——根据种种情况判断，大概是两个三机小队。它们每次先绕两三圈，轰炸完毕之后，回去装上炸弹、加了油再来。它们就这样从清晨惊醒卡佳的时候起一直干到暮色降临。

在村子上空，我们的歼击机和“密塞”整天进行空战。有时可以听见苏联轰炸机在高空隆隆飞过——飞往遥远的德军防线。大概，它们是去轰炸杰尔库耳河上的工事。杰尔库耳河在米佳金游击队根据地附近流入顿涅茨河，普罗庆柯的“迦济克”就封在根据地那边的一个洞穴里。

德国强击机一日之内多次飞过，往不远的地方投弹，可能是在卡梅什纳雅河对岸。从那边不断传来隆隆的重炮声。

有一次，在邻近卡佳即将路过的德军防御工事后面的地带上，发生了一阵混乱的炮轰。

炮轰开始时仿佛是在远处，可是后来逼近了，在近在咫尺的地方达到高潮，之后突然静止。

到傍晚，炮轰又炽烈起来，炮弹就在村前爆炸。德军的大炮还击了好几分钟，炮声连天，震得屋里的人无法谈话。

卡佳和迦丽亚不断意味深长地交换着眼色。只有小萨什柯一直带着神秘的表情望着前面。

这一次又一次的空战和炮轰迫使居民们只好躲在屋子里和地窖里，倒省得有人来串门看见卡佳。德国兵士显然也专心在干他们的正事。村子里好像是空阒无人，只有这个小屋里住着他们三人——两个妇女和一个男孩。

离那决定性的、也许是生死攸关的出发时刻愈近，卡佳就愈是难以控制自己。她不断地向迦丽亚打听路途的详情，能不能有人给她指路。迦丽亚只是说：

“您不用担心，您休息吧。还有您担心的时候呐。”

大概迦丽亚自己也是什么都不知道，只是怜惜她，这反而使卡佳更为激动。不过如果此刻有一个外人来串门跟卡佳攀谈，他是再也猜不出她的心情的。

暮色渐浓，“伊尔”结束了它们最后一次的环舞，高射机关枪也沉寂了。周围的一切都寂静下来，只有在遥远的广大地域里还继续着不可理解的、紧张的鏖战生活。小萨什柯把他交叉着缩在长凳下面的脚放到地上，——他在白天总算穿上了毡靴，——走到门口，开始默默地、费劲地穿上一件满是补钉的皮袄。皮袄的毛原来是白的，现在已经脏了。

“您该走了，维拉。”迦丽亚说，“现在走正是时候。他们这批恶鬼现在要躺下休息一会。咱们的人现在也许会有人来串门，最好别让他们看见您。”

在苍茫的暮色中，看不清她脸上的表情，她的声音有点喑哑。

“孩子预备到哪儿去？”卡佳问道。她心里产生了模糊不安的感觉。

“没什么，没什么。”迦丽亚匆匆地说。她急急忙忙地在屋子里跑来跑去，帮着卡佳和儿子穿衣服。

卡佳的含着母爱的目光在萨什柯的苍白的小脸上停留了一刹那。原来这就是那位著名的向导，在被占领的五个月里他给单身人、三五成群的人、大队的人——几百个，也许是几千个我们的人——带路，通过敌人防御工事的深处！可是孩子已经不朝卡佳这面望。他在费劲地穿他的皮袄，他的一举一动都好像在说：“你本来有很多时间可以看我，可是你没有想到，现在你最好别来妨碍我。”

“您稍等一下，我出去看看再告诉您。”迦丽亚帮着卡佳把她的穿着皮袄弯不过来的胳膊伸进背包的带子，扶正了她背上的袋子。“我们就告别吧，因为没有时间了。上帝保佑您一路平安……”

她们互相亲吻了一下，迦丽亚就走出屋子。卡佳对于做母亲的不跟儿子表示亲热，甚至不跟他告别，已经毫不觉得奇怪。她知道，“他们习惯了”这种说法在这里不适用。如果命运注定她卡佳要送自己的孩子去做这种有生命危险的工作，她本人一定会忍不住要把他紧紧搂在怀里，亲吻他。但是卡佳却不能不同意迦丽亚的做法是比较正确。如果迦丽亚采取别种做法，小萨什柯大概也会拒绝她的爱抚，甚至会对她的爱抚采取敌视的态度，因为母亲

的爱抚此刻只会使他心软。

卡佳和萨什柯单独相对，觉得很尴尬。她觉得，她无论说什么都会显得是虚情假意。但是她终于忍不住了，就用非常认真的语气说：

“你不必走远，只要指点我从哪儿穿过这些工事就行了。

往后的路我认得。”

萨什柯没有作声，也不朝她望。这时迦丽亚把门推开一条缝，悄悄地说：

“走吧，一个人也没有……”

是一个阴沉寂静的夜晚，不很冷，也不太黑，——大概月亮还留在冬天的雾幕背后，可是雪地上有反光。

萨什柯戴的不是暖帽，而是一顶破旧不堪、皱皱巴巴、对他嫌大的鸭舌帽，没有戴无指手套，穿着毡靴，他毫不张望就直往田里走去。他一定很清楚，母亲不会叫他们上当：她说“一个人也没有”，就真是一个人也没有。

他们应当通过的那一带高高低低的丘陵，自北而南连绵不断，是杰尔库耳河和它的支流卡梅什纳雅河之间的分水岭。有两个微微耸起的山岗在草原上朝杰尔库耳河方面伸延，再逐渐低下去，跟草原融为一体。他们的这个村子就坐落在这两个山岗之间的山洼里。萨什柯出了村，就在田里走，要想翻过一个山岗。卡佳懂得萨什柯为什么要选这个方向：尽管山岗只比草原高出一点，但是等他们翻过山岗，从村子这边就看不见他们了。到了山岗那边，萨什柯就沿着它折向东方。

现在他们走的方向跟德军筑着防御工事的一带丘陵是垂直的。

他们出来以后，萨什柯一次也没有回过头去看看他的旅伴是不是跟着他。她顺从地跟在他后面。他们现在是踏着从薄雪下面钻出来的稀疏的庄稼茬走着，——这是一片低地，跟村子的地势相同。和昨夜一样，德军在南北两面的用平路机平过的大路上撤退，他们的嘈杂声清晰可闻。这里的炮声稀了，在东南方米列罗沃附近的炮声却变得更密更响。在很远的地方，大概是在卡梅什纳雅河上空，像灯笼一般悬着几颗德军的照明弹。它们离这里非常遥远，所以从这里只能看见它们惨白色的光，但是这一点光驱散不了这朦胧的夜色。要是在前面一块高地上空也挂着这样一盏灯笼，那时萨什柯和卡佳就要被他们看得清清楚楚了。

脚下柔软的雪毫无声息地陷下去，只听见毡鞋踏在庄稼茬上发出的沙沙声。后来留着残茬的地走完了。萨什柯回过头来，做了个手势叫她过去。等卡佳走到他跟前，他就蹲下，并且比划要她也这样做。她就穿着皮袄在雪地上坐下。萨什柯用手指很快地指指她，又指指自己，然后在雪地上画了一条往东的线。皮袄的袖子盖住他的手，他把手伸出来，很快地把雪扒在一起，堆成尖尖的一小长条横在他刚才画的线上。卡佳明白，他画的是他们的路线和他们要去克服的障碍。后来他从小雪堆上的一个地方抓掉一把雪，又在另外一处抓掉一把雪，好像在雪堆上做出两条通路；他用手指的骨节指出通路两边的防御据点，又画了一根线，先经过一条通路，然后再经过另一条。卡佳懂得，他是在指出他们两条可能通行的道路。

卡佳想起苏沃洛夫的名言：“每个兵士必须懂得他自己的运动路线”，不由好笑起来。

在这个十岁的苏沃洛夫眼中，她卡佳就是他唯一的兵士。她点点头，表示懂得“她自己的运动路线”，于是他们又往前走。

他们现在是绕道朝东北方走。他们就这样走到好像密密的藤蔓似的铁丝网跟前。萨什柯做了个手势叫卡佳卧倒，自己却沿着铁丝网走过去。不多一会就看不见他了。

卡佳面前延伸着一条大约有十一二个铁丝网的障碍线。障碍线是旧有的，铁丝已经生锈，卡佳甚至摸了摸它。这里没有一丝“伊尔”炸过的痕迹。大概，德国人设置这条障碍线是为了对付游击队：它从后面保卫山岗，所以和主要工事相隔很远。

卡佳已经有好久没有体验过这样等待的痛苦。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可是萨什柯老不来。过去了一个钟头，两个钟头，可是那孩子还不回来。但是不知为什么卡佳并不替他担心：这是一个可以信赖的少年战士。

她一动不动地趴了这么久，冷得不禁浑身发抖。她左右转侧，最后实在忍受不住，就坐了起来。不，让小苏沃洛夫来责备她吧。如果他把她丢下这么久，她来试试了解一下地形总不碍事吧。如果孩子是走着去，而不是爬着去的，那她也可以弯着腰稍微走几步。

她刚走了五十来步，就忽然看见一样使她因为喜出望外而颤栗的东西。她前面有一个新近被炮弹炸出来的形状不规则的弹坑。炮弹是最近爆炸的，它炸出来的黑土撒在雪地上。这正是炮弹炸出来的，而不是飞机投下的炸弹炸出来的弹坑。这只要看看被翻出来的泥土的情形就可以断定，因为泥土大部分都落在一边，正巧是在萨什柯和卡佳来的那一面。显然，萨什柯也注意到这一点，他是绕过弹坑再往前走的，——脚印正是这样表明着。

卡佳的目光在雪地上漫射着，找寻还有没有别的弹坑，可是没有别的弹坑，至少在她附近没有。她感到一阵难以言传的、非同寻常的激动：这只能是我们的炮弹炸出来的弹坑。但这并不是远射程重炮的炮弹炸的，这是中等口径大炮的炮弹炸出来的泥土，就是说，我们的炮队发炮的地方已经不那么远了。大概，这就是傍晚前他们三人在迦丽亚的小屋里听到的那次猛烈的炮轰留下的痕迹之一。

我们的军队很近了！他们就在旁边了！这个女人远离自己的子女，在连续不断的可怕的斗争中度过了五个月，日夜盼望着浑身浴血的、穿军大衣的人①进入被敌人蹂躏的祖国的土地，张开他的友爱的双臂的那个时刻就要到来了，——现在要用什么语言才能表达出她的心情呢？她的饱受创伤的心灵是多么强烈地向往着他，向往着在这一分钟里对她比丈夫兄弟还要亲的人啊！

①指苏联红军。

她听到一阵毡靴踏在雪上的柔和的声音，接着萨什柯就到了跟前。在最初一瞬她甚至没有注意到他的皮袄上、膝盖上和毡靴上沾的不是雪，而是泥；孩子把双手笼在袖子里走过来，他大概爬了很久，所以冻僵了。她的目光急切地注视着他的脸——他给她带来的是什么消息呢？但是在这顶压到耳朵上的大鸭舌帽底下的孩子的脸是勇敢无畏的。他只是从袖子里抽出手来，做了一个否定的手势：“这里过不去。”

这个手势把她吓慌了。孩子望望弹坑，又望望卡佳，他们的目光相遇，孩子忽然微笑起来。大概，刚才他看到这个弹坑时所得到的印象也像她现在看到这个弹坑时所得到的印象一样。他懂得卡佳的内心活动，他的微笑表示：“这里过不去没关系，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地方过去。”

他们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他们彼此了解了。

他们照旧一句话不说，但是他们中间产生了友谊。

她想象得出，他怎样用他的不戴手套的细瘦的小手撑着冻土在那边匍匐前进。但是孩子不让自己休息片刻。他朝卡佳招招手，就沿着他们原来的足迹往回走。

很难断定，卡佳对这孩子是怀着怎样的感情。这是同志的感情，是信任、服从和尊敬的感情；同时这又是慈母的感情。这是所有这些感情交织在一起的感情。

她没有细问，是什么妨碍他们从这里通过。她一刹那都没有怀疑，他并不是折回家去而是领她绕到第二条通路去穿过防御工事。她没有把自己的无指手套给他暖暖手，因为她知道他是不会接受的。

过了一会他们又折向北方，然后向东北，又来到已经是围绕着第二个山岗脚下的铁丝网跟前。萨什柯走了，卡佳又焦急地等待着。最后，他带着这顶压到耳朵上的鸭舌帽，手笼在袖子里出现了，身上沾了更多的泥。卡佳坐在雪地上等他过来。他把他的脸凑近她的脸，一只眼睛对她睒了睒，笑了起来。

她到底还是把自己的无指手套递给了他，但是他却拒绝了。

生活中的事情往往如此：她想象中最困难的事情实际上非但是容易的，而且是不知不觉地就过去了。的确，她简直没有察觉，他们是怎样在两个防御据点中间穿过的。这是她在这次征途全部经历中最简单的事。直到事后她才明白这为什么是这样简单。她甚至记不起他们先走后爬的时间长不长。她只记得，由于“伊尔”白天的活动，整个这一带都翻了个身。她所以记得这一点，是因为等她和萨什柯到了田野里之后，她的皮袄上、毡靴上和无指手套上跟萨什柯一样，也都沾满了泥土。

后来他们在这片丘陵起伏的无垠的田野上，踏着皎雪又走了好久。最后，萨什柯站住了，回过身来等待卡佳。

“这儿就是大路了。你能看见吗？”他轻声说，一面伸出了手。

他给她指点，怎样走上他们刚才离开的村子和她往前走要经过的庄子之间的那条村道。

照普罗庆柯的地图上画的，现在她来到的这个地带，德军的防御据点并不多。但是据普罗庆柯的说法，由于德军节节败退，这里一定笼罩着可怕的混乱。撤退的德军残部可能在这一带构筑临时防御工事进行掩护战。在任何地方都可能碰上撤退的德军分队或是偶然掉队的兵士。任何一个居民点都可能突然处于德军防线的前沿。普罗庆柯认为这一段路最危险。

但是，除了仍然沿着平路机平过的大路撤退的德军的嘈杂声以及东南方米列罗沃附近的继续不断的炮轰，这里并没有迹象表明有着普罗庆柯所描绘的情况。

“祝您一路平安。”萨什柯垂下了手，说道。

这时她对他产生的母性的感情战胜了其他一切感情。她满心想把他抱起来，紧紧搂在胸口，这样久久地抱着他，不让他受到世上的任何伤害。但是，这样做当然会彻底破坏他们的关系。

“再见，谢谢你。”她取下无指手套，伸手和他握手。

“一路平安。”他又说了一遍。

“哦，我差点忘了。”卡佳带着一丝微笑说，“为什么那条路不能通过？”

萨什柯严峻地垂下眼睛。

“弗里茨们在埋葬他们自己人。他们挖了一个好大的坑！……”

他脸上露出了残酷的、非孩子的笑容。

有好一会工夫，卡佳一面走一面回过头来望着，想多看这孩子两眼。但是萨什柯一次也没有回头，不多一会他就在黑暗中消失了。

就在这里发生了一件使她极为震动、毕生难忘的事。卡佳走了不到二百公尺，照她的感觉，她似乎马上就该走上大路。不料在她登上一个小丘之后，迎面就看见小丘后面停着一辆巨型坦克，长长的炮筒斜拦着她的去路。首先投入她眼帘的是坦克炮塔上一样暗色的、顶上有一个球状物的、奇怪的东西，它突然动起来，原来这是一个戴着坦克帽的坦克手站在打开的舱口。

坦克手非常迅速地把自动枪对着卡佳，就像他是端着瞄准的自动枪等待着她似的。他非常平静地说：

“站住！”

他这话说得很温和，同时又很响亮；说得带着命令的口吻，同时又很客气，因为他是在跟妇女讲话。但主要的是，他说的是纯粹的俄语。

卡佳已经一句话都答不出来，眼泪禁不住从她的眼睛里涌出来。

第五十五章

卡佳碰到的坦克是先遣坦克部队的先头巡逻队，一共有两辆，但是另外一辆停在大路那边，也是在一个小丘后面，所以她在最初一瞬间没有发觉。拦住她的那个坦克手是那辆坦克的车长兼先头巡逻队队长，不过这一点倒是猜不出来的，因为那个军官穿的是普通工作服。

这些都是卡佳事后才知道的。

车长命令她走下小丘，自己从坦克里跳出来，跟着他又跳出一个坦克手。在车长盘问她的身分的时候，她仔细看着他的脸。车长还非常年轻，但是疲倦得要命，显然好久没有睡过觉，所以眼皮不由自主地要耷拉下来，他要费很大的劲才能抬起这两片发肿的眼皮。

卡佳向他解释她是什么人，来的目的是什么。军官的面部表情显示出，她说的一切也许是真，也许是假。但是卡佳并没有注意到这种表情，她只看见面前的这位军官的年轻的脸疲倦得要命，眼泡发肿，这使她一次又一次地热泪盈眶。

从黑暗中，沿着大路突然开来一辆摩托车，在坦克旁边停下，摩托车手用平常的语调问道：

“出了什么事？”

根据问话的性质，卡佳懂得摩托车手是因为她而被召来的。在敌后五个月的工作中，她已经养成习惯去留意平时不为人们重视的那些细节。即使从坦克里用无线电通知摩托车手的所在地，他也不能来得这么快。到底是用什么方法把他召来的呢？

这时另一辆坦克的车长走过来，匆匆地打量了卡佳一眼，两位车长和那个摩托车手便都退到一旁，一起商量了一会。摩托车手就又向黑暗中疾驰而去。

两位车长走到卡佳跟前，年纪较大的一个有点不好意思地问她有没有

证件。卡佳说，证件她只能呈交上级指挥部。

他们一言不发地站了一会，后来第二个车长（他比第一个更年轻）用低音问道：

“您是从什么地方通过的？德国人的防御工事筑得坚固吗？”

卡佳把她关于防御工事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他们，并且说明是一个十岁的男孩带她穿过这些工事的。她还告诉他们，德国人在埋葬他们自己人以及她看到我们的炮弹炸出来的一个弹坑。

“啊，一颗炮弹原来射到那边去了！你听见吗？”第二个车长带着稚气的笑容望望年纪较大的车长，高叫起来。

直到现在卡佳才明白，白天以及后来傍晚时分，她在迦丽亚家里听到的忽而逼近、忽而沉寂的炮轰，原来就是我们的先遣坦克在轰击敌人的防御工事。

从这一分钟起，卡佳跟两位车长的关系变得比较友好起来。她居然敢问先头巡逻队队长，他是用什么方法召来了摩托车手。队长就向她解释，他是用灯光打讯号——开亮坦克后面的小尾灯——把摩托车手召来的。

他们正这样交谈着，摩托车手在车上挂了一个车斗又驶过来了。摩托车手甚至对卡佳敬了个礼，——可以感到，他已经不仅把她当作自己人，而且还把她当作一个重要人物了。

从卡佳坐进车斗起，她就产生了一种全新的感觉。在她到了自己人那里之后，这种感觉还继续了好几天。她猜想，她不过是到了一个插进仍然是敌占区的坦克分队。但是她已经不把敌人的力量放在心上了。敌人也罢，她卡佳这五个月来所过的那全部生活也罢，她一路上遇到的艰难也罢，——这一切不仅已经留在后面，而且在她的意识中也好像后退得老远老远了。

一条伟大的精神分界线把她跟刚才还包围着她的一切分隔开来。现在环抱着她的是一个具有和她同样的感情、体验、思想方法和人生观的人们的世界。而且这个世界是非常巨大，跟她到目前为止所生活的那个世界相比较，它简直是广阔无垠的。她可以乘这辆摩托车再走上一天，再走上一年，到处也还是这个自己人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不用隐藏，不用说谎，不用在精神上和肉体上勉强自己做什么。卡佳重又觉得自由自在了，永远自由自在了。

寒风吹在脸上像刀割似的，可是她心里却感到，她可以放开嗓子歌唱。

摩托车手没有让她坐上一天，甚至不到一小时，——他疾驰了不到两分钟。他在开上一座架在大概是在夏天干涸了的、现在覆着一层薄雪的小河上的小桥时，就略微减低速度。在由这条小河形成的、两边坡度不大的低低的峡谷里，卡佳一眼就看到沿着大路排列过去的十来辆坦克和几辆卡车。在卡车里和卡车旁边，都有我们的所谓机械化步兵队里的自动枪手或坐或立。这是些戴着冬季的暖帽、穿着棉衣的最普通的自动枪手。

这里已经在等待着卡佳。摩托车刚驶下小桥，就有两个穿工作服的坦克手走到她跟前，搀着她的胳臂帮她爬出车斗。

“请原谅，××同志。”一个已经上年纪的坦克手行了个敬礼，用假证件上写的那个来自契尔的女教师的姓称呼卡佳，“请原谅我不得不履行这个手续……”

他用手电筒照着，从上到下地看了她的身分证，马上就还给她。

“一切都没有问题，大尉同志！”他转过身去对另一个坦克手说。那个坦克手的脸上有一道刚结疤的新伤痕，伤痕从前额下来，斜着经过鼻梁和左面

颊。

“冻坏了吧？”大尉问。根据他那亲切、有礼、有时非常温柔的声调以及他那整个谦虚而又威武的姿态，卡佳猜到跟她谈话的是坦克队的指挥员。“又没有时间可以让您暖和一下，——我们就要出发了。不过……要是您不嫌的话……”他用一只不灵活的手很不方便地把挂在肩上的酒壶从腰后面推到前面来，拔掉瓶塞。

卡佳默默地用双手接过酒壶，喝了一大口。

“谢谢。”

“再来点！”

“不喝了，谢谢您……”

“有命令立刻把您送到军团司令部，坐坦克去。”大尉笑着说，“路上的敌人虽然被我们压制住，可是这个地区乱得厉害，鬼知道它！”

“您怎么知道我的姓？”卡佳问，她觉得这一口搀了水的酒精像火一样烧着她。

“他们在等着您。”

就是说，这都是伊凡·费奥多罗维奇，她亲爱的伊凡，为她做好的准备。她觉得心里热呼呼的。

她把她知道的有关村前工事的一切情况又讲了一遍。卡佳猜测，坦克队马上就要去夺取这些高地。果然，在人家扶她爬上炮塔、再下到冰冷的坦克里的时候，——她到了坦克近旁才感到它的庞大，——周围的坦克就令人胆战心惊地吼叫起来，自动枪手们也都直奔卡车。

她要完成她的旅途所乘的那辆坦克里的全体人员一共是四个人。他们各有各的位置。他们让卡佳就坐在作战部分的底上。坦克里很挤，她就坐在车长脚下。全体人员里只有驾驶员没有受伤。

坦克车长头部受伤。他头上包了一层厚厚的药棉，外面又裹上绷带，所以不能戴坦克帽，他戴着普通士兵戴的帽子。他的一支胳臂也受了伤，挂着吊带，所以他总是不自觉地非常小心地保护着它，不让它碰着什么，有时坦克的冲撞使他痛得直皱眉头。

他和他的人员非常不愿意离开他们的伙伴，起初他们对待卡佳态度冷淡，认为都是因为她才害得他们到后方去。原来，只有坦克车长和驾驶员是原来的人员，另外两个是从别的坦克里撤下来的，尽管他们拚命反对，他们的位置还是由这辆坦克里没有受伤的伙伴去顶替了。卡佳被带到坦克跟前的时候，坦克车长和大尉之间发生了一场小小的争执，虽然双方说话非常客气，然而两人的脸色都非常难看。不过脸上伤痕没有痊愈的大尉却坚持自己的意见。他想利用送卡佳的机会顺便把部队里的伤员送走。

坦克开动之后，坦克手们看清楚跟他们同行的是一个年轻妇女，他们对她的态度就改变了。加上他们又知道，卡佳刚穿过他们的坦克队要去夺取的那些工事，大伙都活跃起来。

他们都是些年轻人，大约比卡佳小五六岁。

坦克车长立刻吩咐开辟“第二战场”——人们给美国罐头焖肉起的名字。那个机枪手兼报务员转眼之间就开辟了“第二战场”，把面包切成老厚的一片一片，车长也用左手把他的酒壶递给卡佳。卡佳谢绝了酒，但是津津有味地尝了焖肉和面包。坦克手们轮流凑着车长的酒壶喝了酒，于是在坦克里面就建立起十分融洽的关系。

他们尽量地开快车。卡佳被颠得左右摇晃。突然，站在打开的舱口的炮长蹲下身子，几乎把嘴唇贴到车长的耳朵上，说道：

“上尉同志，听到没有？”

“开始了吗？”坦克车长沙哑地问，一面用腿碰了碰驾驶员的肩膀。

驾驶员把坦克煞住。在降临的寂静中，大伙听到了密集的炮轰声。这些充满了黑夜的响声来自卡佳来的那一边。

“哈哈，弗里茨没有照明弹！”炮长又从坦克里探出头来，得意地说，“我们的坦克干得真带劲！我看到了开炮的闪光……”

“让我瞧瞧！”

上尉跟炮长换了个位置，小心地把他的裹着绷带的脑袋伸出去。在他观看的时候，坦克手们忘了有卡佳在场，对攻势的进程提出种种推测，又因为他们没待在自己的坦克里而表示懊丧。

车长小心地把裹着绷带的脑袋缩进来，他脸上的表情简直好像他是在生病。但是他没有忘记有卡佳在场，立刻终止这场议论。不过卡佳从他脸上还是能看出他是因为不能参加战斗而痛苦。他甚至不得不在他们继续行驶之前准许大伙轮流看一看那边发生的情况。

总的说来，他们都有些情绪低落。但是卡佳是个机灵人，她立刻向坦克手们详细询问战斗的情况。坦克的轧轧声使他们谈话非常费劲，他们一直在大声叫嚷。回忆重新给他们带来温暖。根据他们的不连贯的叙述，卡佳对于她所到的地带的战斗行动已经有了个初步的、大致的了解。

苏联坦克部队越过了沃罗涅什——罗斯托夫铁路上介于罗索什和米列罗沃之间这个很大的地段，击退了卡梅什纳雅河德军防线上的德军，而在北方新马尔柯夫卡村那个地区，甚至到了杰尔库尔河的上游。撤退的德军匆匆地把卡梅什纳雅河和杰尔库尔河之间的分水岭，特别是卡佳经过的那些高地，变为前沿防御地带。新防线经过李马辽夫卡、别洛沃茨克、戈罗季希——普罗庆柯领导下的游击队现在的活动地区，——一直到顿涅茨河米佳金游击队的根据地。对这些地方非常熟悉的卡佳，到现在才能估计出苏军突击的全部威力。同时，她也看到我军进攻路途上的种种困难。他们得占领杰尔库尔河、叶夫苏格河、阿依达尔河、鲍罗瓦雅河的设防的河岸，得占领旧别尔斯克——斯塔尼奇诺—鲁干斯卡雅铁路，最后，得强渡顿涅茨河本身。

卡佳遇到的先遣坦克部队离开跟在它后面相隔大约十五公里的自己的部队已经有两昼夜。部队朝西方推进，摧毁了路上碰到的敌人的全部抵抗据点，占领了几个村庄，其中也包括按照普罗庆柯的指示卡佳要去的那个村子。

卡佳乘的那辆坦克白天曾在先头巡逻队里参加突击她所知道的那几个高地。先头巡逻队突然碰上敌人的工事，就开了大炮和机枪，因而招来了敌人的全部火力。在这次突击中坦克受损坏，车长的头部和臂部负伤。

他们离开战地已经这样远，而且这显然是已经无可挽回的事，所以除了卡佳和驾驶员之外，大伙渐渐都受到疲倦和瞌睡的袭击。对于在激战之后能脱身去休息的战士，这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卡佳对他们不由得起了一种爱怜之感。

他们就这样经过了几个居民点。突然驾驶员回过头来对卡佳大声嚷道：

“我们的人来了！”

他们一直是在大路上行驶，现在却折到田野里，接着驾驶员就把坦克停下来。

夜深了，只有远处和近处战斗的声音——对于军人的耳朵是这样熟悉的声音——不时打破夜的寂静。在这片寂静里，传来了迎面开来的大队钢铁巨物的轰轰声和吱吱声，愈来愈近，愈来愈响。驾驶员用遮着黑布的前灯打了个灯光讯号。车长和炮长爬出坦克，卡佳也在炮塔里伸直了身子。

一队摩托车手在旁边疾驰而过，接着出现了沿着大路和草原开过来的坦克和装甲车。它们的隆隆声充满了黑夜。卡佳用手套捂住头巾底下的耳朵。拖着大炮的黑色炮架尾的庞大笨重的坦克，轧轧地响着，发出刺耳的排气声爬过去。它们给人以强大而可怕的印象，而黑暗也更加强了这种印象。

一辆小装甲车在他们这辆孤零零的坦克旁边停下，里面爬出两个穿军大衣的军人。他们跟车长互相凑着耳朵大声嚷着交谈了一会，间或望望站在坦克炮塔里的卡佳。后来这两个穿军大衣的军人又爬进装甲车，装甲车就在草原上疾驶着去追赶大队的坦克。

坦克跟载着机械化步兵的卡车交替向前移动。卡车平稳地在大路上行驶。自动枪手们都朝草原上这辆孤零零的坦克那面张望，在这辆坦克里，有一个用手套捂着耳朵的妇人也在望着他们。

黑暗里，大量的沉重的铁甲以及仿佛跟它们融为一体的大批人员的这种移动，把卡佳看得目瞪口呆。大概，正是从这一分钟起，在卡佳内心体验到的那种被解放的感觉里，又掺进了一种她久久不能排除的新的感觉。她觉得，看到这一切、经历这一切的好像不是她卡佳，而是另外一个人。她是从旁边看见自己，就像人们在梦中看见自己一样。她初次感到，她对这个以雷霆万钧之力闯进她灵魂的世界已经生疏了。所以在使她应接不暇的、时刻变化着的人物、事件、谈话，最后，还有人们的概念（其中也有全新的和她久已不用的概念）的万花筒里，她久久不知如何是好。

因此，她越发希望看见她的普罗庆柯，希望感到他就在旁边。她为他的担忧近乎是痛苦。爱和怀念使她心痛，并且因为她早已忘了用眼泪来发泄痛苦而使她更加觉得无法弥补。

卡佳所遇到的红军，是已经意识到自己是胜利者的军队。

经过一年半的战争之后，当卡佳看到这个胜利的军队的时候，它非但不缺乏装备，还显示出那样强大的武装力量，这种力量甚至在那些令人无法忘怀的屈辱的日子里，——当敌人用被奴役的欧洲的最好的工厂所能提供的一切武装着，沿着炽热的顿涅茨草原上横冲直撞、无情地扫荡一切的时候，——也超过了敌人的力量。但是使卡佳感触更深的却是现在命运让她遇到的那些人。是的，卡佳在万花筒似的变换中所碰到、所接触到的人，这是具有新的气质的人。他们不仅掌握了强大的新技术，他们的精神面貌似乎也已经进入人类历史上一个更高的新阶段。

卡佳有时痛苦地意识到，他们这些人已经远远超越过她，使她永远望尘莫及。

由头部和臂部受伤的上尉指挥的这辆载着这些非常好的“混合”人员的坦克，把卡佳送到了在行军中被他们碰上的坦克旅的旅部。实际上这并不是旅部，这里只有旅长带着一个作战小组。他们驻扎在昨天早上对故作战时才遭到严重破坏的一个庄子里。

年轻的上校在一所唯一幸存的小房子里接见她。上校眼睛里充满血丝，脸色也像他手下的旅部人员一样，由于睡眠不足而发黑。他因为不能更好地接待她表示歉意，他自己也只是到这儿来稍待片刻，马上就得出发。不过他

还是劝卡佳待在这里，睡一会。

“我们的第二梯队很快就要到来，会有人照顾您，招待您。”他说。

小房子里烧得很暖和。军官们硬让卡佳脱掉皮袄烤一会火。

这个庄子虽然遭到严重破坏，庄子里还是有好多居民——大部分是妇女、儿童和老头。

他们看见苏联军人，而且还是坦克手，觉得又高兴又新鲜。凡是军人们，特别是指挥员出现的地方，都围聚着居民。通信兵在为旅部和它的机关准备一切的时候，已经把电话线接到这座小房子和邻近的一些残破不全的房子里。

卡佳喝了茶，——这是真正的茶。半小时后，旅长的那辆带篷吉普车就送她直奔军部。

现在护送她的只有一个带自动枪的中士。头部裹着绷带的坦克上尉和眼睛充满血丝、脸色黝黑的上校的脸，还有几十张别人的脸，都从她的记忆中消失了。

是一个严寒的早晨，这一带都笼罩着白茫茫的迷雾，但是在迷雾后面的什么地方升起了太阳，卡佳坐的车子径直对着太阳驶去。

他们在用平路机平过的大路上行驶，迎面一直有军队过来。要不是吉普车不断让开大路，在覆着一层薄雪的草原上行驶，卡佳决不会那么快就到达军部。不多一会，吉普车就涉水开过在这一带河水很浅的卡梅什纳雅河。由于不断有坦克和大炮渡河，——大概是在许多地方渡河，——带来了碎冰、雪和泥砂的混合物，河水变得浑浊不堪。

雾霭略微消散了一些，可以直视的太阳低悬在地平线上空。在整条河流的两岸，卡佳都看到现在被我军占领的德军工事。炮弹、来往的坦克和把重炮运往新阵地的牵引车，把周围这一带地方到处弄得七高八低。

过河之后，更难在大路上前进了，因为有大批军队向西南方挺进，还有被俘的占领军的兵士朝着相反的方向移动。这些俘虏分为大小不等的队伍被押送过去。他们穿着被烧坏的军大衣，满脸胡子，浑身肮脏，被战败和被俘的耻辱所压抑，在满是泥泞的大路上或是干脆在草原上慢腾腾地走着。他们经过的地方都留下他们所造成的可怕的破坏的痕迹。世世代代生长庄稼的肥沃的草原饱受蹂躏，村庄横遭焚毁。到处都有外部烧焦的坦克和残缺变形的卡车的黑色残骸，到处都翘着被击毁的大炮的炮架尾或是倾侧着的漆着黑A 字的机翼。草原上和大路上，冻得蜷缩起来的敌军的尸体遍地狼藉。没有人、也没有工夫来收拾他们，坦克和重炮在他们尸体上碾过，把尸体压成可怕的肉酱。

在进攻的队伍里阔步前进以及乘着坦克和卡车的人

们，——这些由于持续了将近十昼夜的艰苦卓绝、终于获胜的战役而疲惫不堪，同时又受它鼓舞的人们，——他们已经不去理会敌人的尸体。只有卡佳，才偶尔带着嫌恶的冷淡斜睨着这些尸体。

这次战役是历史上最大的战役之一，是希特勒军队在斯大林格勒城下大溃灭的环节之一。这次战役愈来愈广泛、愈来愈有力地向西南方向扩展着。在逐渐消散的雾霭中，时而在这边时而在那边展开了空战；在整个辽阔的草原上，重炮轰隆隆地响着。凡是目力所能及的地方，到处都可以看到军队和技术装备、粮食和炮弹的大规模移动（配合着巨大的军事行动的移动）的画面。

要不是有大火的浓烟融散在雾霭里，这一天准是个大晴天。到中午时候，卡佳抵达近卫坦克军军部。这仍然不是一个司令部，而是军长的临时指挥所，设在米列罗沃北部的一个幸存的砖砌铁路车站里。这个设有车站的小镇已经被破坏得荡然无存。但是，也像所有刚解放的居民点一样，这里首先使人注目的是，一方面还在继续激战，一方面已经在着手安排苏联人民的生活。

卡佳在指挥所的军人中间看到的第一个人立刻使她回忆起和平生活，使她回忆起她的普罗庆柯和他们全家，也使她回忆起她卡佳的先做教师、后来做谦逊的人民教育工作者的劳动。

“安德烈·叶费莫维奇！我亲爱的！……”她情不自禁地这样叫了一声就扑到这个人面前，把他抱住。

这是乌克兰游击队司令部领导人之一，五个多月前普罗庆柯即将转入地下工作之前曾接受过他的指示。

“那请您也拥抱我们大家吧！”一个瘦削的、显得很年轻的将军，用长睫毛下面的坚定而聪明的灰眼睛望着她，说道。

卡佳看到将军的晒黑的刚毅的脸和修剪得很整齐的、两鬓开始斑白的头发，突然窘起来，就用双手把脸捂住，低下了裹着暖和的农妇式的深色头巾的头。她就这样双手捂着脸，穿着皮袄和毡靴，站在这些衣冠整洁的军人中间。

“瞧，把人家女同志弄得不好意思了！您连怎样对待女同志都不懂！”安德烈·叶费莫维奇带笑说。

军官们都哄笑起来。

“请原谅……”将军用他那细长的手微微碰了碰她的肩膀。

她把手从脸上拿下来，眼睛放光。

“没关系，没关系。”她说。

将军已经来帮她脱皮袄。

像当时大多数的指挥员一样，以他的职务和军衔来说，军长还嫌年轻。尽管他目前处于这样的环境，他的态度仍旧沉着稳重，好像并非做作，而显得自然，他动作精确，认真仔细，言谈之间充满谨慎而又有点粗犷的幽默，同时又是彬彬有礼。在他周围所有的军人身上，也有着这种沉着、认真、彬彬有礼和普遍整洁的特征。

在翻译普罗庆柯的密码报告的时候，将军把精密地画着伏罗希洛夫格勒州地图的那张卷烟纸整整齐齐地摊在桌上的一张大军事地图上面，就像普罗庆柯当着卡佳的面所做的那样。

（真难以想象，那不过是前天夜里的事！）将军用细长的手指把这张纸弄平，带着明显的满意说：

“搞得真出色，了不起！……该死的东西！”他忽然叫起来，“他们又在加强米乌斯河的防务了。请注意，安德烈·叶费莫维奇……”

安德烈·叶费莫维奇弯下身子来看地图，他的刚强的脸上更明显地露出使他显老的细皱纹。其他的军人也都把脸凑近军事地图上面这张小小的卷烟纸。

“我们已经不必跟他们在米乌斯河打交道了。但是您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将军抬起他的长睫毛下的眼睛愉快地望着安德烈·叶费莫维奇，说，“他们不至于那么笨：他们现在真的要从北高加索和库班撤退了！”

将军笑起来，卡佳的脸却高兴得发红，因为将军所说的跟普罗庆柯的推测竟不谋而合。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里有哪些是我们不知道的。”将军拿起放在军事地图上面一个很大的放大镜，开始细看普罗庆柯的精确的手在一小张卷烟纸上画的那些记号和小圆圈。“这已经知道了，这已经知道了……唔……不错……”他不用看那还没有译好的说明，就能懂得普罗庆柯的记号的意义。“唔，就是说，我们的瓦西里·普罗霍罗维奇并不算坏，可是你老说——‘侦察队不行，侦察队不行！’”将军带着非常隐晦的讽刺对军部的参谋长，站在他旁边的一个留着乌黑的小胡子的大胖子上校，说道。

一个又矮又胖的秃头军人——他没有眉毛，灵活的浅色眼睛里带着难以形容的狡猾神色，——抢在上校前面回答道：

“军长同志，我们这些情报都是一个来源。”他毫不感到窘迫地说。

这就是瓦西里·普罗霍罗维奇，军部的侦察队长。

“哦，我还以为您是自己侦察得来的呢！”将军失望地说。

军官们都笑起来。但是军长的嘲弄的责备也罢，同事们的哄笑也罢，瓦西里·普罗霍罗维奇一概都不介意，——显然他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了。

“不，将军同志，请您注意这儿杰尔库耳河前面的这些材料。要知道，这些材料已经旧了！在这里，我们知道得还要多些。”他泰然自若地说。

卡佳觉得，瓦西里·普罗霍罗维奇的回答似乎在贬低普罗庆柯搜集的情报——她卡佳为之长途跋涉送来的情报——

的意义。

“把这些情报交给我的那位同志，”她用毫不客气的声调说，“叫我先通知你们：有关敌人撤退的一切新情报，他会发过来，而且我想，他已经在把它发出来。这张地图跟它的说明，是让我们知道本州的总的形势。”

“不错。”将军说，“瓦杜丁①同志和赫鲁晓夫同志更需要它。我们要把这张地图转送给他们。我们自己只要利用跟我们有关的那些材料。”

①瓦杜丁（1901—1944 年），苏军指挥员，当时任西南方面军司令员。

一直等到夜保人静，卡佳才有机会跟安德烈·叶费莫维奇好好地谈谈心。

他们不是坐着，而是站在一间空空荡荡、但是炉火熊熊的房间里，点着缴获得来的德国灯盏。卡佳问道：

“安德烈·叶费莫维奇，亲爱的，您怎么会到了这里？”

“这为什么使您奇怪？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了乌克兰境内。虽然地方还小，不过总是我们的！政府要回到我们的故乡，要建立苏维埃秩序。”安德烈·叶费莫维奇微微一笑，他的满布细皱的刚毅的脸顿时显得年轻起来。“您是知道的，我们的军队已经跟乌克兰的游击队协同动作了。所以我们不在这里怎么行呢？”他从上到下打量着卡佳，他的眼睛放着光。但是突然他的脸又变得严肃起来，“我本来想让您休息休息，明天再谈正经事。不过您是个勇敢的人！”他觉得有些难以启齿，但是他的眼睛直望着卡佳的眼睛，“我们想送您回去，直接到伏罗希洛夫格勒。我们需要知道好多只有您才能打听到的消息……”他沉默了一会，然后轻声询问地说道：“当然，要是您非常疲劳的话……”

但是卡佳没有让他把话说完。她心里充溢着自豪和感激。

“谢谢您。”她好不容易才说出这句话。“安德烈·叶费莫维奇，谢谢

您！……什么也别说了。您再也说不出什么能使我感到这样幸福的话了。”她心情激动地说，她的轮廓分明、衬着金发的晒黑的脸变得非常动人。“我对您唯一的请求就是：明天就送我走，不要把我送到方面军政治部去，我不需要休息！”

安德烈·叶费莫维奇想了一想，摇了摇头，然后笑了。

“不过我们并不急。”他说，“我们要把占领的阵线稍微整顿一下，巩固一下。杰尔库耳，特别是顿涅茨，不能一到就拿下来。而且米列罗沃和卡缅斯克还阻挡着我们。也有些情况要您到政治部去谈谈。就是说，我们暂时不着急。您过两三天再走吧……”

“唉，为什么不明天就走呢？”卡佳叫了一声，她的心因为想念和爱而痛苦着。

第三天傍晚，卡佳又到了那个熟悉的村子，到了迦丽亚的农舍里。她还是穿着那件皮袄，包着那条深色头巾，带着契尔女教师的那张身分证。

现在这个小村里驻扎着我们的军队。但是北方和南方的高地仍被敌人据守着。德军防线沿着卡梅什纳雅河和杰尔库耳河中间的分水岭通过去，然后又沿着杰尔库耳河过去，深入到西部。

夜间，还是那样认真、沉默的小萨什柯带着卡佳沿着以前福马老头带她走过的那条老路回去，于是她又到了几天前普罗庆柯送别她的那个小农舍里。

到了这里，无数柯尔尼延柯之中的一个转告她，普罗庆柯知道她要回来，他本人平安无恙，但是没有机会来和她见面。

这一回，卡佳已经没有人伴送，她日夜兼程，一天至多休息两三小时，好容易到了玛尔法那里。可是一到那边，就被玛莎的死讯吓得大吃一惊。

在乌斯片卡村医疗所的秘密接头站被发现了。克罗托娃姊妹因为“警察队”里有自己人给她们通风报信，得以事先离开，并且把接头站失事的消息通知了跟她们有联系的一些地下组织。但是等出事的消息送到玛尔法那里，玛莎已经动身去乌斯片卡了。

想在半路上截住她，但是没有成功。玛莎落到了宪兵队手里，就在乌斯片卡那边被折磨死了。也是从那个自己人口中听说，玛莎至死否认跟地下组织有任何联系，也没有供出任何人。

这是一个令人心碎的消息！但是卡佳甚至没有权利折磨自己的灵魂：她需要力量。

两天以后，她已经到了伏罗希洛夫格勒。

第五十六章

在德国人后方，哪怕是最糊涂的人，对战局毫不理解的人，都会懂得：希特勒匪徒们的末日来临了。

在像克拉斯诺顿那样远离前线的地方，这首先根据希特勒匪徒的小伙伴，合伙抢劫的伙伴——匈牙利和意大利的雇佣兵以及安东尼斯库①的残部——仓皇逃窜的情形就可以看得出来。

①安东尼斯库是一九四〇至

一九四四年罗马尼亚的军事法西斯独裁者，追随希特勒，一九四六年由布加勒斯特人民法庭判处死刑。

罗马尼亚官兵们在各条大路上乱跑，没有汽车运输和炮队。他们不分昼夜，乘坐套着疲惫不堪的马匹的车子缓慢移动或是步行。他们把手笼在下摆烧坏的军大衣的袖子里，戴着高高的羊皮帽或是船形帽，冻坏的面颊用毛巾或是羊毛女裤衩包着。

一辆马车在柯舍沃伊家的院子旁边停下，里面跳出一个以前在这里住过的军官，直往屋子里跑。勤务兵把军官的一只大箱子和自己的一只小箱子提进去。他因为要捂住一只冻伤的耳朵，所以走路歪着脖子。

军官患了齿龈脓肿，制服上没有带金肩章。他跑进厨房，马上就在灶旁伸出手来烤火。

“喂，事情怎么样啦？”柯里亚舅舅问他。

军官没有牵动鼻尖，——他的鼻子冻伤了，不能动了，——但他的脸上仍然露出他牵动鼻子时的表情，接着突然扮了个模仿希特勒的鬼脸：由于他的两撇小胡子和疯狂的眼神，倒扮得惟妙惟肖。他扮着希特勒的模样，再踮起脚尖做出要逃跑的样子。他甚至连笑都不笑，足见他并非开玩笑。

“咱们回家找女当家的去！”勤务兵好心肠地说，他小心地斜过眼来看看军官，又对柯里亚舅舅挤挤眼。

他们烤完了火，吃了点东西，刚提了箱子走出去，外婆忽然灵机一动，掀起叶列娜·尼柯拉耶芙娜床上的被子一看，两条被单已经不翼而飞了。

外婆火冒三丈，这一气甚至变得年轻起来，她拔脚跟在客人后面追出去，在大门口大嚷大叫，吓得连那军官都懂得，他马上就会变成这场风波的中心。他命令勤务兵打开小箱子，在勤务兵的小箱子里果然有一条被单。外婆一把抓过被单，大声嚷道：

“还有一条呢？”

勤务兵拚命朝主人那边转动眼珠，但是那一位亲手抢过自己的箱子，已经爬上马车。只要这位古罗马人的后裔连同他的勤务兵不被什么乌克兰或是摩尔达维亚游击队员送往极乐世界，这条被单不被他们拿去使用，他就可以把这条被单带回罗马尼亚。

由于出人不意，最冒险的行动有时会比准备得十分周密的行动更容易获得成功。但更多的情形是，最重大的事业却往往因为走错一着而全盘失败。

十二月三十日晚上，谢辽萨和华丽雅跟几个同伴去俱乐部，在路上看见一幢房子旁边停着一辆德国卡车。车上堆满麻袋，但是没有警卫，也没有司机。

谢辽萨和华丽雅爬上卡车，摸模麻袋。根据种种情形判断，里面装的是新年礼品。头一天下过一场雪，不大，天气转冷了，四周被雪色映得很亮。街上还有人行走，可是青年人还是冒险从卡车上扔下几袋，把它们分别塞在附近的院子里和小木棚里。

俱乐部经理莫什柯夫和艺术指导万尼亚向他们建议，等聚在俱乐部玩乐的那批年轻人一散，就把礼品搬进俱乐部：那里有许多各式各样隐蔽的地下室。

群集在卡车旁的一些德国兵，特别是一个穿狗皮领皮大衣和代用品做的毡靴的上等兵，都醉醺醺地拉开嗓门大骂。可是那家女主人——她连大衣都没有穿——就跑了出来说，这不能怨她。那批德国人也看得出，是不能怨

她。弄到末了，德国人上了车，女主人也跑进房子。于是德国人就开着卡车折到通峡谷的斜坡，向宪兵站开去。

青年人把麻袋拖进俱乐部，藏在地下室里。

早上，万尼亚跟莫什柯夫在俱乐部碰头，决定把一部分礼物，特别是香烟，应该在当天，就在除夕拿到市场去卖，因为组织需要钱。碰巧斯塔霍维奇也在俱乐部，他也赞成这个办法。

偷偷摸摸地出卖一些零星德国货，在市场上是不足为奇的。首先，德国兵就在干这种买卖，拿香烟、烟叶、蜡烛、汽油来交换伏特加、御寒用品和食物。这种德国货被一再转手贩卖，“警察”对这种事也听之任之。所以莫什柯夫手下已经有一批固定的街头顽童，他们情愿靠卖香烟来赚取一点外快。

这天一早“警察”们就在失窃地点附近的房子里进行搜查，但是没有发现礼物，所以他们特别注意，会不会有人拿到市场上贩卖。结果就有一个男孩连香烟一起被“警察队长”索里柯夫斯基亲手捉住。

审讯时那男孩说，他这些香烟是拿粮食跟人家换来的。男孩吃了一顿鞭子。但是这种街头的顽童在生活中吃鞭子不是第一次；而且他受的熏陶是，不可以出卖同伙。于是这个男孩就被打得遍体鳞伤，哭肿了眼睛，后来被投进牢房，等天黑再说。

“警察队长”在向勃柳克纳宪兵站长汇报其他许多事件的同时，也一并汇报了捉住一个贩卖德国香烟的孩子的案件。勃柳克纳把这件事和其他卡车的失窃事件联系起来，愿意亲自出马来审讯这个孩子。

迟暮时候，在牢房里熟睡的孩子被唤醒，带进了勃柳克纳宪兵站长的办公室，一进去立刻就被带到宪兵站的两个官员、“警察队长”和翻译面前。

孩子齉着鼻子把他的那一套话重复了一遍。

宪兵站长大发雷霆，揪住孩子的耳朵，亲手把他从走道里拖过去。

孩子进去的那间牢房里，摆着两张血迹斑斑的刑床，从天花板上挂下几根绳子，一张用支架撑着的白木长桌上摆着通条、铁锥、用几股电线拧成的鞭子和一把斧头。生着一只铁炉子。屋角里放着几桶水。牢房的墙脚有两道像澡堂里那样的排水沟。

一个胖胖的、有点秃顶的德国宪兵，坐在支架旁的凳子上抽烟。他戴着浅色玳瑁边眼镜，身穿黑制服，通红的大手上长满了浅色汗毛。

孩子瞅了他一眼，就吓得发抖，说出这些香烟是他在俱乐部里从莫什柯夫、万尼亚和斯塔霍维奇那里拿来的。

在这同一天，五一村的维丽柯娃在市场碰到她的女友李亚德斯卡雅。从前她们俩在学校里同课桌，可是战争一开始，李亚德斯卡雅的父亲被调到克拉斯诺顿村去工作，她们就分开了。

她们说不上有什么友谊。她们所受的熏陶都是同样着眼于个人利益，而这种熏陶并不能促进友谊。然而她们只要从一言半语中就能相互了解；她们有着同样的兴趣，而且从相互的交往中相互利用。她们从小就从她们的父母以及她们父母交往的那个圈子的人们那里学到一套处世哲学，认为所有的人都只是追求个人利益，人生的目的与使命就是勾心斗角，不让别人把你排挤掉，相反地，你最好能踩着别人往上爬。

维丽柯娃和李亚德斯卡雅在学校时担任各种社会工作，对于一切表现现代社会概念和道德概念的词汇都能运用自如。但是她们都深信，这些活动

也好，这一切词汇也好，甚至连她们在学校获得的知识也好，都是人们臆造出来为他们追求个人利益和损人利己的意图做幌子的。

她们见面后虽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喜悦，但是仍旧非常满意。她们亲切地互相伸出伸得笔直的手掌。矮小的维丽柯娃戴着风帽，两条小辫在厚呢领上朝前戳着；李亚德斯卡雅生得身材高大、红头发、高颧骨，染了指甲。她们离开市场上乱哄哄的人群，走到一旁聊起来。

“唉，他们这批德国人，也算是我的救星！”李亚德斯卡雅说，“什么文化、文化，他们一心只想大吃大喝，不花钱玩乐……不，原来我对他们抱的希望还更大些……你在哪儿工作？”

“在以前的牲畜采购站办事处……”维丽柯娃露出满脸的委屈和怨气：她总算能够跟一个能从正确的观点来批评德国人的人谈一谈了。“只有面包，两百克，别的一概没有……他们是笨蛋！一点不重视自愿去给他们服务的人。我非常失望。”

维丽柯娃说。

“我一眼就看得出：划不来。所以我没去。”李亚德斯卡雅说。“而且起初我过得的确不错。我们那边有一伙朋友，关系很亲密，他们总派我乘着车子到各个哥萨克村子里去交换东西……后来有一个女的为了个人打算揭发我，说我不是职业介绍所介绍来的。可是我根本不理她那一套。我们那边有一个职业介绍所派来的代表，一个老家伙，非常滑稽。他甚至不是德国人，他是什么拉林吉亚地方的人。我陪他玩了一阵，后来他还亲自给我送来烟啦、酒啦。可是后来他病了，派来替他的那个人粗暴极了，他一来就派我去矿井。你该知道，摇绞车可不是什么好玩的！我就是为了那个缘故才到这儿来的，说不定在这儿的介绍所里能设法找到个比较好的差事……那里面你有没有靠山？”

维丽柯娃任性地把嘴巴一撅。

“我才不希罕他们呢！……我可以对你这么说，最好是跟军人来往：第一，他是临时的，就是说，迟早要走，你对他一点没有义务。而且他也不那么小器，他知道，他可能明天就被打死，叫他去玩他也还舍得花钱……你几时到我们家来玩？”

“叫人怎么来法，——十八公里的路途，再到你们五一村还有多少路啊！”

“五一村难道早就不再是你们的了吗？……说什么也要过来玩玩，讲讲你找到了什么工作。我可以给你看几样东西，也许，送你一点东西，明白吗？来吧！”维丽柯娃说了就把自己的小手伸得笔直，随便朝她伸过去。

晚上，那天去过职业介绍所的一个女邻居交给维丽柯娃一张字条。李亚德斯卡雅写道：“你们介绍所的笨蛋比我们村里的更坏，”她说她是一事无成，所以“希望破灭地”回去了。

除夕之夜，在五一村以及城里其他各区都进行了一次重点搜查，在维丽柯娃家里发现了这张被她随便塞在一叠旧练习簿中间的字条。进行搜查的是侦查员库列肖夫。不用他施加压力，维丽柯娃就说出女友的姓名，由于害怕，还把女友的“反德情绪”添油加醋地乱说了一通。

库列肖夫吩咐维丽柯娃过了年到“警察队”去，自己就带着字条走了。

第一个知道莫什柯夫、万尼亚和斯塔霍维奇被捕的是谢辽萨。他通知了娜佳姐姐和达莎姐姐、他的朋友维佳之后，就跑去找奥列格。他在那里碰到华丽雅和伊凡卓娃姊妹：她们每天早上在奥列格家里集合，接受他交给她

们当天的任务。

奥列格和柯里亚舅舅这天夜里收听并且记录了苏联情报局关于红军在斯大林格勒地区六个星期进攻的总结、关于德军整个庞大的集团军群在斯大林格勒受双重包围的战报。

姑娘们嘻嘻哈哈地拉住谢辽萨的手，七嘴八舌地把这些消息告诉他。不管谢辽萨是多么坚强，在他说出他的骇人的消息时，他的嘴唇还是颤抖起来。

奥列格面色惨白，呆呆地坐了一会，两只大手的长手指交叉着，额上露出一道道纵纹。

后来他站起身来，脸上又露出平时那种活跃的表情。

“姑娘们，”他轻轻地说，“你们去把杜尔根尼奇和邬丽亚找来。跟总部有密切联系的那些人家里，都去一下，告诉他们把所有的东西都藏起来，不能藏的就毁掉。告诉他们，过两小时会让他们知道下一步怎么做法。你们要预先让你们的亲人知道……还有别忘了刘巴的妈妈。”他说（刘巴到伏罗希洛夫格勒去了）。“我要出去一下。”

谢辽萨也穿上短棉大衣，戴上即使冷天也不换的便帽。

“你上哪儿去？”奥列格问。

华丽雅突然脸红起来：她以为谢辽萨穿起衣服来是要陪她出去。

“在大伙准备的时候，我到街上去望一会风。”谢辽萨说。

这时大伙才初次想到，万尼亚、莫什柯夫以及斯塔霍维奇的遭遇，随时也会落到他们头上，甚至可能就在眼前。

姑娘们在自己中间分派好谁去谁家之后，都出去了。谢辽萨在院子里唤住华丽雅。

“你千万要小心。要是我们已经不在这里，你就到医院去找娜塔丽雅·阿列克谢耶芙娜，我会到那边找到你。没有你，我哪儿也不去……”

华丽雅默默地点点头，就跑去找杜尔根尼奇。

奥列格竭力跨着他平时的步子，向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家走去。她住在离职业介绍所不远的一条街上。

奥列格去找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的时候，她正在悠然自得地做家务事——她在削土豆，把它们放进在灶上冒热气的小铁锅里。等奥列格对她说了同伴们被捕的消息，这个镇定沉着的妇人顿时变得面色惨白。刀从她手里落了下来，她有半晌一句话也说不出。后来她才定了定神。

这一天是元旦，是放假的日子。早上她已经给刘季柯夫去送过牛奶，大天白日再到他家去很不好。但是事情又刻不容缓：有许多事情可能决定于不仅是几小时之内，而是在几分钟之内。

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对于“青年近卫军”的一切事情虽然一向很熟悉，她还是仔细询问奥列格，被捕的人里面有没有人知道奥列格和杜尔根尼奇跟区委的联系。当然，这几个被捕的人都知道联系是有的；但是没有人知道，跟什么人发生个人联系。莫什柯夫本人就跟区委有联系，不过他这个人在各方面都是可靠的。万尼亚只是通过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跟区委发生联系。她深知万尼亚的为人，所以她头脑里根本没有想过她本人会遇到危险。

糟糕的是，斯塔霍维奇对于“青年近卫军”的事知道得太多。奥列格描述他是个正直的人，不过性格软弱。

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让奥列格在她家等着，教他如果有外人来找她应该怎样对答。

可以想象，这一个小时对奥列格说来是多么难熬！幸亏没有人来串门。只听见邻人在隔壁忙碌。

最后，她总算回来了……严寒使她的脸色显得精神饱满。同时，显然刘季柯夫曾说出一番话来在她心里注入了希望。

“你听我说。”她取下头巾，解开大衣的扣子，就在奥列格对面的凳子上坐下，“他叫我告诉你们不要泄气。他还吩咐你们：全体总部委员，所有跟总部或是跟被捕的人接近的人，全都离开城里，要赶紧离开。你们留下两三个可靠的人来领导组织，让负责的来跟我联系，事情安排妥当以后你们就走……要是有人能躲在乡下或是躲在其他比较远的城市里，就让他去躲起来。至于总部委员，还有跟总部接近的人，他建议你们到顿涅茨河对岸北面的几个区里去，——到那边可以越过战线，或是等待我们的军队到来……别忙，话还没说完……”她防奥列格要问什么，这样说。“他吩咐我给你一个地址。你要仔细听着。”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的脸突然板起来，“这个地址你只能告诉杜尔根尼奇。也只有你们俩有权利用它。除此之外不能再给别人，绝对不许给别人，不管你们是多么爱别的青年……或是姑娘们。你明白吗？”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轻轻地说，又注意地望了望奥列格。他明白她是想到了谁。

他缩着脑袋坐了一会，额上现出了成年人才有的很深的纵纹。

“我们，我跟杜尔根尼奇，一定要去这个地方吗？”他轻轻地问。

“不，当然不……不过这是个绝对可靠的地址。那边非但能把你们藏起来，还会给你们工作……”

她从奥列格的脸上可以看出，他内心在进行着多么痛苦的斗争。但是他提出的问题却完全出乎她的意料：

“那么监狱里的人呢？我们怎么能连营救他们的办法都不想就一走了事呢？”

“现在你们反正帮不了他们的忙。”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突然非常严厉地说。“区委会尽力想办法。你们留下工作的青年人，我们也要吸收过来。你们留下谁来负责？”

“波波夫·阿纳托里留下。”奥列格考虑了一下说，“万一他出了什么事，那么就是柯里亚·苏姆斯柯依。您知道他吗？”

他们沉默了一会。他已经该走了。

“你到底打算到哪里去？”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轻轻地问。她现在只是作为一个爱他并爱他全家、跟他们关系密切的人来问他。他可以感到，她是多么焦虑不安。

奥列格的脸变得那样抑郁忧伤，使她不禁后悔自己不该这样问。

“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他痛苦地、费力地说出这句话，“您知道，我为什么不能利用这个地址……”

是的，她知道：是为了妮娜！他不能撇下妮娜。

“我们试试一同越过战线。”奥列格说，“告别了。”

他们拥抱了。

奥列格出去的时候，杜尔根尼奇来到他家，过了一会斯巧巴和谢尔格不召自来，再过一会若拉也来了。沃洛佳没有跟他一块来。今天，一月一日

早晨，沃洛佳满十八岁，他妹妹刘西雅织了一双御寒的毛袜送他过生日，他们一块下乡去探望祖父去了。

杜尔根尼奇派几个人在房子的四面望风。

邬丽亚住得很远，杜尔根尼奇和谢辽萨两人不等她来就开始商量。

现在他们应该怎么办呢？这是他们必须作出答复、并且必须立即答复的唯一的问题。他们懂得，问题不仅关系到被捕同志们的命运，而且关系到整个组织的命运。等待这一切怎样变化吗？他们每一分钟都可能被捕。躲藏起来吗？他们又无处可躲：大家都认识他们。

华丽雅回来了，然后邬丽亚跟奥丽雅，还有她们在路上碰到的妮娜也来了。妮娜说，俱乐部旁边有德国宪兵和“警察”站岗，不放人进去。周围的人都已经知道俱乐部的负责人被捕，在俱乐部的地下室里发现了德军的新年礼物。

杜尔根尼奇和妮娜说出他们的推测，认为这是青年人被捕的唯一理由。不管这件事本身是多么令人痛苦，但这总还不是组织的破坏。

“他们不会泄露的。”杜尔根尼奇怀着他固有的信念说。

这里奥列格走了进来，他一言不发，带着忧心忡忡的神情在桌旁坐下。后来他把杜尔根尼奇叫到外婆的房间里，把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给他的那个地址转告了杜尔根尼奇。他们稍稍商量了一会，就回到姑娘们和谢辽萨那里。大伙都在肃静无声地等待着他们。大伙都带着询问的神情看着奥列格，怀着痛苦和希望看着他。

奥列格开始说话的时候，他的脸甚至变得冷酷起来。

“认为我们可能平安无事的那些想法，我们必—必须放弃。”他说，一面用坦率而勇敢的目光望了望大伙。“不—不管这对我们是多么痛苦、多么困难，那种认为我们可以留在这里等待红军到来、可以在后方帮助他们的想法，我们都必须放弃，连我们明天还计划去做的一切，我们也必须放弃……不然的话，我们就要断送自己，还要断送我们所有的人。”他勉强克制着自己说。大伙都面色惨白、凝然不动地听着他讲话。“德国人搜寻了我们好几个月。他们知道我们的存在。他们是偶然击中了组织的核心。即使除了这个礼物案件之外他们什么都不知道，而且将来也查不出来，”他强调说，“他们也会把我们聚集在俱乐部周围的人全部都抓起来，还会抓上几十个无辜的人……那么到底怎么办呢？”

他沉默了一会。“离开……离开城里……是的，我们必须分散。当然，不是全部都走。

这次的出事恐怕不会波及克拉斯诺顿村的人。五一村的人也不会波及。他们可以工作。”他突然非常严肃地望了望邬丽亚。“邬丽亚除外：她是总部委员，随时可能被暴露……我们忠诚地斗争过，”他说，“我们有权怀着已经尽了职责的心情分手……我们失去了三个同志，其中有最优秀的——万尼亚·捷姆奴霍夫。但是我们不应该垂头丧气地分手。我们已经做了我们所能做的一切……”

他沉默起来。其余的人谁也不愿意、而且也不能再说什么了。

他们并肩战斗了五个月。在德国人统治下的五个月，就肉体和精神上所受的熬煎以及所付出的努力来说，在这种统治下的每一天都远远超过一星期中普通的一天……五个月，——这些日子是怎么过去的啊！在这个时期里大伙都有了多大的改变！……他们认识了多少崇高的和可怕的、善良的和卑

鄙的事物，他们在共同的事业里和相互的关系中投进了自己灵魂里多少光明而美好的力量！直到现在他们才看出来，“青年近卫军”是一个怎样的组织，他们从这个组织里获得了多少裨益。可是现在他们却必须离开它了。

姑娘们——华丽雅、妮娜、奥丽雅——在低声啜泣……邬丽亚坐在那里外表镇静，她的眼睛里却射出可怕的、强烈的光芒。谢辽萨俯首在桌上，嘟起他的好像有些肿的嘴唇，用指甲在台布上画图案。杜尔根尼奇沉默无言，目光炯炯地凝望着前面；在他的秀气的嘴唇上更明显地现出了严峻坚毅的线条。

“有没有别—别的意见？”奥列格问。

没有别的意见。但是邬丽亚说：

“我看不出我有必要现在就走。我们五一村的人跟俱乐部很少联系。我再等一阵，也许我可以继续工作。我会小心的……”

“你应该走。”奥列格说了又非常严肃地望了她一眼。

一直没有开口的谢辽萨忽然说：

“她一定得走！”

“我会小心的。”邬丽亚又说道。

他们避免目光相遇，怀着沉重的心情决定留下三个人组成总部：波波夫、苏姆斯柯依和邬丽亚，假如她不走的话。要是刘巴回来以后知道她可以留下，她就是第四个。通过了一项决议：大家要尽快离开。奥列格说，他跟担任联络员的姑娘们要等通知遍了所有的人，跟波波夫和苏姆斯柯依联系上了再走。但是总部委员和接近总部的人们，今天谁也不应该留在家里过夜。

他们唤来了若拉、谢尔格和斯巧巴，把总部的决议通知他们。

然后大家开始告别。邬丽亚走到奥列格面前。他们拥抱了。

“谢谢你。”奥列格说，“谢谢你一向……”

她温柔地抚摩了他的头发。

但是当姑娘们开始跟邬丽亚告别的时候，奥列格忍受不住了，就到院子里去。谢辽萨跟着他走出来。他们大衣也没有穿就站在严寒里，站在一九四三年的耀眼的阳光下。

“你都明白吗？”奥列格声音喑哑地说。

谢辽萨点点头。

“都明白……斯塔霍维奇可能挺不住……是吗？”

“不错……不过这样说不大好：你还不知道实情的时候，不信任别人是不好的。他一定已经在受苦，可是我们都是自由的。”

他们沉默了一会。

“你打算到哪里去？”谢辽萨问。

“我想试试越过战线。”

“我也是……我们一块走好吗？”

“当然好。不过还有妮娜和奥丽雅跟我一块走。”

“我想，华丽雅也会跟我们一起走。”谢辽萨说。

谢尔格带着满脸抑郁和尴尬的神情过来跟杜尔根尼奇告别。

“等一下，你怎么啦？”杜尔根尼奇仔细打量着他说。

“我暂时留下。”谢尔格闷闷地说。

“欠考虑。”杜尔根尼奇轻声地说。“你帮不了她的忙，也保护不了她。还等不到她回来，你自己就会被抓起来。她是个机灵的姑娘：不是逃走，就

是把他们哄骗过去……”

“我不走。”谢尔格说。

“越过战线到我们军队里去！”杜尔根尼奇厉声说，“我目前还没有卸任，我命令你！”

谢尔格不做声了。

“喂，政委同志，那么，你是要越过战线？这是最后的决定吗？”杜尔根尼奇看见奥列格走进来，这样问道。他不满意奥列格不肯利用给他们俩的地址，但是认为没法说服奥列格改变主意。他听说他们要五个人结伴同行，就摇了摇头：“人太多一点……那么，在回到这里相见以前，我们大伙都要在红军队伍里了！……”

他们互相拉着手，把身子凑近吻别。杜尔根尼奇突然挣脱身子，双手一摆，跑了出去。

谢尔格吻了奥列格一下，也跟着杜尔根尼奇出去了。

斯巧巴有亲戚在卡缅斯克，他决定在那里等待红军到来。若拉心里却进行着他对谁都不能讲的斗争。但是他知道，他留下来不行。大概，他只好仍旧到新切尔卡斯克去找他叔叔，上次他跟万尼亚就是要去那里而没有去成……若拉忽然回忆起他跟万尼亚的全部旅程，眼泪不禁夺眶而出，他就到外面去了。

奥列格、谢辽萨和担任联络员的姑娘们，他们五个人在一起待了几分钟。他们决定，谢辽萨已经犯不上回家去，就让奥丽雅通过维佳去通知他的亲人。

然后，华丽雅、妮娜和奥丽雅分头出去把通过的决议通知应该知道的人，谢辽萨就穿上衣服出去望风：他知道，奥列格需要单独跟家里人在一块待一会。

在餐室里和外婆的房间里举行这些会议的时候，奥列格的亲人们已经知道万尼亚以及其他人被捕的消息，知道青年人正在商量这件事。

家里原来保存着武器、做红旗的布、传单，——叶列娜·尼柯拉耶芙娜和柯里亚舅舅把这些东西一部分藏起来，一部分销毁。柯里亚舅舅把收音机埋在厨房下面的地窖里，压平上面的土，再在这块地方放上一桶酸白菜。

但是现在这些事都做完了，家里的人聚在柯里亚舅舅的房间里，信口胡乱答应着玛丽娜的三岁小儿子的饶舌和调皮的话。大家都像被判决的犯人似的等待会议的结果。

最后一批同伴们出去后，门砰的一声关上了，接着奥列格就走了进来。大伙都转过脸来望他。思想斗争和干劲十足的痕迹从他脸上消失了，但是经常流露的稚气也消失了。他脸上带着悲伤的神情。

“妈妈……”他说，“还有你，姥姥……还有你，柯里亚，和玛丽娜……”小男孩欢叫着搂住他的腿，他就把一只大手放在孩子的头上。“我要跟你们告别了。帮我收拾一下……然后我们最后在一块坐一会，就像以前……就像很久以前那样坐在一块……”这时他的眼睛里和嘴唇上掠过一丝遥远的、温柔的笑意。

大伙都站起来围着他。

……母亲的手在忙碌！像鸟儿似的忙着缝制柔若无物的小衣服，那时这些小衣服还没有人穿，那时他还只是用强烈而又柔和得令人揪心的撞动在母腹里躁动。母亲的手忙碌着用襁褓把他包好带他出去作初次的散步，忙碌

着打扮他送他入学。后来就是送他出门以及出远门，——送别和重逢、罕有的欢乐的时刻和无穷的忧虑交织成的全部生活。当他人还在、还存有希望的时候，母亲的手忙碌着；在希望幻灭的时候，母亲的手也忙碌着给孩子穿上衣服入殓……

每个人都有事做。又跟柯里亚舅舅一起翻阅了一阵文件。日记本得烧掉。有人把他的团证和空白的临时团证缝在短外衣里面。给他缝补了一套换洗的内衣。把所有东西都放进背包：食物、肥皂、牙刷、针和黑白两色的线。给谢辽萨找了一顶带护耳的旧皮帽。又把一些吃的东西放在另外一个背包里给谢辽萨，他们不是有五个人吗……

只是没能像以前那样坐一会……谢辽萨一会进来，一会出去。后来华丽雅、妮娜和奥丽雅回来了。夜幕已经降临。需要告别了……

谁也没有流泪。维拉外婆仔细打量了每个孩子，给这个扣上一个钮子，给那个扶正一下背包。她慌乱地把每个孩子搂在怀里再推开，她把奥列格搂抱了很久，尖尖的下巴紧贴着他的帽子。

奥列格拉着母亲的手，他们走到另外一个房间里。

“原谅我。”他说。

母亲跑到院子里，寒气扑面，她的脚冻得冰冷。她已经看不见他们，她只能听到他们踏在雪上发出的沙沙声，——这声音轻得几乎听不出，现在它也消失了。可是她还久久伫立在黑夜的星空下面……

天刚破晓，一夜没有阖眼的叶列娜·尼柯拉耶芙娜就听到一阵敲门声。她连忙披上衣服，问道：

“谁？”

来的有四个人：“警察队长”索里柯夫斯基、芬庞军士、还有两名兵士。他们要找奥列格。叶列娜·尼柯拉耶芙娜说，他拿了点东西下乡换食物去了。

他们在屋子里进行了搜查，逮捕了所有住在里面的人，连维拉外婆、玛丽娜和她三岁的小儿子也被带走。外婆只来得及向邻居打个招呼，请照顾一下他们的家。

进了监狱，他们被分别关在各个牢房里。玛丽娜带着孩子蹲的那间牢房里，关着许多跟“青年近卫军”没有关系的妇女。但是其中有玛丽雅·安德烈耶芙娜·鲍尔茨和谢辽萨的姐姐菲尼亚——她带着孩子们单住在另外的地方。玛丽娜听菲尼亚说，两位老人家——舒尔卡妈妈和甚至拄着拐棍的驼背的“爷爷”——也都被抓进来。娜佳姐姐和达莎姐姐及时避开了。

第五十七章

万尼亚是黎明时被捕的。他本来准备到下亚力山德罗夫卡去看望克拉娃，摸黑就起床，拿了个面包头，穿了大衣，戴上暖帽，就出了门。

异常洁净而浓密的杏黄色朝霞像一条平滑的带子横在地平线上，比弥漫在苍白色晴空中的粉灰色的轻雾稍低一些。几缕浅粉红色和鹅黄色的细烟，非常浓密同时又非常轻飘，滞留在城市上空。这些景色万尼亚一点都看不见，但是他从小就记得，在这种严寒晴朗的清晨常常是这样的，于是在他

的没有戴眼镜的脸上，——他把眼镜藏在里面的口袋里，免得镜片蒙上水汽，——现出了幸福的表情。他也就是带着这种幸福的表情遇见了走到房前的四个人，一时他还没有看清楚来的是德国宪兵和“警察队”新来的侦查员库列肖夫。

在他们走到万尼亚紧跟前，他认出他们的那一刻，库列肖夫已经在向他问话，于是万尼亚心里明白，他们是来找他的。到了生活中的关键时刻他总是这样，就在同一刹那，他变得极端地冷静和镇定，他也听清了库列肖夫问他的话。

“不错，就是我。”万尼亚说。

“你闯了祸了……”库列肖夫说。

“我跟家里说一声。”万尼亚说。但是他已经知道，他们不会让他进屋，因此他就转过身去，敲了敲离他最近的窗户——不是敲玻璃，而是用拳头敲窗框当中的横挡。

就在这一刹那，库列肖夫和一个宪兵抓住了他的手，库列肖夫很快地摸摸他的大衣口袋，又隔着大衣摸了他的裤袋。

通风小窗打开了，姐姐伸出头来；万尼亚看不清楚她脸上的表情。

“告诉爸爸妈妈，他们叫我到‘警察队’去一趟，让他们别担心，我很快就会回来。”他说。

库列肖夫的鼻子里哼了一声，摇摇头；一个德国兵陪他走上台阶：他们要进行搜查。一个德国军士和另外一个兵士却带着万尼亚走上在这条车马稀少、积雪不深的街上沿着一排房屋踩出来的小道。那条小道很窄，那个中士和兵士只好在雪上走，他们放开了万尼亚，紧跟在他后面。

万尼亚就这样穿着大衣、戴着暖帽、穿着后跟磨坏的破皮鞋，被推进一间四壁结霜、地上滑腻、又暗又小的牢房。他进去之后，牢门就上了锁。只剩下了他一个人。

晨光勉强可以射进天花板底下的窄缝。牢房里既没有铺板，又没有床。屋角里的马桶臭气熏人。

他是为什么被捕的？他们对他的活动是否有所察觉？只是有嫌疑呢？还是有人出卖？这种种的猜测，和对于克拉娃、对于父母、以及对于同伴们的怀念，一齐涌上心头。但是他仿佛在说服自己：“镇静，万尼亚，千万要镇静！”并且以素有的意志力使自己的思想都集中在此刻对他是唯一的、主要的想法上：“要忍耐，过一会就会明白……”

万尼亚把冻僵的双手插进大衣口袋，低下戴着暖帽的头，靠着墙，就这样以他固有的耐性站了很久，他也不知道有多久，也许有几个小时。

走廊里不断有一个人或是几个人的沉重的脚步声从一头走到另一头，牢房的门老是砰砰地响着。不时传来遥远的或是较近的人声。

后来有几个人的脚步声在他的牢房门口站住，有个沙哑的嗓音问道：

“在这里面吗？……带去见站长！”

这个人又往前走，钥匙在锁孔里响起来。

万尼亚离开墙边，转过头来看了一看。进来了一个德国兵，不是原来押送他的那个，而是另外一个，手里拿着钥匙，大概是在走廊里值班的；还有一个“警察”，万尼亚认得他的脸，因为在这段时期里他们研究了所有的“警察”。万尼亚被这个“警察”带进勃柳克纳宪兵站长的接待室，在那里，他看见他们派出去卖香烟的孩子中的一个，由另一个“警察”看管着。

那孩子的脸瘦削得多了，又没有洗；他瞅了万尼亚一眼，把肩膀一耸，用鼻子吸了一口气，就扭过脸去。

万尼亚感到了某种轻松。不过他还是要推得干干净净，因为即使他承认他偷礼物是为了弄点钱贴补贴补，他们也会要他供出同谋的。不，不应该以为这件事可以顺顺当当地过去……

一个德国文书从宪兵站长办公室走出来，拉着门，身子闪在一旁。

“走呀……走呀……”“警察”把万尼亚推到门口，带着惊慌的神气急急地说。另一个“警察”抓着孩子的脖子，也把他推过来。万尼亚跟那孩子差不多是同时进了办公室，他们背后的门就关上了。万尼亚脱下了帽子。

办公室里有好几个人。万尼亚认出了桌子后面靠着椅背坐着的勃柳克纳宪兵站长，他的制服衣领上面露出的脖子上有一道道的粗褶，他用猫头鹰似的滚圆的眼睛直瞪着万尼亚。

“走过来些！现在你可老实啦……”索里柯夫斯基嗄声说，他的声音好像是从密林里透出来的。他站在宪兵站长的桌前的一侧，又粗又大的手里拿着鞭子。

站在另外一边的侦查员库列肖夫伸出一支长胳膊抓住孩子的手，猛地把他拖到桌子跟前。

“是他？”他朝万尼亚那边睇睇眼，轻轻地冷笑着问。

“是他……”孩子好容易说出声来，又用鼻子吸了一口气，就愣住了。

库列肖夫洋洋得意地望望宪兵站长，再望望索里柯夫斯基。桌子对面的翻译毕恭毕敬地向宪兵站长低下头来，说明这里进行的谈话内容。万尼亚认出这个翻译是舒尔卡·雷班德。

像克拉斯诺顿所有的人一样，万尼亚也跟他很熟。

“明白了吗？……”索里柯夫斯基眯缝起狭细的眼睛望了望万尼亚，他的眼睛深深埋藏在浮肿的颧骨后面，好像是从群山后面望出来似的。“告诉站长先生，你是跟哪些人一起干的。快说！”

“我不知道您在说些什么。”万尼亚直对着他瞅了一眼，用有些喑哑的低音说。

“看到没有，啊？”索里柯夫斯基惊讶而愤慨地对库列肖夫说。“苏维埃政权给他们的就是这样的教育！”

那孩子听到万尼亚的话却惊骇地望了望他，好像怕冷似地蜷缩起身子。

“你好意思吗？你也该可怜可怜人家小孩子，人家是在为你受罪。”库列肖夫带着平和的、谴责的口吻说。“你看看，那边放的是什么？”

万尼亚随着库列肖夫的目光回过头来看了一眼。靠墙放着一只开了口的、盛放礼物的麻袋，一部分礼物散在地上。

“我不知道这跟我会有什么关系。这个孩子我是第一次看见。”万尼亚说。他变得越来越镇静了。

雷班德把他们的话都翻译给勃柳克纳宪兵站长听，勃柳克纳显然已经听腻了这一套，他迅速地看了雷班德一眼，咕噜了几句什么。库列肖夫恭顺地住了嘴，索里柯夫斯基也垂手直立。

“宪兵站长先生要你讲，你一共袭击过几次卡车，有什么目的，谁是同党，此外还干过些什么，——要你统统都讲出来……”

雷班德并不望着万尼亚，冷冷地说。

“要是我连你都看不见，我怎么还能去袭击卡车，这你是知道的！”万尼

亚说。

“我请你答复站长先生……”

但是站长先生显然一切都明白了，他用手指做了一个手势，说：

“到芬庞那里去！”

霎时间一切都改变了。索里柯夫斯基用一只大手揪住万尼亚的衣领，恶狠狠地摇撼着他，把他拖到接待室，再把他的脸扳过来朝着自己，使劲用鞭子在他脸上横一道竖一道地抽了几下。万尼亚的脸上鼓起了一道道紫色鞭痕。有一下正抽在左眼角上，眼睛马上就肿起来。带他进来的“警察”又抓住他的衣领，跟索里柯夫斯基一起，连推带踢把他从走廊里拖过去。

他被推进去的那间屋子里，坐着芬庞军士和两个党卫队的兵士；他们都面色疲惫，坐在那里抽烟。

“要是你这个坏蛋不马上供出你的……”索里柯夫斯基用大手抓住万尼亚的脸，用铁一般坚硬的指甲掐它，一面用可怕的咝咝的声音说。

兵士们抽完了烟，用脚踩熄烟头，用不慌不忙的熟练的动作把万尼亚身上的大衣和衣服剥光，把他精赤条条地扔在血迹斑斑的刑床上。

芬庞用他的长满浅色汗毛的通红的手也是那么不慌不忙地在桌上挑了两根用电线拧成的鞭子，递了一根给索里柯夫斯基，一根自己拿着，试着朝空中抽了一下。接着他们两人就一人一下地鞭打着万尼亚的光身子，每打一下都把鞭子朝自己这边一拉。

两个兵士一个按住万尼亚的头，一个按住他的脚。刚抽了几下，万尼亚就全身鲜血淋漓。

他们一动手打他，万尼亚就发誓绝不开口回答他们问的话，也绝不发出一声呻吟。

所以在他们打他的时候他一直没有吭声。他们有时住手不打，索里柯夫斯基就问：

“你现在明白了吗？”

万尼亚一声不吭地趴着，脸也不抬，他们就重又开始打他。

在他之前不过半小时，莫什柯夫也在这张刑床上同样受过鞭挞。莫什柯夫跟万尼亚一样，也是矢口否认偷窃礼物的事有他的份。

住在远郊外的斯塔霍维奇，比他们晚一些被捕。

斯塔霍维奇跟所有和他同样性格的青年一样，他们生活中的主要推动力是自尊心；当着人们的面，尤其是当着他亲近的或是德高望重的人们的面，他可以或多或少地表现得坚强，甚至可以做出歇斯底里般的英勇行为。但是在单独面对危险或是困难的时候，他就是个胆小鬼。

他在被捕的那一刻就吓破了胆。但是他有一种随机应变的急智，可以转眼之间找出几十几百个道义上的借口来为自己开脱。

一让他跟那个孩子对质，斯塔霍维奇马上就明白，新年礼物是他和他的不可能不被捕的同伴们的唯一罪证。转眼之间，他就打好主意要把这一切变成一件刑事案，他要坦白承认这是他们三人干的，哭诉他们是迫于贫困和饥饿，并且保证今后要用诚实的劳动来将功赎罪等等。于是他就非常真诚地在勃柳克纳宪兵站长和其他的人面前表示了这番心意，使他们一看就明白，他们碰到的是个什么样的货色。他们在办公室里就开始打他，要他供出其他的同党：他们三个人晚上不是都在俱乐部吗，他们决不能自己再去搬卸卡车上的礼物！

算他走运，勃柳克纳站长和巴尔德副站长吃午饭的时候到了。他们让斯塔霍维奇安安逸逸地待到傍晚。

傍晚时候他们对他态度亲切，说他只要说出偷礼物的人，马上就可以释放他。他还是说这是他们三人干的。那时他们就把他交到芬庞手里，一直把他折磨到吐出谢辽萨的姓名为止。至于其余的人他说他在黑暗中分辨不清。

这个可怜的家伙哪儿知道，他供出谢辽萨之后，已经使自己陷入更为可怕的磨难的深渊，因为他落到那样一批家伙手里，这批家伙知道，应该趁他现在表现脆弱的时候彻底摧毁他的意志。

他们拷打他，用水浇了再来拷打，不到天亮他已经失去人形，开始苦苦哀求，说他不该受这样的折磨，他不过是执行的人，还有一批指使他的人，让他们来负责吧！于是他供出了“青年近卫军”总部连同它的联络员。不知为什么，他唯独没有说出邬丽亚。在极其短暂的一瞬间，他似乎在面前看见了她的美丽的黑眼睛，就没有把她的名字说出来。

在这几天里，李亚德斯卡雅被从克拉斯诺顿村传到宪兵站，让她跟维丽柯娃对质。她们俩都认为是对方害得自己遭殃，于是她们就当着不动声色的巴尔德和看笑话的库列肖夫的面，像市场上的女贩子那样破口大骂起来，互相揭发：

“得了吧，你还当过少先队的辅导员呢！”李亚德斯卡雅大声嚷着，她的颧骨高耸的脸涨得通红，连雀斑都看不出来了。

“嘿，那么你呢，全五一村都记得，是谁跟着小组到‘国防航空化学建设后援会’去的呀！”维丽柯娃紧捏着小拳头，大嚷着，恨不得要用尖尖的小辫去把她的冤家对头戳个窟窿。

她们俩差点扭打起来。她们被分别带走，拘留了一昼夜。后来又把她们分别唤到宪兵站副站长巴尔德那里。库列肖夫先后都是同样抓住维丽柯娃和李亚德斯卡雅的手，凑着每人的耳朵都说了同样的话：

“不要再装出那副天使模样啦！你说，都是谁参加了组织！”

于是维丽柯娃和李亚德斯卡雅先后都痛哭流涕，赌咒发誓地说，她们非但没有参加组织，而且一辈子都恨透了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也痛恨她们，一面就把留在五一村以及克拉斯诺顿村的全部共青团员和全部出名的青年人都供了出来。她们非常熟悉她们的同学和左邻右舍的同伴，知道谁从事过社会活动，谁有什么样的看法。她们每人都说出了二十来个名字，而这些名字是相当准确地确定了和“青年近卫军”有关的青年的圈子。

巴尔德副站长恶狠狠地转动着眼珠，对她们每一个都说，他不信她跟这个组织无关，本应当让她跟她供出来的罪犯们一起好好吃点苦头。但是他可怜她，给她一条出路……

维丽柯娃和李亚德斯卡雅同时被释出狱，各人虽不知道对方的底，但是揣摩对方反正也不是清清白白地出来的。规定她们每月可以拿二十三个马克的工资。她们互相伸出木头似的手来握了一握，仿佛彼此之间毫无芥蒂似的。

“这次便宜了我们。”维丽柯娃说，“几时过来玩玩。”

“一点不错，是便宜啦，我会来玩的。”李亚德斯卡雅说。

她们就分手了。

第五十八章

在每一次都是立刻闹得满城风雨的那些逮捕中，有一种奇怪的规律性。先是逮捕了已经离城的总部委员的父母。后来又逮捕了若拉、斯巧巴和谢尔格那些接近总部、也已经离城的青年人的父母。

突然逮捕了托霞和“青年近卫军”的一个普通队员。但是为什么偏偏要逮捕这些人，而不是另一些人呢？

那些没有被捕的人，谁也推测不出，这一次一次的时紧时松的逮捕都是由于斯塔霍维奇的可怕的胡乱招供。他每供出某人之后，他们就让他缓一口气，然后再来折磨他，他就再供出别的人。

莫什柯夫、万尼亚和斯塔霍维奇虽然已经被捕了几天，但是在以刘季柯夫和巴腊柯夫为首的地下组织的工作人员里面，还没有人被波及。中央工厂也一切照常。

沃洛佳在乡下祖父家里过新年，住了三天，一月四日去上工。他在头天晚上就听母亲说，有人被捕，“青年近卫军”总部命令大家离城。但是他不肯走。

“小伙子们不会出卖的。”他对母亲说，他认为现在再瞒着她已经没有意义了。

有好多原因使沃洛佳不愿离开。他舍不得抛下母亲和妹妹，特别是他回想起当初她们是为了他而没有撤退的。但是主要的原因是，沃洛佳一向不参加奥列格家里的会议，他非但想象不出他会有什么危险，心里甚至还认为总部的青年人太沉不住气。被捕的三个都是跟沃洛佳最接近的，他信任他们。在沃洛佳的大无畏的心灵里（“我——就像瓦西卡·布斯拉依一样！”），甚至产生了许多搭救他们的计划，这些计划一个比一个更富于幻想。

但是沃洛佳刚到工厂，刘季柯夫就找个借口把他唤进自己的办公室。由于跟奥西摩兴家的旧交，同时也因为在所有的青年人里刘季柯夫对沃洛佳最了解，所以刘季柯夫十分喜欢他。不仅是经验和理智，就连感情也向老头暗示，有多么可怕的危险临到了他的年轻朋友和学生的头上。刘季柯夫劝沃洛佳立即离开。他对沃洛佳的解释连听都不愿意听，他是冷酷和铁面无私的，他不是劝告，而是命令。

但是已经晚了。沃洛佳还没有来得及考虑什么时候走和往哪里走，他就在工厂里他的工作地点当场被捕了。

拷打斯塔霍维奇的那批刽子手不仅极力要他供出“青年近卫军”的全体队员，还极力要他供出一条通往城里的布尔什维克地下组织的线索。有许多材料，而且连普通常识也早就使宪兵站的大小官员们想到，青年人是在成年人的领导下工作，克拉斯诺顿的密谋中心是在布尔什维克的地下组织里面。

但是斯塔霍维奇确实不知道，奥列格是通过什么渠道同区委联系；斯塔霍维奇只能说，这个联系是存在的。他们追问他，成年人里有谁到柯舍沃伊家去得最勤，他脑子里把所有的人想了一遍，就说出了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在活动初期，当斯塔霍维奇还是总部委员的时候，以及后来他因为

组织的工作去找奥列格的时候，他的确在柯舍沃伊家里碰到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的次数最多。以前他没有想到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的在场跟“青年近卫军”的活动有关。但是现在他回想起来，奥列格有时避着人跟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窃窃私语，于是斯塔霍维奇就说出了她的姓名。

从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身上的线索首先通到那个身子沉重、沉默寡言、令人莫测的人——刘季柯夫那里。被捕的莫什柯夫和沃洛佳都在刘季柯夫的车间里工作，这件事在勃柳克纳宪兵站长看来也并非偶然。关于他的全部历史材料和中央工厂发生的一切破坏与事故都归结到一起了。

一月五日清晨，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像平时一样给刘季柯夫送牛奶去，把刘季柯夫用“青年近卫军”名义写的一张传单揣在怀里带出来。传单上只字不提青年人被捕的事。

刘季柯夫想用这张传单来表明，敌人并未击中目标，——“青年近卫军”依然存在，还在活动。

傍晚下工回家，刘季柯夫在彼拉盖雅·伊里尼奇娜的厨房里看到妻子叶芙多基雅·费奥多托芙娜和女儿腊雅从乡下来看他。他真是喜事临门！他浑身上下换得干干净净：穿上雪白的新衬衫，打了灰色条纹的藏青领带，再穿上彼拉盖雅·伊里尼奇娜给刷得干干净净的一套节日衣服。他穿着这套节日衣服，态度平静沉着、和蔼可亲，跟他最亲近的人说说笑笑，一直坐到天黑，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似的。

刘季柯夫知不知道，死亡的危险也已经临到他的头上？不，他不知道，而且也不会知道。但是他认为随时都有这种可能，对它时刻有所准备，而且最近他感到，危险性增大了。

沉默寡言的施维德对巴腊柯夫发火的次数越来越多，在大发雷霆的时候就责备他在怠工。谁能保证，德国人没有抓住真凭实据呢？

几天前，有四辆大车运煤到附近农村里去，仿佛是用煤去换粮食。从工厂区运煤出去这件事本身，就是前所未有的破坏“新秩序”的行为。但是刘季柯夫和巴腊柯夫没有别的办法，他们又没有权利等待：煤底下藏着送给加入了米佳金游击队的克拉斯诺顿游击小组的武器。谁能保证，这个大胆的措施就能这样蒙混过去呢？

敌人接二连三逮捕“青年近卫军”的队员。谁能知道，是哪些暗中的原因招致了这个组织所有环节的破坏呢？

这一切，老刘季柯夫都懂，也能感觉得出来。但是他没有撤退的理由和可能。他的大无畏的精神不在这里，它已经随着解放大军穿过江河和草原，冒着严寒和冰雪在向前挺进。不论他跟妻子和爱女谈论什么，到后来话题总是回到我军的这次声势浩大的进攻上。他怎能单凭一些假设而在这恰恰要求他全力以赴的时刻离开自己的岗位！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个星期，也许只有几天了，到那时他就终于可以剥掉这个压迫灵魂的、奴隶的伪装，向人们露出自己忠贞的真面目！……纵然他不幸活不到这个光明的时刻，他死后还是后继有人，可以把事业坚持到底。在巴腊柯夫的办公室里那次值得纪念的谈话之后，就建立了由可靠的新人组成的“后备的”第二区委，所有的秘密接头地点和关系都移交给他们了。

刘季柯夫穿得像过节似的，非常高兴，也许比平时显得更亲切，话也多了一些。所以女儿一直用含笑的眼睛望着父亲。只有叶芙多基雅·费奥多托芙娜跟丈夫经过漫长的生活道路，才能觉察出他情绪中最细微的变化，所

以她的不安的、探究的目光不时停留在他身上，好像说：“你穿得实在太整齐，你的样子太高兴了。我不喜欢这样。”

等妻子又到厨房里去跟彼拉盖雅·伊里尼奇娜闲话家常的时候，刘季柯夫觑空终于把“青年近卫军”里有人被捕的事对女儿说了。腊雅刚满十三岁，她是听别人讲才知道“青年近卫军”的存在，她猜想到父亲所做的工作，满心希望能够帮助他，但是又不敢问。

“你们不要在我这里久待，我不留你们过夜。你们从这里出去反正是走草原，夜里不会有人看见你们。”刘季柯夫压低嗓门说。“你去对妈说，就说这样好些。跟她是说不清楚的。”

刘季柯夫嘲笑地说。

“你会不会有危险？”腊雅问了脸色就发白了。

“明显的危险并没有。可是危险时时刻刻威胁着我们的弟兄，我对它已经习惯了。我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这件工作。希望你也能这样。”他态度镇定地说。

女儿陷入了沉思，后来用纤瘦的胳臂搂住父亲的脖子，把脸偎着他的脸。母亲走进来，诧异地望了他们一眼。刘季柯夫就打趣地对妻子和女儿下逐客令。他们在被占领期间不止一次会面。碰到家庭问题成为丈夫工作上的妨碍时，丈夫的态度总是很严厉，叶芙多基雅·费奥多托芙娜对此已经习以为常。她判断不出，他什么时候对，什么时候不对，不过一向总是对他让步，即使自己心里很难受。

丈夫的肥大的身躯穿着这件仔细保藏、熨得很平的上装，叶芙多基雅·费奥多托芙娜仿佛在他身上看到了以前没有发现的东西，不禁突然吻起他的刮得虽光、可是胡茬仍旧扎人的脸，甚至在他的领带上吻了一下，把头紧贴在他胸口。他的沉重的下颚颤抖了一下，他爱怜地把妻子推开，说了一句笑话。女儿的眼睛里涌出泪珠，她扭过脸去，拖住母亲的衣油。

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在这天夜里被捕了。一月六日早晨，刘季柯夫和巴腊柯夫不是在家里，而是在厂里被捕。在工厂里跟他们同时被捕的还有几十个人。果然不出刘季柯夫所料，敌人并不重罪证，被捕的人里面大部分都跟组织毫无关系。

“雷响”托里亚既没有在沃洛佳被捕的那天被捕，也没有在工厂大批捉人的那天被捕。

他如坐针毡地挨到下班，就去看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和刘西雅。她们已经知道发生的事情。

“你这是在干什么啊？你是在害你自己！赶紧走吧！……”

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突然母性流露，绝望地高声叫道。

“我不走。”托里亚轻轻地说，“我干吗要走？”他把帽子一挥。

不，只要沃洛佳在监狱里，他就哪儿都不能去。

她们劝他留下过夜。可是他走了。他去找维佳商量营救青年人的办法。他是夜里去的，他熟悉地绕过了“警察”的岗哨。没有了沃洛佳，没有了万尼亚、莫什柯夫、若拉以及其他的人，他在故乡的城市里感到多么孤独啊……绝望和复仇之感使他心乱如麻。

天快亮的时候，有人使劲敲奥西摩兴家的门。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凭她素有的果敢，也不问是谁就开了门。可是她吓得差点要往后退。门口站的又是“雷响”托里亚，他冻得不得了，脸瘦削得变了形，深陷下去

的双目里燃烧着阴郁的火焰。

“你们看……”他说着就把一个小纸团递给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和刘西雅。

她们看的时候，他就在旁边充满激情地讲看：

“不，可以告诉你们，应该把全部真实情况都告诉你们……这是维佳从一个军人那里拿来的。那个军人以前受过伤，维佳掩护过他。我跟维佳，我们一夜之间把传单贴遍全城。这是区党委的委托。昨天夜里出动了几十个人去贴，现在全城的人，所有大小村庄里的人，都在念这张传单！”托里亚态度激烈地说，他不能住嘴，因为他总觉得，他所说的都不是最重要的。

但是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和刘西雅并不听他的，她们在念着：

克拉斯诺顿的公民们！矿工们、集体农庄庄员们、职员们！

全体苏联人民！兄弟姊妹们！

敌人被强大的红军击败了，正在逃跑！他们那股兽性的狠毒无处发泄，就逮捕无辜的人们，对他们施加非人的酷刑。要让这批败类记住：我们——在这里！为了苏联人的每一滴血，他们都要用自己的狗命来抵偿。让我们的复仇之神吓得敌人胆战心惊！

向敌人复仇，消灭敌人！以血还血！以命抵命！

我们的军队要来了！我们的军队要来了！我们的军队要来了！

联共（布）克拉斯诺顿地下区委会

第五十九章

在开始捉人的头几天里，邬丽亚不在家里过夜。但是正像奥列格所预料的，这些逮捕没有触及五一村和克拉斯诺顿村。所以邬丽亚就回家了。

邬丽亚在外面凑合过了几夜，现在又在自己的床上醒来，她感到有一种内在的要求要排除头脑里痛苦的想法，就热心地做起家务事来。她擦了地板，做了早餐。母亲因为女儿在家心里高兴，甚至起床吃了饭。父亲脸色阴沉，很少开口。前几天，邬丽亚不在家过夜，只是白天跑回来待上一两个小时看看父母或是拿点东西。在那几天里，马特维·马克西莫维奇跟玛特辽娜·萨维里耶芙娜谈论的全是城里捉人的事，但是谁也不敢瞧对方的眼睛。

邬丽亚试着谈谈别的闲事，母亲勉强接茬谈下去，但是这种聊天听起来很不自然，她们俩索性都不开口了。邬丽亚都不记得，她是什么时候洗了杯盘，收拾了餐桌。

父亲出去料理家务事去了。

邬丽亚穿着她心爱的那件朴素的、深蓝底白点的家常衣服，背对着母亲站在窗口。两条沉甸甸的有波纹的发辫舒适地、随便地顺着脊背垂到柔韧有力的腰肢；灿烂的阳光透进化了冻的玻璃窗，照射着她的未经整理的有波纹的鬓发。

邬丽亚站在窗前一边眺望草原，一边唱着。德国人来了以后她就没有唱过歌。母亲倚在床上织补什么东西。她听到女儿唱歌觉得很惊讶，甚至放下手里的活儿。女儿用舒畅的低沉的声音唱着母亲从来没有听过的歌：

……你为祖国的荣誉
服务虽然不久，但是忠心耿耿……
这些歌词玛特辽娜·萨维里耶芙娜从来没有听到过。女儿的歌声给人以悲哀沉痛之感。
……无情的复仇者就要起来，
他比我们更强大有力……
邬丽亚的歌声中断，她仍旧那样站着，隔窗眺望草原。
“你唱的是什么？”母亲问。
“我随便唱唱，想到什么就唱什么。”邬丽亚头也不回地说。
这时候门大开了，邬丽亚的姐姐上气不接下气地跑了进来。
她长得比邬丽亚丰满，一向脸色红润，浅色的头发像父亲，可是她现在却面无人色。
“波波夫家来了宪兵！”她喘吁吁地低声说，好像波波夫家那边能听到她说话似的。
邬丽亚转过身来。
“居然来了！最好避他们一下。”邬丽亚面不改色，声调平静地说。她走到门口，不慌不忙地穿上大衣，披上头巾。但是这时她已经听到台阶上沉重的皮靴声，她略微后退一步，靠在遮挡冬季衣服的花幔上，把脸转过来对着门。
后面的这幅花幔衬托着她的线条分明的侧面，她的鼻翼微颤，长睫毛半垂着，好像要减弱她眼睛里射出的光芒；白头巾没有包好，还披在肩上，——她的这个模样就永远铭刻在母亲心上。
“警察队长”索里柯夫斯基、芬庞军士和一个带枪的随从兵士走进了上房。
“这就是她，小美人儿！”索里柯夫斯基说。“没有来得及吗？哎哟哟……”他朝她的穿着大衣、头巾披在肩上的苗条的身材瞥了一眼，说道。
“亲爱的！我求求你们！”母亲边哭边说，打算从床上起来。邬丽亚突然愤怒地瞪了她一眼，母亲就躺下去不作声了。
她的下颚不住地哆嗦。
开始了搜查。父亲来推门，但是那个德国兵不放他进来。
这时，波波夫家里也在进行搜查。进行搜查的是侦查员库列肖夫。
托里亚站在房间当中，大衣敞着，没有戴帽子，一个德国兵在后面反抓着他的手。一个“警察”逼着塔伊西雅·普罗柯菲耶芙娜，大喝道：
“对你说，叫你拿根绳子来！”
身材高大的塔伊西雅·普罗柯菲耶芙娜气得满脸通红，大声嚷道：
“你昏了吗，要我给你一根绳子来捆我的亲生儿子？……”
“给他一根绳子，妈妈，省得他叽叽哇哇鬼叫。”托里亚说，他的鼻翼翕动着，“他们才六个人，怎么能带得了一个没有上绑的人走呢？……”
塔伊西雅·普罗柯菲耶芙娜哭起来，到门道里拿了一根绳子扔在儿子脚下。
在邬丽亚被关进去的那个大牢房里，还关着玛丽娜跟她的小儿子、玛丽雅·安德烈耶芙娜·鲍尔茨、谢辽萨的姐姐菲尼亚，“青年近卫军”的队员里有斯塔霍维奇五人小组里的安娜·索波娃。安娜是一个白净、虚胖、胸部丰满的姑娘，已经被打得体无完肤，几乎躺都不能躺。这时这间牢房里的

不相干的人都被挪出去，一天之内牢房里就挤满了五一村的姑娘们，其中有玛雅、莎霞、舒拉、伊凡尼兴娜姊妹——李丽亚和东妮亚，以及其他的人……

没有铺板，也没有床，姑娘们跟妇女们都坐在地上。牢房里因为人太多，竟开始化冻，天花板上不断有水滴下来。

隔壁也是一个大房间。根据种种迹象判断，是划出来关男孩子的。那边不断有被捕的人送进去。邬丽亚就敲起板壁问："那面是谁？"那边回答道："你是谁？"邬丽亚报了自己的名字。回答她的是托里亚。隔壁牢房里关的大部分是五一村的男孩子：维克多、葛拉万、腊高静、谢毕辽夫、莎霞的哥哥瓦西里，——他们是一同被捕的。事情既然已经如此，有五一村的男孩子们关在隔壁，姑娘们心里到底觉得比较温暖些。

"我最怕上刑。"生着稚气的、粗线条的面孔和两条长腿的东妮亚老实承认说，"我当然是死也不会说的，可是我非常害怕……"

"不用害怕：我们的军队已经近了，也许我们还可以组织一次越狱呢！"莎霞说。

"姑娘们，你们根本不懂辩证法……"玛雅忽然这样说，尽管大伙心情非常沉重，却还是哄堂大笑：简直难以想象，在牢房里居然会说出这样的话。"当然啦！管它什么样的痛苦，习惯了都是可以忍受的！"玛雅不以为意地说。

傍晚时分，监狱里安静了一些。牢房的天花板底下点着一盏有铁丝罩的、昏暗的小电灯，牢房的四角都笼罩着昏暗。

时而从远处传来一句德语吆喝声和牢房门口有人跑过的声音。时而有几阵脚步声咚咚地经过走廊，还听到武器的铿锵声。有一次传来了一声令人毛发耸然的、野兽般的嚎叫声，使她们都跳了起来，因为这是一个男人在叫喊，所以听起来特别可怕。

邬丽亚在板壁上敲了一阵，向男孩子们问道：

"这是不是你们牢房里的？"

那边回答道：

"不是，这是在大人的牢房里……"这是他们内部称呼成年地下工作者的暗号。

后来隔壁牢房里有人被带出去的时候，姑娘们自己也听到了。接着立刻就听到敲板壁的声音：

"邬丽亚……邬丽亚……"

她答应了。

"我是维克多……托里亚被带出去了……"

邬丽亚突然似乎非常清晰地在面前看见了托里亚的脸和他的总是目光严肃的眼睛，这双眼睛具有会突然放光、令人鼓舞的特点。她想象到他将要遭遇的事，不禁颤抖了一下。但是这时钥匙在锁孔里响了一下，她们牢房的门打开了，一个放肆的声音喊道：

"葛洛莫娃！……"

这就是在她的记忆中所留下的……她在索里柯夫斯基的接待室里站了一会。办公室里有人在挨打。索里柯夫斯基的妻子坐在接待室里的沙发上，手里拿着一个小包裹，呵欠连天地在等她的丈夫。她的麻屑似的浅黄色头发是烫过的，她旁边坐的那个女孩也生着麻屑似的头发，睡眼惺忪地在吃一块苹果馅饼。门开了，从办公室带出了脸肿得变了样的万尼亚。他差一点撞在

邬丽亚身上，她也差一点叫了起来。

接着她就跟索里柯夫斯基一起站在勃柳克纳宪兵站长面前，站长态度极为冷漠地问了她一句话，这种话他大概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问了。战前跟她在俱乐部跳过舞、并且企图追求她的雷班德，现在却摆出一副和她素不相识的面孔，把这句话翻译给她听。但是她并没有听清他的话，因为她早在被捕以前就想好，如果她被捕了要怎么说。于是她脸上带着冷冷的表情说出了这番话：

“我不准备回答你们的问题，因为我不承认你们有权审问我。你们爱把我怎么样就怎么样，可是你们再也别想听到我的话……”

这几天里，对于类似的话勃柳克纳站长一定听得很多了，他并不发火，只动了动手指，说：

“到芬庞那里去！……”

可怕的还不是受刑的痛苦，——她能够忍受任何痛苦，她甚至不记得他们怎样打她；可怕的是，当他们扑上来剥她的衣服的时候，为了不让他们的手碰她，她竟不得不当着他们的面自己来脱……

她被带回牢房的时候，迎面抬过了托里亚，他的长着浅色头发的头倒仰着，两手垂到地上，一股鲜血从嘴角流出来。

邬丽亚仍旧记住，在走进牢房的时候应该控制住自己，也许，这一点她是做到了。她将要走进牢房的时候，押送她的“警察”又高喊了一声：

“伊凡尼兴娜·安东妮娜！……”

在门口，邬丽亚和东妮亚迎面擦肩而过，东妮亚用温顺而充满恐惧的眼睛瞅了她一眼，门在邬丽亚身后关上了。但是在这时候整个监狱都听到一声钻心的、孩子的叫喊；这不是东妮亚，而是一个小女孩的叫喊。

“他们把我的小女儿抓来了！”玛丽雅·安德烈耶芙娜大叫起来。她像一头母老虎似的扑到门口，在门上乱冲乱撞，大声喊着：“刘霞！……他们把你，把我的小女儿抓来了！放了她！放了她吧！”

玛丽娜的小儿子被吵醒，啼哭起来。

第六十章

这些日子里有人看见刘勃卡在伏罗希洛夫格勒、在卡缅斯克、在罗文基，有一天她甚至跑到被包围的米列罗沃。她在敌人军官中间的熟人圈子大大地扩大了。她的口袋里塞满人家送她的饼干啦、糖果啦、巧克力啦，碰到人就天真地拿出来请客。

她怀着一股不顾性命的勇气和无所顾虑的心情在深渊边缘上旋转。她脸上带着稚气的微笑，眯缝着的蓝眼睛里有时含着杀气。这次到伏罗希洛夫格勒去，她又跟她以前的那个直接领导发生联系。那人对她说，德国人在城里十分猖狂。他本人差不多每天变换住所。他不洗脸，不刮胡子，因为缺乏睡眠而两眼通红，但是前线的消息使他兴奋异常。他需要有关附近德国人的后备队、有关供应、有关个别部队的情报，——总之，他需要一大堆情报。

刘勃卡只好再去跟那个军需上校来往，有一次她觉得她恐怕难以脱身

了。以这个脸色疲惫、嘴角下垂的上校为首的整个军需局要离开伏罗希洛夫格勒，要急如星火地离开。因此这位越喝酒眼睛越是呆板无神的上校本人以及其他军官们的情绪都是悲观绝望的。

刘勃卡所以能够脱身，是因为他们人实在太多，他们互相干扰、争吵，最后她总算到了那个像白蘑菇的小姑娘的寓所里。她甚至把那个还不肯死心的中尉送她的一听非常好吃的果酱带了出来。

在这个天花板很高、没有生火的冰冷的房间里，刘勃卡脱掉衣服上了床。这时外面有人拚命地敲门。刘勃卡微微抬起了头。隔壁房间里的“白蘑菇”跟她妈妈也醒了。门敲得好像要被捶破似的。刘勃卡连忙从被窝里跳出来，——因为天冷，她没有脱束腰带和袜子，——把脚伸进鞋子，套上衣服。房间里一团漆黑。女主人惊骇地在门道里问是谁敲门，回答她的是几个粗嗓门，——是德国人。刘勃卡以为这是一群喝得烂醉的德国军官来找她，急得不知如何是好。

她还没有来得及考虑好她应该采取什么对策，已经有三个人咚咚地踏着笨重的厚底皮鞋走进她的房间，其中有一个打着手电筒照了照刘勃卡。

“灯！①”一个人大喝了一声，刘勃卡听出是那个中尉的声音。

① 原文为德语。

不错，就是他跟两个宪兵。当中尉把女主人从门后递给他的小灯举过头顶，仔细打量刘勃卡的时候，他的脸都气歪了。他把灯交给一个宪兵，用足气力打了刘勃卡一记耳光。后来他伸手把放在床头桌上的小件化妆品乱翻了一阵，像是要找什么。手帕底下的一支口琴掉到地上，中尉狠狠地踩住它，用鞋跟把它踩得稀烂。

两个宪兵在整个住宅进行搜查，中尉却走了。刘勃卡这才明白，并不是他带来了宪兵，而是宪兵们通过他找到了刘勃卡：大概在什么地方有什么事被发现了，至于是什么事，她却无从知道。

女主人跟那个像白蘑菇的小姑娘穿好衣服，冷得缩做一团，看着他们搜查。说得准确些，女主人是在看搜查，而“白蘑菇”却怀着非常强烈的兴趣和好奇不住地盯着刘勃卡。在最后一刻，刘勃卡猛地搂住“白蘑菇”，直对着她的结实的小脸蛋吻了一下。

刘勃卡被带到伏罗希洛夫格勒的宪兵队里。有一个什么官员审查了她的证件，又通过翻译盘问她，她是不是真是刘波芙·谢夫卓娃，她住在哪个城市里。在审讯时有一个小伙子坐在屋角里，刘勃卡没有看清楚他的脸。那小伙子一直在抽搐。刘勃卡的箱子连衣服以及所有的东西都被拿走，只剩下一些小零碎、一听果酱和她有时用来围脖子的一条很大的花头巾，这条头巾是她向他们要回来包她剩下的东西的。

她就这样仍旧穿着鲜艳夺目的绉纱连衣裙，带着这一小包各式各样的化妆品和一听果酱，在白天进行审讯的时候来到囚禁五一村人的牢房里。

一个“警察”打开牢房的门，用劲把她朝里面一推，说道：

“请接待伏罗希洛夫格勒的女演员！”

刘勃卡冻得两颊通红，眯缝着发亮的眼睛打量着牢房里都有些什么人，她看见了邬丽亚、带着孩子的玛丽娜、莎霞和她的全部女友。她的双手——一只手拿着包袱——垂了下来，脸上的红晕褪了，脸色变得像白纸一样。

刘勃卡被解到克拉斯诺顿监狱的时候，监狱里已经挤满了成年人、“青年近卫军”的队员们和他们的亲人，所以带孩子的人只好住在走廊里，而且

这里还要容纳从克拉斯诺顿村抓来的一批人。

城里还是不断有一批一批的人被捕，这仍旧是由于斯塔霍维奇的胡乱招供。他已经被折磨得像奄奄一息的牲畜，只得靠出卖自己的同伴来给自己买得喘息的机会，但是每一次新的出卖却给他招来一次又一次新的灾难。他一会儿想起柯瓦辽夫和庇罗若克的全部故事，一会儿想起谢辽萨有个朋友，他连那人的姓名都不知道，但是记得他的特征，还记得他住在“上海”。

突然，斯塔霍维奇又想起沃洛佳有一个好朋友托里亚。不多几时，备受折磨的沃洛佳和英勇的“雷响”已经面对面地站在巴尔德副站长的办公室里。

“不，我是第一次看见他。”托里亚轻声说。

“不，我根本不认识他。”沃洛佳说。

斯塔霍维奇又想起万尼亚有一个心爱的姑娘住在下亚力山德罗夫卡。过了几天，勃柳克纳站长面前就站着已经不像本人的万尼亚和有点斜视的克拉娃。她几乎轻不可辨地说：

“不……我们以前同过学。可是从战争一开始我就没有看见过他。我住在乡下……”

万尼亚没有作声。

克拉斯诺顿村的那一批青年人都关在本村的监狱里。供出这批人的李亚德斯卡雅虽然不知道他们中间谁在组织里起什么作用，但是，比方说，李达·安德罗索娃跟她钟情的苏姆斯柯依的关系她是知道的。

李达，这个尖下巴、面孔像小狐狸似的漂亮姑娘，被他们用从步枪上解下的皮带抽得体无完肤：他们要她说出苏姆斯柯依在组织里的活动。李达大声数着抽打的次数，但是矢口不肯吐露一句话。

德国人把老一辈和年轻一辈分开来关，以免老一辈对年轻人发生影响，并且对他们严加防范，不让他们中间有任何联系。

但是，即使是刽子手，在他们所干的兽行中也有个力所能及的限度。非但是久经锻炼的布尔什维克，即使在被捕的“青年近卫军”队员里面，也没有一个人承认自己是属于组织或是供出同志。这上百个几乎还是孩子的男女青年的这种史无前例的刚毅不屈的精神，逐渐把他们跟无辜的被捕者以及亲人们区别出来。德国人为了减少本身的麻烦，开始把全部偶然抓来的以及捉来作为人质的家属们逐步释放出去。奥列格、谢辽萨、若拉以及其他一些人的家属就是这样被释放的。玛丽雅·安德烈耶芙娜·鲍尔茨也被释放。小刘霞比她早一天被放出来，所以玛丽雅·安德烈耶芙娜一直等回到家里才能噙着眼泪证实，她这个做母亲的耳朵并没有听错，小女儿是在监狱里蹲过。现在刽子手们的魔掌里只剩下一批以刘季柯夫和巴腊柯夫为首的成年地下工作者和“青年近卫军”组织的成员。

被捕者的家属从早到夜聚集在监狱旁边，看到“警察”和德国兵士出进，就抓住他们的手，请他们捎个口信或是带点东西进去。他们不断地被驱散，可是又重新聚集拢来，再加上过路的或是纯粹看热闹的人，人就越来越多。受刑者的嚎叫声有时从板壁后面传出来，于是监狱里从清早起就开着留声机，来掩盖这种嚎叫声。全城像患热病似的发抖：这几天没有一个人没有到过监狱旁边。弄得勃柳克纳宪兵站长只好下令接受送给被监禁者的东西。这样一来，刘季柯夫和巴腊柯夫才能知道，他们建立的区委会存在着、活动着，并且在设法营救“大的”和“小的”。

年轻人在监狱里已经待了将近两星期。不管在德国占领者最残酷野蛮的监狱条件下的生活是多么违反自然，他们在里面还是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牢狱生活方式，这里面虽然有着这种摧残青年身心的骇人暴行，但是也有着爱和友情的种种人类关系，甚至还有娱乐的习惯。

“姑娘们，想吃果酱吗？”刘勃卡坐在牢房当中的地上，一边解开她的小包袱，一边说，“这个笨蛋！把我的口琴踩了个稀巴烂！没有口琴叫我在这儿干什么呢？……”

“你等着吧，他们会在你的脊梁上弹琴，包管你就不想吹口琴啦！”舒拉愤愤地说。

“原来你就是这样了解刘勃卡的！你以为他们打我的时候，我会哭哭啼啼或是一声不吭吗？我要连喊带骂。就像这样：‘哎！啊！啊！……你们这批傻瓜！你们为什么要打刘勃卡？’”她叽叽喳喳地说。

姑娘们都哄笑起来。

“这倒是实话，姑娘们，我们有什么好埋怨的？谁的心里又舒服些？我们的亲人心里比我们更难受。可怜他们一点都不知道我们的情况。而且他们难受的日子还在后头呢！……”李丽亚说。

圆脸浅发的李丽亚，她在集中营里大概对好多事都已经司空见惯。她一点不怨天尤人，她照顾大伙，像是整个牢房里的善良的化身。

晚上刘勃卡被唤到勃柳克纳宪兵站长那里去受审讯。这是一次不寻常的会审：宪兵站长和“警察队”的全体官长都在场。刘勃卡没有挨打，他们对她的态度甚至带着讨好的亲切。

刘勃卡的态度非常沉着、冷静，但是他们究竟知道些什么，她却心中无数。她按照她平时跟德国人交往的经验，对他们撒娇撒痴，嘻嘻哈哈，做出完全不懂得他们对她有什么要求的样子。他们暗示她，如果她交出发报机，同时交出密码，那对她是大大有利的。

这不过是他们那方面的一种猜测，他们并没有掌握直接的罪证，但是他们并不怀疑事实正是如此。只要知道刘勃卡是否属于组织，就足以猜出她往来于各个城市以及跟德国人接近的意图。德国反间谍机关掌握材料，知道州里有几架秘密发报机在发报。而在伏罗希洛夫格勒宪兵队里审讯刘勃卡时在场的那个小伙子，就是她在训练班的同学鲍尔卡·杜宾斯基那一伙里的，那个家伙也证实刘勃卡曾经在这个秘密训练班学习过。

他们叫刘勃卡考虑考虑，是不是承认为妙，就把她放回牢房。

母亲给她送来满满一袋食物。刘勃卡坐在地上，两条腿夹住袋子，一会儿摸出面包干，一会儿摸出鸡蛋，一面摇头晃脑地哼唱着：

刘巴、刘巴、小刘巴、好刘巴，

我没有力量养活你……

她对给她拿来这些东西的“警察”说：

“你告诉我妈，就说刘勃卡挺好，平安无事。请她多送些红菜汤来！”她又转过身来对着姑娘们喊道：“姑娘们，快来啊！……”

最后她还是落到了芬庞手里，他把她打得相当厉害。她果然说话算数：她骂他的话不但监狱里能听见，连整个空地上都能听见：

“笨蛋！……秃傻瓜！狗爪子！”在她赏给芬庞的称呼里，这些还算是最客气的。

下一次，芬庞当着勃柳克纳站长和索里柯夫斯基的面用电线拧成的鞭

子抽她，这时候刘勃卡尽管下死劲咬着嘴唇，眼泪却再也忍不住了。她回到牢房，一声不响地趴下去，把头放在手上，不让人看见她的脸。

邬丽亚身穿家里给她送来的、跟她的黑眼睛黑头发非常相称的浅色毛衣，坐在牢房的角落里。她在给围聚在她身旁的姑娘们讲《圣马格达林娜寺院的秘密》①，眼睛里闪烁着神秘的光辉。现在她每天连续给她们讲一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她们已经听过了《牛虻》②、《冰屋》③、《玛戈女王》④。

①《圣马格达林娜寺院的秘密》的作者不详。

②《牛虻》是英国女作家伏伊尼奇（1864—1960）著的小说。

③《冰屋》是俄国作家拉席奇尼柯夫（1792—1869）著的历史小说。

④《玛戈女工》是法国作家大仲马（1802—1870）著的小说。

通走廊的门开着，让牢房里通通风。一个俄罗斯“警察”坐在门对面的凳子上，也在听《圣马格达林娜寺院的秘密》。

刘勃卡稍微缓了口气，坐了起来，不经意地听着邬丽亚的故事，后来她把目光移到整天躺着没有起身的玛雅身上。维丽柯娃供出玛雅在学校里曾做过团支书，所以现在她受的折磨最厉害。刘勃卡一看见玛雅，一股抑制不住的、要向那批刽子手报复的复仇之感就在她心里活动起来，要想发泄。

“莎霞……莎霞……”她轻轻地喊着坐在邬丽亚身旁那群人里的莎霞。“我们的男孩子们怎么那么安静呀……”

“是啊……”

“他们别是泄气了吧？”

“你知道，他们受的折磨到底比我们厉害。”莎霞说，不禁叹了口气。

这个嗓门像男孩子、作风也像男孩子那样粗犷的莎霞，直到进了监狱，在她身上才突然露出一些温柔的少女的特征，她仿佛是因为这些特征是这样姗姗来迟而感到惭愧。

“我们来给他们打点气。”刘勃卡活跃起来，说道，“我们马上来给他们画一幅漫画。”

刘勃卡很快地在枕边摸出一张纸和一小段红蓝铅笔，她们俩就脸对脸地叭下来，低声讨论漫画的内容。接着，两人就挤眉弄眼地笑着，互相抢着铅笔，画出了一个精瘦的、疲惫不堪的小伙子，一只其大无比的鼻子使他的头坠下来，拉得他弯腰弓背，鼻子也扎到地里。她们把那个小伙子画成蓝色的，脸仍旧是白的，鼻子涂成红色，下面题着：

嗨，你们这些小伙子干吗不高兴，

垂头丧气为何情？

邬丽亚讲完故事。姑娘们都站起来，伸了个懒腰，各自回到自己的角落里，有的转过身去望着刘勃卡和莎霞。漫画在大伙手里传阅，姑娘们都笑着说：

“可惜天才埋没在这儿啦！”

“可是怎么送过去呢？”

刘勃卡拿着纸片走到门口。

“达维多夫！”她用挑衅的口吻对那个“警察”说，“把男孩子们的画像给他们拿过去。”

“你们的纸和铅笔是哪儿来的？说真的，我要报告长官，让他来搜查！”“警察”脸色阴沉地说。

雷班德在走廊里走过，看见刘勃卡站在门口。

“喂，怎么样，刘巴？过几天咱俩一块去伏罗希洛夫格勒吧？”他逗她说。

“我才不跟你去呢……不，要是你把这个给男孩子们拿过去，我就去，我们给他们画了一幅像！……”

雷班德看了看漫画，他那张皮包骨头的小脸笑了一笑，就把那张纸塞给了达维多夫。

“拿过去吧，没有什么。”他随便地说了一句又顺着走廊往前走。

达维多夫知道雷班德跟最高长官很接近，也像所有的“警察”一样巴结他，所以就一言不发地把男孩子的牢房的门打开一道缝，把那张纸片扔了进去。只听得那里齐声哄笑。隔了一会，板壁上响起来了：

“姑娘们，这不过是你们的想象。我们屋子里的人都挺好……我是瓦西里·庞达烈夫。

向妹妹问好……”

莎霞在枕边拿起母亲给她送牛奶来的玻璃瓶，跑到板壁跟前敲了一阵：

“瓦西里，你听得见我吗？”

后来她把瓶底抵着板壁，把嘴唇靠近瓶口唱起哥哥心爱的《苏丽柯》①。

①《苏丽柯》是格鲁吉亚诗人崔烈杰里（1840—1915）写的诗。后来广泛流传，成为民歌。

但是她刚开始唱，全部歌词就勾起令人心酸的关于往事的回忆，她就唱不成声了。李丽亚走到莎霞面前，一面抚摩她的手，一面用温柔平静的声音说：

“嗳，不要这样……嗳，镇静一些……”

“我自己也恨这些咸水要流出来。”莎霞神经质地笑着说。

“斯塔霍维奇！”走廊里响起索里柯夫斯基的沙哑的声音。

“要开始了……”邬丽亚说。

“警察”砰地关上门，又上了锁。

“我们最好别去听它。”李丽亚说，“亲爱的邬丽亚，你知道我喜欢的诗，朗诵一段《恶魔》吧，像从前一样，记得吗？”

人算得了什么？——他们的生活和劳动算得了什么？

邬丽亚举起一只手，开始朗诵：

他们来了，他们还要走过去……

还存有一线希望——等待公正的裁判：

它可以宽恕，虽然它会谴责！

而我的悲哀却永远长留，

这悲哀，像我的生命一样，永无尽头；

它在坟墓里也不肯安静！

有时它像蛇一样表示亲热，

有时像火焰那样灼人，发出毕剥的响声，

有时又像巨石紧压着我的思想，——

就像一座坚不可摧的陵墓

埋葬着我的幻灭的希望和热情！……

啊，这些诗句在姑娘们的心里引起了多么强烈的震颤，好像对她们说：“这是说的你们，说的是你们的还没有觉醒的强烈的爱和已经幻灭的希望！”

邬丽亚又朗诵了描述天使带走塔玛拉有罪的灵魂的那几行。东妮亚说：

“你们看！天使到底来把她救走了。这真是好极啦！”

“不！”邬丽亚说，眼睛里仍旧带着她朗诵时那样急切的眼神，“不！……要是我，我宁愿跟恶魔一起飞走……你们想一想，他居然敢起来反抗上帝！”

“对啊！我们的民族是谁也征服不了的！”刘勃卡突然说，眼睛里迸射出热情的光辉。

“而且像这样的民族世界上难道还找得出第二个吗？谁有这么美好的灵魂？谁能经受得住这么多的痛苦？……也许我们要牺牲，可是我并不怕。是的，我一点都不怕。”刘勃卡怀着使她全身发抖的激情说。“但是我并不甘心……我还要跟他们这些家伙算帐！我还要唱歌，——在这段时期里，在我们的人那边一定编了许多好听的歌曲！你们只要想想看，在德国人统治下过的这六个月简直就像待在坟墓里：没有歌声，没有笑声，只有呻吟，只有血和泪。”刘勃卡激动地说。

“我们现在偏要唱起来，谁买他们的这些鬼帐！”莎霞高叫了一声，把微黑的纤瘦的手一挥，就唱了起来：

沿着峡谷和小丘

师团向前进①……

姑娘们都从自己坐的地方站起来，团团围住莎霞，随着她唱起来。这合唱的歌声传遍了整个牢狱。姑娘们听见隔壁牢房里的男孩子们也随着她们唱起来。

牢房的门咚的一声打开了，“警察”脸上带着又恨又怕的神情低声喝道：

“你们发昏啦？住嘴！……”

这些日子的荣誉，

永不会淹没，永不会黯淡。

游击的队伍

占领着一个个城市……

①这是歌颂苏联国内战争时期沃洛恰耶夫卡战役的歌曲《沿着峡谷和小丘》中的歌词。

“警察”砰的一声关上了门，跑走了。

不多一会，走廊里传来沉重的脚步声。门口站着勃柳克纳宪兵站长，——他身材高大，滚圆的肚子下垂着，黄脸上眼皮下面发黑的眼泡浮肿着，衣领上面脖子的皮打着一道道的粗褶。他手里冒烟的雪茄在抖动着。

“各就各位！不许作声！……①”这几个字非常尖锐刺耳地从他嘴里冲出来，仿佛他是在开玩具手枪。

……斯巴斯克的突击之夜，

沃洛恰耶夫卡的白天，

像诱人的火焰……

姑娘们唱着。

一群宪兵和“警察”冲进了牢房。隔壁男孩子们的牢房里混战起来。女孩子们都被摔倒在靠板壁的地上。

惟独刘勃卡一个人留在牢房当中，两只小手叉着腰，充满仇恨的眼睛旁若无人地朝前直瞪着，像舞蹈似的跺着鞋后跟向勃柳克纳直冲过去。

“啊！这个瘟丫头！”勃柳克纳气呼呼地怒喊着。他用一只大手抓住刘勃卡，几乎把她的胳臂拧断，把她拖出了牢房。

刘勃卡露出牙齿，猛地低下头来，用牙齿死劲咬住他这只黄皮肤上布

满小方格形粗纹的大手。

“该死！”②勃柳克纳怒吼了一声，另一只手捏成拳头使劲捶刘勃卡的脑袋。但是她咬住他的手死也不放。 ①原文为德语。

②原文为德语。

几个兵士好容易才把她拉开，再靠勃柳克纳站长——他疼得把一只手在空中直摇，——本人帮忙，才把刘勃卡在走廊里拖过去。

兵士们按住她，勃柳克纳站长跟芬庞军士就用电线拧成的鞭子抽打她身上刚结疤的伤口。刘勃卡拚命咬着嘴唇，一声不吭。突然她听到了牢房上高空中飞机发动机的响声。她听出了这是什么声音，心里充满了得意之感。

“哼，你们这批狗爪子！来吧！……你们打吧，打吧！你们听听我们飞机的声音！”她大嚷起来。

低降的飞机的隆隆声怒吼着冲进了牢房。勃柳克纳和芬庞停止了拷打。有人急忙关了电灯，兵士们也放开了刘勃卡。

“哼！胆小鬼，坏种！你们的末日到了，败类里的败类！啊—哈！……”刘勃卡大喊大叫着，她没有气力翻身，就拚命用脚跺着血淋淋的刑床。

爆炸的气浪的轰响震撼着木板搭的监狱。飞机在城里进行轰炸。

从这一天起，监狱里的“青年近卫军”队员的生活中发生了转变：他们不再隐瞒他们是参加了组织的，并且跟折磨他们的刽子手进行公开的斗争。他们对德国人说粗话，嘲弄他们，在牢房里唱革命歌曲，跳舞，有人被从牢房里拖出去受刑时他们就大声喧闹。

所以，他们现在所受的磨难也就成为人类的意识无法想象的磨难，从人类的理性和良心的观点来看都是不可思议的磨难。

第六十一章

奥列格最熟悉前线军队移动的情况，他领着这几个人差不多是向北走，以便在贡多罗夫斯卡雅地区的某处越过结冰的北顿涅茨河，前往沃罗涅什—罗斯托夫铁路上的葛路鲍卡雅车站。

他们整整走了一夜。对于亲人和同伴的怀念萦绕在他们脑际。他们差不多一路上都是默默地走着。

天快亮的时候，他们绕过贡多罗夫斯卡雅，毫无阻碍地越过了顿涅茨河，沿着就原来的土路铺成的、压得很平的军用大道向杜鲍沃依庄那边走去，他们用眼睛在草原上搜寻着有人家的地方，希望能去暖和暖和，吃点东西。

没有风，太阳出来了，开始有些暖意。岗峦起伏的草原上闪耀着一片洁白。压平的大道开始化冻，路旁露出了沟渠的边缘，地上冒出一缕缕的蒸气，散发着泥土的气息。

在他们走的大路上以及远远可见的、登上小山看得特别清楚的两侧的村道和遥远的村道上，不时迎面走过一些德国步兵、炮兵分队、勤务部队和军需部队的零星残部，这批人没有陷进被红军包围的斯大林格勒的大包围圈里，而是在后来的几次战斗中被击溃的。这些德国人跟五个半月以前乘着几千辆卡车开过这里的那批德国人已经有天渊之别。他们穿着破烂不堪的军大

衣；为了御寒，头和脚都包裹着；长满胡子的脸上和手上又脏又黑，仿佛他们是刚从烟囱里钻出来的。

有一次，青年人自东而西在村道上走着，看见前面有一群意大利兵士。他们多半都没有枪械，有的带着枪，但却像扛棍子那样把枪扛在肩上，枪托朝上。一个军官披着夏季披肩，又像制帽又像便帽的帽子歪戴着，上面缠了一条童线裤。他由兵士簇拥着，骑着没有鞍子的骡子，其大无比的靴子拖到地上，几乎在路面上划出痕迹。他这个来自温暖的南国的居民，鼻子底下拖着两条冻住了的鼻涕，在冰天雪地的俄罗斯，形状非常滑稽而又具有象征性，孩子们互相瞅了一眼，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

路上到处都有不少因为战争而流离失所的老百姓。谁也不来注意背着背包在冬天的大路上赶路的这两个少年人和三个姑娘。

这一切都使他们的情绪好起来。他们怀着青年人对于危险没有实际概念的那股不知忧虑的勇气，好像觉得自己已经到了战线的那一边。

妮娜穿着毡靴，戴着暖帽，沉甸甸的发卷从暖帽下面垂到冬大衣的衣领上。她走得满脸通红。奥列格不住地望着她。他们目光相遇的时候，就相视而笑。谢辽萨跟华丽雅在一个地方竟然玩起雪球来，互相你追我赶，把同伴们甩得老远。他们中间年纪最长的奥丽雅，身穿深色衣服，态度镇静，沉默寡言，她像妈妈似的，对这两对体贴，宽容。

他们在杜鲍沃依庄过了将近一昼夜，一点一滴地打听着前线的情况。有一个独臂的残废军人，大概是没有突围出去而在这里落了户的，劝他们再往北到佳奇基诺村去。

他们在这个村子里和它附近的庄子里待了几天，在混乱的德军后勤部队和躲在地窖里的居民们中间游荡。现在他们离战线非常近，从战线传来的炮声隆隆不绝，到了夜里，炮口喷出的火光好像闪电一般。空军在轰炸德军后方，在苏军的压力下，敌人的战线显然在后退，因为周围德国人的一切都汇合起来川流不息地向西移动。

每个过路的兵士都斜过眼来看他们，居民因为他们来历不明，都不敢让他们进去。不要说是五个人一块越过战线，就连在这里徘徊或是停留都有危险。在一个小农庄里，女主人不怀好意地不时打量着他们，到了夜里忽然穿上厚衣服出去了。奥列格没有睡着，他把同伴们唤醒，大伙都离开庄子走到草原上。他们刚刚醒来，从昨天刮起的大风吹得他们无处可躲。

他们从来没有感到自己是这样地孤立无援，举目无亲。

于是他们中间最年长的奥丽雅就开口说：

“我的话，你们听了别不高兴。”她对谁也不望，用衣袖遮住一边的脸挡风，这样开始说。“我们这么一大群人过不了战线，而且妇女或是姑娘大概很难越过战线……”她望了望奥列格和谢辽萨，等他们反驳，但是他们没有开口，因为她说的是实情。“我们姑娘们应该让我们的男孩子们去自由行动。”她坚决地说。妮娜和华丽雅懂得是指她们。“妮娜也许要反对，但是你妈是把你托付给我的。我们到福基诺村去，我有一个大学里的女同学住在那边，她会收留我们，我们可以在她那里等待战线移过来。”奥丽雅说。

奥列格这是第一次找不出话来回答，谢辽萨和华丽雅也都不作声。

“我凭什么要反对呢？不，我并不反对。”妮娜说，她差点儿要哭出来。

他们五个人又这样一言不发地站了一会，内心痛苦，下不了决心走这最后一步，那时奥列格就说：

“奥丽雅说得对。姑娘们既然有更简单的出路，何必让她们去冒险呢。而且我们的确也可以容易些。那么你—你们就走—走吧。”他突然口吃起来，说了就拥抱了年长的奥丽雅。

然后他走到妮娜面前，其余的人都转过身去。妮娜猛地搂住他，雨点似地亲吻着他整个的脸。他也搂住她，吻了她的嘴唇。

“你记得吗，有一次我缠住你，老要求你让我亲亲你的脸蛋，你记得吗，我说：‘只要亲亲脸蛋，懂吗，只要亲亲脸蛋？’没想到要到现在才能亲吻。你记得吗？”他带着孩子似的幸福的表情低语说。

“我记得，我全都记得，我记得的比你所想的还多……我会永远记住你……我要等着你。”她轻轻地说。

他又吻了吻她，就挣开身子。

奥丽雅和妮娜走了几步，还叫唤了他们一次，后来马上就看不见她们，也听不见她们了，只有风搅雪在薄薄的冰凌上旋转着。

“你们怎么样？”奥列格问华丽雅和谢辽萨。

“我们还是想一块试一试。”谢辽萨负疚地说，“我们沿着战线走，也许可以在什么地方溜过去。你呢？”

“我还是要在这里试一试。至少我对这一带地方已经熟悉了。”奥列格说。

又是一阵短暂的痛苦的沉默。

“我亲爱的朋友，别不好意思，别垂头丧气……对吗？”奥列格说，他很了解谢辽萨的内心活动。

华丽雅猛地拥抱了奥列格，谢辽萨不喜欢流露感情，他只握了握奥列格的手，再用手掌轻轻推了一下他的肩膀，就头也不回地走了。华丽雅跑过去追上了他。

这是一月七日。

但是他们也不能一同越过战线。他们还是一个村子一个村子走过去，就这样一直走到卡缅斯克。他们自称是在中顿河战区跟家里人失散了的兄妹。人们可怜他们，让他们在冰冷的泥地上打地铺，于是他们就像遭难的兄妹那样搂着睡觉。早晨他们又起来上路。华丽雅要求让他们随便在一个地方试试越过战线，但是谢辽萨是一个具有现实气质的人，他一直不肯越过战线。

最后她才明白，只要她华丽雅跟他一块，谢辽萨绝不会作越过战线的尝试：谢辽萨可以在任何地方越过战线，但是他怕会断送了她。所以她就对他说：

“我一个人总可以在这儿的村子里找个安身的地方，等待战线通过我们这一带……”

但是这种话他连听都不愿意听。

不过，她还是编出一套理由来说得他相信了。在他们的全部活动里，特别是在他们无论什么工作都是一起干的时候，他总是头，她总是服从他。但是在个人的事情方面她总是占上风，他是不知不觉地对她唯命是从。所以她现在就对他说，他可以到一个红军部队里去，告诉他们，我们克拉斯诺顿有一批青年人被关在监狱里，性命难保，他可以跟这个部队一起来把青年人从死亡中拯救出来，同时也可以使她华丽雅脱离危险。

“我会在这里附近等你。”她说。

华丽雅累了一天，夜里睡得很熟。等她在天亮前醒来，谢辽萨已经走了：他不忍心叫醒她跟她告别。

于是就剩下了她孤零零一个人。

叶列娜·尼柯拉耶芙娜终生都难忘这个严寒之夜，这是一月十一日的夜里。全家都睡了，外面有人在小窗上轻轻地敲了几下。叶列娜·尼柯拉耶芙娜马上听到了这敲窗的声音，并且马上知道这就是他。

奥列格疲倦得连帽子都没有脱就倒在椅子上，他的两颊都冻坏了。全家都醒了。外婆点起油灯放在桌底下，免得外面看见灯光："警察"一天要来光顾他们家几次。奥列格坐在那里，灯光从下面照着他的脸，他的帽子上围着脸的一圈都结着霜，他的颧骨上都是黑斑。他消瘦了。

他几次试着越过战线，但是他对于防线上的现代火力配系以及各分队和各小队的部署毫不了解。而且他的个子太高大，又穿着深色衣服，所以无法在雪上偷偷地爬过去。而且他一直在为城里青年人的命运担忧。最后，他说服自己，时间已经相隔这么久，偷偷地溜进城去看看总不碍事吧。

"听到万尼亚的消息吗？"他问。

"还是那样……"母亲避免望着他，说道。

她给他把帽子和短外衣脱掉。连给他热点茶水都没法热，可是家里人已经急得面面相觑，生怕马上就会有人来到这儿把他捉去。

"邬丽亚怎么样？"他问。

大伙都不作声。

"邬丽亚被抓去了。"母亲轻轻地说。

"那么刘巴呢？"

"刘巴也是……"

他的脸色变了，他沉默了半晌，又问道：

"那么在克拉斯诺顿村呢？"

不能这样一点一滴地折磨他，所以柯里亚舅舅就说：

"说出没有被捕的人反倒容易些……"

于是他讲了中央工厂大批工人跟刘季柯夫和巴腊柯夫一同被捕的事。现在克拉斯诺顿再也没有人怀疑这两个人是负有特别使命留在德军后方的自己人了。

奥列格垂下了头，不再问什么。

大家商量了一阵，决定连夜立即把他送到住在乡下的玛丽娜的亲戚家里去。柯里亚舅舅负责送他去。

他们在阒无人迹的草原上向罗文基走去，星斗满天，把淡蓝的幽辉射在雪地上，他们可以看得见好大的一片草原。

奥列格经过好多天常常是没吃没住的流浪生活，回家后又听到这一切晴天霹雳似的消息，尽管他还几乎没有缓过气来，但是他已经完全能控制自己。他一路上向柯里亚舅舅打听有关"青年近卫军"的遭受破坏以及有关刘季柯夫和巴腊柯夫被捕的详情。他也把自己的不顺利的经历告诉了柯里亚舅舅。

他们不知不觉地已经走完了一段很长的上坡路，登上坡顶，再开始从陡削的山坡往下走。在他们前面大约五十米的地方就是一个黑魆魆的大村子的村郊。

"我们差一点一直闯进村里去了，应该绕过去走。"柯里亚舅舅说。

于是他们从大路上折过去，靠左边走，仍旧保持离村子五十米左右的距离。只有在有雪堆的地方，雪才很深。

他们正要穿过可以从旁边进村的一条小路，不料从村边一所房屋背后跑出几个灰色的人形来拦住他们的去路。这些人一面跑，一面声音非常嘶哑地用德国话叫喊着。

柯里亚舅舅和奥列格不约而同地撒腿就往大路上跑，想躲开他们。

奥列格觉得他没有力气奔跑了，他听到他们就要赶上他了。他鼓起了最后的力气，但是脚底下一滑，摔倒了。有几个人扑到他身上，把他的手反背起来。有两个人还跟在柯里亚舅舅后面追赶，用手枪在他背后开了好几枪。过一会他们回来了，一边骂着和嘲笑自己没有能把他捉住。

他们把奥列格带到一所大房子里；这里以前大概是村苏维埃，现在是“村公所”。地上铺的麦秸上睡着几个宪兵。奥列格明白，他们方才是闯到一个宪兵站上来了。桌上放着一架套着黑皮套的战地电话机。

一个上等兵捻大了灯芯，他对奥列格发火、叱骂，一面动手来搜查他。他因为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东西，就把奥列格身上的短外衣剥下来，一寸一寸地细摸。他的粗大的手指在靠指甲的地方又扁又宽，他用手指有规律地、敏捷地探摸着。

他的手指就这样摸到了硬纸做的团证，于是奥列格明白，这下子一切都完了。

上等兵用一只手盖住摊在桌上的团证和空白的临时团证，一面用足气力沙哑地对着电话听筒说话。后来他放下听筒，对那个把奥列格带来的兵士说了一句什么。

直到第二天夜里，奥列格才由这个上等兵和一个代替车夫的兵士押送着，乘农村雪橇到了罗文基城宪兵队和“警察局”的办公楼，被交给值班的宪兵。

奥列格双手抱着膝盖独自坐在漆黑的牢房里。要是能够看见他的脸，就可以看到他的神情是平静而严峻的。想念妮娜、想念母亲、想他是多么愚蠢地落入魔掌，——这一切在他坐在“村公所”里以及被押送到这里来的时候，他有许多时间可以去想，现在这些念头已经离开了他。他也不是在考虑他的前途：这他是知道的。他所以这样平静和严峻，是因为他在总结他的短短的一生。

“就算我才十六岁吧，我的生活道路这样短促却并不是我的过错……有什么能够使我害怕？是死亡？是拷打？这些我都能忍受……当然，我希望我能死得让人们在心里永远记得我。但是就算我死得没没无闻吧……那又有什么呢，现在千百万像我这样精力充沛和热爱生活的人都在这样死去。我有什么地方可以责备自己呢？我不撒谎，在生活中从不取巧。我有时有些轻率，也许因为心肠太好而有点软弱……我亲爱的奥列格！对十六岁的人说来，这算不了什么大的过错……我连可以得到的全部幸福都没有尝到。不过我仍然是幸福的！我幸福，因为我没有像蛆虫那样匍匐爬行，——我在斗争……妈妈总对我说：‘我的小鹰！……’我没有辜负她的信念和同志们的信任。让我的死也像我的生一样纯洁吧，——我可以毫不惭愧地对自己这样说……你死得值得，亲爱的奥列格……”

他脸上的线条变得柔和了，他把帽子枕在头底下，朝冻得滑溜溜的地上一躺，就安然入睡了。

他觉得有人站在他面前，就睁开眼睛。天亮了。

奥列格面前站着一个老头，他的结实的身坯几乎把牢房的门遮住。他

身穿哥萨克斗篷，长着满头红发的大脑袋上戴着一顶很紧的波兰四角帽；他的大鼻子是蓝灰色的，满脸大点的红斑，疯狂似的眼睛不住地流泪。

奥列格在地上坐起来，惊奇地望着他。

“我心里想，柯舍沃伊不知是个什么样的了不起的人物？……他原来就是这副模样……小瘪三！小流氓！可惜你要去受秘密警察的教训，——要是在我手里你还可以舒服些。我只有在特殊的场合才打人……你也不过如此！可你的名气简直像杜勃罗夫斯基①一样。你大概读过普希金的作品吧？唔，小瘪三！……可惜你不在我手里。”老头向奥列格弯下身子，眯起一只流泪的、疯狂似的眼睛，酒气熏人地对奥列格神秘地低声说：“你想我为什么来得这么早？”他已经是非常亲密地、信任地挤了挤眼。“今天我要把一批人送到那边去……”

①杜勃罗夫斯基是普希金的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他为报父仇弃家为盗，因此闻名。

他用一个好像肿胀的指头指了指天。“我带了个理发的来给大伙理理发，在做这件事之前，我总让人家理理发。”他低声说。后来他挺直身子，清了清嗓子，竖起一根大拇指，说道：“要做得文明些！……不过你的案子要交到秘密警察那里去，我并不羡慕你。‘乌勒瓦’①！”他举起好像肿胀的老年人的手碰碰波兰帽的帽舌行了个礼，就出去了。接着有人砰的关上了牢门。

①法语“再见”的译音。

后来奥列格被转到一间大牢房里，里面关的人都是从远处捉来的，他根本不认识。这时他才知道，那个老家伙就是罗文基“警察局长”奥尔洛夫，以前是邓尼金手下的一名军官，一个心毒手辣的刽子手和拷打专家。

两三小时以后，他被带去审讯。进行审讯的全是秘密警察，翻译也是一个德国上等兵。

他被带进去的那间办公室里有许多德国宪兵军官。他们都带着公然的好奇和惊讶望着他，有几个望着他甚至像瞻仰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那样。奥列格对外界的理解在很多方面还很稚气，他无法想象“青年近卫军”的名气已经传得多么广；他也想象不出，由于斯塔霍维奇的口供和德国人这么久不能捉到他，他自己已经成为传奇式的人物。审讯他的是一个鳗鱼似的柔若无骨的德国人。那人眼睛下面的可怕的紫色半圆形，从近乎黑色的深色眼睑的两角开始，绕过颧骨，在瘦削的面颊上逐渐扩散成好像尸肉上的斑点，使他的脸三分像人，七分像鬼。这样的人只有在噩梦里才会看到。

他们要求奥列格公开“青年近卫军”的全部活动并且供出它的全体队员和同党，奥列格回答道：

“是我一个人领导‘青年近卫军’，队员们按照我的指示去做的一切也由我一个人负责……如果有公开的法庭来审问我，我也许还可以讲讲‘青年近卫军’的活动。但是要把它的活动向一些对无辜者都要加以杀害的人讲述，这对于我们的组织没有好处……”他沉默了一会，用泰然自若的目光扫视了那些军官，说道：“而且你们本身已经是死人了……”

不过这个的确像死人似的德国人还是又问了他几句话。

“我的这些话——是我最后的话。”奥列格说了就垂下了睫毛。

在这以后，奥列格就被投进了秘密警察的刑讯室。他就开始了一个有心肝的人非但不能忍受、甚至无法描述的那种惨绝人寰的生活。

但是奥列格忍受住这样的生活，直到月底。他们也不把他弄死，医为他们在等待本州野战司令官克列尔少将，他表示要亲自前来审讯组织的头头

们，来决定他们的命运。

奥列格不知道，刘季柯夫也被押解到罗文基这里的秘密警察机关来，受野战司令官的审讯。敌人并没有查明刘季柯夫是克拉斯诺顿地下布尔什维克组织的首脑，但是他们感觉得到并且看得出，这是所有落进他们魔掌的人们中间最重要的人物。

第六十二章

几挺轻机枪从三个点，就像是从三角形的三个角，对着两个小丘中间好像双峰骆驼鞍部的一个洼地射击。子弹哒哒地落在雪和泥混成的泥浆上，快落下时发出“哦—呜……哦—呜……”的声音。但是谢辽萨已经到了鞍子的那一边。一双有力的手抓住他的手腕，把他拉进战壕。

“你不害臊吗？”一个小个子、大眼睛的中士用纯粹的库尔斯克方言说道，“这算什么！一个俄罗斯青年，可是干这种事……是他们恐吓了你呢，还是许了什么好处给你？”

“我是自己人，自己人。”谢辽萨神经质地笑着说，“我的证件缝在棉袄里，带我去见指挥员吧。我有重要消息！”

在离铁路不远的一个庄子里，在唯一没有被破坏的一所农舍里，师参谋长和谢辽萨站在师长面前。以前这个庄子周围遍植槐树，现在槐树都被飞机和大炮扫光了。这里是师指挥所，没有队伍通过这里，并且禁止机动车来往，所以庄子里和农舍里都非常清静，如果不算南方小丘后面一直隆隆作响的各种各样的战斗的声音。

“我不单是根据他的证件，我也根据他的话来判断。这孩子什么都知道：地形，重炮火力阵地，甚至第二十七、第二十八、第十七区的火力点……”参谋长还举出几个数字。“好多都跟侦察队的情报相符合，有的他知道得更准确。顺便提一句，两岸都是断崖构筑。您记得吗？”参谋长说。他是个鬈发的年轻人，领章上有三条杠。他因为牙痛不时皱着眉头，歪着嘴吸气。

师长检查了谢辽萨的团证和一张印着简陋的表格、有指挥员杜尔根尼奇和政委卡苏克签名的手写证明书，证明谢尔盖·邱列宁是克拉斯诺顿城地下组织“青年近卫军”的总部委员。师长检查了团证和这张证件之后，并不是把这些东西交还原来交给他的参谋长，而是还给谢辽萨本人，然后带着有点粗野的天真的表情把谢辽萨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

“好……”师长说。

参谋长牙痛得愁眉苦脸，歪着嘴吸了一口气，说道：

“他有重要消息，他只肯讲给您听。”

于是谢辽萨向他们讲述了“青年近卫军”的情况，并且说了他的想法：他认为师团无疑应该立即出动去救出关在监狱里的青年人。

参谋长听完要师团向克拉斯诺顿移动的战术计划，笑了一笑，但是马上又轻轻地呻吟了一声，用手捂住了腮。师长没有笑，显然他并不认为师团向克拉斯诺顿进军是一件荒谬的事。他问道：

“卡缅斯克你熟悉吗？”

“熟悉，不过不是从这里过去的路，而是从那边过来的路。

我是从那边来的……”

“费多连柯！”师长声若洪钟地唤了一声，震得什么地方的杯盘都响起来。

屋子里除了他们之外，并没有别人。但就在这同一刹那，费多连柯像是从空气里生出来似地站到了师长面前，他使劲碰着靴跟立正致敬，使大家听了都高兴起来。

“费多连柯到！”

“第一，拿双鞋给这个小家伙。第二，拿点东西给他吃。

在我没有唤他以前，让他在暖和的地方好好地睡一觉。”

“是，给他鞋子，给他东西吃，在您没有唤他以前，让他睡觉。”

“在暖和的地方……”师长带着警告的意味竖起一根手指。“澡堂怎么样啦？”

“快好啦，将军同志！”

“去吧！”

费多连柯中士亲切地搂着谢辽萨的肩膀，跟他一同走出了屋子。

“司令员要来了。”师长笑着说。

“真的吗？”参谋长霎时间甚至忘了牙痛，笑容满面地说。

“得搬到掩蔽部去。吩咐他们生起火来，不然的话，‘圆面包’①，你知道，是会狠狠训你一顿的！”师长带着高兴的笑容说。

①“圆面包”出自俄罗斯童话。写一个圆面包从家里出来，一路上敏捷地滚过丘陵和山谷，克服种种障碍，机智地骗过它遇到的一切凶猛的野兽。它是善于克服困难和机智勇敢的象征。

这时候，师长用士兵们起的“圆面包”这个亲切的外号提到的那位集团军司令员还在睡觉。他睡在他的指挥所里，指挥所不设在房子里，而且根本不设在有住房的地区，而是在小树林里以前的德军掩蔽部里。虽然集团军神速前进，司令员还是遵守着这样一条原则：指挥所不设在居民点；每到一处新的地方就占领德军的掩蔽部；如果掩蔽部已经被破坏，那么就给他和整个司令部挖一些新的掩蔽部，像在战争初期那样。自从战争初期有不少和他同事的高级军官认为无需挖掩蔽部而死于敌人的轰炸之后，他就一直严格遵守这条原则。

集团军司令员不久前还是谢辽萨遇到的那个师的师长。这也就是恰恰在半年前应该和普罗庆柯领导的游击队协同动作的那个师。而过去担任这个师的师长的这位集团军司令员，就是在克拉斯诺顿区委大厦跟普罗庆柯当面商谈的那位将军。在伏罗希洛夫格勒和卡缅斯克的防御战中以及在接踵而来的一九四二年七八两个月令人难忘的撤退时期的巧妙的掩护战中，他都先后立下了卓越的战功。

司令员的姓是他父亲和祖父传给他的普通农民的姓。经过几次战斗，这个姓在其他的军事将领的姓氏中间变得显赫起来，它一直保留在北顿涅茨河和中顿河区居民的记忆中。现在，在西南方面军两个月的战斗中，像其他在伟大的斯大林格勒之战中扬名的军事将领的姓一样，这个姓也全国闻名了。

“圆面包”是他的外号；他自己根本没有想到，他会得到这个外号。

就某些方面来说，这个外号倒和他的外貌相符。他生来是矮个子，宽肩，阔胸，一张胖胖的脸表情刚毅，脸型完全是普通俄罗斯型的。他的外表

看上去虽然有些笨重，但是行动却非常灵活敏捷，一双小眼睛聪明而快活，动作灵巧利落。

但是他被叫做“圆面包”却并非因为他的外表。

由于各种情况的巧合，现在他进攻时经过的恰恰是他在七八两个月里撤退时所经过的地方，虽然在那些令人难忘的日子里战斗非常艰苦，当时他还是相当容易地甩掉敌人，朝着无人知道的方向退走，使敌人连他的影踪都找不到。

他并入了后来组成西南方面军的部队之后，就和他们一起隐蔽在战壕里，跟大伙一起待到敌人的疯狂进攻在他们的坚如磐石的顽强抵抗下遭到彻底失败为止。时机一到，他就和大伙一起爬出战壕，先是率领这个师，后来是率领这个集团军，在敌人后面紧紧地跟踪追击，俘虏成千上万的敌人，缴获成百门大炮，赶过敌人，把零星的敌军残部留在自己后方让别的部队去收拾。今天他一只脚还在顿河，另外一只脚已经跨到契尔河上；明天他一只脚在契尔河上，另外一只脚就已经跨到顿涅茨河上。

就在这个时候，从他的兵士们的心底里就滚出了“圆面包”这个童话里的名字，后来这个名字就牢牢地粘在他身上了。实际上，他也是像圆面包那样滚着。

谢辽萨是在一月中旬局势发生转折的那些日子里来到我们的部队里，那时沃罗涅什方面军、西南方面军、顿河方面军、南方方面军、北高加索方面军、外高加索方面军、沃尔霍夫方面军和列宁格勒方面军正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攻势，其结果是：彻底歼灭和俘虏被包围在斯大林格勒城下的德国法西斯军队，突破列宁格勒两年多的封锁，仅仅在一个半月之内就解放了像沃罗涅什、库尔斯克、哈尔科夫、克拉斯诺达尔、罗斯托夫、新切尔卡斯克、伏罗希洛夫格勒那样一些城市。

谢辽萨在一月的那些日子里来到我们的部队里，那时正巧在杰尔库尔河、阿依达尔河、奥斯科尔河（顿涅茨河左面北部的几条支流）一线开始了对德军防御工事的新的强大的坦克攻势，那时在卡缅斯克—康杰米罗夫卡的那一段铁路上已经摧毁了被围困在米列罗沃的德国驻防军的最后抵抗，而在这以前两天还收复了葛洛鲍卡雅车站，我军还准备好强渡北顿涅茨河。

在师长跟谢辽萨谈话的时候，集团军司令员还在睡觉。他像所有的司令员一样，习惯把一切最重要、直接有关指挥的工作都放在夜间来准备和处理，那时候跟这些问题无关的人就不会来打扰他，他也可以摆脱开军队生活中的日常琐事。但是身材像彼得一世①那样魁伟的米欣上士已经在不时望着手上戴的赠送给他的战利品手表，考虑是不是该叫醒他了。米欣上士在集团军司令员将军身边的地位就相当于费多连柯中士在师长将军身边的地位。

①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初的俄国沙皇，身材高大。

司令员总是睡眠不足，今天他应该比平时起得还要早。由于在战争中各种屡见不鲜的情况的巧合，去年七月在他指挥下防卫卡缅斯克的师团现在却要去夺取这个城市，虽然这个师团里的“老人”已经不多。不久前提升为将军的这位师长那时候是个团长。像他这样的“老住户”在军官里还可以找到，但是在战士里面就寥寥无几了：师团里的人十分之九是在中顿河地区发动攻势之前补充的人员。

米欣上士最后一次看了手表，就走到将军睡的架子跟前。这正是一个架子，因为将军怕潮湿，所以总是给他在架子上层搞个铺位，好像火车里的

卧铺一样。

将军侧卧着，他的胸怀坦然的健康人的脸上带着孩子气的表情。米欣像平时一样先用力把他摇了一阵。但是，这当然不能打破他的勇士的好梦，这只不过是米欣下一步工作的前奏。米欣把他的一只胳臂伸到将军的腰下，另一只胳膊从上面伸过去抱住他的胳肢窝，像抱孩子那样小心翼翼地、毫不费力地把将军的沉重的身子从床上扶起来。

穿着晨衣睡觉的将军立刻醒了，他的眼睛非常清醒地望了望米欣，好像他根本没有睡过觉。

“谢谢你。”他说，一面以出人意料的轻捷从架子上跳下来，摸了摸头发，就在方凳上坐下，环顾理发师在哪里。米欣把便鞋给将军放在脚旁。

理发师穿着一双其大无比的软革皮靴，军便服上面围着雪白的围裙，已经在分掩蔽部的厨房里搅和肥皂。他像精灵似的毫无声息地到了司令员身边，把一块餐巾塞在司令员晨衣的领子里，非常轻柔地一下子就把司令员在一夜之间长出了又黑又硬的胡茬的脸上涂满了肥皂。

不到一刻钟，将军已经穿着整齐，军服上的钮扣全部扣上，重重地坐在一张小桌旁边，利用给他端来早餐的空隙，迅速地浏览他的副官从一只皮面红毡里子的文件夹里敏捷地一份份取出来递给他的公文。副官最先递给他的是刚刚收到的关于我军收复米列罗沃的消息，但是对于将军，这已经不是新闻，他知道米列罗沃在昨夜或是今晨必然要攻下。后来递上来的是各种各样有关日常工作的公文。

“这些该死的东西，糖既然已经被他们拿去，就把糖留给他们好啦！……把给萨弗朗诺夫呈请的‘勇毅奖章’换成‘战斗红旗勋章’：他们师里一定以为，给普通战士只能呈请奖章，勋章是专门呈请授给军官的！……还没有枪毙？这不是军事法庭，这简直成了《知心话》①的编辑部！马上枪毙，不然我把他们也要交法庭审判！……唉，这是什么鬼话：‘要求请人替换……’我虽然也是当兵的出身，可是老实说，俄语根本不这么说。告诉那个连看都没看就在这上面签字的克列庇柯夫，叫他去读一遍，用红铅笔或是蓝铅笔把错误改正，再带着这份东西亲自来见我……不，不！你今天给我的尽是些琐琐碎碎的东西，特别麻烦，一切都放一下再说。”将军说着，就精力充沛地开始吃早餐。

①《知心话》是俄国革命前的的儿童杂志，这里指公文里的语气太缓和。

司令员快喝完咖啡的时候，一个身材不高、四肢匀称的将军拿着一个文件夹来到桌旁。

他的白皙宽大的额头因为前面光秃而显得更大，两鬓浅色的头发修剪得很整齐。他态度从容不迫，动作准确利落。他的外表与其说像军人，还不如说像学者。

“坐吧。”司令员对他说。

参谋长拿来的公文比副官塞给司令员的要重要一些。但是在谈公事之前，参谋长先笑着把一份莫斯科的报纸递给司令员，这是一份最新的报纸，是由飞机运到方面军司令部，今天早上再分发到各个集团军司令部的。

报上刊登着一张获奖者以及提升为军官和将军的名单，其中有几个是他那个集团军里呈报上去的。

司令员以军人特有的那种兴致勃勃的劲头高声朗读名单，碰到在军事学院里和在卫国战争中认识的熟人的姓名，就朝参谋长望望，脸上的表情时

而意味深长，时而惊讶，时而怀疑，有时干脆就像孩子那样笑逐颜开，特别是在碰到和他的集团军有关的时候。

名单里有“圆面包”以前指挥过的那个师的师长的名字（他已经多次获奖），现在的集团军参谋长也是从这个师里出来的。师长获奖是为了很久以前的事，但是请奖要一级一级地呈报上去，所以直到现在才在报上公布。

“在他要去攻打卡缅斯克之前知道这个消息真不是时候！”司令员说，“他要格外松劲了！”

“相反地，他会更卖力。”参谋长笑着说。

“我知道，你们的那些毛病我全都知道！……今天我要到他那里去，我要祝贺他……给楚维陵发个贺电，给哈尔钦柯也发一个。至于给库柯辽夫，只要说几句有人情味的话就行，懂吗，别打官腔，要说得亲切。我很高兴，为他高兴。我还以为，他在维亚兹马那次战役以后就会一蹶不振了呢。”司令员说。他忽然狡猾地笑起来，“肩章几时能来？”

“快运来了！”参谋长说，又笑了一笑。

最近颁布了一项命令，军队里的士兵、军官和将军都要佩带肩章。这件事引起了全军的兴趣。

师长只消把司令员要来的消息告诉他的参谋长，这个消息转眼之间就传遍了全师，甚至传到了这时趴在顿涅茨河辽阔的草原上稀粥似的雪泥浆里的战士们那里。从草原上可以看见顿涅茨河陡峭的右岸，可以看见多处在冒烟的卡缅斯克城里的建筑物和在雾中轰炸这个城市的我方冲击机的侧影。

师长亲自到师的第二梯队来迎接司令员。在司令员乘车向这里开过来，以及后来他们一同步行到指挥所的时候，他一路上经过的地方都仿佛是偶然地出现一些单个的人和一群群的战士和军官，大伙不但希望看见他，并且还希望他也看见他们。大伙都特别潇洒而豪迈地碰靴立正致敬，在每一张脸上都带着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表情或是亲切的笑容。

“请您承认，您是一小时以前才钻进掩蔽部的吧。该死，墙上连水汽都还没有呢！”司令员一眼就看穿了师长的花招，说道。

“这倒是真的，是两小时以前。不过在卡缅斯克没有拿下以前，我们就不再出去了。”师长说，他恭恭敬敬地站在司令员面前，眼睛里带着狡猾的表情，嘴唇上带着沉着而有把握的神气，好像是说：“在我自己的师里，事情由我作主，我知道你为什么事会认真地骂我，至于这件事，算不了什么。”

司令员祝贺他的获奖。于是师长就利用一个适当的机会，仿佛是随便地说：

“趁我们还没有谈正经事之前……这儿附近村子里有个没有被破坏的澡堂，我们正在生火。将军同志，您大概也有好久没有洗澡了吧？”

“唔？……”将军非常正经地说，“那么准备好了吗？”

“费多连柯！”

哪知道澡堂要到傍晚才能使用。师长狠狠地赏了费多连柯一个白眼，显然，为了这件事他得好好地挨一顿骂！

“要到傍晚……”司令员想了一下，能不能把什么事情挪后一下，把什么事情取消，但是他忽然想起，在到这儿来的路上还有一件事插进来。“只好等下次再说了。”他说。

根据被全军一致公认为军事权威的集团军参谋长出的主意，师长拟就了一个夺取卡缅斯克的计划，现在他就开始向司令员汇报这个计划。司令员

听了一会，脸上就露出不以为然的神气。

“这哪里算是什么三角形：河流、铁路、城郊——这全是筑有工事的……”

“我也表示过同样的怀疑，但是伊凡·伊凡诺维奇正确地指出……”

伊凡·伊凡诺维奇就是集团军参谋长。

“你强渡过河，但是以后你在战线上就没有地方可以展开了。他们在你一路过去的时候一直可以狠狠地揍你。”司令员说，他巧妙地避而不谈伊凡·伊凡诺维奇的问题。

但是师长懂得，伊凡·伊凡诺维奇的威信可以使他的观点更站得住脚，所以他又说道：

“伊凡·伊凡诺维奇说，他们不会料到我们会从这边攻过去，他们会把它当做佯攻，我们的侦察队的情报也证实了这一点。”

“你们从这边刚冲进城，他们就会沿着街道和从车站这边给你们来个迎头痛击……”

“伊凡·伊凡诺维奇……”

司令员懂得，除非他扫除了以伊凡·伊凡诺维奇为代表的障碍，否则他们的谈话就不会有进展，所以他就说：

“伊凡·伊凡诺维奇的看法不对。”

在这以后，他就用相当委婉的措辞，再加上一只宽大的手和短手指的灵活有力的动作，在地图上和假想的地形上说明了包抄敌人并从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突击这个城市的计划。

师长想起了早上从城郊越过战线的那个孩子，司令员所拟的主攻方向也就是从那边出发。于是突击这个城市的计划就突然不言而喻地、毫无阻碍地在他头脑里形成了。

到了夜里，一切主要的和决定性的工作都在师部里安排就绪，并且交给了各团。指挥员们也到附近一个破坏殆尽的小村子里幸存的澡堂去了。

早上五点钟，师长和负责政治工作的副师长下到各团来检查他们准备的情况。

在团长柯诺宁柯少校的掩蔽部里，人们通宵达旦地在工作，因为根据各级下级指挥员的很小的、局部的、实际上却是主要的和决定性的任务，各级高级指挥员通宵都有相应的命令和说明发给他们。

虽然一切都下达过命令，解说清楚，师长仍然一丝不苟地、耐心地把昨夜已经说过的话又重复了一遍，并且又一次检查了柯诺宁柯少校所做的工作。

柯诺宁柯少校是一个年轻的指挥员，典型的刻苦耐劳的军人，精神饱满的瘦脸上英气勃勃，说话嗓门不高。他的军便服领口下面露出了毛衣，外穿棉袄棉裤，为了行动灵便，没有穿军大衣。他也同样很有耐性地、然而并不十分注意地（因为这一切他都已经知道了）听完了师长的话，又向师长报告他已经完成的工作。

谢辽萨就是到了这个团里。他从师部起，又一级一级地往下回到连长那里，领了一枝自动枪和两枚手榴弹，被编入应该最先冲进卡缅斯克附近一个错车站的那个突击队。

最近几天来，在卡缅斯克周围一带丘陵起伏、有着稀疏的灌木丛的开阔地带的上空，不断刮着温暖的吹雪。后来南风赶来了大雾。在开阔的地方，还不很深的积雪开始融化，田野和大路都变得泥泞不堪。

顿涅茨河两岸的村子都遭到轰炸和炮轰的严重破坏。战士们都待在旧的掩蔽部里、土窑里、帐幕里，或是不生篝火就待在露天里。

在突击的前夕，他们在迷雾中整天都可以看见对岸那个相当大的城市，看见它的荒凉无人、纵横交叉的街道，高耸在住宅屋顶之上的车站水塔，有些地方还保存下来的工厂烟囱以及毁于炮火的教堂的钟楼。肉眼可以看到城市前面山岗上以及城郊的德军碉堡。

在解放这样的居民点的战斗之前，穿士兵大衣的苏联人心里真是百感交集。一种是由于他这个穿军大衣的人是在进攻和解放与自己血肉相关的城市而产生的兴奋情绪。一种是对城市和它的居民、对躲在冰冷的地窖里和潮湿的防空壕里的母亲和幼儿的怜悯。一种是对敌人的仇恨，——根据经验知道，敌人因为意识到自己的罪行和即将受到的报复，一定要以加倍的或是三倍的力量进行顽抗。一种是由于了解到死亡的威胁和任务的艰巨而产生的不由自主的不安。还有多少颗心因为自然的恐惧而揪紧！

但是没有一个战士流露出这些心情。大家都兴奋快活，有点粗野地开着玩笑。

“‘圆面包’，他既然开始了，他就会滚进去。”战士们说话的口吻，简直好像并不是他们自己，而是童话里的那个“圆面包”将要滚进这个城市似的。

谢辽萨加入的那个突击队的指挥员，就是在他越过战线时遇到的那个中士。这是一个矮小灵活、性情快活的人，满脸细皱纹，一双大眼睛是蓝色的，但是闪烁不定，好像是在不断地变换颜色。他姓卡尤特金。

“那么你是从克拉斯诺顿来的啰？”中士带着高兴的、同时甚至又像将信将疑的表情重问了一遍。

“你去过那里吗？”谢辽萨问。

“我在那边有个朋友，是位姑娘。”卡尤特金有点抑郁地说。“不过她撤退了。我跟她是在路上认识的。真是个好姑娘……我曾路过克拉斯诺顿。”他沉默了一会说。“我还保卫过卡缅斯克。所有参加那次保卫战的人有的牺牲，有的被俘，可是我又到了这里。你听到过这样一首诗吗？”

于是他脸色严肃地朗诵道：

我在进攻中多次挂彩，
养好后，几乎伤疤都看不出来。
我三次陷入包围，
三次——瞧他！——都突围出来。
我虽然有过不安，
但在斜射的和三层的，
曲射的和直射的炮火下，
依然没有受到伤害……
在熟悉的路途上，
在路旁被队伍扬起的尘埃中，
多少次有人说我被“驱散”，
有人说我被“消灭”……

“这里面写的就是像我这样的人。”卡尤特金说完就笑了一阵，对谢辽萨挤挤眼。

白天就这样过去，黑夜降临了。在师长再次给柯诺宁柯少校交待任务的时候，将要执行这个任务的战士们都在睡觉。

谢辽萨也睡了。

早晨六点钟，值日兵把他们唤醒。战士们喝了一小杯伏特加，吃了半锅加了米粒的肉汤和一份相当多的麦糊。在迷雾的掩护下，他们沿着洼地和灌木林到进攻出发点集合。

在分批移动的战士们脚下，湿雪和泥泞混成了泥浆。两百米以外已经什么都看不见。重炮已经隆隆地响起来，可是最后几批战士还在向顿涅茨河岸集结，他们就在这一片稀粥似的泥浆里趴下。

大炮均匀地、有规律地轰击着，但是大炮实在太多，所以开炮声和炮弹的爆炸声竟融成一片接连不断的隆隆声。

谢辽萨趴在卡尤特金旁边，只见时而是圆的、时而是带着火尾的红球从他们右面和他们头顶上在迷雾中飞过河去。他听到它们滑过去的沙沙声、到了对岸的刺耳的爆炸声和在城里远处爆炸的隆隆声，这些声音对他和他的同伴们都起着鼓舞作用。

德国人只朝他们设想的步兵集结地点开迫击炮。城里有时用六管迫击炮还击。这种时候卡尤特金就带着几分担心的口吻说：

“瞧，它响起来了……”

突然远远地从谢辽萨背后滚来一阵雷鸣般的响声。这声音愈来愈响，在地平线上扩展开来。趴在岸上的战士们的头顶上也响起了隆隆声和呼呼声。骇人的炮弹的爆炸，裹着黑色的浓烟笼罩了整个对岸。

“‘卡秋莎’①出场啦。”卡尤特金说，他全身缩拢做好准备，皱纹满布的脸上也现出残酷的神气，“‘伊凡凿子’②马上还要来揍他们，那时候可就……”

①“卡秋莎”是一种多发火箭炮。

②“伊凡凿子”是对大口径近卫迫击炮的戏称。

他们背后的隆隆声还没有停，对岸的爆炸还在继续，这时谢辽萨并没有听到是否有号令，只看见卡尤特金探出身子直往前奔，于是他也从小战壕里跳出来跑到冰上。

他们好像是在绝对的寂静中在冰上奔跑，事实上对岸正对着他们开炮，人们也不断在冰上倒下。黑烟和硫磺气味一阵阵地透过大片浮动的迷雾向奔跑的人们滚来。但是，每个战士已经强烈地感觉到，一切都在顺利进行，一切将会进行得很顺利。

谢辽萨被这阵突然降临的寂静弄得莫名其妙，等他明白过来，他已经到了对岸的一个被翻出的泥土还在冒烟的弹坑里，趴在卡尤特金身旁。卡尤特金脸色可怕，在用自动枪对着正前方的什么东西射击。在离他们大约不出五十步的地方，谢辽萨看见从被泥土填没了半边的避弹壕里，翘着一挺机枪的架尾，不住地震抖，他便也朝这个避弹壕射击起来。那边的机枪手看不见谢辽萨和卡尤特金，只看到一个更远的目标，所以一下子就被打闷了。

城市在他们右面很远的地方，城里几乎已经不对他们射击。他们也越走离河岸越远，到了草原深处。过了好一会，才有从城里朝他们推进的方向发射的炮弹落在草原上。

在雾中看不见的、但是谢辽萨很熟悉的一些小庄子附近，他们又遇到猛烈的机枪和自动枪的火力。他们卧倒，趴了很久，一直等到几乎是直对着那些小庄子开炮的一些轻炮赶上他们。最后，有好几队战士跟着一些高大、快活、微有酒意的炮兵不断推着的这些轻炮一同冲进庄子。这里马上出现了营长，通信兵也已经把电线拉进一所被毁的小砖房的地窖里。

这样，在向他们小小的、局部的军事行动的最后目标——会让站——推进之前，一切都很顺利。如果他们有坦克的话，他们早就到了这个错车站，但是这一次坦克没有出动，因为顿涅茨河上的冰承受不住坦克。

现在战士们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进攻。敌人一开火，亲自领导这次作战的营长就只好带着他手边的几队战士去进攻，这时主力部队还在路上。战士们向这个庄子冲去，卡尤特金的一队人沿着大街已经冲进去相当深，开始了校舍的争夺战。

学校里发出的炮火非常猛烈，谢辽萨只好停止射击，把脸埋在泥浆里。一颗子弹打穿他左臂肘的上部，但是没有碰到骨头，在紧张的时候他并不觉得疼痛。等他最后下决心抬起头来，他身边已经一个人都没有了。

最正确的假设是：他的同伴们受不住炮火，退到庄子边上自己人那里去了。但是谢辽萨还没有经验，他觉得他的同伴都被打死了，于是恐怖钻进了他的心。他匍匐爬行着退到一所小房子的屋角后面，开始侧耳细听。有两个德国兵在他身旁跑过。他听到左、右和后面都有德国人的声音。这里的射击已经停止，庄子边上的射击逐渐增强，后来那边也寂静下来。

在远远的城市上空，大片的火光晃动着。被它映红的不是天空，而是一团团浓密的黑烟，接着从那边传来了各种各样的吼声。

在这个被德国人占领的庄子里，受了伤的谢辽萨，孤零零地趴在冰冷的稀粥似的雪泥浆里。

第六十三章

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要动手写到这部小说最令人悲痛的几页的时候，就不由得想起了你……

要是你能知道，在那些遥远的童年岁月里，当我和你一同乘车进城入学的时候，我的心情是多么激动啊！我们住的地方相隔五十多俄里①，每次从家里出来，我总是担心碰不到你，生怕你已经走了。我们不是整个夏天都没有见面吗！

①一俄里合一·〇六六公里。

我在大车上坐在父亲背后，夜里进了你们的村子，马累了，在街上一步一挨地走着，这时候，我惟恐会发生这种叫人难受的事，心里愁得简直无法形容。车子还没有走到你们家，我就从车上跳下来。我知道你一向睡在干草棚里，如果你不在那里，就表示你已经走了……但是你不等我来就自己走掉的情形，连一次也不曾有过，——我知道，你宁肯开学迟到，也不愿意把我孤零零地撇下……我们一直到天亮都没有合眼，把光脚从干草堆上耷拉下来，坐在那里说个没完，用手捂着嘴笑着，惊得架上的母鸡不住扑扇着翅膀。空气中散发着干草的气息，秋天的太阳从树林后面探出头来，突然照亮我们的脸，这时我们才看到，过了一个夏天我们有了多大的改变……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几个少年人卷起裤腿站在没膝深的碧绿的河水里，你对我承认说你爱上了一个姑娘……坦白地说，我不喜欢她，但是我对你说：

“是你在恋爱，又不是我！祝你幸福！……”

于是你就笑起来，说道：

“说实在的，为了阻拦一个人做坏事，甚至可以跟他决裂，但是在恋爱方面怎么能提意见呢？最接近的人往往要以监护人自居，来干预别人的恋爱，给人家拉拢，拆散，搬弄他们听来的关于你钟情的人的流言蜚语……要是他们能知道，他们这样做会造成多少危害，破坏生活中多少永不重现的纯洁的时刻啊！……”

我还记得，那人来了，那个某某来了，——我不愿说出他的名字，他带着嘲弄的微笑，开始肆无忌惮地信口乱扯他的一些朋友：“这个人爱某个姑娘爱得神魂颠倒，简直是拜倒在她脚下，可是她的指甲很脏，——不过这只能在我们中间讲……这一个，您可知道，昨天去做客，拚命地喝酒，喝得呕吐起来，——不过这只能在我们中间讲……某人穿得破破烂烂，装穷，其实他只是小气，这一点我确实知道，——他喝啤酒尽让别人掏钱也不感到害臊，——不过这只能在我们中间讲……”

你对他望了望，说道：

“你听着，某某，你赶快给我滚开……”

“怎么滚开？”某某吃了一惊。

“滚开就是滚开……一个人要是光看自己同志的短处，他就一点也看不见人家的优点，再没有比这种人更卑鄙的了！还有什么比一个专爱说人坏话的青年更可鄙的呢？……”

我是怀着怎样的钦佩望着你啊！我心里也有同样的想法，可是，我也许拉不下面子……

但是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那个夏天，那时我和你相隔很远，我考虑来考虑去，除了入团，我没有别的道路……

秋天，我们像往常一样，仍旧在那个干草棚里会面，我感到你对我的态度有些尴尬和疏远。我感到自己对你的态度也是如此。我们像童年那样耷拉着光脚坐着，彼此都不开口。

后来你说：

“也许，你对我会不了解，甚至会责怪我不跟你商量就这样决定。但是夏天我一个人待在家里，我想来想去没有别的道路。你知道，我决定要入团……”

“但是到那时候你就会有新的任务和新朋友，那叫我怎么办呢？”为了考验我们的友谊，我故意这么说。

“是啊。”你忧郁地回答说，“这种情形当然会发生。是的，我懂得这是良心问题，但是如果你也入团，那不是很好吗！”

这时我已经不能再使你苦恼：我们互相望了一眼，就大笑起来。

也许，我们从未有过像在你的干草棚里最后这一次这样幸福的谈话。那时母鸡还在架上，太阳正从白杨后面探出头来，我们宣誓决不离开我们已经踏上的道路，永远忠于我们的友谊……

友谊！世上有多少人在说这个词的时候指的是茶余酒后愉快的谈话和彼此对弱点的宽容！可是这跟友谊有什么关系呢？

不，我们碰到任何问题都要争论不休，我们毫不顾惜对方的自尊心，——不错，要是我们意见分歧，我们会把对方批评得体无完肤！可是我们的友谊反而因此更为巩固，更为深厚，变得像金石那样坚固。

我常常对你蛮不讲理，但是如果我认识到我错了，我决不怕向你认错。

虽然在这种场合我唯一能说的只是我错了。可是你总是说：

“别难受，这又有什么用呢……要是你都想通了，你就忘掉它吧，这种事是常有的，因为这是斗争……”

以后你对我的照顾就比医院里最和蔼的护士还要好，也许，甚至比我的母亲还好，因为你并不多愁善感，而是一个有些粗犷的少年……

可是现在我却要来讲述，我是怎样失掉了你，——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可是我觉得，这仿佛不是在上一次大战里，而是在这一次……我从湖畔拖着你穿过芦苇走着，你的血流到我手上。骄阳似火，在湖岸那边的人大概已经全部牺牲，对准这条芦苇丛生的狭窄地带射击的炮火实在太猛烈了。我拖着你走着，因为我不能设想你会死去……这时你躺在铺着的芦苇上面，神志清楚，只是你的嘴唇焦干，你说：

“要喝水……给我点水喝喝……”

但是这里已经没有水，而且我们的杯子、小锅和背壶都没有了，否则我可以回到湖边去取水。那时你就说：

“你小心地把我的靴子脱下来，它还挺结实……”

于是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我从你脚上脱下一只经过长途跋涉的大军靴，——我们行军这么久都没有换过包脚布，但是我仍旧拿着这只靴子，先是走，继而向湖畔爬过去。我自己也口渴得要命。当然，我想都不敢想自己能在这样的炮火下喝个痛快，——要是我能把靴子汲满了水再爬回来，这已经是奇迹了。

但是等我爬到你身边，你已经死了。你脸上非常平静。我第一次发现，你是多么高大，难怪人家常要把我们俩认错。泪水从我眼睛里涌出来。我渴得要命，我就伏到你的靴口，伏到这个充满我们战士友谊的粗陋的苦杯上，一边哭一边把水喝尽……

华丽雅疲惫不堪，冻得发僵，腹中饥饿。她既不觉得寒冷，也不感到恐惧，她像一头母狼似的沿着战线流浪，从一个庄子到另一个庄子，有时就在草原上露宿。在战线每一次新的移动之后，一批批撤退过来的德国人就逼得她愈来愈走近她自幼熟悉的地方。

她流浪了一天、两天、一个星期，她继续流浪着，自己也不知道目的何在。也许她还希望越过战线，到后来她自己也相信起她哄骗谢辽萨的那套谎话来了：他为什么不会当真带着一队红军过来呢？他说过：“我一定要来。”他说话一向是算数的。

一天夜里，就在卡缅斯克城里发生了战斗。在周围几十俄里的地方都能看到裹着一团团黑烟的大片火光。华丽雅在离卡缅斯克大约十五公里的一个庄子里找到一个安身之处。庄子里没有德国人，华丽雅也像大多数居民一样，彻夜不眠，观看火光。有什么东西使她不断地等待着，等待着……

上午十一点钟光景，庄子里知道红军部队已经冲进卡缅斯克，战事正在城里进行，德军已经被挤出大部分城区。马上就要有敌人中最可怕的敌人——在战斗中吃了败仗的敌人——像潮水似的涌过来。华丽雅又拿起背包，走出了庄子，女主人怜惜她，在她的背包里放了一个面包头……

她漫无目的地走着。解冻天气一直持续着，但是风已经变了方向，天气更冷了，雾消散了，满天都是轮廓不清的雪云。华丽雅背着背包，在大路当中站住，久久伫立。她消瘦了，她的从帽子下面钻出来的、潮湿的亚麻色鬈发被风吹乱。

后来她就沿着全是雪水的村道缓慢地朝克拉斯诺顿那边走去。

这时候，谢辽萨却拖着一只裹在血污的衣袖里的胳臂，没有带武器，就在庄子的另一头敲着最尽头一所农舍的小窗。

不，命运注定他不死在这一次。……他在会让站附近那个庄子当中的又脏又湿的雪地上趴了很久，等待德国人安静下来。不能指望自己的军队今天夜里再冲到庄子里来。得走，得离开战线。他穿的是便服，武器可以留在这里。他又不是第一次穿过敌人的阵地！

当他费力地拖着一只受伤的胳臂爬过铁路的时候，天空笼罩着黎明前朦胧的雾霭。平常在这时候，农舍里的勤劳的主妇已经起来，点上松明等待天亮。但是现在勤劳的主妇都带着孩子躲在地窖里。

谢辽萨越过铁路之后大约爬了一百米，再站起来走。他就这样勉强支持着走到这个庄子。

一个梳着亚麻色辫子的姑娘刚打了一桶水回来。她撕下一块旧衣服给他裹了伤，洗干净他衣袖上的血渍，又用炉灰揩了揩。主人们非常担心马上会有德国人闯来，连一点热的东西都没有给谢辽萨吃，只给了他一点吃的，让他带走。

于是整夜没有睡觉的谢辽萨就沿着战线一个庄子一个庄子地走过去——寻找华丽雅。

顿涅茨草原上往往如此，天气突然又变得像冬天了。大雪纷飞，落下来就不融化。后来严寒突然降临。在一月的最后几天里，带着孩子单独居住的谢辽萨的姐姐菲尼亚，有一天从市场回来，看见门锁着。

“妈妈，你是一个人吗？”她的大孩子在门里边问道。

谢辽萨坐在桌旁，一只胳臂撑在桌上，另一只胳臂耷拉着。他本来就瘦，现在脸完全凹进去，背也有些驼，只有他的眼睛望着姐姐的时候，还像原来那样活泼，奕奕有神。

菲尼亚告诉他，中央工厂里捉了人，大部分“青年近卫军”队员都被捕入狱。奥列格被捕的消息，她也从玛丽娜那里知道了。谢辽萨默默地坐着，眼睛可怕地闪烁着。过了一会他说：

“我这就走，你别害怕……”

他感到菲尼亚在替他和替自己的孩子担心。

姐姐给他包扎了伤口，给他换了一件女服，把他原来的衣服折好打了一个小包袱，趁着暮色苍茫送他回家。

父亲经过监狱里的折磨，身子更佝偻了，他几乎一直躺在床上。母亲还硬挺着。两个姐姐——达莎和他最喜爱的娜佳——都不在：她们也朝着战线那边去了。

谢辽萨仔细询问：他们有没有听到华丽雅的消息？

在这个时期里，“青年近卫军”队员们的父母彼此关系变得密切起来，但是玛丽雅·安德烈耶芙娜对谢辽萨的母亲一点也没有提到自己的女儿。

“她不在那边吗？”谢辽萨忧郁地问。

不，华丽雅不在监狱里：这一点他们是确实知道的。

谢辽萨脱了衣服，整整一个月来是第一次躺到自己的干干净净的床上。

桌上点着油灯。一切都像他童年时代那样，但是他什么都没有看见。父亲躺在隔壁房间里，咳得连墙壁都在震动。可是谢辽萨却觉得房间里寂静异常：没有姐姐们平常的嘁嘁喳喳声。只有小外甥在“爷爷”房间里的泥地

上爬着，在咿呀学语。

母亲出去料理家务。“爷爷”的房间来了一个女邻居，一个年轻妇女。这个女人几乎每天都来串门，谢辽萨的父母由于老实和心地纯朴，从来没有考虑过，她为什么往他们家跑得这么勤。女邻居来了就跟“爷爷”聊天。

小孩在地上爬着，拾到一样东西就爬到谢辽萨的房间里来，嘴里含糊不清地叫着：

“舅舅……舅舅……”

那个女人很快地朝上房里扫了一眼，看见了谢辽萨，接着又跟“爷爷”聊了一会就走了。

谢辽萨在床上蜷起身子，不动了。

母亲和父亲已经睡了。屋子里黑暗而寂静，但是谢辽萨久久不能成寐，怀念着……

突然院子里传来一阵猛烈的敲门声：

“开门！……”

一秒钟以前，他还以为带领他通过种种考验的那股不屈不挠的生命力已经永远离开了他，还以为自己已经垮了。但是就在听到敲门声的同一刹那，他的身子顿时又变得柔韧灵活，他毫无声息地从床上一跃而起，跑到小窗前面，微微掀起黑窗帘的一角。周围是一片雪白。一切都浴着均匀的月色。非但持枪站在窗前准备着的那个德国兵的身形，就连他的影子也像是印在雪地上似的。

母亲和父亲都醒了，惊骇地、迷迷糊糊地商量了几句，再静下来细听擂门的声音。谢辽萨已经习惯于用一只手做事。他穿上裤子、衬衫和鞋子，只是没法把师部发给他的红军战士的皮鞋的鞋带系起来，他走到母亲和父亲睡的上房里。

“你们谁去开开门，不过别点灯。”他轻轻地说。

泥屋好像眼看就要被擂塌似的。

母亲在房间里直转，她已经急昏了。

父亲轻轻地从床上起来，根据他的默默的动作，谢辽萨感到老头的行动是多么困难，这一切使他多么痛苦。

“没有办法，只好去开门。”父亲说话的声音显得异样地尖细。

谢辽萨明白了，父亲原来是在哭泣。

父亲笃笃地拄着手杖走到门道里，一面说着：

“来了，来了……”

谢辽萨悄悄地跟在父亲后面溜出来。

母亲沉重地跑到门道里，把一样金属的东西动了一下，接着好像有一阵冷空气冲进来。

父亲开了外面的门，手扶在门上，身子闪在一旁。

三个暗色的身形从一块长方形的月光地里鱼贯走进了门道。最后进来的人随手掩上了门，接着门道里就被探照灯似的强烈的电筒光照得雪亮。电筒光先照到母亲身上，母亲站在门道里边，靠着通往做牛棚的边屋的门。谢辽萨在他的黑暗的角落里看见门上的搭钩已经拉开，门半开着，心里明白母亲这是为他做的。但是就在这一刹那，电筒光照到父亲和躲在他背后的谢辽萨身上：谢辽萨没有料到他们会用电筒照亮门道，他原来是希望等他们进了上房再溜到院子里去。

两个人抓住他的手。他的受伤的胳膊里引起的剧痛使他叫了起来。他们把他拖进了上房。

“点灯！干吗那么娇滴滴地站着！”索里柯夫斯基对母亲吆喝道。

母亲的手哆嗦得半天没有能把油灯点亮，还是索里柯夫斯基自己按了打火机。抓着谢辽萨的是芬庞和一个党卫队兵士。

母亲一看见他们，就嚎哭起来，跪在地上。这个高大笨重的老妇人在地上爬着，她的滚圆的双手在泥地上乱扒。老头撑着手杖站着，身子几乎弯到地上，浑身哆嗦。

索里柯夫斯基草草地搜查了一下，——邱列宁家已经被他们搜查过不止一次。那个兵士从裤袋里摸出一根绳，把谢辽萨的双手反绑起来。

“只有一个儿子了……行行好吧……把牛和衣服统统都拿去吧。”

天晓得她在说些什么……谢辽萨实在心疼她，甚至流了眼泪，可是他不敢开口，怕自己会大哭起来。

“带走。”芬庞对那个兵士说。

母亲来拦他，他就嫌恶地一脚把她踢开。

那个兵士推着谢辽萨往前走，芬庞和索里柯夫斯基跟在他后面。谢辽萨转过身来说：

“永别了，妈妈……永别了，我的父亲……”

母亲向芬庞冲过去，用她的还很有劲的双手打他，一面嚷叫着：

“杀人的凶手，宰了你们还嫌便宜！你们等着吧，我们的军队就要来了！……”

“哼，你……又想到那边去了吗？”索里柯夫斯基怒吼道，不顾“爷爷”冲口而出的嘶哑的哀求，就把亚力山德拉·华西里耶芙娜拖到街上。她身上只穿着她平时睡觉穿的宽大的长衣，“爷爷”差点没有来得及把大衣和头巾扔给她。

第六十四章

谢辽萨在受刑的时候不吭声，在芬庞把他双手反绑起来吊在拷问架上的时候不吭声，尽管他的受伤的胳臂万分疼痛，他也一声不吭。只有芬庞用通条戳进他的伤口的时候，他才把牙齿咬得咯吱咯吱响。

可是他的生命力仍旧是惊人地旺盛。他被投进一个单间牢房之后，马上就敲两面的板壁，打听左右是什么人。他踮起脚尖研究了天花板下面的缝隙，——能不能设法把缝隙扩大，拆掉一块木板，哪怕能钻到监狱的院子里也好。他确信，只要能出牢房，他无论从哪里都可以逃走。他坐下来追忆他受审讯和受刑的那间屋子的窗户是怎么开的，走廊通院子的那扇门有没有上锁。唉，要不是胳膊受了伤！……不，他还不认为自己已经陷入绝境。在这些晴朗严寒的夜里，顿涅茨河上的炮声甚至在牢房里都听得见。

第二天早晨，他们让他跟维佳对质。

“不……听说他就住在我们旁边，可是从来没有看见过他。”维佳说。他的温柔的深色眼睛望着谢辽萨身旁，在他脸上只有这双眼睛还有生气。

谢辽萨没有作声。

后来维佳被带走了，过了几分钟，索里柯夫斯基押着谢辽萨的母亲走进牢房。

他们剥去这个老妇人——十一个孩子的母亲——的衣服，把她扔在血迹斑斑的刑床上，当着她儿子的面用电线拧成的鞭子毒打她。

谢辽萨并不转过身去，他看着他们打他的母亲，一声不吭。

后来他们又当着他母亲的面打他，他也还是一声不吭。连芬庞都冒火了，他从桌上抓起一根铁棍，一棍打断了谢辽萨的那只好胳臂。谢辽萨变得脸色惨白，额上冒出汗珠。他说：

“这下子可完了……”

这一天监狱里运来了克拉斯诺顿村全部被捕的人。他们大多数已经不能行走，他们被挟住胳肢窝在地上拖过来，扔到本来已经人满的牢房里。苏姆斯柯依还能走，但是他的一只眼睛被鞭子抽了出来，流着水。托西雅，就是那个看见翻头鸽腾空飞起就快乐得大叫起来的姑娘，只能趴着：在把她送到这儿来以前曾让她坐过烧红的铁板。

他们刚被运到，就有一个宪兵到姑娘们的牢房里来提刘勃卡。她们全体，包括刘勃卡自己，都相信她是被带去处死的……她跟大伙告了别，就被带走了。

但是刘勃卡并不是被带去处死。他们是按照本州野战司令官克列尔少将的要求，把她送往罗文基去让他审讯。

这一天是亲人们可以送东西的日子，天气寒冷，可是平静得一丝风也没有；斧声、井边的水桶声、行人的脚步声，在被阳光和白雪映照得闪闪发光的空气中传播得很远。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和刘西雅总是一起来送东西，她们包了一小包食物，拿着沃洛佳最近送出来的字条上要的一只枕头，沿着在雪上踏出来的、穿过空地的小路，朝狭长形的监狱走过来。监狱的白墙和在背阴那面屋顶上泛着青光的积雪，使监狱跟四周的地方融为一色。

她们母女俩都消瘦了，变得彼此格外相似，简直像是两姊妹。母亲一向容易冲动、急躁，现在格外像是全部都由神经构成的。

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和刘西雅听到聚集在监狱旁的妇人们说话的声音，看到她们手里都拿着小包裹而不向监狱大门移动，已经感到事情不妙。一个德国哨兵像平时一样站在台阶旁边，根本不理会这群妇女。台阶的矮栏杆上坐着一个穿黄色短皮大衣的“警察”，但是他并不接受送来的东西。

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和刘西雅用不着去细看这里都有哪些人：她们天天都在这里碰到这些人。

万尼亚的母亲，一个矮小的老妇人，站在台阶前面，手里捧着一个小包和一卷东西，说：

“至少要拿点吃的进去吧……”

“不用。我们自然会给他吃的。”“警察”望也不望地说。

“他要一条被单……”

“今天我们会给他一副好被褥……”

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走到台阶跟前，声音生硬地说：

“你们为什么不收送来的东西？”

“警察”一声不响，理都不理她。

“我们反正不着急，我们可以一直站下去，等有人出来给了回话再走！”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回过头来望着妇女们，说。

她们就这样站着，一直等到她们听见监狱的院子里响起了好多人的脚步声，听到有人在开大门的锁。平时妇女们总是趁此机会朝监狱里向这面开的窗子张望一下，有时她们居然能看到关在这些牢房里的自己的孩子。现在这群妇女都向大门的左面涌过去。但是从大门里走出鲍尔曼中士率硕的几个兵士，他们开始把这群妇女驱散。

妇女们跑开之后又回来，好些人已经放声大哭。

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和刘西雅退到旁边，默默地望着这些情景。

“今天他们要被处决了。”刘西雅说。

“我只求上帝，让他一直到死不要屈服，让他不要在这些疯狗面前发抖，让他能朝他们的脸上吐唾沫！”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说，她的喉咙里发出低沉沙哑的、激动的声音，眼睛射出可怕的光芒。

这时候，她们的子女正在受着命运使他们遭受的最后的和最可怕的考验。

万尼亚摇摇晃晃地站在勃柳兑纳宪兵站长面前，他满脸流血，脑袋无力地耷拉着，但是万尼亚一直努力要抬起脑袋，后来终于抬了起来，他在这四个星期以来的沉默中第一次开口了。

“怎么样，你们办不到吧？……”他说，“你们是办不到！……你们占领了多少国家……你们把荣誉和良心都抛弃了。

可是你们办不到……你们没有这个本事……”

他说了就大笑起来。

这天迟暮时分，两个德国兵把邬丽亚抬进牢房，她的惨白的脸朝后仰着，辫子拖在地上。他们把她扔在墙边。

邬丽亚呻吟起来，转过身来趴着。

“亲爱的李丽亚……”她对李丽亚说，“把我的上衣往上拉些，痛得像火烧一样……”

李丽亚尽管自己行动也很勉强，但是到最后一分钟还是像保姆那样照顾自己的女友们，她小心地给邬丽亚把被血浸透的上衣卷到腋下，吓得不由往后一退，痛哭起来：邬丽亚的背上被刻了一个血淋淋的五角星。

除非等这几代人里的最后一代进了坟墓，否则克拉斯诺顿的居民永远不能忘记这个夜晚。一弯异常皎洁的残月斜挂在天空。草原上周围几十公里的地方都清晰可见。天气冷得令人难受。在北方的整个顿涅茨河上都闪着亮光，从那边传来大大小小的战斗的隆隆声，时而沉静，时而增强。

亲人里这一夜谁也没有睡。非但是亲人睡不着，所有的人都知道，这天夜里要处死“青年近卫军”的队员。人们在自己的没有生火的屋子里和陋室里，守着油灯或是摸黑坐着；有的跑到院子里，在严寒中久久伫立，倾听着有没有人声、汽车声或是枪声传来。

牢房里，除了那些处于昏迷状态的人，也是谁都没有睡。最后一批被带去刑讯的“青年近卫军”队员，看见斯塔庆柯市长来到监狱里。大家都知道，市长总是在行刑之前，要他在判决书上签字的时候，才到监狱里来……

牢房里也听得到顿涅茨河上惊天动地的炮声。

邬丽亚头靠着板壁，侧着身子半躺着；她敲着板壁对隔壁的男孩子们说：

“伙伴们，听见了吗，听见了吗？……要挺住……我们的军队来了……不管怎么样，我们的军队还是来了……”

走廊里响起了兵士皮靴的踏步声，牢房的门关得砰砰地响。他们开始把被监禁的人带到走廊里，然后不是穿过院子，而是直接带出大门，走到街上。牢房里的穿着大衣或是厚衣服的姑娘们，互相帮着戴上帽子，扎起头巾。李丽亚给僵卧的安娜·索波娃穿上衣服，舒拉也给她心爱的朋友玛雅穿上衣服。有几个姑娘写了最后的字条藏在扔掉的衬衣里。

上次家里给邬丽亚送来一套干净衬衣，现在她动手把旧衬衣包在包袱里。突然一阵眼泪使她窒息，她无法克制，就抓起血衣把脸捂住，不让人听到她在哭泣，然后缩到角落里，就这样坐了一会。

他们被带到浴着月光的空地上，装进两辆卡车。第一个抬出来的是没有一丝力气而且失去理智的斯塔霍维奇，他们把他一甩就扔进了卡车。好些“青年近卫军”队员自己都不能行走。托里亚是被抬出来的，他的一只脚被砍掉了。维克多的眼睛被打了出来，由腊高静和谢毕辽夫搀扶着。沃洛佳被砍掉了右手，但是他自己走。万尼亚由奥尔洛夫和维佳抬出来。在他们后面，谢辽萨像草茎似的，摇摇晃晃地走着。

姑娘们和小伙子们被分开装在两辆卡车里。

兵士们把卡车两边的槽帮砰的关上，跨过车沿爬进塞满了人的卡车。芬庞军士坐在前面那辆卡车的司机旁边。卡车开动了。他们走的路线是穿过空地再经过儿童医院和伏罗希洛夫学校。前面一辆车上都是姑娘们。邬丽亚、莎霞和李丽亚唱了起来：

你受尽牢狱的折磨，

可是你死得光荣……

姑娘们都跟着唱起来。后面卡车里的小伙子们也唱了起来。他们的歌声在严寒的、凝止不动的空气里传送到很远的地方。

两辆卡车开过左面最后一所房子，上了通五号井的大路。

谢辽萨贴着卡车的后槽帮坐着，鼻孔贪婪地吸着寒冷的空气……现在卡车已经开过折向新村的转弯处，马上就要穿过峡谷。不，谢辽萨知道，要他做这件事已经是力所不及。但是他前面跪着双手被反绑的柯瓦辽夫。柯瓦辽夫还很有劲，所以难怪要把他的手绑起来。谢辽萨用头顶了他一下。柯瓦辽夫转过脸来。

“托尔卡……马上要过峡谷了……”谢辽萨低语说，又用头朝旁边点点。

柯瓦辽夫斜过眼来看了看自己肩膀后面，动了动被绑着的双手。谢辽萨把牙齿贴在绑着柯瓦辽夫的双手的绳结上。他虚弱得一点气力也没有，累得几次靠在后槽帮上，额上直冒汗珠。但是他拚命地干，好像是为了争取自己的自由一般。绳结终于被弄开了。柯瓦辽夫仍旧把手放在背后，让两手活动活动。

……严峻的复仇者就要起来，

他比我们更强大有力……

姑娘们和小伙子们唱着。

卡车驶下峡谷，前面的一辆已经在爬山坡。第二辆卡车吼叫着，车轮打着滑，也要开上去了。柯瓦辽夫一只脚踏上后槽帮，纵身一跳，就沿着峡

谷奔去，在雪上踩出了一条沟痕。

最初一刹那的惊慌过去了，可是这时卡车已经开出峡谷，柯瓦辽夫也影踪全无了。兵士们怕其他被捕的人也纷纷逃散，不敢跳下车去，只好在车上乱开枪。芬庞听到枪声，叫车子停下，自己跳了下去。两辆卡车都停下了。芬庞用他那村妇般的嗓子破口大骂。

“他跑了！……他跑了！……”谢辽萨怀着难以形容的强烈的狂喜，用尖细的声音喊叫着，接着就用他所知道的最恶毒的话咒骂着。但是现在这些骂人的话出于谢辽萨之口，听起来就像是神圣的誓词一样了。

现在已经看得见炸毁后的五号井倾斜的井架。

小伙子们和姑娘们唱起了《国际歌》。

他们下车后都被赶到矿井附设的上冻的澡堂里，在里面关了一会，因为要等候勃柳克纳、巴尔德和斯塔庆柯到来。只要有人穿着好衣服和好鞋子，宪兵们就动手把这些东西剥下来。

“青年近卫军”的队员们得到互相告别的机会。克拉娃也能够坐到万尼亚身旁，把手放在他的额上，就不再和他分开。

他们一小批一小批地被带出去，然后一个一个地被扔进探井。凡是还能说话的人，都来得及说了几句他愿意留在人世间的话。

德国人怕几十个人同时被扔进探井不会全部都死掉，又把两辆煤车推下去。但是矿井里发出的呻吟还是一连几天都能听见。

他们，费里普·彼得罗维奇·刘季柯夫和奥列格·柯舍沃伊，手腕被绑着，站在野战司令官克列尔面前。他们被关在罗文基期间，一直不知道他们是被关在同一个监狱里。但是这天早上他们被提出来带到一起，绑在一起带去对质，克列尔希望逼他们供出不单是本区、而且是全州的地下组织的线索。

德国人为什么要把他们绑起来？要是不绑他们，德国人看见他们就害怕。敌人同时也想以此显示，他们知道这两个人在组织里所起的作用。

刘季柯夫头上的白发被干了的血粘在一块，被撕得破烂不堪的衣服粘连在他的巨大身躯的伤口上，每动一下都引起极度的疼痛，但是这一点他毫不显露出来。深重的苦难和饥饿耗干了刘季柯夫的身体，他脸上那些有力的线条显得格外分明了。这些线条在他年轻时曾使他的脸显得非常出色，并且显示出他的伟大的精神力量。他的眼神平静而严厉，像平时一样。

奥列格站在那里，他的被打断的右胳臂无力地耷拉着。他的脸几乎没有改变，只是两鬓已经完全灰白。他的暗金色睫毛下面的大眼睛带着泰然自若的、比任何时候更为泰然自若的神色。

他们——年老的和年轻的群众领导人——就这样站在德国野战司令官克列尔面前。

克列尔杀人成性，因为除此以外，他什么也干不了。这时他就使他们受到更多的可怕的拷打。但是，可以说，他们对这些已经毫无感觉：他们的精神翱翔在只有人类伟大的、富有创造力的精神才能达到的那种无限崇高的境界。

后来把他们分开了，刘季柯夫又被解回克拉斯诺顿的监狱。中央工厂的案件仍旧没有调查完毕。

可是地下工作的同志们依然无法援救被监禁的人，这不但因为监狱防卫森严，同时也因为现在满城都是撤退下来的敌军。

刘季柯夫、巴腊柯夫和他的同伴们也遭到了和“青年近卫军”队员同样的命运：他们也被扔进五号井的探井。

奥列格于一月三十一日白天在罗文基被枪决，他的尸体和其他在同一天被枪决的人们的尸体一起被埋在一个大坑里。

可是刘巴还被折磨到二月七日，他们一直不肯死心，企图从她那里弄到密电码和发报机。在被枪决之前，她设法给母亲寄了个字条：

永别了，妈妈，你的女儿刘巴要到地下去了。

刘巴被押出去枪决的时候，她唱起了她最喜欢的一支歌：

在莫斯科广阔的地方……

押她去枪决的党卫队分队长要她跪下来对着她的后脑开枪，但是刘巴不肯跪下，并且是正面接受了子弹。

第六十五章

刘季柯夫通过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把他认为奥列格和杜尔根尼奇可以利用的地址转告他们的时候，为了预防万一，没有叫她转告这是一个怎样的地址。刘季柯夫知道，玛尔法（他就是叫他们到她那里去）会把他们到达的消息通知普罗庆柯或是他的妻子。到那时，那边就可以使用“青年近卫军”的领导人。

刘季柯夫敢于把这个绝密的地址告诉奥列格和杜尔根尼奇，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他是多么信任他们，重视他们，多么为他们的命运担心。

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虽然没有向奥列格说明刘季柯夫叫他和杜尔根尼奇去的是什么地方，但是杜尔根尼奇立刻猜到，这是通往游击队的道路。

在所有参加“青年近卫军”的人们里面，只有他和莫什柯夫是已经成熟了的成年人。杜尔根尼奇跟他的同伴们一样，为了战友的被捕忧心如焚。他绞尽脑汁，考虑怎样可以拯救他们。但是杜尔根尼奇和他的同伴们不同：他看问题是从现实出发。因此他要援助战友的想法就带有非常实际的性质。

搭救战友的捷径是到游击队去。杜尔根尼奇知道，苏军已经到了伏罗希洛夫格勒州境内，并且在继续挺进，克拉斯诺顿城里也在准备武装发动。他毫不怀疑，以他这样一个有军事经验的人，他们一定会交给他一个支队，或者，至少也会让他组织一个支队。于是杜尔根尼奇就毫不迟疑地去利用奥列格转告他的地址。

他认为，在各个宪兵机关和“警察所”里都可能知道他的姓，所以他不去冒险携带可以证明他身分的证件。用别人姓名的证件他没有，也没有时间去弄。杜尔根尼奇就不带任何证件上了路，往北走去。他的左腕上从小就刺了他名字的第一个大写字母。因此名字只好用原来的，可是想了个假姓——克拉庇文。

他的情况很不妙。不管从他的姿态或是单从年龄来讲，他都绝不像那种没有证件又没有事而在德军后方、而且还是在非常接近战线的地方到处晃荡的人。要是落到秘密警察或是“警察”手里，他能够编造的理由，——比方说，他是从罗斯托夫州奥耳霍夫角跑出来逃避红军的，红军坦克已经冲进

他们的庄子，所以他连证件都没有来得及拿，——充其量也只能保住他的性命。但是这些理由必然会注定他要到德国军队里去做后勤工作或是被赶到德国去。

杜尔根尼奇日夜兼程，绕过照他估计可能碰到“警察”的那些居民点。他挑选比较隐蔽的地方走，有时走大路，有时走草原。要是他觉得别人看着他太显眼，他就白天休息，夜间赶路。他因为穿的是皮靴，所以脚冻得厉害，特别是在他不能活动、几乎没有东西吃的时候。精神上的痛苦使他的心变得冷酷无情。他肉体上那种吃大苦、耐大劳的能力是只有俄罗斯工人，而且是年轻的、还要经历过卫国战争考验的俄罗斯工人才能具备。

他就这样历尽千辛万苦走到玛尔法那里。

在她住的村子里，甚至在她家里，在附近所有的庄子——达维多夫、马卡罗夫·雅尔以及其他庄子里，都驻着敌人的军队。在北顿涅茨河的左右两面，都筑起强大的防御工事。德军的这道防线把伏罗希洛夫格勒州的南北两面完全隔开，使玛尔法和普罗庆柯之间几乎不可能联系。不过，即使这种联系还有可能的话，现在也没有必要了。本州北方各区的游击队都已经跟红军部队直接协同动作，并且是按照这些部队指挥部的指示作战，而不是按照普罗庆柯的指示作战。南方各区的游击队因为战线要到二月中旬才接近他们，所以现在是相机行事。普罗庆柯离他们远在几十公里以至几百公里之外，对于这些情况无法估计，所以也无法领导这些队伍。

普罗庆柯直接待在别洛沃德斯克游击队里，这支游击队离开了它在高罗箕希村的根据地（现在村里驻着德国兵），已经没有固定的根据地，而是按照苏军指挥部的指示在德军后方行动。玛尔法跟普罗庆柯和自己的丈夫都没有联系。她跟纳烈日内以及也离开了根据地的米佳金游击队里的任何人都没有联系：在米佳金镇一带驻有德国军队，并且筑起了工事。等杜尔根尼奇到达玛尔法那里的时候，卡佳早已到了伏罗希洛夫格勒，所以跟卡佳的一切联系也都中断了。

杜尔根尼奇能够见到玛尔法，完全是凭着他的机智和勇敢。而玛尔法肯相信他，更是他的运气。她没有看到他的证件，单凭他的话就相信了他：她根本无法核对杜尔根尼奇的话是真是假。她故意装出一副冷漠的神气迎着他的安静的、非常严肃的目光，她一眼就注意到他的疲倦瘦削的脸上带着刚毅的皱纹，她也渐渐看出了他的军人的姿态和谦逊的举止，于是突然就相信了他，——只有斯拉夫妇人才能这样一下子就对人产生信任，而且不会看错。当然，她没有马上表示相信他，但是这里又是巧上加巧。在她承认她确实是玛尔法·柯尔尼延柯之后，杜尔根尼奇就想起了高尔杰依·柯尔尼延柯，他曾经听和他同名的万尼亚以及参加那次行动的人谈过高尔杰依·柯尔尼延柯在战俘营里遇救的故事，所以就问，他是不是玛尔法的亲戚？

“哦，可以算是亲戚。”玛尔法说，她的年轻的黑眼睛里突然露出活泼的神情。

“这是我们‘青年近卫军’的青年人把他救出来的……”

接着他就讲了这件事的经过。

玛尔法不止一次听她丈夫讲过这件事。于是她就把她无法向拯救她丈夫的年轻人表达的满腔女性的、母性的感激之情，全部都倾注在杜尔根尼奇身上。她不是用言语或手势来表达她的感激。她只是把她在高罗箕希附近的一个亲戚的地址给了杜尔根尼奇。

“那边离战线更近，他们会帮助您越过战线。”她说。

杜尔根尼奇点点头。他并不打算越过战线，但是他需要找到跟我们的部队协同动作的游击队。那么，当然他在玛尔法叫他去的地方可以更快地找到游击队。

他们不是在村里，而是在草原上的一个坟墩后面交谈。天色开始暗下来。玛尔法说她会派人来当夜就带他越过顿涅茨河，她说完就走了。杜尔根尼奇出于客气和自重，没有请她给他拿点吃的东西来。但是玛尔法可不是会把这种事忽略掉的人。一个矮老头——就是普罗庆柯跟他交换衣服的那个老头——在帽子里放了一点面包干和一块脂油带给杜尔根尼奇。老头很爱说话，他用不祥的低语告诉杜尔根尼奇，说他不能带他越过顿涅茨河，因为目前没有人敢冒险过河，更不用说要给游击队员带路了。但是他可以给杜尔根尼奇指点一条最容易过河的捷径。

于是杜尔根尼奇就过了顿涅茨河。几天之后，他到达高罗箕希以南大约三十公里的偏僻的楚庚卡村。现在他经过的地方常常碰到敌军的工事，并且常看到德军大规模的移动。他从当地居民那里听到，在楚庚卡设有一个“警察所”，而且村里还常有德国军队或是罗马尼亚军队路过。他也打听出来，楚庚卡是离已经被我军收复的沃洛希诺村——沃洛希诺村在卡梅什纳雅河边，离卡梅什纳雅河注入杰尔库尔河的地方不远——最近的一个居民点。所以他决定要不惜一切偷偷进入楚庚卡：当地居民可能跟我们的军队有联系。

在这里他的运气不佳：他在快进村的地方被“警察”捉住。他被带到“村公所”里。这时替德国人服务的一批俄罗斯“警官”正在里面恣意狂饮，那种放荡堕落的丑态不是笔墨所能形容的。

杜尔根尼奇被剥得只剩一身内衣，手脚都被绑着扔进一个四壁冰冷的地窖里。他经过长途跋涉，历尽千辛万苦，再加上最后的这次惊吓，已经疲惫不堪，所以他不顾那使他浑身不住哆嗦的砭骨寒气，就在一个恶臭难闻的垫子上面睡着了。这个垫子是他爬遍整个肮脏的地窖里的泥地，才在一个角落里发现的。

一阵汽车排气声把他吵醒，在睡梦中他以为这是枪声。同时他又听到了几辆重机动车在墙外街上停车发出的吼声。他头顶上的地板咚咚地响起来。过了一会，地窖的门打开了，在冬天的晨曦中，他看见有几个穿深色棉衣的苏联自动枪手走进地窖。前面的一个中士打着电筒照了照杜尔根尼奇。

救出杜尔根尼奇的是乘着三辆缴获的德国装甲车冲进村子的我方侦察队。除了已经全部就擒的“警察”之外，村里还驻扎着一个包括一名军官和一名厨师在内总共七个人的德国步兵连。在德国装甲车出现的时候，刚动手做菜的厨师毫不惊慌，甚至还立正致敬，怕万一装甲车里坐着长官。过了一会，他在已经被俘之后，还非常乐意地给苏联自动枪手指点连长睡在哪里。他带路的时候，踮起穿着大得吓人的稻草靴的脚，狡猾地挤着眼睛，把一根手指放在嘴上，发出“嘘—嘘！”的声音。

侦察队因为燃料不足不得不回部队，侦察队的指挥员，一个上尉，建议杜尔根尼奇跟他们一起走。但是杜尔根尼奇拒绝了。他们谈话的时候，装甲车已经被当地居民团团围住，居民本来是来慰问红军战士们的，现在就恳求他们不要离开。结果这里居然有人不愿意离开……要人吗？人有的是！他要多少就可以再找到多少！武器吗？可以把被俘的德军连队的武器给他做基础，其余的让他自己再去设法！并且希望不要拒绝他跟我们在卡梅什纳雅河

上的部队取得联系……

名震全州的伊凡·克拉庇文的游击队，就是这样打下了基础。过了一星期，这支游击队就有了四十多名战士，并且拥有除了大炮以外的一切现代化武器。这支游击队以亚力山大罗夫村从前的牛奶场作为根据地，保卫着离德军战线非常近的好几个后方村庄。在我们军队开来之前，德军始终未能把伊凡·克拉庇文的游击队逐出这个地区。

但是杜尔根尼奇仍然不能把“青年近卫军”救出来。这一段的战线在一月下旬以前保持稳定。直到二月份，苏军才在相当长的一段地方强渡北顿涅茨河，而且最初强渡顿涅茨河的部队，是在相当上游的地方——在红利曼、伊久姆、巴拉克列亚那个地区——作战的部队。

杜尔根尼奇不知道“青年近卫军”里他的大部分战友的悲惨命运。但是向克拉斯诺顿进军的时间拖得愈久，他内心的痛苦和忧伤就愈是强烈。和他并肩完成了这么多辉煌的业绩、他为之贡献出他最美好的一部分心灵的那些男女青年，在他心目中也就变得愈崇高、愈纯洁、愈高贵。

有一次，牛奶场里有几个挤牛奶的姑娘在执行他的命令时发生动摇，她们坦白承认她们害怕德国法西斯匪徒。克拉庇文，也就是杜尔根尼奇，没有对姑娘发火，只是痛心地说：

“唉，你们这些姑娘！我们苏联的姑娘哪能这样？……”

于是，他忘掉了一切，开始对姑娘们讲起邬丽亚、刘巴和她们的女友的故事。姑娘们都听得愣住了，她们感到惭愧，同时又被他眼睛里突然迸射出来的幸福的光芒摄住。他突然住了嘴，两手一摆，话没有讲完就走了。

一直到二月份，杜尔根尼奇带着他的游击队加入了红军正规部队，才跟着这个部队强渡北顿涅茨河，来到了克拉斯诺顿。

在这个时期里，克拉斯诺顿的居民受尽了逃窜的德国军队带来的一切灾难。撤退下来的党卫队抢劫和赶走居民，炸毁城里和全区的矿井、企业和所有的大建筑物。

刘巴牺牲的时候离红军开进克拉斯诺顿和伏罗希洛夫格勒只有一个星期。二月十五日，苏联坦克冲进克拉斯诺顿，苏维埃政权马上就跟着回到了城里。

在接连好几天漫长的日子里，大批老百姓悲痛地看着矿工们不断从五号井的探井里拖出死难的布尔什维克和“青年近卫军”队员的尸体。在这几天里，死者的母亲和妻子始终守在矿井的井筒旁边，等着收领她们的孩子和丈夫的残缺不全的尸体。

叶列娜·尼柯拉耶芙娜在奥列格还活着的时候就到了罗文基。但是她对儿子的事无能为力，儿子也不知道母亲就在他的近旁。

现在，当着奥列格的母亲和他的全体亲人的面，罗文基的居民从坑里拖出奥列格和刘巴的尸体。

人们很难认出，这个两颊发黑而深陷、眼睛里含着的沉痛使性格坚强的人也会深为震惊的矮小衰老的妇人，就是以前的叶列娜·尼柯拉耶芙娜·柯舍瓦雅。但是，这几个月来她一直协助儿子做的工作，特别是使她万分痛苦的他的死难，把她身上的那股使她能超脱个人悲痛的精神力量显示出来。过去，那日常生活的帷幕挡住了她的视线，使她看不见充满人类的斗争、努力和热情的巨大世界，现在，帷幕好像被掀开了。在她跟随儿子的脚印走进这个世界之后，她面前就展开了一条为社会服务的广阔的大道。

这几天里还揭露了德国人另一罪行的详情：公园里矿工们的墓坑被发掘了。在掘开墓坑的时候，殉难者还是那样站立在泥土里：先露出头，然后露出肩膀、身子和手。在这里面发现了瓦尔柯、舒尔迦、彼得罗夫和怀抱婴儿的妇人的尸体。

从五号井的探井里挖掘出来的“青年近卫军”队员和成年人的尸体，都葬在公园里的两个烈士墓里。

参加葬礼的有全体活着的克拉斯诺顿布尔什维克地下组织的成员和“青年近卫军”的队员：伊凡·杜尔根尼奇、华丽雅·鲍尔茨、若拉·阿鲁秋仰茨、奥丽雅·伊凡卓娃和妮娜·伊凡卓娃、腊箕克·尤尔金等。

杜尔根尼奇向部队请了假来跟死难的战友告别，这时他的部队已经从克拉斯诺顿开到米乌斯河上。

华丽雅·鲍尔茨从卡缅斯克附近偷溜回来，玛丽雅·安德烈耶芙娜就把她送到伏罗希洛夫格勒一个亲戚家里，因此华丽雅是在那边迎接了红军。

生还的人们里面没有谢尔格·列瓦肖夫，他在越过战线时被打死了。

斯巧巴·萨方诺夫也牺牲了。红军突击的第一夜就收复了他在卡缅斯克住的那一部分城区，他参加了一个分队，在攻打卡缅斯克的战斗中牺牲。

阿纳托里·柯瓦辽夫被一个工人掩藏在新村里。他的强壮的身体遍体鳞伤，浑身的伤都连成一片，根本没法给他包扎，只好用温水把他身上洗干净，用被单把他裹起来。柯瓦辽夫在那里躲了几天，但是再把他藏下去有危险，所以他就去投奔亲戚。他住在顿巴斯还没有被解放的那个地区。

在红军收复伏罗希洛夫格勒之前，普罗庆柯和他的部队一直走在败退的德军前面，在他们最近的后方跟他们作战。一直到了伏罗希洛夫格勒，普罗庆柯才跟妻子卡佳见面，这是他们在高罗箕希附近分别以后第一次见面。

受普罗庆柯的委托，由纳烈日内率领的一队游击队员，从米佳金镇附近被封堵的采石场里掘出那辆著名的“迦济克”，它依然完好无恙，装满着汽油，甚至还有一桶备用的汽油。

这辆“迦济克”就像产生它的时代那样长命。

普罗庆柯和卡佳乘着这辆“迦济克”前往克拉斯诺顿，顺路把玛尔法的丈夫高尔杰依·柯尔尼延柯接到玛尔法那里去小住几天。在这里，他们得以听到玛尔法讲起她们村里的德国人最后几天的情况。

在苏军收复这个村子的前一天，玛尔法跟从前给奥列格的亲属赶过大车、又把自己的衣服换给普罗庆柯的那个老头结伴到原来的村苏维埃去。那里临时住着顿涅茨河对岸逃过来的德国宪兵队和“警察队”的官员。村里有好多居民都在村苏维埃旁边闲逛，希望无意之中能听到红军离这里有多远，或是只要看看法西斯匪徒逃跑的狼狈相来出出气。

玛尔法和老头站在这里的时候，又有一个“警官”乘着无座雪橇如飞而至。他在老头身旁跳下雪橇，用疯狂的眼睛四下一望，就匆匆地向老头问道：

“队长先生在哪里？”

老头眯起眼睛说道：

“什么先生不先生，你没看见同志们要追上来了吗？……”

“警官”骂了一句，但是他神色仓皇，竟没有顾得把老头揍两下。

那批德国人嘴里一边嚼着东西，一边从屋里跑出来，转眼之间就乘着几辆雪橇逃之夭夭，只见他们后面扬起了一片雪粉。

第二天红军就开进村子。

普罗庆柯和卡佳到克拉斯诺顿来追悼殉难的布尔什维克和“青年近卫军”队员。

普罗庆柯到这儿来另外还有一些事要办：应当恢复克拉斯诺顿煤业联合公司，修复矿井。此外，他希望亲自打听成年的布尔什维克和“青年近卫军”队员死难的详情，打听杀害他们的刽子手的下落。

斯塔庆柯和索里柯夫斯基跟着他们的主子逃跑了，但是侦查员库列肖夫被居民认了出来，被扣下交给苏联司法机关。通过他才知道斯塔霍维奇的招供，知道维丽柯娃和李亚德斯卡雅对“青年近卫军”的覆灭起了什么作用。

在殉难的布尔什维克和“青年近卫军”队员的墓前，他们的活着的同伴们宣誓要为战友复仇。在坟上竖立起临时的纪念碑——普通的木头方尖碑。竖在成年地下工作者坟前的那块碑上，写着以刘季柯夫和巴腊柯夫为首的他们的姓名，在“青年近卫军”的方尖碑的四面写着这个组织的为国牺牲的全体战士的名字。

这些名字就是：

奥列格·柯舍沃伊、伊万·捷姆奴霍夫、邬丽亚娜·葛洛莫娃、谢尔盖·邱列宁、刘波芙·谢夫卓娃、阿纳托里·波波夫、尼柯拉·苏姆斯柯依、符拉箕米尔·奥西摩兴、阿纳托里·奥尔洛夫、谢尔格·列瓦肖夫、斯吉潘·萨方诺夫、维克多·彼得罗夫、安托妮娜·叶里谢延柯、维克多·鲁基扬庆柯、克拉芙箕雅·柯瓦辽娃、玛雅·毕格里万诺娃、亚历山德拉·庞达烈娃、瓦西里·庞达烈夫、亚历山德拉·杜勃罗维娜、李箕雅·安德罗索娃、安托妮娜·马什谦柯、叶夫盖尼·莫什柯夫、李丽亚·伊凡尼兴娜、安东妮娜·伊凡尼兴娜、鲍利斯·葛拉万、符拉箕米尔·腊高静、叶夫盖尼·谢毕辽夫、安娜·索波娃、符拉箕米尔·日丹诺夫、瓦西里·庇罗若克、谢苗·奥斯塔片柯、耿纳箕·鲁卡肖夫、安格林娜·萨莫欣娜、妮娜·米纳叶娃、列昂尼德·达狄谢夫、亚历山大·希什庆柯、阿纳托里·尼柯拉耶夫、杰米扬·福明、妮娜·盖拉西莫娃、盖奥尔吉·谢尔巴柯夫、妮娜·斯塔尔采娃、娜杰日达·毕特里雅、符拉箕米尔·库里柯夫、叶芙盖尼雅·基依柯娃、尼柯拉·茹柯夫、符拉箕米尔·扎高鲁依柯、尤利·维采诺夫斯基、米哈伊尔·葛利高利耶夫、瓦西里·鲍利索夫、妮娜·凯济柯娃、安托妮娜·箕亚庆柯、尼柯拉·米朗诺夫、瓦西里·特卡契夫、巴维尔·帕拉古塔、德米特里·奥古尔卓夫、维克多·苏鲍丁。

一九四三——四五——五一年